

五千年 中外文化交流史

第四卷

李喜所 主编
元青 等著

5000 YEARS' HISTORY OF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OUTSIDE WORLD

世界知识出版社

5000 YEARS' HISTORY OF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OUTSIDE WORLD

《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全五卷）是一部全面系统地论述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沿革的大型专著。此书吸取了近二十年来我国文化研究热潮中的成果，阐明了许多有关文化的理论和历史问题，进行了创造性的思考和开拓，是一部品位很高、价值很大的力作。

元青等著

五千年 中外文化交流史

第四卷

世界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四卷/李喜所主编;元青等著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10

ISBN7-5012-1495-6

I.五... II.李... III.文化交流-中外关系-文化史
IV.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24883 号

责任编辑 周宇君
责任出版 刘林琦
责任校对 余 岚

书 名 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 第四卷
Wuqiannian Zhongwai Wenhua Jiaoliushi Disijuan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100010)
网 址 www.wapbook.com
排版印刷 世界知识出版社电脑科排版 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本印张 850×1168 1/32 印张:20³/₈ 字数:529 千字
版次印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版权声明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内容提要

本卷通过对民国时期中国与
世界各主要国家文化交往的考察，
生动而具体地再现了1912—1949
年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轨迹和基
本面貌。书中着重探讨了国民政
府、留学生、民间团体、来华学
者、外国教会等与中外文化交流
的关系，深入研究了中外文学艺
术交流、现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社
会科学交流、国外汉学研究及中
国文化在世界的传播等。作者对
一些重要的社团和人物适当地加
以评说，对有关民国时期文化交
流的不少理论问题提出了自己独
到的见解。全书注重史料的分析
考订，立论有据，观点鲜明，构
架新颖，内涵丰富。

李喜所 主编

5000 YEARS' HISTORY
OF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OUTSIDE WORLD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1

- 一、民国时期中外文化交流大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1
- 二、民国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主要途径/3
- 三、民国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内容与特点/7
- 四、本书的基本思路和研究重点/10

第二章 中美文化交流/16

一、留美生与中美文化交流/16

1. 留美教育概况/16
2. 留美生与科学民主思想的传播/25
3. 留美生与中美科技交流/30
4. 留美生与中美人文社会科学交流/39

二、杜威与中国/49

1. 杜威的中国之行/49
2. 杜威来华与实用主义哲学思潮的形成/57
3. 杜威与科学民主思潮的传播/66
4. 杜威实用主义与中国学术研究/70
5. 杜威教育理论的传播/78
6. 杜威教育理论与中国学制改革/84

三、胡适与中美文化/91

1. 全面吸收新大陆文明/91
2. 传播实用主义/95
3. 倡导文学革命/102

四、美国传教士与教育医疗事业/107

1. 美国在华传教事业的发展/107
2. 教会大学的繁荣/112
3. 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121
4. 教会医疗事业/126

五、中美文学艺术交流/129

1. 引进美国文学/129
2. 美国戏剧、电影艺术的传入/135
3. 民国时期来华的美国作家/139
4. 轰动新大陆的梅剧演出/147

六、美国的中国学研究/151

1. 传统汉学研究硕果累累/151
2. 现代中国学研究的确立/155

第三章 中苏文化交流/159

一、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苏俄及其文化的介绍/159

1. 十月革命的巨大震动/159
2. 走向红光里/161
3. 从东北到庶联/167
4. 苏联见闻录/171

二、苏联：中国引进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渠道/173

1. 瞿秋白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173
2. 赴苏留学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179

三、中苏文学艺术交流/190

1. 俄苏文学在中国/190
2. 中苏文化交流的使者——曹靖华、萧三/202
3. 中苏电影交流/217
4. 鲁迅与中苏版画交流/225
5. 徐悲鸿访苏与中国画展/230

6. 梅兰芳访苏与京剧的演出/232

四、俄苏的汉学研究/238

1. 史学研究/238

2. 文学研究/240

3. 艺术、哲学、汉语及其他/246

第四章 中英文化交流/248

一、罗素与中国/248

1. 罗素的中国之行/248

2. “我愿为中国竭尽微诚”/255

3. 罗素与中国思想文化界/261

二、中英文学交流/268

1. 蓬勃发展的英国文学翻译/268

2. 莎士比亚戏剧在中国/276

3. 英国作家来华/282

三、留英学生与中英文化交流/286

1. 留英发展历程/286

2. 留英生对祖国科技的贡献/293

3. 留英生与中英人文社会科学交流/300

四、英国的汉学研究/306

1. 英国汉学研究的发展/306

2. 李约瑟的早期来华活动和著述/310

第五章 中法文化交流/316

一、留法勤工俭学与中法文化交流/316

1. 留法勤工俭学的兴起/316

2. 法国文化氛围下的勤工俭学生活/327

3. 传播中国文化/336

4. 留法勤工俭学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338

二、中法文学艺术交流/347

1. 蓬勃发展的法国文学翻译/347
2. 傅雷等法国文学翻译家的卓越贡献/353
3. 法国文坛对中国文学的了解/362
4. 以法国为代表的西洋美术对中国美术的影响/365
5. 徐悲鸿等留法画家学习西方绘画的杰出成就/368
6. 冼星海留法归来后的贡献/375

三、法国的汉学研究/382

1. 法国的汉学研究机构/382
2. 法国著名汉学家及其汉学研究/385

四、法国教会教育在中国/389

1. 法国在华教会学校的中小学教育/389
2. 法国在华教会学校的高等教育/393

第六章 中德文化交流/399

一、德国哲学在中国的传播/399

1. 康德哲学在中国/399
2. 黑格尔哲学的传播/406
3. 引进叔本华与尼采/410
4. 奥伊肯、杜里舒与中国/417

二、德国的文学艺术与中国/420

1. 译介德国文学/420
2. 传播德国音乐/425
3. 介绍德国美术/427

三、中德教育科技交流/431

1. 在华德国人的教育科技活动/431
2. 中国学生赴德留学/434
3. 留德生与中德文化交流/441

四、德国的汉学研究与中国文化在德国的传播/449

1. 德国汉学学科的建立/449
2. 沟通中德文化的卫礼贤/452
3. 福兰克、佛尔克等人的汉学研究/458
4. 库恩的中国古典文学翻译/462

第七章 中日文化交流/465

一、甘苦参半的留日学生运动/465

1. 负笈东渡/465
2. 忍辱负重学文化/472

二、中日文学艺术交流/477

1. 日语词汇对现代汉语的影响/477
2. 日本文学译介及其对中国文坛的影响/480
3. 日本戏剧与中国戏剧界/492
4. 梅兰芳与中日戏剧文化交流/498
5. 日本美术与中国美术界/502
6. 日本音乐与中国音乐界/506

三、日本思想界学术界对中国的影响/510

1. 日本无政府主义学说在中国的传播/510
2. 马克思主义思潮对中国的影响/518
3. 中国社会学萌芽与日本学术界的关系/523

四、日本的汉学研究/525

1. 遍及全国的汉学研究团体和机构/525
2. 汉学研究的重要成就/531
3. 汉籍的日译/534

第八章 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文化交流/539

一、中印文化交流/539

1. 泰戈尔：中国新知识界的嘉宾/539

2. 国际大学中国学院/549
 3. 中国学者对印度文学的译介和研究/555
 4. 中国学者对印度佛教和印度哲学的研究/562
 5. 赴印的中国留学生与学者及来华的印度留学生与学者/566
 6. 印度的中国学/568
 7. 印度援华医疗队/569
- 二、中朝文学友谊与交流/571
- 三、中国与东南亚的文化交流/587
1. 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在东南亚/587
 2. 东南亚华侨华人与文化交流/588
 3. 郁达夫、胡愈之等文化界人士在东南亚/596
 4. 20世纪上半期的东南亚研究/598
- 四、中国与阿拉伯的文学交流/599
- 五、中加文化交流/603
1. 教会的“社会福音”传教事业/603
 2. 几位著名的传教士/608
 3. 加拿大医疗队在中国/618

附录一：民国时期中外文化交流大事年表/623

附录二：主要参考文献/635

后 记/643

作者简介/644

第一章 绪 论

一、民国时期中外文化交流大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

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民国时期是一个极为特殊的阶段，从1912年民国建立到1949年国民党政府撤出中国大陆，只有短短的37年。但是，从中外文化交流的广度和深度、影响和意义来说，这一阶段却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一个比较繁荣的时期。

民国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大发展，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

首先，晚清时期出现并日益扩大深入的近代中外文化交流为此时期文化交流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811年，马礼逊在广州出版了第一本中文西书，揭开晚清西学东渐的序幕。此后，中外文化从初步接触到联系逐步深入，文化交流的途径日益扩大，交流的内容日益丰富：传教士来华，中国留学生赴外留学，外交官联翩出使，西书大量翻译出版，新式学校广泛建立，新学科、新名词不断涌现，西方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生活习俗在中国日益流行，中外文化交流取得前所未有的重大成果。文化有着强烈的传承性，晚清时期所取得的中外文化交流的成果随着历史的推进逐渐积累下来，为民国时期的大发展做了必要的铺垫。

其次，民国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大发展得益于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的推动，得益于南京国民政府有关政策的驱动。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

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为西方文化进一步广泛传播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在随之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中，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更是高扬民主科学的旗帜，以解放人的思想为宗旨，大力引进西方的先进文化，猛烈批判封建意识形态，使思想文化领域呈现出中西文化大交汇的崭新局面，新文学、新艺术、新学术、新教育、新科学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随着全国统一局面的形成，各项建设事业有了较大发展。与之相适应，各项文化政策也逐步完善，包括留学教育在内的文化交流开始走上正轨。中央研究院等一批研究机构的建立和高等学校的发展，也推动了中外文化交流的进步。

第三，大力推进中外文化交流、传播西方先进文化是大批先进知识分子的强烈愿望，反映了他们努力向西方学习、振兴祖国的爱国热情。贺麟在谈到他研究黑格尔哲学的动机时曾说：“我之所以钻研黑格尔哲学，与其说是个人的兴趣，毋宁说是基于时代的认识”，“黑格尔的学说对于解答时代问题，实有足资我们借鉴的地方”，他的思想“实足振聋起聩、唤醒对于民族精神的自觉与鼓舞”。王光祈之所以大力介绍西方音乐，也是出于音乐救国的目的。他提出一方面要整理中国古代音乐使之发扬光大，另一方面则要大量输入西洋音乐，二者融合可以产生一种代表中华民族的音乐以激扬民族精神，使民众立志向上。贺麟、王光祈的举动反映了当时大批知识分子的态度。的确，中国自近代以来，内忧频仍，外患日迫，向西方寻找真理、引进西学便成为先进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必然选择。

第四，各国政府出于加强在华影响、为本国利益和现实政策服务的目的，在一定时期支持和鼓励与中国的文化交流，是民国时期文化交流大发展的重要原因。庚款留美的兴起就是典型的一例。美国率先提出将庚款余额退还中国，用来资送中国优秀青年赴美留学，即意在与其他列强争夺中国留学生教育权，是其对华政策的组成部分。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的确立，也深刻反映了当

时美国与中国紧密接触的对华政策，反映了为美国国家利益服务的立场。其他国家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此外，西方一些国家的宗教团体和传教士出于改变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对基督教的想法、加强教会在中国影响的目的，在中国兴办了许多文化设施，对加强中外文化交流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一些外国学者热爱中国文化，大力研究并向其国内介绍，推动了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传播。

正是在上述历史背景和多方面因素的推动下，民国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呈现繁荣发展的局面：交流的途径多种多样，交流的范围非常广泛，交流的内容极其丰富，在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写下多姿多彩的一页。

二、民国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主要途径

民国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途径主要包括了留学、翻译出版、学者互访讲学、传教活动、演出展览、图书交流等。其中，尤以留学、翻译出版、学者访问讲学、传教活动占据较重要的位置。

民国时期的留学热潮波澜壮阔，较之晚清有了更大的发展，出国的留学生至少有四五万人，其中仅赴美留学生就有一万多人。主要有公费生、自费生、赴美英等国家的“庚款生”、赴法国等欧洲国家的勤工俭学生及二战后中国与英美等同盟国的互换生、俄国十月革命后国共两党派赴苏联的政治留学生等类别。这些留学生大都集中在国外最好的大学，那里名师荟萃，学习条件优越，许多杰出的学者教授把自己的研究心得和学术观点无保留地传授给中国弟子，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留下许多佳话。正是在这些名师的指导点拨下，中国留学生学到了先进的科学知识、科学的研究方法，培养了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国外的良好教育，自己的勤奋努力，使留学生大都学有所成。他们归国后，在社会各领域内发挥了重要作用，许多人成就

卓越，成为中国现当代史上的重要人物。特别是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他们做出了出色的业绩。老一辈的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绝大多数来自留学界。在自然科学领域，他们组织科学团体，创办科学刊物，积极引进科学新成果，普及现代科学知识，鼓吹科学精神和科学思想，努力培养科技人才，为西方自然科学的传播、中国现代科技体系的建立做出了卓越贡献；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他们积极引进西方的学术思想，大量译介西方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成果，用新的研究范式进行学术研究，破旧立新，对中国现代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建立，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堪称功德无量。对于新文化运动的产生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革命进程的推进，留学生都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中华民国成立后，特别是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展开，中国知识界创办了一大批新式报刊，如《新青年》、《民国日报》、《新潮》、《晨报》、《每周评论》、《湘江评论》、《民铎》、《中学生》、《少年中国》、《创造周报》等。据统计，仅1919年和1920年两年之中，创办的报刊就有近百种。从1921年夏到1927年春，各党派、各社团创办的报刊竟达五百多种。这些报刊很多都开辟了诸如“新修养、新知识、新思想”、“讲坛”、“科学丛谈”、“译述”、“讲演录”等栏目，大量登载了介绍翻译西方文化的文章、演说、著作。如《晨报副刊》从1919年5月到1921年7月连载了杜威在北京所作的五大系列讲座、在南京所作的三大系列讲座。有的报刊还专门出了研究、介绍某西方大哲的专刊，如《新教育》杂志的“杜威专号”，《民铎》杂志的“尼采专号”、“柏格森专号”，《东方杂志》的“杜里舒专号”等。在大量创办报刊的同时，民国的出版业蓬勃发展，成立了大批出版机构，其中主要有中华书局、广益书局、正中书局、群益书局、北新书局、亚东图书馆、泰东图书馆等。很多出版机构都成立了编译部门，配备了外文编辑，大量翻译出版了外文书籍，主要包括西方现代科技书籍、西

方社会科学书籍、世界文艺名著。如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和新青年社出版了《马克思全书》、《列宁全书》，中华书局出版了《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文学研究会丛书》（重点介绍外国文学），新知书店出版了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书籍。民国时期报刊出版业的兴盛，为西方现代文化的传播提供了丰富的载体。

在民国时期的文化交流史上，活跃着一支来华访问讲学的学者、作家等外国知识分子队伍，他们积极传播西方现代文化，在民国时期的文化交流史上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杜威、罗素、泰戈尔、杜里舒、赛珍珠、萧伯纳、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贝特兰、孟禄、推士、克伯屈、麦柯尔、葛利普、巴克都是其中闪光的名字。他们对中外文化交流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一是传播了西方现代哲学。如杜威、罗素、杜里舒等人来华后，在各地作巡回讲学，广泛、系统地传播了实用主义哲学、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和生命哲学，对五四时期的思想文化界及中国现代哲学产生了巨大影响。二是介绍了外国文学，加强了中外文学界的友谊和交流。如泰戈尔来华，介绍了印度文学，有力推动了中国文学界对印度文学的翻译、介绍和研究；萧伯纳来华尽管时间很短，但也在文学界掀起一股热潮，使萧伯纳戏剧翻译成为文学翻译界的兴趣所在。三是带来了西方现代自然科学，促进了中外科学的交流。如：美国地质学家葛利普 1919 年被中国地质学研究所所长丁文江聘请来华，先后任地质所顾问和北京大学教授，主持古生物研究和调查工作，并著有《中国地层学》，对引进传播现代地质学理论立下功劳；美国农业专家巴克系著名作家赛珍珠的前夫，1915 年来华后在安徽从事农村调查数年，之后在金陵大学筹建农业经济系并任该系主任、教授，对引进美国现代农业知识做出很大贡献。像葛利普、巴克这样在中国高等院校任教的科技专家、学者还有一大批，他们以自己卓有成就的工作促进了中美科技交流。四是宣传了西方的现代教育理论。杜威、孟禄、推

士、克伯屈、麦柯尔都是世界现代教育史上声名显赫、极有影响的专家教授，他们的到来，大大推动了实用主义教育思潮的传播，对中国新学制的确立起了重要作用。五是向西方世界宣传介绍了中国革命和抗日战争。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贝特兰等是美英等国的一批新闻记者，先后于抗战时期来到中国，访问了抗战前线和陕北根据地，写出以中国革命和抗战为题材的报告文学，沟通了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宣传了中国革命和正义的抗日战争，为声援中国抗战、增进中外文化交流做出杰出贡献。

民国时期是西方教会势力大发展的时期。20年代初，来华新教传教士就有八千余名，天主教传教士也有近两千名，教徒更是数以百万计。此后，随着“非基督教运动”、非宗教运动和反对帝国主义高潮的兴起，来华传教士的人数有所减少，但到30年代抗战爆发前，传教势力又恢复到接近20年代初的规模。在一定时期和一定情况下，宗教传播和西学宣传是相辅相成、并行不悖的。为了更好地发展传教势力，使之更好地融入中国社会、为更多的中国人接受，教会兴办了许多文化设施，特别是高等学校。他们希望通过高等教育改变新一代知识分子对基督教的看法，并通过影响中国的知识精英和社会领袖，把握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这一时期兴办的教会大学有燕京大学、齐鲁大学、福建协和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武昌华中大学、辅仁大学、津沽大学，加之早先创办的圣约翰大学、岭南大学、震旦大学等，构成庞大的教会大学系统。这些学校具有优越的办学条件，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特别注重学科专业建设和课程建设，传播了现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推动了中国现代各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同时把欧美大学的办学传统和办学经验搬到了中国，培养了大批杰出人才，取得显著的办学效益。它对中国人自己兴办的高等教育也产生一种良好的示范效应。教会大学对民国时期中外文化交流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不可低估。

三、民国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内容与特点

民国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内容可以说极其广泛和丰富，涉及包括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工程技术等在内的自然科学，包括哲学、历史学、社会学、教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新闻学、图书馆学等在内的社会科学，包括文学、音乐、美术、戏剧、电影等在内的文学艺术等精神文化的各个分支。

西方现代自然科学早在晚清时即已传入，但比较零散，并未产生太大的影响。民国时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主要表现在：第一，现代科学知识和科学成果系统地输入进来。诸如万有引力定律、相对论、量子论、遗传学说、几何学、拓扑学、航空技术、X射线、青霉素、无线电、照相术、火箭、飞机等基本科学知识和科学新发现新成果都被介绍进来。第二，西方先进的科技体制传入中国，并被中国科技界迅速采用，主要包括各种科学技术学会和团体的设立，大量科学研究刊物的创办，科学研究机构的设立，为中国自己的现代科技体制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三，西方现代科学研究方法被中国科学工作者广泛采用，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其中一些成果在国际上居于领先地位。第四，在大批归国留学生和来华外国学者的努力下，现代科学教育取得长足进步，培养了大批科技人才，现代科学各领域的学科体系基本建立，现代科学的所有门类都得到发展机会。

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大体是在辛亥革命前十余年间，通过严复等人的介绍和大批留日生从日本转译而输入中国的，民国年间得到进一步的传播。首先，领域的覆盖面极为广泛，按西方学科的分类，举凡哲学、史学、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哲学社会科学的各个分支都被介绍过来。其次，每一学科的内容都得到系统全面的传播。以哲学为例，古希腊哲学、德国古典哲学、叔本华尼采哲学、实用主义哲学、逻辑实证主义哲学、生命哲学、马克

思主义哲学等西方古典及现代哲学都在介绍、翻译和研究之列。第三，在输入各学科门类基本知识的同时，西方学术的一套严密的思维方法和治学门径也随之引入，被大批中国学者用来从事学术研究，使固有的经、史、子、集失去了昔日在学坛的垄断地位，而沦为众多学科门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西方输入的各种新学科开始在中国生根成长。第四，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团体和研究机构大量成立，各种专业期刊学报纷纷涌现，文科师资队伍逐渐壮大，科研教学体制逐步建立。

文学艺术是民国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重头戏，其范围之广、内容之多，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从文学翻译方面来说，1911—1949年间共出版外国文学译著（包括重译本）近四千种，涉及到苏俄、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日本、意大利等几十个国家的文学作品，既有当时较发达国家的作品，也有当时处于被压迫地位的大批弱小国家的作品。文学样式丰富多彩，小说、诗歌、剧本、散文、报告文学、回忆录、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应有尽有。文学翻译队伍强大，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家中很多人的文学生涯是从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开始的，他们的翻译活动和创作活动占有同样的地位。就艺术交流方面来说，西方的戏剧、电影、美术、音乐等也大量输入中国。其中，莎士比亚、萧伯纳、奥尼尔的戏剧，美国、苏联的电影，法国、日本、德国的美术（油画、版画），德国、日本的音乐充斥了中国当时的艺术界。与此同时，中国的文学艺术也传到国外，特别是中国的古典文学作品、传统的戏剧如京剧等漂洋过海，传播到许多国家。

在民国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内容，即国外汉学研究的兴盛。标志之一是大批汉学研究机构 and 团体的成立。如日本的斯文会、支那学社、东方文化学院、中国文学研究会，苏俄的东方学研究所、全俄东方学家学会、中国问题科学研究所、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德国柏林、汉堡、莱比锡、法兰克福和哥廷根诸大学的汉学讲座及研究所，美国的太平洋学

会、哈佛燕京学社、远东协会等。这些研究机构、团体的成立，凝聚了一大批汉学研究人员，使他们的汉学研究走上规范化的轨道，也标志着国外汉学学科的逐步建立。标志之二是涌现了数量极为可观的汉学研究成果。这些成果覆盖了包括文学、艺术、历史、语言、哲学和宗教等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广泛领域，同时也注意到现代中国问题研究，如近现代的中外关系、中国革命史、中国的民族运动问题、工业化问题、中国农村调查问题。这些成果的出现，大大推动了中国文化在国外的传播。标志之三是产生了大批汉学造诣较深、具有丰厚研究实绩的著名汉学家，其佼佼者如德国的卫礼贤、英国的李约瑟、美国的费正清、法国的伯希和、日本的青木正儿、苏联的阿列克谢耶夫，他们以自己卓有成效的工作，推动了本国汉学研究的发展，为沟通中外文化树起一座座丰碑。

纵观民国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如下特点：

第一，民国时期尽管只有短短的 37 年，但中外文化交流形式多样，范围广泛，内容丰富，数量空前，在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我们之所以以几十万字的篇幅详尽描述这一时期文化交流的历史过程，原因也就在于此。

第二，文化交流的不平衡性。文化交流总是双向的，双方互相吸收，互相影响。但这并不排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里会出现不同的文化流向。近代以来，中国与外国（主要是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总体上属于异质文化交流的范畴，双方除具有不同的民族特点外，还具有显著的时代差异。其时，西方国家已经步入现代化的进程，初步实现了工业化，其文化具有较高的势能，而中国尚处于非常落后的状态。因此，尽管这一时期不乏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但文化交流的主要趋向是西方文化输向中国。

第三，文化交流的主体是一大批以留学生为代表的中国新型知识分子。与晚清时期相比，民国时期尽管文化交流的流向没有

变化，但文化交流的主体则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随着大批留学生的归国及国内新式学校培养的人才的成长，中国的新型知识分子队伍已渐成规模，他们把学习西方作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重要途径，主动承担起引进西方文化、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责任，大大改变了前一阶段中西文化交流中传教士一统天下的局面。

第四，文化交流的影响极其深远。文化交流是人类社会和各民族文化进步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民国时期的文化交流也不例外。纵览五四以来新文化发展和社会演变的历史，可以说倘若没有近代西方文化的输入和借鉴，没有近代西方文化对中国封建文化的冲击和影响，就不可能有中国新文化的产生，也不可能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具体地说，正是由于西方现代自然科学的传入，才有了中国现代科技体系的建立和中国科学的发展；正是由于西方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传入、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和研究范式才得以创立，社会科学研究才得以奠定以后大发展的基础，更重要的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在中国的统治地位也才得以实现；正是由于外国文学艺术的传入，中国旧的文学艺术在五四以后很短的时间内才可能完成向新文学艺术的转变。西方文化的输入，对改变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情趣、风俗习惯，增进中国与其他国家人民的相互理解和友好关系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四、本书的基本思路和研究重点

对民国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进行研究，早在民国年间就已经开始了。舒新城的《近代中国留学史》、周寿昌的《译刊科学书籍考略》（1936年）、王治心的《中国基督教史纲》（1940年）、郭沫若的《中苏文化交流史》（1949年）等一批论著分别对近代

以来中外文化交流的某个专题进行了探讨，其中对民国时期的情况有所涉猎，可以视为对这一课题研究的开始。但总起来讲，由于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化交流尚在进行之中，还不具备全面客观总结评价的条件。因此，这些研究大都较粗略。

1949年以后，随着民国时期的结束，人们有可能对这一历史阶段的情况进行全面总结回顾。特别是近二十年来，随着中国以新的姿态向世界开放，随着世界范围内文化交流的日益密切，对民国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进行深入研究逐渐引起中外学术界的兴趣，涌现出相当一批研究成果。宏观方面的论著主要有周一良主编的《中外文化交流史》、季羨林主编的《中外文化交流史丛书》、姜义华主编的《中华文化通志·中外文化交流典》、陈辛仁主编的《现代中外文化交流史略》等。除上述较宏观的中外文化交流史外，对民国时期文化交流作专题研究的成果就更多了，称得上丰硕喜人。譬如，在留学生与中外文化交流方面，就出现好几部以翔实的史料为基础、富有理论深度、研究比较系统的学术专著。陈启天的《近代中国留学史》、林子勋的《中国留学教育史》、李喜所的《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王奇生的《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沈殿成的《中国人留学日本百年史》、日本学者实藤惠秀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等都是这方面有代表性的著作。在传教士与中外文化交流方面，同样涌现出不少具有较高学术品位和参考价值的专著，如顾长声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史静寰的《狄考文和司徒雷登在华教育活动》，高时良主编的《中国教会学校史》，陶飞亚、吴梓明的《基督教大学与国学研究》，顾卫民的《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杰西·格·卢茨的《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1950》等。在文学艺术交流、哲学社会科学交流方面，主要有王锦厚的《五四新文学与外国文学》、黄俊英的《二次大战的中外文化交流史》、朱伯雄、陈瑞编著的《中国西画五十年：1898—1949》、田本相的《中国现代比较戏剧史》、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辑的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冯崇义的《罗素与中国》等。近年来，对国外汉学研究及中国文化在国外传播的历史进行研究也已逐渐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开始出现一些较有分量的学术论著。侯且岸的《当代美国的显学——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张国刚的《德国的汉学研究》、严绍望的《日本中国学史》、马祖毅、任荣珍的《汉籍外译史》、王丽娜的《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李明滨的《中国文化在俄罗斯》、王国忠的《李约瑟与中国》等都是该领域较扎实的学术专著。

学术界的研究状况表明，民国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已逐渐纳入中外学人的学术视野，并涌现出相当一批相关的学术成果。这为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同时也不可否认，这些研究从整体上说还是比较薄弱的，主要表现在：一、对某些专题的研究相当薄弱。如外国来华学者与中外文化交流的关系，中外科学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交流，中国文化在国外的传播及对世界文明的贡献，西方近代文化对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化的具体影响，可以说是这一时期中外文化交流中相当重要的内容，但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却很少。二、对于民国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缺乏综合研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部专门研究民国文化交流史的著作，这与此时期文化交流在中外文化关系长河中的重要地位极不相称。

鉴于上述情况，如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深入挖掘中外史料，扩大学术视野和研究范围，对民国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察，把课题研究提高到一个新水平，还有待于我们做大量的工作。

本书的基本思路就是通过对民国时期中国与世界各主要国家文化交往的考察，揭示这一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轨迹和基本面貌。鉴于这一时期文化交流形式与内容的纷繁复杂，我们既不可能也无必要进行面面俱到的阐述，而是抓住这一历史阶段文化交流的突出内容，进行了重点研究和评述。我们的研究工作主要

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留学生与中外文化交流。留学生是民国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主力军，在这一时期的文化交流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为完整、清楚地说明留学生在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和作用，我们在书中用了相当大的篇幅对留学生与中外文化交流的情况进行了详细描述，几乎每一章都涉及这方面的内容。如“留美生与中美文化交流”、“赴苏留学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留英生与中英文化交流”、“留法勤工俭学与中法文化交流”、“留德生与中德文化交流”、“甘苦参半的留日学生运动”等。其中，我们重点叙述了留学教育的发展历程，留学生在外国学习所在国文化的情况，留学生为引进传播西方现代科技和人文社会科学所做的工作，留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在华传播、对五四以来新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及对中国革命进程的推进所做的贡献，留学生在外国介绍中国文化的情况等内容。通过这些研究，大致勾勒出民国时期中国留学运动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阐述了留学生与中外文化交流的关系，客观评价了留学生在文化交流中的历史地位。

旅华外国著名学者与中外文化交流。在民国时期的中国文化舞台上活跃着一支外国学者队伍，他们或在中国巡回讲学，或在高校及研究机构任职，或以记者身份在抗战前线和革命根据地考察采访。这些人数量众多，在华时间长短不一，为传播西方现代文化、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做出极为重要的贡献。对这样一支队伍，我们没有理由不予重视。因此，我们在书中对这些来华学者与中外文化交流的关系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尤其对具有世界影响的西方思想大师杜威、罗素与中国的关系进行了专题探讨。以杜威来华为例，主要考述了其中国之行的历史过程，分析了他的到来与实用主义思潮形成的关系，研究了杜威传播科学民主思想的情况，杜威实用主义哲学对中国新的学术研究的影响，杜威教育理论的传播及其在中国学制改革中所起的主导作用，等等。

对于罗素来华，则主要考察了其中国之行的始末，评述了罗素在华期间及归国后所发表的关于中国问题的主要言论，分析了罗素思想对中国五四时期思想界的深刻影响。此外，我们对泰戈尔、杜里舒、赛珍珠、斯诺、贝特兰等人的来华情况及其在文化交流中所做的工作，也在某些专题中用较多的笔墨进行了阐述。

中外文学艺术交流。作为民国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重头戏，文学艺术交流可谓丰富多彩。为真实地呈现它的历史面貌，我们在每章中都设置专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探讨。包括各国文学作品（小说、诗歌、散文、剧本、报告文学等）的研究、介绍、翻译的情况及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国外戏剧电影艺术的传入及对中国戏剧电影的影响，中外美术交流，外国音乐的传入及对中国现代音乐的影响，中国传统艺术京剧赴国外演出及受到热烈欢迎的情况，都做了详细叙述。在这些研究中，我们注意把握了以下三点：一是注重外国文学艺术作品翻译引进的数量统计和分析，二是注重外国名家名作翻译、介绍的情况，三是重点研究评述了中国著名文学翻译家、画家、音乐家在中外文学艺术交流中的杰出贡献。

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引进。我们在“杜威与中国”、“罗素与中国”等专题中对实用主义、逻辑实证主义哲学的传播情况做了详细阐述。此外，我们还在“苏联：中国引进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渠道”、“留法勤工俭学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德国哲学在中国的传播”、“日本思想界学术界对中国的影响”、“中国学者对印度佛教和印度哲学的研究”等专题中对东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进行了较深入的评述。

西方传教势力的发展与教会教育医疗事业。其中重点探讨了教会大学的沿革，其办学经验和办学特点，教会大学的个案研究。

国外的汉学研究。在每章内容中，均列专题对此进行了较充分的论述，包括国外汉学研究机构、团体的设立，史学、文学、

艺术、哲学、汉语等传统汉学研究的重要成就，国外现代中国学的兴起等。

对西方现代自然科学的引进，本书在关于留学生及在华外国学者的教育科技活动等专题中也做了一定的阐述。

考虑到民国时期时间跨度较小，对上述研究内容，我们没有采取分期叙述的形式；为防止重大史实的遗漏，也没有采取专题研究的结构。而是以国别的形式对民国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进行了阐述。在前六章中，分别论述了中国与美国、中国与苏联、中国与英国、中国与法国、中国与德国、中国与日本之间的文化交流。最后一章，则把内容比较重要、但又很难单独成章的中国与其他国家文化交流的有关史实合在一起加以论述。希望这样的结构方式能较好地再现民国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面貌。

第二章 中美文化交流

一、留美生与中美文化交流

1. 留美教育概况

近代留美教育经历了一个曲折复杂的过程。自19世纪80年代初留美幼童被撤回国内，赴美留学一度中断。此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留美教育处于低潮。其间虽出现少量自费、官派生及获取美国奖学金而赴美留学者，但终没有形成规模。真正在留美教育史上形成大规模留学热潮，还是在民国时期。

根据留美教育发展的阶段特征，可以将民国时期的留美教育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即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

北洋时期的留美教育，其突出特征是庚款留美的兴起和清华留美预备学校的成立。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列强通过不平等的《辛丑条约》从中国获取了巨额赔款，史称“庚款”。其中，美国得到庚款总数的5%强，折合美金2500万元。当时美国的一些议员从美国在华长远利益出发，主张退还，作为中国向美国派遣留学生的经费。经过一番交涉，1908年5月25日，美国国会正式通过将庚款余额退还中国以资送中国优秀青年赴美留学的议案。美国此举意在与其他列强争夺中国留学生教育权，是其对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用心可谓深远。

根据上述议案，中美双方议定了具体实施办法：(1)从1909年开始，中国派一定数量的青年到美国大学深造；(2)创办清华学堂，作为中国青年赴美留学的预备学校；(3)在华盛顿建立游美学生监督处，负责管理中国留美生。为落实上述规定，清政府首先于1909年6月在北京成立了游美学务处，负责留美生考选事宜。1909年8月，该处举行第一次考试，经严格筛选，取中47人，当年启程赴美。1910年7月，游美学务处举行第二次考试，取中70名，包括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胡适、赵元任、竺可桢等人。1911年7月，游美学务处举行第三次考试，录取63人。这样，用庚款派往美国的留学生即达183名。游美学务处的成立及三批留学生的赴美，拉开了随后出现的留美热潮的序幕。

为了使庚款学生赴美前有所预备，游美学务处经清政府批准于1911年成立了清华学堂。辛亥革命后，学堂更名为清华学校，整顿了校务，开始紧张有序地培训留美预备生。清华的性质是留美预备学校，其经费一律由美国退还的庚款支付，美国派员参与学校的管理；学校每年招考学生的名额按全国各省分担庚款的比例分配，各省按所分名额考试选送；为了使学生赴美后能迅速适应那里的大学生活，学校在课程设置、教材选用、教学方式、生活安排、校规校纪等方面均仿效美国；学校学制分中等和高等两科，每科均为四年，高等科的三四年级相当于美国大学的一二年级，学生毕业赴美后可直接插入美国大学的二三年级学习。总之，清华学校的成立，为庚款学生留美做了充分的准备。

清华学校是中国留学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所留学预备学校。从1912年派出首批16名学生赴美，到1929年清华改办国立大学后派出最后一批学生，在近20年的时间里，清华共选派留美学生1279人。人数之多，居同期官费留美学生之首。

在庚款留美的带动下，这一时期还出现中央部费和地方省费等形式的官费生以及大量的自费生。这样，就以庚款留美为中坚力量，形成北洋时期的留美热潮。这一时期，留美人数迅速增

加。1910年，留美学生有500多人；^① 1911年，增至650人；^② 1914年，1300人；^③ 1915年，1461人；1917年，1500人；1924年，1637人；1925年至1928年，每年基本保持在2500人左右。^④ 人们惊呼：“中国留学生满布于美国。”^⑤

如果说北洋时期的留美教育呈现平稳发展的态势，那么国民政府时期的留美则充分体现出大起大落的波浪形发展特征。归纳起来，这一时期的留美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 1929—1932年：留美人数大幅度下降。从1929年开始，留美学生人数开始出现下降的趋势。据环球中国学生会1929年发表的统计结果，该年留美学生人数由1927年的2500人下降到1279人。^⑥ 1930年至1932年，留美人数更是每况愈下。造成这一阶段留美人数大幅度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的爆发。这场危机使美国深受影响，危机期间美国的生产下降了46.2%。经济不景气使美国青年都难以入学，更遑论外国留学生了。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于1929年颁布了《发给留学证书规程》，1933年颁布了《选派留学生暂行办法大纲》，整顿了留学制度，提高了留学资格，限制了一部分有志留学而资格不够的青年学子。此外，清华改办大学后停止庚款留美，也是这一时期留美人数下降的原因之一。

(2) 1933—1937年：留美人数有所上升。经济危机结束使美国经济发展走出低谷，国外学生开始重新把目光瞄准美国，中国

① 《美洲留学界情形》，《留美学生年报》（1910年）。

② 《教育界消息》，《教育杂志》第3卷第6期，1911年6月。

③ 《华人留学美洲之今昔》，《东方杂志》第14卷第12期，1917年12月。

④ 转引自王奇生：《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第45页，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⑤ 转引自李喜所：《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第311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⑥ 《抗战前教育政策与改革》，《革命文献》（台北）第54辑，第189页。

学子也不例外。此时，伴随着全国统一局面的形成和各项建设事业的蓬勃兴起，中国留学教育也开始走上正轨。1933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制定了比较规范的《国外留学规程》，对选派资格、公费生考试程序及科目、实行留学证书制度等做了十分详尽的规定。在它的指导和推动下，各种形式的留美应运而生。从1933年至1936年，清华大学举办了四届留美公费生考试，共派出92人赴美留学，其中包括后来成为著名科学家的钱学森、张光斗、赵九章、马大猷等人。与此同时，各省也纷纷举行留学生考试。这一阶段，河北、山东、安徽、江苏、江西、广东、广西等省至少举行了一至两次考试，录取者多为留美学生。正是在这种形势下，1933年后留美人数开始回升。据统计，1935年在美国大专院校注册的中国学生共有1443人，^① 1936年有1580人，^② 1937年达到1733人。^③

(3) 1938—1945年：留美人数处于民国时期的低谷。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海外中国学子纷纷辍学归国，共赴国难。同时，南京国民政府为了节约外汇以应战时之需，于1938、1939年相继颁布了《限制留学暂行办法》、《修正限制留学暂行办法》，规定抗战期间，公费生非经特准，一律暂缓派遣；自费生除有国外奖学金或其他外汇补助、无须请购外汇者外，一律暂缓出国；已在国外的自费生，除成绩特别优良者外，无论学习何种科目，一律不核给外汇。这些办法的出台，大大限制了学生的出国，使留美人数锐减。据1939年5月统计，留美学生当时已减至1163人。^④ 1938年至1941年四年间，赴美留学人数总共只有193

① 《中国留美留加学生概况》，《全国学术工作咨询处月刊》第1卷8期，1935年8月。

② 《中国留美学生学科统计》，《江西地方教育》第74期，1937年3月。

③ 《我国留美学生概况》，1937年4月7日《时事新报》。

④ 《中国留美学生现况》，《教与学月刊》第4卷6、7期，1939年9月。

人。^① 其间，清华大学只举办了一届（第五届）留美公费考试，16人取中赴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抗战形势日趋明朗，国民政府为适应培养抗战建国人才的需要，于1942年宣布废除《限制留学暂行办法》，重新放宽留学政策，并于1943年举行了第一次自费留学考试，录取327人，于1944年秋赴美。1943年，清华大学举行了第六届公费留美考试，22人取中赴美。这样，1942年后留美人数稍有上扬。但总体上，没有改变这一阶段的低谷现象。

（4）1946—1949年：抗战胜利后的留美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与西方其他列强相比，美国是青年学子最为理想的留学国度。因美国本土未曾沦为战场，其文化设施没有直接遭受战火摧残。对于中国来讲，战后青年学生大批赴美，还有其特殊的原因。当时，美蒋关系密切。美国提供各种奖学金，鼓励中国学生前往留学。南京国民政府为了战后重建工作，也需要派遣大量人员前往美国学习、进修。1946年7月，教育部在南京、上海、北平、重庆等九城市设置考场，同时举行公费留学考试和第二届自费留学考试。最后录取公费生148人、自费生1216人，外加此次公费考试落选而成绩合乎自费录取标准者718人，总计录取1934人。^② 这一时期，南京国民政府为了奖励为抗战做出贡献的青年军人和从军青年翻译，还举办了青年军人公费考试和翻译官考试，分别录取25人和97人。同时，各省市也进行了公费留学考试。1948年后，由于国民党的腐败和军事上的节节败退，很多人愤于时局或对前途感到渺茫，纷纷自备外汇涌入美国。由于上述原因，在抗战胜利后的几年里，汇成了一股强大的赴美洪流。据华美协进会统计，1948年在美国大学就读的中国学生有2710人，分布于全美45个州。1949年，中国留美学生更比上年

① 陈启天：《近代中国留学史》，第374页，（台北）天一出版社1979年版。

② 《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880—882页，（台湾）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

增长了40%，达到3797人，^①成为近代留美运动的最高峰。

可以看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留美潮流尽管呈现大起大落、波浪形发展的特征，但主导趋势是留美人数的大幅度上升。据统计，除日本以外，这一时期美国是拥有中国留学生最多的国家。抗战全面爆发以后，中国留学美国人数更是居所有赴外留学人数之首。

以上所述为民国时期的大体留美历程。

留美学生所学专业，总体上文理持平。北洋时期尽管没有十分精确的统计，但从各方面的情况来看，留美生学习文理者各占一半。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情况更是如此，有时学文科者稍多一点。据1935年的统计，在1443人中，除566人尚未分科外，学习理工农医者446人，学习文法商教者431人，文理科平分秋色。又据教育部1938年的统计，当时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有1000余人，其中学文科者占54.6%，学理科者占41%。^②另据1948年统计，在1675名留美生中，文科学生占55%，理科学生占44.3%。^③

然而，在公费留美生中，学理工者则明显居多。庚款留美生竺可桢曾回忆说：“我们这批七十人中，学自然科学、工、农的最多，约占百分之七十以上。……不仅我们这批如此，恐怕全部庚款留美生中学工农理科的都要占百分之七八十。”^④在1934年派出的公费生中，理工科占87%，文科只占13%。^⑤1945年，领有留学证书而出国的八人全部都是理工科学生。在1946年赴

^① 刘伯骥：《美国华侨史》续编，第434页，（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1年版。

^② 王焕琛：《留学教育》，第2082页，（台北）国立编译馆1979年版。

^③ 《最近教育动态》，《中华教育界》复刊第2卷第2期，1948年2月。

^④ 转引自李喜所：《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第311—312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⑤ 《抗战前教育概况与检讨》，《革命文献》（台北）第55辑，第84页。

美的 554 人中，绝大多数学理工农医。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是政府政策的推动。庚款留美兴起时，清政府为了鼓励留美生学习对实际有用的东西，以便回国后能服务于社会，更有鉴于以往的文法科留学生容易滋生革命意识，所以特别限定留美学生必须“以十分之八习农、工、商、矿等科，以十分之二习理财师范诸学”^①。这一方针决定了当时的留美学生大多学习应用科学。民国以后，这一传统基本上保持下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由于认为“当兹训政伊始，建设事业经纬万端，实用人才尤为需要”，因此决定“以后选派国外留学生，应注重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公费留学生应视国家建设上的特殊需要，斟酌派遣，每次属于理农工医的，至少应占全额十分之七”。^② 抗战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为适应抗战需要，更强调派遣“军工理医各科有关国防需要者”。此外，美国在自然科学等科目上的国际先进地位，也吸引着大批学子选择理工科。

在高学历的留美生中，学理工者也远多于学文科者。一份统计表明，1905 年至 1960 年在美获得博士学位的 2789 名中国学生中，习实类者 1914 人（自然科学 696 人，工程学 590 人，卫生科学 149 人，地球科学 40 人，生物 439 人），占 69%；而习人文社会学者只有 875 人，占 31%。^③

相对来说，自费留美生和留美生中的低学历者，则学文者占多数。个中原因很复杂，其中主要一点，恐怕在于学理工科难度较大，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特别是要获取较高学历，就更不易。而自费生大多是想获取一张文凭，习文科者较易获得。

无论公费还是自费，留美学生在国内时所受教育的程度都比

① 林子勋：《中国留学教育史》，第 589 页，（台湾）华冈出版有限公司 1977 年版。

② 国民政府行政院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③ 林子勋：《中国留学教育史》，第 601 页。

较高。据梅贻琦、程其保对近百年中国留美学生情况所做的调查，国内高校按其毕业生赴美人数多少排列，前20名依次是：①清华大学；②圣约翰大学；③中央大学；④交通大学；⑤燕京大学；⑥岭南大学；⑦北京大学；⑧金陵大学；⑨上海商学院；⑩复旦大学；⑪西南联大；⑫苏州大学；⑬中山大学；⑭吉林女子师范学院；⑮浙江大学；⑯武汉大学；⑰南开大学；⑱政治大学；⑲辅仁大学；⑳福建协和学院。这些学校教学水平高，注重英语训练，学生基础扎实，出国时还要经过严格的考试选拔。因此，学生质量比较有保证。这为学生赴美后的学习打下较为坚实的基础。

学生赴美后进人的学校大都是美国较好的大学，其中芝加哥、伊利诺依、康奈尔、哥伦比亚等20所高校吸收中国学生最多。这些学校名师荟萃，学习条件优越，中国学生在这里受到美国最好的教育。美国许多杰出的学者教授把自己的研究心得和学术观点无保留地传授给中国弟子，在中美文化交流史上留下许多佳话。正是在这些名师的指导点拨下，中国学生学到了先进的科学知识、科学的研究方法，培养了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他们日后成长为专家学者正是受益于此。

在国内学到了知识基础，又在美受到良好的教育，并经过自己的勤奋努力，留美生取得了突出的学业成绩。许多美国华侨认为：“中国学生在美国大学读书，一般都比美国同学更用功，天资也比较聪明。大学四年的课，往往三年读完。”^①留美学生在学期间获数学奖、物理奖、化学奖、文学奖者不乏其人。许多留美学生在学期间发表了有学术价值的文章，并在学术研究中崭露头角。竺可桢在哈佛求学期间就经常在《科学》月刊和美国的《每月天气评论》上发表关于中国雨量及台风问题的研究成果，引起国际气象界的重视。周厚坤写出《航空机振动促进法》，并

^① [美]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第78页，华东师大出版社1993年版。

获得美国航空学会奖。汤佩松在美学习时从植物体中首次发现细胞色素氧化酶，是当时很重要的一项学术研究成果。1943年3月麻省理工学院高等力学论文评选，前三名均为中国学生。当时该校校长特致函华美协进社社长孟治，称赞中国人智慧之高，中国政府选派学生之严格。^①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据袁同礼统计，1905—1960年期间，中国留学生占全美国每年授予博士学位人数的比例为15%，仅次于加拿大。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留美生学业成绩之优异。

留美学生的经济生活一般是比较平稳的（除抗战期间外）。因赴美路程较远、美国生活水平较高等缘故，留美费用是最为昂贵的。按教育部1936年所定留学公费标准，留英生每人每年3960元，留法生3888元，留德生4579元，而留美生则高达4935元。^② 一般家庭是无力承担的。据考察，留美自费生大多为家产殷实者。数量较少的公费生，其经费或由中央、或由省区定期按时汇给，生活也可保无虞。考取庚款留学者，生活则更为优裕。每月80美元的生活费在美国生活绰绰有余，在美国大学生中也算得上阔少。胡适留美时，还可寄钱回国赡养寡母。潘光旦20年代在美国留学，他后来回忆，每月80美元收入，在西部上大学的，每年还可节余一半寄回家。^③ 抗战爆发后，留美学生的生活受到严重冲击。随着战争的发展，一部分留学生的家庭沦陷于战区，经济来源中断。即使家庭未陷于战区的学生，也因战争的冲击和南京国民政府统制战时外汇，经济远不如战前充裕。太平洋战争发生后，中美之间的国际汇兑渠道受阻，留美学生的经费来源完全中断，几有流落海外之虞。一些学生被迫参加美国的一些战时工作，以获取报酬。美国国务院从总统紧急用款项下拨出

① 《教育通讯》复刊第5卷第3期，1948年3月。

② 《我国留学生出国留学之费用标准》，1936年12月8日《申报》。

③ 《过去的学校》（回忆录），第594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82年版。

80 万美元，资助成绩优异而生活无着的中国留学生，每人每月 75 美元，缓解了部分留美生的燃眉之急。与此同时，南京国民政府也拨出 30 万美元，在美国组织留美中国学生战时学术计划委员会，以奖励留美学生的战时学术研究，并对经济困难的留美学生予以适当救济。美国的一些大学和团体组织也对留美生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援助，帮助留美生渡过难关。

留美生不仅学业出类拔萃，而且满怀爱国之情、报国之志，完成学业后大都回到国内。在 1937 年的《清华同学录》上，共载有 1152 人，其中留美归国者有 1131 人，回国率在 98% 以上。新中国成立前后，他们更是掀起回国参加建设的热潮，华罗庚、赵忠尧、邓稼先、张文裕、钱学森等大批科学家冲破美国政府的重重阻力回到国内，为祖国建设和中美文化交流做出巨大贡献。

2. 留美生与科学民主思想的传播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思想文化界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努力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反对封建专制和旧礼教，宣传科学，反对封建蒙昧和迷信，树起民主、科学两面大旗，使民主与科学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题。

在宣传民主、科学思想的过程中，留美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

远涉重洋的中国学子，在踏上新大陆之后，立刻领略到美国的现代文明。一位留美生在家信中说：“凡游美国村市，虽至陋之邑，罔不具有文明国种种形式气象。街市整饬，绿阴夹道，而电车、汽车往返其间，物富民殷，观瞻壮丽，夜则电灯照耀，警察逡巡。民人安居乐业，无盗贼之患。人其室，则有自来水，有电话，有休息室，有澡浴室，有气管以通气，有沟洫以泄秽。其

外象之庄严，其内容之安适，迥异中土。”^①而反观中国，长期与外隔绝，积贫积弱，非常落后。中美之间的鲜明对比给留美生以强烈冲击。经过痛苦的思考比较，他们认识到“我国以礼教文物之邦，习焉成数千年专制之局”；而“美国以英人殖民之地，一跃而为新大陆共和之主，盖其自由独立之精神，有足多者”。^②同时也认识到，近代欧美“文明文物之盛，震铄千古，翔厥来原，受科学之赐为多”。^③中国欲成为文明富强之国家，必须学习和引进美国这样的民主与科学。于是，留美生在紧张的专业学习之余，开始大力宣传倡导科学民主思想。

留美生所宣传的科学思想主要包含以下内容：

第一，科学的极端重要性：科学是国家富强之本。留美生通过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考察，认定当今世界发展的关键是科学。中国之所以步步落后，也在于科学不发达。留美生陆费执在《中国宜组织科学学会》一文中指出：“今之世界，一科学世界也。国富兵强，文明进步，无一非科学发达为之基础。科学不发达，则政治因之腐败，教育因之迟缓，军备因之靡陋，农业因之欠厄，工业因之停滞，商业因之闭塞。是则科学者，为治国之本也。”^④因此，中国要振兴，惟有科学。他们疾呼：“吾辈负笈异域，将欲取有用之学术，救我垂危之国命，舍图科学之发达，其道未由。”^⑤“继兹以往，代兴于神州学术之林，而为芸芸众生所托命者，其为科学乎，其为科学乎！”^⑥表达了“科学救国”的强烈愿望，把科学视为救国的惟一途径。

① 《教育杂志》第3卷第8期，1911年8月。

② 《留美学生季报》1914年第1期。

③ 《科学》第1卷第1期，1915年1月。

④ 陆费执：《中国宜组织科学学会》，《留美学生季报》1918年第1期。

⑤ 赵元任、任鸿隽等：《科学社致留美同学书》，《科学》第2卷第10期，1916年10月。

⑥ 《科学》第1卷第1期，发刊词。

第二，科学方法：科学研究与探求真理的不二法门。科学的兴起是同科学方法的运用偕与俱来的。留美生深知此点，因此在宣传科学重要性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引进传播科学方法。任鸿隽认为，学习国外的科学技术，要从根本上着手，即“吾人今日之从事科学者，当不特学其学，而且学其为学之术，术得而学在是焉”。所谓为学之术，即指科学方法。胡明复也强调科学的实质在于科学方法，他说：“盖科学必有所以为科学之特性在，……此特性者何？即在科学之方法。”正是出于这种认识，留美生在五四前发表了大批介绍宣传科学方法的文章，如胡明复的《科学方法论》，任鸿隽的《建立学界再论》，赵元任的《海王星之发现》、《说时》，王珽的《法国之科学》，杨铨的《实业时》，等等。在这些文章中，留美生重点介绍了实验方法和逻辑方法。所谓实验方法，就是后来胡适所说的“试验室里的方法”。它重视证据，重视实证的事实即经验事实和实证材料，重视检验。所谓逻辑方法，是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综合、比较、推广的一种方法，包括归纳法和演绎法。留美生对这些科学方法的学习和引进，不仅使他们自己受到现代科学方法的熏陶和训练，而且对五四时期科学思潮的兴起乃至中国现代科学的发展，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三，科学精神：求真求实。留美生提倡科学，突出强调科学精神。认为科学精神的真谛就是求真求实。任鸿隽曾发表《科学精神论》，认为科学的核心精神既非研究材料，也非研究方法，而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者何？求真理是也”。而“真理之特征”就是“有多数之事实为之佐证”。因而，科学精神必须有两个不可或缺的要害，即“崇实”与“贵确”。^①胡明复在《科学方法论》中同样认为“科学方法之惟一精神”就是“求真”和“立真去伪”。他还具体论述了科学的精神及其意义：“此精神直

^① 任鸿隽：《科学精神论》，《科学》第2卷第1期，1916年1月。

接影响于人类之思想者，曰排除迷信与盲从。考诸西国科学发达史，盖自然科学发展以来，几无日不与旧迷信旧习尚旧宗教旧道德相搏斗，然其结果，则不待科学之自身发展而已也，即风俗道德与宗教亦因之进于纯粹，而趋于真境。”^①五四时期科学声浪响彻云霄，其最主要的意义表现在科学精神、求实态度和理性思维的张扬。留美生的上述宣传，使这种科学精神和理性思维深入中国思想文化界。

在宣传上述科学思想的同时，留美生还组织了科学团体，开展了各种科学活动，大力传播了西方现代科学知识。关于这些内容，我们将在下一个专题中予以介绍。

如果说留美生对科学思想的传播，前提在于他们对西方现代科学的信仰，那么他们对民主思想的宣传，则首先来自于对美国民主政治的推崇。留美生一般都在美国生活六七年左右，这种长时间的潜移默化，自然培养出某种美国式的民主意识。一位留美生曾说：“乘舟来美者，入纽约湾，遥见自由神像，昂首立海中，……则自由独立之念，不觉油然而生。”^②再加之书本上的学习，实际的社会考察，留美学生几乎为美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所同化，因此赞美之词溢于言表。伍廷芳称赞“人民主权之在美国，正如群卉当春，奇花怒放，发育已至全盛之期”。^③还有人说，假如袁世凯生在美国，中国人民有美国人民那种觉悟，他还敢做当皇帝的梦吗？在留美生的思想中，美国的宪法、政党及竞选等都是好的。

正是出于这种认识，留美生在其所办的《留美学生年报》、《留美学生季报》、《留美学生月报》等刊物上发表了大量文章，介绍和评论美国的民主政治。如《美国大总统选举法》、《美国的

① 胡明友：《科学方法论》，《留美学生季报》1917年第1期。

② 叶建柏：《美国工商发达史》“序言”，中华书局1918年版。

③ 伍廷芳：《美国视察记》，第17页，中华书局1915年版。

国民主义》、《共和国民必要之心理》、《法律可改变吗?》等。还有人在日记、著作、演说中对美国民主政治详加介绍,推崇备至。胡适在留学日记中就留下关于美国政治组织、政党、总统选举团、选举制度及美国宪法、政府机构等大量评介文字。在撰文演说的同时,留美生以自己组织的各种社团为单位,模仿美国的议会程序,公开竞争,辩论演说,民主选举。他们认为,中国不讲也不会有党派竞争,又缺少议事能力,更无公开演说辩论的传统。他们之所以模仿美国的竞选及议会程序,目的就在于宣传、倡导美国的民主政治和民主精神。事实上,这种模仿活动确实起到传播民主思想的重要作用。

在评介和实践美国式民主的同时,留美生撰写了大量文字,用他们所掌握的政治标准批评中国社会,呼吁中国实行民主政治。1914年,杨铨在《留美学生季报》第1期上发表《社会罪言》,抨击了中国社会的各种弊病,分析了产生的原因,鼓吹变法革新,实行民主政治。1918年,赵元任发表《十七字诗十八首》,形象生动地揭露了民初的社会怪现状。如讽刺袁世凯称帝:“清亡帝室空,老袁进皇宫,万民俱叩首,送终。”批评留学生做官:“实业并不难,只要在乎专,回去第一样,做官。”揭露封建道德:“既讲礼与义,又重 Purity (贞节),当仁让我先,狎妓。”当年,侯德榜也撰文指出:“民国成立,于今七年,其间三复共和,四易总统,国中庶政之不举,民生之憔悴,无以异于前清。而地方之受刀兵之祸,人民之遭离乱劫夺,乃有甚于前清。”因此,必须改变中国的政治社会现状,使中国成为民主社会。

留美生对科学民主思想的传播,无疑是五四前后兴起的科学民主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倡科学,是由留美生首先提出来的。人们往往依据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的《敬告青年》一文(文中鼓吹“科学与人权并重”),认为是陈独秀首先提倡科学。殊不知在此前一年即1914年,留美生就成立了“中国科学社”,明确提出科学救国的思想。提倡民主,尽管不能说

是留美生首先提出的（晚清时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已提出民主思想），但他们鼓吹美式民主之不遗余力，也是有目共睹的，实际上对推动国内民主思潮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新文化运动期间，以胡适为代表的大批留美生学成归国，在思想文化界和教育界大力宣传和实践科学民主思想，更成为科学民主思潮的重要代表人物。可以认为，留美生对科学民主思潮的兴起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3. 留美生与中美科技交流

美国是世界科技强国，有大批造诣深厚、声名卓著的科学家，有一套完善的行之有效的科技体制，在许多学科领域走在其他国家前面。正是在这里，留美学生受到严格的科学训练，培养了求真求实的科学态度，同时也掌握了世界先进的科学知识和科技成果。为了把自己之所学贡献给落后的祖国，他们在留学期间及学成归国后，努力致力于科学引进、传播、研究、教育工作，为中国现代科技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发挥了主导作用，做出了重要贡献。

如何引进、传播科学呢？留美生最先想到的是组织科学团体，创办科学刊物。

1914年夏，在康奈尔大学留学的中国学生赵元任、任鸿隽、杨铨（杨杏佛）等在一次聚谈中，商定创办一份杂志，以便向国人灌输科学知识。之后，他们便筹集资金、联系作者，商讨出版事宜，并将刊名定为《科学》，每月一期。为了筹集资金并处理有关事宜，他们组成了“科学社”。翌年10月，正式定名为“中国科学社”。该社以“联系同志，研究学术，以图中国科学之发达”为宗旨，受到留美生的热烈拥护。不到几个月，即已发展社员七十多人，所筹资金也有相当数量。1915年1月，中国历史上第一份自然科学的专门刊物《科学》月刊在上海出版了。

从《科学》月刊编发的内容来看，它既有综合性的科学理论

探讨，又有分科论述和各种知识性的介绍，还旁及一些文化生活知识，具有研究性、知识性、趣味性等特点，深受广大读者欢迎。许多青年把《科学》月刊当做获取知识的宝库，不少科学工作者也从中受到了启发。《科学》月刊从1915年创刊，直到1950年与《自然科学》合并，共刊行了35年。其间，三千多篇学术论文在该刊上发表，总计两千余万字。《科学》月刊为中美科技交流，为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 and 人民科学知识水平的提高，做出了巨大贡献。

创办《科学》月刊为中国科学社赢得良好声誉。但发行刊物并不是它惟一的活动。在1915年中国科学社成立大会上通过的社章中，就规定了以下9个方面的活动内容：(1) 发行杂志，传播科学，提倡研究。(2) 著译科学书籍。(3) 编定科学名词，以期划一便学者。(4) 设立图书馆以供学者参考。(5) 设立各科学研究所，施行实验，以求学术、工业及公益事业之进步。(6) 设立博物馆，搜求学术上、工业上、历史上以及自然界各种标本陈列之，以供展览及参考。(7) 举行学术演讲，以普及科学知识。(8) 组织科学旅行团，进行实地科学调查研究。(9) 受公私机关之委托，研究及解决科学上一切问题。^① 从科学社发展的历程来看，这九个方面的工作都取得了一定成绩。科学社也因此逐步发展壮大。1918年，该社由美国迁回国内。社员也由1914年的35人，很快发展到1919年的435人。1924年增至648人。到1932年时，增至1400多人。到1949年，更发展到3776人。中国科学社成为民国时期中国第一大科技团体。

除中国科学社外，民国时期留美生组织或参与组织的科技团体还有很多。如1912年由詹天佑等人创办的“中国工程师会”，1917年过探先等人创办的“中国农学会”，1924年竺可桢等人创办的“中国气象学会”，1932年王箴、王璠等人创办的“中国化

^① 《中国科学社社史简述》，《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

学会”，梅贻琦、李书华等人创办的“中国物理学会”，1934年竺可桢等人创办的“中国地理学会”，秉志等人创办的“中国动物学会”，1935年胡敦复等人创办的“中国数学会”等。这些科技团体发行科学刊物，定期召开年会，举行科学演讲，邀请外国科学家来华讲学，翻译出版科学书刊，为现代科技的引进传播、为中国科技的发展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

在组织科技团体的同时，留美生还创办了一些以传播科学、繁荣学术为宗旨，以研究、宣传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科技成果为主要内容的刊物。其中一类是综合性杂志，如《留美学生年报》、《留美学生季报》、《留美学生月报》；另一类是专业性自然科学杂志，如《化学通报》、《物理学报》、《数学学报》、《地质学报》、《植物学报》、《气象知识》；再有一类是科普读物，如《科学画报》、《科学时代》、《科学新闻》等。这些刊物的创办，为中美科技交流的发展、为中国科学事业的繁荣提供了丰富的载体。

综观民国时期留美生对科学的传播，其内容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①

第一，引进科学新成果、新发现。民国时期的留美生首次将西方现代科学以整体性面目介绍给中国人，其内容涉及理论、技术、方法三个基本层面。从理论科学方面来说，包括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天文学、地质学、地理学、气象学、生理学等；从技术科学方面来说，包括冶金、化工、铁路、采矿、机械、土木工程、电气、水利及农林等。其中，他们特别注意引进新的科学成果和科学发现。20世纪初，X射线、放射性元素、电子相继被发现（所谓“三大发现”），相对论、量子论、遗传学说相继建立。留美学生对这些新东西迅速做了介绍。如任鸿隽的《爱因斯坦之重力新说》、杨铨翻译的《爱因斯坦相对说》都对相

^① 参见王奇生：《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第290—292页，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徐曼《近代留美生与中国科技》（打印稿），第17—18页。

对论做了较通俗而完整的介绍；杨孝述的《原子论》、任鸿隽翻译的《原子的构造》对原子结构及量子力学做了介绍；秉志的《动物与天演》、钱崇澍的《天演新义》对遗传学说做了介绍。在数学领域，《科学》等刊物也刊行了许多译介、论述学术新进展的文章，如“近世纯粹几何学”、“拓扑学”等。此外，留美生对原子堆、火箭、超音速飞机、传影电话、潜艇、青霉素的制法、海洋热能利用等当时的新技术、新成果也做了详细而及时的介绍。

第二，普及基本科学知识。留美生在将科学新发现、新成果介绍到国内的同时，也意识到“吾国科学程度方在萌芽”，不能“过求高深，致解人难索”。而应“使读者由浅入深，渐得科学上智识”。^①因此，他们非常注意介绍科学基础知识、基本原理。譬如，《科学》第1卷第1期就刊载了胡达撰写的《万有引力之定律》，杨孝达撰写的《欧姆定律》。最初的另外几期还刊出关于X射线、无线电、电灯、照相术、细胞原理、军事医学、植物选种论等方面的内容。留美生还针对当时人们对一些常见的自然现象的愚昧无知，写文章深入浅出地阐明其背后的科学道理。如胡达的《说虹》、张准的《论水》、唐铎的《雷电说》、竺可桢译述的《说风》、胡达译述的《彗星》等，就在介绍科学常识的基础上，澄清了古人对一些自然现象的错误认识和迷信思想。为了便于读者接受科学知识，留美生在撰写这些科普文章的时候，力求形式活泼多样。赵元任编写的关于地球知识的《科学会话》，竺可桢编写的《钱塘江怒潮》、《空中航行之历史》，便是通俗易懂、引人入胜的文章。此外，他们还以文画结合的形式宣传介绍科学。1933年8月，留美学生创办了《科学画报》。其宗旨是“要把普通科学知识和新闻传输到民间去，……逐渐地把科学变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使他们看科学为容易接近、可以眼前利用的资

^① “例言”，《科学》第1卷第1期，1915年1月。

料，而非神秘不可思议的幻求”。^① 此刊出版后风行一时，月销售量高达 23000 册，成为当时国内最有影响的科学普及读物。留美学生对基本科学知识的普及，开了现代科普宣传的先河，对当时的中国人具有重大的启蒙意义。

第三，科学名词的划一与审定。中国现代科技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大量科学名词和概念需要翻译。但自从翻译书籍流行，名词混乱的现象十分严重。这对于中国科学的发展非常不利，因此，划一和审定科学名词就成为十分必要和迫切的工作。中国科学社成立之初，就将“审定名词”列为一项重要工作。1916 年，他们专门成立名词讨论会，推举赵元任、胡刚复、周铭、张准、顾唯精等五人为理事。后来，又成立了名词审查委员会，每年暑假期间分学科组召开会议，审查通过科学名词。《科学月刊》上还经常刊登讨论科技名词翻译的文章，并发表过几批科技名词审定草案。在他们的努力下，《算学名词》、《化学名词》、《物理学名词》等多学科的名词先后审定出版。科学名词的划一审定，是引进和发展科学技术的必备条件，留美学生在这方面首开先河，做出积极贡献。

如果说留美学生的上述工作主要还停留在对西方现代科技一般性的介绍和引进的层面，那么，他们在此基础上所进行的杰出的科学研究和科学教育工作，则使现代科技在中国生根开花。

留美生从留学时起就注重科学研究，撰著了许多高质量的有创见的学术论文和著作，对促进中国科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回国后，他们分布在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运用所掌握的科学方法进一步开展科研工作，取得极为丰硕的成果。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本世纪二三十年后，现代科学的所有门类都在中国获得发展机会，科研成果不断涌现，其中许多在国际上居于领先地位。

^① 《科学画报》发刊词，1933 年 8 月。

譬如，在数学领域，中国第一位数学博士、留美生胡明复1918年在享有世界声誉的学术刊物《美国数学会会刊》上发表了自己的博士论文，表明他在二阶线性微分方程组的研究中获得突破，并由此揭开了中国现代数学的帷幕。留美生姜立夫曾以《非欧几里得空间直线球面变换法》一文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致力于数学研究，在圆素几何和球素几何方面取得了创新性的进展。江泽涵毕生致力于拓扑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取得系统性的研究成果。

在物理学领域，留美生中获得杰出成就者更是不乏其人。他们在留学期间即已取得不少令人瞩目的成绩。王守竞第一次把量子力学应用于分子运动的研究，取得了国际公认的成果，他被美国人称为“中国物理俊才”。周培源、赵忠尧、何增禄在加利福尼亚学习期间，也获得杰出成就，被美国著名科学家称为“加利福尼亚的中国三杰”。胡刚复在哈佛大学研究X射线，饶玉泰在普林斯顿大学研究水银蒸气的低压弧光，叶企孙在芝加哥大学测定普朗克常数，都有突出成就。他们回国后致力于研究工作，更结出累累硕果。其中，周培源关于金属自由电子反磁性的研究，王竹溪关于湍流理论的研究，赵忠尧、龚祖同关于镭放射和Y射线的研究，张文裕关于宇宙射线的分布及其性质的研究等，都得到国际物理学界的公认。邓稼先、赵忠尧、郭永怀、钱学森、朱光亚对发展我国的核技术及导弹技术，师昌绪对发展高温合金技术，林兰英对发展半导体技术，常迥对发展无线电技术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开拓性贡献。特别是钱学森，更以其杰出的科学成就成为留美生和广大科学家的典范。

钱学森系清华大学第二届公费留美生，在加州理工学院攻读空气动力学，师从于世界气体力学大师冯·卡门，曾获优异成绩，并为二战期间美国的火箭研究做出重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他积极争取回国参加建设，遭到美国官方的百般阻挠，被扣留达五年之久。直到1955年中美两国在日内瓦举行大使级谈判，经过

我国政府多次严正交涉，并以释放美军被俘飞行员为代价，他及郭永怀等一批留美科学家才回到祖国怀抱。之后，他出任中国科学院新成立的力学所所长和国防部五院院长，主持研制了我国的导弹、运载火箭、弹道火箭、人造地球卫星，被誉为“中国导弹之父”。周恩来总理曾指出，50年代中期的中美大使级会谈，虽然没有取得积极的结果，但要回来一个钱学森，就是这一件事情，会谈也是值得的。1985年，他与另外两位留美出身的导弹专家梁思礼、屠守锷，荣获国家科技特等奖。1989年，他与美国氢弹之父泰勒博士一起荣获国际理工界最高奖——“小罗克韦尔奖”。1991年，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他“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奖”，他成为我国目前惟一获此殊荣的人。这些荣誉象征着钱学森对中国及世界科技所做的卓越贡献。

在化学及化工领域，留美生中同样成长起大批杰出科学家，如吴学周、庄长恭、曾昭抡、侯德榜、唐敖庆、时钧、严东生、何炳林、陈茹玉等，他们在留美期间及回国后同样取得辉煌业绩。留美生刘树杞的博士论文《从铬酸盐废溶液中电解再生酸的连续方法》获得美国专利，这一方法曾被许多著名科学家运用。他还在美国完成了“电解制造铍铅合金”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崭新的制造铅合金的方法，成为当时化学界公认的一大发明。唐敖庆的量子化学研究，严东生的材料化学研究，庄长恭的有机化学研究，曾昭抡的分析化学及有机化学理论研究，都取得重要成果，受到国际化学界重视。在化工方面，最有成就的当数留美科学家侯德榜。他1921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化学工程博士学位，回国后长期致力于中国化工事业的发展。20年代，在他指导下，中国建成亚洲第一大碱厂。30年代，他又主持建成亚洲最大的硫酸氨厂。1943年，他首先在实验室里完成连续生产纯碱和氯化氨的联合制碱工艺，而后实现了大工业化生产。这一方法解决了当时世界制碱工业的难题，被称为“侯氏制碱法”。此外，他还于1932年在纽约出版了《制碱》一书，引起化学界和化工界

的极大关注。侯德榜是中国现代化学工业奠基人之一，世界制碱工业的权威。

在生物学、农学等领域，随着一批学有所成的留美生陆续回国，也取得很多重要成果。生化家王德宝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核糖核酸；微生物学家沈善炯发明了抗生素金霉素；汤佩松首先证明植物体内存在细胞氧化酶；小麦专家金善宝与助手一起培育了京红号春麦良种，平均单产比风靡世界的墨西哥小麦品种增产一二成；邓叔群长期从事粘菌、真菌的分类研究，发现新属 4 个，新种 120 个，均为国际所公认。

在工程技术领域，留美生在铁路工程、土木工程、冶金工程、电力工程、航空工程、车辆及造船工程等方面均有所作为。其中，茅以升作为我国现代桥梁学的奠基人，主持建造了钱塘江大桥、武汉长江大桥，创造了“沉箱法”、“浮运法”等科学新方法，使大桥建造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在航空工程方面，留美生也取得极为突出的成绩。

留美科学家的研究工作是相当出色的，他们的许多成果在中国乃至世界科技史上写下灿烂篇章。然而，中国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要想把科技搞上去，建立中国自己的学科体系，单靠归国留美生自己埋头钻研，显然是不够的。留美生也深知此点。因此，他们在大力开展科学研究的同时，十分注重培养科技人才，注重发展中国的科学教育。如在数学领域，姜立夫回国后创立了南开大学数学系，培养出一大批后来闻名中外的数学人才，如江泽涵、吴大任、陈省身、孙本旺等；胡明复回国后先后在大同大学、国立东南大学、南洋大学、上海商科大学教授数学，也培养了大批数学人才。在物理学领域，饶毓泰、叶企孙、梅贻琦、萨本栋、赵忠尧、周培源等人回国后开辟了清华大学物理系、北京大学物理系、燕京大学物理系等物理学阵地，并成立了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奠定了中国物理学事业的基础。后来成为著名物理学家的王淦昌、钱三强、

钱伟长、王大珩、何泽慧等人，正是在上述地方打下牢固的物理学基础。在生物学、农学等领域，留美生过探先在东南大学农科主持工作时，引进美国高等农业教育体制，培养了大批农科毕业生，这些人后来都成为我国农业科学的重要奠基人。竺可桢作为中国现代气象学和地理学的奠基人，先后执教于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并出任浙江大学校长，培养了大批气象学和地理学人才。总之，在留美科学家以及其他科学家的努力下，中国的科技人才得以大量涌现，西方现代科技得以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中国的现代科技体系得以逐步建立。

留美生在引进传播及建立发展现代科技体系的过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做出了卓越贡献。而他们自己也成为中国科技界的主导和中坚力量。在1948年选出的中央研究院81名院士中，留美生有49人，其中，学自然科学的留美科学家34人，占全部院士数的41%。这还几乎不包括30年代后留美的科学家，因为30年代以后的留学毕业生此时才刚刚崭露头角，他们的研究工作尚处于积累时期，他们大多数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脱颖而出。在1955年、1957年、1980年三次选出的中科院400多名学部委员中，留美出身的科学家有235人，占到全部学部委员数的50.1%。请见下表：

中科院各学部委员学历状况对比表^①

	留美	留欧	留日	留苏	留加	国内大学毕业生
数学物理部 (84人)	30	26	3	5	1	19
化学部 (75人)	47	17	-	3	-	8

^① 据《中国科苑英华录》（新中国之部，上、下册，科学普及出版社1985、1988年版）编制。

	留美	留欧	留日	留苏	留加	国内大学毕业生
生物学部 (117人)	68	27	4	2	2	14
地学部 (91人)	30	26	1	4	-	29 (另有留印1人)
技术科学部 (102人)	60	28	-	3	-	10 (另有自学1人)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设立的最高学术称号，代表了中国科学界的最高水平，象征着科学家的最高荣誉。从上述学部委员的学历状况对比表中，我们不难发现留美生实际上已经成为新中国科技事业发展的主力军。

4. 留美生与中美人文社会科学交流

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不仅在科技上独领世界风骚，而且在人文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也颇有优长之处并独具特色。正是在这里，许多留美生受到了西方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严格训练和美国人文环境的深刻熏陶感染。学成归国后，他们努力介绍传播美国的人文社会科学，成为推动中美文化交流、促进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力量。其杰出者，包括胡适、郭秉文、蒋梦麟、陶行知、冰心、梁实秋、闻一多、林语堂、洪深、孙瑜、熊佛西、余上沅、冯友兰、金岳麟、瞿世英、贺麟、张仲礼、林同济、谢幼伟、吴文藻、孙本文、马寅初、何廉、何炳松等大批硕学名流。

留美生对美国及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介绍传播，其主要途径是对西方各学科门类的译介。在输入各学科门类基本知识的同时，西方学术的一套严密的思维方法和治学门径也随之引入，被留美生广泛用来进行研究与创作。这样，由西方输入的各种新学科如哲学、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等，开始在

中国生根成长。下面，我们具体看一下留美生输入发展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情况。

(1) 哲学。清朝末年，西方哲学即已输入中国，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对康德、黑格尔、叔本华、尼采、洛克、笛卡尔等西方哲学家均有所介绍。但总的讲，这些介绍失之简单，正如梁启超所评价的那样，“稗贩、破碎、笼统、肤浅、错误诸弊，皆不能免”。^① 西方哲学真正在中国系统地传播，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在这一过程中，留美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对全面引进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传播德国的古典哲学、尼采哲学及介绍西方逻辑学、哲学史等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实用主义哲学是美国土生土长的哲学，产生于 19 世纪下半叶，经过皮尔士、詹姆斯、杜威的发展，到 20 世纪上半叶，成为美国最时髦、最有影响力的一种哲学思潮。以胡适为代表的一批留美生在美国曾亲炙实用主义哲学大师杜威，受到实用主义的深刻影响。回国后，他们颇以介绍实用主义为己任。1919 年五四运动前夕，他们把杜威邀请到中国讲学，更是掀起实用主义学说在中国传播的高潮，并对新文化运动乃至中国新的学术研究范式的建立，对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教育改革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实用主义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最大的现代西方哲学思潮。关于实用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具体情况以及留美生从中所起的作用，我们后面将设专题予以研究。

德国古典哲学在中国的传播，离不开瞿世英特别是贺麟所作的卓有成效的工作。瞿世英 1926 年毕业于哈佛大学，1928 年他在《哲学评论》二卷二期上发表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导”一文，阐述了康德哲学的中心问题，显示了他研究康德哲学的深厚造诣。同一时期，他还翻译了美国新黑格尔主义者霍金的《哲学大纲》和顾西曼的《西方哲学史》，在二三十年代介绍康德、黑

^① 《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 27 页，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

格尔哲学的工作中，起了比较重要的作用。^① 贺麟 1930 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后来又赴德国学习，在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研究方面造诣极深，是久负盛名的黑格尔哲学专家。他先后发表了“朱熹与黑格尔太极说之比较观”、“德国三大哲人歌德、黑格尔、费希特处国难时之态度”等文章，翻译出版了《黑格尔》、《黑格尔学述》、《黑格尔理则学简述》、《小逻辑》、《黑格尔哲学讲演集》，对传播黑格尔哲学功不可没。在介绍康德哲学方面，他撰写了“康德名词的解释和学说的重点”、“时空与超时空”等文章，是康德研究中的不可多得之作。除瞿世英、贺麟外，留美生张颐、谢幼伟等人在译介德国古典哲学中也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尼采哲学的传播，留美生同样发挥了主力军作用。抗战期间曾出现一股“尼采热”，始作俑者和中坚力量便是几个有留美经历的学者，如陈铨、林同济、雷海宗、贺麟。他们在昆明主办了一份《战国策》月刊，在上面发表了大量文章，如陈铨的《尼采的思想》、《尼采的政治思想》、《论英雄崇拜》、《再论英雄崇拜》，林同济的《萨拉图斯达如此说——寄给中国青年》、《我看尼采》，贺麟的《英雄崇拜与人格教育》，大力宣传尼采学说，特别是尼采的“权力意志”和英雄崇拜的观念。其目的在于鼓吹积极的进取精神和顽强的抗争意识，抨击明哲保身、委屈求全的庸惰的国民性，在知识界引起较大反响。

留美生还介绍了西方的逻辑学和哲学史。在对西方逻辑学的介绍中，金岳麟的成就最大。金岳麟早年留学美国，1920 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1935 年，清华大学出版了他的《逻辑》一书，第一次系统地介绍了西方近代以来特别是罗素的数理逻辑，极具启蒙意义，有很高的学术水平。贺麟后来曾称赞此书

^① 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第 37 页，辽宁教育出版社 1988 年版。

“为国内惟一具新水准之逻辑教本”。^①此外，1921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的唐钺1930年翻译出版了鲁一士的《逻辑底原理》一书，流行也比较广。在哲学史方面，留美生刘伯明撰著的《西洋古代中世哲学史大纲》、《近代西洋哲学史大纲》，讲述了西方哲学从古希腊罗马时期到近代的变迁，介绍了主要的哲学流派。两书多次再版，在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

在输入西方哲学思潮的同时，留美生也引入了西方哲学的一套严密的思维方法，并结合中国传统哲学的范畴来创造自己的哲学体系，从而为中国哲学开辟了一片新天地。如冯友兰创造的“新理学”，就是运用新实在论和逻辑实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改造中国传统儒学创造自己哲学体系的尝试。金岳麟回国后，也致力于将西方哲学传统中国化。1940年，他出版了《论道》一书，所使用的方法，用他自己的话就是“旧瓶装新酒”，即借助实证主义哲学的原理和逻辑分析方法去重译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一些基本范畴，并赋予那些范畴以新的内容。谢幼伟1941年出版的《伦理学大纲》，将西方的伦理学与传统的儒家思想融为一体，也是将西方哲学中国化的一个有益尝试。留美生正是通过这些工作，使西方哲学在中国生根开花，反映了中国哲学现代化的趋势。

(2) 史学。中国一向有重视修史的传统，加之历史悠久，史料丰富，故史学极为发达。但与西方新史学相比，中国旧史学历史观落后，研究内容狭窄，在方法论上也显得不够精密。吸收西方新史学的优长之处，使传统史学现代化，无疑是中国史学发展的方向。留美生在引进西方现代史学、建立中国新史学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胡适、何炳松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关于胡适的史学贡献，我们后面将有详述，这里主要介绍一下何炳松的情况。

^① 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第29页。

何炳松于1912年至1916年在美国威斯康辛和普林斯顿大学学习，专攻现代史和国际政治，受到美国鲁宾逊（J.H. Robinson）“新史学”的深刻影响。1916年回国后，他先后在北京大学、暨南大学等校任教任职，翻译了鲁宾逊的《新史学》及其欧洲史教本，同时还翻译了亨利·约翰生的《历史教学法》、绍特韦尔的《西洋史学史》等其他一些“新史学派”的著作，在史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鲁宾逊是美国现代资产阶级史学中实用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从实用主义的观点出发，宣称历史之所以有价值，就在于它对当前有用。何炳松完全接受了这一观点，公开否认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走向历史唯心主义。但是鲁宾逊史学观点中也有合理的因素，如重视历史教育和历史知识的作用，认为通过历史教育，可以培养人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对于扫除鄙薄历史的观念、重视和加强历史教育，很有意义。又如他反对传统史学只注重政治史研究的偏向；主张引入多种现代科学知识，改进历史研究方法；批判复古倾向，主张今胜于昔，等等。这些观点都是有进步意义的。何炳松极力介绍传播这些观点，无论对当时还是后世的影响，都是不容忽视的。^①在他的带动下，民国时期鲁宾逊及其弟子的历史著作被大量地翻译出版，如鲁宾逊的《心理的改造》、桑戴克的《世界文化史》、巴恩斯的《新史学与社会科学》、海斯的《欧洲近代政治社会史》等。许多人“以新史学派所主张者为最可信”，以致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内出版的很多《史学概论》一类的书，大都程度不同地接受或引用过鲁宾逊等人的观点，奉为历史学的新理论。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留美出身的建筑学家梁思成翻译了英国史学家韦尔斯（George Wells）的名著《世界史纲》，192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到1935年先后发行了五版，在史学界产生较

^① 参见胡逢祥、张子建：《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第343页，华东师大出版社1991年版。

大影响。女作家陈衡哲撰写了《西洋史》，20年代出版后颇受赞誉，曾被胡适称为“中国治西洋史的学者给中国读者精心著述的第一部西洋史”。

(3) 社会学。社会学在西方是一门新兴学科，19世纪末才建立起来。但它传入中国却比较早，五四前已有十余部译著问世。这些书大多译自日本或从日本转译，译者也并非以社会学为专业，故质量不高，影响不大。五四后，随着主修社会学的欧美留学生特别是美国留学生的回国，西方社会学的传播才开始出现新的局面。

美国是社会学研究的重镇，人才济济，成果丰硕，学科非常完善、系统。尤以芝加哥学派闻名于世。这吸引着众多的学子赴美研习社会学。据留美学者孙本文（1921年纽约大学社会学博士）1947年12月的调查，当时全国有社会学教授、副教授、讲师计144人，其中除10名美国人外，绝大多数是留美学者。^①正是他们，在大量翻译西方社会学原著的同时，主要以撰著的方式，将西方社会学的理论、知识、方法系统地传入中国。

1929年至1930年，由孙本文主编的《社会学丛书》15种由世界书局陆续出版。其中，留美生撰著的著作有《社会的文化基础》（孙本文）、《社会的心理基础》（潘菽）、《社会的经济基础》（寿勉成）、《社会研究法》（杨开道）等13种。这套丛书的基本内容是：阐明社会学的性质及范围，系统地介绍欧美社会学的各种理论和方法，介绍社会学各派学说的历史和发展及其在各国的现状，介绍在社会建设上所必须的基本知识。丛书的出版，无疑是国内首次对西方社会学的系统输入。

留美生撰著的社会学著作，按西方社会学的分类，涉及到普通社会学、都市社会学、农村社会学、人文区位学（今译人文生

^① 转引自杨雅彬：《中国社会学史》，第326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态学)等诸多方面。^①

在普通社会学方面,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著作是孙本文的《社会学原理》。该书采欧美社会学众家之长,对社会学的基本内容进行全面阐述。有人评价说,此书从体系到具体观点,基本上是移植西方学说之结果。^②书后有一份关于外国社会学者生卒年月和著述情况的附录,收录了430位学者的情况;还附有416个社会学专业名词,这在当时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此书193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40年被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定为大学教学用书,前后出了十余版,在社会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都市社会学方面,比较有影响的是吴景超(1928年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博士)撰著的《都市社会学》。该书介绍了都市社会学及其研究方法,尤其介绍了芝加哥学派的观点,引起时人较大兴趣。

在农村社会学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杨开道(1927年密歇根农学院社会学博士)撰著的《农村社会学》。此书192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书中杨开道主要介绍了创立于美国的农村社会学的基本内容,特别是乃师巴特菲尔德的学术观点。其后,言心哲(1928年毕业于南加州大学)于1934年、1937年分别出版了《农村社会学概论》、《农村社会学导言》。

在人文区位学方面,主要有赵承恬(1933年密执安大学这些博士)的《从分与合的观点对中国的区位学研究》、《社会调查与社会研究》等论著,系统地介绍了人文区位学的缘起、基本理论、社会研究的技术方法以及区位学的应用及其局限性。

除研究输入西方社会学各分支外,留美生也注重从整体上介绍评论西方社会学。这方面最突出的当数吴文藻(1929年哥伦

^① 参见刘集林:《近代留美生与西方人文科学的东渐》(打印稿),第21—22页。

^② 韩明汉:《中国社会学史》,第125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比亚大学社会学博士)。1932年至1936年,他接连发表了《现代法国社会学》、《季廷史的社会学学说》、《德国系统社会学学派》、《功能派社会人类学的由来与现状》等大量文章,对西方社会学发达国家法国、美国、德国、英国的社会学进行了全面评介,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此外,吴文藻在社区研究方面也着力甚多,并取得相当成就。他曾发表《现代社区实地研究的意义和功用》、《西方社区研究的近今趋势》、《布朗教授的思想背景及其在学术上的贡献》等论文,介绍社区研究的意义及西方社区研究的现状,引进当时影响较大的英国功能主义学派作为社区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4) 教育学。五四前后,随着一批批留美生特别是专修教育的留美生的归国,美国先进的教育学说被引进国内。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实用主义教育学说。五四前,他们把实用主义教育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杜威请到中国,在各地作巡回演讲,使实用主义教育学说得到极为广泛的传播。配合杜威的来华,留美生们在五四前后撰写了大量介绍杜威及其学说的文章,翻译了杜威的主要教育著作,对中国现代教育产生重要影响。关于这些情况的细节,我们将在“杜威与中国”专题中加以介绍。

在引进杜威教育学说的同时,留美生还译介了美国及西方教育学说的其他内容,综合起来,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儿童教育。主要有陈鹤琴1925年出版的《儿童心理之研究》一书。此书根据杜威教育思想中关于“儿童中心”的观点撰成,反映了杜威教育思想对陈鹤琴的深刻影响。此外,章益与潘硌基合译的《行为主义的幼稚教育》于1930年由黎明书局出版。

教育测验、教育心理学。1921年、1924年,商务印书馆分别出版了陈鹤琴、廖世承根据美国的教育测验方法合编的《智力测验法》、《测验概要》,这是我国最早的智力测验著作。它们的问世,有力推动了我国早期教育测验工作的发展。1924年,廖世承又翻译出版了《教育心理学大意》;此后,潘菽、萧孝嵘分

别撰著出版了自己的《教育心理学》，把西方的教育心理学引进到中国。

教育科学研究。1924年，郑晓沧翻译的美国吉特《教育科学的研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介绍了教育科学研究的方法和重要性；1932年，罗炳之撰著的《教育科学大纲》由中华书局出版，此书主要探讨了欧美教育科学的发展过程，并介绍了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包括历史法、调查法、实验法、观察法、统计法等；1933年，王璉翻译了美国推士（G.R. Tuiss）的《科学教授法原理》，被列为大学丛书出版。

欧美教育史。留美生在介绍西方教育学说各分支的同时，十分注重研究西方的教育史，以期能够为中国现代教育的发展提供借鉴。二三十年代，商务印书馆就出版了留美生译著的大量欧美教育史著作，较具代表性的有：庄泽宣翻译的美国格莱夫斯基著的《近三世纪西洋大教育家》（1925年），庄泽宣编著的《各国学制概要》（1931年）、《各国教育比较论》（1933年），孟宪承著的《西洋古代教育》（1933年），雷通群著的《西洋教育通史》（1934年），姜琦著的《现代西洋教育史》（1935年），罗炳之著的《最近欧美教育综览》（1938年）等。

在师范教育、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康德教育思想等方面，留美生也有不少译著出版。可以说，在留美生引进传播的西方人文社会科学中，教育学的成果是非常丰硕的。

（5）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同样是留美生着力引进的学科之一。据统计，在1919年至1949年的三十年中，译自英美的经济学著作近三百种，其中，绝大部分是留美生翻译的。现择其要者介绍如下：^①

在西方经济理论方面，较有代表性的译作有：王造时1930年翻译的《经济学》，巫室三1933年翻译的《经济学概论》；著

^① 参见刘集林：《近代留美生与西方人文科学的东渐》（打印稿），第23—25页。

作有：李权时的《经济学原理》，此书1928年出版后风靡一时，多次再版；马寅初的《经济学概论》，此书1938年出版，至1948年时已出了九版。马氏在书中对经济学所涉及的财富、商品、资本、价值、消费、生产、交换、分配等范畴做了简要介绍，并对30年代以来流行的各种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进行了阐述。此书被后来学者称为“那时较为流行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原理书籍（包括翻译本）中最为先进的一种”。^①

在经济学说和经济学派方面，较为流行的有：臧启芳译的西方名著、美国韩纳（Lewis. H. Haney）的《经济思想史》，此书论述了经济思想史的性质、起源、重商主义以前的经济学史、从重农学派到奥地利学派、19世纪下半期的各主要经济学派，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赵乃抟著的《欧美经济学说史》，该书对重商主义、重农主义及美、德、法等国的经济思想进行了论述。此外，还有杭立武译的凯恩斯（J. M. Keynes）的《放任主义告终论》，金国保著的《凯恩斯之经济学说》，赵乃抟著的《五十年来美国经济思潮的主流》等。

在财政学方面，主要有寿景伟著的《财政学》，李权时著的《财政学原理》、《各国遗产税史要》，何廉、李锐合著的《财政学》等。

在货币学方面，主要有金国保译的《伦敦货币市场概要》，马寅初著的《通货新论》等。

在统计与会计方面，有刘大钧著的《统计学概论》，朱君毅译的《统计方法大纲》，潘序伦著的《高级会计学》等。

（6）文学艺术。留美生对美国及西方文学情有独钟，小说、散文、诗歌、剧本等的翻译，皆有所涉猎。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们以后在谈美国文学翻译时，再详加叙述。

^① 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第42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留美生在引进西方艺术方面，最杰出的成就是把西方戏剧介绍到中国。20年代，随着洪深、熊佛西、余上沅等一批留美戏剧专业学生的归国，西方戏剧理论、剧本比较正规地传入中国。如洪深于20年代撰写了一批有关编剧、表演的论文，从戏剧基本术语到训练方法都做了简要的介绍和论述，对普及戏剧知识有着重要的启蒙意义。20年代熊佛西出版了《戏剧原理》一书，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部系统讲述戏剧原理的书。30年代，余上沅、赵太侔等创办了中国第一所专门的戏剧学校——国立戏剧专科学校。该校出版了一套戏剧辅导小丛书，其中由留美生撰写的有：《导演提要》（洪深）、《演员的创造》（陈治策）、《表演提要》（余上沅）、《声音技术》（洪深）等。这些书比较全面地介绍了戏剧基本知识，在当时曾产生重要影响。

留美生对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引进传播远不止上述几个方面。但仅从上述几个学科的情况来看，也完全可以说，留美生是中美人文社会科学交流的主力军。

二、杜威与中国

1. 杜威的中国之行

约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年）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最有影响的代表和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创始人，在现代西方哲学史和教育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

作为实用主义哲学的集大成者和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创始人，杜威对美国及世界的影响是巨大的。在他90岁诞辰之际，美国《新共和》杂志的编辑们在其专刊上总结了这种影响，文章说：“如果任何其他人对现代智慧生活的影响可以与杜威相比的话，那么我们还不知道他是谁呢。”对这样一个评价，美国许多学者表示了极大的认同。《新共和》杂志的一位作者认为“没有

一个现代美国人能不受约翰·杜威的影响”。^①著名哲学家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指出“我们生活在受杜威影响的时代之中”。^②杜威的亲传弟子、著名教育家克伯屈(W. H. Kilpatrick)则评价说:“就杜威在哲学史上的相应地位来说,我把他放在仅次于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位置上。至于他在教育哲学史上的地位,依我看来,他是世界上还未曾有过的最伟大的人物。”^③对杜威的影响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应该说,这些评价大都是公允的。从哲学上来讲,杜威以皮尔士、詹姆斯的实用主义理论为基础,广泛吸收黑格尔学说、进化论和美国本土文化等丰厚的学术营养,进一步发展了实用主义哲学,使之成为20世纪前半叶美国最时髦、最有影响力的一种哲学思潮。杜威也因此在此后四十多年里一直居于实用主义哲学思想领袖的地位,被人称为“实用主义神圣家族中的家长”。他的思想对美利坚民族精神产生了重要影响,人们公认他是纯粹的美国哲学家、美国文化的解释者、美国精神的代言人。对杜威嘲讽备至的罗素也说他代表了美国工业社会的哲学。从教育上来讲,杜威将他的实用主义哲学理论贯彻到教育中,创立了一套系统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这套理论几乎涉及和深入到所有教育问题的每一个方面,在教育史上是无与伦比的。它首先影响了哥伦比亚师范学院的同事和学生们,并通过他们影响全美。杜威因此成为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领袖和20世纪美国影响最大的教育家。

正是这样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思想大师,五四时期被中国新

① 《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 1949年10月,第10、26页。转引自〔澳〕W. F·康内尔著、张法琨等译:《二十世纪世界教育史》,第179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② 希尔普:《杜威哲学》第477页,转引自赵祥麟主编:《外国教育家评传》(二),第539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③ William W. Brichman, John Dewey: Master Education, New York, 1961., P16.

知识界邀请到了中国。

1919年2月，杜威偕夫人艾丽丝（Alice）、女儿露茜（Lucy）到日本游历、讲学。此事很快被杜氏一些中国弟子得知，他们立即协商酝酿请乃师来华。3月12日，南京高师教授陶知行（即陶行知）致信胡适，称三个星期前已获悉杜威到日本游历讲学，如果能借使“请先生（指杜威——引者注）到中国来玩玩”，并帮助中国“建设新教育”，则再好不过了。^①胡适接陶知行信后，立即致函正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讲学的杜威，邀他旅华讲学。^②当月，经协商，北京大学教授陶孟和，南京高师代理校长郭秉文受北京大学、南京高师、江苏省教育会、尚志学会、新学会等教育单位和社团的委托，赴东京盛邀杜威来华，杜威愉快地接受了邀请。他在给胡适的复信中说：“我接到你的信非常欢喜。我每日总想写信把我们想到中国来游玩的事告诉你。……你问我能否在中国讲演，这是很荣誉的事，又可借此遇着一些有趣的人物，我想我可以讲演几次，也许不至于我的游历行程有大妨碍。”“……郭秉文博士同陶履恭（即陶孟和）教授前日来看我，他们问我能否在中国住一年，作讲演的事。这个意思狠（很）动听，只要能够两边大学的方面商量妥贴了，我也愿意做。我觉得几个月的旅行实在看不出什么道理。要是能加上一年工夫，也许我能有点观察了。”^③4月，杜威结束在日本的讲学活动，启程来华。

可以说，杜威赴华讲学是由胡适、陶知行、郭秉文、蒋梦麟等一批杜氏中国弟子直接促成的。

但是，显然不能把邀请杜威来华仅仅视为弟子邀请老师之举。应该看到，邀请杜威来华之举体现了五四新文化界放眼世界、广纳新知、全面吸收人类先进文化的开放精神，体现了新文

^① 《胡适往来书信选》，上册，第29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② 曹伯言、季维龙编：《胡适年谱》，第92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

^③ 《杜威博士致胡适教授函》，1919年3月28日《北京大学日刊》附张。

化阵营对科学、民主等新的价值理想、伦理精神的热切追求。还应看到，邀请杜威来华讲学，除胡适等一批杜氏中国弟子的努力外，另有几位知识分子的头面人物，如梁启超、蔡元培也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这里有必要对杜威来华讲学的主聘单位做一点考订。

关于杜威来华讲学究竟由哪几家单位邀请，从邀请者、被邀请者到后来的研究者各有不同的说法。杜威本人曾于离开中国前夕讲“北京大学、尚志学会、新学会是最初请我讲演的”。^① 胡适后来则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做了不同的回忆。1952年，他在台湾省立师范学院宣讲《杜威哲学》，其中提到“五四的时候，蒋梦麟先生、陶知行先生和我，代表江苏省教育会、北京大学和北京大学行知学会请他（杜威）到中国来讲学”。^② 50年代他在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口述回忆时说：“当蒋梦麟和我这一群杜威的学生听说他在日本讲学时，我们乃商请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江苏教育会和北京一个基金会叫做尚志学会，筹集基金邀请杜威来华讲学，并分担全部费用。”^③ 1960年他在夏威夷大学作《杜威在中国》的演讲，其中则谈到“当他（杜威）在日本的时候，中国有五个教育团体联名请他”。^④ 历史研究者在研究五四时期这段历史时，也有不同的表述：一说“杜威是由北京大学、新学会、尚志学会和中国公学联名聘请的”；^⑤ 一说“杜威来华讲学是东南大学（即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北京大学联合发起的”；一说是北京大学、江苏教育会等五个文教团体邀请的。

① 《五团体公钱杜威席上之言论》，1921年7月1日《晨报》。

② 葛懋春、李兴芝编：《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册，第480页，华东师大出版社1981年版。

③ 〔美〕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第98页，华东师大出版社1993年版。

④ 同②，第555页。

⑤ 丁守和、殷叙彝：《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第234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

以上各种表述除个别者外，多数说法都同意杜威来华实际上是两所高校即北京大学、南京高师和几个学术团体联合邀请的，这些说法大体上都是对的。因为这些单位从人事方面说是共同的。上面提到的几个学术团体，除江苏省教育会外，尚志学会、新学会、中国公学的主要负责人都是梁启超，而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江苏教育会负责人蒋梦麟又都是尚志学会的发起人。杜威来华一年后的1920年9月，上述几个学术团体和北京大学等联合成立了讲学社，并由该社续聘杜威，而梁启超、蔡元培则又是该社的主要发起人。由此可知，倘若没有梁启超、蔡元培这些学界头面人物的支持，杜威中国之行怕不会那么顺利。

此外，从杜威来华前后中国知识界对杜威及其实用主义学说所抱的热情欢迎、赞扬有加、信奉服膺的态度、立场来看，也不应仅将杜威当做胡适等一派弟子的客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杜威来华，其牵线和直接促成者为胡适等一批杜氏中国弟子；梁启超、蔡元培等学界头面人物从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同时，邀请杜威来华之举体现了中国五四时期广纳新知、博采世界先进文化的时代精神。可以说，杜威是五四时期中国新知识界的嘉宾。

1919年4月30日，杜威偕夫人及女儿到达上海。^①

5月3日，到江苏省教育会演讲“平民主义的教育”，从此开始了在华巡回演说的历程。至5月底，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杜威主要在上海、杭州、南京等地活动，度过旅华的第一个阶段。

5月29日，杜威夫妇北上到达天津，在胡适迎候下当天抵

^① 关于杜威到达中国的时间，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说是4月30日，一说是5月1日。根据杜威夫妇写给美国孩子的家信和胡适5月3日致蔡元培的信函，杜威到达中国的准确时间应为4月30日。参见杜威夫妇：Letters From China And Japan, New York 1920., P147.;《胡适教授致校长函》，1919年5月8日《北京大学日刊》。

达北京。至1920年3月，在九个月的时间里，杜威主要在北京各教育团体进行学术演讲，其间，还到太原参加了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五届年会，赴济南作演讲。这是杜威旅华的第二阶段。

杜威抵北京之初，正赶上五四运动进入新高潮。杜威对北京学生运动的发展情况极表关注，在6月初至6月中旬的每封家信中几乎都谈及于此，对军警镇压学生表示厌恶，认为把大学变成监狱是非法的，这“等于军事占领大学”，^①同时对青年学生表示同情。

在关注学生运动的同时，杜威开始了在京的学术演讲。先后进行了《美国之民治的发展》、《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教育哲学》、《伦理讲演》、《现代的三个哲学家》等五个长篇系列讲座。此外，这一阶段杜威还进行了一些短的演说。

杜威在北京所过的是平静而紧张的学者生活，大量学术讲座占去了他的大部分时间。讲学之余，杜威偕夫人、女儿也参观游览了北京的一些名胜古迹。“风景如画”的西山，“黄色屋顶，蓝、绿、红色院墙，壮丽粗犷”的紫禁城，“美丽的”颐和园，都给杜威夫妇留下极其美好的印象。^②偶尔，他们也到中国朋友家做客，那些富有北京特色的四合院式的建筑引起他们相当大的兴趣。杜威夫人在6月1日的家信中饶有兴味地描述道：“昨天我们参观了--位朋友的住宅，很有意思，我真希望生活在这样一所宅子里。……院落四周分布着四排共18间房子，一些房间是纸窗，一些房间是玻璃窗。夏天，在院里用席子搭成比屋顶高一些的临时性的凉棚，既可通风，又有阴凉。”生活在这样一座四合院中，除需每天从外面运水不太方便外，真是太美妙了。^③

给杜威夫妇留下美好印象的不仅仅是中国的风光、建筑，还

① Letters From China And Japan, P166.

② 同①，P205、207、216.

③ 同①，P217—218.

有中国朋友的友谊和热情。1919年10月19日是杜威60岁生日，这一天，北京大学与教育部、尚志学会、新学会共同为杜威举办了生日晚宴，以示庆贺。晚宴于当天下午7时在中央公园来今雨轩举行，梁启超、蔡元培及胡适等一批杜氏弟子出席，蔡元培做了热情洋溢的致词。致词中，蔡元培称赞杜威哲学“用19世纪的科学作根据，用孔德的实证哲学、达尔文的进化论、詹美士的实用主义递演而成的，我敢认为西洋新文明的代表”。他认为“孔子的理想，与杜威博士的学说，很有相同的点，这就是东西文明要媒合的证据了”。杜威也即席讲话。他首先感谢东道主为他的生日举行晚宴，接着谈了来中国后的一些观感，最后建议中国多讲西洋文明中哲学等方面的学问，“不但可以解除东方人从前的观念，并且可以补救西方物质文明的坏处”。^①

1920年3月底，杜威结束在京举行的长篇系列讲座，受新教育共进社的邀请南下讲学。至7月份，在近四个月的时间里，杜威主要在江浙一带如南京、镇江、扬州、常州、上海、南通、杭州、徐州、无锡、苏州等城市巡回演说。这是杜威旅华的第三个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他先后到了十几个城市，做了40多场演讲，在各地的知识界、教育界产生了巨大影响。7月初，杜威结束南下巡回演说里程，北上返京。

还在南京作演讲时，杜威旅华一年的期限已到。但中国知识界意犹未尽。为使杜威继续在华讲学，北京大学等原邀请单位请求杜威留下来。中国新知识界的盛情，特别是“中国正在为统一独立民主而斗争的吸引力改变了杜威夫妇准备于1919年夏返回美国的计划”。^②杜威答应了中国朋友的请求。1920年4月，北京大学打电报给哥伦比亚大学，请求延聘杜威一年，得到哥伦比亚大学的允准。这样，方才有了杜威另外一年零两个月的巡回

^① 1919年10月22日《北京大学日刊》。

^② *Letters From China and Japan*, 前言。

演说。

从1920年秋至1921年夏一年间，杜威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研究科讲授“教育哲学”。其间，先后两次南下巡回演说，到了湖南、湖北、福建、广东、山东等地。这是杜威旅华的第四个阶段。1920年10月17日，北京大学举行典礼，授予杜威哲学博士。

在紧张繁忙的巡回演说中，杜威不知不觉间已在华度过了两年零两个月。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杜威不辞辛劳，顶酷暑、冒严寒，频繁奔波，到处演讲，足迹遍及上海、北京、天津、辽宁、河北、山西、山东、江苏、湖南、湖北、浙江、福建、广东等14个省市，做了大小演讲二百多场，广泛传播了实用主义哲学、政治学、教育学、伦理学。这些饱含实用主义学说的西方新文化极大地吸引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注意力。报载，杜威每到一处皆在当地引起轰动，各阶层到会听讲者，颇极一时之盛。因杜威不能久滞广东，“百粤人士甚为快憾”，致使杜威离粤时，“百般设法阻止其行，大有扳辕挡路之慨”。^①杜威演说收到极好的效果，对五四时期乃至此后很长一段时间的中国思想文化界、教育界产生了重要影响。旅华时间无多，杜威决定踏上归程。1921年6月30日，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尚志学会、新学会五个团体在中央公园来今雨轩举行宴会，为杜威夫妇及女儿饯行，八十余人出席。席间，五团体代表梁启超、胡适、范源廉、吴卓生等先后发言，盛赞杜威来华的影响，感谢他对中国的帮助。杜威夫妇及女儿也分别讲了话。杜威在讲话中希望中国民众既要有容纳新思想的精神，又要有实行的态度。^②随后几天，宾主双方话别。7月11日，杜威一家离京返美。

① 1921年5月15日《晨报》。

② 1921年7月1日《晨报》。

2. 杜威来华与实用主义哲学思潮的形成

实用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非自五四始，但是成为一股具有重大影响的哲学思潮却是在 1919 年以后，契机便是杜威的中国之行。

翻看五四时期的报刊，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杜威在华巡回演说的记录稿充斥报端，连篇累牍。譬如《晨报》、《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民国日报·觉悟》、《时事新报·学灯》、《新教育》等报刊都大量刊登过杜威的演讲稿。以《晨报》为例，在杜威旅华两年多的时间里，就几乎连载了杜威的全部重要演说。详见下表：^①

《晨报》刊登杜威演讲记录稿情况表

刊登日期	报纸版面	报纸栏目	演讲题目
1919.5.9—5.13 (共刊载 3 天)	第七版	演说汇录	《杜威博士在沪讲演记》、 《杜威博士讲演大要》(介绍 5 月 3 日、5 月 4 日杜威在上海演讲的《平民主义的教育》)
1919.6.9—6.20 (共刊载 7 天)	第七版		《美国之民治的发展》
1919.9.22— 1920.3.29 (共刊载 27 天)	第二版、 第三版、 第五版、 第七版	杜威博士之 讲演，讲坛， 杜威讲演	《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
1919.9.22— 1920.3.3 (共刊载 33 天)	第二、三、 七、五版	昨日杜威博 士之讲演， 杜威博士之 讲演，讲坛， 杜威讲演	《教育哲学》

① 据 1919 年 5 月至 1921 年 7 月《晨报》编制而成。

刊登日期	报纸版面	报纸栏目	演讲题目
1919.10.15— 1920.4.1 (共刊载18天)	第七、三版	讲坛, 杜威讲演	《伦理演讲纪略》
1919.11.16— 1920.2.4 (共刊载16天)	第三版	杜威讲演	《思想之派别》
1920.3.8—3.28 (共刊载16次)	第五、七版	杜威讲演	《现代的三个哲学家》
1920.4.22—8.23 (共刊载42天)	第七、五版	讲演	《教育哲学》 (在南京之演讲)
1920.5.9—6.29 (共刊载19天)	第七、五版	讲演录	《哲学史》
1920.9.16—9.18 (共刊载3天)	第七版	讲演录	《学生自治的组织》
1920.9.20—10.10 (共刊载18天)	第五、七版	讲演	《试验伦理学》
1921.4.25—4.26	第五版	讲演录	《大学的旨趣》
1921.4.30—5.2 (共刊载3天)	第七、五版	讲演录	《教育者为社会领袖》
1921.5.3—5.6 (共刊载3天)	第七版	讲演录	《自动与自治》
1921.5.8—5.9	第七版	讲演录	《教育与国家之关系》
1921.5.10—5.11	第七版	讲演录	《教授青年的教育原理》
1921.5.13—5.14	第七版	讲演录	《教育与实业》
1921.6.17—6.19 (共刊载3天)	第七版	讲演录	《南游心影》
1921.6.20—6.21	第七版	讲演录	《国民教育与国家之关系》
1921.6.22	第七版	讲演录	《自动的研究》
1921.6.24—6.27 (共刊载4天)	第七版	讲演录	《教师职业的现在机会》

刊登日期	报纸版面	报纸栏目	演讲题目
1921.6.28 -6.29	第七版	讲演录	《天然环境社会环境与人生之关系》
1921.6.30—7.1	第七版	讲演录	《习惯与思想》
1921.7.8	第七版	讲演录	《民治的意义》

从上表可以看出，杜威在北京进行的五大系列讲座，全为《晨报》所收录，一些短的演说也加以刊载，这些演说有的连载数日，有的则连载数十日，为读者了解实用主义学说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像《晨报》这样大量刊登杜威演说的报刊还有很多。如《新青年》从第7卷第1号到第8卷第1号分五期连载了杜威《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的全文。《时事新报·学灯》从4月19日至6月19日刊登了《试验伦理学》、《教育之要素》等演说的全文。《民国日报·觉悟》刊登了《教育与社会进化底关系》、《“自动”底真义》、《新人生观》、《职业教育的真义》、《职业教育与劳动问题》、《社会进化》、《公民教育》等多篇演说。杜威的同一篇演讲被数家甚至十几家报刊登载，其宣传效应可谓大矣。在刊登杜威演说稿的同时，许多报刊还大量登载了杜威的行踪、杜威的谈话和演讲要点、杜威的照片、杜威演讲的广告、杜威的简历、杜威在美国发表的文章的翻译稿。一时间，杜威成为舆论界关注的焦点。与此同时，杜威的演说稿也结集出版发行。1920年8月，晨报社将杜威在北京举行的五个系列讲座辑为《杜威五大演讲》向全国发行。到杜威离华时，该书已印行十三版，每版都在一万册以上。此后，该书又多次印刷，堪称出版史上的奇迹。除《杜威五大演讲》外，这一时期还出版了《杜威三大演讲》、《杜威在华演讲集》、《杜威罗素演讲录合刊》等多种杜威演讲稿。

我们在研究五四时期各种外来思潮传播的时候注意到，杜威是受到五四知识界几乎比较一致欢迎的外国思想家。当时活跃于文化舞台上的各派人物都表现出对实用主义的浓厚兴趣和极大好

感。如革命民主派和早期共产主义者对杜威及其学说就大都表示敬意。陈独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认为实用主义可以与唯物史观并存，因此表示“相信尊重”实验哲学。^① 1921年5月初，杜威赴广东演讲，正在筹建中国共产党的陈独秀（时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职务）亲自出面主持演讲会并介绍杜威的历史。此后，他也没有对杜威及其思想表示异议。毛泽东也曾信奉实用主义。他在《湘江评论》发刊宣言中说，当前“中国就成功或者将要成功许多方面的改革”，“见于思想方面，为实验主义”，把实用主义当做思想领域指导性的学说。直到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时，毛泽东仍是从积极意义上理解实用主义哲学的，并且受胡适实用主义观点的影响，于1919年在长沙发起成立了“问题研究会”。周恩来在《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创刊号上也称“现在世界的最新思潮是‘实验主义’”。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观点如此，被后人称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梁启超，对实用主义的态度同样热情。他是杜威来华的积极支持赞助者，杜威巡回演说后，他更对实用主义学说表示称颂和认同。他认为“自杜威到中国讲演后，惟用主义或实验主义在我们教育界成为一种时髦学说，不能不说是很好的现象”。^② 他还表示“中国人宜以杜威哲学为底，造出一派新的哲学来”。^③

在五四新文化舞台上十分活跃的胡适、蒋梦麟、傅斯年等自由派知识分子对杜威及其学说更是服膺有加，使劲鼓吹和传播。为在杜威到来前介绍杜威及其学说，1919年3月和5月初，胡适在北京和上海分别对实用主义做了系统介绍和评述，1919年4月发行的《新青年》第6卷第4号发表了她的以《实验主义》为

^① 《本志宣言》，《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

^② 梁启超：《颜李学派与现代教育思潮》，《东方杂志》第21卷第2号，1924年1月。

^③ 《五团体公饯杜威席上之言论》，1922年7月1日《晨报》。

题的讲稿。在这一时期介绍实用主义的诸多文章中，胡适的这篇东西无疑是分量最重的。出于同样的目的，《新教育》杂志出版了“杜威专号”（第1卷第3期，1919年4月20日发行），集中刊登了一批介绍杜威学说的文章。此外，《新潮》、《晨报》、《时事新报·学灯》等报刊也刊登了一大批介绍杜威学说的文章。这些文章的作者大体上是一批自由派知识分子，尽管他们的思想状况不尽相同，但在宣扬实用主义这一点上都有着相同的特点。他们推崇实用主义的社会政治观、人生观、教育观，鼓吹点滴改良论和实用主义的方法论，强调自由、平等、个性解放。实用主义已为这派知识分子所接受并成为他们的哲学旗帜。

以上情况表明，随着杜威的来华讲学，五四时期的中国思想文化界，确实形成了一股实用主义热潮。

一般来讲，一种思想学说在异域发生影响的程度，至少有赖于如下条件：一是该学说自身所具有的理论价值和普遍意义；二是该学说满足文化传播所涉国家社会需要的程度；三是这种学说和它所传播的地方的学术文化传统是否具有一致性或相近性。这也正如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谈到的：“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时代之要求者也。”^① 作为一种外来思潮，实用主义之所以成为当时中国影响最大、最为知识分子普遍接受的思想学说，原因恐怕也应作如是观。

客观地说，杜威实用主义学说无疑具有其价值和合理性。从他的经验观来说，他把经验看做人的遭遇和行动的过程，在人的认识和行动的关系上，以行动为中心。同时强调经验的能动作用，强调人是行动的主体，突出了经验的主体性和创造性。这种重视行动和人的创造性的哲学，反对消极无为和害怕失败的观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第1页，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版。

念，主张不断进取、敢于冒风险、敢于奋斗，显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从他的真理观来说，尽管本质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但他从强调概念学说的工具作用出发，把实践放在实现真理和检验真理的重要位置上，这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是检验真理惟一标准的观点颇有相近之处。特别是他强调，看概念、学说是否为真理，关键要看其最终的功效和目的，这种以效用为中心的哲学，对于反对形式主义、反对重名轻实的观念和思维方式，大有裨益。从他的方法论来说，其思维五步法描述了人的认识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科学认识的逻辑，也有其合理之处。尤其是他从人类思想发展轨迹的角度，强调科学的怀疑精神，从思维方法的角度强调假设在人的认识过程和科学发展进程中的作用，颇具真知灼见。从他的社会政治哲学来说，他强调社会及社会发展动力多元化，看到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历史发展是一种合力作用的结果，这无疑也是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他主张国家政府应有权威，但掌握权力的人不能滥用权力，这种观点对于各种类型的国家政权建设都具有现实意义。他的教育学说包含了符合教育教学规律的诸多内容，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总的来说，杜威实用主义本身所包含的合理因素是显而易见的，应将其看做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成果，大可吸收和借鉴。五四时期的中国知识界显然是从某些积极方面接受实用主义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运动，而高举科学民主大旗，批判封建专制制度，抨击传统伦理道德，反对迷信，鼓吹个性解放、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呼声，已成为五四时代的最强音，也是时代赋予思想文化界的艰巨任务。完成这些任务，需要理论的武装和思想的指导。这也正是西方各种思潮在五四时期广为传播的根本原因。实用主义的风行一时，恰恰是因为它更加满足和适应了思想解放运动的时代需要。当时杜威在中国所宣扬的美国及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观念和五四时期知识界

对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企盼追求一拍即合，特别是他重行动、重效果、重进取的基本哲学精神。他强调假设、怀疑的方法论，以及“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气魄与当时进步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甚为合拍。胡适曾将他的老师杜威的学说归纳为“一切带有评判精神的运动的一个重要武器”，“最公平，又最厉害”^①。用这种武器评判中国文化，则要：（1）对于习俗相传下来的制度风俗，要问：“这种制度现在还有存在的价值吗？”（2）对于古代遗传下来的圣贤教训，要问：“这句话在今日还是不错吗？”（3）对于社会上糊涂公认的行为与信仰，都要问：“大家公认的，就不会错了吗？人家这样做，我也该这样做吗？难道没有别样做法比这个更好，更有理，更有益吗？”^② 胡适的这段话实际从思想解放的意义上概括了实用主义所具有的批判怀疑精神及其对中国旧思想、旧礼教、旧的社会秩序的挑战意义，从一个侧面回答了实用主义在中国五四时期风行一时的原因。艾思奇后来评述中国哲学发展进程时也有一段类似的分析，他说：“新的思想方法之出现，是在五四的炮声发出以后，实验主义的治学方法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与传统迷信针锋相对，因此也就成为五四文化中的天之骄子。”他还说，五四时“胡适所标榜的实验主义占了一时代的上风，其他哲学思潮自然未尝没有介绍，但对于传统的推翻，迷信的打破，科学的提倡是当时的急务，以‘拿证据来’为中心口号的实验主义被当时认做典型的科学精神”。“实验主义在今日，谁也知道是一种错误的思想方法，……但在当时，作为与传统迷信抗战的武器，还不失为历史推进的前锋”。^③ 就实用主义在五四思想界所发挥的作用来说，这个分析无疑是对的。

^① 胡适：《杜威先生与中国》，葛懋春、李兴芝编：《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第182页。

^② 胡适：《新思潮的意义》，《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

^③ 艾思奇：《二十二年来之中国哲学思潮》，《艾思奇文集》第1卷，第59、62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实用主义之所以为中国知识界各派人物普遍接受，从当时人们的文化心理上来分析，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即实用主义学说和中国经世致用学术传统的相近性。实用主义是一种效用哲学，主张各种理论的价值“在于它们所能造就的结果中显现出来的功效”，强调效果和功利性。中国的学术传统显然有与此相近或相似的一面，即重视理论学说的实用性、现实性，轻视与现实人生、社会生活无关的形而上学的思辨抽象；重视经验和现状，轻视学理和未来；统治者立一学说或扶一学派，更是要看它是否于己有实用价值。近代学者皮锡瑞所说的“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决狱，以三百五篇当谏书”，正揭示了中国传统学术思想“通经致用”的价值取向。近代以降，中国学人继承了这一传统。鸦片战争前后，经世派官僚士大夫高扬“经世致用”旗帜，力主“更法改图”，竞相“谈瀛海故实”以谋外御外，开了近代向西方学习的先河，其方案具有浓厚的功利性和实用性。洋务运动时期，一批地主阶级的改革派倡导“中体西用”，从物的层面上引进学习西方文化，更体现了实用主义的立场和态度。甲午战争后，各派知识分子向西方学习的层次加深了，范围扩大了，但无不体现出一切为了救亡图存这一最大的现实功利目的。可以说，学以致用的观念在中国知识分子头脑中是根深蒂固、一以贯之的，这对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普遍接受实用主义无疑起了很大的作用。以胡适为例，他在服膺杜威学说之前的学术思想便受中国传统“致用”观念影响甚深。他在1914年1月的一篇日记里写道：“今日吾国之急需，不在新奇之学说，高深之哲理，而在所以求学论事观物经国之术。”他还把“致用哲学”列为自己关心的主要问题。这已经很接近实用主义观点了。胡适后来成为实用主义的忠实信徒是有着中国传统“致用”思想作根底的。五四时期接受实用主义的其他知识分子也大抵如此。

在分析实用主义风行于五四时期原因的时候，还应看到这一时期中美外交关系、中美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五四时期是中美两

国关系相对友好阶段。当时，美国朝野各界许多人，包括驻华使节、在华美国人团体、美国参众两院乃至出席巴黎和会的美国代表团大多数成员，都对争取中国山东主权的斗争持同情、支持态度，最终影响到美国国会拒绝批准巴黎和约并拒不参加国联。这使得中国当时舆论均看好美国，而以“友邦”相称。这一时期也是中美文化广泛交流时期。就在杜威来华前后，美国教育家孟禄、地质学家葛利普、社会学家狄雷、社会活动家山格尔夫夫人等一批美国学者先后来华，宣传自己的学说，产生了广泛影响。美国在华兴办的文化教育事业也出现一个大发展的局面，特别是高等教育事业。美国人或以美国人为主创办的燕京大学、齐鲁大学、清华学校、北京协和医学院、金陵大学、之江大学、岭南大学等，学风严谨，管理严格，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新颖，在中国教育史上产生重要影响。与此同时，通过一大批归国留美生的辛勤工作，美国及西方的现代科技、人文社会科学也被引进到中国。中美两国政治、文化关系的发展极大扩大了美国在华的影响，为杜威来华创造了良好的政治、文化环境。作为美国文化、美国精神的代表，杜威及其学说在中国广受欢迎也就可以理解了。

实用主义学说的广为流传，和杜威的一批中国弟子的努力鼓吹也分不开。胡适是和杜威的名字紧密相联的，他在实用主义流传过程中所起的巨大作用，我们将在后面详细介绍。除胡适外，还有一批留美生亲炙杜威，在他的指导下学习哲学和教育学，如陶行知、蒋梦麟、张伯苓、郭秉文、郑晓沧等人。这些人回国后充当了传播实用主义的热情使者。杜威巡回演说，就由他们陪伴左右并充当翻译。杜威在北方各地的演说全部由胡适翻译，在南京、上海等南方各地的演讲则主要由刘伯明及郑晓沧等人翻译。与此同时，他们还发表文章介绍实用主义，并通过自己所占领的文化教育阵地，实践实用主义。杜威学说的风行一时，其弟子们的工作功不可没。

3. 杜威与科学民主思潮的传播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次彻底的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新知识界的一批文化战士努力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反对封建专制和旧礼教，宣传科学，反对封建蒙昧和迷信，树起民主、科学两面旗帜，使民主与科学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题。

考察杜威在华的总体言论，应该说，他的思想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题完全合拍。他对五四时期民主与科学思潮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比较五四时期来华的外国思想家们的在华言论，应该承认，杜威是谈论和鼓吹西方民主政治最多的。1919年6月，杜威到北京伊始所作的首场演说就是《美国之民治的发展》。在随后进行的五部长篇系列讲座中，首次开讲的又是包括民主政治内容的专讲社会政治问题的《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在此后进行的巡回演说中，又多次专门讲述民主问题。如1920年6月3日在上海中华职业学校讲《德谟克拉西之意义》；6月12日在杭州青年会讲《德谟克拉西的真义》；6月13日在杭州第一师范讲《德谟克拉西的社会分子应有的性质》；1921年4月15日在福建尚友堂讲《民治的意义》；4月在福建私立法政学校讲《民本政治之基本》，其他演讲中涉及民主思想的内容就更不计其数了。

在上述这些演说中，杜威除了泛论民主政治是整个人类的理想和中国政治的方向，还详细阐述了民主政治的具体内容。

譬如他在《美国之民治的发展》中，介绍了民主的基本概念，指出它既包括“用宪法保障权限，用代议制表现民意”，又包括“注重人民的权利，如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居住自由”，还包括社会民主、经济民主。他还指出，民主政治的理想目的是自由、平等、博爱，以美国为例，就是更注重人民的个性，让他们自由发展各人的才能；在人民与政府的关系上，是

借重政府好做事，不是依靠政府做事，是用政府，不是为政府所用。

在《德谟克拉西的真义》中，杜威更指出了民主的真谛。他认为，德谟克拉西的定义，正如林肯所讲的，“是一种政治，是一种‘为民的’、‘由民的’、‘被民的’政治”。这个定义包括有三种要素：（1）“德谟克拉西底目的，专为人民底幸福，不是为私人的一部分的幸福的”；（2）“由民的”，就是民意的重要；（3）“政治的组织”，是由人民选出的代议士所组成的。

在《民本政治之基本》中，杜威指出人权分为身体自由、财产自由与思想自由，三大自由具备，然后可言民主政治。

在对民主具体内容的介绍中，杜威特别对西方民主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思想自由”进行了详细阐述。他认为，“各种权利的重要目的，即在保障知识思想的权利”。知识思想的自由是民主政治所不可少的，也是人类文明进步所必需的。然而，“凡是独裁政治，对于思想自由和发表思想的自由，都是很怕的。他们越怕，我们越可证明这些自由的重要。没有这些自由，则独裁政治可以安然过去，不会变动”。这里，杜威首先从正反两方面论述了思想自由的重要性。接下来，杜威指出思想自由主要是指发表思想的自由，没有发表的机会，即有思想也是没有效果、没有价值的。因此，言论、出版、集会等自由就显得非常重要。他最后告诫说：“有许多思想家政治家，希望把全国人的思想信仰归于统一，故主张排除异端邪说。不知事实上实在做不到。社会是变迁的，……想用一个思想来范围全社会全国，哪里做得到呢？”他的结论是：“一国的思想信仰，大致相同，固然是很好的事；但在这个变迁时代，一致的趋势，只可说是将来逐渐发展的结果，决不能硬求一致的。”所以，“聪明的思想家、政治家”，应“以容忍的态度，提倡思想自由”。^①

^① 《杜威五大演讲·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第119—124页，晨报社1926年版。

杜威对西方民主政治的热情鼓吹，兴趣当然绝不仅仅在学理的交流与探讨，他的落脚点在中国现实，希望中国建设民主政治。杜威对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社会政治现状是持批评态度的。他认为中国以等级尊卑为核心的儒家伦理道德是不平等的，是蔑视个人权利的；中国人轻视个人自由，特别是思想上长期维持着大一统局面；官场腐败，军阀当道。这些完全是民主政治的对立物。中国要建设民主政治，必须屏弃这些东西，敞开国门学习西方。

在谈论和鼓吹西方民主政治的同时，杜威作为一位以现代科学为基础，强调实证的哲学家、教育家和启蒙思想家，对科学也做了大张旗鼓的宣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存在轻视自然科学的偏向、中国在现代科学方面远远落后于西方，这是杜威关于中西文化的一个基本观点。因此他在旅华演讲中十分注意向中国听众介绍西方现代的心理、教育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科学知识和科学理论。但是他更强调的是要培养科学的思想科学的精神，掌握科学的方法。在系列讲座《教育哲学》中，杜威就用很大的篇幅阐述科学进步的意义，唤起人们树立科学思想，重视科学。他认为，科学进步发展的影响，“不在科学自身的增加，以新的代替旧的，以正确的近于事实的代替不正确不近于事实的”，而在于它带来思想方法的变革，如归纳法、实验法；带来观念的变革，如自然法的观念、能量的观念、运动的观念。科学进步还有利于民主政治的建立。杜威举例说：“如美国这么大的国家，本来一定不能行共和政体。古代有大国不宜于共和之说，也因为大国的各部分交换意见有种种不方便之处。现在既有电报、电话、报纸，往来传递消息，所以这么大的共和国，也一点不觉困难的过去。这是科学进步以后对于政治上的影响。”科学进步对道德的完善也是有利的，可使人产生新的希望，新的勇敢，新的诚实。科学进步对教育的影响更是显著：“在教材方面，科学进步的影响，大概减少从前偏重文科方面的语言文字等学科，而加

上些注意实证的 (Positive) 学科”；“在教授方法方面，科学进步的影响，则把从前武断的方法，如依据古训遗说、圣经贤传以及强使学生记诵等等，都减少了，而加上些使学生直接去观察去实验的方法”。

科学进步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但科学方法比科学本身更重要。“若单知道这样那样的科学，而不知道科学的方法，算不得知道科学”。所谓“科学的方法”即实验的方法，即“用人的动作 (Action)，将一方的心的作用和别一方的天然界的事实连起来”。在这种实验方法中，假设是极为重要的。“试验的都是假设的性质，假设他应该起什么作用，起了是对的，不起是不对的”。他特别强调，“没有一定不变的真理，只有试验价值的假设”；“对于一种主张，以为也许真的、也许假的，只认他为一种假设，认他为有试验的价值，可以做动作的根据。至于他的是否值得认为真或假，都以试验的结果来定”。这才是真正科学的态度。^①中国无疑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但仅此是不够的，关键“在于受新科学精神的影响”，形成真正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这才是中国文化希望所在。

来自民主科学之乡的杜威，既现身说法，极力宣传西方的民主科学思想，又设身处地，为中国建设民主政治、树立科学精神摇旗呐喊，这对中国正在兴起的民主科学浪潮无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对于正在投身于努力追求民主科学事业的中国启蒙战士无疑也产生了深刻影响。

详细指明五四时期哪个启蒙战士受了杜威上述言论中哪一思想的影响，既非常困难又无多大意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是，就在杜威巡回讲学过程中的1920年8月，胡适、蒋梦麟、陶孟和、李大钊等人联名发表《争自由的宣言》，声称“政治逼迫我们到这样无路可走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起一种彻底觉悟：认定政治如

^① 《杜威五大演讲·教育哲学》，第53—75页。

果不由人民发动，断不会有真共和的实现。但是，如果想使政治由人民发动，不得不先有养成国人自由思想、自由评判的真精神的空气”。^① 1922年5月，蔡元培、王宠惠、李大钊、丁文江、胡适等16人又联名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提出所谓“好政府主义”。其中谈到，所谓“好政府”，就是“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政治是社会用来谋最大多数的最大福利工具”，人民要参政并监督政府。^② 这些思想和杜威来华后所宣传的西方民主政治思想何其相似。至于胡适反复宣扬的实验主义只是一种方法，它主张“一切学说理想，一切知识都只是待证的假设”，“一切学说理想都须用实行来试验过”，就更是杜威所讲的“科学方法”的翻版。

4. 杜威实用主义与中国学术研究

杜威实用主义对五四思想文化界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不仅成为当时人们批判封建主义意识形态、解放思想的强大理论武器，引发了新知识界的思想论争，而且成为学术界破旧创新、推动中国现代学术发展的重要理论源泉。

杜威实用主义对中国学术研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哲学、史学、文学诸领域。

人们通常认为，杜威对中国哲学领域并未产生太大影响，因为五四后中国没有形成一个实用主义哲学学派，这并不公允。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有相当一批人吸收了实用主义所包含的实证精神的营养，推动了中国现代实证主义的发展。

实证主义是现代西方哲学思潮之一，自19世纪上半期以来，经历了几代的发展，涌现出不同的流派，如斯宾塞、赫胥黎的学说，马赫主义，实用主义，逻辑实证主义，新实在论等。它们尽

^① 《争自由的宣言》，1920年8月1日《晨报》。

^② 《我们的政治主张》，《胡适文存》第2集卷3，第27—34页。

管思想体系不同，但在如下方面有着共同的特征：都主张人类知识发源于经验，只承认“实证的”事实；反对形而上学，坚持以观察和经验为证的原则；重视方法论，推崇科学方法。杜威实用主义无疑体现了这些特征，它在中国的传播，使一些哲学家和富有哲学精神的科学家受到了某些实证哲学精神的影响。

胡适作为杜威实用主义在中国的最好传人，他所注重的正是实用主义所具有的实证精神和实证方法。在《实验主义》一文中，胡适多次谈到实用主义的“实验室的态度”、“试验室里的方法”，他将实用主义（Pragmatism）一词翻译为“实验主义”，典型地反映了他对实用主义所具有的实证精神的把握。他指出，实验的方法注意从具体的事实与境地入手，可以免去许多无谓的假问题，省去许多无意义的争论；把一切学理都看做假设，可以解放许多“古人的奴隶”；主张一切学说都须用实行来实验过，“可以稍稍限制那上天下地的妄想冥思”。^① 他还将实验主义的方法概括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些思想都体现了胡适注意“实证的”事实即经验事实和实证材料，对形而上学的玄想、思辨敬而远之的实证方法论的倾向。正是由于受到实证主义精神和方法的深刻影响，胡适极力倡导在学术研究中强化实证意识。1935年，他发表《今日思想界的一个大弊病》一文，对知识界缺乏实证的现象进行了批评，他说：“现在有一些写文学的人最爱用整串的抽象名词，翻来覆去，就像变戏法的人搬弄他的一个郎当、一个郎当、郎当一郎当一样。他们有时候用一个抽象名词来代替许多事实，有时候又用一大串抽象名词来代替思想，有时候同一个名词用在一篇文章里可以有无数的不同的意义。我们这些受过一点严格思想训练的人，每读这一类的文字，总觉得无法抓住作者说的是什么话，走的是什么思路，用的是什么证据。老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的日记》（上），第113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实说，我们看不懂他们变的是什么掩眼法。”^① 胡适认为，用抽象名词代替许多具体的历史事实，这毛病是笼统、混沌、抹煞事实，用连串的名词的排列来代替思想的层次，代替推理的程序，容易产生武断。改变这种现状，只有用具体事实作验证，运用实证的方法。胡适自己也正是充分运用了实证主义的归纳方法和怀疑精神进行研究工作，从而成为中国第二代实证主义的中坚人物。

冯友兰是继胡适之后另外一位在哥伦比亚大学专攻西方哲学的中国学人。当时在哥伦比亚大学授课的杜威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哥大学习期间，为了向校方申请奖学金，冯友兰曾请杜威写过一封推荐信，奖学金虽然没有申请到，但这件事却使冯友兰终身难忘。在这封推荐信中，杜威称赞冯友兰“是一个真正学者的材料”。这个评语对冯友兰产生了巨大鼓舞，增强了他作为一个真正学者的信心。直到晚年，每当他提起这件事时，都充满了自豪感。关于杜威的思想影响，冯友兰曾自述：“在五四运动的时候，梁启超等人组织了一个尚志学会，约请了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和英国的哲学家当时是新实在论者的罗素到中国演讲。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的时候，在这个大学中，恰好也有这两个学派。杜威在那里讲实用主义，还有两位教授讲新实在论。因此这两派我比较熟悉。在我的哲学思想中，先是实用主义占优势，后来新实在论占优势。”^② 冯友兰的“新理学”，乃是运用现代实证主义尤其是新实在论和逻辑实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改造中国传统儒学思想来创造自己的哲学体系，从中不难发现沿用了实用主义的某些看法。譬如他肯定“实用主义所讲的，实际是一

^① 《独立评论》第153号，1935年6月2日。

^② 冯友兰：《二松堂全集》第1卷，第210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

种发现真理的方法”，有它的价值，它和新实在论是“并行不悖的”。^①他和胡适一样，也重视归纳法在自然科学研究中的作用。在冯友兰所受的实证主义影响中，无疑可以看到杜威实用主义的影子。

丁文江本是中国现代地质事业的开拓者和创始人，但由于他是20年代初“科玄论战”中一方的主将，因此在现代哲学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他宣称自己的哲学思想是“存疑的唯心论”。他说他所讲的科学知识论，“用哲学的名词讲起来，可以说是存疑的唯心论。凡研究过哲学问题的科学家如赫胥黎、达尔文、斯宾塞、詹姆士、毕尔生、杜威，以及德国马哈派的哲学，细节虽有不同，大体无不如此。因为他们以感官感触为我们知道物体唯一的方法，物体的概念为心理上的现象，所以说是唯心。感官感触的外界，自觉的后面，有没有物，物质本体是什么东西：他们都认为不知，应该存而不论，所以说是存疑”。^②这里，丁文江明确指出了自己的哲学思想和实用主义学说的一致性。对于“存疑”哲学到底是什么样的主张，丁文江后来做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说：“存疑主义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是奋斗的，不是旁观的。要‘严格地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用比喻同猜想来同我说，是没有用的’，所以无论遇见甚么论断，甚么主义，第一句话是‘拿证据来’！你的证据不充分，我们不信他；他把比喻猜想来作证据，我们一定要戳穿了他的西洋镜，免得他蒙混人。”^③无疑，这是一种典型的实证精神，和胡适所宣扬的注重假设、怀疑和实验的实用主义的方法论是完全合拍的。在中国现代科学史上，类似丁文江这样注重并倡导实证哲学的科学家并不

①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1卷，第197页。

② 丁文江：《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勱的“人生观”》，《人生观之论战》中册，第11页，泰东图书局1923年版。

③ 同②，第47页。

少见，如任鸿隽、王星拱、唐钺等人都可纳入这个范围。他们重视经验，大力倡导科学方法，特别是归纳法，反对形而上学的玄思冥想，体现了包括实用主义在内的现代实证主义哲学对他们的深刻影响。

杜威实用主义对中国现代实证主义的发展显然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杜威实用主义对中国现代史学的影响同样是深刻的。其原因就在于实用主义所体现的强调怀疑和实证的方法论为中国史学研究提供了比较科学的研究方法。胡适曾经自述“杜威对有系统思想的分析帮助了我对一般科学研究的基本步骤的了解；他也帮助我对我国近千年来——尤其是近三百年来——古典学说和史学家治学的方法，诸如‘考据学’、‘考证学’的了解”。^① 傅斯年声称只有杜威和席勒的实验态度的逻辑即方法论，是真正的“整理学问的利器”。顾颉刚指出：“五四运动以后，西洋的科学的治史方法，才真正输入，于是中国才有科学的史学可言。”这里所说的西洋科学的治史方法，主要指的是19世纪以来流行于西方的实证主义方法论，包括杜威实用主义。正是由于这种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运用，中国史学才出现了破旧创新的可喜局面，涌现出具有“范式性”变革意义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和在史学领域蔚为大观的疑古史学。

1919年2月，胡适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在这部书里，胡适运用实用主义的强调怀疑、假设和实验的方法论，对中国古代哲学进行了破旧创新的研究，在学术界产生强烈反响。该书在出版后两年内共印刷7次，累计发行16000册，社会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长期以来，中国哲学史受传统经学注疏的影响，把哲学与经学、哲学与哲学史混在一起，难以区分。胡适在这部书中明确界

^① [美] 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第97页，华东师大出版社1993年版。

定了哲学和哲学史的概念。他指出：“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这种种人生切要问题，自古以来，经过了许多哲学家的研究。往往有的问题发生以后，各人有各人的见解，各人有各人的研究方法，遂致发生辩论，……若有人把种种哲学问题的种种研究方法和种种解决方法，都依着年代的先后和学派的系统，一一记述下来，便成了哲学史。”^①这样，就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哲学史明确地从传统学术史中划分出来，把各种非哲学的问题全部剔除出哲学史的范围，使哲学史具有明确的研究对象，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②正是按这样的界定范围，在论述中国哲学史时，胡适把原来只能膜拜、不能非议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甩在了一边，而从老子、孔子讲起。这对于当时中国哲学史的研究，确有扫除障碍、开辟道路的作用，对于当时的思想文化界也起了极大的震撼作用。

《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另外一个重大贡献，是突破了千百年来封建学者不敢触及的经学禁区，把历来不能议论的孔圣人和其他诸子相提并论。在封建史家的思想和著作中，历来是以儒家为正统，其他各家，或被认为是“支与流裔”，或被认为是“异端邪说”，古代文化典籍经、史、子、集四部的排列，也是以“经”为首的，在这样一种条件下，各种学术都湮灭于经学体系中，知识分子只能注释、信奉儒家经典，而不能议论它，更不能批判它。胡适以实用主义的存疑态度和实验精神，重新审视中国哲学史，跳出经学的圈子，废除了正统与非正统的观念，将无论哪一家一派的哲学思想都看做中国哲学的组成部分。他特别指出：

^① 《中国古代哲学史》第一篇“导言”，《胡适作品集》，第31册，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版。

^② 参见欧阳哲生：《自由主义之累——胡适思想的现代阐释》，第118—11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中国哲学的将来，有赖于从儒学的道德伦理和理性枷锁中得到解放，这种解放，不能只用大批西方哲学的输入来实现，而只能让儒学回到他本来的地位：也就是恢复它在历史背景中的地位。儒学曾经只是盛行于古代中国许多敌对的学派中的一派，因此，只要不把它看做精神的、道德的、哲学的、权威的惟一源泉，而只是灿烂的哲学群星中的一颗明星，那么，儒学的被废便不成问题了。”^①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胡适将孔子和其他哲学家摆在同样的地位，对各自的长处、短处加以评论，这对打破儒学的桎梏，破除经学垄断学术界的大一统局面，具有极大的冲击作用，在当时的思想文化界也是一件具有重大变革意义的事情。

疑古史学的兴起，是在顾颉刚创建古史辨派之后。五四运动后，顾颉刚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大胆地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认为传统的所谓中国古史，完全是后人一代代垒造起来的，并非客观真实的历史。这一惊人的创见立即在史学界引起轰动，得到胡适、钱玄同、傅斯年、周予同、罗根泽等人的主持。他们发扬实用主义所具有的怀疑和实证的精神，以“辨伪”、“考信”为职志，对我国先秦至两汉古书上有关古史的记载做了系统考辨，“从圣道王功的空气中夺出真正的古籍”，揭露出传统的“靠不住的上古史”的真面目。顾颉刚等宣称：古史辨的工作就是推翻伪史，要严格地不信任一切没有证据的东西。在他们的影响带动下，疑古学者日益增多，在史学界形成了一个颇有声势的疑古学派，即“古史辨派”。

疑古史学的兴起，无疑继承了中国历史上疑古惑经的传统。但顾颉刚主要是吸收了现代实证主义特别是胡适所倡导的怀疑、实证精神的影响也是确凿无疑的。对于胡适所倡导的实用主义的怀疑精神和实证精神对古史辨伪工作的影响，顾颉刚后来曾回忆

^① 胡适：《先秦名学史》，第8—9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83年版。

说：“要是不遇见孟真（傅斯年）和胡适之先生，不逢到《新青年》的思想革命的鼓吹，……要是适之、玄同两先生不提起我的編集辨伪材料的兴趣，奖励我的大胆假设，我对于研究古史的进行也不会这般的快速。”^① 他还说：“我的《古史辨》的指导思想，从远的来说是起源于郑、姚、崔三人的思想，从近的说则是受了胡适、钱玄同二人的启发和帮助。”胡适对“古史辨”派的影响主要在历史方法上，对研究线索“不但要去辨伪，要去研究伪史的背景，而且要去寻出它的渐渐演变的线索，就从演变的线索上去研究”^②；于具体考证则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正是胡适受杜威方法论影响概括出的实证的“科学方法”。

疑古史学的许多具体结论可能并不一定正确，但它在现代学术史上仍是有价值的。它提倡用演进变化的观点看待历史传说，反对历史循环论和“退化观”，通过实际材料的验证，证明了越古越完美的旧社会史观的荒谬性，扩大了进化史观的传播。在治学上，他们坚持实证主义方法，对史料强调“考信”、“辨伪”，讲究“实证的知识”，主张“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对培养求真证实的科学态度、细致考订材料的研究方法大有裨益。

五四后中国学术研究所受实用主义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实证主义哲学、哲学史和古史辨伪领域，还表现在胡适所著的开创新红学的《红楼梦考证》等著作和研究成果方面。

可以认为，杜威实用主义为推动中国新的学术研究的发展奠定了哲学基础。没有这种体系性的西方学理做武器，中国学术的破旧创新是不可能的。

^① 顾颉刚：《古史辨》第1册，第8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② 顾颉刚：《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古史辨》第1册，第12页。

5. 杜威教育理论的传播

早在民国初年，杜威教育学说即已传入中国。但其作为一股有重大影响的教育思潮的兴起，则是在五四前后，其标志如下：

第一，杜威来华前后，知识界集中涌现出一批介绍宣传杜威教育学的文章。1918年，陶行知发表《试验主义教育方法》一文，对杜威和詹姆斯的教育思想大加赞誉，说“近二百年来，教育界之进步，何莫非由试验而来？……杜威之集成教育哲学，也以试验……美国三十年前之教育，说几无事不模仿大陆。自乾姆（即詹姆斯——引者注）创设心理试验科，而学者趋向一变”。在另一篇文章中，陶行知还将杜威的教育思想概括为“拿平民主义做教育目的，试验主义做教学方法”，并且表现出对杜威教育思想的倾慕之情。^① 1919年3月，郑晓沧在《新教育》1卷2期发表《杜威氏之教育主义》，对杜威教育思想的基本观点做了简明介绍，并推崇杜威为“今日教育新思潮之领袖”。^② 1919年4月，胡适在《新青年》6卷3号发表长文《实验主义》，其中对杜威的教育哲学做了专题介绍，他认为：“杜威教育哲学的大贡献，只是要把阶级社会遗传下来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制度一齐改革，要使教育出的人才真能应平民主义的社会之用。……杜威的新教育理论，千言万语，只是要打破从前的阶级教育，归到平民主义的教育的两大条件。对于实行的教育制度上，杜威的两大主张是：（1）学校自身须是一种社会的生活，须有社会生活所应有的种种条件。（2）学校里的学业须要和学校外的生活连贯一气。”胡适还指出：“杜威教育学说的要旨，总括起来，只有两句话：（1）‘教育即是生活’。（2）‘教育即是继续不断的重新组织经验，要使经验的意义格外增加，要使个人主持指挥后来经验的能力格

^① 《陶行知全集》（一），第61、102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

^② E承绪、赵端瑛编：《郑晓沧教育论著选》，第1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外增加’。”^① 胡适对杜威教育思想的诠释，既抓住了杜威学说的真谛和关键，又通俗易懂。与此同时，《新教育》1卷3期刊发“杜威专号”，其中将杜威教育思想作为重点内容予以介绍。此后，随着杜威的到来，知识界、教育界对杜威教育学说的宣传更加集中，数量也更多，不仅《新教育》、《教育杂志》等教育刊物以介绍杜威教育思想为职志，其他报刊也大量刊登了这方面的研究文章。

这些文章的作者大体上都是留美归来的新型知识分子，其中大部分专攻教育，有的还是杜威的亲传弟子。因此，他们的介绍宣传能够把握杜威教育学说的基本内涵，加上他们的热情鼓吹，其影响是可以想象的。

第二，杜威来华后的巡回讲学，以教育作为主要内容，把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传播推向高潮。杜威是20世纪难得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和思想家，但他更感兴趣的无疑还在教育。旅华伊始，他发表的头两篇演说就是关于教育的。在中国两年多时间里，他发表长短篇演说二百多讲，其中绝大部分内容是介绍自己的教育思想。譬如，他在福州的15次演讲，至少有10次专谈教育；在济南的8次演讲，都是谈教育；在上海的12次演讲，也有7次是谈教育。他先后进行了《民主主义的教育》、《平民教育之真谛》、《现代教育的趋势》、《教育哲学》、《普通教育》、《教育家之天职》、《教育与社会进化底关系》、《职业教育之精义》、《公民教育》、《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之关系》、《教材底组织》、《教育与实业》、《学校与社会》、《大学的旨趣》等多篇关于教育的重要演说。通过这些演说，杜威全面深入地表述了自己的教育观。这些演说被译成中文在各种报刊上接连发表后，在中国社会特别是教育界引起强烈反响。杜威常说的教育格言如“教育即生活”、

^① 葛懋春、李兴芝编：《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第89、82页，华东师大出版社1981年版。

“学校即社会”、“从做中学”、“教育是经验的不断改组改造”等在中国教育界广为流传，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第三，杜威的教育著作在五四运动后的几年中有多种被译成中文，广为流行。外来学说在域内流传，原著翻译是必不可少的。在撰文介绍杜威教育学说的同时，一些学者陆续翻译了杜威的一些教育原著。1921年9月，刘衡如翻译的《学校与社会》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1921年10月，《杜威教育哲学》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22年9月，常道直翻译的《平民主义与教育》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23年，朱经农、潘梓年翻译的《明日之学校》出版；郑晓沧翻译的《我的教育信条》、《儿童与教材》、《兴趣与努力》出版；1928年，邹韬奋翻译的《民本主义与教育》出版。^①此后，又陆续翻译出版了《经验与教育》、《教育科学之资源》、《今日的教育》等杜威教育著作。杜威原著的翻译出版，使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传播更加深入。

第四，杜威教育学说在五四运动前后开始进入中国学校讲坛，为更多的青年学子所熟悉和掌握。当时，杜威教育哲学为中国所有的高等师范学校和大学教育系所接受，他的划时代的著作《民本主义与教育》被用来作为课本或参考书。与此同时，从各级师范院校到中小学，多把实用主义教育学和心理学作为教育实践的依据。许多中小学在杜威“学校即社会”口号的影响下，布置了“社会环境”，提倡学生活动，如开银行、设商店，组织慈善团、学生会、自治会、巡查团等，长期进行杜威教育实验。这极大地扩大了杜威教育学说的影响。

上述情况表明，在五四运动后的几年里，随着杜威来华讲学，中国社会迅速出现了风靡全国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潮，中国教育界形成了一股“杜威热”。

杜威教育理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

^① 参见《民国时期总书目·教育体育》，第25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

首先，杜威教育理论的传播，满足了当时经济发展与教育改革的实际需要。众所周知，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欧洲列强无暇东顾，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从而给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了“黄金时代”。民族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使民族资产阶级迫切感到人才缺乏对实业发展的阻碍，他们除了继续依靠外籍人员和归国留学生来解决高级技术人员的需求问题外，愈来愈寄希望于本国教育界能为他们培养更多的中、初级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乃至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工人、职员、店员。但是，当时的中国教育状况却令人失望。它存在着许多弊端，集中地表现为教育脱离社会实际、生活实用，一批一批的中小学毕业生，因为缺乏专业知识、无一技之长而处于毕业即失业的状况。对此，当时许多进步的教育家都提出尖锐批评。胡适就批评说：“社会所需要的是做事的人才，学堂所造成的是不会做事又不肯做事的人才。”^① 这些批评反映了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对教育改革提出的强烈要求。而杜威提出的通过教育来维护民主制度、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儿童中心、从做中学等教育观点，使教育与民主社会、生活实用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他的教育学说理所当然受到中国教育家和教育工作者的热烈欢迎。他们把杜威教育学说视为革除教育时弊的对症良药，解决极需人才而又无才可用矛盾的良方。庄俞当时就提出：“欲救今日教育之弊，非励行实用主义不可。何则？虚伪、剽袭、矜夸、敷衍，无一不与实用主义有极端之反对，实用主义不得推行，则此种积弊，决难扫荡廓清。”^②

其次，中国当时存在着实用主义教育学说得以流传的思想基础。杜威教育思想体系从根本上讲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教育思

^① 胡适：《归国杂感》，《胡适文集·读书与胡说》，第24页，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版。

^② 《教育杂志》第5卷第7号，1913年10月。

想范畴，是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相联系，并为其服务的。没有近代以来兴起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做基础，它的产生和流传是不可想象的。1915年后中国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和继之而起的五四运动，高举反封建反传统的批判旗帜，有如急风暴雨，猛烈荡涤了旧思想、旧文化、旧道德的污泥浊水，使民主思想广为流行，共和精神深入人心。这无疑成为杜威教育思想流行的最重要的思想土壤。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是西方思潮在中国传播的运动，实证主义、唯意志论、生命哲学、德国古典哲学等在这一时期大规模涌入中国，特别是作为杜威教育哲学体系重要来源的康德、黑格尔、斯宾塞、达尔文等人的思想陆续被介绍到中国，为中国人更好地理解 and 把握杜威教育思想提供了思想资料。此外，明清以来占据中国思想界主要地位的王守仁的“知行合一”思想与杜威的“从做中学”有某种相似之处。孙中山大力提倡的“知难行易”说也加深了国人对杜威“从做中学”思想的认识。中国传统思想与杜威教育思想中某些观点的一致性或相近性为中国人接受杜威教育思想扫除了认识上的障碍。

再次，这一时期中美文化交流，特别是教育交流的繁荣为杜威教育思想的传播铺平了道路。五四时期，中美之间处于政治上相对友好、文化上大交流时期，特别是教育交流更呈现繁荣景象。美国在华创办的许多教会学校，办学上完全采用美国学校模式，这些学校注重教育质量，教会大学被允许在美国立案，颁发美国大学认可的各种学位，在招生上放宽限制，设立奖学金，并鼓励毕业生到美国研究院攻读学位，这在中国教育界和中国青年中产生很大影响。当时，日本报纸曾有评论：“近来美国人在中国之教育设施，其计划最有系统，亦最有生气，中国上下人士均甚依赖之，其所立学校之毕业生前途亦最有望。”^① 美国在华教育影响的扩大，无疑增加了杜威教育思想在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

^① 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第1082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

的分量。这一时期，继杜威来华后，又有一批美国实用主义学者先后来华，如教育史家孟禄（Paul Monre，1921年），教育家推士（G.R.Tuiss，1922年）、麦柯尔（W.A.Mecall，1923年）、柏克赫斯特（H.Parkhurst，1925年）、克伯屈（W.H.Kilpatrick，1927年）等。这些人都是在世界现代教育史上声名显赫、极有影响的专家教授，他们的到来，使实用主义教育思潮的传播得到连续不断的推动，其影响更加扩大。

最后，中国教育界于五四前后逐步形成的数量可观、结构较合理的教育理论与实践队伍为杜威教育思想的传播提供了组织基础。五四前后活跃于中国教育界的大体上有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在清末民初政坛十分活跃、甚至叱咤风云的老知识分子，如梁启超、张謇、熊希龄、蔡元培、范源濂、严修、张元济等人。这些人在清末民初以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政治改革中冲锋陷阵，领袖群伦，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做出过历史性贡献。在文化教育事业中，他们同样发挥了先锋和中坚作用。从清末废科举、兴新堂、创办新式教育以来，他们大都站在了时代前列。随着历史的发展，到五四后，这些人在政治上逐渐落伍了，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仍然追随时代步伐，以不同的方式，直接或间接支持教育上的各种改革活动，甚至对自己亲手制定或参与制定的民元学制，不居功，不护短，以积极的姿态进行改革。他们不断追求新知，对五四前后传人的西方教育思想给予充分理解并积极加以传播。没有教育界这些元老和领袖人物的支持参与，杜威教育思想的传播与贯彻就会大打折扣。另一部分是五四前后陆续回国的欧美留学生，如郭秉文、蒋梦麟、胡适、陶行知、陈鹤琴、郑晓沧、廖世承、刘经庶、任鸿隽、陆志韦、张耀翔、刘廷芳等人。这些人受过现代西方教育的全面熏陶，视野开阔，思想敏锐，富于朝气，对国内教育现状极为不满，要求变革的愿望强烈。他们广泛地分布在中央和各省的教育行政部门，各大学、专门学校、中等学校和各种文化教育机构、教育社团组

织、教育刊物，成为左右中国教育方向的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在这部分人当中，有一批杜威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时的亲传弟子，他们以教育为主攻方向，回国后在教育界身居要职，成为传播杜威教育思想、推动中国教育改革的主力军和中坚力量。

杜威教育思想的广泛流行并成为影响极大的教育思潮，是上述诸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

6. 杜威教育理论与中国学制改革

杜威教育理论对中国现代教育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教育改革上。学制改革就是其中之一。

民国初年，经过全国临时教育会议讨论，教育部公布了《壬子癸丑学制》。这个学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蔡元培、范源濂等资产阶级教育家改革封建教育的主张，在适应和服务国家政治转变，稳定教育形势、推动教育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的历史作用。但是，这个学制的制定过程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一是学制形成的时间过于匆忙。据当事人回忆：“计临时政府为时三个月，而教育部之学制草案，亦于是时告成。”^① 这样，就使学制的制定缺乏较广泛的群众基础，也来不及认真总结、吸收《癸卯学制》颁行近十余年的经验教训；二是制定者受民初政治形势的影响，注意力主要放在新学制如何适应和服务国家政治转变方面，着力于清除封建思想对学制的影响，而较少对学制本身做深入研究。因此尚不能完全摆脱清末学制的影响。三是多照搬日本学制成法，脱离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实际，“当时部中起草诸人及与议之会员，……对于专门大学规程，缺乏经验，不过将日本学制，整

^① 蒋维乔：《民元以来学制之改革》，《中国近代学制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1073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个抄袭，草草了事”^①。正由于制定过程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壬子癸丑学制》在实施的过程中不断暴露出一些弊端，如中学年限过短，课程设置机械且时有重复，缺乏灵活性，整个学制以升学为主要目标，不能适应经济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多重需求，对儿童个性培养不够重视，学校毕业的学生千人一面，缺乏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等等。当时，教育界人士曾批评它“三不管”：“不管社会的需要，不管地方的情形，也不管学生的个性。”^②陶行知也说：“壬子学制，经十年之试验，弱点发现甚多。近一二年来，教育思潮猛进，该学制几有不可终日之势。”^③在这种背景下，随着西方教育思潮在中国的传播，特别是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潮的盛行，要求改革旧学制的呼声日益强烈。

在民间教育组织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的不断推动下，北洋政府教育部终于在1922年11月1日正式公布了《学校系统改革案》，即所谓“新学制”或“壬戌学制”。

那么，杜威教育思想对新学制的影响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呢？中国教育史学界以往的研究成果认为，杜威教育思想对学制改革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如下两点：（1）1919年10月，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在太原召开的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废止教育宗旨，宣布教育本义”建议案中，可明显看出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决定性影响；（2）1922年公布的新学制所依据的七条教育准则中，有四条反映了杜威教育思想的基本精神。这两点无疑抓的是准确的。但并不全面，没有完整反映出杜威教育思想对学制改革的影响。

分析我们所见到的材料，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杜威教育思

^① 蒋维乔：《民元以来学制之改革》，《中国近代学制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1074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② 《改良现行学制之意见》，《中华教育界》第10卷第3期，1920年9月。

^③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900页。

想是新学制改革的灵魂。这主要体现在：

第一，杜威教育理论影响了学制改革的关键环节。学制改革是一个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发起的自下而上的改革过程，从1915年湖南省提出动议到1922年最终完成，历时七年，这和近代前几部学制的产生过程相比，酝酿的时间是最长的。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为此先后开了八次会议。其中，有两次会议是具有关键意义的：一是1919年的第五次会议，二是1921年的第七次会议。这两次会议都明显反映出杜威教育思想的影响。

1919年10月10日，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五次会议在太原举行。杜威夫妇偕女儿在胡适陪同下前往太原出席此次会议。在太原期间，杜威先后做了《世界大战与教育》、《品格之养成为教育无上之目的》、《教育上的自动》、《高等教育的职务》等数场演讲。10月12日，杜威专门为教育会议代表做了题为《教育上的试验态度》的演讲，受到与会代表热烈欢迎。杜威的太原之行对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的影响是直接而深刻的。会议通过的“废止教育宗旨，宣布教育本义”的建议案，就充分体现了这种影响。该建议案指出：“新教育之真义，非止改革教育宗旨，废止军国主义之谓，若改革现时部颁教育宗旨为别一宗旨，废止军国主义为别一种主义，仍是应如何教人的问题，非人应如何教之问题也。从前教育，只知应如何教人，不知研究人应如何教。今后之教育，应觉悟人应如何教；所谓儿童本位教育是也。施教育者，不应特定一宗旨或主义，束缚被教育者。盖无论如何宗旨，如何主义，终难免为教育之铸型，不得视为人应如何教之研究。故今后之教育，所谓宗旨，不必研究、修正或改革，应毅然废止。本年调查研究结果，‘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二语，经本会讨论，认为适合教育本义，非宗旨之改革。”^①

建议案的这段内容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是它指出确定“新

^①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844—845页。

教育之真义”，应研究“人如何教”而不是“如何教人”。这不仅仅是词序的颠倒，实际上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教育思想，一是以教师、教材、知识为中心，按照某种外在的目的铸造、培养学生；一是以学生为中心，开发、引导、利用学生的本能，使其个性得到充分发展，大力调动学生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使其成为具有创新精神与能力的人。该建议案所建议的，典型地反映了杜威教育理论中的“生长论”和“儿童中心”的思想。其二是它提出的“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的教育本义，是对原有教育宗旨的否定，实际上反映了杜威所强调的现代教育应是适合民治国家教育的思想。也正如胡适所诠释的：“杜威的新教育理论，千言万语，只是要打破从前的阶级教育，归到平民主义的教育的两大条件”，即“（甲）须养成智能的个性；（乙）须养成共同活动的观念和习惯”。^①从这两点内容来看，杜威学说的影响是明显的。

太原会议所形成的这个建议案虽然没有正式颁行，但对后来的学制改革起了某种先导的作用。如何把新教育的“真义”和“本义”贯彻到新学制中去，是新教育改革家们努力的方向。后来形成并颁布的新学制也体现了这一“真义”和“本义”。

1921年10月在广州举行的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七次会议，同样打上了杜威教育思想的烙印。会议期间，正在中国进行教育调查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授孟禄，在其中国弟子陶行知、王卓然、汤茂如等的陪同下抵临会场。他对与会代表发表演讲，举行座谈会，中心话题就是学制改革，“所讨论者皆属根本问题”。孟禄极力宣扬实用主义教育观点，宣传美国学制的优点，“对会议进行，贡献颇多”，“其言论、主张直接影响于会议，间接影响于今后全国教育界者，实非浅鲜”。^②孟禄是杜威在哥伦比

^① 《实验主义》，葛懋春、李兴芝编：《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第89页。

^② 《第七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纪略》，《教育杂志》第14卷第1号，1922年1月。

亚大学的同事，与杜威同属实用主义教育学派，并深受杜威的影响，他在此次会议上所宣扬的观点与杜威思想是完全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孟禄对会议的影响也是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的影响。会议通过的《学制系统草案》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这个决议案确定了六项学制标准，形成新学制的基本框架，为最终形成新学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杜威教育理论影响了新学制的标准和内容。1922年颁布的《壬戌学制》因采用美国式的六三三分段法，故又称为“六三三学制”。学制所依据的标准，学制内容都和杜威教育理论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深受其影响。

新学制所依据的标准是：（1）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2）发挥平民教育精神；（3）谋个性之发展；（4）注意国民经济力；（5）注重生活教育；（6）使教育易于普及；（7）多留地方伸缩余地。^①综观这些标准，可以说反映了杜威教育理论的基本精神。如第一条“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实际上是杜威教育理论中关于教育与社会关系思想的反映：教育是社会的，也是为了社会的，社会进步需要教育，教育离不开社会生活。第二条“发挥平民教育精神”、第七条“使教育易于普及”，则明显体现了杜威在华所着力倡导的平民主义教育的精神，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在教育上的反映。第三条“谋个性之发展”，是杜威教育理论的一个重要观念，即“生长论”，也是他来华后在《现代教育的趋势》中所着力阐述的注重个人本能趋势主张的反映。第五条“注重生活教育”，自然也 and 杜威的教育理论有关。杜威强调“教育就是生活”，并进一步强调“教育即是生活，并不是将来生活的预备”，因此主张“学校的学业应同学校外的生活连贯一气”。至于第四条“注重国民经济力”、第七条“多留地方伸缩余地”，讲的

^① 《大总统颁布施行之学校系统改革案》，《政府公报》命令，1922年11月2日第2393号。

是办教育应从实际出发，不能脱离社会现实情况，也不能说和杜威教育思想没有关系。总起来讲，新学制所依据的教育标准深深打上杜威教育思想的烙印。

从新学制的具体内容来看，杜威思想的影响也渗透其中。新学制规定：小学分初、高两级共六年，义务教育以四年为准；中学分初、高两级共六年（各三年）；大学修业年限四至六年；普通教育设职业准备教育或职业科；从中学开始实行选科制，并设师范教育；注重天才教育和特种教育。这些规定扩大了小学毕业生的数量，提高了中学生的知识水平，加强了职业教育，根据学生发展阶段，照顾到学生的个性，都体现了杜威实用主义的教育理论。

第三，杜威通过一批追随者推动了新学制的制定和贯彻。在五四前后教育界兴起的学制改革浪潮中，包括杜威弟子在内的一批杜氏追随者发挥了积极作用。

胡适对学制改革所起的作用显然是关键性的。除胡适外，在杜威弟子中，陶行知对新学制的制定也起了重要作用，是改革学制的积极鼓吹支持者。当时，他发表文章指出：“应当用科学的方法、态度，考察社会个人需要能力，和各种事业不可少之基础准备，修正出一个适用的学制。”他主张对外国和本国的经验，应按其适用与否，决定去取，“去与取，只问适不适，不问新与旧，能如此，才能制成独创的学制——适合国情，适合个性，适合事业学问需要的学制”。^①但是，他真正感兴趣的还是美式学制。1921年10月，他陪孟禄参加了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七次会议，对孟禄的观点表示支持。会上，他还代表中华教育改进社被推为新学制的起草委员。对此次会议议决案所确定的深刻反映了杜威教育思想的六项教育标准，及新学制的基本框架，陶行知给予了热情的支持。会后，他立即撰写发表了《我们对新学制草案

^① 《陶行知教育文选》，第19页，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应持之态度》一文，指出它“确是适应时势之需求而来的”，认为它的六项标准基本上符合社会和个人的需要与能力。^①他还邀请胡适在《新教育》第4卷第2期发表《对于新学制的感想》，大造有利于推动改革的舆论。

另外一位归国留美生、时任南京高师教授兼附中主任的廖世承在扩大新学制影响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1921年，他在苏州等地演讲“中小学沟通”问题时，便坚决主张采用美国的“六三三学制”。他通过在南高附中的实践和对国外学制的研究，对济南、武汉等地的调查，全面分析了对“六三三学制”正反两方面的意见，认为这一学制顺应时代潮流，具有符合青少年个性、各学段衔接密切及增加效率等诸多优势。^②针对一些人的不同主张，他在《新教育》、《教育杂志》、《教育汇刊》、《中等教育》等刊物上发表了多篇文章，依据事实，予以反驳。

教育界的元老人物蔡元培也积极支持学制改革。作为民元学制的制定者，他对已落后于形势发展的旧学制不护短，不保守，力主改革，实属难能可贵。他是1922年9月教育部召开的学制会议的主席，积极支持胡适担任学制主要起草人。新学制的七项标准虽为胡适所改定，但同时也体现出会议主导者蔡元培的思想倾向。此前，他还与范源濂等24位著名教育家首次提出对民初教育宗旨进行修改，并建议以“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为宗旨。

正是通过信奉杜威学说的一批追随者的工作，为新学制的制定铺平了道路。

总之，新学制改革反映了民国以后特别是五四以后经济与社会发展对教育提出的新要求，它综合吸收了当时世界各国学制的长处，考虑了我国的社会实际状况，特别是贯彻了五四后广泛流

① 《陶行知全集》（一），第189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

② 汤才伯编：《廖世承教育论著选》，第56—58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行于我国的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的基本精神。它的颁布，改变了旧学制“三不管”的弊端，标志着我国现代学校教育体制的基本确立，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里程碑式的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说，杜威对中国现代教育的影响堪称功德无量。

三、胡适与中美文化

1. 全面吸收新大陆文明

胡适是中国近代史上学贯中西、影响极大的文化巨人。他的成名及最终奠定在近代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他全面吸收并创造性地传播美国及西方资产阶级新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胡适是清末由游美学务处考选的第二届庚款留美生，1910年赴美进入康奈尔大学学习。最初学习农科，但枯燥乏味的农科知识无论如何引不起他的兴趣，倒是课余阅读的欧美文学名著及哲学书籍使他产生极大的兴趣。于是，在农学院勉强度过一年半后，他放弃农科，转入文学院学习。

为了拓展知识面，胡适选修了多种课程，如西方哲学史、美术哲学、伦理学、美国政党和政治、文学、心理学等。课余，他广泛阅读各种书籍，涉及文学、政治、历史、宗教、哲学等各方面，内容庞杂，体裁丰富。如：关于西方小说，阅读了狄更斯的《双城记》，高尔斯华绥的《小人》、《辟邪符》，果戈理的《警察总监》，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屠格涅夫的《丽莎传》，大仲马的《侠隐记》，韦斯科特的《大卫·哈伦》等；关于西方戏剧，阅读了莎士比亚的《亨利五世》、《罗密欧与朱丽叶》、《哈姆雷特》、《无事生非》、《麦克白斯》，易卜生的《人民公敌》，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赫普特满的《东方未明》、《织工》、《獭裘》；在政治方面，阅读了亨利·乔治的《进步与贫穷》，赖尼希的《远东的知识和政治潮流》，安德森的《七大政治家》，罗斯

的《变化中的中国人》等；历史方面，阅读了格罗特的《希腊史》，大畏重信的《日本开国五十年史》，薛谢尔的《文艺复兴时代》等；宗教方面，阅读了《马太福音》、《旧约》、《集说全真》，杰克生的《十字架之真谛》等；在哲学方面，阅读了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的辩护》，诺曼·安吉尔的《巨大幻觉》，爱默生的《爱默生札记》，以及关于实用主义哲学的大量著作。课程学习及课余阅读使胡适广泛涉猎了美国及西方文化的诸多领域，形成他知识结构的主体部分，为他打下坚实的西学基础。特别是对实用主义有关书籍的阅读，使他对杜威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决定转到哥伦比亚大学，亲随杜威学习哲学。

关于自己师从杜威的经过，胡适后来曾有如下一段叙述：“我转学哥大的原因之一便是因为康乃耳哲学系基本上被‘新唯心主义’（New Idealism）学派所占据了的缘故”，这派哲学“动不动就批评‘实验主义’，……杜威便是被他们经常提出的批判对象”。“在聆听这些批杜的讨论和为着参加康大批杜的讨论而潜心阅读些杜派之书以后，我对杜威和杜派哲学渐渐的发生了兴趣，因而我尽可能多读实验主义的书籍。在一九一五年的暑假，我对实验主义作了一番有系统的阅读和研究之后，我决定转学哥大向杜威学习哲学”。^①那时的哥大，教授阵容强大，在学术界声望颇高。其中尤以作为“实验大师中硕果仅存者”的杜威影响最著，形成一个学派。胡适慕名而来，自然抓住一切机会努力钻研。他除继续研读杜威著作外，还选修了杜威的“论理学之宗派”和“社会政治哲学”两门课，虽也感到枯燥无味，认为杜威“不是个好演说家或讲师”，但对“他用字的慎重选择以及对听众发表意见的方式则印象极深”，大加推崇，他的博士论文选题《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就是受杜威“论理学之宗派”的启发而决定的。课余，胡适也经常参加杜威夫人举行的家庭茶

^① [美] 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第91--92页。

会，在那里感受纽约的文化氛围，受实用主义学说的熏陶。在哥大近两年的学习，杜威的耳提面命，使胡适系统地研究和接受了实用主义学说，成为其忠实信徒。

胡适对新大陆文明的吸收，并没有停留在书本知识上，而是把书本知识和社会考察结合起来，全面理解美国的文化特征。赴美伊始，胡适“对美国政治组织、政党、总统选举团和整个选举的系统，可说一无所知，对美国宪法的真义和政府结构，也全属茫然”。辛亥革命的爆发和中华民国的成立，引发了他研究民主政治的兴趣。1912年是美国大选之年，胡适抓住这一机会，努力学习选举。他按照讲授美国政治的山姆·奥兹（Samuel P. Orth）教授的要求，仔细阅读《纽约时报》、《纽约晚报》、《纽约论坛报》（它们分别支持角逐总统的候选人威尔逊、塔夫脱和老罗斯福）上的各种消息，并做出摘要、写出读书报告。与此同时，胡适积极参与有关选举的活动，有关总统选举的各种集会他都参加，而且每次都使他“神往之至”。在整个选举年里，他佩戴着一枚象征支持老罗斯福的大角野牛象的襟章，“跑来跑去”。在宣布大选结果的日子里，胡适随同成千上万的美国国民，徘徊在报馆所在的广场上，争看报馆最新得到的各州的统计结果。当罗斯福当选后，胡适激动得热泪盈眶。到1916年的大选年里，胡适又选择威尔逊作为自己支持的对象，并戴上支持威尔逊的胸章。这时，胡适已是一个训练有素、具有相当民主意识的新知识分子了。对美国政治的学习研究及美国两次大选的经历，使胡适对西方现代民主政治有了深入体察，也使他的政治文化观念打上美国色彩。胡适后来回忆说：“我对美国政治的兴趣和我对美国政治制度的研究，以及我学生时代所目睹的两次美国大选，对我后来对（中国）政治和政府的关心，都有决定性的影响。”^①

在熟悉美国总统大选程序后，胡适又学习掌握议会程序。他

^① [美] 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第36页。

多次前往伊萨卡城的市议会旁听，认为“此等议会真可增长知识，战国者万不可交臂失之”。他甚至前往华盛顿，“每得暇辄至国会旁听”，“尤数至众议院”。在了解美国议会的情况后，他慨叹“其共和平权之精神可风也”。^① 胡适是留美学生中热中社会政治活动的活跃分子，曾出任康奈尔大学世界学生会会长、国际政策会会员、联校非兵会干事、留美学生会哲学教育群学部委员长等职。他利用各种活动和主持学生俱乐部之便，亲自实验“议会程序”。在胡适留美时，几乎美国所有学生会的章程都明文规定，各种会议的议事程序须以“罗氏议事规程”为准则。胡适在自己主持的学生活动中，取法“罗氏议事规程”，逐渐了解了民主议事程序的主旨，知道在制度上怎样保证民主内容得到执行，获益匪浅。他在留学日记中曾记载他主持康奈尔大学世界学生会会议的感受，说：“余虽尝研究此道，然终不如实地练习之有效，此一夜之阅历，胜读议院法三月矣。”^② 这些社团活动加深了胡适对美国政治的认识，也促使他新的政治观念的形成。他后来回忆，这些社团活动促进了自己“对民主会议程序的掌握，使我对民主政治有所认识，以及一个共和国家的公民在政治上活动的情形，也有更进一步的了解”。^③

胡适在读书和参加各种社团活动之余，还常到美国人家中做客，和各阶层人士聊天，广交朋友。在他交往的外国朋友中，有教授、博士、商人、牧师、记者、律师，他们有的来自亚洲的日本、韩国、印度，有的来自欧洲的法国、德国、瑞士、保加利亚，还有的来自巴西、南非等国。在与这些不同信仰、不同肤色的人相处过程中，胡适受到西方文化的深刻影响。譬如在与伯尔和施米特教授的交往中谈起中美家庭中父母与子女关系的差异，

① 《胡适留学日记》，第112页，海南出版社1994年版。

② 同①，第81页。

③ [美]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第55页。

使胡适了解到美国的家庭模式及伦理观念。与商人海因的交谈使胡适对西方宗教的发展特别是贵格教的教义和发展过程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在与瘦琴女士的讨论中，胡适认识到西方的字源学，认识到拼音文字与表意文字在字源学上的差异，同时第一次接触到西方文字学领域的学术研究方法。画家罗宾逊和布朗纳使胡适了解到西洋画的写真和油画技巧，令他对绘画艺术的看法为之一变。与胡适交往的外国朋友，大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与胡适谈话的主题也多是有关文学、艺术、宗教、哲学等文化领域的问题，这使胡适从另外的角度和侧面认识、感受到美国及西方文化的内涵和真谛。

对新大陆文明的全面吸收，使胡适在留美期间确立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政治观念、实用主义的哲学观念和文学改良思想，为他回国后掀起新文化运动的风暴、传播美国及西方现代文化做好了充分准备。

2. 传播实用主义

回国后的胡适以传播乃师的实用主义学说为己任。1919年3月，当得知杜威正在日本讲学的消息后，他立即联合陶行知、蒋梦麟、郭秉文等杜氏弟子，并商请蔡元培，极力主张和促成了杜威的来华。与此同时，为了使中国知识界在杜威到来之前，对实用主义有一个初步的认识，他撰写了长达3万字的文章《实验主义》，概述了实用主义的基本观点，介绍了皮尔士、詹姆斯的学说，特别用较大篇幅介绍了“杜威哲学的根本观念”、“杜威论思想”、“杜威的教育哲学”，比较完整地宣传了实用主义学说。4月30日，杜威偕夫人、女儿抵达上海，此前几日南下上海的胡适这天和蒋梦麟、陶行知亲到码头迎接杜威一行。5月2日，为了给杜威第二天的演说“开辟出一条道儿”，胡适在江苏省教育会演讲了“实验主义”，讲述了“科学律令”、“生存进化”、“方法论”、“真理论”、“实在论”等五点内容，作为杜威“讲演的导

言”。^①之后又相继出席了杜威在江苏教育会的两场演讲。5月12日，胡适因事返抵北京。5月29日又亲到天津迎候北上的杜威夫妇一行。6月8日，杜威登上北京学术讲坛，开始了他在北京的各种演讲，胡适充当了所有这些演讲的翻译。10月，杜威前往山西太原参加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五届年会，年底赴济南演说，胡适皆全程陪同并做翻译。胡适的这些翻译，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受到听众热烈欢迎。当年聆听胡适翻译的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后来回忆：1919年秋的一天，她的一位朋友约她到北京师大去听杜威讲演，她因不懂哲学又不懂英文，不想去听，朋友则劝她：你不用想这想那的，有一位北大教授胡适之先生做翻译，不但说的有精神，而且说到一般人都可以懂哲学，他本人还非常漂亮有风采，你非去听一次不可。杨去听了后，对胡适的翻译赞不绝口。杜威在华演讲所收到的轰动效应，和胡适的精彩翻译是分不开的。

为了宣扬实用主义学说，胡适回国后还陆续撰写了大量文章。除《实验主义》外，主要有：《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新思潮的意义》、《不朽》、《杜威先生与中国》、《我的歧路》、《五十年来世界哲学》、《介绍我自己的思想》等。直到晚年，他还在台湾演讲《杜威哲学》，在夏威夷演讲《杜威在中国》。在撰文演说的同时，胡适还开设了研究宣传杜威学说的课程。譬如在杜威刚刚离华的1921年秋季开学后，胡适就为北京大学开设了一门“杜威著作选读”课。此课原定不超过30人，上课时竟有60人之多，反映了胡适宣传实用主义的影响。

杜威实用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胡适无疑起了中坚作用。

作为杜威学说的信徒，胡适对乃师始终服膺有加，怀有深厚的感情。1921年7月11日，杜威一家离华返国，胡适带着儿子思祖为其送行。当天，他在日记里写到：我心里很有惜别的情

^① 《胡适致校长函》，1919年5月8日《北京大学日刊》。

感。杜威先生这个人的人格真可做我们的模范：他生平不说一句不由衷的话，不说一句没有思索过的话。只此一端，我生平未见第二人可比他。^① 为了纪念此次杜威中国之行，胡适在前一天晚上写了一篇送别的文章《杜威先生与中国》，刊登在这天的《晨报》上。文中谈道：“杜威先生今天离开北京，起程归国了。杜威先生于民国八年五月一日——五四的前三天——到上海，在中国共住了两年零两月。中国的地方他到过并且讲演过的，有奉天、直隶、山西、山东、江苏、江西、湖北、湖南、浙江、福建、广东十一省。他在北京的五种长期讲演录已经过第十版了，其余各种小讲演录——如山西的，南京的，北京学术讲演会的，——几乎数也数不清了！我们可以说，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影响有杜威先生这样大的。……在最近的几十年中，也未必有别个西洋学者在中国的影响可以比杜威先生还大的。”他还说：“我敢预定：杜威先生虽去，他的影响仍旧永远存在，将来还要开更灿烂的花，结更丰硕的果。”^② 对杜威来华产生的影响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反映了杜威在胡适心目中的位置。作为杜威学说的信徒，胡适也一向乐于承认自己是杜威的学生，多次谈到杜威实用主义对自己的影响。1930年，他为《胡适文选》写序，其中谈道：“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做待证的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③ 1936年，他为《胡适留学日记》所写的序言中又说：“我在1915年的暑假中，发愤尽读杜威先生的著作，作有详细的英文摘要，……从此以后，实验主义成了我生活与思想的一个向导，成了我自己的哲学

① 《胡适的日记》（上），第135页。

② 葛懋春、李兴芝编：《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第181、183页。

③ 同②，第337页。

基础。”^① 胡适离开大陆后，无论在台湾、美国，无论写文章、发演讲，只要涉及这个问题，他都一再明确宣称“杜威先生是我的老师”，“杜威当然更是对我有终身影响的学者之一”，“杜威对我其后一生的文化生命有决定性的影响”，有时胡适干脆自认是“中国杜威”。^②

胡适与杜威及其学说确实有着不解之缘。但是，判断胡适与杜威及其学说的关系，评判胡适在传播杜威实用主义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关键还要看他的思想，看他是如何宣扬实用主义的。在这个问题上，学术界存在着针锋相对的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胡适对实用主义采取了实用的态度，他并不把实用主义作为一个整体的理论，而是对之进行了一次分解，从中择取他认为有用的东西加以推衍，认为他只强调其方法论，而忽视了实用主义的其他内容。^③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胡适相当忠实地介绍宣传了杜威哲学的根本观念，他所发表的哲学言论与他所师承的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是相一致的。说胡适违背了实验主义或背离了杜威哲学的精神是没有根据的，不能令人信服的。^④ 这两种观点都有值得商榷之处。

应该说，胡适对实用主义的介绍基本反映了杜威学说的原貌。在他专讲哲学的长文《实验主义》中，他对杜威哲学的根本观念作了如下概括：杜威哲学的根本观念，“总括起来，是：（1）经验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对付人类周围的环境；（2）在这种应付环境的行为之中，思想的作用最为重要；一切有意识的行为都含有思想的作用；思想乃是应付环境的工具；（3）真正的哲学必须抛弃从前种种玩意儿的‘哲学家的问题’，必须变成解决‘人的

① 《胡适留学日记》，《胡适自序》第3页。

② 葛懋春、李兴芝编：《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第561页。

③ 欧阳哲生：《自由主义之累——胡适思想的现代阐释》，第95页。

④ 耿云志：《胡适研究论稿》，第100、113、105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问题’的方法”。对比杜威本人的哲学思想，可以看出胡适的上述概括大体是对的。首先，经验在杜威哲学中的确是一个根本观念。杜威经常称自己的哲学为经验的自然主义或自然主义的经验主义，他把“经验”看做哲学的本体。他也宣称“哲学的主要任务在于将经验的可能加以合理化，尤其是集体的人类经验的合理化”。这等于说经验是他的哲学的唯一的对象和唯一的内容。其次，经验的意义是应付环境。这个意思，杜威在其名著《经验与自然》中说得很清楚。他把经验看做有机体与环境的交涉活动，看做“达到自然、揭露自然秘密的一种方法”。在他看来，人只有通过经验同自然即自己的生存环境联系起来，才能使环境适应自己的需要。第三，强调思想理论的工具作用，这也是杜威学说应有之义。杜威是一个经验论者，但却非常强调思想的作用，他说“思想乃是在某些经验的对象和其他的经验的对象之间的中介”。他尤其强调思想理论学说的工具作用，认为它们不过是一种应用的假设，是人们为了达到某种预期目的而设计的工具。这种工具主义理论可以说是杜威思想的核心。第四，杜威确曾批评以前的哲学家“没有抓住如何使人思想得好”这个根本问题，而徒费精力去弄那些属于“哲学家的问题”。他宣称，哲学若不与科学精神相背离，“就必须变更它的性质，它必须具备实用的性质，它必须成为有效的实验的”。^①这个思想实际也是强调了哲学的功效性，是一种重效果的观点。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胡适抓住了杜威哲学的基本观点。至于杜威的社会政治哲学，他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点滴改良论，更是为胡适所青睐并反复加以宣扬的。

如果说胡适本人的思想言论与杜威学说完全一致，恐怕也不尽然。文化传播学认为，理论原型和理论传播往往是两回事，在跨文化传播中，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不同程度的文化变异。胡适的

^① 杜威：《哲学的改造》，许崇清译，第66页，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

思想观点与杜威实用主义自然也有相脱节或背离之处。譬如胡适承认自然规律的客观性与认识主体的有限性，他说：“在那个自然主义的宇宙里，天行是有常度的，物变是有自然法则的，因果的大法支配着他——人——的一切生活，生存竞争的惨剧鞭策着他的一切行为，——这个两手动物的自由真是很有限了。”^① 这种观点显然和杜威实用主义的本体论与真理观不太相符。此外，胡适的政府权力观与杜威的思想也截然不同。杜威赞成由政府干预经济，反对以自由放任为特色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认为它“把自由和在经济领域内、在资本主义财政制度下最高程度的无限制的个人主义活动等同起来了，这一点注定了不仅使得平等不能实现，而且也使得一切人们的自由不能实现”。而胡适则主张限制政府的权力，在他看来，最好能将政府的权力缩小到警察权，“只要能维持人民的治安，别的建设事业可以暂时不管。人民有了治安，自然会用他们的余力去发展积极的事业”。在其他一些方面，胡适的思想与杜威学说之间也有些差距。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胡适在全面介绍实用主义的基础上，把关注的焦点放在实用主义方法论上，甚而至于多次强调实用主义只是一种方法。他在送别杜威的那篇短文《杜威先生与中国》中重点阐述了这个观点，他说：“杜威先生不曾给我们一些关于特别问题的特别主张，——如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恋爱之类——他只给了我们一个哲学方法，使人们用这个方法去解决我们自己的特别问题。他的哲学方法，总名叫做‘实验主义’。”这种方法可以分为两步，一是历史的方法，二是实验的方法。“实验的方法至少注意三件事：（一）从具体的事实与境地下手；（二）一切学说理想，一切知识，都只是待证的假设，并非天经地义；（三）一切学说与理想都须用实行来试验过；实验是真理

^① 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葛懋春、李兴芝编：《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第297页。

的惟一试金石。”^① 1922年6月，他在《努力周报》第7期上发表《我的歧路》一文，更明确指出：“实验主义自然也是一种主义，但实验主义只是一个方法，只是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他的方法是：细心搜求事实，大胆提出假设，再细心求实证。”^② 正是从实用主义方法论出发，胡适在《实验主义》一文中特别详细地介绍了杜威的思维五步法。在此后的几年里他将这五步逐渐简化，提出他那几乎人人皆知的治学方法两步说，即“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很显然，将实用主义仅仅视为一种方法是不全面的。实用主义是一个哲学体系，包括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过多强调其方法论的意义，难免忽略这个体系中的其他内容，而有简单化和浅薄之嫌。但是，胡适也并不是光讲方法论，他对实用主义的介绍既包括方法论，也包括真理论和实在论。特别是作为杜威哲学基础的经验论，也更屡次言及。说他实用主义地对待乃师的学说实在是冤枉了胡适。

不管怎样讲，在杜威实用主义学说的传播过程中，在五四时期实用主义思潮的形成过程中，胡适所起的作用是谁都无法替代的，他介绍宣传的杜威实用主义思想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起的进步作用也是不容抹煞的。特别是他提倡的富于怀疑和实证精神的方法论，强调从事实出发、拿出证据来，强调一切学说、理论都非天经地义，只是一种待证的假设，需要经实践检验，这对于破除封建教条、传统意识形态和旧道德具有重要作用，体现了反蒙昧主义的理性态度，体现了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精神，是一种思想的解放。更重要的是，他不仅在理论上宣传了杜威实用主义，还在学术研究中贯彻了实用主义。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叙述“杜威实用主义与中国学术研究”时已有阐述，这里不再赘述。

① 葛懋春、李兴芝编：《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第181—182页。

② 同①，第217页。

3. 倡导文学革命

胡适引进、传播西方文化的重要成果之一，是他首先打出“文学革命”的旗帜，和陈独秀等一起，使文学革命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

留美初期的胡适本是一个沉湎于中国旧式词章的学子，并未意识到中国旧文学有何弊端，更无文学革命的思想。但是，在美国的学习，特别是对西方语言文字的学习及对西方文学作品的大量阅读，使胡适逐渐意识到中西之间在语言文字方面的差异及英语作为表达思想工具的优越性。如何吸收西方语言文字的长处，改良中国文学，成为胡适关注的问题。

触发胡适改良中国文学之念的，是清华留美学生监督处的一名工作人员钟文鳌。钟的主要职责是每月从华盛顿向在美国各地留学的清华学生寄发学费。他是一个基督徒，利用寄发学费的机会，他时常向清华学生进行一些革新社会的宣传，如“废除汉字，改用字母”、“不满 25 岁不娶妻”等。一天，胡适在收到的学费支票里，又发现一张钟寄来的传单，说中国应改用字母拼音。胡适感到这是钟滥用职权，在自己面前指手画脚。于是当即写了一张字条回敬他，说：“像你这样的人，既不懂汉字，又不能写汉文，你最好闭起鸟嘴。”^①字条寄出后，胡适又感到有些后悔，觉得“我既然说钟先生不够资格讨论此事，我们够资格的人就应该用点心思才力去研究这个问题”。恰巧这一年（1915 年），美国东部的中国留学生成立了一个“文学与科学研究部”，胡适被推选为文学股委员，并受命准备东部留学生年会的讨论题目。胡适乃建议以“国文”为年会论题，并用英文撰写了一篇题为《如何使吾国文言易子教授》的论文。文中，胡适将中国文字与世界各国文字进行比较，认为希腊文和拉丁文是死文字，中国

^①〔美〕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第 139 页。

文言文是半死文字，当代英、法、德、意文和中国白话文是活文字。胡适之所以把文言文比做半死的语言，把白话文当成活的语言，很显然是受到西方现代语言表达方法的启发，并将其和汉语进行了比较。这是胡适酝酿文学革命之始。

此后，胡适将自己的上述见解拿出来与一班留美同学探讨，遭到梅光迪等人的坚决反对。辩论进行了无数个回合，梅光迪越辩越守旧，胡适则越辩越激进，由文字改革过渡到文学革命。在这些辩论中，胡适逐步确立了两个基本的“文学革命”观念：一是：一部中国文学史，便是一部中国文学工具变迁史——一个文学或语言的工具去代替另一个工具；二是：一部中国文学史也就是一部活文学逐渐代替死文学的历史。

以后胡适常将“文学革命”和“诗国革命”等口号挂在嘴上，并在通信、撰文、作诗、日记中反复多次谈到文学革命之事，到1916年秋天，胡适将自己一年多所积累的见解，写信告诉陈独秀，正式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及具体施行的“八事”。陈独秀读完胡适的信，立即回复表示极为赞成，并提出“倘能详其理由，指陈得失，衍为一文，以告当世，其业尤盛”。^①在陈独秀的敦促下，胡适将自己的“八事”衍为一文，这就是他提出“文学革命”的第一篇公开宣言《文学改良刍议》。

《文学改良刍议》凡7000言，语言和缓，但对旧文学的批判明确、深刻，充满开拓者的勇气。文中提出“欲言文学革命，须从八事人手”：

一曰，须言之有物——写文章力戒空谈，要有情感，有思想。

二曰，不模仿古人——因为文学是随时代而变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学，所以不能泥古不化，“今日之中国，当造今日之文学”。

^① 《陈独秀答胡适之》，《陈独秀书信集》，第39页，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

三曰，须讲求文法——若文法不通，则失去文学之价值。

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无病呻吟的文学是悲观失望的产物，养成国人一种暮气，不思奋发有为。

五曰，务去烂调套语——懒惰者不求创新，惯用套话唬人，改掉的办法是“人人一其所亲见亲闻所亲身阅历之事情，一一自己铸词以形容描写之”。

六曰，不用典——这并非指引用一般人们公认的典故成语，而是指文人墨客自编自造的所谓“典故”。

七曰，不讲对仗——此指为求语言对仗而故意为之，合乎文意的对仗并非反对。

八曰，不避俗字俗语——即文字通畅，大众化，有生活气息，奉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①

以上八事是胡适关于文学革命的纲领性意见，既涉及文学形式，又涉及文学内容，堪称对中国几千年文学一次全局性的大变革。文章发表后引起知识界热烈反响，陈独秀推出《文学革命论》，明确表示支持胡适的意见，同时进一步提出文学革命的三大目标，态度和主张比胡适更坚决、更激进，一场“文学革命”运动从此迅猛展开。

在“文学革命”中，胡适的主要贡献表现在文学理论上，他接连发表了一系列对文学革新和文学创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理论文章，如《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什么是文学》、《国语与国语法》、《国语的进化》、《论短篇小说》、《谈新诗》、《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等。在这些文章中，胡适提倡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这对于推行现代国民普及教育，发展大众传播事业，进行科学技术的普及和思想启蒙，促使中国文化由传统向现代转变，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同时，他积极引进西方文学理论，譬如，关于文学题材的搜集，他提出打破传统文

^① 《新青年》第2卷第6号，1917年2月。

学只以才子佳人为写作对象的旧习，如工厂之男女工人，人力车夫，内地农家，各处大商贩及小店铺，一切痛苦情形，都应该“在文学上占一位置”，将下层民众的生活纳入文学的视野。文学要反映新旧文明冲突时所产生的种种变故，如“一切家庭惨变，婚姻苦痛，女子之位置，教育之不适宜，……种种问题，都可供文学的材料”。关于文学作品的结构，胡适特别提出应注意剪裁和布局，追求高效果的“文学经济原则”。西方近代文学理论的引进，对新文学创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为了推进文学革命，在推倒旧文学的同时创造新文学，胡适积极提倡翻译介绍西方文学。在1918年发表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中，胡适明确提出，要创造新文学，必须获得一些高明的文学方法。如何获得这些高明的文学方法呢？“只有一条法子，就是赶紧多多的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做我们的模范”。他先拿散文、戏剧做了比较，认为西洋的文学方法，比我们的文学实在完备得多，高明得多，不可不仿效。对西洋小说，胡适更是推崇备至。他说：“那材料之精确，体裁之完备，命意之高超，描写之上切，心理解剖之细密，社会问题讨论之透切，……真是美不胜收。至于近百年新创的‘短篇小说’，真如芥子里面藏着大千世界；真如百炼的精金，曲折委婉，无所不可；真可说开千古未有的创局，掘百世不竭的宝藏。”用比较中外文学优劣的办法，鼓吹学习西方文学的创作方法，可谓引人注目。在这篇文章里，胡适还指出以前所译的西洋文学书，大概都不得其法，所以收效甚少。纠正这种状况，只有采取以下两条办法：“（1）只译名家著作，不译第二流以下的著作”。他主张国内真懂得西洋文学的学者应该开一个会议，一起选定若干种不可不译的第一流文学名著，比如一百种长篇小说，五百种短篇小说等，编为第一部《西洋文学丛书》，五年译完之后再选第二部。译稿则由几位学者审查，并一一为译作写出长序及作者传略，然后付印。第二流以下，如哈葛得之流，一概不选。“（2）全用白话韵文之戏曲，也

都译为白话散文”。^①他认为，用古文译书，必失原文的好处。只有用白话文翻译，才能得原文之神韵。胡适的这些鼓吹，对造成引进西方近代文学的舆论和风气，起了很大的作用。

引进西方文学，胡适除在理论上加以鼓吹外，还身体力行，做了很多介绍的工作。1918年6月，《新青年》刊出“易卜生专号”，专门介绍挪威伟大戏剧家易卜生（Henrik Ibsen，1828—1906）的社会问题剧。胡适的《易卜生主义》是其中的领衔之作，也是当时介绍易卜生剧作及其戏剧主张最有分量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胡适全面介绍分析了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并且联系当时中国社会现实，考察评述了易卜生的戏剧主张。胡适认为易卜生的戏剧创作方法是现实主义的，这种创作方法对针砭当时中国现实、指引戏剧乃至整个文艺创作很有现实意义。由于胡适在当时新文化运动中所处的地位和《新青年》在全国的重大影响，胡适等人将易卜生戏剧介绍到国内，不仅为一般从事新剧活动的有志者所欢迎，而且整个思想文化界都对此发生了一定的兴趣。从此，易卜生社会问题剧开始登上中国的舞台，而中国的思想文化界由对易卜生社会问题剧的介绍评论，发展为对中国社会问题和中国传统旧剧猛烈地抨击，吹响了向中国封建势力及传统旧剧进攻的号角。在1918年发表的《论短篇小说》一文中，胡适则介绍了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柏林之围》，介绍了莫泊桑的普法战争题材的短篇小说，最后还指出俄国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是19世纪中叶以来通行短篇小说的文坛上绝无仅有的长篇小说。^②

在翻译西方文学方面，胡适也取得显著成绩。据统计，从在美留学期间到20年代末，胡适先后翻译了法国都德的短篇小说《割地》（即《最后一课》）、《柏林之围》、《二渔夫》、《梅吕哀》、

^① 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2），第56-5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② 《新青年》第4卷第5号，1918年5月。

《弑父之儿》，大仲马的诗《米桑》，英国诗人卜朗吟的诗《乐观主义》，安尼·林德萨的诗《老洛伯》，拜伦的《哀希腊歌》，奥斯汀·多布森的诗《奏乐的小孩》，托马斯·哈代的诗《别离》、《月光里》，吉百龄的短篇小说《百愁门》，挪威易卜生的戏剧《娜拉》，美国爱默生的诗《大梵天》，欧·亨利的短篇小说《戒酒》，哈特的小说《米格尔》、《朴克坦赶出的人》，瑞典史特林堡的短篇小说《爱情与面包》，意大利卡德奴勿的短篇小说《一封未寄的信》，俄国高尔基的短篇小说《他的情人》，契诃夫的短篇小说《洛斯奇尔的提琴》、《苦恼》，德国哥德的诗《竖琴手》，等等。^①可以看出，胡适的翻译涉及欧美各国的许多作品，很多是名家名作。这些作品的翻译，丰富了中国现代翻译文学的宝库，对中国文学吸收异域营养、创立新文学体系大有裨益。

四、美国传教士与教育医疗事业

1. 美国在华传教事业的发展

民国期间，美国基督教在华势力从迅猛发展到撤出中国大陆，经历了一个大变革的时期。

辛亥革命后的十多年里，基督教在华事业面临着新的形势。宗教自由的条款被载人民国政府的约法，新政府在最初时期对基督教采取完全宽容的态度，这无疑对民国初年传教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孙中山及大批革命同志本身就是基督徒，他们的革命业绩与救国形象大大改变了社会上对基督教会的看法。同时，历经庚子事变的严重挫折，教会对自身的行径也做了某种反省和检讨，对传教士和教会在政治上的活动，尤其是对地方上民教诉讼的干预，做出了限制。

^① 参见季维龙编：《胡适著译系年目录》，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教会内部和外部环境的变化，使传教运动在各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基督教在华势力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到1918年，基督教新教教徒已增至35万人，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增加了27万人，为1900年以前的三倍半；传教士人数1901年是1500人，到1919年增加到6636人，是原来的四倍；基督教在华的独立传教团体由1900年的61个发展到1920年的130个，许多新教的小宗派纷纷涌入中国。

在基督教新教在华发展过程中，美国传教势力逐渐占据优势。英美传教士的比例，1900年以前是三比一，1914年是四比五，到1918年则发展为五比六；在中国活动的基督教大小差会一次大战后有150多个，其中属于英国系统的有40多个，属于美国的有70多个，其余分属北欧各国，美国差会超过英国及北欧差会系统的总和。^①美国教会势力已占到很大的优势。在以后的岁月里，这一优势不断得到巩固和加强。

美国在华传教势力的大发展，从根本上说是和美国的扩张主义政策相联系的。美国内战和重建结束后，经济获得高速发展，垄断资本家积聚起巨额财富，他们已不满足于国内市场，要求扩大海外殖民地。作为显示美国力量、传播美国文化与生活方式的传教运动因此受到美国政府和垄断资本集团的大力支持。正是在这一背景下，19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国内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学生志愿国外传教运动”，大批信奉基督教的大学生被鼓动志愿到海外传教，成为美国传教运动的主体。从1886年到1918年，美国通过这个运动派往海外的传教士共达8000多人，其中2500多人被派到中国，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司徒雷登、赖德烈等人便是其中的名流。^②民国初年，美国基督教在华势力的迅猛发展，和这个运动的展开是直接相关的。

①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250、32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② 参见〔美〕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第25—26页，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

在民国初期迅速发展的美国在华传教事业中，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是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基督教青年会是一个根据青年特点进行宗教宣传和道德教育的组织，19世纪40年代创立于英国，50年代传入美国。在美国垄断资本集团的财政支持下，1889年，美国和加拿大的青年会联合组成“北美协会”，向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传播基督教。1896年，北美协会的干事穆德首次到达中国。在他的活动下，中国的学校青年会由原来的5所发展到27所。在此基础上，穆德召集了全国已成立的近30所学校青年会（当时称“基督教学塾幼徒会”），在上海举行了第一次全国会议，成立了“中国基督教学塾幼徒会”，推举传教士米来会理任总干事。此后，北美协会派遣更多的美国干事来中国，青年会在中国顺利成长。进入20世纪后，青年会紧密适应中国形势的变化，加快发展速度。1906年，为适应中国大批青年东渡日本留学，组织了留日青年会；1909年，组成留美青年会；1912年，在北京举行青年会第六次全国会议，将总部名称改为“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推举美国传教士巴尔满为第一任总干事。此时，全国青年会市会已有25处，校会有105处。

青年会在中国的发展，同样受到美国政府和垄断资本集团的支持。1910年10月，北美协会在美国总统塔夫脱的支持下，在白宫举行了一次“青年会世界扩张计划会议”，美国政界、财界及宗教界二百余人参加了会议。财界人士当场解决了穆德提出的用于向远东和拉丁美洲扩张的三分之二的预算，达100万美元。此前，洛克菲勒已经承担了青年会扩张费用54万美元。塔夫脱总统在会上的演讲中更是强调指出：“有些基督教青年会的会员，能够在他们本国的政府中取得重要的地位。我已经看到在中国和其他国家中，凡受过外国教育或其他因素影响的人，很容易获得重要的地位。通过这些人，我们就能使这些落后国家接受我们的

文明和道德标准。”^①塔夫脱明确表示支持青年会的工作。

正是在美国政府和大资本家的支持下，基督教青年会在民国初年获得了迅速发展，到1922年进入了所谓的“黄金时期”。当时全国市会已达40处，会员53800人；校会200处，会员24100人。青年会主要分成“城市青年会”和“学校青年会”两部分，其主要活动内容分成德育、智育、体育、群育四个方面。在德育方面，最主要的活动是传经布道。设有青年会的学校都有查经班，组织会员和会外青年利用业余时间阅读英文版圣经，由牧师负责讲解答疑。布道的主要形式是举办大规模的布道大会，由青年会安排“布道家”进行布道演讲。演讲内容注意结合青年特点和人们所关心的实际问题，如科学和宗教的关系、基督教与劳工问题、恋爱与婚姻、青年道德修养等，深受听众欢迎。在智育方面，主要开展教育和出版活动。各地的青年会开设了补习学校、夜校和半日学校，开展平民教育活动，重点是识字教育。1933年，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和青年会全国协会会同晏阳初等领导的平民教育促进会，在河北定县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平民教育运动的现场会，邀请了许多中外名流和各报记者前往参观，标志着平民教育运动达到高潮。出版活动早期着重于宣传宗教，从20年代起陆续出版了一些政治读物，既有宣扬西方政治制度、政治理论的内容，也有鼓吹不抵抗主义和反共的内容。在体育方面，青年会引进介绍了一些流行于欧美的体育项目和体育设施，培训了一些体育师资和裁判员教练员，组织了中国最早的运动会（1902年在天津举行）和1913年、1915年的两次远东运动会，对传播、普及西方现代体育运动发挥了积极作用。在群育方面，青年会主要参与了一些关于劳工和农村的改良实验活动，如在浦东建立了

^① 江文汉：《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第5页，中华书局1961年。

“劳工新村”，在沪西成立了“沪西公社”等。^①

基督教在华势力的迅猛发展，引起许多中国人尤其是民族主义者的忧虑与不满。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展开和科学思潮的兴盛，1922年至1927年，中国社会爆发了声势浩大的“非基督教运动”。这使得基督教势力的发展从1922年开始速度减慢。在不利于教会发展的形势面前，基督教会采取积极措施，实行了所谓“本色教会运动”，教会学校更明确提出“更有效率、更基督化、更中国化”的口号，以回应中国社会的挑战。经过一番反思、调整，教会势力重新站稳脚跟并向前发展。到30年代中期，在华传教士达到了6000人。其中，美国传教士近3600人，占到了60%，在各国基督教势力中已居于绝对优势。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家和人民惨遭苦难，基督教在华势力及各项事业也遭受很大损失。但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基督教在华势力还没有遭到日本太沉重的打击。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美国变成日本的交战国，美国在华的基督教势力受到日本的疯狂迫害。日本占领区的美国传教士被关进集中营，大批传教士被迫回国，经费短缺，形势动荡，美国教会的活动几近瘫痪。在此期间，教会虽然在后方西南省份发展了一些信徒，教会学校仍在办学，但传教士的活动总的讲，处于低潮，教务活动基本上只是维持局面。

抗日战争胜利后，基督教在华势力出现了短暂的复兴。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基督教差会及其所办各项事业纷纷迁回沿海原址，回国的传教士也纷纷回到中国。到1947年底，美国传教士增加到2100人，占基督新教在华传教士的60%。但好景不长。随着中国内战的爆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节节胜利，基督教的活动很难继续开展下去。于是，他们在采取了一系列应变措施后，被迫于新中国成立前后陆续撤出中国大陆，结束了其在华的活动。

^① 参见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307—310页。

2. 教会大学的繁荣

民国时期，美国在华基督教会把工作重点放在教育事业特别是高等教育事业上，教会大学的发展出现了高潮。

美国教会之所以重视发展大学，最重要的原因是想通过高等教育改变新一代知识分子对基督教的看法，并通过影响中国的知识精英和社会领袖，把握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基督教北美协会领导人穆德当时就曾指出：“世界上有四万万人民的国家只有一个，那个国家进步现代的新潮流，也只有这第一批人。这第一批受到现代教育的学生，将来便成为新中国的领袖。他们要设立新的标准，并且走入新的途径。我认为，这些人受基督化而与基督教发生友谊的关系实在是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我常常有这样的渴望，因为恐怕我们失去这种卓绝的机会。”^① 圣约翰大学校长、美国传教士卜舛济也表示，“我们的学校和大学，就是设在中国的西点军校”，通过这样的学校，可以训练“中国未来的领袖和司令官”，他们将来要对中国同胞施加最巨大和最有力的影响。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美国基督教会特别是新教教会竭力创办大学。这一时期新教创办的大学主要有：燕京大学、齐鲁大学、福建协和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武昌华中大学。

燕京大学是由包括美以美会、长老会、公理会等在内的七个美国差会和英国伦敦会联合创办的。上述几个差会经过多次协商谈判，于1916年宣布将华北协和大学和汇文大学合并，成立新的大学，英文初名“北京大学”，后改名“燕京大学”。1920年，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并入；1926年，协和医学院预科并入，校址也迁到以未名湖为中心的新校舍；经过十几年的建设，到30年代，燕京大学已成为中国最著名的教会大学。

^① 马素士著、张士章译：《穆德传》，第364页。转引自顾卫民：《传教士与中国近代社会》，第37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齐鲁大学是由五个美国差会、五个英国差会和一个加拿大差会于1917年联合创办的。它的前身是登州文会馆、山东联合大学和山东基督教大学。1917年，山东基督教大学结束了文理学院、医学院和神学院分别在潍坊、青州和济南三地上课的局面，迁到济南的新校园，并正式以“齐鲁大学”命名。1924年学校在加拿大立案，1931年在教育部立案，到抗战前，学校出现了短暂的繁荣。

福建协和大学是美国公理会、美以美会、归正会和英国圣公会于1915年联合创办的。1918年，该校在美国纽约州立案，并获得“洛克菲勒基金会中华医学部”的资助；1931年在教育部立案。该校在生物学、农学领域颇有建树，也是一所著名的教会大学。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是在基督教各差会所办女子中学的基础上于1915年在南京成立的。该校是中国最早的女子高等学府，1916年和美国斯密司大学结成姊妹校，1925年上海体育师范并入。学校利用美国教会捐赠的巨额款项建造新校舍，宋氏三姐妹出资捐建了金陵女大附中宿舍，校友严彩云捐建了小医院，到30年代，校园初具规模。在几十年的办学实践中，该校以“厚生”为校训，重视对学生的基础教育和社会实践，形成自己独特的办学特色。

武昌华中大学的前身是美国圣公会1871年创办的“文华书院”（后开设大学课程，改名武昌文华大学）。1924年，文华大学和武昌博文书院大学部、汉口博学书院大学部合并组成武昌华中大学。1926年，湖南长沙雅礼大学和湖南岳阳湖滨大学相继并入。经过十几年的建设，华中大学成为基督教会华中地区创办的一所知名的高等学府。

除民国时期新创办的上述几所教会大学外，美国基督新教于晚清时期创办的教会大学也有了较大规模的发展。圣约翰大学、东吴大学、沪江大学、之江大学、金陵大学、岭南大学、华西协

和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等都在扩展规模，增设新的系科，扩大招生。

譬如，圣约翰大学初创时只有 39 名学生，只设国文、神学两科。到 20 世纪 20 年代，学生达到 400 多人，设置了文、理、医、神 4 个学院。后来，又发展到 5 个学院、17 个系，办学规模有了很大的发展。

沪江大学初创时规模很小，仅占地 34 亩，1917 年时只有 14 名学生。而到 20 年代初，学生达到 344 人，设有文科、理科、社会学科、商科等，占地面积也大大增加。

东吴大学刚建立时只有中学程度，学生不足百人，后开出大学课程，但学科也少得可怜。自 1911 年葛赉恩任校长后，不断扩大学校规模，先后在苏州、上海、湖州、无锡设立了四所附属中学，1915 年开办了法科，1917 年开始授予硕士学位，成为当时国内极少数有权授予硕士学位的大学之一。1927 年，成立了文、理、法三个学院，开出更多的中西学课程。二十多年的苦心经营，到抗战前夕，东吴大学已具备相当规模，在海内外享有很高声誉。

之江大学是美国长老会在杭州设立的一所大学，初创时规模极小，1911 年迁到二龙头新址后大力建设，办学规模和实力有了显著增长，到 30 年代初学生发展到几百人，学校以其突出的办学成绩受到社会各界瞩目。

金陵大学成立于辛亥革命前夕，在中国教会大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经过近二十年的建设，成为一个包括文理农 3 个学院、21 个系、4 个专修科的综合大学，教学质量备受世人称赞。

岭南大学的前身是广州“格致书院”，后改名“岭南学堂”、“岭南大学”。该校与海外华侨华人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学校的很多建筑是由他们捐建的，学校的专业设置也适应了华侨社会的需要。进民国后学校发展很快，到 1918 年，学生已有近六百人。

总的来说，进入民国时期，美国基督教差会在华创办的教会大学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到1921年就达到了十几所。而同时，我国国立大学仅有北京大学、山西大学、北洋大学等三所，私立大学也只有武昌中华大学、北京中国大学、朝阳大学、南开大学和厦门大学等五所。就办学规模、实力和整体办学水平而言，美国教会大学也超过了同时期的中国大学。可以说，在当时的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美国教会大学居于重要地位。

教会大学的急剧发展，引起中国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关注和警觉。五四运动以来，随着中国民族意识的逐步高涨，许多人对外国人在中国办教育的利弊存废提出自己的意见，认为外国教会在中国土地上办学，教育的是中国的青年，但却丝毫不受中国政府的管理，这是完全不合理的，这种状况应予改变。在1922年至1927年的非基督教运动中，收回教育权更成为运动的主题。运动中，中国知识界、教育界的民族主义者纷纷撰文批判教会教育，强烈要求政府收回教育权。他们认为教会教育“破坏中国教育的统一，蔑视中国的国语国文教育，养成国民媚外的习性，培植帝国主义侵略的先驱，实在是教会教育已成的罪案，也就是中国改造的最大障碍物之一”。^①

面对中国日益高涨的民族情绪和反对教会教育的呼声，教会教育界首先做出慎重的反应。1921年至1922年间，由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伯顿（Ernest D. Burton）任团长的中国教育调查团来华进行了四个多月的调查，回国后撰写出版了一份长达450页的报告《基督教教育在中国》。报告要求教会学校“在性质上彻底地基督化”，“在气氛上彻底地中国化”，“把效率提高到一个新的

^① TSO:《教会教育盛行的原因》，《前锋》第2期，1923年12月。转引自李楚才编著：《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料——教会教育》，第578页，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高度”，^①以应付中国的挑战。所谓“中国化”，报告提出教会学校要增加中国教师和行政人员的比例；西籍教师要认真学习中国文化；学校课程要适合中国国情；要保存中国文化的优点，学校要培养学生的爱国精神。这份报告显然对中国教会教育界发生了重要影响。此后，在中国知识分子要求收回教育权的浪潮中，教会大学开始做出相应的调整。许多院校根据报告提出的观点陆续在中国政府的教育管理部门登记立案，改组董事会，由中国人出任校长。譬如，燕京大学由吴雷川当校长，而司徒雷登改任了校务长；齐鲁大学由刘世传任校长；福建协和大学由林景润担任校长；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由吴贻芳担任校长；武昌华中大学由韦卓民担任校长；岭南大学请钟荣光担任校长；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由王世静担任校长；东吴大学由杨永清担任校长；之江大学由李培恩担任校长；金陵大学由陈裕光担任校长，等等。与此同时，宗教课和宗教活动大幅度减少，而国学课和国学研究得到显著增强，其他课程也尽量参照中国政府的教育体制做了适当的调整。

经过上述应变和调整，美国教会大学为更多的中国人所接受，学校事业发展得以顺利进行。到抗战前，美国教会大学发展到高峰，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

但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给包括美国教会学校在内的教会大学带来极大的冲击。战前，教会大学学生有八千余名，战事发生后，1938年骤降到不足四千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在华办理的教会学校更受到沉重打击，日占区的美籍教师被关进集中营，大批教会大学被迫迁到西南大后方。其中，燕京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迁入成都华西协和大学校内，其他教会大学则迁到重庆、贵阳、昆明等地办学。尽管大部分美国教会大学仍在顽强维持生存，但毕竟和战前无法同日

^① *Christian Education in China, the Report of the China Commission of 1921—1922*, New York 1922, P.109—134.

而语。

抗战胜利后，大后方的学校纷纷迁回原地办学，沦陷区的学校重新开张，美国教会大学也努力恢复正常的教学科研秩序。但无论如何，这些大学战前的风光不再。随着中国内战的爆发，教会大学已很难继续发展下去。新中国成立后，所有的美国教会大学校名被取消，系科专业并入中国的大学，教会大学在中国大陆消亡。

美国教会大学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考察这些大学取得显著办学成绩的历史，以下因素是不可忽视的。

其一，这些教会大学具有优越的办学条件。

首先，它们具有充足的办学经费。教会大学属私立学校，没有固定的政府财政资助，经费除靠学校所属差会拨款外，主要靠自己筹集。譬如，燕京大学为了实现自己的办学目标，就非常注意筹款。副校长哈利·卢斯常驻美国，专门负责筹款。校长司徒雷登从1922年到1936年间先后10次回国募捐。他们的募捐活动为燕大争取到大量财源。美国一些重要的基金会如霍尔(C. Hall)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都曾经给燕京大学以巨额资助，中国的一些名流巨富、达官贵人也多次为燕大捐款。这使燕大具备了雄厚的经济基础。圣约翰大学也非常重视经费的筹集，校长卜舫济每隔一段时间便回美国休假一次，每次都在美国各地到处奔走，广泛开展劝募活动，回到上海时，往往都带回一笔资金，用于办学。他还在中国国内广泛联络，动员上海的地方士绅和各界名人捐资助学。这给圣约翰大学带来了滚滚财源。^①其他教会大学的情况也大致如此。此外，教会大学的学费也是一个重要的经济来源，校友赞助、政府补助对教会大学财力的增长也不无补益。上述财源特别是募捐所得，为学校事业发展打下了雄厚的基础。就此点而言，中国公私立大学皆无法与之相比。据

^① 高时良主编：《中国教会学校史》，第121、135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1947年的统计，金陵大学每年的经常费用按中国当时货币计算达到19个多亿，而同年中央大学的经常费则只有3个多亿。^①

其次，正因为经费充足，因此这些教会大学的基础设施和图书资料等硬件也是最好的。它们都拥有大片土地面积，如金陵大学占地2340亩，岭南大学占地1800亩（尚不包括校外农场），燕京大学占地2000余亩，华西协和大学占地1000余亩。最小的教会大学，校园也有几百亩。以校舍而言，美国教会大学多在美国请名家为学校进行建筑设计，加上大量的投入，建成的校舍往往堂皇典雅，颇具异国情调。校园布局也很有特色，建筑错落有致，树木花草布满校园。以图书资料而言，教会大学是非常丰富的。以1946—1947年的情况为例，当时金陵大学有图书40多万册，而同时期国立中央大学图书馆藏书只有12万册。^②

再次，它们拥有雄厚的师资力量。一流的师资是学校办学的关键和根本希望所在。为了同中国公私立大学竞争，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科学研究水平，美国教会大学十分注重教师队伍建设，对教师的遴选十分严格。以圣约翰大学为例，1913年学校规定，只有那些具有三年教龄和拥有硕士学位者方能聘为教授。1925年又进一步将教师分为教授和讲师、助教等六个等级，每一个等级都有相应的资历和学历要求。经十余年努力，圣约翰大学教师中高学历者的比例不断提高。据1937—1938年的统计，在圣约翰大学所属文理学院的54名教职员中，已有10人拥有博士学位，16人拥有硕士学位。^③为提高教师的层次和学校的知名度，许多教会大学还特别请来著名学者任教，这些名家往往成为各个教会大学的骄傲。如燕京大学有陈寅恪、顾颉刚、郭绍虞等；圣约翰大学有孟宪承和钱基博等；之江大学则聘请过马寅初、马叙

① 《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5编第2章、公私立大学概况。

② 同①。

③ 高时良主编：《中国教会学校史》，第136页。

伦、郁达夫、许广平；华南女子文理大学聘请过顾毓秀、林景润。此外，教会大学还利用同国外交流之便，进行师资队伍建设。如燕大的法学院是在普林斯顿——燕京基金会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普林斯顿的教授或毕业生常到燕京讲课，燕京的优秀生也有机会到普林斯顿攻读学位，然后回校任教。

其二，这些教会大学十分注重课程建设和学科专业建设。教会大学的课程设置，一般沿袭欧美大学的传统，注重基础宽厚。前二三年上基础课，文理并重，第三或第四年才有系科之别。在专业课程方面，因师资力量雄厚，设置比较完备。在课程建设和教学中，特别注重外语训练，除中文课外，专业课均用英语授课，要求学生用英语做作业，用英语回答教师的提问。司徒雷登曾回忆说：燕大的学生“能听懂无论用哪种语言教授的大学课程，教师们也可以随便讲哪种语言，或两种语言都讲。外来的讲学者从来不用翻译”。^①此外，特别注重国学教育，也成为教会大学的重要办学特点。办学者们认识到，要赢得中国社会的尊重，中国文化的教学与研究是至关重要的。因此，许多学校都设置了文学院，开设了中国文学、历史、哲学等国学课程，聘请了著名的国学教师来任教。只有圣约翰大学对国学教育重视程度不高，但在非基督教运动后，状况也有所改变。

在学科专业建设方面，教会大学予以极大的关注，各校围绕办学目标，建设了一批较为完整系统的学科专业。随着办学实践的开展，经过中外学者的不懈努力，各校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学科专业，如燕京和福建协和大学的生物学，东吴大学的法学，沪江大学的商业管理，燕京的新闻学，金陵和岭南大学的农学，齐鲁大学的医学，都享誉中外教育界。

其三，这些教会大学重视管理，有一套行之有效的严格管理制度。教会大学一般实行董事会监督下的校长负责制。每所教会

^① [美]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第62—63页，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

大学都有两个董事会，一在美国，一在中国。其在美国的董事会早期称为“托事部”。民国初年，各校董事会所有成员都是外国人，由基督教差会任命。非基督教运动特别是收回教育权运动发生后，各校为了应付中国的挑战，提出包括“中国化”在内的调整目标，校长改由中国人担任，董事会也吸收一定比例的中国人参加。董事会监督学校行政管理、人事安排、经费支配。重大决策由西方托事部决定。校长负责学校具体方针政策的制定，管理学校日常工作。除校长副校长外，教会大学还设有教职员行政委员会、校委会、执行委员会、学生自治会等。这些组织积极参与学校管理工作，对提高学校工作效率和管理水平起到重要作用。此外，在教学、学生日常行为规范等方面，学校也实行了严格的管理措施。

正因为美国教会大学具有优越的办学条件，注重课程和学科专业建设，注重管理，因此取得显著的办学效益。1950年11月，美国驻联合国安理会代表奥斯汀（W. Austin）在安理会发言，其中谈道：“中国全部大学毕业生中有八分之一在美国基督教新教教会建立的十三所大学中的一个或者一个以上的大学中受过教育”，“至少有15000名中国学生曾在美国在华所支持的各种院校中领受了大学学位”。^①姑且不论奥斯汀说这段话的主观动机和意图如何，仅就其提供的有关数字来看，应该说是实事求是的。不仅如此，在这些教会大学毕业生中还涌现了一大批杰出人才。如颜惠庆、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等民国外交界的风云人物，宋子文、严家淦等国民党要人，以及大实业家刘鸿生等都曾经是圣约翰大学的学生；教育家陶行知，化学家陈裕光、李方训、戴安邦，医学家戚寿南、侯宝璋，古典文学家程千帆则出自金陵大学；东吴大学的校友中先后有二三十人担任解放前和解放后的大学校长；之江大学则造就了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金仲华，莎士比

^① 转引自高时良主编：《中国教会学校史》，第116页。

亚研究专家朱生豪，一代词宗夏承焘，等等。大学的办学效益最终要在其培养的人才上体现出来，美国教会大学以其培养造就的大量杰出人才，充分显示了自己显著的办学效益。

3. 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

燕京大学是以美国基督教会为主在中国设立的一所著名高等学校，在同时期基督教会创办的大学中居于领先地位。它的发展，一方面是20世纪上半期教会教育迅猛发展的大势所趋，另一方面和校长司徒雷登的着力推动也密不可分。

司徒雷登于1876年出生在中国杭州，在那里度过了童年时代。他的父母都是美国早期来华的传教士，非常重视对儿子的中国文化教育。因此，司徒雷登从小就能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接受了一些中国文化的教育。12岁时，司徒雷登被父亲送回美国读书，1896年20岁时毕业于汉普顿学院，获文学士学位。这一时期，正是美国“学生志愿国外传教运动”大发展时期，受此影响，司徒雷登大学毕业后转到纽约协和神学院学习。获博士学位后于1904年被美国南长老会派到中国杭州传教，1907年被调到金陵神学院教书。传教的同时，司徒雷登进一步学习汉语，诵读经史子集，与中国各界人士进行广泛的接触，对中国文化与社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1918年底，他应聘出任燕京大学校长。当时，受燕京大学美国董事会派遣专程来华考察司徒雷登的史密斯(Edward L. Smith)在向董事会的报告中曾对司徒雷登有如下评价，他说：“出生于中国的司徒雷登博士无论在传教士还是在中国人中都享有很高的声望。他精通中文，了解中国人的思想，具有专业知识，……一旦他被给予(校长)机会，他将展示他优秀的行政才能。”^①事实也正是如此。

^① Edward Lincoln Smith: *Fifty - two Days in China*, 转引自章开沅、林荫编：《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第168页，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建校之初的燕京大学，办学条件很差：经费支绌，校舍简陋，缺乏必要的教学设备，师资短缺，“教职员连‘打字姑娘’都算在内只 33 人”，学生也只有不足百人。司徒雷登感叹说：“我接受的是一所不仅分文不名，而且似乎是没有人关心的学校。”为增强办学实力，改变燕大的弱小局面，他到任后立即采取措施，从诸多方面发展壮大燕京。

筹措经费、改善办学条件是司徒雷登首先关注的问题。燕京大学开办时经费主要由教会供给，1917 年至 1918 年的预算是 35000 美元，87% 来自教会。到抗战前的 1936 年至 1937 年，预算达到 215000 美元，较前增长了 6 倍，其中只有 14% 来自教会，而绝大部分来自募捐所得。这其中反映了司徒雷登的良苦用心和所做出的不懈努力。为了筹措经费，他在中国先后拜访过北洋政府的首脑和许多大买办、大资本家，如段祺瑞、张作霖、孙传芳、汪精卫、孔祥熙、虞洽卿等人，向他们劝募或委托他们代燕大募捐。同时，他积极向美国筹款。司徒雷登几乎每年都要回美国募捐，从 1922 年至 1936 年先后回国 10 次进行募捐旅行。美国有一个铝业大王霍尔，1914 年去世时留下巨额遗产，遗嘱中规定三分之一必须用于资助由美国或者英国控制下的亚洲或巴尔干地区的教育事业。司徒雷登闻讯，立即和霍尔遗嘱执行人取得联系，陆续获得相当一笔经费。20 年代初，燕大得到霍尔遗产 188000 美元的资助；1928 年，从霍尔遗产的美国国外教育基金的分配中得到 100 万美元用于全校的建设；哈佛燕京学社成立后，燕大又从中申请到大笔款项。此外，洛克菲勒基金会也给燕大不少捐款。据不完全统计，从 1921 年到 1937 年，仅从这两大基金中，燕大就得到捐赠 400 万美元。燕大纽约“托事部”也为燕大提供经济援助，司徒雷登还委托美国的一家募捐公司代学校募捐。

经过司徒雷登的多方努力，燕京大学具备了雄厚的经济基础。这使得燕大有条件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20 年代初，

燕大在北京西郊海淀购买了 700 多亩的土地，陆续建造了 80 多座建筑物，加上花草树木点缀其间，使燕大成为一个颇具规模、富有特色的美丽校园，很多国外来访者称赞燕大是“世界上最美的校园”。

充足的办学经费也使燕大有条件聘请大批著名学者来校任教。司徒雷登到校伊始，燕大只有 29 名教师，其中中国籍教师只有 4 名。为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司徒雷登到美国聘请了一些教授来执教，还请美国大学的教授到燕大进行短期讲学。在国内，则从公私立大学延请了很多名流学者。他们中间，有学术造诣深厚、在知识界享有盛名的陈垣、钱玄同、周作人、容庚、钱穆、顾颉刚、金岳麟、俞平伯、刘廷芳、陆志韦、冯友兰、萧公权、熊佛西、朱自清、许地山、谢冰心等。经过司徒雷登多年的努力，到 1934 年，燕大已有教授 111 名，其中外籍教授 44 名，中国教授 67 名。燕大已形成一支实力雄厚的教师队伍。

充裕的办学经费，优美的校园环境，良好的教学设施，阵容强大的师资队伍，使燕大的办学条件相当优越。

在创造好的办学条件的同时，司徒雷登为燕大制定了一套适应形势需要的办学方针。他说：“燕京大学的成立是作为传教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的，为的是给教徒的子女提供教育设施，或甚至更多地是为训练教会的工作人员。这种辅助的功能是它能够提出要求在中国的土地上建校的惟一理由，也是获得财政支援的惟一指望。我要燕京大学在气氛和影响上成为彻底地基督化，而同时又要甚至不使人们看出它是传教运动的一部分。”^① 他还说：“这所大学应牢牢地以中国生活为根基”，“让中国人在教学、行政、宗教、财务和其他部门中发挥日益增多的作用，把学校最终办成为一所中国大学”。这个方针应该说是符合教会学校提出的“更基督化、更中国化”的目标的。

^① [美] 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第 66 页。

为贯彻上述方针，司徒雷登一方面淡化学校的宗教气氛，另一方面强化学校的中国化色彩。1922年，燕京大学宣布废除学生必须参加宗教仪式的规定；1927年，又把宗教课与一般大学课程分离，另设神学院；另外，逐渐减少宗教课的教员。在中国化方面，董事会中增加了中国人的比例，并使之占据优势；由中国人出任校长，而司徒雷登任校务长；实施中外教师待遇平等的政策，规定中国教授在薪金、住房、休假、医疗等方面与外籍教授享有同样待遇；特别加强了中国文化的教学与研究，与哈佛大学共同成立了哈佛燕京学社，合作研究中国文化，同时增加了学生课程中有关中国文化的内容。这些措施的出台，适应了当时的非基督教运动发展形势的需要，调动了中国教师参与办学的积极性，进一步提高了学校的学术水平。

司徒雷登深知，一所大学要想在学术上站住脚，必须有自己的优势学科和专业。因此，他充分利用教会大学与美国国内高校的密切关系，中美合作大力加强燕大的学科建设。经过十余年的努力，一批优势和特色学科在燕大发展起来，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新闻系和社会学系。

新闻系的前身是1924年开设的新闻科。当时，美国传教士白瑞华（R.S. Britton）、聂士芬（Vernon Nash）在燕大开设了最早的新闻学课程。但不久由于白、聂二人回国，新闻学科的发展停顿下来。司徒雷登自己当过新闻记者，深知新闻人才对中国的作用。为了建设一个好的新闻系，他回到美国，和那里最著名的新闻院校——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挂上了钩，延聘了一些有名的新闻学教授来燕大执教。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马丁和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都曾是燕大的外籍教师。在他们的帮助下，新闻系的各项工作得以恢复，并得到极大的发展。该系还设立了燕京通讯社，出版了《燕京新闻》和《平西报》，为燕大赢得很高的知名度。由于新闻系办学成绩显著，学生毕业后有出路，因此成为燕大最受欢迎的专业，报考的学生很多。到30年代末，新闻系

已成为燕大第一大系，毕业生受到国内各大新闻单位的青睐，有的还被派往国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新闻社派往世界各国首都的代表几乎全是燕大新闻系的毕业生。司徒雷登不无自豪地说：“有一度中国的新闻机构派至世界各重要首都的代表几乎都是我们燕京大学新闻系的毕业生，在中国各报馆任职的我校毕业生也毫不逊色。”^①

社会学系是燕大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合作建立的，它的发展，受到美国社会学教育的深刻影响。教材、教师最初都来自美国。成功的引进使燕大成为采用西方科学方法进行社会研究的先行者。中国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者几乎都与燕大社会学系有联系，张鸿均、吴文藻、雷洁琼、费孝通、林耀华等都曾在这里学习或工作。他们组织了专业社团，出版了当时最有权威的学术杂志，撰写出版了大批反映当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最高水准的研究成果。该系还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在学校附近的清河镇建立了一个农村试验区，训练社会学系学生进行农村社会调查，推行平民教育和农业改良等活动。燕大社会学系以其高质量的学术研究和大规模的农村调查试验而享誉国内外。

在改善办学条件、发展学科专业、提高学术水平等方面，司徒雷登无疑是成功的。但他在办学方面值得称道的不仅仅在于此。在建立平等、和谐、温馨的学校人际关系，创造一种新型的学校精神方面，司徒雷登更显示出一个大教育家的风范。学校每年开学时都要举行隆重的迎新仪式，校长、教务长与每一位新生握手、交谈，使新生一入校就感受到学校对他们的关心和重视。司徒雷登还吩咐学校的注册处，对各班级比较突出的学生要向他汇报，他在闲暇时总要找他们谈心或把他们请到自己家里。这使得学生“觉得他是兼有了严父的沉静和慈母的温存”。对教师，司徒雷登也是关怀备至。每请到一位新教师，他总是请到家里款

^① [美]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第70页。

待一番，使新教师一进校就感受到校长的温暖。不仅如此，学校“上千上万的人的生、婚、病、死四件大事里，都短不了他。为婴孩施洗的是他，证婚的是他，丧礼主仪的也是他。你添了一个孩子，害一场病，过一次生日，死一个亲人，第一封短简是他寄的，第一盆鲜花是他送的，第一个欢迎微笑，第一句真挚的慰语，都是从他那儿来的”。^①在司徒雷登的带动下，“中国人和外国人，教师和学生，都彼此关心，互相照顾，亲如一家”。这种大家庭式的亲情温馨和美好和谐的人际关系被很多燕大人称为“燕大精神”。多年后，许多校友还对此记忆犹新，津津乐道。

在司徒雷登的擘划和领导下，燕京大学成为中国规模最大、水平最高、最具影响的教会大学，取得了显著的办学成绩。在其存在的三十多年中，共培养了六七千名学生，其中绝大多数工作在教育界、政界、新闻界，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它在新闻学、社会学及中国文化研究等领域取得丰硕成果，为提高中国的现代学术水平、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燕京大学独特而丰富的办学经验也为中国高等教育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1946年，司徒雷登出任美国驻华大使，积极执行美国战后扶蒋反共的对华政策，站到了中国人民的对立面，这显然应予批判和揭露。但我们决不能因此抹煞司徒雷登经营燕京大学的历史，对他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所提出的办学思想、积累的办学经验、创造的办学业绩都应合理地分析、批判地继承。

4. 教会医疗事业

进入20世纪后，在华美国教会更加注重医疗卫生事业，除扩大原有医院规模外，又新设了不少医院和诊所。据1938年出版的《基督教差会世界统计》资料所载，截至1937年，在华欧美基督教会所办的医院共有300所，病床床位有21000张，另有

^① 《燕大友声》第2卷第9期，1936年6月24日。

小型诊所 600 处。其中，属于美国教会系统经营的医院有 140 多所，病床 10000 余张，占到欧美教会所办医院总数的 50%。加上洛克菲勒财团在北京直接投资经营的协和医院和医学院，英美基督教会合办的医院，以及美国天主教会在华开设的医院，可以说美国教会在医疗卫生事业方面如同其在教育事业方面一样，也居于绝对优势地位。

这些医院的分布极其广泛，除个别边远地区外，几乎大多数省区都有美国教会医院。其中比较有名的医院有：广州的博济医院、柔济医院，汕头的盖世医院，通州医院，保定的戴德生纪念医院，上海的同仁医院，苏州的博习医院，南京的鼓楼医院，山东的齐鲁大学医院，成都的协和大学医院和内地会医院等。

教会医院的经费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来自各种捐款收入，一部分来自医院的收费。早期开设的教会医院一般不收费，目的是扩大影响，吸引更多的群众信教，因此靠捐款维持。进入 20 世纪后，教会医院的收费办法逐渐改变，实行了就地募捐、以富养贫的办法。多数医院是在中国向有钱人募捐建造的，对有钱的病人收取昂贵的医药费，补贴对贫民医药费的减免。

美国教会医院的创办，把西方先进的医术、医药及现代医院制度传入中国，成为近代中美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

美国教会在大力兴办医院的同时，还在教会大学中设立了专门的医学科或医学院。比较有名的医学院有：

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它的前身是美国圣公会 1880 年创办的圣约翰书院医科，1914 年改为现名。该校在医学界颇有影响，旧上海工部局医院聘用的医师大多数是该校毕业生，社会上许多名医也出自该校。

协和医学院。1906 年，美英六个教会团体在北京创办了协和医学校。1915 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华设立的中华医学部接办此校并加以扩建，正式更名为北京协和医学院。在所有的教会医学院中，以此校最为著名，教学质量也最高。学校教学设施先

进，被誉为“具有临床前和临床教学与科研所需要的一切设备的第一流医科学学校”；学校师资力量雄厚，极为重视学术研究，曾创办实验生物和医学会北京分会、协和教员医学会和杂志会、中国生理学会，并出版了《中国生理学报》。该校培养了大批医学人才，大都成为中国现代医学界的骨干力量。

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1914年，华西协和大学设立了医科，之后又增设了牙科。30年代在医科和牙科的基础上建立了医学院。该校师资力量雄厚，系科完整，教学手段先进，管理严格，是一所质量很高的医学院校。

湘雅医科专门学校。1914年，美国雅礼会和湖南省政府在湖南长沙设立了湘雅医科专门学校，1927年学校暂时停办，1929年复办，1931年更名为湘雅医学院。该校师资力量雄厚，开设有一流的基础课和专业课，有良好的临床基地，用英语教学，学生实行严格的升级制度。特别注重社会服务工作，培养了大批公共卫生工作人员，抗战期间自发组织了抗日医疗救护队。该校为推动中国医学教育和医疗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国内同类院校中名列前茅，当时有“南湘雅，北协和”之称。

齐鲁大学医学院。由济南的“共合医道学堂”、北京旧协和医学院的部分师生、华东联合医科、汉口大同医科合并而成。该校注重医学教科书的翻译和编写，出版了一整套医科课本和各科临床参考书；注重学生的临床实践，建起规模宏大、设备齐全的附属医院；学校还参与了一些社会服务项目，如开办了麻风病医院、儿童诊疗所，在国内享有盛誉。30年代初国联考察团来中国考察，称此校是当时中国最好的医学院。在其存在的几十年中，它培养了大批西医专门人才，其中一些人成为国际知名的医学家。

岭南大学医学院。20年代后期由美国教会所办的博济医院、夏葛女子医科学院等合并而成。内设教学科目齐整，师资阵容较强，培养的毕业生在医疗、护理、公共卫生和药物改善等方面做

出重要贡献。

上述教会医学院校的创办，传播了现代医学教育制度，把先进的西医西药等现代医学引进到中国，对中国建立自己的现代医学和医学教育体系大有裨益，为中美医学交流做出了不可多得的贡献。

五、中美文学艺术交流

1. 引进美国文学

在中国文学由传统向现代的划时代转变中，外来文学的输入与借鉴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很多作家十分注重引进外国文学，大力加强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联系，用西方现代文学冲击和改变中国传统文学。其中，美国文学是他们引进、输入的重点之一。据统计，从1911—1949年，中国共出版外国文学译著近4000部（包括同一著作的不同译本），其中美国文学译著达569部，占引进的外国文学作品总数的14%，在数量上居各引进国的第四位。从引进的作品的分类来看，涉及到各种文学样式，包括小说356部，诗歌8部，戏剧34部，报告文学87部，散文4部，回忆录、日记10部，儿童文学55部，文学理论与研究3部，作家论与作品研究6部，作品综合集6部。^①与此同时，对美国文学的介绍和研究也全面展开。一批中国作家更是受到美国文学的深刻影响，他们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模仿、吸收美国文学作品的创作风格和创作手法，极大地丰富了作品的内涵，增强了作品的冲击力和感染力。

(1) 诗歌。比较而言，中国现代文学受美国文学影响最深的，当数美国的诗歌。美国诗歌对五四后中国新诗的发展起了积

^① 《民国时期总书目·外国文学》，第328—373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

极的推动作用。

从1912年到1922年，美国文学史上出现了一个新诗运动，其中，“意象派诗歌”盛行一时，几乎唱了主角。意象派诗歌强调诗人应以鲜明的意象来表现诗意，反对空泛的抒情、陈腐的说教和抽象的概括。意象派诗人提出的创作原则是：每一首诗应呈现一个意象，即感觉中的具体对象；以直接的手法处理事物，不模糊、不含混；对表现无用处的语言，一字不用；韵律上用连续和音乐性语言，不受节拍的束缚。意象派诗歌在冲破浪漫派诗歌的束缚、建立新的现代诗歌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美国新诗运动风起云涌之时，中国大批青年学子正在美国学习，他们不能不受到深刻影响。最有代表性的是胡适。他当时非常关注这场运动，称颂“意象派是对西方传统诗歌烦琐堆砌风气的反叛”。1916年12月25日，他在日记中剪贴了《纽约日报》登载的《意象派宣言》并加以批注：“此派所主张与我所主张多相似之处。”正是在意象派的启示和影响下，胡适写出《文学改良刍议》，提出文学革命的八点主张，强调文章要言之有物、不避俗字俗语、直接描写事物等，与意象派的创作原则非常吻合。关于胡适文学革命主张与美国意象派诗歌运动的联系，后来的文学史家和文艺评论家多有评述。梁实秋曾说：意象派“在美国声势最盛的时候，我们中国留美的学生一定不免要受其影响。试细按影象主义者（即意象派——引者注）的宣言，列有六条戒条，主要的如不用典，不用陈腐的套语，几乎条条都与我们中国倡导白话文的主旨吻合。所以我想，白话文运动是由外国影响面起”。^①其实，不只是文学革命主张，就是胡适的白话诗创作，也深受意象派诗歌运动的影响。他借鉴意象派诗歌写出的《尝试集》，为中国新诗的发展开辟了方向。

^① 梁实秋：《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第7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

除胡适外，五四以后的很多诗人也受到意象派的影响，并创作了一批新诗。如沈尹默的《月夜》，闻一多的《秋色》，王统照的《湖心》，刘大白的《秋晚的江上》等。一批诗人和作家还纷纷撰文介绍、倡导意象派诗歌。《现代》、《乐群月刊》、《新文艺评论》、《小说月报》等杂志都曾登载文章介绍美国新诗运动和意象派的主要纲领。《现代》杂志第5卷第6期是美国文学专号，邵洵美等人发表文章对意象派予以介绍并称颂有加。意象派诗歌的传人，对中国新诗运动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中国新诗的发展，还受到美国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惠特曼(Walt Whitman)的深刻影响。惠特曼的作品歌颂自然，歌颂人，歌颂劳动，体现了新兴的资本主义美国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在形式上，惠特曼的作品打破了美国诗歌的旧传统，创造了自由体的形式，大量采用重叠句、平行句，语言形象、生动，如行云流水般流畅、激越，有一种强烈的震撼力。他的诗从思想内容到表达形式都契合了中国五四后文学革命特别是新诗改革的需要，一经传入，立即受到中国诗人的热烈欢迎和积极响应。

郭沫若还在日本留学时便读到惠特曼的作品，从此与其结下不解之缘。据他回忆：“惠特曼那豪放的自由诗使我开了闸的作诗欲又受到一阵暴风般的煽动”，“尤其是惠特曼的那种把一切的旧套摆脱干净了的诗风和五四时代狂飙突进的精神十分合拍，我是彻底地为他那雄浑的豪放的宏朗的调子所动荡了”。^①正是在惠特曼作品的影响下，郭沫若接连创作了《凤凰涅槃》、《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地球，我的母亲》、《匪徒颂》、《天狗》、《心灯》、《巨炮的教训》等大批诗歌。这些诗豪放生动，气势恢宏，充满生机，将民族性、时代性和诗人的个性紧密结合在一起，奠定了郭沫若在中国新诗坛的重要地位。

闻一多在留美期间系统地学习过英美诗史，尤其深入接触了

^① 《郭沫若文集》第11卷，第14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包括惠特曼作品在内的浪漫主义诗歌。在浪漫主义诗风的影响下，他先后创作了《让她被忘掉》、《太阳吟》、《亿菊》等诗歌，其中充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感情、节奏、音韵达到和谐完美的统一。从中不难看出他对惠特曼等浪漫主义诗人作品创作手法的借鉴。

艾青是在外国文学的直接影响下从事诗歌创作的，其中惠特曼的雄浑和宽广就像最深沉的底色一样出现在他的背后。冯至的第一部诗集中的很多作品也使人想到惠特曼《草叶集》中浸透着的战斗和进取的精神。何其芳写诗注意吸取惠特曼作品复杂的内涵，诗中自然的韵味、爽朗的情调和开放的思考方式使人自然想到惠特曼的很多诗篇。^①

对给中国诗人如此重要影响的惠特曼的作品，中国文艺界自然注意到对它的译介。1919年，田汉在《少年中国》创刊号发表了题为《平民诗人惠特曼的百年祭》的长篇论文，对惠特曼的生平、思想、艺术做了全面介绍和评价，并指出，纪念惠特曼，就要借鉴他所高歌的平和、平等、自由、博爱的精神，就要学习他主张的灵肉调和的艺术观，就要实践他的自由体诗歌。到40年代，惠特曼的诗作被大量翻译过来，出版了高寒译的《大路之歌》、《草叶集》，屠岸译的《鼓声》，陈适怀译的《囚牢中的歌者》。这些译作的出版发行，为更多的文艺工作者学习借鉴惠特曼的诗歌作品，提供了方便条件。

(2) 小说。同诗歌一样，美国小说也受到五四以来新文学作家的极大关注并给予他们重要影响。

五四以来美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出版有两个特点，一是小说的数量占了绝对优势。在569部美国文学作品中，小说有356部，而其他各种文学样式作品的总和只有213部。二是小说翻译涉及的作家、流派极其广泛，据统计，仅美国知名作家就有欧文

^① 曾逸：《走向世界文学》，第123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Washington Irving)、霍桑 (Nathaniel Hawthorne)、爱伦·坡 (Edgar Allan Poe)、奥尔科特 (Louisa M. Alcott)、马克·吐温 (Mark Twain)、德莱塞 (Theodore Dreiser)、巴勒斯 (E. R. Burroughs)、杰克·伦敦 (Jack London)、辛克莱 (U. B. Sinclair)、赛珍珠 (Pearl S. Buck)、海明威 (Ernest Hemingway) 等一大批。他们的作品很多都被介绍、翻译了过来，并给中国作家以深刻影响。

爱伦·坡是美国 19 世纪上半叶的一位著名诗人和小说家。他的小说充满了对情节的神秘安排，对人物心理的深刻分析，对现实生活的象征性讽刺，体现了自然主义、象征主义、神秘主义等流派的创作思想和手法。他的作品引起中国新文学作家的广泛关注。鲁迅早在 1906 年翻译出版的《域外小说集》中就收集了爱伦·坡的小说《黄金甲虫》，后来在回忆里也承认爱伦·坡的作品对自己早期文学创作产生过影响。茅盾曾翻译爱伦·坡的小说《心声》，并从中吸取了有益营养。王统照称赞爱伦·坡的作品技巧精美，“所示的印象更见沉实、鲜明”。在他创作的长篇小说《春花》中，不难发现爱伦·坡作品的影响。施蛰存在创作中更有意模仿爱伦·坡，在他的《善女人的品行》、《小珍集》、《梅雨之父》等作品中，爱伦·坡小说的种种特色，如对气氛与色彩的渲染、充沛的诗意、各种病态的怪异心理的描写，等等，都有所展现。

杰克·伦敦是 19 世纪美国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的作品表达了对被压迫者的深切同情。他的作品深为中国作家所喜爱。鲁迅曾说过，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唤》是自己爱看，也愿意别人看的书”。他还说“杰克·伦敦的作品恐怕于中国的现在也还相宜”。艾芜在他所写的《文学手册》中也将杰克·伦敦列为自己喜爱并受到过影响的作家之一。20 年代以后，杰克·伦敦的作品大量被翻译过来，仅《野性的呼唤》就有三个版本。

辛克莱也是美国的著名作家。他的早期作品反映了劳苦大众艰辛悲惨的生活，揭露了垄断资产阶级的贪婪腐朽及工业化社会

对人性的扭曲。中国新文学作家很注意对辛克莱作品的翻译，20年代至30年代，郭沫若在日本以“易坎人”的笔名翻译了他的三部长篇小说《石炭王》、《屠场》、《煤油》。到40年代，辛克莱的小说有25部被译成中文（包括同一小说的不同版本），受到中国广大读者的欢迎。

在翻译引进的美国小说中，斯坦培克描写美国经济萧条时期农业工人悲惨境遇的《愤怒的葡萄》，海明威所写的歌颂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战地钟声》、《蝴蝶与坦克》等作品也受到进步读者的普遍好评，对中国的抗战文学产生重要影响。

(3) 报告文学。报告文学是一种纪实作品，它以信息量大、反映迅速的特点在某一特定时期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抗战时期美国关于中国的报告文学和反法西斯题材的报告文学便是中国文艺界和广大读者极为关注的外国文学作品。

中国抗战初期，中国抗战文艺界在竭力搜寻世界各国的反法西斯文学作品时，就注意到美国的报告文学。尽管此时中国文坛译介外国文学作品很少，但还是翻译出版了斯诺的《中国的新西北》（平凡书店1937年5月）、《二万五千里长征》（文摘社1938年1月）、《西行漫记》（上海复社1938年2月），史沫特莱的《打回老家去》（上海导报馆1938年10月），斯特朗的《为自由而战的中国》（上海棠棣社1939年3月），斯诺夫人的《西行访问记》（上海译社1939年4月）及辛克莱的《不准敌人通过》等战争文学作品。^① 这些作品在中国读者中产生极大反响。之后，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规模的扩大，美国作家及记者所写的有关世界各战场的报告文学也被广泛介绍过来。如《东亚见闻录》、《法兰西倾圮记》、《滇缅公路》、《瓜岛日记》、《在德军后方》、《空中皇后》、《我轰炸东京》、《随史迪威将军撤退》、《东方上空之十秒》、《所罗门群岛争夺战》、《在战争中的旅程》、《鱼雷艇第

^① 《民国时期总书目·外国文学》，第360—368页。

八队》等。这些书被称做“最权威的战争书籍”，帮助了中国读者认识现代战争。^①

五四以后的中国新文学界对美国文学的引进及中国艺术家所受美国文学的影响，绝不止上述几个方面。除我们上面谈到的以外，在剧本、文学批评等方面也翻译引进了很多内容。如随着美国戏剧艺术的传入，作为戏剧之本的剧本也为中国的艺术家所重视，先后翻译了34个剧本，其中美国戏剧大师奥尼尔的作品就有10部翻译了过来，为推动中国现代戏剧艺术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在文学批评方面，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白璧德的理论受到一批中国学人的重视，他们先后撰写了大量介绍和研究白璧德的文章并结集出版，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产生一定的影响。特别是梁实秋，他一生的文学批评活动及文学批评成果，深受白璧德的影响。

2. 美国戏剧、电影艺术的传入

民国以来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戏剧界的一些先驱积极引进西方先进的话剧艺术，用以改造中国传统戏剧中陈旧僵化的表现形式。其中，美国话剧艺术是他们引进的重点之一。

美国话剧艺术引起中国戏剧界极大关注并产生重要影响的，一是小剧场运动，二是奥尼尔的剧作。

小剧场运动是19世纪末在世界剧坛兴起的一场声势浩大的戏剧革命。它首先出现在法国，继而在欧洲迅速传播开来，1910年前后传入美国。到1915年以后，从纽约到旧金山，从大城市到小乡村，小剧场团体大量出现，上演了世界著名戏剧家的大量作品，推动了小剧场运动的发展。小剧场运动的特点是：它对社会的强烈批判精神和对人性的犀利剖示，使戏剧比以往任何时候

^① 黄俊英：《二次大战的中外文化交流史》，第278—279页，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

都要关注人生，具有严肃的社会意义；它将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平等思想熔铸在戏剧之中，使戏剧题材走出神话、传说、王公贵族的藩篱；它改变了传统的大戏院中那种等级森严的空间格局，使平民能够进入小剧场享受戏剧艺术；它改变了以往戏剧中演员夸张、矫揉造作的表演风格，及舞台上华而不实的绘画布景，而代之以真实细腻、自然亲切的舞台表演，和形同现实生活场面的戏剧环境；它以“导演中心”来统一舞台演出，完成戏剧体制由“明星制”向“导演制”的转换。^①小剧场运动揭开现代戏剧的帷幕，在戏剧文学、导演、表演、舞美、剧场空间观念等方面，对世界现代戏剧的发展具有奠基性的意义。

中国人比较早地注意到美国的小剧场运动并著文予以介绍。1921年5月创刊于上海的《戏剧》月刊在创刊后不到一年就刊载了五篇关于美国剧坛的报道。其中，汪仲贤译的《美国最近组织的小剧场》、《美国的剧场公会》两篇文章，比较详细地介绍了美国的小剧场运动。其他报刊还刊登了陈治策所译威廉姆斯的《小戏院公演预算》、莫西斯的《美国小剧场史》，冯国英所撰《美国的剧场协会》，陈治策所撰《欧美各国的近代小剧场运动》等文章。

在撰文译文介绍美国小剧场运动的同时，中国戏剧界的一些人开始以此指导中国的话剧实践。1921年，陈大悲参考美国有关小剧场运动的论著，撰写了长篇文章《爱美的戏剧》，连载于《晨报副刊》。该文依据美国小剧场运动的理论与实践，分析了中国剧坛的现状，对中国话剧的发展提出了一系列主张。其中特别强调业余演剧的重要性，认为中国戏剧要发展，只有以不指望演戏挣钱吃饭的学生演剧为主体，辅以其他有职业保障而有志于戏剧的业余演剧。因为美国的小剧场运动就是一种“业余戏剧

^① 田本相主编：《中国现代比较戏剧史》，第227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93年版。

活动”。文章还详细介绍了业余演剧的性质、起因及剧作、导演、表演、舞美等方面的知识。在陈大悲的“爱美的戏剧”的倡导下，中国戏剧界出现了一个以学生演剧和其他业余戏剧社团为基本队伍的爱美剧运动，一直持续到20年代末，为中国话剧建设培养了大批剧作家、导演、演员和观众。

受美国小剧场运动影响最深、传播最为努力、成就最大的是—批留美专攻戏剧的人士，如张彭春、洪深、余上沅、赵太侔、熊佛西等。他们把当时世界最新的戏剧思潮——小剧场运动引入国内，开始中国的戏剧建设。譬如，他们模仿美国小剧场运动中出现的戏剧研究机构和实验剧场相结合、大学中设实验剧场的特点，创办了大批戏剧学校和小剧场。如：余上沅、赵太侔、熊佛西等先后主持的国立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戏剧系及其演剧礼堂；熊佛西主持的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戏剧系及其演剧小礼堂；张彭春主持的南开新剧团，等等。这些学校、机构边开展戏剧教育，边进行演剧实践，为推动中国话剧事业的发展起了开创之功。

这些留美生深得小剧场运动的精髓，他们运用小剧场运动的戏剧理论知识，排演了大批剧目，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如南开新剧团团长张彭春，尽管留美期间所学专业是哲学和教育，但他对戏剧有着特殊兴趣，在美期间观摩了大量戏剧剧目，对小剧场运动有着深刻体察。1916年回国后，他主持南开新剧团，排演了《娜拉》、《一元钱》、《一念差》、《新村正》等剧，采取了美国戏剧那样比较正规、严格的导演制，舞台布景生活化，演员表演真实自然，使演出大获成功，南开新剧团也因此蜚声津京，成为北方一个颇有影响的爱美剧社，受到戏剧革新家的重视和称道。又如洪深，留美期间专攻戏剧，师从贝克教授，在哈佛大学戏剧系系统地学习过戏剧理论、表演、导演、编剧和剧院管理等知识，深受小剧场运动的影响。1923年回国后，经人介绍加入上海戏剧协社，任导演，先后执导了《终身大事》、《泼妇》、《回家以后》、《好儿子》、《少奶奶的扇子》等剧目。他实行了严格的

排演制度，废除了以往戏剧演出中男扮女装的习惯，强调演员表演要忠实于原作风格，导演中强调“幻觉”和“写实”。他导演的戏剧，轰动了剧坛，有力推动了中国话剧的发展。

奥尼尔（Eugene O'Neill，1888—1953年）是美国戏剧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家，一生创作了大量作品，这些剧作反映了多方面的社会问题和人的问题，在戏剧形式上也有很大的突破和发展，形成自己独特的悲剧风格。由于奥尼尔在戏剧文学中的杰出成就，他四次获得普利策奖，并于193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被誉为“美国戏剧之父”，在世界剧坛上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奥尼尔的戏剧在中国经久不衰，同样产生了巨大影响。从五四时期到40年代末，奥尼尔始终是中国剧坛上一个响亮的名字。报纸杂志发表了大量介绍奥尼尔及其作品的文章，翻译界先后翻译出版了他的名作《加力比斯之月》、《天边外》、《琼斯皇》、《奇异的插曲》等17部戏剧，戏剧界上演了他的9部剧目。他的剧作吸引并哺育了一代代中国戏剧家。洪深吸取了《琼斯皇》的场景安排和情节结构，创作了被称为“中国的《琼斯皇》”的《赵阎王》；另外两位戏剧家伯颜和谷剑臣受《琼斯皇》的影响，分别创作了《宋江》和《绅董》。三部作品在戏剧构思、表现主义技巧、人物内心的处理等诸多方面都模仿和借鉴了《琼斯皇》。比较而言，中国戏剧界受奥尼尔影响最深、吸收奥尼尔戏剧营养最成功的是曹禺。30年代中期，他创作的《原野》问世，标志着中国戏剧在学习借鉴奥尼尔方面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在《原野》中，无论是场景安排、音响效果，还是戏剧结构、人物独白、幻觉处理，都受到奥尼尔戏剧的启迪而又加以充分消化吸收，使之更符合中国的生活逻辑和中国观众的欣赏习惯。可以说，曹禺借鉴了奥尼尔，又发展了奥尼尔。

在引进美国戏剧的同时，美国电影也较前更多地涌入中国。

还在清末的时候，美国电影就传入中国。1897年7月，美国电影放映商雍松带着一些美国影片来到上海，在天华茶园、奇

园、同庆茶园等处放映，很多人去看，“使观者如人山阴道上，有应接不暇之势”。1909年，美国电影商人宾杰门·布拉斯基（Benjamin Brasky）在中国创办了亚细亚影戏公司，开始在上海和香港拍摄影片。第一部影片是由该公司的张石川、郑正秋编剧、导演的《难夫难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美国电影称雄世界，输入中国的美国影片更多，几乎独占了当时和以后一段时期中国的全部银幕。其中，卓别林的喜剧片受到中国观众的热烈欢迎。1926年8月，有声电影在美国诞生，四个月后就传到中国。1926年12月，上海百星大戏院从美国运来若干种有声短片放映，影院还把电影放映机、影片、扩音器材陈列出来，让观众参观，并有放映技师在旁解释影片发音的原理，引起中国电影工作者和观众的很大兴趣。1928年11月，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有人从美国带来一架有声电影放映机并放映了美国影片。^①这两次试映是有声电影在中国放映的开始。此后，美国有声片在中国盛行一时，大量充斥中国银幕。

美国电影的传入，将西方的电影艺术完整地输入到中国，对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3. 民国时期来华的美国作家

民国时期，中国活跃着许多美国作家。他们写作了大量中国题材的文学作品，向西方真实介绍了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构成这一时期中美文学交流的重要内容。在这些作家中，首先值得一提的便是美国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

赛珍珠（Pearl S. Buck, 1892—1973年）的父母是受美国长老会派遣早期来华的传教士，长期在中国传教。赛珍珠的五位兄弟姐妹也全部出生在中国，但其中三人因患流行病早夭。为了减轻

^① 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第8、12、16、156—157页，中国电影出版社1980年版。

丧子的痛苦，赛珍珠的父母于1891年回美国休假，并在美生下了赛珍珠。但出生后仅三个月，赛珍珠便在襁褓中被父母漂洋过海带到中国。在此后的四十余年中，她除回美国上大学和读硕士学位外，其余岁月都是在中国度过的。在镇江，她度过自己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1917年，她嫁给美国年轻的农业专家约翰·洛辛·巴克，并随之在皖北土地贫瘠、经济落后的宿州生活了两年半。1919年，她与丈夫移居南京，在金陵大学讲授英国文学，在这里生活了将近十二年，完成了后来为她赢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几乎全部文学作品。1931年，她的小说《大地》在纽约出版，引起轰动，随后获得普利策奖。1934年，她离开南京回美国定居。1938年，她因此前创作的大量中国题材的文学作品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获得该奖的女作家。此后，她在美国继续她的文学创作生涯，出版了大批各种样式的文学作品，享誉世界文坛。

赛珍珠在华生活、工作了三十多年，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对她的影响是其他任何一个美国作家所望尘莫及的。在她小的时候，她的父母为方便传教，把家安在与中国普通百姓比邻而居的地方，而不是与外界隔绝的租界或侨民保护区。这样，赛珍珠从小就同中国小孩一起玩耍，“在中国人的世界里，说中国话，举止像中国人，和他们吃一样的东西，分享他们的思想感情”，^①对中国百姓的生活有着相当深入的了解。在父母的教导下，年幼的赛珍珠和佣人们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老保姆经常给她讲各种神话故事、民间传说，赛珍珠后来称这是她最早接受的文学熏陶。她的家里还有一位家庭教师，为她讲解文学经典、儒家伦理和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使她获益匪浅。后来，她在金陵大学任教期间，还专门请国学造诣很深的龙墨乡先生辅导她学习中国小

^① Pearl S. Buck: *My Several Worlds: A Personal Record*, New York: John Day, 1954, p. 10.

说史，阅读大量的古典小说和现代作品，使她对中国人的民族心理有了更深的了解。在随丈夫居宿州期间，她时常和丈夫一起到乡下去，往往是丈夫与男人们一起研讨农业技术，她则找些女人孩子聊天，同时观察他们的生活，这使她对中国农民的生活习性、喜怒哀乐了如指掌。从那时起，她的心底便弥漫着一种对中国农民的爱，这种爱贯穿她的生命始终，并体现于她的文学作品之中。

赛珍珠从小在中国长大，她熟悉中国不同阶层的社会生活，有着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同时她也了解西方世界，熟悉西方文化，这使得她创作的以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农民生活为题材的小说既真实生动，具有广博的容量和深刻的意义，又符合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从而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轰动。30年代，她接连发表了《东风·西风》、《大地》三部曲、《母亲》等一系列中国题材的小说。在这些小说中，我们不但看到了勤劳、顽强的中国农民形象，也看到他们愚昧落后的观念和恶习；既有对中国农村新年风俗、结婚庆典、丧葬仪式、家庭宗法的出色描绘，也有对中国连年不断的旱、涝、蝗、兵、匪等天灾人祸的详细叙述。这些作品深深影响了欧美众多读者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看法。正如在瑞典皇家学院授予赛珍珠诺贝尔文学奖后举行的宴会上主持人所说：赛珍珠“通过自己质地精良的文学著作，使西方世界对于人类的一个伟大而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人民有了更多的理解和重视”；使“我们懂得如何在这人口众多的群体中看到个人，并向我们展示了家庭的兴衰变化，以及土地在构建家庭中的基础作用”。由此，赛珍珠“赋予了我们西方人一种中国精神，使我们意识到那些弥足珍贵的思想感情”。^①同时，赛珍珠的文学创作也引起中国文学界和中国广大读者的高度关注。赛珍珠的小说大

^① Elizabeth Groll: *Wise Daughters from Foreign Lands - European Women Writers in China*, London, Pandora, 1989, p. 209.

部分都有中译本，有些作品还有几种不同的译本。《大地》原著在美国出版不久，中国的《东方杂志》便开始连载，后来各地的书局出版了近十种不同的中译本，其中上海商务印书馆的翻译本从1933年至1949年就印刷了12次。一个外国作家的作品在中国这样大规模地印行，这在出版史上是少有的。

赛珍珠不但在小说中描写中国，她还用其他形式向西方大力介绍中国文学，致力于促进中国与西方的跨文化交流。1938年，她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仪式上发表题为《中国小说》的长篇演说，高度赞扬了中国小说的成就。她说“恰恰是中国小说而不是美国小说决定了我在写作上的成就”，“中国小说对西方小说和西方小说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在演讲中，赛珍珠如数家珍地阐述了中国小说的起源、发展演变及其特征，中国小说与中国文人和百姓的关系等。她特别详细地介绍了中国古典名作《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声称“想不出西方文学中有任何作品可以和它们相提并论”。她还介绍了其他古典小说，如《西游记》、《封神演义》、《儒林外史》、《镜花缘》、《西厢记》和《金瓶梅》。赛珍珠的演说得到西方媒介的广泛报道，使中国的小说为更多的西方民众所了解。三四十年代，她和丈夫理查德·沃尔什创办了《亚洲》杂志，在这份杂志上，赛珍珠刊登了鲁迅、老舍等进步作家的作品，向西方介绍中国现代文学。斯诺向西方介绍中国革命的《西行漫记》，也首先刊登在这份杂志上。1941年，赛珍珠夫妇还在美国创办了旨在促进东西方交流的“东西方协会”，正是这个协会，热情接待了1946年赴美讲学访问的中国著名作家老舍和曹禺。赛珍珠多次邀请老舍出席美国艺术界的各种集会，向与会者介绍老舍并宣传他的文学成就，称老舍“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作家”，“是中国的狄更斯和马克·吐温”。她还积极协助老舍在美国出版《骆驼祥子》、《四世同堂》。“东西方协会”还聘请了中国旅美表演艺术家王莹担任该协会的董事和中国戏剧部主任。王莹组成中国剧团在抗战期间赴美国各地演出，宣

传抗战，得到了赛珍珠的大力支持。

赛珍珠一生从中国吸取了无尽的文化营养，也为向西方世界展示和介绍中国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她热爱中国和中国文化。在她逝世后，尼克松总统称颂她是“一座沟通东西方文明的人桥”。在她为自己设计的墓碑上没用一个英文字，而在一个方框内镌刻了“赛珍珠”三个汉字。选择汉语和她早年的名字来永远代表自己，充分说明赛珍珠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热爱之情。

作为民国时期来华的美国作家，赛珍珠的经历是比较特殊的，更多的美国作家不同于她。这些人大都是记者出身，来华时间大都集中于抗战时期，其作品也主要是以中国革命和抗战为题材的报告文学。他们的作品沟通了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宣传了中国革命和正义的抗战斗争，也使他们自己成为著名的作家和远东问题专家。在这些人中，成就卓著者当推埃德加·斯诺、爱格尼丝·史沫特莱、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①。

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1905—1972年）于1905年出生在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其父是一位经营出版印刷业的小业主，母亲是一位天主教徒。斯诺是在一个温暖、严格、注重教育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他精力充沛，爱好广泛，尤爱旅行。中学毕业后，他到堪萨斯城大学读了两年书，接着又到密苏里大学著名的哥伦比亚新闻学院学新闻。在那里，他潜心攻读了许多新闻课程，为后来从事新闻事业打下了基础。1928年，他以一位年轻船员身份来到中国，随即担任了上海《密勒氏评论报》、《芝加哥论坛报》的助理编辑和记者。在上海居住几年后，他与美国领事馆的一位美国姑娘海伦·福斯特结婚，并于1933年搬到北京居住。

^① 参见《纪念埃德加·斯诺》（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纪念史沫特莱》（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东方行——记斯特朗》（白紫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95年版）、《二次大战的中外文化交流史》第二编第八章。

在北京，斯诺继续从事新闻工作，同时在燕京大学新闻系任教，开设了《特写写作》等选修课。在此期间，中国爆发了席卷全国的“一二·九”运动，斯诺坚定地支持学生的正义斗争。几个大学的学生曾在斯诺家里进行筹备活动，商议游行路线、集合地点。从12月9日到次年1月初，斯诺多次参加了学生的游行等活动，并将事件始末写成长篇报道发往国外，刊登在《太阳报》上，使西方及时了解到“一二·九”运动的真相。

斯诺逐渐得知，在独裁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广大地区之外，还有一个“红旗下的中国”，那里聚集着一支革命的武装力量。他要了解这个“中国”，将那里的实情描绘出一幅完整的图画。在宋庆龄和其他许多朋友的帮助下，1936年，斯诺冒着生命危险，偷越国民党的重重封锁线，秘密访问了陕北根据地，成为进入苏区的第一个美国人。在那里，斯诺度过了五个月的时间，行程3000里，从后方到前线，从工农群众到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进行了广泛的采访。之后，他带着这些非同寻常的材料回到北京，以真诚的感情，朴实的文笔，写下了震动世界的《西行漫记》。这本书于1938年用英文和中文同时开印，它向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民报告了红色根据地的真相，很多中国青年正是通过这本书了解了共产党和红军，从而参加了革命；它也向世界人民报告了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打破了国民党十年的新闻封锁，向世界宣传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开始后，斯诺把他的全部注意力集中于揭露日本法西斯在中国的暴行。上海“一·二八”战事之夜，他秘密潜入中日双方阵地采访，直接与交战双方的士兵交谈，倾听了蔡廷楷将军的誓言。他把这一独家快讯连夜发往美国，第二天，美国六家大报同时采用了斯诺的快讯，报道了发生在上海的日军屠杀事件，使世界为之震惊。1940年，他写成一部分析性长篇报告文学《为亚洲而战》，以他所见所闻的资料，详细评述了“卢沟桥事变”的始末，揭穿了日本法西斯向世界散布的政治谎言。文中

还报道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的抗战情况，批评了国民党顽固派不利合作抗日的言行。正因此，国民党政府把斯诺视为敌人，于1941年将他逐回美国。

作为一名记者，斯诺为人正直，持见公允，采访深入，政治触觉敏锐。他的作品不仅史料翔实、知识丰富，而且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他为向西方介绍中国，加强中美人民之间的友谊，加强中美文化交流做出重要贡献，他也成为中国人民患难之交的朋友。新中国成立后，他又三次访问中国，为改善中美关系做了进一步的努力。

爱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 1890—1950年）出生在美国一个贫困的工人家庭。为了求学、谋生，很小的时候，她就卖报、做女佣和推销员，吃尽了苦头，同时也唤起她对底层人民的深切同情和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憎恨。青年时代，她参与了印度人民的独立运动，之后，远赴德国、丹麦、捷克斯洛伐克、俄国等国教书、旅行。1928年，她来到上海。一踏上中国的土地， she就把立足点放在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抗日民主的进步力量一边。她与中国左翼文艺运动联系密切，“左联”五烈士牺牲的信息报道就是通过她转到美国发向世界的，而她本人与鲁迅、宋庆龄都有着非常深厚的友谊；她为中国红军争取国际医药援助做了大量工作，动员、组织白求恩、柯棣华等一批加拿大和印度的医生到中国解放区工作；她协助宋庆龄成立中国保卫人权大同盟；她冲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向全世界现场报道了西安事变，并在外国报刊上报道了江西苏区的革命斗争情况。

1937年，她到达延安，采访了毛泽东和共产党的一批高级将领，其中用几个月的时间与朱德畅谈，后来写出《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此书是继斯诺《西行漫记》之后较完整地向西方世界介绍八路军最高将领的惟一书籍。1938年，武汉沦陷，她以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的身份，随新四军转战华中、华东，写下许多著名的通讯。

史沫特莱一生写的书籍大部分是献给中国人民的。抗战前，她就写出《今日中国特写，中国人民的命运》，向全世界披露了旧中国的黑暗统治和被压迫人民的凄惨生活。抗战期间，她写了《中国红军在前进》、《中国在反击》。1940年返回美国后，又完成《中国的战歌》和《伟大的道路》。史沫特莱为宣传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为中美文化交流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Strong，1885—1970年）也是人们熟悉的美国进步作家。她很早就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1925年，中国的省港大罢工方兴未艾，斯特朗从香港进入广州，亲眼看到了中国大革命的开始。这是斯特朗第一次到中国。1927年，中国的革命风暴席卷了长江流域，斯特朗第二次访问中国，从上海坐轮船逆江而上，采访了武汉政府的首次会议，并深入湖南农村，考察了那里的农民运动，称颂“农民的行动是好的，是合理的”。在这两次访问中国之后，她写出《千千万万中国人》，第一次将中国革命的消息传播到外部世界。

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爆发，斯特朗第三次到中国访问。她经香港到达武汉，第一次见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接着到山西抗日前线，访问了这个地区的八路军，会见了朱德、彭德怀等八路军的高级将领。在这次访问之后，她写成第二本报道中国革命的书《人类的五分之一》，颂扬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

1940年、1946年，斯特朗第四次、第五次访问了中国。在第五次访问中，她来到中国革命圣地延安，采访了中共领袖毛泽东，毛泽东对她做了重要谈话，发表了著名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回国后，她写了《中国的黎明》一书，在许多国家出版。她还写了《毛泽东思想》一文，在美国《美亚》杂志上发表，第一次向全世界介绍和宣传了毛泽东思想。

斯特朗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她一生多次到中国访问，为增进中美人民间的友谊、促进中美文化交流做出重要贡献。她的著作在西方也产生很大影响，成为当年美国的畅销书。

抗战期间，到中国访问的美国作家和记者还有毛那（E·A·Mowler，撰写了《毛那在中国》）、约翰·根室（Juim Guneiren，撰写了《亚洲内幕》）、海明威、威尔基（W·L·Willkie，撰写了《自由中国》）等人。他们关于中国抗战题材的报告文学为当时的世界舆论所重视，为这一时期的中美文化交流写下了令人难忘的一页。

4. 轰动新大陆的梅剧演出

1930年，中国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赴美国进行了为期半年的访问演出，在美国引起极大轰动，成为中美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京剧的发展源远流长，经过几代人的改革和探索，到民国时期已形成相当完整的艺术风格和表演体系，成为我国的主要剧种，拥有传统剧目一千多个，深受我国人民喜爱。然而，由于文化背景和欣赏习惯的差异，西方人中愿意进中国戏院看京剧者为数极少。但到梅兰芳的时代，这一状况开始有了改变。

梅兰芳11岁开始登台演出，演青衣，兼演刀马旦。在长期的舞台艺术实践中，他对京剧旦角的唱腔、念白、舞蹈、音乐、服装、化妆等皆有所创造和发展，成为一代京剧艺术大师。民国初年，他演出的剧目受到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法国驻安南总督、美国驻菲律宾总督、瑞典皇太子等西方人士的赞美，许多美国人来华旅游时甚至把“观梅剧”作为其重要内容。芮恩施在一次宴会上更是对梅兰芳京剧艺术称颂有加，并极力鼓动请梅兰芳赴美演出。他说：“若欲使中美国民感情益加亲善，最好是请梅兰芳到美国表演他的艺术给美国人看，必得良好结果”，“我深信用毫无国际思想的艺术来沟通两国的友谊，是最容易的”。^① 芮恩施的话促使梅兰芳下决心到美国访问

^① 齐如山：《梅兰芳游美记》，第2页，岳麓书社1985年版。

演出。

为确保赴美演出成功，梅兰芳和齐如山等同仁做了长时间的准备。当时，各国到北京来游历的政治家、文学家、美术家、实业家，无不托使馆或本国绅商介绍，到梅兰芳府上一谈。梅兰芳和齐如山对于这些来访的外国人尽力接待，借此机会做了很多出国演戏的宣传。譬如，招待客人的用具都是中国古式的，菜蔬茶点都用中国极精美的食物，室内的点缀品，也是中国式的，为的是表现中国精神的高贵典雅；每到吃饭、喝茶的时候，对客人细说在戏台上吃饭饮茶的姿势，由此引申到舞台上的一切动作及其所以然的理由；室内悬挂笔墨山水，借外国人所欣赏的中国书画来解说中国戏剧；请外国人观赏京剧图画书籍等，为他们理解京剧作铺垫；向美国报纸杂志寄送梅兰芳的剧照，扩大梅剧的影响。与此同时，千方百计筹措赴美演出的经费。赴美演出是自费，需要一笔不小的费用，梅兰芳尽管演出有一些收入，但只够日常开销，根本负担不起旅美费用。经过齐如山等人的张罗，最后，由京沪两地的金融界友人组成后援会，筹措了银元 15 万元。临行前一段时间，他们又编印了赴美用的宣传品，如《中国剧之组织》、《梅兰芳歌曲谱》、赴美演出剧目的说明书、京剧图画，并请人翻译成英文。在做好上述准备的同时，重新整理改编了梅剧的一些剧目，以适应美国观众的欣赏习惯和口味。

经过七八年时间的充分准备，1930 年 1 月 18 日，梅剧团一行 21 人乘坐英国坎那大皇后号轮船从上海出发，经日本横滨、加拿大维多利亚，至西雅图换火车经芝加哥，于 2 月 8 日到达纽约。

2 月 16 日，梅兰芳在纽约百老汇 49 街剧院进行了首场演出，受到美国观众热烈欢迎。最高票价 6 美元，黑市价达 16 美元。两个星期后，移到帝国剧院又演出三星期，每场满座，观众达七

万多人次。^①

梅兰芳在美国的演出，得到著名戏剧家张彭春的指导帮助。梅兰芳刚到美国时，张彭春正在美国讲学，梅兰芳邀请张彭春出任总导演。这是梅剧团第一次建立导演制。张彭春曾在美国学习戏剧，回国后又在南开组织新剧演出，对现代戏剧造诣颇深，非常了解美国观众的欣赏口味。在他的参与下，梅兰芳将原定的演出剧目调整为三组：第一组是《汾河湾》、《青石山》、《剑舞》、《刺虎》，第二组是《醉酒》、《卢花荡》、《羽舞》、《打渔杀家》，第三组是《汾河湾》、《青石山》、《别姬》、《杯盘舞》。三组剧目在故事、化妆、穿戴的色彩等方面差异较大，三组轮换着演，给观众以新鲜感。此外，在旧金山等地，因华侨较多，有看中国戏的习惯，又加演了《天女散花》、《打城隍》、《春香闹学》和《空城计》。

为了适应美国观众的欣赏习惯和接受能力，梅剧团除精心调整安排好剧目外，还在每场演出的具体安排、每一出戏的具体内容上做了精心布置。每场戏规定两个小时，其中两个完整的戏约占一小时，一个武打片断、一个古装舞约占15分钟，当中穿插着幕间音乐、休息、叫帘^②、剧情说明，占40多分钟。每出戏的大段唱腔全部删去，改唱散板，复杂的身段也改动了。演出时，剧场门前挂宫灯，剧场内挂纱灯，招待员穿中国服装。舞台是富有中国民族色彩的宫殿式的，平金绣花的帐幔、行头，使看戏人如同置身于中国最华贵的戏院。每场演出前，由美国华侨杨秀女士用英语介绍剧情。

梅兰芳的出色演技，加之演出前的精心周到的准备，使得梅剧团的演出非常顺利。在纽约进行了首站演出后，剧团又连续在

^① 许姬传等：《梅兰芳》，第45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② 叫帘是观众欢迎演员的表演，请再开幕露面。梅兰芳在美演出时最多曾有15次叫帘，可见受欢迎的程度。

华盛顿、芝加哥、旧金山、洛杉矶、檀香山等地演出，总共演出了72天、100多场戏，场场爆满，轰动一时。

梅剧团的精彩表演使美国观众和社会各界人士为之倾倒，对中国京剧一时好评如潮。评论文章纷纷赞扬京剧“具有它独特的风格和规范，犹如青山一般的古老，像中国的古瓷瓶和挂毯一样优美”，它使西方人对自己的“舞台和一般西方舞台上的表演感到惶恐谦卑。”中国京剧则“是一种以令人迷惑而撩人的方式使之臻于完美的、古老而正规的艺术”。著名戏剧评论家斯达克·扬(Stark Young, 1881—1963年)评论说：“以前常听人说中国剧的作法太不像真。但是现在我看了以后，觉得剧中意思的表演，非常的真，不过不是写实的真，却是艺术的真，使观众看了，觉得比本来的真还要真。”他还说，中国剧是世界的艺术，这种艺术臻于完美而理想，犹如梦境一般迷人。它的举止动作，极雍容大雅，位置的高尚，分量的沉重，实在在世界戏剧之上。^①

对于梅兰芳个人的表演，人们更是推崇备至。评论者认为“梅兰芳的做工、表情、从眼的动作到手的动作都是恰到好处，姿态形象生动，有含蓄不尽的美”。舞蹈家评论说，梅兰芳“舞蹈优美，表情细腻，节奏和谐”，“并非单纯模仿女子，而是以艺术手段再创造妇女的形象”。还有人评论说：梅兰芳在舞台上出现三分钟，你就会承认他是你所看到的一位最杰出的演员。演员、歌唱家和舞蹈家结合在一切，它让人根本看不出这三种艺术的界限。一般观众对梅兰芳的欢迎更是友好热烈。每场梅兰芳演出后，都有多次叫帘。纽约最后一场演出闭幕后，观众久久不愿离去，排成长队，挨个和梅兰芳握手，一直持续了几十分钟。^②赴旧金山演出期间，数万人到广场欢迎梅兰芳，两面大旗上书“欢迎大艺术家梅兰芳”，乐队高奏欢迎曲。梅剧团所到之处，轮

① 齐如山：《梅兰芳游美记》，第106—108页。

② 梅绍武：《我的父亲梅兰芳》，载齐如山：《梅兰芳游美记》，第173—193页。

埠、车站都有成千上万的民众来欢迎和献花，剧团的汽车队在市区经过时，到处遇到市民的欢呼围观。旧金山市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对梅兰芳说：这种热烈情景是几十年来罕见的。

梅兰芳的赴美演出获得了巨大成功。

在洛杉矶演出期间，梅兰芳在剧场经理的介绍下，在一家夜总会里会见了美国喜剧大师卓别林。两位艺术家早就互相倾慕对方的艺术风格和艺术成就，如今得以相见，相互交谈了东西方的艺术特点和表演心得，都感到获益匪浅。在洛杉矶期间，该市波摩拿学院为表彰梅兰芳宣传东方艺术、联络美中人民友谊的杰出成就，授予梅兰芳文学博士学位。几天后，梅兰芳又到南加里福尼亚大学接受了该校授予的博士学位。

1930年夏，梅兰芳率梅剧团结束了美国之行，顺利回到国内。梅兰芳为传播中国的艺术瑰宝京剧、加强中美艺术交流做出独特贡献。

六、美国的中国学研究

1. 传统汉学研究硕果累累

20世纪上半叶，美国的传统汉学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形成一支专业化的研究队伍，取得一大批研究成果。所谓传统汉学研究，注重从中国语言文字入手，研究中国的古代文化和历史传统，坚守纯学术的壁垒，较少关注现实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化，研究课题专门化。

美国传统汉学研究的中间力量是一批移居美国的欧洲汉学家。其中成就最显著者是德国的两位汉学家劳费尔和夏德。劳费尔（Berthold Laufer, 1874—1934年）曾在柏林大学和莱比锡大学攻读东方语言，1898年赴美后长期任职于芝加哥菲尔德自然博物馆。他的汉学研究继承了欧洲汉学的传统，注重语言文字的比

较研究，并结合考古学、人类学的研究成果，以求领悟中国古代文化。他曾多次率团来中国考察，在中西交通史、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等领域造诣较深。1909年，他出版了《汉代的陶器》(Chinese Pottery of the Han Dynasty)；1910年，出版了《中国的基督教艺术》(Christian Art in China)；1919年，出版了《中国与伊朗：中国对古代伊朗文明史的贡献》(Sino-Iranica: Chinese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Ancient Iran)。这些研究以小见大，从中国的器物看中国的古文化，从植物动物的移植迁徙中看中国和伊朗在古代的交往，体现了劳费尔深厚的汉学研究功力，也使劳费尔成为当时美国汉学界的泰斗。夏德(Friedrich Hirth, 1845—1927年)早年考入中国海关，曾在厦门、上海、九龙、淡水、镇江、宜昌、重庆等口岸任职，对中国和中国文化有较深的了解，是德国有名的汉学家。1902年他出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丁龙汉学讲座教授。此后，他出版了《中国的铜镜》(Chinese Metallic Mirrors)、《周朝末年以前的中国古代史》(The Ancient History of China to the End of the Chou Dynasty)等汉学著作，还翻译了中国许多的典籍，在美国汉学界享有盛誉。此外，经过他的安排，欧洲的一些汉学大师如法国的伯希和、英国的翟理斯等人纷纷到美国访问讲学，促进了美国汉学的发展。

正是在欧洲汉学研究的影响下，美国在20世纪初初步形成了一支专业化的传统汉学研究队伍。这些人有较高的汉语造诣，能直接接触到中国的经典文献，有的还把中国文献翻译成英文。他们撰写了一大批汉学研究著作，在国际汉学界产生重要影响。

贾德(Thomas Francis Carter, 1882—1925年)便是上述美国学者中较著名的一位。鉴于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对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贡献，他很早就开始研究中国的印刷史。为此，他曾两次来中国进行学术考察。1911年，他第二次来华，滞留了12年之久。在长期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他写出了《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向西方的传播》一书，用详尽的史实阐明了中国印刷术的发明过

程，描绘出印刷术西传的轨迹。该书澄清了西方对欧洲印刷术来源的不同认识，1931年出版后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

德效騫（Homer Hasenpflug Dubs, 1892—1969年）也是美国传统汉学研究的著名学者。他经常在欧洲著名的汉学研究杂志《通报》上发表有关中国哲学中有神论和自然主义的研究成果，还将荀子的著述和《前汉书》译成英文。他的代表作是论文《古代中国的一座罗马人城市》。在这篇文章中，德效騫通过大量的史料分析和详尽的推理，论证了公元5世纪在中国郡县名册中所载明的“骊靛”城，实为罗马人移民点。公元前36年，中国军队在中亚与罗马克拉苏军团的百余名游勇遭遇后，将他们掳回中国。“骊靛”城就是为这些罗马人设置的移民点。这篇文章曾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一场争论，深化了中外关系史的研究。

这一时期，另一位知名的汉学学者是德克·卜德（Derke Bodde）。他曾于1931—1935年以哈佛燕京学社研究生的身份来中国留学，后又在欧洲汉学研究中心荷兰的莱顿大学深造并获博士学位。1942年，他写成《中国物品西传考》一书，详尽叙述了中国物品如丝绸、瓷器、茶叶、纸、火药、指南针、漆器、风筝、纸牌等西传的历史。他指出，中国给予西方的东西远远胜过它从西方得到的。中国的发明创造“不仅完全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而且为整个现代文明奠定了基础。如果没有纸张和印刷术，我们将仍旧生活在中世纪；没有火药，世界可能少受些苦难，但在另一方面，欧洲中世纪穿戴盔甲的骑士们会仍旧占据着护城河围绕的城堡，居于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我们的社会将仍旧停留在封建农奴制状态。……最后，如果没有指南针，地理大发现的年代将永远不会到来。没有这些发明，迄今为止整个世界仍然是不可知的，甚至包括我们的国家在内”。^① 1948年，他又出版了《中国思想西传考》一书，着重介绍了中国哲学、政治、

^① 《中外关系史译丛》第1期，第231—238页。

经济理论、教育思想、科学发明、文学艺术对西方的影响。卜德的著作打破了以往西方学术界“西方文化中心论”的旧调，正确阐述了中西关系的本来面目。^①

此外，还有一些汉学研究者写作、翻译了一些著作，反映了这一时期美国汉学研究的实绩。如史密斯（Arthur H. Smith）写了《中国人的特征》，莱托雷特（K. S. Latourette）写了《中国历史和文化》，柔克义（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与夏德合作翻译了赵汝适的《诸番志》。

这一时期是美国传统汉学研究取得长足发展的重要标志，除上述研究成果的取得外，汉学讲座的开设和汉学研究机构的设立也是不可忽视的。美国高校开设汉学讲座、设立汉学研究机构始于19世纪70年代，那时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先后开设了汉语课程，建立了东方学图书馆。进入20世纪，这方面的情况又有所发展。20年代，中国学者陈受颐在芝加哥大学开设了汉语，王天目在夏威夷大学开设了类似的讲座，李绍章在芝加哥大学成立了东方研究系；30年代，赵元任、梅光迪在哈佛大学讲述中文课程。一些中国学者为发展美国的传统汉学研究做出了贡献。最为引人注目的是，1928年哈佛大学和中国教会大学燕京大学合作，成立了哈佛燕京学社，使美国的汉学研究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哈佛燕京学社也因此成为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中心。

哈佛燕京学社成立的目的是“从事及帮助有关中国文化的研究、教学和出版”。关于中国文化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于中国的文学、艺术、历史、语言、哲学和宗教史。“共同的任务在于激发美国人的兴趣和鼓励利用近代批评手段的中国东方问题研究。”学社的成立，为推动中美两国的中国文化研究、加强中美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对于美国的汉学研究来说，学社的成立

^① 参见张铨：《美国中国史研究专业队伍的形成及其史学成就》，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5年第7期。

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首先，受学社派遣，一大批学者和研究生来华学习、进修和学术考察，他们归国后成为汉学和现代中国学研究领域的学科带头人，如魏鲁男、毕乃德、卜德、顾立雅、费正清、徐中约、克雷格、余英时等。其次，学社成立后，总部设在哈佛大学，促使哈佛加强汉学研究，聘请了欧洲汉学大师伯希和等人来校讲学，在远东系新开设了16门相关课程，购置了大量中文图书资料，使哈佛大学逐渐成为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中心。

2. 现代中国学研究的确立

当一些汉学家在书斋中静静从事传统汉学研究并取得丰硕业绩的时候，另有一些学者则在更广阔的时代背景上，来研究现代中国问题，并最终与欧洲汉学的传统分道扬镳。这些研究并不十分强调掌握中国古代文字，因为研究现代中国依靠的是档案材料，而不是古籍；研究者也不像传统的汉学家那样博学，但却极富现实感，注重现实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与历史变革、中外关系的研究，强调为美国国家利益和现实政策服务。美国研究中国的这一倾向，深刻反映了这一时期美国与中国紧密接触的对华政策。与中国的频繁交往，需要培养大量了解中国现状和历史的“中国通”，需要大量关于现代中国问题的研究成果。

1925年，太平洋学会成立。它的出现，使传统意义上的汉学研究走出古典语言文学、历史、思想文化的纯学术研究壁垒，而转向现代中国问题研究的新领域。这一学会最初是由夏威夷关心太平洋地区社会经济问题的商界、教育界、宗教界人士发起的区域性团体，后来经过扩充，吸收了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及政府官员参加，发展为一个国际性的学术团体，总部迁至纽约。出于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错综复杂的远东局势的关注，太平洋学会始终把研究重心放在远东问题研究上，如民族运动问题、劳工组织问题、工业化问题、殖民机构问题、国际政治关系问题、商业和

投资问题等。学会还积极联系基金会，资助东方学家和汉学家深入远东、中国内地进行实地考察。30年代中期，学会负责人菲尔德和拉铁摩尔曾经为汉学家威特福格尔所从事的中国研究计划寻求资助。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陈翰笙（当时是太平洋学会的研究人员）也接受过该学会资助，从事中国农村的社会调查。他根据调查材料写成的《广东的农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一书也以太平洋学会的名义在中国出版发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更加需要熟悉远东事物的专家和远东方面的资料，因此太平洋学会在美国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对战时中国问题拥有一定的发言权。他们派遣了大批中国问题专家来华考察，其结果对当时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① 总之，太平洋学会的建立和发展，对美国的现代中国研究产生很大的作用，在50年代以前，美国出版的有关亚洲和中国的书籍有一半是由太平洋学会出版或得到它的资助的。

如果说太平洋学会的成立，标志着美国现代中国研究的开始，那么到二战期间，中国问题研究则进入迅速发展时期。战时，美国采取了各种紧急措施，加速培养大批研究远东或中国的专业人员，如在大专院校举办有关的培训班，设置“军区民事部国外地区和语言课程计划”、“特种军事训练计划”和扩大陆军外国语学校、海军语言学校的招生计划等，这些措施无疑也是对中国研究的重大推动。与此同时，出版了大量研究现实中国的书籍。据统计，1942年至1945年5月在美国出版的50部关于中国的重要著作中，有20部是研究现实问题的。^② 此外，二战时期，以斯诺、斯特朗等为代表的一批左翼新闻记者在其极其艰苦的条件

^① 参见侯且岸：《当代美国的“显学”——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第36—38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编：《美国中国学手册》，第14—1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下，深入中国根据地采访，撰写了大量新闻报道、访问记和研究文章，从不同的角度真实反映了中国革命的情况，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对时局的方针政策，成为美国中国革命史研究的拓荒者。特别反映这一时期美国注重现实中国研究倾向的，是研究机构的变动。1941年6月，一批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青年学者不满美国东方学会着重中国古典研究的方针，在费正清等人的倡导下，组织建立了“远东协会”，出版了《远东季刊》。该协会得到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成为美国研究亚洲问题、中国问题的最重要的文化机构之一。

在美国的现代中国学确立和发展的过程中，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年）出生于南达科他州，还在中学学习时就树立了从事学术研究的理想，中学毕业后，在威斯康辛大学学习一段时间，1927年进入哈佛大学学习。在此期间，他有幸遇到了从英国来哈佛执教的国际法教授查理·韦伯斯特（Charles Webster）。韦鼓励他利用故宫收藏的清朝档案研究中国近代史，启发了费正清研究中国的热情。1929年秋，费正清从哈佛大学本科毕业，到英国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伦敦期间，他结识了曾经长期在中国海关任职、后来写出著名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的马士（Hosea Ballou Morse）。马士的鼓励使他坚定了研究中国的信心。在马士的影响下，费正清选择了中国海关外籍税务司制度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1932年，费正清来到中国，一面进修汉语，一面师从中国著名史学家蒋廷黻，为写作博士论文做准备。蒋给予他很多指点，并引荐他认识了当时许多著名学者，如胡适、金岳麟、梁思成、林徽因等。这些学者给费正清很多帮助。1936年，费正清回到牛津大学，以论文《中国海关的起源》（*The Origin of the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获得博士学位。随后，被哈佛大学历史系聘用，开始了长期从事中国研究的学术生涯。

在哈佛，费正清大力倡导中国研究。他认为传统的汉学研究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他批评“汉学家就像是语言的仆人，甚至奴隶。但历史学家的问题是要将语言为我所用，而不是相反”。因此他鼓励学生研究文件档案，而不像传统汉学家那样为语言的学习所束缚。从1939年起，他还和赖肖尔一起在哈佛大学开设了东亚文明课程；和他的中国助手邓嗣禹一起编辑了不少文件集，为开设美中关系史、清史等课程提供了教材。与此同时，他撰著出版了大量有关中国近代历史的著作。1941年，他和邓嗣禹合作，在《哈佛亚洲学报》上发表了《清朝的朝贡制度》，标志着他的学术生涯的新开端；1945年，他与房兆颖等人合编了《中国对西方的反应》，同年还出版了由他编辑的《中国对西方反应的研究指南》；1948年，出版了《美国与中国》，介绍了中国文化，让美国读者了解到国民党为什么会丢失中国大陆，此书使他声誉鹊起，成为他的代表作之一。

二战期间，由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费正清的中国研究一度中断，他被美国政府派到中国，在重庆建立了学术资料服务处，目的是搜集有关日本的各种出版物，分析整理后分批送回华盛顿。他的这项工作使他有与中国学者和国共两党的高级官员有广泛密切的接触，加深了他对中国的了解。1946年，他回到哈佛大学，担任了区域研究（中国）项目的第一任主持人。50年代，他在哈佛大学支持和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创建了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并出任主任，直至1973年。

作为现代中国学的开拓者，费正清一生著述勤奋，著作等身，并建立了近现代中国研究的基本框架和模式。在他的影响下，美国的现代中国研究出现繁荣局面，并取代欧洲成为西方中国学研究的中心。

第三章 中苏文化交流

一、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苏俄及其文化的介绍

1. 十月革命的巨大震动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民为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一直试图学西方，走资本主义的道路，但都没有成功。十月革命的炮声震撼了正在寻求救国真理的中国人民，他们把视线从西方转移到了东方，关注社会主义的苏维埃俄国。1917年11月10日，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三天，天津《益世报》就以《俄京军队内讧之近状》为题报道了这一事件：“伦敦电，路透访员云：反对党（俄国布尔什维克——作者注）现已占据俄京电局及京城全部，将阁员拿捕。反对首领莲林氏（列宁——作者注）为主动人，并要求俄国即时停战讲和。”同一天，国民党人在上海所办的《民国日报》也以《突如其来之俄国大政变》为题，报道了俄国克伦斯基政府已被推翻的消息。此后，《申报》、《东方杂志》、《晨钟报》、《劳动》月刊、《汉口新闻报》、《大汉报》、《大公报》等上海、北京、武汉、长沙等地的报刊也都对俄国革命和革命后的内外政策进行了报道。人们密切注视着俄国形势的发展。这些报道多摘译自欧美和日本的报纸。虽然帝国主义对十月革命大肆攻击，称俄国布尔什维克为“过激党”，散布谣言，制造恐怖气氛，但人们还是从这些报道中看到：“军工代表议会告示全国各省军工委员，授彼等以全权推倒现政府，释放被捕各农工，擒捕前携农工之党

人”，“新政府将提出即行订立公平之和议，移交土地于农民，并召集选举之国会”。^①即在俄国资产阶级已被推翻，工人、农民、士兵掌握了政权，农民获得了土地。这些无疑对中国人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人们从中看到了新的希望。正如李大钊后来在《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中说：“我们劳苦的民众，在二重乃至数重压迫之下，忽然听到十月革命喊出的‘颠覆世界的资本主义’、‘颠覆世界的帝国主义’的呼声。这种声音在我们的耳鼓里，格外严格，格外有意义。”^②国民党人也对十月革命表现出欢迎的态度。孙洪伊在《民国日报》1918年元旦的社论中说：“吾人对于此近邻之大改革不胜其希望也。”他还认为十月革命与辛亥革命具有相同的意义，都是要争人权、民权，改善农工生活，实现自由平等。孙中山于1918年夏天致电列宁和苏维埃政府，向其表示祝贺，“中国革命党对贵国革命党所进行的艰苦斗争，表示钦佩”，并表示“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③

但是，对十月革命认识最深刻、最正确的还是李大钊。他于1918年7月1日在《言治》季刊第三册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文章首先告诉人们对十月革命后的“一时混莽现象”不必悲观，因为“一世纪新文明之创造，新生命之诞生，其机运每肇基于艰难恐怖之中，征之历史，往往而是”。^④他对俄国革命和法国革命进行比较，指出“俄国今日之革命，诚与昔者法兰西革命同为影响于未来世纪文明之变动”。但是俄国革命与法国革命的性质不同，“俄罗斯之革命是20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之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⑤他认为

① 《马克思主义在天津早期传播（1917—1924）》，第30、31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② 《李大钊文集》（下），第577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③ 《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500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④ 同②，（上），第572页。

⑤ 同④，第573页。

“俄罗斯之革命，非独俄罗斯人心变动之显兆，实二十世纪全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因此“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勿徒以其目前一时之乱象遂遽为悲观也”。^①同年11月、12月他又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文章，热情歌颂十月革命的胜利是“庶民的胜利”、“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进一步表现出对十月革命的热烈拥护，并预言：“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②

1919年巴黎和会上，西方列强无理地将中国领土山东转让给日本，又一次激起了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强烈愤慨。与西方列强相反，1919年7月25日，苏俄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签署了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皇政府与中国订立的不平等条约，放弃沙皇政府及克伦斯基政府侵夺中国的一切权利。此后，苏俄又发表了第二、第三次对华宣言，重申第一次对华宣言的内容，表示了对中国人民真诚友好的态度。两相对比，更加深了中国人民对苏俄的好感。人们对这个新生政权充满了向往，希望了解它，研究它，从它的经验中找出拯救中国的真理。《新青年》从1920年起，开辟了“俄罗斯研究”专栏。孙中山也在1921年8月28日复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的信中表示希望与他及莫斯科的其他友人获得私人接触，了解苏维埃以及军队和教育的组织。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出现了赴俄热潮。

2. 走向红光里

十月革命发生后，在华帝国主义报纸对十月革命攻击污蔑，北洋政府也跟从帝国主义政府，对新俄采取敌视态度，封锁消

^① 《李大钊文集》（上），第575页。

^② 同^①，第603页。

息。国内报纸由于得不到第一手材料，主要是从外国报纸转译。所以国内对革命后的俄国缺乏具体系统的报道，以致中国人民对这场革命不能深入了解，甚至由于列强的片面宣传，对新俄产生了误解。但是，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迫切希望了解俄国，学习其革命的经验，求得中国问题的解决。

1920年9月，北京《晨报》为直接报道俄国的形势，决定招聘特派记者赴俄采访，当时在北京俄专的瞿秋白欣然应聘，决定要到俄国去“求一个‘中国问题’的相当解决，——略尽一分引导中国社会新生路的责任”。^①当时即遭到了堂兄瞿纯白的坚决反对，以为是“自趋死地”，但瞿秋白去意已决，因为在他看来不管“俄国怎样没有吃，没有穿”，但“他始终是世界第一个社会革命的国家，世界革命的中心点，东西文化的接触地”。^②

1920年10月16日，瞿秋白、李宗武、俞颂华一行从北京启程，踏上赴俄旅程，“走向红光里去了”！在哈尔滨，因谢苗诺夫的匪军横梗在满洲里和赤塔之间，无法前行，不得不停留了五十多天。瞿秋白参加了聚集在那里的俄国人举行的纪念十月革命三周年的庆祝会，第一次听到了《国际歌》。会后，他又到俄国友人家里做客，听一位刚从莫斯科来的共产党人演讲，初步了解了俄国社会的一些情况。从哈尔滨启程，向满洲里进发的途中，瞿秋白与俞颂华商定好，由俞颂华负责通信事务，瞿秋白竭力帮助，同时“定了一勉力为有系统的理论事实双方研究的目的。研究共产主义，俄共产党，俄罗斯文化”。^③车出满洲里，便踏上俄国的领土。他们目睹沿途战后凄凉景象，接触到革命后俄国的现实社会。在赤塔，他们遇到资产阶级的俄国女郎，抱怨家里的一所房子现在一大半被充公了，只留四五间住的，……瞿秋白认

①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② 同①，第31页。

③ 同①，第65页。

为这是资产阶级的心理。进入伊尔库茨克，到了“饿乡”，见到了因屡次怠工、唾骂布尔什维克而下狱三四次的工程师，此人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极为不满，指责“乡下人的鸡鱼鸭肉一概都行集权制，怎么办得了，又不准做生意。办事的人才才有饭吃，不办事的，——也许他不高兴，——可不行了”。^① 在离鄂木斯克车站不远的市场上，触目皆是穿着褴褛不堪的俄国人。这一切促使瞿秋白对俄国的认识发生了变化。他说：“来俄之前，往往想：俄罗斯现在是‘共产主义的实验室’，仿佛他们‘布尔塞维克的化学家’依着‘社会主义理论的公式’，用‘俄罗斯民族的原素’在‘苏维埃的玻璃管里’，颠之倒之试验两下，就即刻可以显出‘社会主义的化合物’。西伯利亚旅行的教训，才使人知道大谬不然。”^② 1921年1月25日，瞿秋白一行终于到达了赤色旗帜之下的新莫斯科。瞿秋白将从北京到莫斯科这段行程所见所闻所感写成《饿乡纪程》，记下了他自非“饿乡”至“饿乡”的心路历程，初步向人们展示了十月革命后初期俄国的真实面貌：人民生活仍然困苦，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对新生政权，伺机对其进行攻击。

从1921年1月25日到达莫斯科到1922年底回国参加革命，瞿秋白在俄国旅居两年，实地考察了十月革命后的俄国。他广泛接触了俄国社会的各色人等，从政府要人到诗人、农民、工人、老人、儿童、没落贵族，欲以此了解“那一社会的心灵”。他参观美术馆，到剧院观看演出，参加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葬礼，访问托尔斯泰的故居，到俄国普通民众家中去做客，深入俄国的社会生活。瞿秋白将这些写入《赤都心史》一书，以优美流畅的文字，向人们展示了一幅俄国革命初期的“社会的画稿”，使当时的人们得以从中窥见俄国社会的真实面貌。

^①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91页。

^② 同①，第93页。

到俄之初，瞿秋白就访问了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教育委员会的委员长卢那察尔斯基，卢氏向他陈述了革命后教育上的改革及科学技术上的发明。后来教育委员会又安排瞿秋白等人参观了好几处幼稚院、劳动学校，这些地方“规模虽小，精神却很好，只是物质太苦些”。^① 在参观托尔斯泰陈列馆时，瞿秋白了解到：“各种社会公共机关，……凡不是共产主义的，只要不带政治上的危险性质，如托尔斯泰陈列馆等，都不受什么妨碍，有时亦稍得辅助。”^② 由此可见，俄共十分重视文化建设，注意保护文化遗产。此外，他还参观过美术馆、画院，到剧院观看演出，参加了“无产阶级文化部”的音乐会或诗歌晚会，拜访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实地考察了革命后俄国的文化。

1921年，俄国刚刚经过四年的帝国主义大战和三年的国内战争，经济生活上的困苦是不可避免的。瞿秋白在《赤都心史》中记下了这样的一件小事：教育委员会的职员刘白文纳女士来给作者送书籍杂志时，作者招待她喝茶吃面包，她要求给她的母亲带去一个，因为她们已经两三年没有吃过这样的面包了。可见当时人民生活的困苦。国内战争时期，俄国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无物不集中，在农村实行余粮收集制，在军事时代保证了一切物资用于军事。可是战争结束后，这种政策越来越不适应形势，农民对此不满，起而反抗，瞿秋白称之为“革命之反动”，俄共因此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实行以后，开放商业，出现了市场繁荣的景象：“十字街间，广场两而，一排一排小摊子。……人山人海，农家妇女，老人，工人，学生……种种色色人，簇拥在一处。这里一批面包，香肠，火腿，牛奶，糖果点心，那里一批小褂，绒裤，布匹。一堆一堆旧书旧报，铁罐洋

^①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126页。

^② 同^①，第133页。

锅，碗盏茶杯，……唔！多得很呢！”^①可是有些农民对此仍有疑虑，在《劳动者》一文中瞿秋白写道：“一女仆说他的兄弟在乡间耕地，今年春天收成或者还好，雨水若是不足那可没希望了。食粮年年政府收尽，乡间生活，也没有城里人说得这样好。我告诉他，今年实行课税法，不至于尽收食粮，很可以多下些种了。他说他兄弟不敢信政府公报上的政策，还不肯多种，恐怕枉费力呢。”^②

1921年，东俄发生严重的旱灾，瞿秋白引俄国中央及各省报纸上的灾区通讯写道：“一堆一堆饥疲不堪的老人幼童倒卧道旁，呻吟转侧”，“啮草根烂泥”。“竟有饥饿难堪的农家，宁可举室自焚”，“还有吃死人肉的呢”。^③同时，他也记下了“劳农政府”救济灾民的种种措施：各机关实行赈捐，没有受灾的农村都派人募收志愿捐助的食粮，城市中举行音乐会，演剧，募捐……相反，莫斯科的新资产阶级却对此麻木不仁，只捐很少的钱，欧洲资本家还想借此鼓弄阴谋。

瞿秋白并不是一味宣扬俄共的种种好处，对其弊端视而不见，相反，他揭露其内部存在的官僚主义：“一个小学教师值学校停课，所领口粮不够生活，因就一临时讲席，原来的口粮也没辞去。农工检察人民委员会，委派整理联员予以考核的时候，这位教师不得不受审判，争辩的结果，反得知审判官中每人至少也得七份口粮呢。”^④瞿秋白分析这是由于“封建遗毒，东方式专制政体，使官僚问题种得很深的根底。……几十年，因为社会经济的根源，只在变化不在消灭，革命的巨潮如此凶猛尚且只扫刷得一些”。^⑤完全站在客观立场上，既不回避现实，同时又引导

①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154页。

② 同①，第148页。

③ 同①，第171页。

④ 同①，第166页。

⑤ 同①，第166页。

人们去思考现实背后深刻的社会原因。

此外，在《赤都心史》中，瞿秋白还两次向人们描述了伟大领袖列宁的光辉形象。一次是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出席发言三四次，德法语非常流利，谈吐沉着果断，演说时绝没有大学教授的态度，而一种诚挚刚毅的政治家态度流露于自然之中”。^①第二次是在第三电力劳工工厂十月革命的纪念晚会上，列宁再次登台演讲，“无意之中忽然见列宁立登演坛。全场都拥挤簇动。几分钟间，好像是奇愕不胜，寂然一响。后来突然‘万岁’声，鼓掌声，震天动地”，“列宁演讲用极明显的比喻，证明苏维埃政府之为劳动者自己的政府，在劳工群众之心中，这层意义一天一天增胜，一天比一天明了：——‘拿着军器的人’，向来是劳动群众心目中一可怕的东西；现在不但不觉他——赤军——可怕，而且还是自己的保护者”。^②

瞿秋白是十月革命后最早赴俄采访的新闻记者，也是“真正浸身于赤色的俄罗斯”，见到其“现实的涌现”的人。他在旅俄期间写成的《饿乡纪程》、《赤都心史》真实地描绘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革命初期的社会面貌，既反映其深刻变革，又如实报道它存在的弊端，同时分析其存在的原因，申明俄共采取的措施。这样就使当时许多不明真相的人从帝国主义的谣言迷雾中走出，对俄国革命后的现实有了切合实际的认识：虽不是尽善尽美的极乐世界，但是却充满着勃勃生机，革命的政府努力在兴利除弊。正如其在《共产主义之人间化》的长篇通讯中所说：“共产主义是‘理想’，实现共产主义的是‘人’，是‘人间’的。他们所以不免有流弊，也是自然不可免的现象”，“哪能一跳便入天堂”！^③茅盾在《纪念瞿秋白同志，学习瞿秋白同志》一文中说：

①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162页。

② 同①，第203、204页。

③ 转引自杨之华：《回忆秋白》，第33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三十多年前，现在的五十多岁的人，当时被‘十月革命’的炮声所惊醒，往往幻想着那个跨横欧亚两洲的大国在革命以后就该是一下子变成怎样一个极乐世界。认为就该是，这是多么天真，多么幼稚；……《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却用‘清醒的现实’（……）教育了上面说的那些太幼稚太天真的人。这样做是有好处的；至少在当时，因为我看到过，有些抱着那样幻想的人，后来发现事实的发展不能一下子就符合他们的幻想，就觉得受了骗了（其实是他自己受了幻想的骗），于是从火热变成了冰冷，甚至走上相反的道路。对于这样的人，我以为《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可以医治他的病。至少，我是有这样的经验。”^①陈独秀在1923年4月7日致胡适的信中也说：“秋白兄的书颇有价值，……国人对于新俄，誉之者以为天堂，毁之者以为地狱，此皆不知社会进化为何物者之观察，秋白此书出，必能去掉世人多少误解。”^②

3. 从东北到苏联

30年代，胡愈之、曹谷冰、戈公振、邹韬奋、戈宝权等记者都因各种机缘访问过苏联，并大多留有著作。其中，戈公振从1933年3月起旅居苏联三年，时间较长，深入考察了苏联社会生活，并写下《从东北到苏联》。此书不仅介绍了他在苏联的见闻，而且处处将苏联和中国对比，殷切希望国人取苏联之长，补中国之短。

在当时白色恐怖之下，进步书刊常遭查禁，“尤其是清党之后，提起那日有建设的苏联。一提到罢，不是说你意在宣传，就

^① 转引自章玉梅：《最早报道十月革命后苏俄实况的人——读罢秋白同志的〈饿乡纪程〉〈赤都心史〉》，《新闻研究资料》1980年第4期。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194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是说你得了卢布”。^① 所以戈公振首先提出了观察苏联的态度：“第一，要能无成见。譬如平日因为笃信某种主义，早存了是非素之心。尤其是政治家资本家宗教家和有阶级观念的人，很容易因为个人利害关系，自始即对苏联不怀好感”。“第二，要不为习惯所囿。譬如平时享受物质文明，养尊而处优，一见黑面包，便不由地食不下咽”，“如果不能跳出这种旧环境，即难领会这新中国精神的所在”。“第三，要不以一时一事的情形来肯定或否定一切。因为俄国地方极大，民族又极复杂”，“尤其是最近一二年中，俄国进步颇快，随时在变化改良之中”。“第四，要有专门学识，最好能精通俄语文”。因为“传译必多隔膜”。^②

戈公振访苏期间正值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刚刚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实行时期。他十分钦佩苏联人民完全用自己的力量节衣缩食含辛茹苦来完成五年计划的建设成果，但他没有像一般人那样只是惊奇于工厂林立，而是更注意苏联文化建设上的成就，他称赞苏联“这几年中，能将文盲从十分之三递减而至于零，这才是人类的福音。最可羡慕的，是那数目超过英、美、德国每年所出的书籍，成车成箱地运销到乡下去”。^③ 在他看来“苏联的情形，和我国差不多，就是拥有极广泛的土地和极复杂的民族，治理很不容易。同时工业落后，农村破产，又复具体而微”，^④ 所以他摘录了斯大林关于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一段的报告，希望作为国人建设上的参考。

在旅苏期间，戈公振注意了解苏联文艺界的情况。他参观了在红场举行的国际劳动节的阅兵典礼和群众游行，在列宁格勒又参加了体育大检阅，写成《两个大阅》一文，记下了当时的盛

① 《林克多〈苏联见闻〉序》，《鲁迅全集》（第4卷），第42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② 戈公振：《从东北到苏联》，第41、42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③ 同②，第49页。

④ 同②，第50、51页。

况，反映苏联军事上的科学化和强大以及重视体育事业，以养成国民同时有工作和运动的习惯的情况。在莫斯科他曾用三天时间参观美术展览会，对苏联十五年来新兴艺术形成了自己的看法：“简单地说就是由破坏而建设，由小己而大群，充分表现出一个时代和一个社会极激烈复杂地转变。”^①他考察了美术家在苏联的地位，了解到他们也是工人，精神上的联系有苏维埃美术家联合会，物质上有美术家合作社。合作社有自己的商店、工厂、食堂、公寓。公寓内饭厅、浴室、理发室、洗衣室、演讲厅、图书馆、托儿所、幼稚园、画室……各种设施应有尽有，艺术家们也投身社会，从事实际工作。在五年计划中，新区域的开辟，旧城市的改造，工厂和学校的设计，探险队或探矿团的远征，莫不有艺术家参与，尤其是在宣传上显出优越的技巧。苏联文学家的境遇与艺术家们相同，他们写作时要深入生活。“总之文学和艺术，在苏联已和政治打成一片，成为转移人心的武器，而不是有闲阶级的消费品了”。^②

1935年1月25日，戈公振参加了苏联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苏联的选举制度深有感触。他说：“在社会主义的国家内，要有百万的人民才能当选。我想这是可信的。俄国人没有私财，拿几个薪水只够勉强生活，哪有余钱去做选举运动？要博得群众信仰和拥戴，只有平时拼命做工和拼命做人，舍此别无它法。所以这次被选出的代表，实际全是‘穷光蛋’，他们居然高坐堂皇，讨论国家天下事了。”^③他在书中用了大量的篇幅介绍苏联自下而上的选举制度，突出其民主性和平等性，指出在苏联除被剥夺公民权的人或富农之类，不分性别种界，凡年满18岁的公民都能参加选举，从城、乡的各种组织到城会和乡会，再到区会、省

① 戈公振：《从东北到苏联》，第62页。

② 同①，第67页。

③ 同①，第87页。

会、国会，层层而上，选出苏联最高统治机关。这次大会又提出给农民和工人同等的选举权，由间接选举改为直接选举，由公开选举改为秘密选举（如由举手表决改为投票表决），由此可见苏联的政治日趋民主化。

苏联的工农业建设成就无疑是戈公振考察的一个重点，他参观了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场，指出农民，尤其是妇女，已从奴隶变为主人。农村的物质精神生活进步很多。有了宽坦的大道、明亮的电灯；有了学校、俱乐部、无线电广播、农业专家，妇女可以外出工作，所以有些农村简直就是世外桃源。他也介绍其管理体制，认为其在普及教育、造就人才、制造机械、大宗投资等方面可供我们借鉴。同时他对这两种体制的前途充满信心，认为“苏联农业的将来，无可怀疑的，……最后农场将只存两种形式：一是国营，一是公社”。^①他希望用苏联改良农业的方法来改良中国的农业，并以西北荒地为例来进行说明，认为可以由国家筹款经营。关于农村集体化，他认为在浓厚的家族观念之下和新式农具极缺乏的情况下，只能因势利导。他还访问了苏联许多工业城市，如南俄的第聂伯水电站、油城巴库，乌拉尔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别烈兹尼基、塔吉尔、马格尼托高尔斯克、车利亚宾斯克等地，参观了许多工厂。他综合参观所得，写成《社会城》一文，称那些在极短时间内全凭人力从荒地上兴起的新城为“社会城”，描述了社会城不仅交通便利，而且凡工人生活所需的物质或精神生活设施无不具备。在社会城中人人劳动，有工厂委员会保障工人的权利，工人有自己的法庭组织，劳资纠纷有专门机构调解，工厂或农场还有自己印刷的报纸，生活消费上也有许多便利，工厂建设注意卫生和防止危险。不仅各种社会保障制度完备，而且资金完全取自工厂、农场或企业。总之，苏联新旧社会不同：“第一，是人人有工作，无不生产的人和剥削阶级的存在；

^① 戈公振：《从东北到苏联》，第128页。

第二，是人人无私产、地位平等，没有阶级的差别；第三，是因为有社会保险制度，人人可以安心职业，无须外鹜和忧虑将来；第四，是因为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等设备，人人无家庭的烦恼，有家庭的快乐。又因为儿童由国家教养，父母责任减轻，而父母子女的关系依然保存。”^①此外，戈公振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介绍苏联人民的衣食住行以及娱乐等。

总之，戈公振在旅苏三年中处处留心，无论是考察工农业，还是介绍选举制度，目睹苏联的建设成就，总是联想到贫困落后、受人欺凌的祖国，以苏联革命前的状况与祖国对比，认为颇多相似之处，而苏联经过革命和建设取得的成就，“我们未始不可做到，有为者，‘亦若斯’”，希望祖国能仿效苏联“不久也有全国总动员从事建设的一日”。^②

4. 苏联见闻录

进入40年代，郭沫若和茅盾两位文化名人先后访问过苏联。1946年6月，郭沫若应苏联科学院的邀请去参加该院成立220周年纪念大会，访苏50天，回国后写成《苏联纪行》，介绍其风土人情及和文化界人士的会见。抗战胜利以后，苏联邀请中国文化界知名人士到苏联访问。1946年12月，茅盾夫妇应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邀请，乘“斯摩尔纳”号轮船赴苏，在苏联访问了三个多月，其间到过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等共和国，写成了《苏联见闻录》。《苏联纪行》和《苏联见闻录》这两部著作反映了4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对苏联的认识，下面以《苏联见闻录》为例，进行介绍。

到了40年代，“就翻译的书来讲，中国译苏联的书确乎多些，然而倘就一般中国人对苏联了解之程度而言”，“而我们的知

^① 戈公振：《从东北到苏联》，第100、101页。

^② 同^①，第103页。

识分子甚至大学教授及鼎鼎大名的学者中间，也有不少人对于苏联抱着不正确的成见，把一些对苏联的歪曲而诬蔑的报道认为可信的材料呢”！^①茅盾的这段话反映了当时一些知识分子对苏联的真实情形仍缺乏了解，而茅盾写《苏联见闻录》的目的正如他在序中所说：“对于渴求知道苏联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文艺等等各方面成就的人们”，“一则是由此可以窥见苏联人民生活的剪影，二则是由此也可以知道苏联人民保卫世界和平的奋勇坚决”。^②

茅盾作为文化名人访苏，中国文化界期望他“代表中国人民到苏联去，把苏联蓬勃的人民艺术带回来”。^③所以他苏联之行重点是考察那里的文化事业。在苏联，他参观了许多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大学、研究所、科学院、报社等文化机构，并对这些机构进行了详细考察。如去访问大学，即对学校的历史、师资、学生、学科设置、图书馆、实验室等一一进行考察。访苏期间，茅盾常常是白天到各处参观，晚上被邀请去观看歌剧、舞剧、话剧等演出，有时还去看木偶戏、马戏表演，或是欣赏音乐。他在《苏联见闻录》中以大量文字叙述了这些戏剧的情节，有时兼有简明扼要的评价。他通过大量来自民间传说的戏剧介绍苏联古代历史，通过反映革命后苏联现实生活的戏剧让人们正确认识社会主义苏联，从中窥见苏联的灿烂文化。

茅盾每到一处参观访问都同当地的文化界进行交流。各地对外文化协会和文化界人士常常举行茶话会、座谈会招待茅盾。茅盾向他们了解当地文化概况，他们也询问中国文化界的现状。如在阿塞拜疆，茅盾参加了当地作家协会举行的茶话会，向作家们询问阿塞拜疆文学发展的情形，批评家扎发洛夫对此一一作答。

① 茅盾：《苏联见闻录》，第115页，开明书店1948年版。

② 同①。

③ 茅盾：《我所走过的道路》（下），第42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

在《苏联见闻录》中茅盾用了一大段文字叙述了阿塞拜疆文学发展的轨迹。同时阿塞拜疆的作家们也屡次问及中国文艺的情形。“他们非常渴望能够和中国的作家团体经常有交换知识和经验的机会”。^①茅盾在访苏期间多次向苏联文艺界介绍中国，曾为《星火》杂志写过《中国民间艺术之新发展》，略述陕北及华北解放区的快板、秧歌的新发展及其意义。后来又应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东方部主任叶洛菲也夫的要求写了《抗战时期中国文艺概况》的文章，也几次作过关于中国文艺的报告。访苏期间茅盾有机会与苏联著名作家卡达耶夫、马尔夏克、西蒙诺夫、吉洪诺夫等相见，并与他们进行文学创作上的交流。他写有专文介绍会谈情形，同时也介绍作家们的经历、作品、创作方法等。作家们都表现出对中国文学的渴望，希望互相了解。

此外，茅盾也参观了一些工厂、农场等，如红十月工厂、红旗工厂、第比利斯制片厂、三八集体农场等，考察了苏联的经济建设、工人的文化娱乐及福利事业。《苏联见闻录》中反映了苏联工人们的文化娱乐生活丰富多彩，许多工厂、企业有自己的剧院、图书馆俱乐部等，定期举行舞会、音乐会；也反映了苏联战后重建的情形和十月革命以来经济的大发展。

总之，茅盾以《苏联见闻录》一书向中国人民展示了苏联当时的文化概况，也表达了苏联文艺界人士渴望中苏友好，希望增进对中国文艺界了解的愿望。

二、苏联：中国引进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渠道

1. 瞿秋白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1920年10月，瞿秋白以北京《晨报》特派记者的身份赴俄，

^① 茅盾：《苏联见闻录》，第171页。

去寻求中国问题的解决。在留俄期间，他认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1922年，他在莫斯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又到莫斯科东方大学任助教兼理论课的翻译，更进一步学习了马克思主义。1923年1月，瞿秋白回国，开始在国内宣传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早期的传播过程中，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等人主要从日本引进马克思主义，他们宣传的主要是唯物史观，特别是阶级斗争学说。与他们不同，瞿秋白主要是在苏俄学习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他宣传的马克思主义打上了浓厚的苏俄色彩。1923年，瞿秋白在国共合办的上海大学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讲授现代社会学、社会哲学等课程。1923—1924年间，他出版了《社会哲学概论》、《现代社会学》和《社会科学概论》，宣传马克思主义。《社会哲学概论》中的“唯物主义与社会现象”基本上是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的摘译，而《现代社会学》则沿用苏联布哈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观点，除第一章外，其余四章几乎全是转译《历史唯物主义理论》。1927年1月，瞿秋白又翻译了苏联哥列夫的《无产阶级哲学——唯物论》一书，不仅保留了原著的两个附录，而且收录了他本人所写的《唯物论的宇宙观概说》和《马克思主义之概念》两篇文章。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他是第一个把苏俄式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过来的人。

在瞿秋白之前，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主要传播了唯物史观。瞿秋白则首次向中国人民介绍了唯物辩证法（在他的著作中称“互辩证法”或“互辩证律”），他的《社会哲学概论》和《现代社会学》中的第四章简明扼要地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他首先指出“我”与“非我”、“意识”与“实质”是哲学的基本问题，根据对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划分了哲学的不同派别：“凡以客观为出发的，——只要他是一贯的思想家，有勇气一直推究下去，——他必成唯物论中之一派。而以主观为出发

的，——便是唯心论中之一派。”^① 在物质与意识两者关系上，他阐述了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物质决定精神的观点：“精神不能外乎物质而存在；物质却能外乎精神而存在，物质先于精神；精神是特种组织的物质之特别性质。——物质当然是宇宙间一切现象之根本。”^② 虽然意识的根本是物质，但并不是一切物质都有意识。瞿秋白进一步指出，“只有人的脑经（一种特别的物质）能思想。没有这种物质，便没有思想，没有意识”，^③ 即意识是人脑的机能。他又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我们的一切智识都从外物所给的经验得来的。就是纯粹抽象的算术亦是现实世界的反映，抽象的算术亦是以外界的空间及时间做对象的，——决不是心灵里凭空创造出来的，算术及其他科学都是应人类的需要而发生的”。“人在发展的历程里渐渐的增加经验，对于客观的世界渐渐的认识。因此却亦由实际的应用进于抽象的原则”，^④ 即认识来源于实践，并在实践的基础上，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同时，瞿秋白也强调了世界是可知的，“人类智识固然还不能完全认识客观，然而却能渐渐知道客观，把已知的整顿出系统来，那就得一更利害的武器，再向‘所知’进攻——直到完全认识为止”。^⑤ 他还探索了关于真理检验标准问题，认为在认识世界时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才能检验认识的正确与否，“所以必须就我们所能知道的所能感觉的物质去研究，一切结论可以得而校正；以物质基础的考察，实际状况的调查，来与我们的理论相较，是非正误立刻可以明白。——因为精神现象发生于物质现象，而物质现象是可以实际去按察的。——这就是唯物主义。研究社会现象的时候，尤其应当细细的考察这唯物主义

①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第322页，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② 同①，第433页。

③ 同①，第347页。

④ 同①，第347页。

⑤ 同①，第333页。

的，互辩律的（Dialectique）哲学，——他是一切社会科学的方法论”。^①

瞿秋白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形而上学两种不同的运动观：“宇宙间的一切现象及社会间的一切现象可以有两种观察法。一种以为一切都是静的，一成不变的，还有一种便以为是变迁不居的。第一种是所谓静力观，第二种是所谓动力观”，“这种动力观叫做‘互辩法’或‘互辩律（Dialectique）’”，^②同时指出宇宙间的一切事物都处于运动中，社会现象也是如此，因此研究社会科学的基本方法也是“互辩的唯物主义”。

瞿秋白还简明扼要地介绍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三个基本定律，即矛盾（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关于矛盾规律，首先指出矛盾是宇宙及人类社会的“根本属性”，矛盾具有普遍性，从简单的机械运动到生物机体的发展再到社会现象都含有矛盾，“没有矛盾互变便没有动；没有动便没有生命及一切现象”。^③内部的矛盾斗争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切变易起于永久的内部矛盾，内部的斗争”。^④此外，瞿秋白还论述了系统与环境之间的矛盾关系：“环境与个体之间必定有经常的联系；环境影响于个体，个体亦影响环境。”^⑤关于质量互变规律，他指出这是宇宙的普遍规律，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准备，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宇宙及社会里的一切发展，——就是数量的渐渐积累，然而数量的变，到一定程度，必定突变为质量的变”。“质量上的突变要数量上的渐变做预备。”^⑥变易的过程有两种特性：一是量变到一定程度，便发生质变；一是量变引起质

①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第334页。

② 同①，第449、450页。

③ 同①，第355页。

④ 同①，第455页。

⑤ 同①，第458页。

⑥ 同①，第355、462页。

变是一种突然的跳跃，是渐进过程的中止。社会发展的需要与社会结构相冲突时便会发生革命式的突变，这是无法避免的。因此得出结论：社会和自然界都有突变；一切渐变都必行向突变，一切进化必行向革命；社会和自然界每次必须经过一种突变才能开始一种渐变，经过一次改造才开始一种新的改变。总之，瞿秋白认为“宇宙的根本是物质的动，动的根本性质是矛盾——是否定之否定，是数量质量的互变。社会现象的根本是经济的（生产关系的）动——亦就是‘社会的物质’之互变。所以我们研究社会哲学应当从经济关系的哲理入手”。^① 这样就以极其简明的言语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和基本规律，第一次系统地把辩证唯物主义介绍给了中国人。

除了向人们介绍辩证唯物主义以外，瞿秋白和当时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大力宣传了历史唯物主义。他指出物质资料生产是社会存在的基础，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变易的根本原因。生产力由三个基本要素组成：（1）工力，即人所自有的体力及智力；（2）生产工具，即所谓技术；（3）生产资料，即劳动的对象。在三者之中，“技术尤其容易变革”。^② 人类不能主观选择生产力，“人类社会的发展每时期每地域总只能从现有的生产力之状态着手”。^③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社会制度变更的最终决定力量是生产方式，“生产力是人类从事于经济行为之物质基础，所以生产力的状态变，经济关系（生产关系——引者注）也变，社会制度是表现经济关系的形式，所以经济关系变更，社会制度也就变更”。^④

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上，瞿秋白一再强调经济基础

①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第357页。

② 同①，第556页。

③ 同①，第556页。

④ 同①，第556页。

决定上层建筑，物质关系决定精神关系，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既有物质的经济基础，譬如是小农交易社会，便必然发生精神的社会现象，譬如孔教、守旧主义、玄想主义”；^①“因物质的经济关系之需要，社会中渐渐发生各种精神关系（政治、道德等）。这些精神关系当然受那物质关系的支配”。^②“并不是‘精神文化’（社会意识）产生那‘社会的物质’（物质的生产），而是社会物质的发展造成‘精神文化’的发展。换句话说，就是社会的精神生活，受物质生产的实际状况及其发展程度之束缚。人类社会的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大足以规定其精神生活”。^③除此之外，他还指出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政治、思想等当然能返其影响于经济。不过经济是基础，政治及思想等只能做经济数量上变更之助缘，而不能做经济上变动之动因”。^④对于上层建筑中政治、法律、道德、宗教、风俗、艺术、哲学等，他一一加以分析，表明其具有阶级性，阐述了它们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变迁历程，指出它们的最终结局。

关于阶级斗争及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瞿秋白指出阶级是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只有技术程度（劳动工具）发展到一定时期，社会上发生两种人：一种是占有生产资料及其工具的人，一种是丧失生产资料及工具的人；前者得以购买后者的工力，后者的生产品之一部分为前者所夺——那时，这两种人以及他们之间种种过渡者，方成‘社会阶级’”。^⑤阶级之间目的和利益不同，阶级斗争不可避免。政治是阶级斗争最重要的工具，“有阶级即有政治”。^⑥阶级斗争是争夺政权之争，“目的总在于

①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第596页。

② 同①，第546页。

③ 同①，第447页。

④ 同①，第597页。

⑤ 同①，第553页。

⑥ 同①，第562页。

取得政权以改造经济关系；因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新阶级便非取得政权不能往下发展”。^① 资本主义社会大生产要求“渐次实行有规划的经济。可是有规划的分配及生产直接侵害资产阶级的生存权，所以资产阶级不肯为社会大多数人福利而容忍无产阶级政府和平进行这经济改造事业。因此，无产阶级必然行独裁制——剥夺资产阶级之政权及一切公权，只有劳动者享有代表制的权利——苏维埃制”。^②

除此之外，瞿秋白还强调社会发展有客观规律，批判宗教目的论和内在目的论，坚持“有定论”，反对“无定论”，阐述社会形态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的关系，解释了社会的“过渡形式和复合形式”。在其译著《无产阶级哲学——唯物论》中，不仅再一次概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且在《马克思主义之概念》的附录中提出马克思主义由互变法唯物论、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学说、科学社会主义四部分组成，一改从前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看成由唯物史观、经济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三部分组成的看法，强调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基础，是其总的宇宙观和统一的方法论。同时，瞿秋白在批判胡适的实用主义、张君勱的唯意志论、东方文化派的唯心论时也宣传了马克思主义。他所宣传的苏俄式的马克思主义尽管有其缺欠和不足，但是它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尤其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传播，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使中国革命获得了新的理论指导。

2. 赴苏留学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中俄两国虽为邻邦，但是长久以来，俄国对中国人民来说是陌生的。沙皇俄国并非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它在政治上保存了

^①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第562页。

^② 同^①，第565页。

许多封建性，专制落后，经济上更难同美、英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因此，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从未曾想过学习俄国，在清末以来涌现的留学热潮中，留俄者很少。十月革命的胜利给正在寻求救国真理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他们渴望学习俄国的经验，使中国走上独立富强的道路。1919年7月25日，苏俄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表示苏维埃政府愿意“把沙皇政府独自从中国人民那里掠夺的或与日本人、协约国共同掠夺的一切交还中国人民”；“拒绝接受中国因1900年义和团起义所负的赔款”和“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①1920年3月，宣言在中国国内发表，苏俄的友好态度与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领土山东的任意宰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更增加了中国人民对苏俄的好感。此时，中国国内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社会主义思潮的盛行，也增强了人们对社会主义苏俄的向往。因此，从1921年第一批中国青年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到1925年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开办，再到1930年中山大学的停办，这一时期形成了一股留苏浪潮。

莫斯科东方大学是1921年在苏联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下设的东方训练班的基础上筹建起来的，全称为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大），斯大林为名誉校长。学生一部分来自苏联东部各共和国，一部分来自朝鲜、日本、中国、伊朗、越南等东方国家，以培养为革命服务的干部为办学目标。1920年春，共产国际派魏金斯基来华，先到北京见到了李大钊，又在李大钊的介绍下在上海会见了陈独秀，与其商量建党事宜。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建立了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组织为了培养革命干部，决定派革命青年赴俄留学。于是，陈独秀等人在上海法租界霞飞里新渔阳里六号创办了外国语学社，魏金斯基的翻译杨明斋任校长兼教俄语，魏金斯基的夫人库兹涅佐娃教授俄文。学

^① 《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1949）》（下册，第1分册），第15、1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生除学习俄文外，还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1921年4月，从中选出了一批人赴俄留学，他们是东大中国班的第一批学生，有任弼时、肖劲光、刘少奇、曹靖华、罗觉（罗亦农）、韦素园、梁柏台等人。当时苏联国内战争刚刚结束，经济上相当困难，但十分照顾中国留学生，让他们享受最高的物质待遇——苏联红军的待遇。尽管如此，物质生活仍然是十分艰苦的，每天不过一块黑面包和几个土豆。可是人们的学习热情很高，他们在这里认真学习了马列主义，如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西方革命史、国际职工运动史、列宁的《青年团的任务》、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等。这部分人除少数由于革命的需要未毕业即奉调回国外，大部分于1924年毕业回国，献身中国的革命事业。

革命形势的发展，急需大量干部，旅欧勤工俭学的学生也有一部分在中国共产党的指示下，离开欧洲到东方大学学习。从1923年3月到1924年9月，先后有三批。聂荣臻在回忆录中说：“送骨干去东方大学学习，从一九二三年就开始了。在我们之前，已经走了两批，第一批是一九二三年三月，有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熊雄等；第二批是一九二三年十月，有李林、熊味耕、胡伦、范易、傅烈、穆青等同志，共二十多人。”^①除此之外，1923年到1924年间，国内也有一部分人，由中国共产党派遣到东方大学学习，如袁玉冰、叶挺、关向应等人。所有这些人大部分于1925年五卅运动后回国。不过，当时共产国际和中共党内一些人认识到掌握武装的重要性，所以1925年2月从这批人中抽出一部分进苏联红军学校学习，计有聂荣臻、熊雄、叶挺、范易、颜昌颐等23人。1924年孙中山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改组了国民党，实行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国共实现了第一次合作。革命形势的高涨，需要大批革

^① 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上），第35页，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

命干部，在这种形势下，1925年在莫斯科成立了孙中山中国劳动者大学，以纪念逝世的孙中山，招收国、共两党人员及共青团员、进步青年，由此形成了留苏高潮，此后留苏者多赴中山大学，但仍有一部分人赴东方大学学习。如1926年10月10日，张仲实从上海出发，经海参崴到莫斯科，11月进入东方大学学习，他后来回忆说：“我进的一个班是新设的，这个班有十四五个人，全是刚从国内去的。”^①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认识到革命武装的重要性，决定培养军事人才，于是选派了一批人赴苏学习军事，组成军事班。伍修权回忆说：“我们作为莫斯科步校的第一批中国学员正在学习时（当时为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引者注），国内又陆续派出几批人，先后来到莫斯科学军事，到一九二八年夏季，总数达到三百多人。……共产国际决定将他们集中到共产国际所属的东方大学，专门成立一个军事班，利用夏季天热，在莫斯科郊区用野营形式进行军事训练。三个月后训练结束，一部分人分批回国参加斗争，一部分人转到别的学校，另有一百多人则选送来莫斯科步校，继续学习军事。”^②1928年秋，东方大学并入中山大学，中山大学改名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习惯上仍称中山大学。

1925年，中山大学在广州举行公开招考，由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持，报名者十分踊跃，经过初试、复试，录取了180名，90%是国民党党员，其中包括黄埔军校、湘军、滇军等三校各选出的10名，共30名，还有一些国民党政要的子弟也通过免试保送赴中山大学，如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李宗仁的弟弟李宗义、叶楚伦的儿子叶南、陈树人的儿子陈复等，这些人从广州启程赴莫斯科。在京、津、沪及其他省份则主要是通过中共的党团

^① 张仲实：《二十年代赴莫斯科留学的回忆》，《党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12期。

^② 伍修权：《回忆与怀念》，第63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组织选派，伍修权就是当时由湖北省党组织选派的。据他在《回忆与怀念》中说：“孙中山先生逝世以后，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中国革命家，决定在莫斯科创办一所以孙中山命名的学校，专门为中国培训革命人才和党的干部，以进一步帮助和支援中国革命，这就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现在中山大学已经筹建就绪，中共中央通知各地的党组织，选调一批年轻的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青年，在指定地点集中，然后集体赴苏学习。湖北的党组织遵照中央的通知，对所属党、团员和青年骨干一一作了研究，确定了我和其他一批同志作为赴苏学习的人选。”^① 这些由中共从各地选送的学生秘密集中于上海，从这里启程赴莫斯科，计有张闻天、王稼祥、乌兰夫、吴亮平、孙冶方、潘自力、杨放之、刘少文、李培之、马骏、马骅、于树勋、刘辉、罗文炳、俞秀松、董亦湘，傅学文等一百多人。此外，还有一批人从法国、德国、比利时等西欧国家赴莫斯科进入中山大学学习，如邓小平、傅钟、徐冰等。这些人成了中山大学的第一批学生。他们学习的主要课程有“马列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联共党史、西方革命史、东方革命史和俄语”。^② 1926年暑假后，中山大学招收第二批学生，招收方法与第一期相同，学生仍由国共两党组成，有李伯钊、李竹声、秦邦宪（博古）、杨尚昆、沈志远、盛忠亮、吴家钰、何汉文等人。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国民党停止选送留苏学生，撤回在中山大学的国民党党员，首批赴中山大学的学生也已经到了结业之时。中山大学“鉴于当时形势，校方决定将原来国民党选派来的学员，主要是一些国民党员和倾向国民党观点的人，首批结业送回祖国”。^③ 此后，赴中山大学学习的全部为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

① 伍修权：《回忆与怀念》，第35页。

② 同①，第48页。

③ 同①，第54页。

1927年暑假，中山大学招收第三批学生，大部分来自国内，少部分来自法国，同时选派了一批人到苏联进行军事学习和深造，第一批中山大学毕业生也有一部分进入各种军事院校学习。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共一些领导干部也由党组织安排来到苏联，由于这部分人年龄较大，中山大学为他们开设了特别班，人称“老头子班”，董必武、徐特立、叶剑英、方维夏、杨之华、吴玉章等就是这个班的成员。1928年暑假，中山大学招收第四批学员，其中一部分学生是从东方大学转过去的，其余多来自国内。1930年，留苏学生大部分毕业回国，中山大学也于同年停办，此后中共也曾派一些人到苏联学习，但人数较少。

1921—1930年，大批中共党员、共青团员、进步青年赴苏留学，他们在苏联学得了革命的理论，回国以后积极投身于中国革命运动，担当起领导责任，同敌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许多人为革命献出了生命，如罗亦农、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刘伯坚、熊雄等，还有一部分人担任党、政、军的要职，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如刘少奇、王稼祥、张闻天、朱德、伍修权等。当然也有一部分国民党员回国后走上了反苏反共的道路，如谷正纲、谷正鼎、康泽、贺忠寒等。一些留苏学生在苏联进入各类军事学校，学到了一定的军事理论和技术，成为中国革命不可缺少的军事人才。虽然苏联的军事教育不是尽善尽美，“但是许多军事上的基本知识和战术、技术，他们一些行之有效的经验和方法，还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我们一大批在苏联学习过军事的同志，在回国以后都曾对革命战争和军队建设作出过应有的贡献，其中有的成为屡建战功的名将；有的成为桃李满天下的军事教育家”，^①如中国十大元帅之一的聂荣臻、为炮兵建设做出杰出贡献的朱瑞，就曾在苏联学习军事。更为重要的是留苏学生在苏联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回国以后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

^① 伍修权：《回忆与怀念》，第70页。

传播起了重要作用。一些学生在苏联期间就开始翻译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如罗亦农在1924年夏天在莫斯科近郊度假时就组织中国班的学员翻译了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和其他理论著作。更多的人则在回国后大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如任弼时回国后写成了《列宁主义要义》，指出：“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极盛时代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①建党之前和建党之初，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多是从日文、英文转译，而30年代以后，回国的留苏学生则从俄文直接翻译马列著作，减少了谬误，促进了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在这些留苏学生中，吴亮平、张如心、沈志远、张仲实等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吴亮平（1908—1987年），笔名吴黎平，1925年加入共青团，由中国共产党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山大学期间就翻译了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的《两个策略》、《国家与革命》等经典著作，并在莫斯科出版发行。这些著作后来也在国内多次出版，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1929年，吴亮平回到了祖国，开始在国内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工作。1930年，他在上海盛夏酷暑之下，在困难的经济生活和险恶的政治环境中，用三个月的时间翻译了恩格斯的经典著作《反杜林论》，由与中共有关系的江南书店出版，这是国内第一个《反杜林论》的中译本。毛泽东曾说：“吴亮平翻译的《反杜林论》这本书，对中国革命起了很大的作用。”^②30年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开展了哲学大众化、通俗化的运

^① 高军、范寅铮：《任弼时》，转引自胡华主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8卷，第9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② 《吴亮平自传》，《晋阳学刊》编辑部编：《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6辑），第143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动。吴亮平写了《社会主义史》、《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通俗读物，“比较系统地介绍了社会主义思想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介绍了当时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批评了当时各种假社会主义的谬论”。^①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因革命斗争对理论的需要形成高潮，尤其是唯物辩证法思想极受重视。吴亮平根据苏联芬格尔特和薛尔文合著原本编译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强调了认识的社会历史性，概括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当然，此书的大量篇幅仍是介绍唯物史观，但将唯物史观与辩证唯物主义同时置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系统中，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结构模式上却是前进了一步。1939年，吴亮平在延安又与艾思奇合著了《唯物史观》、《科学历史观教程》。他还编写了《论民族民主革命》一书，“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恩、列、斯关于民族民主革命的理论，分析了各国各民族民主革命的历史特点和具体经验，为研究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参考材料”。^② 在延安时期，吴亮平还在抗大、陕公、马列学院和中央党校从事教学工作，讲授马列主义基础理论。

张如心（1908—1976年），广东兴宁人，1926年应国民政府招考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留苏期间认真阅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史著作。1929年回国后在上海从事文化活动，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1930年至1932年，连续撰写了《无产阶级底哲学》、《辩证法学说概论》、《苏俄哲学潮流概论》和《哲学概论》四部哲学专著。《无产阶级底哲学》一书“内容主要的是说明辩证唯物论哲学底起源和他的几个基本问题，

^① 《吴亮平自传》，《晋阳学刊》编辑部编：《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6辑），第144页。

^② 同^①。

此外并提及辩证唯物论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上的地位，与文化革命的关系问题”。^①书中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继承人类历史上一批优秀思想发展而来的，是马克思在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论的基础上创立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构成了辩证唯物论的哲学系统，同时指出了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三个基本规律，在这三者中，对立统一规律是核心。《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则介绍了从古希腊朴素的唯物辩证法一直到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发展历程，并且阐明了唯物辩证法的主要内容。

沈志远（1902—1965年），浙江萧山人，1926年12月由上海共产党组织派遣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6月毕业后到莫斯科中国问题研究所读研究生。1930年8月到1931年11月在共产国际东方部中文书刊编译处从事编译工作期间参加了翻译出版《列宁选集》六卷集中中文版的工作。1931年底回国后，在国内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和哲学理论。

1933年，沈志远发表第一部经济学著作《计划经济大纲》，详细介绍了十月革命后的苏联计划经济。1934年，《新经济学大纲》出版，是一部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著作，阐述了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原理，解放前曾多次再版，沈志远也多次进行修改、充实。此书当时还被许多大学用做教科书，可见影响之大。1936年，沈志远又编写了《研究资本论入门》，次年重译了《雇佣劳动与资本》，这两本著作都多次再版，有助于当时的青年研读《资本论》。1937年底，上海生活书店出版了沈志远的《近代经济学史》，书中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历史上各个经济学派做了适当的评价。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他

^① 转引自李其驹等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第30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于1932年出版了《黑格尔与辩证法》，序中指出：“现代哲学不是别的，恰恰就是辩证的唯物论和唯物的辩证法，这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底宇宙观。”^①书中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1933年，沈志远出版了《新哲学辞典》，收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许多概念和范畴。1936年，沈志远撰写的《现代哲学基本问题》作为上海生活书店的“青年自学丛书”出版，这是一本通俗化的哲学读物，简明扼要地向人们阐述了辩证唯物论的基本范畴和基本原则，出版后受到了艾寒松主编的《读书与生活》杂志的大力推荐，深受读者欢迎，到1951年前后再版过15次之多。沈志远译自苏联米丁等人主编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是30年代中国哲学界所译的苏联哲学著作中最有影响的三本著作之一，1936年12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该书的上册，1938年又出版了下册。书中肯定了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贡献，指出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新的更高阶段”，阐明了物质与运动的不可分割性，强调了社会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即“实践第一”的观点，详细说明了唯物辩证法的三原则及其不同作用。《读书月报》的书评曾评论它“由于研究范围的广博，系统的严整，解释的详尽，这本书实在是一本最好的辩证唯物论教科书”。^②

张仲实（1903—1987年），陕西省陇县人，1926年10月由中国共产党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8年转入中山大学，被分配在翻译班翻译教材，参与翻译了政治经济学、哲学、工人运动史、联共党史、党建以及世界史等方面的马列主义教材。1930年回国，1931年到上海从事编译工作，从俄文翻译了许多文章和理论著作，介绍苏联及世界形势，宣传马列主义。1934年与

^① 转引自许全兴等：《中国现代哲学史》，第23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② 沈骥如：《沈志远传略》，《晋阳学刊》编辑部编：《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6辑），第143页。

樊英合译了 20 年代风靡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程》。1935 年初，由胡愈之介绍进入生活书店，在生活书店期间主持出版了大量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其中“世界名著译丛”实际就是一套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译著丛书。在工作之余，他坚持不懈地翻译马列主义理论著作。1935 年翻译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初学读本》。1936 年至 1937 年间，翻译了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其中包括《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还收录了当年苏联《真理报》为纪念费尔巴哈逝世 60 周年的两篇文章《伟大的哲学家》、《费尔巴哈与新兴哲学》，介绍费尔巴哈的生平及时代背景。此外，他还翻译了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和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讲话》。1939 年又翻译了恩格斯的重要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斯大林的《论民族问题》。毛泽东曾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引用了斯大林在《论民族问题》中的观点，并指出此书是张仲实所译。这些从俄文翻译的理论著作，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熊复在《我的马克思主义启蒙导师》中曾说：“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方面，我要特别感谢仲实同志。正是他翻译的恩格斯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和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指引我踏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堂奥。也正是他翻译的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讲话》，使我初尝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甜果。”^①

1940 年，张仲实来到了延安。同年 7 月担任了马列学院编译部主任，根据俄文版原文校订从英文译出的《列宁选集》。1942 年参加毛泽东主编的《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一书的编辑工作。1943 年调到中宣部主管马列著作的翻译和出版。1947 年，广大解放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张仲实编选了《马恩列斯毛论农民土地问题》，为土地改革运动提供了马克思主义

^① 张积玉、王钊春：《马克思主义理论翻译家张仲实》，第 159 页，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

理论指导。全国解放以后，张仲实继续从事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出版工作。

三、中苏文学艺术交流

1. 俄苏文学在中国

19世纪末20世纪初，梁启超等人倡导以小说改良社会，开始译印政治小说，在这种形势下，翻译文学运动蓬勃兴起，出现了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热潮，俄国的文学作品也随之翻译过来。1903年，上海大同书局出版了戢翼翬从日文重译的《俄国情史·斯密士玛利传》，一名《花心蝶梦录》，据戈宝权先生考证，这本小说就是普希金的历史小说《上尉的女儿》。此后，又陆续有俄国的文学作品被翻译过来，到辛亥革命以前，莱蒙托夫、契诃夫、托尔斯泰、高尔基、安特列夫等人的作品都有人翻译，只是数量还不多。辛亥革命以后，翻译俄国作品的数量有所增加，比较重要的有：1914年马君武译托尔斯泰的《心狱》（即《复活》），1915年刘半农译屠格涅夫的四首散文诗（载于《中华小说界》），1916年《小说海》杂志上发表的半依翻译的高尔基的《廿六人》（即《二十六男和一女》的前半部），1917年中华书局出版的陈家麟和陈大镫合译的《婀娜小史》（即《安娜·卡列尼娜》），191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林纾和陈家麟合译的托尔斯泰的《现身说法》（即《幼年，少年，青年》）。总之，从清末直到五四以前，我国已翻译了一些俄国文学的名家名作，如托尔斯泰、契诃夫、普希金、屠格涅夫、高尔基等人作品，但这一时期主要是从日文和英文转译，而且多用文言写成，其忠实于原文的程度可想而知。

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

主义。”^①人们从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中看到了新的曙光、新的希望，试图从文学与革命的关系上探讨俄国革命发生的原因，所以五四以后出现了翻译俄国文学的热潮。瞿秋白说：“俄罗斯文学的研究在中国却已似极一时之盛。何以故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赤色革命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生出极大的变动，撼天动地，使全世界的思想都受它的影响。大家要追溯它的远因，考察它的文化，所以不知不觉全世界的视线都集于俄国，都集于俄国的文学；而在中国这样黑暗悲惨的社会里，人人都想在生活的现状里开辟一条新道路，听着俄国旧社会崩裂的声浪，真是空谷足音，不由得不动心。因此大家都要来讨论研究俄国。于是俄国文学就成了中国文学家的目标。”而且“不是因为我们要改造社会而创造新文学；而是因为社会使我们不得不创造新文学，那么，我们创作新文学的材料本来不一定取之于俄国文学，然而俄国的国情，很有与中国相似的地方，所以还是应当介绍”。^②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920年，瞿秋白、郑振铎等人为北京的《新中国》杂志社编辑了一本介绍俄国文学的《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第一集），集中收有普希金的《驿站监察吏》和《雪媒》（即《暴风雪》）、果戈里的《马车》、赫尔岑的《鹊贼》、屠格涅夫的《九封书》等九篇小说。1921年1月1日，沈雁冰（茅盾）、郑振铎、王统照、耿济之、郭绍虞等12人在北京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以《小说月报》为机关刊物。1921年10月《小说月报》出版了《俄罗斯研究》专号，发表了郑振铎的《俄国文学的启源时代》、鲁迅的《阿尔志跋绥甫》、沈雁冰的《近代俄国文学家38人合传》、张闻天的《托尔斯泰的艺术观》

^①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② 《〈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序》，《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2卷，第248、24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等 20 篇论文，选译了普希金、屠格涅夫、果戈里、安德列耶夫、高尔基等人的 28 篇作品，还翻译了《第三国际党的颂歌》和三篇赤色小说。此后，1922 年文学研究会又翻译出版了安特列夫的《小人物的怅悔》（耿式之译），1923 年出版了安特列夫的《人的一生》（耿济之译）和《狗的跳舞》（张闻天译），1926 年出版了柯罗连科的《音乐师》（张亚权译）等作品。

除了文学研究会以外，共学社编译了《俄国戏曲集》（共 10 册，由郑振铎主编）其中包括果戈里的《巡按》（贺启明译），奥斯特罗斯基的《雷雨》（耿济之译），屠格涅夫的《村中之月》（耿济之译），托尔斯泰的《黑暗之势力》（耿济之译）和《教育之果》（沈颖译），柴霍甫（契诃夫）的《海鸥》（郑振铎译）、《伊凡诺夫》（耿式之译）、《万尼亚叔父》（耿式之译）和《樱桃园》（耿式之译），史拉美克的《六月》（郑振铎译）等 19 世纪至 20 世纪初期的俄国最有影响的十大剧作。未名社也翻译了许多俄国文学作品，鲁迅在《记韦素园君》中说：“未名社现在几乎消灭了，那存在期也并不长久。然而自素园经营以来介绍了果戈里（N. Gogol），陀斯妥也夫斯基（F. Dostoevsky），安特列夫（L. Andreev），介绍了望·蔼覃（F. Van Eeden），介绍了爱伦堡（I. Ehrenburg）的《烟袋》和拉夫列涅夫（B. Lavrenev）的《四十一》。”^① 这一时期各种刊物也竞相登载翻译过来的俄国文学译作，如《东方杂志》、《新中国》、《小说月报》等。

总之，从五四以来直到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前，俄国文学作品的翻译数量不断增加。“据《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1919—1927 年）》中《翻译总目》统计，‘五四’运动以后八年内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共有 187 部，其中俄国为 65 部，占三分之一强。其他依次为法国 31 部，德国 24 部，英国 21 部，印度 14 部，日本 12 部……，均大大低于俄国。这里仅统计单行本，

^① 《鲁迅全集》（第 6 卷），第 67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发表于报刊上的还未计在内”。^① 不仅翻译数量增加，而且质量也在提高，瞿秋白、耿济之等一批精通俄语的人加入了翻译队伍，开始从俄文直译，有利于保持作品的原貌，当然大部分人仍是从英、日等文字转译。

随着俄国文学作品的大量翻译，新文学界也开始了对俄国文学的研究工作。这期间，既有从整体上研究俄国文学的，也有针对某一作家及作品的研究。如1920年郑振铎在《改造》杂志第3卷第11期上发表的《俄国文学发达的原因与影响》，同年10月瞿秋白在苏州《妇女评论》月刊第2卷第2期上发表的《托尔斯泰的妇女观》。除了刊物上发表许多研究俄国文学的文章外，当时许多译作都在序言或后记中简要介绍作者及作品的风格。如1920年瞿秋白为沈颖译的普希金小说《驿站监察吏》作序，概括这篇小说的特色“情节非常简单，而作者艺术上的高尚的‘意趣’，很能感动读者，使作者对于贫困不幸者的怜悯之情，深入人心曲”。同时借果戈里之口，指出了普希金在俄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我国现在人，提及普希金的名字，就立刻联想及俄国的民族文学家。现在时代，俄国文学家，没有一个能出普希金之上的，没有一个人能称为民族的文学家。”^② 同年瞿秋白翻译果戈里的独幕剧《仆御室》，在文末的《译后志》中对果戈里进行了简要介绍，指出他是“俄国极有名的戏曲家，诗人，小说家，有人称他为俄国写实主义派的第一人”。他的作品的艺术特色“就在于描写刻画‘社会的恶’而又没有过程的刺激。于平淡中含有很深的意境，还常常能与读者一种道德上的感动”。所以“现在中国实在很需要这一种文学”。^③ 这一时期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两

^① 转引自李明滨：《中国与俄苏文化交流志》，第25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②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2卷，第24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③ 同^②，第4卷，第392、393页。

部俄国文学史的出版。一部是郑振铎的《俄国文学史略》(文学研究会丛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出版),一部是蒋光慈和瞿秋白的《俄罗斯文学》(创造出版部1927年出版)。郑本可说是我国第一部俄国文学史专著,由瞿秋白校阅,并为之写了最后一章《劳农俄国的新作家》。全书正文约六万六千字,简明扼要地介绍了俄国文学发展的历史,并附有《关于俄国文学研究的重要书籍介绍》,在当时中国可称得上是研究俄国文学最详尽的书目,十分难得。但此书篇幅较小,所以对作家作品的分析难免过于简略。瞿秋白在1921—1922年居俄期间就已写成一部俄国文学史,1927年蒋光慈将其收入他所著的《俄罗斯文学》,改题为《十月革命前的俄罗斯文学》,并经过删改,编为下卷。由于瞿秋白本人通俄语,又到过俄国,对俄国社会和文学进行过实地考察,因此,他对俄国文学有深刻的认识。书中系统介绍了十月革命前的俄罗斯文学,如“民间文学”、“古代文学”、“俄国文学之中世纪”、“俄国文学与西欧文明”、“俄国文学之黎明”、“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九十年代”、“一九〇五年革命与旧文学”等,同时重点介绍了普希金、哥哥里(果戈里)、列尔芒托夫(莱蒙托夫)、托尔斯泰等人的生平及创作。《俄罗斯文学》上卷为蒋光慈所作的《十月革命与俄罗斯文学》,“作者以为十月革命后的俄罗斯文学比较重要而且对于读者有兴趣些,故将它列在前面”^①。

五四以后,苏联文学理论著作已开始译介过来,1921年1月的《新青年》(第8卷第5号)发表了震瀛翻译的《苏维埃政府的保存艺术》。同年,耿济之翻译的《艺术论》(托尔斯泰著)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25年8月任桢翻译的《苏俄文艺论战》出版。1926年一声翻译的《党的出版物与文学》(即列宁《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发表于《中国青年》第144期。冯雪峰分别于1926年、1927年翻译了日本人升曙梦的《新俄文学的曙光

^①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2卷,第134页。

期》、《新俄的无产阶级文学》及《新俄的演剧运动与跳舞》。但在当时这些译作的影响不大。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在白色恐怖中，太阳社、创造社大力倡导无产阶级文学。由于受苏联无产阶级文化思潮和“拉普”（全称是“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影响，他们过分强调文艺的阶级性，否定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的成果，挑起革命文学的论争，攻击鲁迅、茅盾等人，造成宗派主义。虽然后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干预下论争停止，但斗争双方都感到理论的贫乏，于是出现了对俄苏文学理论译介的高潮。鲁迅曾说：“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挤’我看了几种科学的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列汉诺夫的《艺术论》，以救正我——还因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①但是30年代，中国共产党政治上一度陷于左倾的状态，所以在文艺政策上也出现了同样的左的错误。而中国左翼文艺界处处跟从苏联，当时苏联自身的理论又尚不成熟，真理与谬误并存，所以就直接导致中国文艺界跟着发生了错误。1930年3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左联成立。1930年11月，国际革命作家联盟在苏联哈尔科夫召开代表大会，萧三作为左联代表出席了大会。会上公开提出“唯物辩证创作方法”，会后被传达给左联。1931年11月左联执委会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的决议，在创作方法上要求“作家必须从无产阶级的观点，从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观察，来描写。作家必须成为一个唯物辩证法论者”。^②同时必须同浪漫主义斗争。这种将作家的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等同起来的做法，导致了文学创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脸谱化。1932年4月，苏联联共（布）中央做出了《关于改组文学艺术

^① 《鲁迅全集》（第4卷），第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② 转引自张良春、张大明主编：《中国现代文学思潮》（下册），第655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团体》的决定，撤消了“拉普”，随之对“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进行批判，文艺界提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口号。这一口号很快被中国引进，1933年初，《艺术新闻》以《苏联文学的新口号》为题，率先向中国做了介绍。同年11月，周扬发表了《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之否定》，正式介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从此中国的文艺界才开始摆脱了错误，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这一时期，中国的文艺界翻译了大量俄苏文学理论著作，如克鲁泡特金的《托尔斯泰论》和《俄国文学史》、卢那察尔斯基的《文艺与批评》和《西方的文化和苏联的文化》、别林斯基的《伯林斯基批评论》、弗理契的《欧洲文学发达史》、贝灵的《俄罗斯文学》、高尔基的《戈里基文录》和《高尔基论文选集》以及《苏联文学诸问题》、米尔斯基的《现实主义》、波格达诺夫的《新艺术论》、伏洛夫斯基的《作家论》；此外，还有一些从日文转译的文艺理论著作，如升曙梦的《新俄的无产阶级文学》、《俄国现代思潮》、《高尔基评传》；藏原惟人的《新俄的文艺政策》等。鲁迅和瞿秋白在这一时期为翻译俄苏文艺理论著作做出了巨大贡献。

鲁迅是我国杰出的作家，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翻译家，他一生翻译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约占其全集文字的一半。而在他的全部译著中，俄罗斯和苏联的文学作品又占了三分之二。1907年，鲁迅发表《摩罗诗力说》，介绍了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里；1909年与周作人编译《域外小说集》，亲自翻译了安特列夫和迦尔洵的作品；1920年翻译阿尔志跋绥夫的中篇小说《工人绥惠略夫》；1920年至1921年集所译短篇小说九篇为《现代小说译丛》，其中有六篇是俄国作家的作品；1921年为《小说月报》写了《阿尔志跋绥夫》的论文；1922年翻译果戈里的《鼻子》，1923年翻译了爱罗先科的童话剧《桃色的云》，1930年翻译了雅可夫列夫的《十月》、法捷耶夫的《毁灭》，1933年编译出版了

两个苏联作家短篇小说集《竖琴》和《一天的工作》；1934年开始翻译高尔基的《俄罗斯童话》，于次年译完；1935年翻译了潘杰列耶夫的《表》和果戈里的《死魂灵》（第一部）。在文学理论方面，1929年至1930年，支持冯雪峰编辑出版《科学的艺术论》丛书，亲自翻译了联共（布）的《文艺政策》，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之社会基础》、《艺术论》，梅林格的《文学评论》，特别是其翻译的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较好地解释了无产阶级文艺观，在当时影响很大。

瞿秋白（1899—1935年），是我国译介俄国文学的先驱。1917年入北京的俄文专修馆，1919年9月在《新中国》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译作——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闲谈》，1920年为《新中国》杂志社编辑了第一本翻译介绍俄国文学的《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1920年10月，作为北京《晨报》特派记者前往莫斯科，写成《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向人们介绍十月革命后俄国的真实情况。旅俄期间，写成《俄罗斯文学史》。他还翻译了果戈里的剧本《仆御室》、托尔斯泰的小说《三死》、《伊拉斯》、《阿撒哈顿》、《人依何为生》，契诃夫的《好人》、高尔基的小说《劳动的汗》、《时代的牺牲》，普希金、莱蒙托夫的诗作。1931—1933年由于受王明的打击，被迫离开中央领导岗位，与鲁迅一起领导左翼文化运动，翻译了苏联及俄罗斯的许多文学作品，主要有绥拉菲摩维奇的《一天的工作》、《岔道夫》，葛拉特珂夫的《新土地》，别德纳衣《没工夫唾骂》。他十分重视高尔基的文学作品，认为“这是惊醒我们的书，这样的书要‘教会我们明天怎样去生活’”。^①为此，他翻译了高尔基的两篇早期小说《二十六个和一个》、《马尔华》，长篇小说《克里姆·萨尔金的一生》（只译了一章），还翻译了《高尔基论文选集》、《高尔基创作选集》。他在介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方面做出了杰出贡

^①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5卷，第32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献。30年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传入许多是从日文转译的，难免有偏差，当时懂俄文的并不多。瞿秋白精通俄文，由他直接从俄文翻译无疑有助于减少谬误。冯雪峰在《回忆鲁迅》一文中谈到当年鲁迅迫切希望瞿秋白由俄文翻译文艺理论，鲁迅当时说：“我们抓住他！要他从原文多翻译这类作品！以他的俄文和中文，确是最适宜的了。”^① 1932年间，他根据苏联共产主义学院出版的《文学遗产》第1辑、第2辑上发表的文章，编辑成《现实——马克思主义文艺论文集》，其中包括他翻译的恩格斯致巴尔扎克和易卜生的两封信，普列汉诺夫的论文《易卜生的成功》、《别林斯基的百年纪念》、《法国的戏剧文学和法国的图画》、《唯物史观的艺术论》，拉法格的《左拉的金钱》。此外，还有根据有关材料编译的评论文章《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恩格斯和文学上的机械论》、《文艺理论家普列汉诺夫》、《拉法格和他的文艺批评》等。1933年又翻译了列宁论托尔斯泰的两篇论文《列甫·托尔斯泰像一面俄国革命的镜子》、《L.N. 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以及《列宁全集》（苏联版本）编者V·亚陀拉茨基等撰写的《关于列宁论托尔斯泰的两篇文章的注释》。在30年代，瞿秋白从俄文直接翻译的这些著作，比较系统地宣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理论，介绍了列宁用辩证唯物主义对托尔斯泰的评价，同时也介绍了普列汉诺夫的文艺理论，正确评价了他的功过，有助于当时左翼作家理论水平的提高，纠正对五四新文学的虚无主义态度，也使他们在现实的文艺斗争中获得了理论武器。

在翻译俄苏文学理论的同时，俄苏文学作品译介并没有因大革命的失败和国民党的白色恐怖而减少，而是源源不断地被介绍进来。正如鲁迅在1932年写的《祝中俄文字之交》中所说：“可

^① 转引自梦花：《把天火盗给人间——瞿秋白与苏联俄罗斯文学》，《萌芽》1984年第6期。

祝贺的，是中俄的文字之交，开始虽然比中英、中法迟，但是近十年中，两国的绝交也好，复交也好，我们读者决不因此而盛衰。不但如常，而且扩大。这可见我们的读者大众，是一向不用自私的‘势利眼’来看俄国文学的。”^① 俄国文学和苏联文学作品不仅大量翻译过来，而且深受欢迎。据调查，1927年至1937年，俄罗斯文学“初版的新译作一百四十种，年均达到了十四种”，比前一阶段最高的年份即1923年的十三种还要多。而且“苏联文学作品翻译数量也扶摇直上”。^② 1928年，上海民智书局出版了宋桂煌翻译的《高尔基小说集》。1929年，上海大江书铺出版了沈端先（夏衍）翻译的高尔基的《母亲》。1930年，曹靖华在苏联翻译绥拉非摩维奇的《铁流》，1931年在国内出版。此外，鲁迅还翻译了法捷耶夫的《毁灭》、果戈里的《死魂灵》。仅据《中国现代文学大系（1927—1937）·史料·索引二》粗略统计，这一时期翻译的俄苏中长篇小说就有120部左右（同一作者，不同译者的也算在内），其中苏联中长篇小说约占近二分之一，高尔基的作品被翻译过来的最多。如《母亲》、《奸细》、《我的童年》、《我的大学》、《在人间》、《四十年代》（上）、《隐秘的爱》、《英雄的故事》、《忏悔》、《三人》、《颓废》、《夏天》、《燎原》、《胆怯的人》（上下册），都被翻译过来。有的作品还有好几个版本，如《我的大学》。此外，屠格涅夫的作品译介也很多，如《罗亭》、《初恋》、《父与子》、《春潮》等。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译介俄苏文学作品并未停止，特别是40年代对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文学作品的译介更是盛极一时。俄国作家的作品翻译过来的有果戈里的《两个伊凡的吵架》，普希金的《恋歌》和《欧根·奥尼金》，屠格涅夫的《处女地》、《静静的回流》等。苏联作家的作品大量被翻译过来，反法

^① 《鲁迅全集》（第4卷），第462页。

^② 转引自李明滨：《中国与俄苏文化交流志》，第256页。

西斯的作品更是深受欢迎，如西蒙诺夫的《望穿秋水》、列昂诺夫的《侵略》、卡达耶夫的《闭的儿子》、法捷耶夫的《胜利的保证》、吉洪诺夫的《战争》等。曹靖华在中苏文化协会主编“苏联文学丛书”，萧三在延安翻译柯涅楚克的剧本《前线》，并在解放区上演。1942年11月，上海孤岛出版了《苏联文艺》杂志，先后由苏联塔斯社社长罗果夫和施维卓夫出任主编。这本刊物及时地将苏联当代文学作品译介过来，介绍了大量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文学作品。1936年，《中苏文化》在南京创刊，1937年在重庆复刊，翻译了许多俄苏文学作品，尤其是发表了苏联反法西斯文学作品，如小说《虹》、《保卫察里津》，剧本《俄罗斯人》，散文《一支带着“生命之水”的军队》等；发表了二十余篇探讨中苏文学交流的文章，如刘西舫的《如何加强中苏文学交流》，还推出了许多俄苏著名作家的纪念特辑，如“高尔基纪念特辑”、“马雅可夫斯基纪念特辑”、“莱蒙托夫纪念特辑”、“A·托尔斯泰纪念特辑”等。除此之外，重庆和各地报纸、刊物也大量译介苏联文学作品，如《文学集林》、《半月文艺》、《诗创作》、《文学报》、《文艺杂志》、《文艺生活》、《翻译杂志》等。抗战胜利以后，俄苏文学的翻译仍在进行。为纪念普希金逝世110周年，罗果夫和戈宝权编了《普希金文集》。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深受外国文学的影响，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文学作品被翻译过来，直到建国以前，对俄苏文学作品的译介从未曾停止过，中国现代作家从中获得了许多有益的帮助。它不仅影响了中国的文学观念，而且也给中国现代作家提供了创作上的借鉴，在战争年代又曾一度成为中国人民的精神食粮，增添了他们对敌斗争的勇气。五四时期，外国文学作品大量被翻译过来，引起了中国文学观念的变化，茅盾等文学研究会的成员提出了“为人生”的文学主张，就是受了俄国文学的影响。茅盾说：“中国文学不发达的原因，由于一向只把表现的文学看做消遣品，……现在欲使中国文艺复兴，惟有积极的提倡为人生

的文学。”^① 鲁迅则说：“俄国的文学，从尼古拉二世的时候以来，就是‘为人生’的，无论它的主意是在探究，或在解决，或者堕入神秘，沦于颓唐，而其主流还是一个：为人生。”“这一种思想，在大约二十年前即与中国一部分的文艺介绍者合流，陀斯妥夫斯基、都介涅夫、契诃夫、托尔斯泰之名，渐渐出现于文学上，并且陆续翻译了他们的一些作品。那时组织的介绍‘被压迫民族文学’的是上海的文学研究会，也将他们算作被压迫者而呼号的作家。”^② 由于俄国文学是为人生的文学，所以它关注下层人民生活的疾苦，充满着人道主义精神，鲁迅深受其影响，他的小说《孔乙己》、《故乡》、《祝福》等就是描写了下层人民的痛苦。不仅如此，中国现代作家在创作技巧上也借鉴了俄苏文学。以鲁迅为例，他自己曾多次承认安特列夫对自己创作的影响：“《药》的收束，也分明留着安特莱夫（L. Andreev）式的阴冷。”^③ 1935年在致萧军、萧红的信中又说：“至于老王婆，我却不觉得怎样鬼气，这样的人物，南方的乡下也常有的。安特列夫的小说，还要写得怕人，我那《药》的末一段，就有些他的影响，比王婆鬼气。”^④ 而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不仅与果戈里的小说同名，而且题材上也相同，都是用日记体。沈从文则从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中受到启示：“用屠格涅夫写《猎人笔记》方法，揉游记和小说故事而为一，使人物凸浮于西南特有明朗天时地理背景中。一切还带点‘原料’意味，值得特别注意。十三年前我写《湘行散记》时，即有这种意图，以为这方法处理地方

① 《矛盾全集》（第18卷），第10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② 《南腔北调集·〈竖琴〉前记》，《鲁迅全集》（第4卷），第432页。

③ 《〈中国现代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第23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④ 鲁迅：《致萧军、萧红》，《鲁迅书信集》（下卷），第90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

性问题，必易见功。”^①除此以外，像郁达夫、巴金、茅盾等人都在创作方法上从俄苏作家身上获益。30年代，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引进，使中国现代作家将创作视野转向了工农大众的生活和斗争，像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等就是这样的作品。而三四十年代苏联文学作品译介的作用还在于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斗志。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曾指出：“法捷耶夫的《毁灭》，只写了一支很小的游击队，它并没有去投合旧世界读者的口味，但是却产生了全世界的影响，至少在中国，像大家所知道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②

2. 中苏文化交流的使者——曹靖华、萧三

中苏之间的文化交流蓬勃发展起来，涌现出很多推动、促进交流的人物，曹靖华和萧三就是其中两位最重要的代表。

曹靖华，原名曹联亚，1897年出生于河南省卢氏县五里川村。1920年中学毕业后来到了上海，后来进入中共所办的“外国语补习学校”学习俄语。1921年被中共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3年回国，由李大钊安排到北京大学俄语系旁听，进一步学习俄语。同年，第一部译作契诃夫的独幕剧《蠢货》在瞿秋白主编的中共刊物《新青年》季刊第2期上发表，从此开始文学翻译生涯，致力于把俄罗斯进步文学和苏联文学作品介绍给中国，“给起义的奴隶偷运军火”，鼓舞中国人民从事革命斗争。1924年翻译了契诃夫的《三姊妹》，列入郑振铎主编的“文学研究会丛书”，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同年译作《新俄戏曲集》、《白茶》由未名社出版。1925年到河南开封国民革命军第二军中

^① 沈从文：《新废邮存底·二十三》，《沈从文文集》（第12卷），第67、68页，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联合出版1984年版。

^② 转引自黄维道：《法捷耶夫与中国》，《俄苏文学》1987年第6期。

为苏联顾问团当翻译，与顾问团成员瓦西里耶夫（王希礼）相识。同年译剧本《可怜的裴迦》。1926年又翻译了《两个朋友》、《烟袋》、《乐人杨珂》等。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再次赴苏，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列宁格勒大学、列宁格勒东方语言学院任教，1933年秋回国。在这期间拜访了苏联作家绥拉非摩维奇、拉甫列涅夫等，翻译了《一月九日》、《第四十一个》、《不走正路的安德伦》、《乡下佬关于列宁的故事》、《粮食》等，尤其是应鲁迅的邀请，翻译了绥拉非摩维奇的《铁流》。《铁流》从1929年开始翻译，1931年五一节前完成。为将《铁流》寄到国内付印，又历尽艰辛，“那时，全世界反动派对斯大林的孤岛，连邮路都全斩断，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采用复写办法。一笔下去，须力透六层。每次投邮，均发两份。以备一份万一遗失，另份或可漏网。倘两者均落尽魔掌，就据第三份重新复写。加之，当年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在帝国主义封锁、威胁中，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投到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上，轻工业就不得不因陋就简。这样，复写纸和衬纸，粗而且厚，力透六层，实非易事。每字每划，都得全神贯注，略一疏忽，麻烦无穷。十四五万字的稿件，复写下来，手指都出现了老茧”。^①《铁流》这样关山万里“流”到中国，在当时白色恐怖的情况下，国内却无一个书店敢于承印，最后鲁迅自己拿出1000元钱，以并不存在的三闲书屋的名义印了1000部。但又无书店敢卖，只好通过鲁迅的日本朋友内山完造在中国的书店，“从柜台下一点一滴地‘渗’透到读者中间”。^②不过《铁流》一出，就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虽遭查禁，但当时北自伯力，南至香港，全国各地都已有重版。瞿秋白在1931年12月5日致鲁迅的信中说：“《毁灭》、《铁流》等等的出

^① 曹靖华：《风雪万里栽铁花》，《曹靖华散文选》，第149、150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② 同^①，第150页。

版，应当认为一切革命文学家的责任。每一个革命的文学战线上的战士，每一个革命的读者，应当庆祝这一个胜利；当然这只是小小的胜利。”^①《铁流》成为一代人的精神食粮，鼓舞他们投身革命，争取自由和幸福。作家刘白羽说：“我当时只是一个朦朦胧胧对革命向往的人，但正是从《铁流》里，我看到一幅新世界悲而壮的图像，我听到一曲悲而壮的歌声，《铁流》点燃了我年轻心灵的火焰。”^②林伯渠后来也曾对曹靖华说过，《铁流》在长征途中成为大家抢着要看的书，鼓舞他们去完成长征。

1933年秋，曹靖华回国后，到国立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东北大学、中国大学、中法大学等校任教，给学生讲述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普希金、果戈里、高尔基等不少俄苏进步作家的作品和理论，把十月革命后苏联的真实情况介绍给学生们。1936年高尔基逝世后，北平进步文化界举行了高尔基追悼会，曹靖华做了《高尔基生平和创作》的讲话。此后，每逢遇到纪念高尔基的活动，他常常是向中国人民介绍高尔基。1938年，曹靖华随西北联大迁往汉中，11月以“宣传马列主义，领导民先活动”的罪名被解聘。在这期间，他在教学之余，还翻译了苏联儿童文学作品《远方》（与尚佩秋合译）、《第四避弹室》等小说，《恐惧》、《粮食》等剧本以及《高尔基的创作经验》、《我的创作经验》（阿·托尔斯泰著）等理论文章。

1939年3月，曹靖华来到重庆，周恩来安排他到中苏文化协会工作。抗战期间，他一直担任中苏文化协会理事，主编了苏联抗战文艺丛书，把苏联卫国战争的文学作品介绍给中国，如《列宁格勒日记》、《斯大林格勒》、《复仇的火焰》、《两姊妹》、《人民是不朽的》、《团的儿子》、《虹》、《城与年》、《俄罗斯问题》

^① 瞿秋白：《关于翻译的通信》，《鲁迅全集》（第4卷），第370页。

^② 刘白羽：《鲜艳而铁一般的新花》，北京大学等编：《一束洁白的花——缅怀曹靖华》，第66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版。

等。当时处于战争环境，通讯困难，为了及时介绍苏联卫国战争的文学作品，曹靖华多次写信给苏联作家，请他们提供帮助。如1942年3月13日致弗·克梅诺夫的信中说：“自德国法西斯背信弃义入侵神圣苏联国土后，诸如《星》、《十月》、《赤新地》、《新世界》等文学杂志，我们一期也看不到。因此，如有可能，恳请费神赐寄上述刊物，以便翻译。”^① 1944年5月12日又在致弗·克梅诺夫的信中提出“恳请费神赐寄获斯大林奖文学作品。并将有关获奖作品的评论一并寄来”。“请费神赐寄有关阿·托尔斯泰《保卫察里津》的评论文章”。^② 为了将苏联的文学作品尤其是卫国战争时期的作品更好地介绍给中国人民，曹靖华还多次写信给作品的原作者，请他们为中译本作序，写自传，寄照片及评论文章，还请他们介绍创作经验，同时曹靖华也把他们的作品在中国受到欢迎的情况告诉给他们，沟通中苏两国之间的文学交流。如1943年12月5日致《虹》的作者、苏联女作家万·瓦西列夫卡娅信：“奉上大作中译本初版两册，如有可能，恳请为第二版写一篇序言。”^③ 又在1944年5月6日的信中说：“今年二月我曾有幸将有关大作《虹》的评论寄给您。……您的小说仍深受欢迎。中国读者过去和现在都怀着极大的兴趣阅读《虹》。它在读者中引起热烈反响，获得读者高度评价。”^④ 1945年6月某日致康·费定的信提出：“一、恳请为中译本（即《城与年》，引者注）写序，序中谈谈您如何创作这部小说”。“二、切盼惠寄尽可能翔实的小传”。“三、切盼寄有关城与年评介文章及关于您创作和生平的文章”。“最后还希望您能将亚历克舍夫为您的小说所

① 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编：《曹靖华译著文集》（第11卷），第47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河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② 同①，第471页。

③ 同①，第466页。

④ 同①，第466、467页。

作的木刻插图尽快寄给我”。^①在这期间，曹靖华自己也翻译了《油船德宾特号》、《列宁的童年》、《列宁的故事》、《梦》、《苏联民间故事选》、《虹》、《党证》、《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望穿秋水》等大量苏联文学作品。到1946年翻译最后一部苏联文学作品《城与年》为止，在二十多年间，据不完全统计，曹靖华的译作约达三十余种，近三百万字。这些俄苏文学作品不仅在中国人民面前展开了一个新世界，把苏联国内战争、经济建设、卫国战争的情形用文学作品的形式呈现给中国的读者，而且让他们从这些作品中看到了人民的力量，在战争年代增加了他们对敌斗争的勇气。

曹靖华不仅是我国介绍俄苏文学，尤其是苏联文学的拓荒者之一，而且也是他首先促成了鲁迅作品被译成俄文。五四以后，中国虽然出现了介绍俄苏文学作品的热潮，但是苏联对于五四以后中国的现代文学却是一无所知。正如曹靖华所说：“中国大革命前，苏联的所谓汉学家，几乎都浸沉在中国旧文化里。尤其是热衷于《四书》、《五经》和唐宋八大家，至多也不过介绍一点《聊斋》之类而已。至于中国现代文学，却几乎无人过问。”^②所以1925年曹靖华在开封国民革命第二军任第三国际顾问团翻译，见到顾问团的成员王希礼时，不禁要为他的聊斋式的汉语发笑。两个热爱文学的青年经常在一起畅谈交流。在曹靖华的推荐下，王希礼在阅读了鲁迅的《阿Q正传》之后拍案叫绝，于是产生了要把这部作品译成俄语传播到苏联去的想法。在曹靖华的帮助下，王希礼着手翻译，遇到疑难曹靖华尽量为其解决，可是，有些问题曹靖华也解决不了，比如小说中关于绍兴民间赌博之类。于是，由曹靖华写信向鲁迅请教，并请他给俄译本写序及自传。

^① 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编：《曹靖华译著文集》（第11卷），第488、489页。

^② 曹靖华：《好似春燕筑一巢》，《曹靖华散文选》，第142页。

鲁迅回信一一作答，而且还绘了一张图详细说明赌法，此为鲁迅与曹靖华通信之始。1929年，王希礼译的《阿Q正传》在苏联出版，“好像第一只春燕，衔着友谊的花蕾，在风雪交加中，冲破了封建军阀的天罗地网，横越浩瀚的蒙古沙漠，飞到苏联”。^①

1927年到1933年，曹靖华第二次赴苏，在列宁格勒大学主讲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文学，对中国语言文学系的汉语教学进行改革，把过去只教文言文改为既教文言文，又教现代汉语，同时把重点放在现代汉语上，向学生介绍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学，从而为苏联培养了一批有名的汉学家，如刘斌、斯萍青、阿赫提金娜、莫罗佐娃、波兹涅耶娃、费德林，这些人后来为中苏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抗战时期在重庆，曹靖华也曾应邀担任苏联大使馆的语言教师，在紧张工作之余，每周讲几小时的课。在列宁格勒大学，曹靖华还帮助苏联中国学家瓦·阿列克谢耶夫校订《聊斋》译文。如1930年1月3日，曹靖华致瓦·阿列克谢耶夫信中说：“关于校《聊斋》事，已将《画壁》一篇校完，只校出一个小错。”^②

曹靖华第二次赴苏还担负起为鲁迅搜集苏联美术作品的任务，帮助鲁迅把苏联的艺术介绍给中国。他为鲁迅搜集木刻作品始于为《铁流》寻找插图，1931年鲁迅准备印《铁流》时，从苏联的《版画》期刊中得知苏联木刻家毕斯克列夫为《铁流》作有四幅插图，于是请曹靖华代为搜寻，以便同原著一并付印。曹靖华得信后“几乎费尽心机，踏破铁鞋，遍访两年，没打听到木刻家”。^③最后想到木刻家既为《铁流》作插图，《铁流》作者可能知道他的地址，于是写信给《铁流》的作者，终于打听到了木刻家的住址。他专程从列宁格勒到莫斯科，拜访了木刻家。此行

① 曹靖华：《好似春燕第一只》，《曹靖华散文选》，第147页。

② 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编：《曹靖华译著文集》（第11卷），第460页。

③ 曹靖华：《哪有闲情话年月》，《曹靖华译著文集》（第11卷），第190页。

不仅得到了《铁流》插图的原版手拓木刻，而且因为苏联木刻家只要求以宣纸作为回报，从此开始由鲁迅寄宣纸给曹靖华，由他再寄给木刻家们，换取木刻作品，后来这些木刻作品结成《引玉集》出版。曹靖华除了用宣纸向苏联木刻家搜集木刻的手拓作品外，还在市场上搜集一些复制品，虽不及原拓名贵，但有些也是难得之物，如《死魂灵百图》中就有曹靖华在苏联搜集的梭可罗夫的12幅插图。当时曹靖华搜集的范围极为广泛，据他在《雪雾迷蒙访书画》中说：“其中有古典和现代的各家版画集、漫画集、风景画册等；有附着插图的作家、艺术家、名演员（如科米萨热夫斯卡娅）等纪念册；有单色、彩色、大小不同的单幅名画、风景画、名人像和美术邮片等；有西欧古典名著插图精本（如《浮士德》）等；有俄罗斯古典名著插图精本（如《城与年》）等；有《俄罗斯民间故事》插图精本等；有《苏联书籍封面集》等；更珍贵的彩色精印插图的俄文本《天方夜谭》等；有整函的大幅古典名画集；有大型和中型的当代名画家画的《苏联作家像》等；也有价值低廉，但颇有艺术价值和政治意义的独具风格的招贴画等等。总之，从古典到当代，从苏联到西欧，凡有政治艺术意义，足供我们借鉴和利用的采做插画或作封面之用，都在搜寄之列。”^①当年不管多忙，曹靖华每周至少挤出半天时间逛书店，尤其是一年一度的“书会”（“春季在各大城市交通便利的地方，指定一个地点，如公园或广场上举行。为期约十天。书市摆摊栉比，人如潮涌，五光十色，新旧杂陈。这里可发现平时所未见，但梦寐以求的东西。”^②）更是令曹靖华寝食俱废，乐而忘返的。他一有空暇便在当地几家著名的旧书店里访书探画，为了买到精印插图本的《天方夜谭》，“当时三口之家的饥寒，也在所不

^① 曹靖华：《雪雾迷蒙访书画》，《曹靖华译著文集》（第11卷），第233、234页。

^② 同①，第234页。

计了”。^①曹靖华就是这样顶风冒雪，节衣缩食，为鲁迅在苏联搜集美术作品，为中苏艺术交流竭尽全力。

新中国成立以后，曹靖华投身俄语教学工作，从1951年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建立起至1983年，他一直担任该系的系主任。他还担任过中苏友好协会全国理事会理事兼北京市分会副会长，曾多次访问过苏联并接待苏联代表团。鉴于他一生为中苏文化交流所做的巨大贡献，1987年5月，苏联列宁格勒大学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同年8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他各国人民友谊勋章。苏联汉学家齐赫文斯基在《祝贺曹靖华教授90寿辰》的信中也说：“苏联高度评价曹靖华教授的译著，达到这一成就需要渊博的文化知识、语言知识和对苏联人民的历史知识。他对苏联翻译工作者在中国文学，尤其翻译鲁迅著作所给予的帮助是不能忘怀的。”^②

萧三，1896年10月10日出生于湖南省萧家冲，少年时曾与毛泽东同窗。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1922年底由法国只身赴莫斯科，进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在这期间与同学谢文锦一起把俄文歌曲《光明赞》译成中文，在同学中间传唱，归国的同学又把它带到了国内，从此《光明赞》的高亢旋律在国内响起。1923年暑假，萧三和东大中国班的同学们到瓦西钦诺村苏维埃农场度假，他与陈乔年一起把《国际歌》译成了中文。虽然同年瞿秋白在国内已把《国际歌》译成中文，并发表在6月5日《新青年》季刊第1期上，但当时并未流传开去。萧、陈所译的《国际歌》很快被东大中国班的同学学会，随着这些人的先后回国到各地参加工作，《国际歌》在全国各地传唱开来。1939年，萧三从苏联回到延安后，又在著名音乐家吕骥、冼星海和歌词作家塞克等的帮助下进行过修改。1962年《国际歌》虽再次进行修改，但基

^① 曹靖华：《雪雾迷蒙访书画》，《曹靖华译著文集》（第11卷），第235页。

^② 《一束洁白的花——缅怀曹靖华》，第168页。

本保持了萧陈译本的原貌。

1924年8月，萧三奉调回国，参加革命工作。五卅惨案发生后，萧三在湖南领导工人运动，声援五卅运动。他根据自己在苏联生活学习所得写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之研究》一文，发表在1925年6月1日的《新青年》杂志上，向人们介绍苏联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组织机构等情况，特别是介绍了实行新经济政策以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1927年初，萧三因病赴苏疗养。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政府于10月14日同苏断交。萧三难以回国，只得暂留苏联，不料一留就是十年，直到1939年初才再次回国。在这期间，他在中苏文化界之间传递信息，充当两国文化交流的使者。

因不能回国，萧三先在远东大学任教，教中国工人班的政治课并兼任班主任，从事华工教育工作。1930年他自荐到莫斯科东方学院教中文，担任初级班的会话和写字以及十来个研究生的中国文学课。在他教过的研究生中有两位后来成为著名汉学家，他们都曾来华，并为中苏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一位是费德林，担任过驻华大使馆的文化参赞，见过毛泽东主席；一位是艾德林，汉语汉文都非常好，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曾把白居易的诗译成俄文，后来为研究陶渊明多次来华，并访问过陶渊明的故乡。

1930年，在苏联避难的外国作家准备召开一次国际革命作家代表大会，邀请萧三参加，并请他写信邀请中国革命作家参加。萧三于是写信给鲁迅及左联，告知此事，得到的回答是：“由中国现在派出作家出国，去苏联，碍难实现；即请你作为我们的代表出席……”^①萧三从此成为左联驻苏联代表。他与鲁迅之间书信往来，互寄刊物，把苏联及国际文坛的情况介绍给国内，又把中国左翼作家及其作品介绍给苏联，向苏联人民及世界报告中国的革命文学及中国革命情况，尤其是向苏联人民宣传中

^① 转引自《萧三文集》，第280页，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

国的伟大作家鲁迅。1930年11月，萧三出席了在苏联哈尔科夫举行的国际革命作家代表大会，在大会上发言介绍中国的左翼文艺团体，提出希望苏联以及其他国家注意宣传中国文学艺术。会后，萧三写信给左联和鲁迅、茅盾，详细介绍了大会情况。

这次大会成立了国际革命作家联盟，出版机关刊物《世界革命文学》，1933年改名为《国际文学》，由萧三主编过两期中文版。他致力于沟通中国文坛与世界文坛的联系，把中国文学作品介绍给世界。正如1933年1月1日他在题为《我们的任务》的发刊词中所说：“同人鉴于中国文艺和先进的国际文艺之间至今仍隔着一座万里长城——一方面国际文艺运动的潮流激变，国内读者界或只知其一二，语焉不详，或且不能不相信与事实完全相反的传述；一方面中国文艺界的真象从来就异常少有系统地给国际以明晰的观念……用特出版这个中文的《国际文学》汇刊，以期于沟通及联系中外文艺的任务内，尽一份子力量。”^①因此这一期不仅发表了译文，而且刊登了中国作家方格（黄药眠）的短篇小说《长发店的没落》、诗歌《印度洋的船上》以及萧三的诗作《血书》、《两个日本兵》、《东巴斯的“老乡”》，特别是从美国报纸上译载了一篇以论鲁迅为主的评价中国文学的文章。1935年8月第2期中文版主要介绍了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的情况，萧三曾把刊物寄回国内，至今北京博物馆和上海各存一本。

为了向国外介绍中国的左翼革命文学，萧三写信给国内索稿，但长期未有回音，于是自己开始动手写诗。1930年他写了第一首诗《命该如此》，描写了王老头一生听天由命，最后惨死在国民党手下，而其子王林在血淋淋的事实面前觉醒，号召人民起来反抗的故事。这首诗由俄国诗人兼翻译家A. 罗姆译成俄文，发表在《世界文学》上，从此萧三开始了诗歌创作生涯。后来他又写了《南京路上》、《棉花》、《血书》、《纪念广州公社》、

^① 陈漱渝：《萧三在苏联的文学活动点滴》，《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3期。

《三个（上海的）摇篮歌》、《张五嫂打定主意了！》、《满洲里的两个日本兵》、《蒋介石行军歌》等，译成俄文在苏联发表，向苏联人民介绍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1934年5月10日，萧三应邀参加了在伯力举行的苏联远东部队太平洋师先进新闻工作者代表大会，用俄语做了《中国苏区文化建设和中国红军》的长篇报告，向苏联人民详细介绍了中国苏区文化建设的成就，最后说：“在国民党统治区文化教育工作一片破败的同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虽处于极困难境况，但却加紧创建自己的文化，的确无愧于……有文化的，文明的苏维埃共和国。”^①在6月5日的远东地区作家代表大会上，萧三又做了《跟上时代的步伐》的报告，介绍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革命斗争中的作用，特别强调了鲁迅的伟大贡献。

1933年底，苏联筹备召开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邀请各国作家参加。萧三写信给鲁迅，请其出国一游，既可看苏联的建设成就，又可暂避国内的白色恐怖，到南俄疗养。但鲁迅终未能成行。不过他回答了《国际文学》杂志编辑部向各国著名作家征求的三个问题，还将茅盾的答复亲自抄写寄到苏联，后来由萧三译成俄文在《真理报》上发表。1934年8月17日，萧三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以左联代表的身份发言，“举出鲁迅在中国革命文学上的领导作用，和茅盾的《春蚕》与长篇小说《子夜》”。^②正如萧三所说：“我在国际革命作家联盟及《国际文学》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揭露蒋介石枪杀五个革命作家和一位戏剧演员的暴行，五种文字都刊印了左联给我的死难作家的照片和几位著名作家的抗议短文。”^③在代表大会进行期

^① 转引自高陶：《天涯萍踪——记萧三》，第178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

^② 萧三：《我为“左联”在国外作了些什么》，《萧三文集》，第282页。

^③ 同②，第281页。

间，高尔基设宴款待出席大会的各国代表，萧三和胡兰畦在宴会上向高尔基及世界各国的作家代表们控诉了蒋介石残杀左联五作家的罪行。许多作家写了声援中国革命和向中国革命作家致敬的诗、文，萧三把这些诗文连同大会上关于中国文学的决议寄回国内，可惜并没有全部收到。

1935年，萧三在苏联《真理报》上发表了《鲁迅》一文，介绍和宣传鲁迅，文章和照片几乎占了报纸的半个版面。后来，萧三把它从报纸上剪下来寄给鲁迅。信中说：“9月间在真理报上为文介绍我公于苏联读者，兹剪下另封寄上，匆卒不及译成中文，至此为歉！（如得亚兄时当能转述也）”^①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萧三得知后立即写了一篇短讯寄《真理报》发表，又给苏联当时出版的英文报纸写了短文。后来，在苏联作家协会的帮助下，萧三在莫斯科作家俱乐部举行了一个鲁迅追悼会，苏联作家法捷耶夫致词盛赞鲁迅，萧三做了关于鲁迅生平的报告，“着重介绍他反对托派，赞成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支持反日统一战线，实在是一个非党的布尔什维克”。^② 萧三还布置了一个鲁迅及中国文学展览会，陈列出中文版、外文版的鲁迅及中国其他作家的作品。当时鲁迅和中国现代作家的作品译成俄文的很少，苏联国立文学出版社应读者的要求用俄文出版一部《鲁迅选集》，萧三帮助选稿、校稿，还特地请苏联著名作家法捷耶夫再校一遍。“鲁迅著作除一九二九年及一九三〇年曾在莫斯科的少年先锋出版社及列宁格勒的普利博伊出版社都出版过外，好几个‘中国专家’竞争着翻译还没有翻译过的，或已经翻译过而译得不很好的，则又再译。因此我们得以比较、选择好的译稿；还觉得不够，于是由我将较好的译稿和鲁迅的原文从头到尾校订一

^① 萧三：《给鲁迅的信（1935年11月26日）》，陈冰夷、王政明编：《萧三诗文集》（散文篇），第231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6年版。

^② 萧三：《我为“左联”在国外作了些什么》，《萧三文集》，第284页。

遍，还觉得不够，我们又请对鲁迅特别亲切，对中国抗战和中国新文学非常关心的法捷耶夫同志——这个俄国文学的能手——将译稿从艺术文学的观点上再校一遍。”^① 萧三还为之写了一篇关于鲁迅生平、创作、思想、斗争历史的文章。1937年1月1日，萧三在苏联伯力举行的远东作家大会上做了《鲁迅先生的生平及创作》的报告。1938年10月，鲁迅逝世两周年，苏联作家在莫斯科作家俱乐部举行纪念大会，开会前一天，萧三应大会主席绥拉非摩维奇之邀，与他详谈鲁迅。同年，鲁迅纪念委员会由上海写信给萧三，要他直接向法捷耶夫和绥拉非摩维奇征求意见，请他们做鲁迅纪念委员会的委员。萧三不仅和他们面谈，以后又写信给他们，征得他们的同意。总之，萧三在苏联利用各种机会、各种形式宣传和介绍鲁迅。

为沟通中苏之间的文化交流，萧三与鲁迅书信往来，互寄书刊。如鲁迅1932年9月1日致萧三信：“VITZ的画，不知何时可以寄下，中国人还不知道他，我想介绍一下。”^② 1933年11月24日致萧三信：“今天寄出杂志及书籍共二包。”^③ 1934年1月17日致萧三信：“寄来之《艺术》两本，早已收到”。“也在十一月二十四日，我寄上书籍杂志（《文学》从第一期起在内）两包，一月初寄列京木刻家中国画本时，附有杂志两本并它兄（瞿秋白——引者注）短信，托其转交，不知已收到否？今天又寄杂志五本共一包”。“Goethe纪念号是收到的；《文学报》（苏联作家协会机关报——引者注）收到过两回，第一回它兄拿去了，它一去，这里遂再没有会看原文的人。此后寄书，望常选插图多的寄来，最好是木刻插图，便于翻印介绍，倘是彩色，就不易翻印

① 萧三：《鲁迅在苏联》，《萧三文集》，第134页。

② 《鲁迅书信集》（上卷），第32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

③ 同②，第449页。

了”。^① 1934年3月4日致萧三信：“《文学周报》是陆续收到一些的，但此外书报（插画的）一本也没有到。弟前寄杂志二包后，又于寄莫京木刻家以书籍时，附上杂志数本，前几天又代茅兄寄上他们所赠的书一包，未知收到否，此外尚有三本，当日内寄上”。“中国文学史没有好的，但当选购数种寄上。至于作家评传，更是不行，……但亦当购寄，以备参考”。^② 萧三《给鲁迅、茅盾并转左联的信（1934年12月12日）》：“前天寄去一包照相画片，内附一纸寄《新生》与《世界知识》”，“所以经过你们者，是想由你们斟酌扣留一部分作为自己刊物之用，今天想及，这一包关于作家大会〔指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的简直可以完全留为己用”。“承寄杂志等都已收到，至谢！《新地》内之‘王伯伯’已在翻译成西文”。^③

1939年初，萧三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祖国，投身国内革命工作，仍继续为中苏文化交流做贡献。萧三十分敬佩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并把他介绍到中国，在此之前，“中国文艺界对于马雅可夫斯基的了解，一向是不很详细，而且是不很正确的”。^④ 在诗人逝世十周年之际（1941年），萧三写了《正确认识马雅可夫斯基》，介绍他的生平、创作道路、作品特色，赞扬他以诗为革命服务，“在国内战争时代，他的许多煽动性诗发生了直接的战斗作用。他的诗唤起人们上前线，保卫革命，反对逃避革命，反对开小差。他号召国人巩固后方，扩大红军，替红军做寒衣，征粮食，为火车头掘取煤炭……”。^⑤ 在苏联国内战争结束以后，苏联开始经济建设时，马雅可夫斯基对于革命的敌人和各种肮脏

① 《鲁迅书信集》（上卷），第479、480页。

② 同①，第498、499页。

③ 《萧三诗文集》（散文篇），第224、225页。

④ 《萧三诗文集》（译文篇），第90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6年版。

⑤ 同④，第92页。

和不文明等现象“集中他讽刺诗的火力打击他们”。^①萧三给马雅可夫斯基以极高的评价：“马雅可夫斯基是新诗人的典型，他的艺术是人民的，他的创作是与社会主义生活密切联系的，他是革命诗人的模范，热烈的苏维埃爱国主义者，无产阶级的诗人、战友、阶级的煽动者、呐喊者、指挥师。”^②不仅如此，萧三还把马雅可夫斯基的诗作及诗歌创作理论介绍给中国。1940年，他与李又然合作翻译了马雅可夫斯基的短诗《与列宁谈话》，自己又单独翻译了《左的进行曲》，刊登在同年出版的《大众文艺》第1卷第1期上。40年代初，萧三又译了马雅可夫斯基的《怎样作诗》，只是当时未能发表。此外，他还多次写文章介绍高尔基。

抗战期间，萧三把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文学作品介绍给中国。1942年，萧三翻译的维·古曼夫的诗剧《光荣》作为中苏文化协会编的《苏联文学丛书》的一种在重庆出版。1944年，他翻译了柯涅楚克的剧本《前线》。后来《前线》曾在延安及其他解放区上演，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虽然萧三于1939年回到了延安，但他与当时全苏作家协会外国文学委员会副主任米·雅·阿波列金之间书信往来，不断互寄书刊，相互传递两国文学方面的信息，使得中国作家的作品能够比较及时地被介绍到苏联，也促进了苏联文学作品，尤其是卫国战争时期的文学作品及时地在中国翻译。虽然在当时的情况下，国民党政府从中阻挠，许多书刊被扣留，但仍有一部分得以传到双方手中，促进了中苏文化交流，这可从1939—1943年萧三和米·雅·阿波列金的通信中看出。如1939年3月17日萧三致米·雅·阿波列金信中说：“我还给‘国家文学出版社’寄了一些材料，……把我的几页作品转给他们并监督该书出版”，并要求“P.S请给我们寄1939年的日历来，日历标有全年节日的日期，

① 《萧三诗文集》（译文篇），第92页。

② 同①，第96页。

著名人物的简历。这对我们是很需要的”。“请寄些苏联文学新作为来”。^①米·雅·阿波列金 1939 年 7 月 16 日致萧三信：“非常感激你的信和‘文学’书。我们非常愉快地得知，在中国，人们正关注着我们这里的文学出版物”。“给你寄去了一些新作；不定期的文艺丛刊《民族友谊》（仅出了第一期）。给你寄去了一些谢甫琴柯的书。”^②此后，双方书信往来不断，互相提出需要对方寄的书刊，彼此都尽力而为。当时书信往来缓慢，又加之国民党在通讯上制造种种障碍，有些信息传递过来已经过时，所以萧三在 1943 年 10 月某日致米·雅·阿波列金的信中说：“我反复考虑过，希望你们用电报来通知我苏联文学的某些新作，因为电文总是可以送达的，而一般地，信和邮件就不知道其所向了”。“让我们说定：偶尔，你用电报告知我苏联文学中正在发生的某些事情好吗？谨先以谢忱！从我自己这方面来讲，将尽力利用一切可能通知您，中国文艺界有哪些新闻。”^③

总之，萧三无论是在苏联从事文学活动，还是作为左联代表负责左联与苏联及国际革命文学界的联系，向苏联人民介绍中国革命和中国现代文学，还是在回国以后向中国人民介绍苏联作家及文学作品，与苏联作家协会外国委员会副主任米·雅·阿波列金书信往来，互寄书刊，始终充当着中苏文化交流的使者，为中苏文化交流架起桥梁。

3. 中苏电影交流

20 年代初，苏联电影已开始在中东铁路职工中放映，但属非营业性质，只供内部职工看，社会影响不大。1924 年列宁逝世，苏联政府拍摄了纪录片《列宁的葬仪》，表达人们对这位伟

① 米镇波译：《萧三与米·雅·阿波列金的通信》，《新文学史料》1994 年第 1 期。

② 同①。

③ 同①。

大领袖的崇敬和哀悼。当时正值国共合作时期，孙中山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对苏友好，中国也开展了追悼列宁的活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924年这部影片也在中国的北京、天津、广州等地放映，成为第一部在中国公开放映的苏联影片。1926年，苏联著名导演爱森斯坦拍摄的经典影片《战舰波将金号》在南国电影剧社支持下，在上海南市西门方浜桥共和影戏院放映，此为苏联故事影片在中国的首次放映，但当时并非公开放映，只有部分人看到。田汉在《我们的批判》中说：“何况因皮涅克之来，我们与苏俄驻上海领事林德交好，时有机会接近新俄艺术，又曾以林德氏之托将大导演家 Eisenstein（爱森斯坦）的轰动世界的杰作《波特姆钦军舰》（*Man-of-war Potemkin*，今译作《战舰波将金号》——引者注）私映于南国，供友人数辈欣赏，是为真正苏俄艺术影片入中国之始。看这个片子的时候，友人之间有右倾思想或艺术至上主义倾向的，对它的摄制与表演都极恭维，独不高兴它里面所含的煽动性。我虽然很承认这影片传来一种崭新的美与力，即反抗的群众（片中无主角）之美与力，但感伤的情调还浓厚地蓄在我的心头，右倾思想之包围，Bourgeois（资产阶级）模仿生活之沉酣等，使我不敢勇敢地主张这种新的美。”^①可见，苏维埃无产阶级的电影一同进步的文艺工作者见面就显示了它的魅力，即使是反对它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它的摄制与表演。

与苏联电影传入我国的同时，苏联电影工作者也开始来中国拍片。1925年夏季，苏联电影导演B·A·史涅伊吉洛夫参加了开辟莫斯科至北京航线的飞行，来到了中国。他在张家口拍摄了冯玉祥的军队，在北京拍摄了古代建筑、城市街道、官方招待会和庆祝典礼，也拍摄了一些北京城内和郊区居民生活的个别景象。为了“拍摄有助于苏联观众正确了解现代中国和蓬勃高涨的人民

^① 《田汉文集》（第14卷），第264、265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87年版。

革命运动的材料，从而揭露帝国主义者对起来斗争的中国人民的诽谤和歪曲”，^① 史涅伊吉洛夫来到了上海，当时正是五卅运动广泛开展的时候，在革命工人的保护帮助下，他拍摄了工人的艰苦生活，向人们介绍了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压榨；拍摄了工人的罢工、与工贼进行斗争的场面，展示了中国人民起来斗争的场面。后来，他又来到了广州，在革命政府的帮助下，“拍摄了政府机关，拍摄了国民政府、党和社会团体的杰出人物。我们拍摄了逮捕的工贼、反革命分子以及对他们公审的实况；我们还拍摄了解除叛乱分子的武装，已被占领的拒不投降的部队的指挥部以及个别被击败的军阀”，^② 也拍摄了不少有趣的日常生活场面及各种行业的制作与农民的劳动，城市和乡村的生活。后来他将这些素材编辑成影片《伟大的飞行与中国的国内战争》，于1925年底在苏联放映。此后又以“东方之光”之名在欧洲各国广泛上映，影片共六本，后三本介绍中国的情况，“影片第一次向全世界真实地报道了关于中国、关于英勇的中国人民已经开始了自己解放的斗争的情况”，^③ 产生了轰动效应。1927年，苏联电影导演雅可夫·布里奥赫来到了上海，拍摄了新闻纪录片《上海纪事》（五本），“纪录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一阶段上海劳动人民的生活与斗争。影片摄取了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工人纠察队的雄姿和示威游行，以及在工人武装起义后英、美、法帝国主义者增兵租界，在租界周围赶筑工事的惊慌失措的丑态；摄取了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对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进行疯狂屠杀的滔天罪行。它以尖锐深刻的对比手法描写了半殖民地化都市——上海 1927

① B·史涅伊吉洛夫：《1925年我是怎样在中国拍摄电影的》，《中国电影》1958年第2期。

② 同①，《中国电影》1958年第3期。

③ 同②。

年的生活”。^①影片于1928年在苏联上映。《伟大的飞行与中国的国内战争》和《上海纪事》的拍摄与在国外的放映，第一次向世界人民展示了中国革命的真实场景。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蒋介石政府与苏联断交，对中苏文化交流采取种种限制措施。但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左翼电影运动开展了对苏联电影理论、政策的译介，对苏联影片的宣传与评析。尤其是1932年中苏复交以后，苏联电影得以在中国公开放映，中国共产党利用各大报纸的副刊大力宣传。1927年7月，明星影片公司特刊第25期上刊登了罗树森的文章《俄国最近电影事业之调查》，是我国最早介绍苏联电影事业的文章。1930年6月，《沙仑》月刊登载了冯乃超翻译的卢那察尔斯基的《俄国电影 production 的路》。这是中共地下组织直接领导的刊物最初译介有关苏联电影的文章。同年7月，田汉主编的《南国月刊》第2卷第4期刊出了“苏俄电影专辑”，译介了卢那察尔斯基的《苏俄革命电影之现在及将来》以及美、英、日、德等国艺术工作者评析介绍苏联电影和苏联电影事业的文章。1930年8月1日，“中国左翼剧团联盟”成立，1931年1月，又改组成为以个人为单位参加的“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简称剧联）。1932年7月成立了“剧联”领导下的影评小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各种渠道，将上海各主要报刊的电影副刊掌握在自己手里，如《时报》的《电影时报》、《民报》的《电影与戏剧》、《中华月报》的《电影新天地》、《晨报》的《每日电影》和《申报》的《电影周刊》，等等，为译介苏联电影理论，宣传苏联电影做出了杰出贡献。夏衍后来回忆说：进入电影界后，我们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主要进行了四项工作，其中之一就是大力介绍苏联

^① 转引自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第145、146页，中国电影出版社1980年版。

电影，翻译、介绍苏联电影剧本及理论著作。^①

1932年6月，王尘无在《电影时报》上发表了《电影在苏联》一文，第一次在中国国内介绍了列宁论电影的理论及苏联共产党第十二次、十三次代表大会关于电影的决议的内容以及“电影应当成为掌握在党手里的共产主义教育与鼓动的有力工具”^②的主张。同年，夏衍和郑伯奇用黄子布和席耐芳的化名合译了普多夫金的《电影导演论》和《电影脚本论》，连载在《晨报》的《每日电影》上，后来又出版了单行本。1933年9月，上海《申报》副刊《电影专刊》上刊登了卢荻从保尔庭斯基著的《列宁与电影》摘译出的《列宁的电影论》，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列宁关于电影的见解。1934年5月4日创刊的《民报》电影副刊《影坛》先后发表过“普多夫金的《电影导演论》（陈鲤庭译）和《电影剧本论》（金光洲译）、《苏联的电影》（章泯译述）、《苏联电影事业》（袁文殊译）、《苏联电影最初十年史略》（鲁思译述）、《苏联电影十五年》（陈鲤庭译）、《苏联的新闻文献电影和科学教育》（赵铭彝译）、《苏联影话》（作者韦勃，记不清是谁的化名）、《苏联电影导演》专栏（未名、鲁思、萧崇素、许幸之等）、《苏联电影艺术史》（陈鲤庭译）和《苏联电影发展史略》（陈鲤庭译）等等”。^③

1932年12月中苏复交，从1933年2月6日起，苏联电影被允许在中国公开放映。此后，《生路》、《金山》《重逢》（又名《迎展计划》）、《我们来自喀隆塔特》、《伊凡》、《夏伯阳》、《静静的顿河》、《雪耻》、《爱与敌》、《傀儡》、《狂风暴雨》（即《大雷

^① 夏衍：《从事左翼电影工作的一些回忆》，《夏衍研究专集》（上），第218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② 于伶：《党在解放前对中国电影的领导与斗争》，《于伶戏剧电影散论》，第292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版。

^③ 鲁思：《关于“剧联”影评小组》，《左联回忆录》（下），第739、74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雨》)、《抵抗》、《北极探险》(即《车留斯肯号破冰船》)、《齐天乐》(即《快乐的人们》)、《铁马》、《无国游民》、《冰天雪地》、《马戏团》、《阿比西尼亚》等一大批苏联电影在中国上映。“剧联”的影评小组利用掌握的各大报纸的电影副刊几乎每片必评,介绍和宣传苏联电影。1933年2月16日,苏联有声电影《生路》在上海大戏院上映,左翼电影评论家欢呼这是“新艺术的登场”,不遗余力地进行介绍、宣传。《晨报》的副刊《每日电影》用整整三天的版面刊登了黄子布、洪深、沈西苓、史东山、陈鲤庭、尘无、程步高、张石川等人写的八篇评论和14篇短文,如郑伯奇就从题材的选择、创作方法、技术的教训等方面给以评价,最后指出:“《生路》公映了。为中国电影界应该指出了一条生路。革命不须夸张的英勇。字幕上满写着口号,不必一定能使观众跃动。问题在要抓住现实而前进。”^① 夏衍还以丁谦平的笔名翻译了《生路》的摄制台本,这是我国翻译的第一个苏联电影剧本。随着苏联电影的大量上映,影评人员采取集体执笔和个人执笔的方式给以积极推荐和评论。据统计,“单在《晨报》副刊‘每日电影’上,一九三三年内,共发表了五十五篇介绍苏联电影的文章”。^② 总之,30年代对苏联电影理论的翻译、苏联电影事业、政策的介绍以及苏联电影上映后对苏联影片的评析推荐,使中国电影界从苏联电影中吸取了养料,学到了新的创作方法、技巧,如电影中的蒙太奇手法。人们亲切地称苏联影片中的某些艺术手法为“苏联镜头”。同时苏联电影的上映也让中国人民加深了对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了解。

30年代不仅有苏联电影在中国的放映,中国电影也应苏联之邀,到苏联去参加影展。1935年,苏联为纪念其电影事业诞生15周年,于2月21日至3月2日在莫斯科举行国际电影展览

^① 郑伯奇:《两栖集》,第146页,上海书店1987年影印版。

^② 夏衍:《懒寻旧梦录》,第238、239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

会，邀请各国的电影公司、名导演及演员参加。苏联文化当局就此询问当时在苏联的中国记者戈公振关于中国电影事业发展情况，戈公振向其做了介绍，并推荐了影星胡蝶，苏联因此向中国电影界和胡蝶发出邀请。中国电影界选出了明星公司的制片人周剑云、摄影师颜鹤鸣、翻译孙桂籍、演员胡蝶，联华公司的制片人陶伯逊、编剧余一清、副导演黄谦七人组成的代表团，经过再三协商，选出了八部影片，即明星公司的《姊妹花》（有声）、《空谷兰》（有声）、《春蚕》（配音）、《重婚》（无声），联华公司的《渔光曲》（配音）、《大路》（配音），艺华公司的《女人》（无声）及电通公司的《桃李劫》（有声）。代表团成员分三批赴苏，前两批赴苏代表携带《渔光曲》、《大路》、《空谷兰》及《春蚕》等四部影片，参加了展览会。“二月二十八日，联华公司的《渔光曲》一片即上演于莫斯科的银幕，深得观众的赞许。惟苏俄人士对于《渔光曲》一片的批评就是配音太幼稚，而又采自西洋不成熟的歌曲，这是我国从事电影事业的人最应注意的一点”。^①《渔光曲》一片在这次有31个国家参加的展览会上获得了第九名荣誉奖，成为我国第一部获得国际荣誉的影片。周剑云夫妇和胡蝶是第三批赴苏的，他们于1935年2月21日随苏联迎接梅兰芳剧团的北方号专轮离沪，3月12日到达莫斯科。当时影展已经闭幕，胡蝶等所携带的影片未能参展，但是苏联方面召集了尚未回国的代表和苏联电影艺术界专业人士观看了他们带来的影片《姊妹花》和《空谷兰》。两片分别于3月24日、4月21日在莫斯科放映，也在列宁格勒放映过，都受到了好评。名导演普多夫金就《空谷兰》一片的导演问题向胡蝶提出了诚恳的批评，认为“这张片子的对白太多，且类乎演讲，这似是须要改良的”。^②

中国电影在苏联的放映，增进了中苏两国人民的进一步了

① 戈公振：《从东北到苏联》，第205页。

② 同①，第209页。

解，也让苏联电影界了解了中国的电影事业。正像多夫任科在3月24日观看完影片《姊妹花》后所说：“本人从前在欧洲，也看过许多西方人所摄制的中国影片。这些影片中，对于中国总加上许多曲解，并且所演的中国人，总是代表下流的角色。所以本人那时就想：中国恐怕是毫无电影事业可言吧？及至最近看到真正的中国电影，才觉得中国电影，不仅是摄制的技术好，就是表演也非常的好，何况表演《姊妹花》的主角胡蝶女士就在眼前呢？所以本人以为电影确是促进民族了解的最好的工具。”^①在当时，苏联的电影技术虽然不是最先进的，但比起中国来则是先进得多了。中国电影界通过这次访苏也学到一些苏联电影制作技术。当时访苏的影星胡蝶后来回忆说：“在当时的欧洲，苏联的电影片还不是最先进的，但比起我国来，摄影镜头的运用却已算得多姿多彩了，所以从苏联回来以后，在摄影镜头的运用方面向他们借鉴的地方也不少，以致当时有‘俄罗斯镜头’的流行语。”^②胡蝶等人还参观了莫斯科电影院、电影学校、制片厂，访问了列宁格勒制片厂，看了苏联影片，亲眼看到了苏联电影事业的情况。

八年抗战时期，苏联电影继续在中国放映，如《列宁在一九一八》、《马门教授》、《虹》、《忠勇巾帼》（即《她在保卫祖国》）、《大地怒吼》、《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列宁在十月》、《保卫斯大林格勒》等。中国进步人士一如既往地发表评论，宣传介绍苏联影片。戈宝权还节译了《列宁在十月》的电影剧本。夏衍以席耐芳的笔名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了《苏联电影与世界大战》一文，对苏联电影在世界大战后的发展充满信心。抗战开始后，苏联著名电影导演和摄影师罗曼·卡尔门，为了向全世界人民展

① 戈公振：《从东北到苏联》，第208页。

② 胡蝶口述、刘慧琴整理：《胡蝶回忆录》，第97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版。

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真实情况，来中国拍摄纪录片。1938年10月，他到武汉拍摄了武汉战役的场景，后来他又从武汉到湖南、广西、广东、重庆等地，排除国民党政府的种种阻挠，摄取他所需要的素材。为全面真实地反映中国抗战情况，卡尔门还去了陕甘宁边区，来到了延安，见到了毛主席，拍摄了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的活动。在他离开延安前一天，“又特地到毛泽东主席那里拍摄了主席的工作日，记录下毛主席看文件、写文章等工作情形”。^① 卡尔门回国以后，根据他在中国拍摄的素材，编辑成了两部大型纪录片《中国在战斗中》和《在中国》，向苏联人民介绍了中国人民的抗战情形。

4. 鲁迅与中苏版画交流

鲁迅在其一生中不仅翻译了俄苏的许多文学作品，促进了中苏文学交流，而且也十分热心地向中国人民介绍苏联的版画艺术。在他看来，中国的美术“因为倘没有鼓励和切磋，恐怕也很容易陷于自足”，“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道路”。^② 而在当时，“新俄的美术，虽然现在已给世界上以甚大的影响，但在中国，记述却还很聊聊”。^③ 所以鲁迅热心地将苏联美术，主要是版画介绍给中国。

1928年11月，鲁迅在上海发起成立了朝花社，和柔石、王方仁、崔真吾、许广平等人一起介绍东欧和北欧的文学，输入外国版画，扶植刚健质朴的新艺术。为介绍外国的版画，印制了《艺苑朝华》。1929年3月出版的第1期第3辑《近代木刻选(二)》中首次介绍了俄国版画家陀蒲晋斯基（多布任斯基）1922

① 萧三：《忆苏联电影摄影师卡尔门在延安的日子》，《萧三文集》，第206页。

② 鲁迅：《〈木刻纪程〉小引》，《鲁迅全集》（第6卷），第48页。

③ 鲁迅：《〈新俄画选〉小引》，《鲁迅全集》（第7卷），第34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年为俄国著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白夜》所作的插图《窗内的人》。1930年5月《艺苑朝华》第1期第5辑出版了《新俄画选》，内收苏联绘画和木刻13幅，5幅摘自日本人升曙梦的《新俄美术大观》，8幅从奥地利作家勒内·非勒普·米勒所著的《布尔什维克的精神与面貌》的插图复制而成。这些作品中有法孚尔斯基的木刻画《莫斯科》（莫斯科）、古泼略诺夫的木刻画《熨衣的妇女》、保里诺夫（保夫理诺夫）的木刻画《培林斯基》（别林斯基）、克拉甫兼珂的木刻作品《列宁的遗骸任人瞻礼》和《列宁的葬礼》等。鲁迅说：“这区区十二页，又真是实不符名，毫不能尽介绍的重任，所取的又多是版画，大幅杰构反成遗珠，这是我们所十分抱憾的。”^①但是这在苏联版画被介绍到中国的历史上却是重要的一页，“因为它是我国出版的第一本苏联版画集”。^②

1933年，鲁迅准备校印曹靖华所翻译的苏联名著《铁流》时，偶然在苏联《版画》杂志上看到苏联木刻家毕斯凯来夫为《铁流》所刻的插图，于是托当时在苏联的曹靖华代为搜寻，“《铁流》木刻的图，如可得，亦希设法购寄”。^③曹靖华费尽周折，多方打听，终于得到了《铁流》插图的木刻原版手拓木刻，虽然未能赶上同《铁流》原书一同付印，但却从此担负起帮助鲁迅搜集苏联版画的使命，于是有了《引玉集》在中国的出版。原来苏联的木刻版画原拓的定价很高，但苏联木刻家出于友情，只要中国的宣纸相酬。因为“印版画，中国宣纸第一，世界无比”。“手拓木刻，它是理想的纸”。“可是我们却买不来”。“可是我们木刻家呵，怎能忘情于中国宣纸呢？！”^④于是鲁迅买了许多中国

① 鲁迅：《〈新俄画选〉小引》，《鲁迅全集》（第7卷），第345页。

② 戈宝权：《中外文学因缘》，第331页，北京出版社1992年版。

③ 见鲁迅1932年2月24日致曹靖华信，《曹靖华译著文集》（第11卷），第506页。

④ 曹靖华：《哪有闲情话年月》，《曹靖华散文选》，第322页。

的各种宣纸和日本的“西之内”、“鸟之子”寄给曹靖华，再由他寄给苏联的木刻家们。苏联木刻家们又把木刻作品寄给鲁迅，正所谓“抛宣纸之砖，引木刻之玉”。通过这种方法，三年间鲁迅陆续得到许多苏联木刻家的木刻作品，于是在1934年出版了《引玉集》。定名“引玉集”，乃是“抛砖引玉”之意。鲁迅在《〈引玉集〉后记》中谈及出版这本木刻集的原因时说：“这些作品在我的手头，又仿佛是一副重担。我常常想：这一种原版的木刻画，至有一百余幅之多，在中国恐怕只有我一个了，而且秘之篋中，岂不辜负了作者的好意？况且一部分已经散亡，一部分几遭兵火，而现在的人生，又无定到不及薤上露，万一相偕湮灭，在我，是觉得比失了生命还可惜的。……我决计选出六十幅来，复制成书，以传给青年艺术学徒和版画的爱好者。”^①《引玉集》共收了11位木刻画家的作品60幅（实为57幅），其中有亚历克舍夫为高尔基的《母亲》所作的14幅插图，书前有陈节（瞿秋白）摘译的苏联楷戈达耶夫所作的《十五年来的书籍版画和单行版画》，介绍苏联版画艺术革命后的发展情况，书后有鲁迅所作的后记。鲁迅特地通过内山书店将原作寄往日本制版印刷，共精印了300部，很快就销售一空，后又再版了200部。1933年秋，曹靖华回国后，鲁迅与苏联木刻家有书信往来，木刻家们仍有作品寄给鲁迅，如1934年10月9日“午后得冈察罗夫所寄木刻十四幅”。^②

1936年7月，鲁迅又以三闲书屋的名义，编印出版了《死魂灵百图》。俄国艺术家阿庚、潘克莱夫斯基和梭可罗夫都曾为《死魂灵》作过插图，其中以阿庚的百图最为正确和完备。鲁迅这本《死魂灵百图》即收阿庚所画，培尔那尔特斯基所刻的《死魂灵百图》，并附有梭可罗夫为《死魂灵》所画的12幅插图。

① 鲁迅：《〈引玉集〉后记》，《鲁迅全集》（第7卷），第415页。

② 《鲁迅日记》（下卷），第90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

“俄国艺术家所作的最写实，而且可以互相补助的两种《死魂灵》插图，就全收在我们的这一本集子里了”。^①这本集子不是创作版画，而是复制的俄国的古典版画，“对于木刻家，恐怕并无大益”。^②但是翻印的目的，除了在介绍外国的艺术之外，“第一，是在献给中国的研究文学，或爱好文学者，可以和小说相辅，所谓‘左图右史’，更明白十九世纪上半的俄国中流社会的情形。第二，则想献给插画家，借此看看别国的写实的典型，知道和中国向来的‘出相’或‘绣像’有怎样的不同，或者能有可以取法之处”。^③

从1936年2月20日起，在上海举行了为期一周的苏联版画展，鲁迅前往参观。展览结束以后，良友图书印刷公司于1936年7月编印出版了一本《苏联版画集》。这本版画集当时即是请鲁迅代为挑选作品并写了序文。据赵家璧回忆，鲁迅在4月7日下午一点多钟到了北四川路的良友图书公司编辑部，“走上三层扶梯，显得有些气喘，但是没有休息一会儿，立刻要求把原画拿出来让他看。……他坐在面前的椅子上，一张张翻阅，仔细地推敲，研究，把选用的放在一边，不用的放在另一边。……他一方面钦佩原作技巧的高超，又担忧复制后多少要打一个很大的折扣。这天选画时间最初估计不过一二小时，但他一直看到下午五点钟才完毕。鲁迅先生对每幅版画都细细的玩味，先放近前看，然后又放远处看。有时脸上浮起一阵满意的笑容；有时凝神静思，长久地默不作声；有时也指出这幅画的优缺点，谦虚地征求旁人的意见。这天下午，他像完全进入了苏联版画家所创造的精神世界中，忘记了斗室里逐渐增加的闷热气氛，对旁人要他略作休息的要求，也毫不考虑，……等他把约近二百幅原画全部看

① 鲁迅：《〈死魂灵百图〉小引》，《鲁迅全集》（第6卷），第446页。

② 同①。

③ 同①。

完，时间已近下班，斗室中满屋太阳”。^① 后来鲁迅还曾计划出版木刻集《拈花集》，只是因病未能如愿。

为了介绍苏联版画，鲁迅除编印版画集，还曾在上海举行了三次版画展。1930年10月4日至5日，在上海北四川路的狄思威路（今溧阳路）812号日本人开办的购买组合（即供销合作社）第一店二楼举行世界版画展览会，鲁迅将所藏苏、德版画70多幅展出。内山完造在《上海漫语》中说：“在中国可以说是真正的第一次版画展览会”，“两天中间来四百人参观，可以说是旗开得胜。要是考虑到把这次展览会描绘成‘投向中国艺术界的一石之波纹’这点，那就可以说实在是获得了伟大的成功”。^② 1933年10月14日至15日借北四川路的施高塔路千爱里（今山阴路二弄）40号空屋举行德俄木刻展览会，展出作品一百多幅。1933年12月2日在老靶子路（今武进路）40号举行俄法书籍插画展览会，展品40幅，主要为苏联版画，杂以少量法国版画。

鲁迅不仅热心地把苏联版画介绍给中国，而且也把中国的版画艺术介绍给苏联。他给苏联版画家及木刻协会寄去中国的版画作品，1934年1月9日“寄莫斯科跋木刻家亚历舍夫等信并书二包，内计木板顾恺之画《列女传》、《梅谱》、《晚笑堂画传》、石印《历代名人画谱》、《圆明园图咏》各一部，共十七本”。^③ 1934年3月1日“以《北平笺谱》一部寄苏联木刻家”。^④ 1934年10月又将中国青年木刻家的作品集《木刻纪程》寄给苏联木刻家。“上午复 A. Kravchenko 信并寄《引玉集》一本。复 P. Ettinger 信

① 转引自马蹄疾、李允经：《鲁迅与中国新兴木刻运动》，第255、256页，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版。

② 吕元明译：《内山完造对鲁迅的回忆·鲁迅与版画》，《鲁迅在上海》，第14页，山东师范学院聊城分院中文系、图书馆1979年版。

③ 《鲁迅日记》（下卷），第870页。

④ 同③，第877页。

并寄《木刻纪程》一本，又二本托其分送 A.K. 及 A. Gonchrov”。^①

5. 徐悲鸿访苏与中国画展

1933年1月，徐悲鸿应法国国立外国美术馆邀请赴法举行中国画展，这次画展汇集了徐悲鸿自己和中国当代许多著名画家的作品数百幅，代表了中国近代绘画的各个流派。画展先后在法国的巴黎、德国的柏林和法兰克福、意大利的米兰等地展出，引起了强烈反响。英国和苏联都向徐悲鸿发出了邀请，徐悲鸿决定赴苏举办中国近代画展，因为在他看来“苏联毫无侵略其他国家迹象，又为首先对中国取消不平等条约之国家，大革命后，广向建设，人欲访问其邦不得，此次由苏联对外文化协会聘请，实乃极好机会”。^②

1934年5月7日，中国近代绘画展在莫斯科红场历史博物馆开幕，苏联各界要人及外交团都出席了开幕典礼。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会长阿罗舍夫及中国驻苏大使馆代办吴南如分别作了演说。画展很受欢迎，徐悲鸿自己曾说：“开幕后，参观者之踊跃为各处所不能比拟，有重来五六次者。尚有一可注意之事，即在他国画展中，参观者多半是知识分子，而在苏联，除知识分子外，大半是工人农民。彼等停立凝视，在一幅前探索玩味，苟遇我在，必寻根究底，攀问各画内容。彼等对美术兴趣之浓厚，不但中国工人所不及，虽各国时髦绅士亦难比拟……彼等认为自大革命以来，这是最有兴趣、最大规模之外国展览。”^③当时在苏联的记者戈公振也说：“俄人对于写实一派极为重视，尤注意新旧画家

① 《鲁迅日记》（下卷），第910页。

② 转引自吴作人：《徐悲鸿先生生平》，《中国美术》1979年第1期。

③ 转引自廖静文：《徐悲鸿的一生（我的回忆）》，第137、138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2年版。

不同之点，询问不厌其详。美术印刷如木版套色、芥子园画谱之类，亦颇引起兴趣，而赞叹不止。连日参观者络绎不绝，休息日尤为拥挤，各报皆载有图片甚多，并有赞美之评论。”^①在莫斯科画展期间，徐悲鸿应邀到苏联美术协会、美术院校等多处演讲，并与苏联著名画家涅斯切洛夫、版画家克拉甫钦科等交换了作品。苏联著名雕刻家梅尔库洛夫邀请他到家中做客，并以亲手所制的托尔斯泰和列宁的面模相赠。徐悲鸿又为中央大学艺术系与莫斯科博物馆商定，将该馆若干重要的雕刻用石膏翻成复制品。画展在莫斯科展出一个月后，又应邀到列宁格勒隐居博物馆展出。在列宁格勒，徐悲鸿结识了老画家李洛夫，对他的风景画《绿舞》称赞不已，还专门拜访了苏联老前辈画家涅斯切洛夫，认为他是可以同世界上最伟大的画家并列的。

列宁格勒画展结束后，徐悲鸿回国。徐悲鸿这次访苏举行画展，让苏联人民看到了中国近代美术的新成就，促进了两国美术界的交流。“在离开列宁格勒前，苏联美术界希望悲鸿能留下一部分中国画，悲鸿便请他们自己挑选。隐居博物院挑选了十二幅中国画，悲鸿又以中国现代名画家作品十五幅赠送莫斯科现代美术馆。莫斯科人民教育委员会开会决定赠给悲鸿以十九世纪俄罗斯著名作家及现代作家作品十三件。后来，由于国民党政府的阻挠和破坏，未能实现”。^②徐悲鸿从苏联带回了大量俄罗斯巡回派大师的作品的复制品，把俄罗斯巡回派介绍给了中国人民。后来他的学生回忆说：“徐先生此行带回大批油画印刷品，分送给他的学生，如列宾的《伏尔加纤夫》、《不期而至》、《查波罗什人写信给苏丹王》、《伊凡杀子》，苏里科夫的《枪兵临刑的早晨》、《莫洛卓娃的流放》等。这一大批现实主义的作品，使我们开阔

① 戈公振：《从东北到苏联》，第202页。

② 转引自廖静文：《徐悲鸿的一生（我的回忆）》，第137、138页。

了眼界，增添了对现实主义艺术的了解和信心。”^①

徐悲鸿苏联之行还促成了苏联版画在中国的展出。他在访苏之时，建议苏联艺术家到中国举行画展。1936年1月11日至18日，由中苏文化协会和中国美术家协会联合举办的苏联版画展在南京中央大学图书馆举行。2月21日，苏联版画展览又在上海举行，展品有木刻、石版、铜版画二百多幅。参观者络绎不绝，鲁迅也参观了画展，并写文章称赞道：“现在，二百余幅的作品，是已经灿烂的一同出现在上海了。单就版画而论，它不像法国木刻的多为纤美，也不像德国木刻的多为豪放；然而它真挚，却非固执，美丽，却非淫艳，愉快，却非狂欢，有力，却非粗暴；但又不是静止的，它令人觉得一种震动，——这震动，恰如坚实的步法，一步一步，踏着坚实的广大的黑土进向建设的路的大队友军的足音。”^②这对中国新兴的木刻艺术无疑是大有益处的。鲁迅还说：“克拉甫兼珂（A. kravchenko）的木刻能够幸而寄到中国，翻译介绍的也只有一幅，到现在大家才看见他更多的原作。他的浪漫的色彩，会鼓动我们的青年的热情，而注意于背景和细致的表现，也将使观者得到裨益。”^③

6. 梅兰芳访苏与京剧的演出

1930年，梅兰芳访美演出大获成功，增强了他对京剧走向世界的信心，于是有了欧洲之行的打算，准备把京剧介绍给更多的国家。1934年3月2日，中国驻苏大使馆代办吴南如因为筹备徐悲鸿组织的中国绘画展览会在苏联展出一事，与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艺术部主任乞尔略夫斯基商谈，谈话间提及梅兰芳欧洲之

^① 冯法祀：《一代巨匠 艺坛师表》，《徐悲鸿（回忆徐悲鸿专辑）》，第26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版。

^② 鲁迅：《记苏联版画展览会》，《鲁迅全集》（第6卷），第483页。

^③ 同^②，第482页。

行若经过莫斯科，苏联方面将如何接待，乞尔略夫斯基等人表示若梅兰芳到苏联演出，必受到热烈欢迎。后来在苏的中国记者戈公振极力促成此事。他曾就此征询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东方司帮办鲍乐卫的意见，鲍乐卫表示：“梅兰芳如能在赴欧之前，先来庶联表演，则我方将毫不迟疑，立缮请书，并可保证其表演必获成功。”^① 得此答复，戈公振即以私人资格电告梅兰芳，梅兰芳也表示愿意赴苏演出。自此以后，戈公振便充当了梅兰芳和苏联之间联系的使者，就演出事宜，征询双方意见，终于达成共识。12月底，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向梅兰芳发出了正式邀请书，梅兰芳即复电表示接受。

当时中苏两国因中东路的出卖关系冷淡，苏联希望借梅兰芳访苏加强两国的友好，对梅兰芳此次赴苏非常重视，专门成立了接待委员会，由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会长阿罗舍夫任主席。委员中不仅有中苏双方外交界要人，而且汇集了众多戏剧、电影、文学界的名流。梅兰芳对赴苏演出也是精心准备，以期再获成功。他请赴美演出时的总指导张彭春再任总指导兼团长。演出剧目也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又与张彭春、余上沅、欧阳予倩、谢寿康、田汉、徐悲鸿等进行讨论，最后选定了正剧为：《汾河湾》、《刺虎》、《打渔杀家》、《宇宙锋》、《虹霓关》、《贵妃醉酒》；副剧为：《红线盗盒》（剑舞）、《西施》（羽舞）、《麻姑献寿》（袖舞）、《木兰从军》（戟舞）、《思凡》（拂舞）、《抗金兵》（戎装舞）、《青石山》（武术剧）、《盗丹》（武术剧）、《盗仙草》（武术剧）、《夜奔》（姿态剧）、《嫁妹》（姿态剧）。

1935年2月21日，梅兰芳剧团一行24人乘苏联特意派来迎接的“北方号”专轮从上海启程，赴苏联莫斯科。3月12日，梅兰芳一行抵达莫斯科，受到了热烈欢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国家戏剧作家协会等都派代表迎接，中

^① 戈公振：《从东北到庶联》，第213页。

国驻苏大使馆代办吴南如、苏联驻华大使也前来欢迎。3月14日，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举行午宴和晚宴，欢迎梅兰芳。3月21日，苏联驻华大使亦举行晚宴招待梅兰芳等人。莫斯科的街头巷口到处贴着印有“梅兰芳”三个中国字的招贴和演出剧目的招贴，彼得洛夫卡街一带商店的玻璃橱窗里陈列着放大的梅兰芳便装照片和戏装照片，报纸也争相报道梅兰芳剧团的消息。据戈公振记述，当时“《真理报》、《消息报》、《莫斯科晚报》、英文《莫斯科日报》及法文《莫斯科日报》等大报，皆连续不断地登载关于梅氏的新闻和照片，以及关于中国戏剧的文字等。消息报屋顶上的流动电灯新闻，则逐日报告梅氏的消息”。^①戏票自3月5日出售，不到三天就已销售一空。由于苏联人民对梅兰芳剧团的热情欢迎，应苏方的要求，梅剧团将原来定在莫斯科演出五天，在列宁格勒演出三天，改为在莫斯科演出六天，在列宁格勒演出八天。

为了使苏联人民能够理解中国的戏剧艺术，梅兰芳在国内编印了三种英文书籍，带到苏联作赠送之用。一为《梅兰芳与中国戏剧》，书中有梅兰芳的剧照、小传，张彭春的《中国戏剧艺术之特色》，美国人托克·扬（Stark Young）的《梅兰芳艺评》，齐如山专论中国戏剧表演时的姿态、歌唱及台词，舞台上所用的象征性道具、服装、乐器及脸谱的文章；二为《梅兰芳在苏联所演六种舞之说明》，即六个正剧及副剧中前六出舞蹈；三为《梅兰芳在美国所得之评论集》，收录梅兰芳在美国演出时各报纸、杂志的部分评论文章。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为便于人们了解剧情，也编印了三种书籍，演出时在剧院出售。一为《梅兰芳与中国戏剧》，由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会长阿罗舍夫作序，包括苏联汉学家王希礼的《中国舞台上的伟大艺术家梅兰芳》、爱森斯坦的《梨园仙子》、剧作家特列杰亚考夫的《五亿观众》、张彭春的《京剧

^① 戈公振：《从东北到苏联》，第223、224页。

艺术概况》等四篇文章；二为《梅兰芳在苏联所表演之六种戏和六种舞之说明》，即前述第二种的俄文译本；三为《大剧院所演三种戏之对白》，即梅兰芳剧团此次赴苏最受欢迎的三出戏《打渔杀家》、《盗丹》、《虹霓关》的对白全文。

3月23日，梅兰芳剧团开始在莫斯科音乐厅演出。开演之前，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会长阿罗舍夫亲自向观众介绍梅兰芳，并申明梅兰芳此次赴苏演出对沟通中苏文化的重要性。此后，中国驻苏大使颜惠庆也向观众解释忠孝节义的含义，帮助他们了解剧情。第一天演出很受观众的喜爱，尤其是梅兰芳和刘连荣合演的《刺虎》更是深得苏联人民的喜爱，欢呼鼓掌要求梅兰芳出幕多次。从3月23日到28日，梅兰芳剧团在莫斯科演出了六天，每场都座无虚席。29日，著名导演爱森斯坦为了让更多的苏联人民看到梅兰芳的演剧艺术，征得梅兰芳的同意，把《虹霓关》中东方氏（梅兰芳饰）和王伯党（朱桂芳饰）对枪一场歌舞拍摄成了电影。此后，梅兰芳剧团在列宁格勒文化厅演出了八天，同样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从列宁格勒回到莫斯科以后，应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邀请，梅兰芳于4月13日在莫斯科大剧院又举行了一次告别演出，剧目是此次访苏演出最受欢迎的《打渔杀家》、《虹霓关》、《盗丹》。大剧院是苏联戏剧界的演出圣殿，专演歌剧及芭蕾舞剧，中国戏剧能在此演出，足见苏联方面给予其崇高地位。苏联党政领导人和文化界知名人士都来观看演出。告别演出受到空前热烈的欢迎，梅兰芳被观众的掌声请出谢幕达18次之多。

梅兰芳在莫斯科演出时，“除戏剧界以外，苏联政府要人，如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长李维诺夫、国防委员会委员长伏洛罗夫、教育委员会副委员长布勃洛夫，大文学家，如高尔基，亚列克塞·托尔斯泰等人，均前往观剧。李

维诺夫夫人每日皆往观剧，并掷花束，以示敬慕之意”。^① 梅兰芳还收到来自各方的赞美信函和纪念品。在梅兰芳演出期间，许多女士穿上中国古装绣花衣服，许多戏迷或是买不到票的人为一睹梅兰芳的风采，围在戏院门口，当局不得不动用警察骑着马来驱散才能开出一条路。马路上的小孩子见到中国人就喊“梅兰芳”。据当时在莫斯科的中国影星胡蝶后来回忆：“我初到莫斯科的头一两天，因为报纸还不曾将我的照片在报上发表，所以当我在街上游玩或买东西的时候，许多人都指着我说梅兰芳。”^② 由此可见梅剧团演出的影响之大。莫斯科各大报纸更连篇累牍地登载评论梅兰芳演剧的文章。如莫斯科《消息报》（3月23日）载政论家拉狄克的文章，赞美梅兰芳：“此人也，以其与吾人生疏之语言，扮演旦角，能以如魔之艺术，迷醉听众，同时能产生栩栩欲生而令人置信之形象焉。梅氏眉目传情，及其手部与全身之苗条姿态，令人忘其一切，均与吾人不同。以梅氏之天才，而能传导千百年来之思想，令其得为一般人所了解。”^③ 《红报夕刊》（4月9日）上艺术家拉德洛夫的文章不仅赞美梅兰芳的表演艺术，而且指出其可供苏联借鉴之处：“如《虹霓关》一剧中，寡妇与仇人之间之交战，而间以美妙的热情之‘闭音’，主题变化之丰富、完美，实令人敬佩不止。剑术与舞蹈两者交综错合之各种姿势，诚可叹为观止。此种提高艺术家创作力要求之新方法，诚足供吾人借鉴也。”^④

梅兰芳在苏联期间，除演出外，还参观了工厂、学校、名胜古迹，并受各剧院之邀请观看了许多戏剧、歌剧和芭蕾舞剧。他还参观了戏剧学校、电影学院和莫斯科历史博物馆举办的苏联

① 戈公振：《从东北到苏联》，第228、229页。

② 胡蝶口述、刘慧琴整理：《胡蝶回忆录》，第100页。

③ 戈公振：《从东北到苏联》，第231、232页。

④ 同③，第233、234页。

17年戏剧艺术展览会，并应邀到艺人俱乐部讲演中国的戏剧艺术。正如他自己所说，通过这些，“我一方面想把中国的戏曲介绍到国外，一方面也是想借此观摩外国的戏剧艺术丰富我们的民族艺术”。^①

梅兰芳苏联之行无疑促进了中苏戏剧交流。当他在莫斯科演出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常去观看。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也邀请梅兰芳去看他自己导演的话剧，而且还看了一些在当时进行改革实验的演出。梅兰芳后来回忆时说：“这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经验交流。苏联的朋友们毫无保留地把他们的工作成果在一个中国演员前面展示出来；同时也对我的不成熟的演出给了鼓励和评析，特别是史坦尼斯拉夫斯基老先生给我的鼓舞和启发，直到今天，还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②1935年3月30日，梅兰芳拜访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双方谈论了中国戏曲的源流和发展情况。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特别注意梅兰芳表演当中的“手”的姿态，询问其在中国的传统戏曲当中的源流和训练方法以及它所代表的复杂人物感情。梅兰芳就其所知给予了回答。双方都十分重视表演中的“整体性”。苏联大戏剧家梅耶荷德十分钦佩梅兰芳的表演艺术，认为梅兰芳剧团对苏联从事新戏剧的人们影响非同小可，他说：“我现在正要重新排演我的一出旧戏——格里鲍陀夫的《智慧的痛苦》。当我看过梅兰芳的两三出戏再来到排演场，我就觉得，我应该把我原先做过的统统来一番改造。”^③他也十分欣赏梅兰芳的“手”的表演艺术，直率地说：“看过梅兰芳的表演再到我们的所有剧院去走一遭之后，……可以把我们所有演员的手

① 梅绍武：《梅兰芳和高尔基》，《文艺报》1984年第1期。

② 梅兰芳：《史坦尼斯拉夫斯基印象记》，《文艺月报》1953年第8期，第32页。

③ 《论梅兰芳的表演艺术——一九三五年四月十三日在全苏对外文化协会召开的戏剧座谈会上的讲话》，A·格拉特柯夫辑录，童道明译编《梅耶荷德谈话录》，第248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86年版。

都砍去得了，因为它们毫无用处。”^① 1935年4月14日，梅兰芳假座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邀请苏联文艺界人士开了一个座谈会，与他们进行交流。苏联戏剧大师聂米洛维奇·丹钦柯主持会议，并给予中国戏曲艺术以很高的评价。著名电影导演爱森斯坦也谈了他的感想：“起初我听说东方的戏剧都是一样的，我曾经看过日本戏，现在又看了中国戏，才明白日本戏与中国戏之不同，犹如罗马之与希腊、美国初年之与欧西。在中国戏里喜怒哀乐虽然都有一定的程式，但并非呆滞的。俄国戏剧里的现实主义原则的所有优点，在中国戏剧里面差不多都有了。……俄国的电影，将采用中国戏的方法来丰富表演。”^② 当时在场的瑞典戏剧导演斯约堡也同意电影可以从中国艺术当中学到许多东西。戏剧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梅耶荷德也都发言赞美梅兰芳的表演。剧作家谢·特莱杰亚考夫则认为，梅兰芳剧团的演出，对于在西方特别盛行的对中国艺术持“异国情调”的看法，打开了一个有决定意义的缺口。可以说梅兰芳访苏不仅促进了中国戏剧艺术走向世界，吸取其他民族艺术精华，加速自身发展，而且也对苏联戏剧的发展做出了有益贡献。

四、俄苏的汉学研究

1. 史学研究

俄国的汉学研究源远流长，十月革命前就已有了相当的发展。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十分重视中国学的研究。他本人的

^① 《论梅兰芳的表演艺术——一九三五年四月十三日在全苏对外文化协会召开的戏剧座谈会上的讲话》，A·格拉特柯夫辑录，童道明译编《梅耶荷德谈话录》，第249页。

^② 梅兰芳：《我的电影生活》，第55页，中国电影出版社1984年版。

著作中直接涉及中国问题的就有八十多篇，其中五十多篇写于革命前。在他的指示下，1920年在彼得堡和莫斯科成立了东方学研究所，1921年成立了全俄东方学家学会。1928年以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国学研究室为基础，成立了中国问题科学研究所，这是苏联中国学的主要研究中心之一。1930年在列宁格勒成立了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此外，还出版了《东方》、《现代东方》、《中国问题资料》、《革命的东方》、《殖民地民族问题资料》等刊物。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苏联不仅帮助中国建立起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而且在中国革命的初期还直接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并派顾问人员来华。大革命失败以后，苏联通过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进行指导，由于它对中国社会缺乏深刻具体的了解，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出现了巨大的失误，但是它在中国革命初期的贡献还是不应抹杀的。正是这种现实斗争的需要使苏联中国学研究重视现实问题，特别注意研究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在古代史方面，杜曼（Л.И.Думан）写了《十八世纪末清政府在新疆的土地政策》、《中国古代史纲（公元前十二世纪到公元一世纪）》。此外，他还写了的《中国近代史（讲义）》，于1938年在列宁格勒出版。西蒙诺斯卡娅（Л.В.Симоновская）写有《十七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农民战争》、《中国古代国家的产生和发展》等文章。近现代史方面的专著和论文很多，涉及的范围也很广，包括远东国际关系、农民土地问题、工人运动、中国社会经济、中共的苏区、中国的革命斗争及具体的斗争事件（如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广州公社、抗日战争中保卫上海的斗争等）及具体人物（如孙中山）、国民党、近现代政治等各个方面，出现了伊万诺夫（А.А.Иванов，笔名 А·伊文）、坎托罗维奇（А.Я.Канторович）、卡拉—穆尔扎（Г.С.Кара—Мурза）、克雷莫夫（А.Г.Крымов 郭绍堂）、米夫（П.А.Миф）、科瓦廖夫（Е.Ф.Ковалев）、叶菲莫

夫 (Г. В. Ефимов) 等一大批中国学家, 他们为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做出了杰出贡献。如伊万诺夫 (1885—1942 年), 曾于 1917 年至 1927 年在北京大学任教, 关于中国农民问题写了《中国的农民》及《红缨枪 (中国农民运动)》, 关于中国革命斗争的著作有《中国解放斗争的第一阶段》、《1927—1930 年中国游击队活动概况》、《苏维埃中国》等。克雷莫夫对中国土地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写了《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中国土地危机的加深和农民运动的高涨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中国苏区共产党的土地纲领和土地政策》等文章。科瓦廖夫也发表了《北满的土地危机》、《战争对中国土地关系的影响》、《中国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国民党中国的土地危机》等以及几篇关于土地问题的文章。1947 年, 他又出版了《中国的地租和租佃关系》。坎托罗维奇 (1896—1944 年), 主要研究列强对旧中国的经济侵略, 著有《中国重工业中的外国资本》、《中国铁路中的外国资本》、《前资本主义时代的中国社会关系体系》、《美国参与瓜分中国的争斗》等。卡拉—穆尔扎 (1906—1945 年), 对中国苏区颇有研究, 著有《中国苏区的文化革命》、《对中国苏区第六次进攻的结束》、《中华苏维埃是革命民主专政》。此外, 还著有《中国中世纪讲义》、《中国近代史纲》(第 2、3、5 册)、《太平军·中国伟大的农民战争和太平天国 (1850—1864)》等。米夫 (1901—1939 年), 主要研究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 曾于 1927 年来中国, 并出席中共五大, 写有《中国农民问题》、《中国共产党和危机时刻》、《中国革命》、《中国发生了什么》、《伟大的十月革命和中国》等著作。

2. 文学研究

除了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以外, 苏联对中国文学研究也有了进一步发展。文学方面的研究首推苏联中国学家阿列克谢耶夫 (В. М. Адекеев, 1881—1951 年)。他 1902 年毕业于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 1916 年以《中国诗论·司空图〈诗品〉》的论文获得

硕士学位。1923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1929年获语文学博士学位，同年又当选为院士。他是苏联中国学的奠基人，曾多次来华，对中国的历史、文化、语言、文学等多方面都有研究，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1916年，阿列克谢耶夫的《司空图〈诗品〉（翻译与研究）》在彼得格勒出版，这是俄国第一部研究中国古典诗歌和诗论的力作。在此之前，俄国人多从法文转译中国古典诗歌，国内几乎没有准确的中国诗歌译本。阿列克谢耶夫不仅按二十四品的顺序，把《诗品》译成俄文，而且对其进行了详细的注释和分析评论，附有人名、书名词语索引，收录了一千多条出自《诗品》的词语和成语，并且介绍了司空图的生活经历。他还把司空图的《诗品》与此前钟嵘的《诗品》、李嗣真的《画后品》以及此后的黄钺的《画品》、杨景增的《书品》、袁枚的《续诗品》进行比较，肯定其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价值。此外，他还指出了司空图的《诗品》在世界文学史中占有重要地位，认为其与罗马诗人贺拉斯的《诗艺》和法国诗人布瓦洛的《诗的艺术》不相上下，因此他说：“司空图的长诗在世界文学上应当占有一个极其荣耀的席位。”^①可以说他是中西比较诗学研究的先驱。1928年，阿列克谢耶夫选编的《中国古代抒情诗选》问世。1944年，他又在《苏联科学院院报》（文学语言类）第3卷第4分册上发表了《罗马人贺拉斯和中国人陆机论诗艺》，对贺拉斯的《诗艺》与陆机的《文赋》进行比较研究，认为：“贺拉斯在《诗艺》里所写的内容，‘为’诗人的比‘论’诗人的更多，在‘论’诗人这个题目上，陆机用的功夫比贺拉斯更大。”^②

阿列克谢耶夫一生热衷于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写了许多有关中国古典文学的论文，尤其在翻译中国古典小说《聊斋志异》上

① 转引自李明滨：《中国文化在俄罗斯》，第61页，新华出版社1993年版。

② 同①。

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他的译作出版之前，巴拉诺夫（И. Баранов）在1915年第2期的《亚洲杂志》上发表了《跳神》、《促织》、《太医》、《狐谐》、《珊瑚》、《孝子》等八篇译文。1921年，伊尔库茨克大学的青年讲师帕施科夫（Б. Пашков）发表了《〈聊斋志异〉（目录学试析）》的文章，介绍蒲松龄的生平，将《聊斋志异》的内容分为儒、释、道及非宗教性质几类，并提供了其各种文字（满文、德文、英文、法文）译本的名单。1922年，阿列克谢耶夫的第一个《聊斋志异》选译本——《狐媚集》，由彼得堡国家出版社出版，并列入《世界文学丛书》。书中选译了《婴宁》、《狐梦》、《狐女》、《潍水狐》、《丑狐》、《狐妻》等29篇小说。次年，他的第二个《聊斋志异》选译本——《僧术集》，由莫斯科及彼得格勒国家出版社分别出版。书中包括《崂山道士》、《画壁》、《画皮》、《小谢》、《白秋练》等43篇译文。1928年，他的第三个《聊斋志异》选译本——《异怪集》，由列宁格勒思想出版社出版，选译了《妖术》、《小翠》、《封三娘》、《偷桃》等21篇小说。1937年，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科学出版社分别出版了阿列克谢耶夫的第四个《聊斋志异》选译本——《异人故事》，收有《侠女》、《云萝公主》、《红玉》、《青梅》等62篇小说。总之，从1922年到1937年，阿列克谢耶夫一共翻译了一百五十多篇蒲松龄的短篇小说。正如苏联汉学家艾德林所说：“阿列克谢耶夫的译文是高超的，它能够充分传达原作的意思和精神，能够把原作中各种具有独特性格的艺术形象再现出来。阿列克谢耶夫为译文所作的注释，具有独立的学术价值。对《聊斋》的翻译和注释，是阿列克谢耶夫一生的重大贡献。”^①不仅如此，阿列克谢耶夫对《聊斋志异》的研究，也做出了很大贡献。他在选译本序言中介绍蒲松龄的生平、学识、艺术风格，研究蒲松龄的创

^① 转引自王丽娜：《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第234页，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

作，分析其作品中的人物，如狐仙、书生、道士、和尚等。他还在1934年发表了题为《论中国古典文学中民主化的历史（关于〈聊斋〉中的故事）》的文章。

阿列克谢耶夫的学生苏联汉学家瓦西里耶夫（王希礼，Б.А.Васильев）在中国古典文学的方面也颇有研究。他1899年生于彼得堡一个职员家庭。1922年毕业于彼得格勒大学社会科学系中国班。1935年获文学理论副博士学位，同年升任教授。他曾在1924—1925年、1927—1930年两次来华，并与曹靖华相识，成为挚友。1924年，他在莫斯科《东方》杂志第4期上发表了《俞伯牙摔琴谢知音》。1929年又在莫斯科《东方戏剧》杂志上发表了《中国戏剧》一文，“详细地介绍了中国戏曲的种种特点，角色行当、脸谱、服装、身段、剧场形式等等。但对剧作本身谈得较少。重要的是，这篇文章在叙述中国戏剧发展史的时候，已经参照了王国维、刘师培、宋春舫等人的论著”。^① 他还将《空城计》译出，附于文后。1931年，他又发表了《聊斋选译与探源》一文。1935年，他的《中国九世纪小说〈李娃传〉》收入《东方》论文集第一集。30年代，他还写了一篇论述《水浒》小说中所表现的儒家思想的论文，可惜未能发表，手稿现存苏联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院士档案。此外，据李福清介绍，1921年在哈尔滨出版的俄文本《中国的传说》中，收有《借东风》、《空城计》、《诸葛亮之死》、《关羽之死》、《华佗之死》等13篇三国故事。1927年，列宁格勒思想出版社出版了列文译自法文的《侠义风月传》（《好逑传》）。阿·伊文也翻译了《儒林外史》前八回，连载于1929年出版的《青年近卫军》杂志第18、19、20、21期上。在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方面，1911年，叶戈里耶夫、马尔科夫合编的《中国之笛（中国古典诗集）》，由青年联盟出版

^① [苏]李福清著、田大畏译《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在苏联（小说·戏曲）》，第65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

社出版。休茨基译的《中国七至九世纪抒情诗集》，1923年、1927年由莫斯科——彼得格勒国家出版社出版。1935年，他又翻译了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同年，他所译的《古诗·为焦仲卿妻所作》，刊载于《东方》第1辑上。艾德林翻译的《白居易绝句集》分别于1946年、1949年两次出版。1946年的译本上还有郭沫若所作的序言。

在中国现代文学方面，苏联对鲁迅的作品介绍最多。1925年，瓦西里耶夫（王希礼）于河南开封在曹靖华的帮助下翻译了《阿Q正传》，1929年在列宁格勒出版，除《阿Q正传》外，还收有《孔乙己》、《故乡》、《社戏》等短篇小说。除此以外，他还发表了几篇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章，如1932年在《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丛刊》第1册上发表了《帝国主义时代中国文学的外来影响》，1934年又在该刊的第4册上发表了《中国的左翼文学》。鲁迅逝世后，苏联为纪念他，由苏联科学院东方学院出版了《纪念鲁迅》一书，收有追悼鲁迅的文章以及鲁迅的短篇小说和杂文数篇。苏联国立文学出版社根据读者的要求，出版了由萧三校订、法捷耶夫润色的《鲁迅选集》。书中收有《呐喊》、《彷徨》两本书中几乎全部作品和《野草》、《坟》里面的几篇，还有一篇萧三写的关于鲁迅的生平、创作、思想、斗争历史的文章。1945年，罗果夫主编的《鲁迅全集》，由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出版。他还主编了《鲁迅小说、杂文与书简集》，书后附有许寿裳、许广平等人写的回忆文字。该书于1949年由上海时代出版社出版。除鲁迅的作品外，伊文翻译了茅盾的小说《子夜》的部分篇章，题名为《罢工之前》，发表在1934年的《青年近卫军》第4期上。1935年《国际文学》3期、4期合刊上刊登了普霍夫从英文转译的《子夜》中的一章《暴动》和涅克拉索夫翻译的《春蚕》。同年，茅盾的小说《动摇》被译成俄文，由列宁格勒国家出版社出版。1937年，《子夜》的全译本也由该社出版。1935年，第11—12期的《国境线》上刊登了由波兹涅耶娃

(Л. Д. Позднеева) 翻译的丁玲的小说《水》。1949年，她又将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译成俄文，在莫斯科出版。此外，丁玲的《青年无产者》、《某夜》、《从夜晚到天明》、《消息》、《礼物》等也都被译成了俄文。1937年，巴金的短篇小说在苏联《在国外》杂志上连载。1939年，张天翼的小说《华威先生》被译成俄文。1935年，萧三编选的俄文版中国短篇小说集《中国》在苏联哈尔科夫出版。1944年，莫斯科国家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短篇小说集》，收有鄂山荫译的茅盾小说《林家铺子》和波兹涅娃译的老舍的战时短篇小说《人同此心》。

除小说以外，中国诗人萧三的诗歌也被译成俄文。萧三于1927年至1939年留苏期间创作了大量诗歌，许多被译成俄文。1930年，他写了第一首诗《命该如此》，由俄国翻译家兼诗人A·罗姆译成俄文，发表在1931年的《世界文学》第4期上。1931年，他的长诗《南京路上》又由其译成俄文，刊登在《共产国际灯塔》上。这首诗还被苏联教育部编入教科书。此外，萧三还写了《敬礼了，兄弟们！》、《棉花》、《纪念广州公社》、《赵五嫂打定主意了！》、《蒋介石行军歌》、《血书》、《瓦西庆乐》等，都被译成俄文在苏联发表。30年代，萧三的诗作还被译成苏联少数民族语言广为流传。萧三的俄文版诗集《诗歌》、《为了苏维埃中国》、《湖南长笛》等分别于1932年、1934年、1940年在苏联出版。不过，在建国前，中国现代文学作品译成俄文的数量还是极少的。正如郭沫若所说：“由苏联介绍到中国来的作品可以说洪流；由中国介绍到苏联去的作品似乎只有一条溪涧。我们知道，鲁迅、茅盾、丁玲和若干东北作家的作品是被翻译了，而且是备受欢迎，但无论从质或量上来说，是断难同俄国文学成对比的。”^①

^① 郭沫若：《中苏文化之交流》，第4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49年版。

3. 艺术、哲学、汉语及其他

在艺术方面，杰尼克（Б.П.Денике，1885—1941年）著有《中国艺术简史》、《论吐鲁番的文化和艺术古迹》。卡津（В.Н.Казин）著有《封建中国的文化和艺术·展品指南》，克韦尔非尔德（1877—1949年）1937年出版了《中国艺术的对象》及《中国艺术的现实主义特征》。在哲学方面，彼得罗夫（А.А.Петров，1907—1945年）主要研究中国古代哲学，着重研究王弼，主要著作有《王弼（226—249）·中国哲学史片段》、《中国哲学史纲》、《俄国资产阶级中国学中的中国哲学》。1940年，马拉库耶夫（А.В.Маракуев）发表了《〈阴符经〉是中国哲学史的一页》的论文。不仅对《阴符经》进行了翻译和注释，还对西方的译文和研究做了评述。1948年，杨兴顺在《哲学问题》上发表了《“生命哲学”——帝国主义反动派在中国的思想武器》的文章。

苏联在汉语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编有许多汉语教科书，如《汉语白话课本》（列宁格勒东方学院，1935年）、《一年级汉语教科书》（第1册，莫斯科，1944年）、《汉语口语教科书》（莫斯科—列宁格勒，1935年）、《汉语军事文选》（二年级教材，莫斯科，1942年）、《汉语教科书》（第1卷—第2卷，1946年），还出版了《简明汉俄辞典》（莫斯科，1935年）、《汉语语法》（列宁格勒，1931年）、《简明华俄辞典》（莫斯科，1935年）、《华俄辞典》（莫斯科—列宁格勒，1948年）等工具书。苏联的中国学者也十分注意研究中国的文字改革运动，关注汉字的拉丁化，如1932年《苏联科学院东方学院论丛》第1卷上，就发表了《汉字的拉丁化问题》。

除此以外，苏联中国学者对蒙古、西藏、满族、西夏等的历史、语言、文学、艺术做了大量研究。1932年，苏联出版了《中国书目·关于中国俄文书籍和论文目录（1730—1930）》，对百年来的俄文中国学文献进行了系统整理。1940年又出版了

《中国：历史、经济、文化和争取民族独立的英勇斗争》，堪称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中国学著作。“阿列克谢耶夫称这本书是用俄文写成的关于现代中国和历史中国的第一部教科书”。^① 总之，民国以来到 1949 年以前苏联中国学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从 1917 年到 1949 年，出版近一百部研究中国问题的各种书籍。”^②

^① [苏] B·C·米亚斯尼科夫：《苏联中国学的形成与发展》，《外国研究中国》(1)，第 54 页，商务印书馆 1978 年版。

^② 同①，第 55 页。

第四章 中英文化交流

一、罗素与中国

1. 罗素的中国之行

罗素 (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 年) 是 20 世纪英国最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 也是一位成就卓著的数学家、逻辑学家和世界和平运动的积极倡导者, 他的思想和著作对英国乃至世界文化都有着巨大的贡献和推动。

在数学上, 罗素曾从事过数理逻辑和数学基础的研究, 在 20 世纪的头几年里, 他专心撰著了《数学原理》(三卷本, 与怀特海合著), 试图建立逻辑主义数学体系, 把整个数学归结为逻辑学, 取得了重大成果。以他命名的“罗素悖论”, 曾对 20 世纪的数学基础产生过重大影响。

在哲学本体论上, 罗素继承了英国传统的经验主义哲学, 吸取了现代自然科学的有益营养, 提出了“中立一元论”的学说, 认为世界的本源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心”或“物”, 而是无数中立于“心”和“物”之间的“事实”; 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 他提出了“逻辑原子论”和“逻辑分析方法”, 认为作为世界本源的“原子事实”可以通过“逻辑分析”的方法来认识, 并由“原子命题”来描述。他认为全部哲学的任务就是通过“逻辑分析”来获得“原子命题”并由“原子命题”来组成人类的全部知识。概而言之, 罗素哲学是一种逻辑实证主义, 它对 20 世纪西方哲

学的影响非同小可。他的哲学思想体现在《哲学问题》、《心的分析》、《物的分析》、《西方哲学史》、《我的哲学发展》等大批著作中。哲学是罗素的立脚点。

在政治思想领域，罗素坚持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批判，揭露资本主义的无情竞争给社会和生产力的浪费与破坏，资本家的残酷剥削给工人阶级带来的苦难，资本主义制度下政治民主的不彻底性，资本主义分配制度的不公平性。作为人道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他着重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对人性的扭曲和对和平主义事业的破坏。与此相应，罗素坚持“基尔特社会主义”，主张以公有制取代私有制，消灭资本对人的奴役，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同时主张社会主义要走和平民主的途径，反对暴力革命。

作为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思想大师，罗素并不满足于埋头书斋的学者生活。他以丝毫不逊于哲学思辨的热情积极投身于反对民族之间的战争，反对帝国主义以强凌弱和侵略扩张的政策。一战期间，他参加并领导了积极反战的“拒服兵役联谊会”，到英国各地进行巡回演说，宣讲战争对人类文明的破坏。一战后，他批评各国政府一面医治战争创伤，一面又在加紧备战。二战期间，他修正了自己反对一切战争的观点，提出“为和平而战”，坚决反对法西斯。二战后，世界赢得了新的和平，但原子武器的出现又极大地困扰着罗素的心灵。从那时起直到他离开人世，年迈的罗素几乎将全部精力投入到要求核裁军的事业中，成为坚决反对核武器与核战争的杰出先驱者。

总之，罗素是本世纪一位关注社会现实，具有人类良知的思想巨人。

对这样一位享誉世界的西方思想大师，五四时期刻意追求西学的新知识界的人们理所当然地给予了极大关注。1919年至1920年，徐彦之、张东荪、沈雁冰、张崧年、高一涵、余家菊等人先后在《新潮》、《解放与改造》、《新青年》、《东方杂志》等重要报刊上发表了关于罗素著作与生平的大批译介文章。在他们

看来，罗素是一位“最有根底的改造论者”，他痛恨现存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并从大哲学家的角度提出了美妙的社会改造方案，“极能洞烛社会之根本，现代的病源的”；^① 罗素又是一位力主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在国际事务中主持公道、尊重被压迫国家和民族的正直的知识分子，具有高尚的人格；同时，他还是“现代世界至极伟大的数理哲学家”，他的“逻辑的解析的方法”在现代哲学界和思想界“最有影响”。因此，无论从指导中国的社会改造运动、声援支持中国的反帝运动，还是从吸收数理哲学的有益营养丰富中国哲学等各方面讲，罗素都被当时中国新知识界认为是“今日我国所亟亟需要者”。

中国新知识界对罗素的这些颂扬得到正在中国讲学的杜威的首肯。杜威将罗素与实用主义哲学的奠基人詹姆斯和“生命哲学”的创始人柏格森并列为“世界三大哲学家”。他认为罗素的“理论哲学”高深无比，自己也没有能力完全理解。^② 杜威是名震西方的大哲学家，此刻在中国思想界知识界声誉极高，他对罗素的介绍无疑更增添了罗素在中国的分量。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20年5月，以梁启超为首的新学会、尚志学会、中国公学等学术团体联合北京大学共同邀请罗素来华讲学。^③

1920年10月12日，罗素偕情人勃拉克小姐抵达上海。翌日，设在上海的江苏省教育总会、中华职业教育社、新教育共进社、中国公学、时事新报社、申报社、基督教救国会等七个社团

① 张崧年：《罗素与人口问题》，《新青年》第7卷第4号，1920年3月；《罗素》，《新青年》第8卷第2号，1920年10月。

② 1920年3月23日上海《民国日报》。

③ 关于罗素来华讲学的邀请者，当时的新闻界及后来的学术界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认为是讲学社，有人认为是北京大学，也有人认为是新学会、尚志学会、中国公学联合北大共同邀请，似以第三说较准确。讲学社成立于1920年9月，此后，罗素讲学事宜才由它主办。罗素来华的主要费用由讲学社董事王敬芳、胡汝麟等负担。

联合在大东旅社举行了热烈的欢迎晚宴。席间，罗素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希望中国开辟一条新路，不要盲目抄袭别国，要警惕西方近代的商贾主义。在谈到中国的改造问题时，他提出各种改造之中最应注意以教育为第一。这是罗素来华后的第一次演说，由赵元任翻译。此后，罗素又在中国公学、江苏教育总会分别做了“社会改造原理”、“教育的效用”两场演说。

在结束上海的短暂停留后，罗素由赵元任、傅铜^①等陪同，游览了杭州西湖。那里的美丽风光与百姓的乐观善良给罗素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他写信给他在英国的恋人，称赞中国“比意大利更古老，更富有人情味，这里风景如画，人民乐观，和蔼可亲，比任何我知道的国民更爱笑。他们像18世纪的法国人那样机智”。他表示要尽力帮助中国。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他还打算学好中文。^②游完西湖，罗素于10月19日又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做了一场关于教育问题的演讲，之后折回上海，继抵南京，应中国科学社之邀做了一场题为“爱因斯坦引力新说”的演说。10月20日，罗素一行乘船沿长江逆流而上，经汉口，于10月26日抵达长沙。在那里，他受到极其隆重的接待。为了报答东道主的盛情，罗素于10月26日下午、晚上和27日上下午连续做了四场报告，题目为“布尔什维克与世界政治”。27日晚，湖南省长谭延闿亲自出面宴请了罗素及正在长沙出席湖南省教育会议的杜威、蔡元培等中外著名学者。席间，谭延闿再三挽留罗素，被罗素婉言谢绝。当晚，罗素乘火车北上，10月31日抵达北京。

初到北京，罗素住在大陆饭店，随后租住了东单北路东的遂

① 傅铜当时是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给罗素的邀请信即由他执笔。

② 罗素致柯莉 (Colette Maleson)，1920年10月18日、28日；罗素致奥托琳 (Ottoline)，1920年10月18日、28日。转引自冯崇义：《罗素与中国》，第109页，三联书店1994年版。

安伯胡同2号院。这是一所北京典型的四合院，罗素、勃拉克及随同翻译赵元任各居一室。罗素和勃拉克还到北京旧货市场买来中国旧式家具摆放在房间里，他们还雇了厨师、家仆、人力车夫及临时的裁缝女佣，过上舒适安逸的生活。生活安排停当，罗素便开始了在北大的讲学活动。

1920年11月7日，罗素的第一个系列讲座“哲学问题”在北大开讲，一千多名师生聆听了他的哲学见解。此后，罗素每周在北大讲学两次，每次分别讲不同的题目，同时并进。至1921年3月，罗素在北大共举行了五个系列讲座，即：“哲学问题”、“心的分析”、“物的分析”、“社会结构学”和“数学逻辑”，中国学术界称之为“罗素五大演讲”。

“哲学问题”以罗素1912年出版的同名专著为蓝本，系统阐述了他的“中立一元论”观点，他主张以“事实”(event)代替“物质”概念，批驳了唯物论。同时对唯心主义哲学进行了批判，指出以贝克莱为代表的“主观唯心论”违背了逻辑原则，走入了歧路；以黑格尔为代表的“绝对唯心论”和以柏格森为代表的“神秘唯心论”则都走向神秘主义，与人类的进步、科学的进步背道而驰。随着现代实证科学的发展，这些唯心论哲学终将不推自倒。演讲时，罗素将唯物主义全部加以排斥显然是错误的，但他强调“科学的方法”、“科学的态度”，强调哲学必须以最新的科学为依据，则为五四时期蓬勃兴起的科学思潮提供了养料，注入了活力。

“心的分析”系列讲座几乎与“哲学问题”同时进行。该讲题在罗素旅华前于伦敦演讲过，是他当时十分得意的一个讲题，其主旨在于汇合20世纪现代科学两种对立的倾向，^①对传统意义上的“心”做出新的解释。罗素认为，“意识”不能作为描述

^① 即源自以行为主义为代表的现代心理学和以相对论为代表人物的现代物理学的两种倾向。

“心”的基本概念；“知觉”、“记忆”、“观念”、“想象”、“信仰”等概念能更确切地解释人类的精神现象。

“物的分析”是罗素于上述两个系列讲座的后半部同时演讲的。他向中国听众首先介绍了物理学的最新成就：相对论与量子力学，然后对物理世界进行了哲学分析。

“数学逻辑”主要讲述了有关数理逻辑的一些简单常识，如数理逻辑与普通数学的区别；指出了将数学作为哲学工具的优点；介绍了数理逻辑的使用符号、数理逻辑的基本推论原理及它们的符号表达公式。

上述四个系列讲座，其内容都是罗素的“纯哲学”。姑且不论其哲学观点是否正确，仅就他给当时渴求新知的中国知识界系统介绍了相对论、量子论、数理逻辑等这些崭新的科学知识，激发起中国知识界对这些新知识的浓厚兴趣来说，也称得上功德无量。

罗素“五大演讲”的最后一个系列是“社会结构学”。本来，当时中国知识界对罗素的最大期待是希望他阐明其社会政治学说，并在社会改造方面“予中国以种种指导”，^①但罗素却回避了中国的现实问题。他的“社会结构学”主要分析了工业大生产对整个工业社会的结构性影响和人类社会的工业大生产时代的发展趋势。

除“五大演讲”外，罗素还应有关学术团体之邀，追加了一些单篇演讲。另外，他每周还参加一次北大“罗素学说研究会”的英文讨论，每两周参加一次他们的中文讨论。学术活动之余，罗素参观了北京的一些名胜古迹。他尤其钟情于北京天坛，每周一都要和勃拉克在那里待上一整天。罗素晚年在回忆起天坛时写道：“那是一座我所见过的最美的建筑物。我通常坐在冬阳之下，

^① 《沪七团体欢迎罗素记》，1920年10月16日《晨报》。

默默无语，完全沉浸在安谧宁静之中。”^① 罗素和中国的一些学者名流也经常交往，梁启超、范源濂、张崧年（申府）等都到遂安伯胡同拜访过他。张崧年曾回忆，罗素对他所介绍的北大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很感兴趣，并对五四时期中国在文化上的自由活动表示赞赏，他希望中国能创造出一种极好的新文化，以补西洋文化之不足。^②

正当“数学逻辑”、“社会结构学”讲座尚在进行中的时候，3月中旬，罗素因受凉患上急性肺炎，不得已中断了讲座，被送进北京一所德国人开的医院。在整整两周的时间里，罗素昏迷不醒。罗素的病况震动了知识界，当时中国的各大报纸每天报道他的病情，去医院探病的人更是络绎不绝。直到3月底，他才脱离危险。此后，罗素又受到心脏病、肾病、痢疾的折磨，学术活动几乎完全中止。7月初，罗素的身体状况基本复原，他决定结束在华讲学回国。7月6日，罗素拄着拐杖到教育部会场发表了他的告别演说：“中国到自由之路”，针对中国知识界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表明了自己的立场、观点。7月7日，梁启超、丁文江等人设宴为罗素饯行，感谢他给中国带来的现代有价值的学说。7月11日，罗素借勃拉克小姐离开中国。

附：罗素在华演讲目录^③

时间	演讲题	地点
1920年10月13日	在上海七团体欢迎会上的答辞	上海：大东旅社
1920年10月15日	社会改造原理	上海：中国公学
1920年10月16日	教育之效用	上海：江苏省教育会

① 《罗素自传》第2卷，第129页。转引自冯崇义：《罗素与中国》，第141页。

② 张申府：《罗素哲学译述集》，代前言，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③ 转引自冯崇义：《罗素与中国》，第222—223页。

1920年10月19日	教育问题	杭州：浙江第一师范学校
1920年10月20日	在江苏省教育会招待会上的 的答辞	上海：一品香饭店
1920年10月21日	爱因斯坦引力新说	南京：中国科学社
1920年10月26— 27日	布尔塞维克与世界政治	长沙：湖南省教育会
1920年11月9日	在讲学社欢迎会上的答辞	北京：美术学校
1920年11月7日 —1921年1月	哲学问题	北京：北京大学
1920年11月10日 —1920年2月	心的分析	北京：北京大学
1920年11月19日	布尔塞维克底思想	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
1920年12月10日	未开发国之工业	北京：中国社会政治学会
1921年1月6日	宗教的要素及其价值	北京：哲学研究社
1921年1—3月	物的分析	北京：北京大学
1921年2—3月	社会结构学	北京：北京大学
1921年3月	数学逻辑	北京：北京大学
1921年3月14日	教育问题	保定：育德中学
1921年7月6日	中国到自由之路	北京：教育部会场

2. “我愿为中国竭尽微诚”

罗素十个月的在华讲学活动，传播了现代英国与西方大量的科学知识与哲学思想，给五四时期渴求新知、向往西学的中国知识界带来丰富的养料，注入新鲜活力，堪称中英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十个月的中国之行也给罗素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领略了中国的古老文明，美丽风光，接触了中国知识界热心现代化事业的进步人士，感受到中国五四时期可贵的文化争鸣。同时，他也看到中国的贫穷落后与封闭，看到中国与现代化之间的遥远距离。作为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罗素希望中国摆脱贫穷落后、备受奴役的地位，复兴和弘扬光辉灿烂的文明，在整个人类文明

中发挥应有作用。为此，回国后，罗素诚挚地表示：“我愿为中国竭尽微诚。”^①从访华归国到20年代末，罗素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研究中国，勉力从事中国问题的著述与演说，成为英国当时颇有影响的中国问题专家。他接连在英美一些较有影响的报刊上发表文章，探讨中国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办法，驳斥旅华的英国外交官、传教士和商人欺骗英国舆论的种种言论，谴责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与掠夺，呼吁正直的人们为中国的独立做出贡献。很多机关团体也竞相邀请罗素就中国问题发表谈话，各报纸则将这些谈话作为权威性意见加以刊载。

1921年11月24日，罗素以“为中国请愿”为题在《太阳报》上发表了一篇专论。文章指出，中国的文明并不比西方差，西方不要自封为高等文明的布道士。“中国人更有耐心，更为达观，更爱好和平，更看重艺术，他们只是在杀戮方面低能而已。”他警告西方世界，中国拥有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又是世界上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它在未来将是不可战胜的。罗素最后呼吁西方各国放弃在华特权，让中国获得完全独立并创造出有利于全人类的新文明。

同月，一战后讨论远东、太平洋问题的华盛顿会议召开。罗素认为这是使中国获得独立、从而使人类历史出现新转折的契机。因此，他围绕此次会议先后发表了《华盛顿会议的险境》、《华盛顿会议说些什么》、《华盛顿会议如何能帮助中国》等一系列文章和谈话，再次表达了希望中国独立的真诚愿望。他认为，中国爱国者有两个压倒一切的目标，一是结束内乱和无政府状态，二是重新获得独立和主权完整。对中国来讲，来自外部的最大威胁是日本，因为他们要吞并中国的领土，而英美则主要是要与中国做生意以获得利益。他希望英美利用其在华盛顿会议上的优势地位，遏止日本人的侵略企图，帮助中国获取完全的独立，

^① 罗纳德·克拉克：《罗素的一生》，第395页，伦敦1975年版。

否则，华盛顿会议将毫无意义。^①

1924年，针对英国及港英当局支持中国商团叛乱的举动，罗素发表文章揭露英帝国主义的行径，为孙中山领导的广州政府辩护。他指出，列强正在利用中国内部某些不良分子玩耍极不光彩的花招，他们威逼利诱中国军阀出卖中国的权益，他们干涉中国事务，打击“中国激进主义的领袖、主张共和制度的孙中山”。而孙中山实际上得到了所有具有公共精神的中国人的支持，如果他获得成功，他将会抵制外来侵略。如果英国和西方其他列强总是害怕中国独立富强，从而支持中国的腐朽反动势力，他们将受到应有的惩罚。^②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中国掀起全国范围的反帝爱国运动，英国官方舆论却把“五卅惨案”和“五卅运动”说成布尔什维克党人所制造的排外阴谋。对此，罗素坚决站在中国人民的立场上，谴责英国当局嫁祸于人。他奉劝英政府：“我们已经不如往日那样强盛了，我们不应该如此蛮横和暴虐，以免引起文明世界的憎恶。就是从自私自利的动机出发也应明智一些。至于稍微有一点荣誉感和人道精神的人所应具备的其他动机，我在这里无话可说。”^③

此后，在省港大罢工、“万县惨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等重大事件上，罗素都毫无例外地站在支持中国人民正义的反帝反侵略的立场上。

此外，在英国退还庚款用途问题上，罗素的态度同样令人敬佩。1924年，执政的英国工党政府决定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管理退还之庚款，罗素被任命为该委员会的教育委员之一。罗素认

① 上述文章主要发表在《劳动导报》、《伦敦新闻》、《新共和》等报刊上。

② 罗素：《英帝国主义在中国》，《新领袖》1924年9月24日。

③ 罗素：《评英国的对华政策》，《祖国博览》第37卷第16号，1925年7月12日。

为这是一件于中英文化交流大有裨益之事，于是根据委员会须有中方代表的规定，赶忙推荐丁文江和胡适为中方委员，并向政府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力主将英国所退庚款全部用于中国教育，理由是：“（1）此乃最有益于中国之用途；（2）别种用途不能赢得中国人心；（3）英国之利益在赢得中国人心之基础上方能有所保障；（4）美国早就将庚款移用于中国教育，英国若采别种用途，过于相形见绌；（5）主张采用别种用途之论据皆出于腐败之动机，即通过政府之权力谋取私人之利益。”^①令人惋惜的是，后来英政府决定仅将全部庚款基金的利息用来兴办文教事业，因此英国利用庚款加强中英文化交流之举所产生的影响远远不及美国利用庚款加强中美文化交流之影响。这实在与罗素的愿望相去甚远。

在罗素访华归国后所有关于中国问题的著述中，最系统、最具理论性、影响也最大的是他1922年分别在伦敦和纽约两地出版的《中国之问题》一书。

罗素指出，他之所以要写作《中国之问题》，是因为中国问题对西方乃至整个世界太重要了。他说：“在未来的两个世纪里，整个世界将受到中国的决定性影响，不管是好的影响还是坏的影响。”

那么，怎样解决中国的问题呢？罗素认为首先应从中国的现实政治入手，建立一个有秩序的政府，改变政治混乱的局面，这对发展中国实业改变中国贫弱状况，抵御外来侵略、维护中国独立和主权，发展中国的教育文化事业都是极为必要的。

罗素分析，中国政治混乱的根源不仅在于中国的内政和军阀的个人野心，还在于列强对中国的侵略。鸦片战争以来，列强通过战争的商业的政治的等各种手段，逐渐成为中国一种重要的政治支配力量。他们在华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在中国每一个政治集

^① 《罗素自传》第2卷，第148页。转引自冯崇义：《罗素与中国》，第34页。

团或强人、军阀后面，都能看到列强的影子。在中国的分裂混乱中，列强从中渔利。因此，结束中国内部的分裂和混乱而获得统一，同结束外来的侵略和干涉而获得独立，便成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罗素向西方指出，中国文明并不亚于西方文明，保护其独立发展是人类整体的义务。更重要的是，一个独立统一的中国从长远角度看也完全符合英美等国的经济利益，毕竟一个统一的向世界开放的中国比一个分裂的充满势力范围的中国对英美更有利。因此，罗素希望英美等列强的当权者明智一些，放弃控制中国的企图，尊重中国的独立，让中国人获得时间和机会来解决自己的内政问题。

对中国来讲，在列强放弃控制中国后，首先需要做的是通过舆论界、知识界的努力，化解军阀势力，实现国内和平；然后，由宪政主义者制定一部完整的宪法，以联邦制原则划分中央、地方权限。此外，由各方面人士组成一个稳定、高尚、充满生机的政府，由爱国商人提供贷款安置解散的军阀士兵；由政府用外交手段收回近百年里所丧失的全部主权。这样，“一个政治上独立、统一的中国便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了”。

在建立有秩序的政府后，中国人民要做的是“在自己的支配下发展实业”，实现工业化。这是中国独立的坚实基础。罗素认为，中国发展工业必须走“国家社会主义”的道路。理由是：“在一个经济上落后而文化上并不落后的国家，实行国家社会主义或列宁所称的国家资本主义，优点很多。首先，国家比私人更容易得到贷款；其次，通过国家更容易聘请到必不可少的外国专家；第三，国家更容易保证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工业不至于受外国人的控制。也许比上述考虑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国家办企业，可以避免私人资本家的诸多罪恶。”但同时，这种经济模式也要有如下条件作依托：第一，必须建立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府；第二，农业、轻工业、商业将长期留在私人手中，即使像铁路、矿山等关

系国家主权独立的部门也应待时机完全成熟时再全部收归国有；第三，必须充分利用外国的资金、技术和人才。罗素还强调：“中国的工业发展控制在中国之手而不是外国人之手，这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因此，中国人必须把握中国工业发展的主动权。

解决现实政治问题、发展实业都是急需的，但在罗素看来，解决文化问题“无论从中国还是整个人类的角度看”都更重要。为此，罗素在书中对中西文化进行了一番比较分析。他认为中国传统文明可谓利弊杂陈。如：中国自古以来使用表意文字而没有过渡到拼音文字，这有利于中国文明的延续和它在广阔国土上的交流，但汉字太古奥而具有贵族倾向，不利于普及教育和实行民主政治；又如儒家伦理作为宗教的替代品而统治了中国士大夫的心灵，使中国文明避免了存在于其他文明中的宗教迷狂，但儒家的孝道因倡导家庭至上而严重地破坏了国民的公共精神，锢闭了民族心灵，成为中国文明进步的严重障碍；中国公民知足常乐、淡泊宁静、富于自尊、善于妥协、爱好和平，但同时又麻木、冷酷、怯懦，缺乏迎接挑战敢于抗争的勇气。尽管如此，相对于病人膏肓的西方文明来说，中国文明仍然有希望担当起拯救西方文明乃至整个人类文明的责任。为此，中国一方面要避免彻底西化，另一方面又要避免排外主义和保守主义。他期待中国新知识界的人们能够将中西两种文化的优秀成分相结合，创造出一种灿烂辉煌的新文明，给人类带来新希望。^①

综观罗素在中国问题上的所有言行，可以说，他不愧是中国人民的真诚朋友。作为一名西方学者，他不是站在西方列强的立场上对中国予以歧视、贬低，说三道四，而是站在中国一边，揭露和谴责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掠夺和欺压，真诚希望中国能摆脱贫弱状况，走上独立、富强之路，并对人类有所贡献。为此他殚

^① 罗素：《中国的问题》，纽约1922年版。

精竭虑，设身处地分析中国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种种解决办法，履行了“为中国竭尽微诚”的诺言。

也应该指出，作为一名和平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罗素尽管憎恶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与干涉，千方百计地鼓吹中国独立，但他却把中国独立的希望寄托在列强的发善心上，寄托在列强能奇迹般地根除他们对中国的偏见、自动放弃在华特权上；尽管他看到了中国政治混乱的病根之一是军阀割据、实行专制统治，但又以为只要新知识界大造舆论，便能化解军阀势力，再加之制定一部宪法，中国完全能组建一个稳定高尚的政府。这样的建议和办法，在实践中只能流于空想，对解决 20 年代的中国问题也无能为力。列强和军阀绝不会自动交出权力，消除非理性的横暴势力，真正可靠的也只能是暴力。倒是罗素为中国设计的经济发展模式反映了五四时期全世界范围内追求以更美好的制度取代资本主义的进步潮流，值得认真玩味。他为中国文化设计的出路、对中国文化的殷殷期望也完全符合文化发展的趋势和规律。

3. 罗素与中国思想文化界

罗素旅华时间并不长，但作为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西方思想大师，他对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影响却是巨大而深远的。

这首先体现在 20 年代初中国思想界关于中国发展道路的论争中。罗素在访华之初的几次演说中曾对中国问题发表过一些零星见解。如提出“中国改造当以教育为一义”；^①又说“开发工业有依靠资本家、依靠国家、依靠工人三条路可走。中国工人阶级幼稚，中国政府腐败无能，所以目前发展实业非靠资本家不可，将来要越过资本主义阶段，则必须借助国家的力量”，^②等等。罗素此时对中国知识界关于中国应走何种道路的争论并不知

^① 《沪七团体欢迎罗素记》，1920 年 10 月 16 日《晨报》。

^② 杨端六：《和罗素先生的谈话》，《东方杂志》第 17 卷第 22 期，1920 年 11 月。

晓，他提倡中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国家发展实业与教育，也属正常。他此时并未提出中国发展模式问题。但上述片言只语都引起知识界的争论。主张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工业的张东荪借题发挥，借罗素之言加强自己一派人关于中国尚没有资格谈论社会主义的论点。梁启超也发长文予以附合。而另有一些人则立即指出张东荪有断章取义或假传圣旨之嫌。邵力子著文说：“中国除了开发实业以外无以自立，这是小学生也知道的，用不着引罗素先生底话。罗素先生最要紧的教训，是中国必须开发实业，而开发实业必不可再蹈欧美资本主义底覆辙。东荪君不要抵采用他半截话啊！”^①明确指出罗素并非认为中国无资格发展社会主义。陈独秀则干脆直接写信给罗素问明其言论真意所在。他在信中说：“近来中国有些资本家的政党的机关报屡次称赞你主张中国第一宜讲教育，第二宜讲开发实业，不必提倡‘社会主义’，我们不知道这话真是你说的，还是别人弄错了呢？我想这件事关系中国改造方针，很重要，倘是别人弄错了，你最好是声明一下，免得贻误中国人，并免得进步的中国人对你失望。”^②字里行间透露出对罗素看法的高度重视。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思考，罗素明确提出了改造中国的纲领。这就是他在中国的最后一场演讲“中国到自由之路”。在这篇临别赠言中，他向中国提出十多条建议，诸如“必须从政治改革人手”，“必须打破中国传统”，“必须发展爱国主义”，“必须以现代教育为长远之计”，“俄国的方法适合于中国”，“国家社会主义为中国之出路”，“社会主义必须保护自由”，等等。其中关于中国发展模式，罗素说了如下一段话：“求国民的智识快点普及、发达，实业不染资本主义的色彩，俄国式的方法，是惟一的道路了。……现在欲我答如何能免资本主义而发展实业，我必说第一

① 邵力子：《东荪君底“又一教训”》，《新青年》第8卷第4号，1920年12月。

② 《陈独秀致罗素先生底信》，《新青年》第8卷第4号，1920年12月。

步惟有国家社会主义……我相信这类方法，比较等到教育上和实业上达到和英美一样的程度，然后再来祛除资本的流毒，总要好点。”^① 明白无误地主张中国实行“国家社会主义”。主张效法苏俄的人们兴高采烈，对张东荪先前“假借名义”予以讥讽；而原以罗素为同道的张东荪则黯然神伤，最后竟至于抱怨罗素“自己的思想还未确定，如何能指导我们呢”？批评罗素的临别赠言是说“梦话”，“对中国情形毫无所得”。^② 其实，尽管罗素也主张中国应“走俄国人的路”，但他与中国当时的共产主义者仍有重大区别。

不管怎样讲，罗素关于中国发展道路的言论成为中国社会主义论战的直接导火线，而且各派人物都从他那里寻找中国的改造方案。罗素在当时中国知识界的影响由此可见非同一般。

类似于罗素与中国发展道路论争之关系这样的问题还体现在当时的中西文化之争中。各文化派别都借重罗素言论为自己说法。

罗素来华伊始，曾发表一些称赞中国文明的言论，如提出“中国固有之文明，如文学美术，皆有可观，且有整理保存之必要”。^③ 又说：“鄙人初来中国，觉得种种事情，都有兴味，而对模仿西方之各种事象，终觉得可厌。若中国将来因发达产业而使固有之审美上、精神上有价值的事事物物，逐渐丧失，实觉可惜。”^④ 既然连罗素这样的西方大哲学家都赞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当时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当然感到欢欣鼓舞。于是，具有较浓保守色彩的《申报》在报道上海团体欢迎罗素宴会时特地加上一个副标题：《罗素博士言中国宜保存固有国粹》，并将罗素的演讲

① 《中国人到自由之路》，《东方杂志》第18卷第13号，1921年7月。

② 张东荪：《后言》，1921年7月31日《时事新报》。

③ 《沪七团体欢迎罗素记》，1920年11月16日《晨报》。

④ 《罗素在华之演讲：社会改造原理》，1920年10月17日《晨报》。

辞译为：“现近欧洲之思想，多激烈破坏及纷乱之状态，妨忌以之而起，战争以之而生，诚以当初过渡时代各种过渡思想有以误之也。中国殊不宜学之。夫中国古代有甚好之文明，及今中国公民尚谨守之，凡中国人之一举一动，一事一物，未受欧化之影响者，均有至可羡慕之处，此皆中国固有之国粹也，不宜弃之。”^①

罗素上述言论的报道主题在新文化派中引起紧张情绪。周作人在1920年10月19日的《晨报》上撰文批评罗素“不大明白中国的内情”，希望罗素“不久便会知道，中国的坏处多于好处，中国人有自大的性质，是称赞不得”的。张崧年则以上海各团体欢迎罗素宴会出席者身份，著文批评《申报》歪曲罗素讲话本意。他指出，罗素演讲是提醒中国人在发展工业时，不要采用已在西方带来恶果的“商贾主义、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罗素虽然说过中国的文学艺术有可取之处，但这是特指为西方“过胜的商贾主义”所毁坏了的某些艺术，绝不能笼统地称为“保存国粹”。^②

罗素在明白中国新思想界的反映后，便不再片面地为中国传统文化唱赞歌。在1920年11月9日讲学社为他举行的欢迎会上，他提出“中国人不要遗弃中国的好处，而对于西方的好处，也要尽量采人”，突出了学习西方的必要。12月初，罗素又给登载他言论的《申报》写了一封长信，澄清他对中国文化的观点。他指出，喜爱中国的古典美是一回事，中国为生存发展而不惜代价革故鼎新是又一回事；中国如果不是要作为一个博物院而是作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存在下去，就不能不像欧洲人那样牺牲古典美而发展现代工业大生产；工业大生产、民主、科学、新教育等新事物，正是中国所急需的。

以上是罗素访华期间与中国思想文化界热门话题间所发生的

① 《各团体欢迎罗素博士记》，1920年10月14日《申报》。

② 张崧年：《国人对罗素的误解》，1920年10月20日《晨报》。

关系，可见其社会政治思想、文化观念对中国知识界的整体影响。至于罗素对中国新知识界中一批青年知识分子的个体影响就更大更深远。

2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受罗素熏陶最深的首先是徐志摩。他所以中断在美国的学业转赴英国留学，完全是受罗素思想与人格魅力吸引。为了追随罗素，他丢弃了实业救国的理想，放弃了准备攻读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于1920年9月东渡大西洋来到英伦之岛。没有想到，罗素此时已到中国讲学。失望之余，徐志摩只得进入剑桥大学研究政治经济学。不久，他从报纸上看到罗素病死于中国的消息（误传），信以为真，悲痛万分，写诗哭悼罗素。罗素病愈回国后，徐志摩立即写信给他，要求与他见面。一周后，徐志摩如愿以偿。此后，徐志摩几乎参加了罗素所有的演讲会，并成为罗素家中的座上客。当罗素的第一个孩子满月时，徐志摩发动一批中国留英生为之庆贺。罗素也很欣赏这位“具有很高文化修养”、“能用中英两种文字写作的诗人”，^①因此研究写作之余，经常和徐志摩谈论聊天。徐志摩回国后，罗素曾将新作《中国之问题》寄给他，请他将此书主旨向中国读者广为介绍。为此，徐志摩写了《罗素与中国——读罗素〈中国问题〉》，发表于1923年12月3日的《晨报》副刊上。此后，又发表《罗素与幼稚教育》、《罗素又来说话》等系列文章，介绍罗素其人其学。与罗素的亲密交往，对罗素思想的研读，使徐志摩受到多方面的影响。他接受了罗素对共产主义与苏俄的看法，接受了罗素尊崇人道和平、提倡创造反对抑塞天性的思想，在人生观及精神气质上也深受罗素的感染，甚至于连谈话的方式、举止衣着风度上，都深深打上罗素的烙印。可以说，徐志摩是中国现代最早理解罗素的知识分子之一，但他是在通俗而生动的意义上理

^① 梁锡华：《徐志摩海外交游录》，转引自宋炳辉：《徐志摩传》，第37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解罗素的，对罗素那些艰深的数学、数理逻辑学及哲学思想则不甚了了。

当时真正在哲学上倾心崇拜罗素的是张崧年和张东荪。张崧年（申府）1914年于北京大学读书时第一次接触到罗素著作《我们的外界知识》，由此对罗素哲学产生浓厚兴趣。此后几年，他如饥似渴地研读罗素著作，并将它们翻译、介绍给中国知识界。他当时从英美报刊上广泛搜集资料，编成一篇罗素著述目录索引，搜求罗素著述之完备，连罗素也感到不可思议。罗素旅华初期，张崧年曾多次前往罗素住处看望他，向他介绍北京大学，介绍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化活动。此后，他前往法国，暂时中断学术研究。1925年回国后，继续研究介绍罗素哲学，对罗素的数理逻辑、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皆有涉及并兼及自然科学、社会哲学等领域，取得一大批成果。^① 这些成果皆为单篇译述，评述文章简明扼要，译文谨严准确，在民国时期的中国罗素哲学研究中别具一格。可惜的是，他没有将自己的罗素研究融会贯通，写成一部学术专著。张东荪是新文化运动中的显赫人物。罗素来华之初，张东荪表示对他“崇拜到了十二分”。在哲学方面，张东荪深受罗素影响，他对哲学认识论的兴趣是受罗素的鼓舞而产生的，他在《认识论》、《理性与民主》等著作中所主张的“认识多元论”、“思想自由”和罗素的思想观点非常接近。

此外，罗素在华讲学的陪同翻译赵元任，直接出面邀请罗素来华的联络人傅铜也在某些方面受到罗素哲学影响，并为推动罗素思想在华传播做出重要贡献。赵元任还在哈佛大学任教时，罗素哲学即对他产生重要影响。罗素旅华期间，他作为罗素的专业翻译一直和罗素住在一起，对罗素哲学的精髓有深刻的把握。他在1921年的《罗素月刊》创刊号上发表《罗素哲学的精神》一

^① 这些成果散见于民国时期的报刊上。80年代初，徐盈将这些成果搜集起来，按时间先后编为《罗素哲学译述集》，1989年由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

文，把罗素哲学精神概括为实验的精神、分析的精神和细定的精神，堪称知人之作。傅铜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曾在英国专攻西方哲学达七年之久。罗素来华期间，他曾和赵元任一起陪同罗素在长沙等地讲学。之后在北大发起成立了“罗素学说研究会”，并支持北大学生创办了《罗素月刊》，对组织介绍罗素思想出力尤多。不过，他自己关于罗素哲学的著述并不多，只发表《罗素的创而不有主义》、《答张东荪先生》等一些短文。

继上述学者之后，留英的金岳麟成为罗素哲学在中国最有成就的继承人。他的第一部哲学著作《逻辑》，是对罗素数理逻辑的系统介绍；他的哲学大著《论道》一书，充分运用了罗素倡导的实证主义及逻辑分析方法；他的《知识论》，出发点是罗素等人的命题和难题；1949年后他撰著的《罗素哲学》一书，更是中国研究罗素哲学最系统、最有深度的一部学术专著。

罗素思想在中国思想界、知识界所产生的影响，还表现在自20年代起出现的罗素著作的翻译热。据统计，从罗素来华至40年代，罗素的主要哲学著作如《哲学问题》、《心之分析》、《物的分析》、《科学观》、《我的信仰》、《哲学中之科学方法》都有了完整的中译本，一些重要著作如《哲学问题》、《心之分析》甚至有好几个译本。罗素论述社会问题和中国问题的著作和文章也有翻译，如杨端六等翻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出版的《罗素论文集》，柯硕宁翻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44年出版的《赞闲》等。^①可以说，“罗素是现代西方哲学家中最被中国人知晓的一位，也是现代哲学家中著作翻译成中文最多的一位”。^②

^① 据《民国时期总书目·哲学心理学》统计，民国时期罗素著述译为中文的有14部（包括不同版本）。

^② 张申府：《罗素——现代生存的最伟大的哲学家》，《罗素哲学译述集》，第235页，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二、中英文学交流

1. 蓬勃发展的英国文学翻译

英国是一个文学传统深厚的国家，自文艺复兴以来，涌现出一批又一批享有世界声誉的作家、诗人，产生了一批又一批具有世界影响的作品。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所受外国文学的影响，恐怕再也没有像英国文学那样广泛的了。

早在晚清时期，英国的一些文学作品即被译介到中国来。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集》，兰姆的《莎氏乐府》，狄更斯的《孝女耐儿传》，拜伦的《哀希腊》，是这个时期的主要译作。不过，这些翻译数量少，盲目性大，且使用文言，故对中国文学产生的影响亦很有限。

真正介绍、翻译英国的名家名著并产生较大影响，则是五四前后的事了。在五四新文学运动前后译介外国文艺的高潮中，中国新文学的先驱们在译介英国文学方面较之林纾等人大大前进了一步：

第一，注重选择思想性、艺术性强的作品，避免翻译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如富于反抗精神的拜伦的作品《哀希腊》，继有苏曼殊、马君武早年的译文后，五四时又有胡适、胡怀琛、柳无忌的译文。一首诗一译再译，其原因就在于作品具有强烈的反抗压迫的思想性。另外，对王尔德的作品进行了大量介绍。王尔德(Dscar Wilde, 1854—1900年)是西方唯美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英国著名的剧作家。他的剧作结构精巧，人物刻画生动，语言风趣、情节跌宕，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五四新文学家对王尔德作品怀有极其浓厚的兴趣，努力译介之。赵景琛曾回忆当时的情形：“王尔德在我国新文艺初期的确走过一阵红运，几乎他所有的著作都有了中译本，例如田汉译的《沙乐美》，张闻天等译

的《狱中记》，穆木天等译的《王尔德童话》，洪深改译的《少奶奶的扇子》，孔襄我译的《同名异娶》等，零星的译文还不在于内。”^①

第二，注重对文学的整体性研究。五四前对英国文学的译介工作主要停留在作品的翻译尤其是节译上，反映不出英国文学的全貌。五四期间，情形有所改变，既有英国作品的翻译，又有英国文坛消息的报道，作家生平、思想的介绍，还有文艺理论、思潮的移植。例如1921年的《小说月报》开辟了“海外文坛消息”，向国人大量介绍了英国文坛的信息。又如胡愈之写的《近代英国文学的概观》，较详细介绍了英国文学的特质，浪漫主义运动，诗歌、小说、戏剧发展情况。《王尔德评传》、《爱尔兰诗人夏芝》等文，既介绍了文学家的思想艺术，也宣传了英国的文学理论。《小说月报》15卷1期上发表的英国阿兰坡《诗的原理》的译文，把作家的文学批评理论及方法介绍给中国文学界。此外，还出版了《英国文学史》（上海泰东书局，1927年5月）、《英国文学ABC》（上海ABC丛书社，1928年8月）、《唯美派的文学》（上海光华书局，1927年7月）等四部英国文学史著作。这些介绍、研究清晰地勾勒出了英国文学的全貌。

第三，强调译介英国文学的根本出发点，是“用文艺来鼓吹新思想”。为了集中宣传一种新思想，新文学先驱创造了出专号的办法。如《创造季刊》1923年2月上旬出版的1卷4期上刊出了“雪莱纪念”号；《小说月报》于1924年4月10日出版的第15卷4号上刊出了“诗人拜伦的百年祭”专号；《少年中国》、《文学》1924年先后发表了纪念弥尔顿的系列文章，等等。这些纪念专号或纪念专文阐述了纪念这些英国文学家的意义，介绍了他们的生平和著作，分析了他们在英国文学史及世界文学史上的

^① 赵景琛：《文坛忆旧》，转引自王锦厚：《五四新文学与外国文学》，第201页，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地位影响，集中翻译了他们的一些代表作品，在较短的时间内较好地展示了被纪念者的全貌。而这一切工作的中心目的是为了紧密配合五四前后汹涌澎湃的思想解放、争取民主自由的时代潮流。譬如郭沫若称颂雪莱是“自然的宠子，泛神论的信者，革命思想的健儿”，纪念他是“要借来向着我们困在乱世之下枷锁之下的中华民国的同胞，在此大声急呼一下”。^①茅盾指出纪念拜伦是因为“中国现在正需要拜伦那样的反抗精神的震雷暴风般的文学，以挽救垂死的人心”。^②田汉叙述自己之所以“略叙密尔敦氏之生平及其与时代之关系，意者其药石英国之大精神，或亦能药石今日之中国”。^③可以看出，五四新文学先驱把译介英国文学家及其作品作为激励社会前进的有力武器。

第四，从译介英国文学作品的实绩看，五四时期以诗歌译介为主，兼及戏剧和小说。除了上面提到的雪莱、拜伦、弥尔顿三位诗人外，译介还涉及华兹华斯、济慈、骚塞、哈代等一大批英国著名诗人。除报纸、杂志发表的大量译介文章外，还出版了《雪莱诗选》（郭沫若译，上海泰东书局，1926年3月）、《装饰集》（夏莱蒂译，上海光华书局，1927年）等数部诗歌集。在戏剧方面，翻译出版了十数部英国剧作，包括莎士比亚、王尔德、萧伯纳等英国大剧作家的部分作品。其中，田汉所译《哈孟雷特》（上海中华书局，1922年11月初版）、《沙乐美》（上海中华书局，1923年1月初版），潘家洵所译《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北京朴社，1926年6月初版）、《华伦夫人之职业》（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4月初版）最为著名，对中国戏剧文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小说方面，亦翻译了一批作品。

如果说，五四时期英国文学的译介为现代中英文学交流开辟

① 郭沫若译：《雪莱的诗·序》，《创造季刊》1卷4期，1923年2月。

② 沈雁冰：《拜伦百年纪念》，《小说月报》第15卷4号，1924年4月。

③ 田汉：《密尔敦与中国》，《少年中国》第4卷5期，1923年7月。

了一个新生面，那么，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三四十年代的文学译介工作则把这种交流推向了高潮。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翻译作品的数量有了大规模的增长。据不完全统计，民国时期翻译英国文学作品的总量达七百多部（包括同一作品的不同译本），其中三四十年代的译品有五百多部，^①是民国初期20年的三倍。这个数量是各出版社公开出版的书籍数量，不包括散落在各种报刊上的翻译文字。即便如此，也反映了此期引进英国文学的辉煌成就。

(2) 翻译作品的样式、所涉及的作家及文学流派相当广泛，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期。从作品样式看，囊括了诗歌、戏剧、小说、散文、传记、报告文学、书信、日记、回忆录、童话等所有文学品种；从涉及的作家看，包揽了莎士比亚、雪莱、拜伦、弥尔顿、王尔德、萧伯纳、笛福、菲尔丁、司各特、奥斯丁、狄更斯、勃朗特姐妹、哈代、斯蒂文森、哈葛德、康拉德、柯南道尔、贝特兰等几乎所有的古典和现代著名的戏剧家、小说家、诗人，还包括一大批不太知名的作家；从作品涉及的文学流派看，既有古典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义，还有19世纪末期开始流行的唯美主义及象征派、意识流文学。英国文学译介工作的繁荣景象由此可见一斑。

(3) 在大面积收获的基础上突出了翻译重点，将名家名作的翻译放在了显要的位置上。譬如在此期出版的127部剧作中，莎士比亚戏剧就占了73部，王尔德戏剧占了13部，萧伯纳戏剧占了17部。三位大戏剧家的作品占全部翻译剧作的80%。又如在此期出版的近四百部小说中，名家作品就占了近三百部。^②在这些作品中，涌现出一大批翻译质量较高的传世佳作。

(4) 注意引进英国的战时文学。英国进入二战轨道后，出现

^① 据《民国时期总书目·外国文学》统计。

^② 同^①。

了一些反映战争题材的文学作品，中国的翻译家们及时地将其中的一些作品译介到我国，对鼓舞中国人民的抗战精神、为抗战服务起了很好的作用。如奈埃特德的小说《高于一切》和《飞》，反映了英国对德战争最初阶段人民的精神状态，使中国读者格外感奋。长篇小说《三个穿新衣服的人》于1945年翻译过来，展示了英国人民在战争期间的觉悟提高以及他们不愿照旧生活下去的愿望，给中国抗战文艺界和国统区人民以很大鼓励。《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的朋丁先生》、《欧罗巴的出租》、《人质》、《断臂记》、《大攻势》、《花衣吹笛人》等小说也受到中国读者的欢迎。此外，中国翻译界还介绍了不少英国的战时诗歌，如奥登创作的《诗篇》、《演说者》、《死的舞蹈》，劳伦斯的《北极星》等。这些为现实服务的译作，充分体现了进步的中国文艺界为人生、为抗战的文艺宗旨，是对五四时期“用文艺鼓吹新思想”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5) 在原原本本翻译英国文学作品的同时，大大加强了对英国文学的全面研究和对英国文艺理论的引进。据统计，三四十年代出版的英国文学的研究性著作46部（包括部分译作），其中包括《英国文学》（李祁著，上海华夏图书出版公司，1948年5月）、《世纪末英国新文艺运动》（肖石君编，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9月）等理论书籍12部，《莎士比亚评传》（李慕白著，重庆中华文化服务社，1944年3月）、《萧伯纳的研究》（林履信著，长沙商务印书馆，1939年7月）等作家论与作品研究30部，英国文学史4部。^① 无论著作的数量还是质量都大大超过五四时期。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文艺界对外国文艺理论的引进。此期，举凡写实主义（Realism）、表象主义（Symbolicism）、新浪漫主义（New Romanticism）都有所介绍。尤其意识流的基本理论和创作

^① 据《民国时期总书目·外国文学》统计。

方法，更受到文艺界一批人士的关注。20年代，爱尔兰作家乔伊斯（James Joyce）的划时代作品《尤利西斯》、英格兰作家理查德逊（Dorothy Mier Richardson）的《巡礼丛书》相继发表。这些以崭新的“意识流”的方法创作的小说，给本世纪文学带来极大的影响。中国作家、翻译家很快把它们介绍过来。1935年5月6日，周立波以立波的笔名在《申报·自由谈》版面上发表《詹姆斯乔伊斯》一文，对乔伊斯的作品进行了介绍并分析了其成功的原因。在1944年1卷2期《中原月刊》上，冯亦代翻译发表了伍尔芙（英国作家）作的《论现代英国小说——“材料主义”的倾向及其前途》，全面论述了意识流小说的创作原则与风格。赵家璧、张芝联、陈尧光等人也先后在《现代》、《西洋文学》、《文潮》等杂志上发表了介绍英国意识流小说及小说家的译作。这些文章（或译文）抓住了意识流的真谛，传播了世界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创作方法。

（6）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英国文学翻译家，如潘家珣、梁实秋、曹未风、朱生豪、方重、孙大雨、黄嘉德、李霁野、杨宪益、卞之琳、钱歌川、朱维之、朱文振等。他们为繁荣我国现代的英国文学翻译、促进中英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潘家珣是我国现代著名教育家和翻译家，他在早年积极投身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来长期从事外国文学的教学研究和外国戏剧的翻译工作，20年代曾翻译萧伯纳的《华伦夫人之职业》，王尔德的《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又译《少奶奶的扇子》）两部戏剧，后又出版了《萧伯纳戏剧选》、《萧伯纳戏剧集》等，为改革我国旧戏剧、促进新戏剧的创作，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方重早年曾在美国两所大学专攻英国文学，二战末期又应英国文化委员会之聘，到剑桥、伦敦、爱丁堡等大学讲学，长期从事英国文学的研究与翻译，对英国文学尤其是乔叟作品造诣颇深。1943年，他翻译了《乔叟故事集》，在我国第一次将乔叟作品译成中文。在此前后，他还翻译了《近代英国散文选》、莎士

比亚的《理查三世》，撰有《英国诗文研究集》。从1944年开始，他还致力于把陶渊明的诗文译成英文并取得可观的成就。他为中英、中西文学交流做出可喜贡献。

孙大雨20年代曾在美国专攻英国文学，回国后致力于英国文学的研究与翻译，出版了《奥赛罗》、《麦克白》、《黎琊王》等多部莎剧译作，还翻译了拜伦、雪莱、济慈的诗四十多首。此外，他还将中国古典诗歌译成英文，成为沟通中英文学的重要使者。

卞之琳早在北大英文系读书时就曾试译出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及其他一些英国诗。30年代应中华文化基金会编译委员会之约译出英国现代传记文学作家里敦·斯特雷切的名著《维多利亚女王传》。该书40年代再版数次，颇获译界和读者好评。此外，还译有《英国诗附法国诗十二首》、《西窗集》等作品，后者是30年代介绍西方现代派文学的第一部译作选。

李霁野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文学翻译家、作家，曾翻译介绍一系列外国文学名著，在国内外文学翻译界享有很高声誉。他的译作主要集中于英、俄文学方面，其中以英国文学翻译影响更大。他翻译的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e, 1816—1855年）的不朽名著《简爱》于30年代出版，多次再版，几乎成为中国广大读者必读的外国文学名著，亦在翻译界产生重大影响。此外，他还译有英国吉辛的《四季随笔》，斯蒂文森的《化身博士》，也都拥有广大读者。

黄嘉德译有多种外国文学作品，尤以翻译和研究萧伯纳作品见长。从30年代初期开始，他先后把英国现代传记作家弗兰克·赫理斯的《萧伯纳传》、《萧伯纳情书》和萧伯纳的独幕剧《乡村求爱》译成中文出版。新中国成立后继续从事外国文学的教学研究及翻译工作，获得多种成果。他是我国造诣深厚的萧伯纳研究专家。

钱歌川早年曾留学英国攻读英美语言文学，归国后在中华书

局工作多年，晚年赴美定居。他曾翻译辛克莱的《地狱》、哈代的《娱妻记》，同时也是一位翻译研究家，著有《翻译的技巧》、《英文疑难详解》等著作，在译界产生一定影响。

朱维之是我国著名的外国文学学者，著译丰富。在英国文学方面，译有弥尔顿的《复乐园》、《失乐园》，并撰有一批英国文学研究论文，在学术界和译界产生一定影响。

杨宪益是30年代的留英生，曾在牛津大学莫顿学院专攻欧洲文学。1940年回国后长期从事外译中、中译外的文学交流工作，是我国现代成就卓著的翻译家，曾翻译萧伯纳《凯撒和克丽奥帕脱纳》、《卖花女》、《英国近代诗抄》，并与夫人戴乃迭一起将《红楼梦》、《鲁迅选集》等一大批中国名家名著译成英文出版，在国内外文学翻译界享有盛誉。

朱文振译有萧伯纳的《康缇达》，莎士比亚的《理查二世》（六部史剧），在英国文学翻译方面亦有一定贡献。

在莎士比亚戏剧文学翻译方面写下辉煌篇章的则有梁实秋、朱生豪、曹未风等人。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民国时期的英国文学译介工作是相当繁荣的，构成此期中英文化交流的重头戏。

丰富多彩的英国文学的传入，给中国作家及现代中国文学带来深刻而广泛的影响。诗歌、戏剧、小说等文学样式给中国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学习的范式和有益的营养。如新月派诗人徐志摩和闻一多的许多诗，便是以英国诗歌为“模特儿”的。难怪梁实秋在给徐志摩的信中要这样说：“志摩，你和一多的诗在艺术上大半是模仿近代英国诗，有时候我能清楚的指出哪一首是模仿哈地，哪一首是模仿吉伯龄。”^①当然，模仿中也有创造，尤其在他们的后期创作中更是如此。又如中国剧坛泰斗曹禺的戏剧创

^① 梁实秋：《新诗的格调及其他》，转引自王锦厚：《五四新文学与外国文学》，第227页。

作，也从英国戏剧尤其是莎剧中吸收了许多养分。他对莎剧开头、结尾的引人入胜、别出心裁赞不绝口，并进行深入研究。受这些艺术技巧的启发，他在构思剧本时十分注重开头、结尾的推敲，获得了巨大成功。著名作家老舍的创作深受狄更斯作品的影响，尤其他创作中反映出的幽默艺术，在笑声中嘲弄伪善者的面目、揭露生活中的丑相，在笑声中饱含对底层人民的深切同情，于讽刺中显出幽默风格，可说是老舍从狄更斯作品中汲取的创作思想和艺术手法。再如，英国及西方其他一些国家流行的意识流手法传入中国后，一些新文学作家深受感染，并以此方法进行创作尝试，刘呐欧的《都市风景线》、施蛰存的《上海的狐步舞》等作品便是这方面的典型之作，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两大创作主流之外点缀了新文学的艺术长廊。

2. 莎士比亚戏剧在中国

在近代以来介绍到中国的所有外国文学家，中国学者对莎士比亚的作品翻译得最多、研究得最深入，以致形成一种专门的学问“莎学”。

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年）是文艺复兴时期英国的戏剧大师，曾被马克思誉为“人类最伟大的戏剧天才”。他一生写有37部戏剧和大量诗歌，所有作品都体现了人文主义的基本精神，集中代表了欧洲整个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成就，对世界各国文学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巨大影响。

民国以前，莎剧已有零星翻译。民国以来，尤其是五四运动后，随着西方文艺的大量引进，莎剧的翻译也出现了大繁荣的局面。1922年和1924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了田汉译的《哈孟雷特》、《罗蜜欧与朱丽叶》，这是用现代汉语移译莎剧全译本的开始。此后，朱生豪、曹未风、梁实秋等人致力于莎剧翻译，获得

了可喜收获。据不完全统计，民国时期公开出版的莎剧达 70 种，^①几乎囊括了莎氏的主要作品，不少重要剧作都有好几种译本，翻译质量更在不断提高。

在众多的莎剧翻译者中，首先应提到的是年轻的翻译家朱生豪。

朱生豪（1912—1944 年）出生于浙江嘉兴一个破落商人家庭，17 岁进入杭州之江大学主修中国文学并兼攻英文，打下深厚的中英文功底。毕业后留校，任《之江校刊》英文部编辑，不久经人推荐转入上海世界书局任英文编辑。1935 年，23 岁的朱生豪与世界书局签订了译莎合同，决心将莎士比亚的皇皇巨著介绍给中国，以填补中国文化界的空白。

为了做好译莎剧的准备，朱生豪从 1935 年春起，花了整整一年时间搜集莎剧的各种版本、诸家注释本及有关莎学的资料，比较和研究这些资料的优劣得失。一部英文版莎氏全集，他更是反复吟诵，仔细推敲，几达废寝忘食的地步。在做好充分准备后，他首先试译了莎氏后期的传奇代表作品《暴风雨》并获得成功，由此信心倍增。根据译《暴风雨》的体会，他制定了译莎的全面计划，预定两年内完成全部 37 个莎剧。

翻译本身难度极大，如为了一个词或一个句子的译法，往往要苦思几个小时。翻译不仅要在咀嚼原文的基础上注意字句的准确和流畅、韵脚和字数的推敲，还要考虑能否译出作品的神韵、人物的口吻。但在朱生豪的艰苦努力下，凭借深厚的语言文化功底，至 1937 年 6 月，拟译中的第一个分册“喜剧”已译就六七本并先后交付书局。按照这个进度，两年译完全剧是不难实现的。然而事与愿违。1937 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给朱生豪

^① 据《民国时期总书目·外国文学》统计。陆祖耀《莎士比亚作品的中译本》（《文汇报》1984 年 4 月 24 日）一文统计解放前共出版莎剧译作 50 种，此数字似有误。

的译莎工程带来沉重打击。“八·一三”战事爆发后，朱生豪的寓所被毁，已交付印刷的几个译本也毁于战火。朱生豪只身携带一箱莎剧和译稿逃离上海。半年后，为了译莎再返上海，就任《中美日报》编辑。在动荡不安的危困环境中，他仍笔耕不辍，矢志译莎。不料，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袭击了《中美日报》馆，朱生豪出逃，不仅丢失了全部生活用品、图书资料，而且数年颠沛流离中所补译的莎剧再次毁于一旦。他成了失业者，生活也陷入了困境。

难以想象的困难没有动摇朱生豪译莎的决心。他豪迈地宣称：饭可以不吃，莎剧不能不译。他把精力和时间全部投入到译莎上。先补译了战火中丢掉的莎剧第一辑，接着于1943年冬完成第二辑悲剧八种，1944年4月完成第三辑杂剧十种，之后又陆续译出史剧《约翰王》、《理查二世》、《亨利四世》。翻译获得了辉煌成果。

然而，困苦的生活条件，紧张到极点的翻译工作，损坏了朱生豪的健康，他患上严重的结核病。1944年11月底，32岁的朱生豪在完成31个半莎剧翻译后，带着没有最后完成莎氏全集翻译（未完成五个半史剧）、没有亲眼目睹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和中文莎士比亚戏剧出版的遗憾，离开了人世。

令人欣慰的是，在朱生豪病逝两年后的1947年，上海世界书局将他的译作分三辑出版，共收27个剧本，题为《莎士比亚戏剧全集》。195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将朱译全稿重新整理，把31种剧作180万字分编12册，以作家出版社的名义于1954年全部出齐，在海内外广为发行。朱生豪若在天有灵，也会感到欣慰的。

朱译莎剧问世后，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反响，台湾大学教授虞尔昌说：“1947年秋，我国首次出版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译作三辑传到海外，欧美文坛为之震惊，许多莎士比亚研究者简直

不敢相信中国人会写出这样高质量的译文。”^① 国内著名翻译家和翻译研究者也都公认朱生豪的莎氏译作不愧是我国翻译文学中的珍品，充分肯定了朱生豪在译介莎剧中的杰出贡献。方平在比较三四十年代出版的四个莎氏剧作译本（顾仲彝译、梁实秋译、曹未风译、朱生豪译）后得出结论，认为“以文字的妥贴和流畅而言，该以朱译本为第一，这是可以肯定的”。^② 卞之琳称赞朱生豪“译笔流畅，为在我国普及莎士比亚戏剧作出了最大的贡献”。^③ 罗新璋在《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一文中也指出：“朱生豪译笔流畅，文词华赡，善于保持原作的神韵，传达莎剧的气派。”^④ 这些评价都是符合实际的。

与朱生豪译莎剧同时，另两位年轻人也开始着手翻译莎剧。一是曹未风，他计划译出莎士比亚的全部剧本，但由于条件限制，经过十几年含辛茹苦的劳动，仅完成了11种。1942—1944年，他所译的莎剧由贵阳文通书店出版，题为《莎士比亚全集》。1946年，上海文化合作股份公司重印了其中的九种，与一种新译一起以《曹译莎士比亚全集》为名出版。新中国成立后，曹未风继续从事莎剧翻译工作，除再版了多种旧译外，又出版了一批新译。曹未风在我国文学翻译界享有盛名，拥有一大批读者。

另一位是梁实秋。他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散文家、文学批评家，也是一位成就卓著的莎士比亚作品翻译大家。30年代中后期，他就陆续翻译出版了莎剧八种，较曹未风、朱生豪译作的出版为早。1949年赴台定居后，在教学著作之余，继续埋头莎剧翻译，至1967年，终于将莎氏戏剧译毕，并由台北出版《莎士比亚戏剧全集》，共37卷。倾一人之力费数十年之时将莎剧全部

① 转引自吴治敏、朱宏达：《朱生豪传》，第130页，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② 方平译：《威尼斯商人·译者的话》，上海译文出版社1954年版。

③ 转引自吴治敏、朱宏达：《朱生豪传》，第139页。

④ 《翻译通讯》，1983年第7、8期。

译出，梁实秋为第一人。因此，他的译本的问世，也是中国翻译史上的一件大事。

除朱、曹、梁三位译莎大家外，曹禺、顾仲彝、周庄萍、孙大雨等人也有莎剧翻译问世，各具特色，亦受到广大读者欢迎。

几乎在莎剧翻译出现繁荣局面的同时，莎士比亚及其作品的评介研究工作也取得了很大进展。

1916年，孙毓修在《欧美小说丛论》中，比较具体地介绍了莎士比亚的生平和创作，这是我国首次对莎士比亚做较详尽评介。1918年，《太平洋》1卷9号刊登了《莎氏乐府谈》一文，这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评介莎士比亚的专论。20年代末30年代初，随着莎剧翻译和演出的日益增多，评介莎翁及其作品的文章也逐渐多了起来。这个时期评论莎士比亚最勤的是梁实秋，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他相继发表了近十篇莎评，文笔清新，颇有见地。留英女学者袁昌英也发表两篇有分量的莎评论文。袁昌英1916年赴英留学，攻读英国与欧洲文学，1921年以论莎士比亚名剧《哈姆雷特》的论文获文学硕士学位，是中国妇女在英国获文学硕士的第一人。回国后，她在北平女子高等师范、上海中国公学、武汉大学主讲莎士比亚，是我国第一位研究介绍莎剧的女学者。1930年、1935年，她先后发表《歌洛克》和《莎士比亚的幽默》两篇莎评，后文是民国时期较好的莎士比亚研究文章，解放后先后被台湾、大陆收入研究莎士比亚的论文集。据统计，从五四前后到解放前夕，国内发表的评介莎士比亚的文章近一百篇。^① 这些文章用今天的眼光看总体水平并不高，但在中国研究莎士比亚历史上的启蒙作用是明显的。少数文章达到一定深度，很有学术价值，如杨晦为他的译本《雅典人台满》撰写的长序，就是一篇有分量的莎评，被认为是“中国第一篇用马列主义

^① 莫自佳、王忠祥：《莎士比亚和他的戏剧在中国》，《外国文学研究》1986年第2期。

观点来介绍莎士比亚及其作品的重要论文”。^① 值得注意的是，从30年代开始，文艺界翻译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及苏联学术界有关莎士比亚的一些评论。马、恩的莎评虽然是些只言片语，但对我们的研究评论具有指导意义。苏联的莎士比亚评论集《莎士比亚新论》1943年由文汇书店出版，这些论文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批判吸收了欧美莎学的成果，对莎士比亚的时代、生平、思想、创作皆进行了探讨，对我国当时及后来的莎士比亚研究起了积极的作用。

最后介绍一下莎氏戏剧在中国演出的情况。

中国舞台上开始演出莎氏戏剧是在辛亥革命后。1913年，新民社在上海演出了《威尼斯商人》。^② 1914年、1915年，春柳社演出了《倭塞罗》（《奥赛罗》）、《铸情》（《罗密欧与朱丽叶》）、《驯悍》（《驯悍记》）。1916年，我国话剧运动先驱郑正秋的药风新剧社为了抨击袁世凯称帝，上演了根据莎剧《麦克白》改编的《窃国贼》。1916年至1917年，欧阳予倩演出了《鬼诏》（《哈姆雷特》）。此外，五四前后上演的莎剧还有《口孝与心孝》、《李尔王》、《孪生兄妹》（《第十二夜》）、《怨偶成佳偶》（《无事生非》）、《从姐妹》（《皆大欢喜》）、《医生女》（《终成眷属》）、《李误》（《错误的喜剧》）、《维也纳之梦》、《颧媒》（《暴风雨》）、《仇金》（《雅典的泰门》）等。^③ 以上这些上演的莎剧，皆根据林纾、魏易译的英国兰姆姐弟《吟边燕语》（《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改编，并不忠实原著，演员需要依照演出大纲在台上即兴表演，水平也不高。

中国剧坛严格依照莎翁原著进行演出是在30年代。1930年，上海“戏剧协会”在中央大会堂公演了《威尼斯商人》。这是莎

① 曹未风：《莎士比亚在中国》，《文艺月报》1954年第4期。

② 此剧当时名称较多，如《一磅肉》、《肉券》、《借债割肉》、《女律师》等。

③ 参见陈丁沙：《中国早期舞台上的莎士比亚》，《戏剧报》，1983年12月。

氏戏剧在中国舞台上第一次较严肃的演出。此次演出采用的是顾仲彝的译本，由应云卫执导。1937年，上海业余实验剧团在卡尔登戏院演出了《罗密欧与朱丽叶》。演出本依据田汉的译本改编，由章泯任导演，赵丹、俞佩珊分别扮演罗密欧、朱丽叶。这是莎氏戏剧在中国舞台上第一次成功的演出，受到戏剧界和广大观众好评。八年抗战中，无论“大后方”还是上海“孤岛”，都上演了不少莎剧，如国立剧专演出的《威尼斯商人》、《奥赛罗》、《哈姆雷特》，上海新生活话剧研究社演出的《铸情》（《罗密欧与朱丽叶》）等。其中，1944年，怒吼剧团以神鹰剧社之名在重庆排演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堪称抗战时期莎剧最高水平的演出。此次莎剧出演采用了著名剧作家曹禺的译本，台词优美，突出了莎氏原剧诗情画意的特色；著名导演张骏祥执导，享有“电影皇帝”之誉的金焰和著名演员白杨分饰男女主角，陶金、章曼萍、周峰等当时的名演员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演员阵容整齐强大。此次演出相当精彩，轰动了山城重庆。

民国时期的莎士比亚戏剧翻译、研究、演出三位一体，推动了我国莎学的发展，并为后来的莎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 英国作家来华

民国时期，首先到中国来的是萧伯纳。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 1856—1950年）是继莎士比亚之后英国最伟大的戏剧家，也是著名的讽刺作家和批评家，西欧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最杰出的代表之一，一生创作了52个剧本、5部长篇小说和大量评论文章，在一定程度上揭露讽刺和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伪善和罪恶。他在现代世界文坛上享有极高的声誉，1925年曾获诺贝尔文学奖。

1933年2月17日，萧伯纳偕夫人在环球旅行中到达上海。上午10时半，宋庆龄上船迎接萧伯纳。萧伯纳上岸后访问了著名学者、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中午应邀参加了在宋庆龄住宅

举行的午宴，出席作陪的有蔡元培、鲁迅、杨杏佛、林语堂、史沫特莱、伊罗生等人。下午先出席了世界学院的欢迎会，会后返宋庆龄住宅接见了中外记者，并回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晚6时返回原船，11时离沪北上赴秦皇岛，然后转车赴北京访问。

萧伯纳在上海停留不过短短的一天，却在中国文化界掀起一股热潮。在萧氏来华前后的数日里，鲁迅、郁达夫、林语堂、邹韬奋、张若谷、张资平等一大批文化名人纷纷著文，对萧伯纳予以介绍评论，有人赞扬他“不为帝国主义所利用”、“从资产阶级社会里出来，而揭穿这个社会的内幕”；有人推崇他的文学成就，高度评价他的幽默风格；有人希望以“他的精神的正当益壮”、“振作振作我国人里面未老而先现出的一副老腔老样”；^①也有人 对萧伯纳的倾向同情社会主义冷嘲热讽，予以批评。不同政治倾向的文人对萧伯纳表示了不同的态度。在萧伯纳离华后的几年里，萧氏戏剧的翻译也出现一股热潮，相继翻译出版了《人与超人》、《圣女贞德》、《乡村求爱》、《魔鬼的门徒》、《千岁人》、《日内瓦》等近十部萧氏戏剧，成为此期蓬勃发展的英国文学翻译中的重要内容。

继萧伯纳短暂访华后，在中国抗战期间，更有一大批英国作家来华。有的作家以中国抗日题材创作的作品成了他一生获得最高声誉的成就。以创作《华北前线》赢得了世界声誉的英国作家詹姆斯·贝特兰（J. M. Bertram）就是其中的一位。

贝特兰于牛津大学毕业后曾在伦敦当记者，1936年受英国《每日先驱报》、《曼彻斯特卫报》委派到北京任驻中国特派记者。从此，他一生的业绩都与中国的抗战事业连在了一起。到华后，他在燕京大学学习了一年中文，之后旅游到西安，正赶上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他以职业记者特有的政治敏感和对中国人民抗日热情的理解，迅速记下了这次事变的经过和他的感受，陆续

^① 《萧伯纳在上海》，第2页、3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发往英国，向西方世界最早报告了西安事变的信息。后来，他将这些报道汇为一辑，名为《中国的新生》。此后，为了全面准确地掌握中日双方的局势动向，他又来到日本。七七事变后，中日战争的帷幕全面拉开，为了尽快采访到中国人民抗战的新闻，他从日本迅速返回北平。之后，绕道山东、西安，直奔延安。在那里，他见到了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10月下旬，毛泽东连续几个夜晚向他发表了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谈话（这些谈话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并叫他在陕北“多走走，多看看”。随后，在八路军的保护下，他跨过黄河来到前线阵地，访问了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左权、贺龙等中国共产党和军队的领导人，也采访了八路军的普通指战员和战地的人民群众，考察了游击战的辉煌战绩，亲自经历了惊心动魄的战斗。延安和八路军前线之行，使贝特兰真正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所在，加深了他对中国革命斗争的了解，增进了同中国人民的友谊。1938年春，他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离开延安。回国后，他以采访的丰富资料为依据，创作了报道中国的第二本书《华北前线》。

《华北前线》一书，记述了贝特兰在抗战初期访问延安和山西前线八路军的经历，生动而朴实地报道了八路军的英勇战绩，精心描绘了八路军高级将领的英雄形象，及广大战士前赴后继、英勇杀敌的牺牲精神，也把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和已取得的成功告诉世界。此书资料极其珍贵丰富，是全世界不曾报道的独家新闻，加之作者分析深刻、见解独到、文字流畅优美，因此它在1939年出版后，立即成为英国的畅销书，并被苏联和世界各大国抢译过去。同年，中国译本也出版发行，被誉为《西行漫记》的姐妹篇。

《华北前线》创作的成功也使贝特兰声誉鹊起。1941年他被英国政府特聘为驻重庆大使馆新闻专员。到职后他赴香港考察，正赶上日军攻陷香港。由于撤退不及时，被日军所虏，送到日本监禁。日本战败投降后，他出狱回国，又写了《回到中国》、《在

今日中国的年轻旅行者》等回忆录和专著。

贝特兰为声援中国抗战、促进世界和平做出了杰出贡献。

抗战期间，像贝特兰这样致力于宣传中国抗日事业的英国作家不止一个。1938年武汉保卫战期间，奥登和伊修乌特就曾来到过中国。^①奥登是英国诗坛30年代崛起的“牛津派”诗人，他的诗以讽刺见长，总是毫不留情地嘲弄英国的现实环境，挖苦上流社会的虚伪；在艺术上，他不师陈规，不拘形式，雅俗并举。伊修乌特既写小说也写戏剧，也属英国的新兴作家群。二人长期合作，保持着亲密的关系。因此他们受英国《新闻记录周报》的委派，以记者身份联袂来到中国。

在中国期间，他们曾到汉口、陇海铁路沿线各战场及沦陷后的北平等地考察，并曾经上前线和普通士兵生活过一段时间。武汉保卫战前夕，他们到武汉各地演说，传达英国人民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在中国半年多的时间里，他们与中国人民结下了深厚感情，写下许多献给中国人民尤其是奋战在前线的中国士兵的诗歌，如《献给殉国的中国士兵》等。1938年底，他们回到英国，将在中国的全部创作汇编成集。共分四辑，一辑是日记，写他们在华的见闻；一辑是照片，是他们对全国各地抗战和沦陷区人民境遇的实况摄影；另外两辑是以中国抗战为题材写下的自由诗和十四行诗。此书完整记录了奥登和伊修乌特在华的足迹和支持中国抗战、呼吁世界和平的努力。在此后的日子里，奥登和伊修乌特继续关注中国的抗战事业。他们创办了一份文学刊物《新作品》，刊出了《中国抗战文学》专号，发表了大量的中国抗战文学作品。

与上述两位作家来华同时，英国女作家何登夫人作为英国援华总会特派代表、世界妇女反战会代表及《前驱日报》记者，也

^① 参见黄俊英：《二次大战的中外文化交流史》，第237—241页，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

来到中国。她先后赴汉口、湖南、广东、昆明、重庆等地考察，并沿途发表演说，坚信“拥有万万人民的中国，只要举国一致团结，人民尽其最后力量于国家，则最后胜利必属于中国”。^① 何登夫人的到来及演说给抗战中的中国人民以极大的鼓励。对此，《新华日报》特发短评表示感谢。

除上述知名作家外，抗战期间来华的英国作家还有一些。如约翰·索麦菲尔德曾于1939年在中国滇缅边境的英国部队服役。青年作家罗伯特·潘恩抗战中在西南联大执教，直至抗战胜利；他还创作了反映中国人民抗战斗争的小说《中国兵》，受到英国读者欢迎。维基·包姆也曾到中国考察，回国后创作出版了反日本法西斯的长篇报告《南京路》。^② 在支持中国反法西斯的斗争中，英国文坛的大批作家走到了一起。

三、留英学生与中英文化交流

1. 留英发展历程

民国时期的中国学生留英，和留美、留日及留学欧洲其他国家有所不同，既没有某一时期的人数骤增，也很少某一时期的人员断流，而是呈现出一种不间断的平稳发展的态势。

民国时期最早的留英学生，大概要算由临时稽勋局^③派出的留英生了。该局1912年、1913年先后两次派出赴欧、美、日各国学习的中国学生共51名，其中留英学生有十几名，涌现出李四光、王世杰等名人。同时，交通部也派出留英生15名，各

① 《何登夫人演说于昆明》，1938年10月16日《新华日报》。

② 参见《二次大战的中外文化交流史》，第244页。

③ 临时稽勋局是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由孙中山向参议院建议特设的，旨在奖励有功于民国人员。

省派出官费留英生近百名。^① 据初步统计，民国初期几年间留英的中国学生有一百三四十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兴起和欧洲各国物价、汇兑波动不定，中国留欧人数大增，尤其留法、留德学生，更大幅度增加。相对来说，20年代英国经济相对稳定，生活费用介乎德法之间，故留英人数没有大起大落现象。1921年，中国留英学生约有200人；1924年有250人；1927年有300人。^②

进入30年代后，留英人数有所增加。1934年至1936年人数鼎盛时，居留英国学生人数达500人。^③ 从1929年起，除二战期间的几个年份外，中国每年都要派出几十人乃至上百人的留英学生。请看下表：^④

年份	1929	1930	1931	1932	1933	1934	1935	1936	1937
人数	49	16	25	56	75	121	102	86	37
年份	1938	1939	1940	1941	1942	1943	1944	1945	1946
人数	40	26	—	3	46	1	156	1	41

从1929年至1946年，总共派出881人的留英队伍，人数仅居同期留日、留美生后而高居第三位。留英人数增加的原因如下：

一是受南京国民政府留学政策的驱动。20年代末30年代初，南京国民政府相继制定了《选派留学生暂时办法大纲》和

① 刘真、王焕琛主编：《留学教育》，第3册，第1524—1527页，台湾国立编译馆1980年版。

②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二），第24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留英学报》发刊词，1927年第1期。

③ 《留学制度之商榷》，《教育杂志》第25卷第10期，1935年10月。

④ 此表据陈启大：《近代中国留学史》（台北天一出版社1979年版）第474页改制。

《国外留学规程》，在各项建设事业出现转机的同时，也使留学教育走上正轨。留学政策的基调是在严格管理的基础上鼓励留学，以适应日益发展的建设需要。这恐怕是留英生增加的最大动因。

二是受当时日益严重的“毕业即失业”问题的影响。30年代留英的费孝通曾回忆说：“单靠一张大学的文凭，到社会上去，生活职业都没有保障。要向上爬到生活比较优裕和稳定的阶层去，出了大学的门还得更上一层楼，那就是到外国去跑一趟。”^①而英国作为欧洲文化的重镇，它在理工和人文某些学科方面的优势，确实吸引着一些青年学子前往。

三是庚款留英和互换留学生的出现，使留英生增加了三百多人的队伍。

关于庚款留英，由于它在民国留英史上的重要性，有必要做一专门介绍。1922年12月，协约国一战时所定中国庚款停付五年之期届满。英国政府宣布，以后中国应付庚款，英国准备全部退还，用于发展对两国互有利益之事。自此以后，英国即将中国逐期付去的庚款提存于伦敦汇丰银行，不再纳入国库。但此事因后来的英国会选举、内阁更迭而搁置。直到1925年，英国会才正式通过“中国赔款案”。为确定这笔款项的用途和管理办法，英政府成立了一个咨询委员会。该委员会派遣了一个由英人威林顿（The Viscount Willingdon）为团长，包括中英学者胡适、丁文江、王景春、安德森（Dame Adelaide Anderson）、苏得赫（W.E. Sothill）等组成的代表团，于1926年上半年分赴北京、上海、天津、南京等地调查。此次调查的报告，即作为此后中英两国换文的根据。1930年，中英两国正式换文，确定将退还的全部庚款作为基金，用于建设中国铁路和其他生产事业，然后以所得利息用来兴办文化教育事业，文化教育事业费的15%用于中

^① 费孝通：《留英记》、《过去的学校》（回忆录），第560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82年版。

国学生留英的费用。

1931年，中英两国根据上述换文成立了中英文教基金董事会，成员包括朱家骅、贺耐（William W. Hornell）、马锡尔（Robert Calder Mashall）、王家楨、宋子良、叶公绰、陈其采、李书华等十五人，朱家骅、贺耐分任正副董事长。该董事会自1933至1946年先后举行了九次庚款留英考试。^① 应考者须是专科以上学校毕业后继续研究所学专业或从事与所学专业有关的职业两年以上者，选拔十分严格。学习专业侧重理工科，旨在培养一批专门学者充实中国高等教育。学习期限为三年。庚款留英共选拔194人，人数虽不多，但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科学家，仅新中国的学部委员就有二十多名是庚款留英出身的，此外还有一些著名的人文学者如钱钟书、王佐良等。

1942年后，同盟国之间为加强文化联系，决定互换留学生。这年，英国文化委员会设置了10名留学生奖学金名额，英国工业协会资助了31名中国工科学生赴英国实习。1944年，英国上述机构再次赠送中国65名留英研究生和69名实习生名额。^② 这些留英生中的许多人亦成为中国留英史上的重要成员。

受二战的影响，英国大学的教学条件大受损害，加上战后青年军人复员后群返学校上学，因此二战结束后英国的大学无力再接纳大批外国留学生，故中国学生留英者很少。

民国时期中国学生的留英历程，大体如上。总而言之，这个时期的留英人数与留日、留美生相比要少得多，也赶不上留法、留德生，这似乎与英国在世界近代文化史上的地位不太相称。其原因恐怕主要与留英费用昂贵和某些英国大学门阀太高有关。英国的许多学校贵族气甚重，不仅收费高，而且不承认中国大学的

^① 九次考试时间分别为：1933年、1934年、1935年、1936年、1937年、1938年、1939年、1944年、1946年。

^② 刘真、王焕琛主编：《留学教育》第4册，第2127页。

毕业资格，还有的竟然拒收中国学生。面对种种阻难，一些中国学生只好转向他国。如周恩来最初本打算留学英国爱丁堡大学，抵英后因爱丁堡大学留学费用过高负担不起，只好改往法国勤工俭学。^①

中国的留英生主要分布于剑桥、牛津、曼彻斯特、利物浦、伦敦、爱丁堡、伯明翰、里兹、希菲尔、格拉斯哥等大学和部分专科学院、学校，其中30年代后的庚款留学生和1942年后的留英研究生则主要负笈剑桥、牛津、伦敦、爱丁堡等在欧洲大学史上享有盛誉的著名学府。30年代后，由于南京国民政府的提倡及出于充实大学理工师资的考虑，故留英所学专业理工科占了绝大多数。譬如在194名庚款生中，学理工的就占了148名。

英国学坛一向有着浓厚的绅士气息，一些中国学生沾染些许作风并为世人诟病亦不足怪。重要的是，留英生的主流以学业为重，读书极为刻苦，并取得相当耀人的成就。庚款生和留英研究生“在英成绩甚佳，颇得好评”，自不待言，因为他们在国内学业基础好。就是30年代前的留英生中，佼佼者也不乏其人。李四光、丁燮林、老舍、许地山等人足以成为留英生的骄傲。

有人在分析留英生特点时，曾以其既与辛亥革命无关、也与共产主义运动无缘为由，认为留英生不关心政治。的确，如果以留学生与中国近代政治的关系而论，留英生的确不像留日、留法、留苏学生那样在近代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关心政治。拿退还庚款用途一事来说，留英生就曾站出来发表自己的意见。退还庚款较少用于教育，曾引起议论纷纷。留英学生龚光远等人对此事极为关注。他们先是致函国内教育家及中华教育改进社，推举蔡元培先生同教育部共商处置赔款办法，旋又在英组织了留英学生退款兴学研究会，并于1924年4

^① 参见上奇生：《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第86—88页，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月在英通过议案七条，包括以庚款设置科学博物院、资助若干大学发展学术事业、购置图书、派留学生和交换教授等内容，^①显示出留英学生关心祖国文化事业的拳拳之心。这些建议曾引起当时中英人士的重视。又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进步人士曾组织了英国援华会。该组织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派人赴各地宣传中国的抗战。很多中国留学生参加了这项活动，成为该组织的特约讲解员。英格兰、苏格兰、南威尔士，到处留下他们奔波的足迹。此外，在英国民众强烈呼吁开辟西欧第二战场以钳制德军的活动中，也可以看到中国留学生的身影。^②新中国成立后，滞留英国的大批学生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抛弃舒适的生活和良好的工作条件，冲破种种阻挠，毅然回到国内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更体现了留英生的爱国情怀。

当然，留英生的主要业绩还是在学术事业上。他们引进英国的先进科技，传播英国和西方的现代人文社会科学，为推动中英文化交流，发展中国学术做出了杰出贡献。

附录：中国庚款留英生名单

第一届庚款留英生（1933年，9人）

王葆仁、林兆耆、石声汉、顾学勤、吴大任、李 祁、周传儒、戴克光、钱清廉

第二届庚款留英生（1934年，26人）

陈永龄、董铨林、夏坚白、王之卓、周宗莲、张有龄、童大坝、柯元恒、林致平、陈宗惠、邵象华、丘玉池、吴在东、何琴莲、

^① 林子勋：《中国留学教育史》，第390页，台北华冈出版有限公司1976年版。

^② 参见王嘉良、周健男：《萧乾评传》，第177—179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0年版。

朱应洗、李国鼎、钱临照、周鸿经、唐培经、杨人榘、俞大缙、任启元、丁 骥、钟道铭、林 超、袁 寿

第三届庚款留英生（1935年，24人）

钱宝钧、张承洪、苏元复、王祖舜、王德荣、张 创、杨仁杰、张文治、余瑞璜、张文裕、谢明山、彭蜀麟、李华宗、柯 召、吴仲贤、徐绍斌、章文才、杨会威、程裕淇、施正信、张 毅、钱钟书、朱廷丰、朱宝贤

第四届庚款留英生（1936年，20人）

赖宝勤、王绳祖、楼邦彦、李浩培、罗凤超、黎名郁、许宝騷、张宗燧、周长宁、翁文波、吴征铠、任美镛、李旭旦、朱王葆、王自新、俞调梅、李登科、辛一心、胡启勋、黄克维

第五届庚款留英生（1937年，25人）

戴文赛、马仕俊、卢嘉锡、谭桢谋、鲍觉民、叶和才、沈其益、汤逸人、王 栋、胡祥璧、唐世凤、王兆华、顾兆勤、张 维、黄玉珊、周家仁、陈 彬、李佩琳、张昌绍、袁家骅、许焯光、徐毓枬、程振粤、徐钟济、张天开

第六届庚款留英生（1938年，20人）

王大珩、彭桓武、黄用讷、徐近之、储钟瑞、铁 明、张民觉、朱树屏、宁 棣、赵国华、史家宜、张万久、夏震寰、卢焕章、璩定一、王应睐、王承绪、谢志耘、陈仲秀、王显湘

第七届庚款留英生（1939年，23人）

郭永怀、钱伟长、傅承义、汪盛年、林慰桢、张龙翔、沈昭文、林家翘、曹 隆、李春芬、罗开富、谢安祐、朱承基、姚玉林、张祿经、易见龙、宋 杰、曹 飞、张孟休、欧阳子祥、靳文

翰、陈春沂、韩德培

第八届庚款留英生 (1944 年, 30 人)

洪朝生、黄 昆、程 系、钟开笔、赵佩之、刘佩德、李文雄、沈中甫、王培生、白家祉、杨 琳、张沛霖、张建侯、杨时兴、姚钟秀、朱晓屏、朱宣仁、吴中伦、刘建康、李昌甫、朱继民、苏德隆、王正宪、陈顺理、黎禄生、程镇球、杨景年、刘家驹、樊星南、徐春霖

第九届庚款留英生 (1946 年, 17 人)

王佐良、白纯瑜、陈建光、钱荣堃、戴传曾、李天庆、汤宗舜、陈志让、邹承鲁、嵇汝运、周孝达、张沅昌、杨南生、支德瑜、陈安磐、周则巽、连孟雄

2. 留英生对祖国科技的贡献

留英生在学术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 其中最突出、最骄人的成绩当数自然科学领域。中国现代科技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 凝聚着众多留英科学家的心血和汗水。

为了清楚地说明留英生在中国科学界之地位, 其与中国现代科技发展之关系, 我们首先以新中国成立后三次 (1955 年、1957 年、1980 年) 选出的中科院学部委员为资料, 统计出有留英经历科学家的情况如下:

中科院学部委员民国时期留英情况一览表^①

姓 名	留英时间	留英学校	学习专业	备 注
王竹溪	? —1938	剑桥大学	物理	获博士学位

^① 此表据《中国科苑英华录——新中国之部》(上、下册, 科学普及出版社 1985、1988 年版) 编制。

姓名	留英时间	留英学校	学习专业	备注
王绶琯	1945—1952	伦敦大学	天文学等	
朱洪元	?—1948	曼彻斯特大学	理论物理学	获博士学位
许宝騄	1936—1940	伦敦、剑桥大学	数学	获哲学、科学博士
沈元	1943—1946	伦敦大学	空气动力学	获博士学位
李林	1945—1951	伯明翰、剑桥大学	金属物理学	获博士学位
张文裕	1935—1938	剑桥大学	核物理	获博士学位
张宗燧	1936—1938	剑桥大学	理论物理学	获博士学位
杨澄中	1945—1950	莱士特、利物浦大学	核物理	获博士学位
林同骥	1945—1948	伦敦大学	航空工程	获博士学位
胡济民	1945—1948	伦敦大学	核物理	获博士学位
柯召	1935—1937	曼彻斯特大学	数学	获博士学位
钱临照	1935—1937	伦敦大学	金属物理学	
黄昆	1945—1951	布里斯托尔大学	固体物理	获博士学位
程开甲	1946—1950	爱丁堡大学	理论物理	获博士学位
彭桓武	1938—1945	爱丁堡大学	理论物理	获哲学、科学博士
戴传曾	1947—1951	利物浦大学	实验核物理	获博士学位
王葆仁	1933—1935	伦敦大学	化学	获博士学位
卢嘉锡	1937—1939	伦敦大学	物理化学	获博士学位
刘有成	1945—1948	里兹大学	有机化学	获博士学位
朱亚杰	?—1949	曼彻斯特大学	化学工程	获硕士学位
苏元复	1935—1937	曼彻斯特大学	化学工程	获硕士学位
吴征铠	1936—1939	剑桥大学	物理化学	
高怡生	1948—1950	牛津大学	化学	
曹本熹	1943—1946	伦敦大学	化工	获博士学位
嵇汝运	1947—1953	伯明翰大学	化学	
王应睐	1938—1941	剑桥大学	生物化学	获博士学位
王善源	?—1948	伦敦EMI学院	电子工程	
冯德培	1930—1933	伦敦大学	神经生理学	获博士学位
冯兰州	1933—1934			博士进修
朱千保	1936—1939	爱丁堡大学等	生理学	获博士学位
朱既明	1945—1950	剑桥大学等	病毒学	获博士学位
邹承鲁	1947—1951	伯明翰大学	生物化学	获博士学位

姓名	留英时间	留英学校	学习专业	备注
陈华癸	1936—1939	剑桥大学	土壤微生物	获博士学位
邱式邦	1949—1951	剑桥大学	农业昆虫学	
周廷冲	1945—1947	牛津大学	生物药理学	获博士学位
张肇霖	1933—1935	后家邱植物园等	植物学	
俞德浚		爱丁堡植物园等	植物学	
裘成后	1946—1948	伦敦大学	植物学	
钟惠澜	1934—1936		热带医学	博士进修
姚鑫	1947—1949	爱丁堡大学	生物学	
秦仁昌	1930—1932			访问研究
殷宏章	1944—1945	剑桥大学	植物生理学	交换教授
曹天钦	1945—1951	剑桥大学	生物化学	获博士学位
蔡翹	1930—1932	伦敦大学等	生理学	博士进修
马杏垣	1946—1948	爱丁堡大学	地质学	获博士学位
王鸿祯	?—1947	剑桥大学	地质学	获博士学位
任美镔	1936—1939	格拉斯哥大学	地质学	获博士学位
李四光	1912—1919	伯明翰大学	地质学	获硕士学位
侯仁之	1936—?	利物浦大学	历史地理学	获博士学位
俞建章	1933—1936	布里斯托尔大学	地质学	获博士学位
翁文波	1936—1939	伦敦帝国大学	地球物理学	获博士学位
涂长望	1930—1933	伦敦大学	气象学	获硕士学位
夏坚白	1934—1935	伦敦大学	大地测量学	获工程师文凭
程裕淇	1935—1938	利物浦大学	地质学	获博士学位
傅承义	1939—?		地球物理学	
王之玺	1934—1936	希菲尔大学	钢铁冶金	
王大珩	1938—1948	伦敦大学等	应用光学	
史绍熙	1945—1949	曼彻斯特大学	工程热物理	获博士学位
庄育智	1947—?	利物浦大学	物理冶金学	获博士学位
李薰	1937—1951	希菲尔大学	物理冶金学	获博士学位
杨榘	1935—1940	格拉斯哥大学	船舶设计	
陈芳允	1945—1948		无线电电子学	从事研究
邵象华	?—1938	伦敦大学	钢铁冶金	获硕士学位
张作梅	1945—1951	希菲尔大学	机械工程学	获博士学位

姓名	留英时间	留英学校	学习专业	备注
张沛霖	1945--1949	希菲尔大学	物理冶金学	获博士学位
张恩虬	1945—?	飞利浦公司	电子管制造	
张维	1937—1938	伦敦大学	固体力学	获硕士学位
柯俊	1944—1948	伯明翰大学等	金属物理	
赵飞克	1930—1935	爱丁堡大学等	结构力学	获硕士学位
章名涛	1927—?		电机工程	进修
钱钟韩	1934—1937	伦敦帝国理工学院	电机	

在 469 位学部委员中，有留学经历的 389 人，其中民国时期的留英生 72 人，占有留学经历之学部委员的 18.5%。这个比例在中科学院部委员中仅次于留美毕业生而高居第二位。

学部委员（今中科院、工程院院士）是国家设立的最高学术称号，代表着中国科技队伍的水平 and 声誉。他们大都是中国现代科技事业的奠基者和带头人。因此，留英生对中国科技发展的作用是相当突出的。

如果我们将考察的范围扩大一下，结论也是同样的。据《中国科学家辞典》（现代卷）所收录的科学家资料，民国时期留学外国的科学家有 626 人，其中留英者就有 100 人，占同期留学科学家的 16%，也仅次于留美科学家的比例。

无论是中科院的学部委员，还是活跃于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学术团体的知名科学家，这些留英生为中英科技交流、中国科技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留英所学专业，大都是祖国缺乏而英国较发达的学科，学习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因此，他们如饥似渴地钻研这些先进的学科领域，努力掌握其研究方法，在较短的留学时间内就得其门径并取得一些重要成果。如空气动力学家沈元，其在留英期间所作博士论文，研究高亚音速流体流过物体时的流动计算问题，对当时解决跨音速飞行中的气动问题，具有开创意义，受到国内外空气动力学界的重视。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留英期间取得突出成绩，曾获爱丁堡大学哲学、科学两

个博士学位，并被选为爱尔兰皇家学会会员。神经生理学家冯德培，在英学习期间，从事神经和肌肉生理学的研究，完成不少引人注目的工作，其中关于肌肉放热的“冯氏效应”的发现，举世公认。生物化学家曹天钦，40年代末在英国首先发现了肌球蛋白物质的化学性质，受到国际同行的重视。物理冶金学家李薰留英期间对合金钢发裂原因的研究具有开拓意义。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在英国先进科学技术和严谨治学精神的熏陶下，留英生提高了科学素养，培养了高度的学术洞察力和至诚的求实精神，并熟练掌握各专门领域的系统知识和研究方法。回国后，他们以此为基础，致力于中国现代科技的奠基和发展，涌现出大批国际知名科学家并获得大量具有世界领先地位的科研成果。

譬如，在理论物理和核物理学领域，涌现了张文裕、王竹溪、杨澄中、彭桓武、程开甲等一批著名学者。张文裕在核物理理论、实验和宇宙线实验研究等方面取得重要成绩，对建设我国高能物理实验基地发挥了重要作用。杨澄中曾和赵忠尧一起领导了我国第一台静电加速器的研制工作，指导并参与了我国第一台高压倍加器的研制，在核物理研究中做出一批水平较高的研究成果并解决一些关键技术。王竹溪为统一我国的物理学名词、发展计量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化学、生物学领域，王葆仁、卢嘉锡、王应睐、冯德培、邹承鲁等人成为国际著名科学家。化学家王葆仁，解放后主要从事高分子合成研究，在科研、规划、教学、生产、出版、普及等方面都做出重要贡献，是我国高分子科学的创始人之一。原中科院院长卢嘉锡长期从事物理化学的研究工作，在原子簇化合物的结构化学研究上卓有成绩，他的“福州模型”在国际化学界获得较高评价。生物化学家王应睐，对琥珀的脱氢酶做了深入研究，澄清了国际上长期未能解决的问题，获全国科学大会重大成果奖。他还组织领导了我国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的研究工作，使我国

人工合成生物大分子的水平保持世界领先地位。冯德培留英归国后对神经肌肉接头生理学进行了大量的开创性研究，被公认为这一领域的先驱者，其成果至今仍被国际同行引用。邹承鲁是我国人工合成胰岛素工作的主要作者，他在研究中所提供的方法已被国际上广泛采用。

在地质学气象学领域，更涌现出李四光、翁文波、涂长望等享誉中外的著名学者。李四光的名字和事迹，由于著名作家徐迟的报告文学《地质之光》的发表，早已家喻户晓。他是国际著名的地质学家，地质力学的创立者，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科院副院长、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协主席和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副主席，是中国科学家的骄傲。翁文波长期从事地球物理勘探工作，创立了一整套适用于我国石油地球物理勘探的理论和方法，并参与指导大庆油田勘探和有关地震预报工作，成绩卓著。气象学家涂长望早在英国读书期间就被推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回国后开创了我国长期天气预报的研究工作，提出了一些重要理论和观点，为国防和国民经济建设打下良好基础。

此外，在工程技术等领域也涌现出王大珩、史绍熙、陈芳允、李薰等著名科学家，他们在应用光学、内燃机、无线电电子学等领域做出了突出成绩，享誉国内外。^①

留英科学家在从事科研工作的同时，还积极参与组织科技团体，创办科学刊物，为传播英国的先进科技，发展中国科学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1912年，留英学生丁绪贤、王星拱、石瑛等人成立了“中国科学社”；1920年，留英科学家丁文江、李四光联合其他科学家成立了中国地质学会；同年，以留英生为主的中国学生创办了《科学季刊》；1945年，李四光、涂长望和其他一些科学家共同创建了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新中国成立后，留英

^① 参见《中国科苑英华录——新中国之部》（上、下册）；《中国科学家辞典》（现代卷）。

科学家更成为创办、参与科技团体、科学刊物的主力成员之一。此外，留英生学成归国后，大都工作在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他们将学来和发展了的科学知识、方法及其成果应用于教学工作中，培养了大批科技人才，使先进的英国科技在中国生根开花。

在人才辈出的留英科学界，地质学家李四光是最杰出的代表。他对中英地质学交流、中国地质学的发展功不可没。1913年，李四光进入英国的伯明翰大学。经过一年的预料和采矿科学习后，转入地质系，师从于英国的著名地质学家包尔顿(W.S. Boulton)教授。在近代地质学的启蒙运动中，英国居重要的位置。伯明翰大学也以历史悠久、设施好、师资强享誉教育界。李四光充分利用英国的有利条件，在地质学理论和实际地质知识方面狠下苦功，1919年以长篇论文《中国之地质》获得硕士学位。1920年，他回到国内，凭着留英六年打下的雄厚地质学基础，对地质学的诸多领域进行了深入研究，获得巨大成果。他发现了我国第四纪冰川的存在，为该领域的研究揭开了新篇章；他用力学的观点研究地壳运动的现象，探索地壳运动与矿产分布的规律，建立了“构造体系”这一地质力学的基本概念，从而创立了一门新的边缘学科——地质力学；他的关于华夏构造体系三个沉降带具有广阔找油前景的论断，对大庆、胜利、大港等油田的相继发现具有指导意义。

李四光的成就得益于他的勤奋努力，也得益于留英期间打下的扎实功底。在归国后的岁月里，他仍然注重于中英地质学交流，既宣传了中国的地质学，也从中汲取了有益营养。1934年12月，根据中英两国交换教授讲学的协议，李四光应邀到英国讲学。在半年的讲学时间里，李四光同英国地质界的新老朋友广泛接触，对许多学术问题开展了讨论，双方都感到获益匪浅。讲学结束后，李四光应英国地质界朋友的请求，又在英国住了一年，将讲稿整理成书。1948年2月，李四光三度赴英，参加了在伦敦举行的第十八届国际地质学会。会上，李四光宣读了题为

《新华夏海的起源》的论文，受到广大与会者的重视和高度评价。

3. 留英生与中英人文社会科学交流

作为近代西方文化的重镇，英国不仅在自然科学的某些领域居世界领先地位，在文学、哲学、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也颇具特色。因此，尽管民国时期留英的文科学生并不多（如庚款留英生中只有46人学文，还不到庚款生的四分之一），但还是产生一批蜚声中外的硕学名流，成为推动中英文化交流、促进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力量。其杰出者，按留英时间顺序，包括陶孟和、徐志摩、傅斯年、金岳霖、许地山、老舍、朱光潜、钱钟书、向达、费孝通、杨宪益、萧乾等人。此外，还有杨人楩、叶君健、王佐良等人。请见下表：^①

中国著名作家、社科学者留英情况一览表

姓名	留英时间	留英学校	学习专业	备注
陶孟和	1913--1915	伦敦经济政治学院	社会学	
徐志摩	1920.9— 1922.9	剑桥大学	经济学、 文学	留英前曾在美国学习 两年经济学
傅斯年	1920—1923	伦敦大学	实验心 理学等	
刘半农	1920年春— 1921年夏	伦敦大学	文学	
金岳霖	1922—1926		哲学	留英前曾在美国学习 并获博士学位
许地山	1924.9— 1926.10	牛津大学	文学、宗教	留英前曾在美国学习 并获硕士学位
老舍	1924—1929	伦敦大学东方学院	文学	教授汉语和中国文学

^① 此表系根据相关人物传记及有关辞书制成。

姓名	留英时间	留英学校	学习专业	备注
朱光潜	1925—1933	爱丁堡、伦敦大学	文学、美学、哲学	获博士学位
朱自清	1931.9—1932.4		文学	进修
钱钟书	1935—1937	牛津大学	文学	获学士学位
向达	1935—?	牛津大学、大英博物馆	敦煌卷子	
杨宪益	?—1940	牛津大学	文学	
费孝通	1937—1939	伦敦经济政治学院	社会学	获博士学位
杨人楩	1934—1937	牛津大学	史学	
萧乾	1939—1946	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牛津大学	文学	教授中国文学,学习英国文学
叶君健	1944—1949	剑桥大学	欧洲文学	
王佐良	1947—1949	牛津大学	英国文学	

毫无疑问,英国博大精深的学术文化对这些留英生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从上表可以看出,这些学文的留英生大都负笈牛津、剑桥、伦敦等著名学府。牛津是英国和欧洲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这里人文荟萃,聚集着世界著名的专家学者,尤其是它拥有世界上第一流的图书馆——牛津博德利图书馆,其藏书远比国内图书馆丰富得多。著名作家、学者许地山、钱钟书等人二三十年代先后在这里求学,尽情饱览浩瀚如海洋般的书籍,在文学、哲学、心理学、比较宗教等方面狠下了苦功。他们究竟在这里读了多少书,谁也不知道,就连他们本人也难以说清。^①他们日后的博学及在创作、研究上所取得的重要成就,显然与在牛津的求学是分不开的。

^① 参见宋益乔:《许地山传》,第81页,海峡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孔庆茂:《钱钟书传》,第78页,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剑桥大学的历史与牛津同样古老，在二战前它就拥有二十多个学院，学科门类齐全，不知出过多少闻人学士。中国现代著名诗人徐志摩、作家萧乾等人曾先后在这里读书。正是在这里，徐志摩深受剑桥文化的熏染，接触到更多的英国诗歌，并开始了自己的诗歌创作。萧乾在伦敦东方学院教授中国文学的同时，到剑桥皇家学院潜心攻读英美意识流派小说。尽管由于种种原因，他的学术研究没有持续下去，但剑桥的学习生涯在他一生中有着特殊意义，对他后来从事中英文化交流大有裨益。^①

伦敦大学、伦敦经济政治学院虽不及牛津、剑桥那样古老、学科齐全，但在某些学科领域及教学方法上亦颇有值得学习之处。著名作家老舍 20 年代曾在伦敦大学教授汉语五年，在这里，他大量阅读了英国文学作品并开始写作生涯。他后来回忆说：“我是读了些英国的文艺之后，才决定也来试试自己的笔。狄更斯是我在那时候最爱读的，下至于乌德豪司与哲布扣也都使我欣喜。”著名社会学家陶孟和、费孝通先后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求学，那里的业师制度、“席明纳”教学方法使他们深受影响，尤其处于社会学领域前沿的英国功能学派的研究方法更使他们终身受益。

如果说，著名学府使留英生学到了先进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和方法，那么英伦良好的文化氛围和丰富的文化生活同样使他们受到英国人文环境的熏陶和感染。在伦敦，既有举世闻名的大英博物馆，又有不起眼的小小诗铺和林立的旧书店，还有世界著名的大文豪莎士比亚、狄更斯、济慈、加莱尔的故居和遗迹。这些地方深深吸引着留英生。此外，听音乐、看芭蕾、参观画展和各种博览会也是他们课余生活的重要内容。这些人文学科学生的成长都是必不可少的。

^① 参见《徐志摩选集·序》，第 12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 年版；王嘉良等：《萧乾评传》，第 185 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0 年版。

学成归国后，这些留英生努力介绍传播英国的人文社会科学，获得一批重要成果：

在哲学领域，深受休谟和罗素哲学影响的金岳霖，回国后亦以介绍休谟、罗素哲学为己任。1938年，他出版了国内第一部较系统地介绍西方数理逻辑的著作《逻辑》，以大部分篇幅介绍了罗素的数理逻辑。他还经常在课堂上一字一句地教学生念休谟的《人性论》，介绍休谟哲学。

在史学领域，向达译有帕刻的《鞑靼千年史》（1936年）、《匈奴史》（1934年），斯坦因的《斯坦因西域考古记》（1936年）；杨人楩译有芒图的《十八世纪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张芝联译有巴葛的《英国大学》（1948年）等。

在经济学领域，滕茂桐译有《资本主义发展之研究》、《专门化商店服务方法的改进》等。

在文学领域，老舍虽未专门从事英国文学翻译，但多次介绍了英国文学。1930年11月，他在《文学时代》创刊号上发表了《一个近代最伟大的境界与人格的创造者——我最爱的作家——康拉德》一文，对波兰籍英国小说家康拉德及其作品进行了介绍并给予高度评价；1936年9月，他在《宇宙风》第24期上，从总结借鉴外国创作经验出发，分析了哈代、康拉德、劳伦斯等著名英国作家在景物描写方面的得失；1956年，在纪念萧伯纳诞辰100周年之际，他翻译了萧伯纳的话剧《苹果车》。萧乾在对外介绍中国文学的同时，也翻译了一些英国文学作品，其中《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文笔流畅，故事情节引人入胜，受到读者普遍欢迎；他还翻译了被誉为“英国小说之父”的亨利·菲尔丁的政治寓言小说《大伟人江奈生·魏尔特传》，亦产生一定影响。杨宪益译有萧伯纳的《凯撒和克丽奥帕脱纳》、《英国近代诗抄》；卞之琳译有《一九三九年以来英国散文作品》；钱歌川译有辛克莱的《地狱》、哈代的《娱妻记》。

此外，在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领域也引进一批英国

作品。

这些成果的引进，增进了人们对英国人文社会科学的了解，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创作与研究提供了有益的营养和借鉴。

与此同时，留英的作家和社科学者依据英国和西方的创作方法、学术思想进行创作和学术研究，使外来的文化在中国生根成长。文学方面，徐志摩之于英国的“湖畔派”，老舍之于狄更斯和康拉德，无不体现了留英作家创作初期对英国文学创作范式的模仿。在模仿中创造，在模仿中提高，英国文学作品最终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有益成分。美学方面，朱光潜以英国和西欧的美学思想为基础，30年代撰著了《悲剧心理学》、《变态心理学》、《文艺心理学》、《谈美》、《诗论》等大批美学著作，将英国和西方美学移植到中国。在社会学领域，曾同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师从霍布浩斯和韦斯托马克的陶孟和、梁宇皋，引进英国和西方社会学注重社会实地调查的方法，合著了《中国乡村与城市生活》，之后又成立北平社会调查所并开创了对中国家庭与生活标准的研究，在社会学界产生较大影响。费孝通以英国功能学派注重社区研究的方法，撰写了《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生活》），对社会学的社区研究做出贡献。哲学方面，金岳霖1944年出版了《论道》，构筑了一套由道、式、能诸范畴组成的玄学体系。他一方面运用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名词，另一方面又在论证上遵循了英国及西方式的严密逻辑思维，是中英、中西哲学交流的典范。

尤为可贵的是，留英生在引进传播英国文化的同时，满腔热情地向英国介绍宣传中国文化，真正实现了中英人文学术的双向交流。

老舍在英期间，编写了一本《汉语声片》教材，1930年在英出版；他还担任了“灵格风”汉语教学唱片全部30课的北京音朗读工作。这部教材和这套唱片是最早教外国人说汉语的普及教学音响资料。与此同时，他还帮助英国学者艾支顿将中国古典名著《金瓶梅》译成英文。为此，艾支顿在1939年出版的该书

首面上写道：“献给我的朋友——舒庆春。”在译者注上他还写道：“我在此特别向舒庆春先生致谢，……如果没有他的不屈不挠的慷慨的帮助，我根本没有勇气接受这件翻译任务。”^①老舍为传播汉语和中国古典文学做出了贡献。

许地山刚到英国时，正值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与英国社会学会将联合举办一次“帝国宗教大会”。这是一次国际性的学术交流，规格高，议题涉及到世界各民族的宗教研究，参加者是东西方各国最优秀的宗教学者。如此广泛的会议，竟没有一个中国人参加，也没有一篇研究中国宗教的文章。许地山深感痛心。为了向国际学术界展示中国人的研究成绩，许地山赶写了一篇题为《道家思想与道教》的文章，由他的英国老师伊文思先生译成英文后提交大会，获得极高评价。会后，不少外国学者纷纷拜访年轻的许地山。作为此次会议的成果，英国的一家出版社出版了《帝国的宗教》一书，许地山的文章占了其中的两章。^②

二三十年代留学剑桥的初大告，在学习英国文学的同时，开始英译中国古典诗词、哲学及其他文学作品，出版了《中华隽词》、《老子道德经》、《中国故事选译》等作品。译笔深得原旨，保留了原作风韵，并以英国读者喜闻乐见的语言形式予以再现，语言简洁流畅，节奏鲜明，深得伦敦文坛的好评。

萧乾旅居英国七年，一身数任，既当过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讲师，教授中国现代文学；又做过剑桥大学的研究生，攻读英国文学；还于二战后期充当了西欧战场上的记者，向国内报道海外战况，是一名典型的文化交流使者。他在向海外读者介绍中国现代文学方面取得了辉煌成绩。在东方学院的课堂上，在英国援华会安排的集会里，他向英国学生、听众不遗余力地介绍宣传了中

^① 舒乙：《老舍》，甘海岚编《老舍年谱》，第17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

^② 参见宋益乔：《许地山传》，第82—84页。

国的新文艺运动发展的曲折历程，并将这些东西著成五部英文著作，由伦敦的出版社出版。这五部著作是：《苦难时代的蚀刻》（1943年）、《中国而非华夏》（1941年）、《龙须与蓝图》（1944年）、《千弦琴》（1946年）、《蚕》（1943年）。其中最有影响的是《苦难时代的蚀刻》。这部副题为《中国当代文艺的一瞥》的著作，概括阐述了新文学运动以来25年间（1917—1942年）小说、诗歌、戏剧、散文、文学翻译五个领域的成就，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和特点做了精辟的分析。著作不仅介绍了现代中国的第一流作家，还涉及一大批30年代崛起的后起之秀，对文学各门类的代表作家、不同文学流派，都有专题论述。史料之丰富，论述之全面，堪称一部优秀的现代中国文学史。此书对打破中西方文学之间严重的隔膜状况、向外传播中国现代文学极有意义。该书出版后，在英国引起热烈反响。《泰晤士报》文艺副刊、《新政治家与民族》、《观察家》、《论坛》、《听众》等刊物都载文推荐，称道此书包罗宏富，立论谨严，文字简洁明晰，使对中国现代文学朦胧无知的读者不但大开眼界，而且深受教益。《观察家》载文说：“凡是有志于研究东西方关系的人，都应该仔细读一读萧乾这本文笔精炼而优美的论著。”^①

四、英国的汉学研究

1. 英国汉学研究的发展

20世纪上半叶，随着中英交往的扩大和英国在华利益的需要，英国的汉学研究迅速发展起来，继理雅各、威妥玛、德庇时、翟理斯之后，又涌现出亚瑟·韦利、阿·克·穆尔、爱德华兹、翟林奈、倭纳、苏慧廉、修中诚等一大批有名的汉学家。他们继

^① 参见王嘉良等：《萧乾评传》，第274页。

承了欧洲汉学传统，注重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哲学等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撰著、翻译了大批著作，有的汉学家还在大学开设汉学讲座、创立汉学科，培养汉学人才，使这一时期的英国汉学研究出现了可喜的繁荣局面。

亚瑟·韦利（Arthur Waley, 1888—1966年）早年在剑桥大学学习，师从著名教授迪肯森（G.L. Dickinson）和摩尔（G.E. Moore），两位学者仰慕东方古代文明的思想熏陶着他，使他产生了致力于东方文化研究的愿望。1913年离开剑桥后，他放弃父亲为他选择好的经商之路，进入大英博物馆东方部做馆员，负责整理中国敦煌书画、雕刻，同时自学中文。1929年，他因健康原因辞去博物馆工作，全力投入汉学研究，专攻中国思想史、中国绘画史和中国文学史，到1966年去世，撰著、翻译了近百部著作，发表了大量文章。其中，1918年伦敦和纽约同时出版的《中国诗一百七十首》，收录了从先秦至明末的诗111首，白居易诗59首，翻译采用了直译的方式，不压韵的自由体诗的形式，深受汉学界的好评；1937年翻译出版的《诗经》一书，打破了《诗经》风雅颂的原来次序，根据诗歌内容重做编排，充分体现了他的汉学造诣。此外，他撰写的《白居易的生平和时代》、《李白的诗歌与生平》，翻译的《中国诗选》、《诗人李白》、《中国古诗集》等著作，也都在西方汉学界产生很好的影响。

阿·克·穆尔（Arther Christopher Moule, 1873—1955年）是剑桥大学的汉学教授。他早年在剑桥大学学习，毕业后曾作为建筑师在中国工作过，后来在山东做传教士，1908年回国。1933年到1938年出任剑桥大学中国语言和历史教授。他先后出版了《155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1930年）、《马可波罗游记校注》（与伯希和合作完成，1938年）、《杭州》（1956年）、《中国的统治者》（1957年）等著作，受到英国及西方汉学界的重视。

爱德华兹（Evangeline Dora Edwards, 1880—1957年）即叶女

士，出生在中国，父亲是来华的传教士。她 1933 年任伦敦大学汉文教授，专门研究中国文学，在中国文学作品翻译领域成就卓著。1938 年伦敦阿瑟普洛普斯坦因公司出版了她译著的《中国唐代散文作品》，收入了晋代著名的志怪小说集干宝的《搜神记》中的有关篇章、唐代传奇《李娃传》及《太平广记》中的个别传记材料。

翟林奈 (Lionel Giles, 1875—1958 年) 是英国第一代汉学家翟理斯之子，出生在中国，子承父业，成为英国第二代汉学家中的佼佼者。他翻译的《唐写本搜神记》刊登在 1921 年的《中国新评论》第 3 期，内容包括《搜神记》的部分译文和部分论述介绍。1938 年，他编写的《中国的不朽长廊》由伦敦约翰·默里出版社出版，其中收集了他翻译的《三国演义》的部分片断。

倭纳 (E. C. Werner, 1864—1954 年) 曾于 1884 年来中国，历任英国驻北京及其他各地的领事、清政府的历史纂修官，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学有很深的造诣。他的译著《中国的神话与传说》，1922 年由伦敦 G·C·哈拉布公司出版，译介了《搜神记》和《聊斋志异》中的五个短篇（《河间生》、《毛狐》、《酒友》、《真生》、《侠女》）等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

苏慧廉 (William Soothill) 是传教士出身，曾在中国传教、办学二十多年，1907 年被任命为山西大学西斋总教习。回国后于 1920 年被牛津大学聘请为第三任汉学讲座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历史的研究，著有《中西交通史大纲》、《中国史》、《中国和英国》等汉学著作。

修中诚 (Ernest Richard Hugnes) 曾任牛津大学的中国哲学和宗教讲师，1939 年，在牛津大学汉学讲座教授空悬的情况下，由他主持，进行了牛津大学汉学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创立了汉学科，确定了本科四年制的课程内容和考试方法，设置了正式学位。从此，牛津大学汉学讲座的重心从经院式研究转到开放式教育上来。

在英国汉学发展史上，还有一位值得一提的人物，即剑桥大学从德国聘请的著名汉学家古斯塔夫·哈隆（Gustav Haloun, 1898—1951年）。哈隆出生于奥地利，先后在维也纳、莱比锡学习汉学，受业于德国著名汉学家孔拉迪，后担任德国哥廷根大学的汉学教授。他的研究领域是先秦语言和历史，出版有《中国古代部落分布研究》、《中国人知道大夏人或印欧人始于何时》，在西方汉学界享有盛誉。1938年，他出任剑桥大学汉学教授，标志着剑桥大学的汉学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政府开始重视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增拨了经费，设立了一个专门的大学委员会来检讨和促进大学的中国学研究。学习汉学的学生也有显著的增加。借此东风，哈隆于1948年邀请欧洲的汉学家聚首剑桥，共商振兴欧洲汉学研究的大计，扩大了剑桥大学汉学研究的影响。这次会议成为后来每隔两年一次的“欧洲汉学家会议”的起源。为了丰富剑桥大学汉学研究的图书资料，哈隆1949年还亲自到中国和日本购置图书。哈隆为剑桥、为英国汉学研究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总起来看，英国这一时期的汉学研究大抵没有超出欧洲传统汉学的范围。涉及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中国古代历史、中国古代文学和传统中西关系等方面。尤其在中国古代文学翻译方面更是取得显著成绩。除上面提到的译著以外，还有克兰默一宾的《汉诗选译集》（1916年），马瑟斯的《清水园》（1920年），巴德的《古今诗选》（1922年），初大告的《中国抒情诗选》（1937年），哈特的《牡丹园》（1938年），休斯的《中国的骨与魂》，翟林奈的《仙人群像：中国列仙传记》（1938年），豪厄尔的《反复无常的庄夫人及其他中国故事》（1925年），阿克顿的《四谕书》（1948年），邓罗译的《三国演义》（1925年），杰弗里·邓洛普译的《水浒》（1929年），海伦·M·赫斯译的《佛国天路历

程：《西游记》（1930年），等等。^①

2. 李约瑟的早期来华活动和著述

在英国汉学史和中英文化交流史上，有一个人的名字是不能忘记的，他就是被人们称为“当代利玛窦”的李约瑟博士。他倾其一生撰写的鸿篇巨制《中国科学技术史》为西方的中国学研究树起一座令人叹为观止的丰碑。他早期的来华活动和著述构成民国时期中英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

李约瑟1900年出生于英国伦敦。23岁时在剑桥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和科学博士两个头衔。此后继续钻研，到30年代，已经成为英国著名的生物化学家、胚胎学家，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三位专攻生物化学的中国青年学者来到李约瑟夫妇^②所在的剑桥大学，攻读生物化学博士。他们是来自燕京大学的沈诗章、金陵大学的王应睐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鲁桂珍。其中鲁桂珍在李约瑟夫人李大斐的研究室进修，她们的实验室恰好在李约瑟的实验室对面，每日都能相见。而由于生化研究的相同专业以及中国学生之间的频繁往来，李约瑟也和沈诗章、王应睐建立了个人友谊。在和三位中国同行特别是和鲁桂珍的交往中，李约瑟受到深刻影响。鲁桂珍告诉李约瑟，人类历史上的一些很基本的科学技术，是从中国的土地上生长发展起来的。正是中国的科学成就一度使西方的科学技术获得很大的发展，那种认为只有西方发展了科学技术的观点荒唐至极。鲁桂珍还用一些具体史实作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领先于西方这一观点的佐证。鲁桂珍的这番话对于长期埋头于西方科学的李约瑟不啻是一声惊雷，使得他不仅对鲁桂珍这位东方女性另眼相看，更对博大精深

^① 参见马祖毅、任荣珍：《汉籍外译史》，第235—265页，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② 李约瑟的夫人莫伊尔也是一位杰出的生物化学家，汉名李大斐。

的中国古代文明特别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一见钟情”。他说：“我爱上了中华文明”，“中国人所谓的‘苍天’对我另有安排”，“命运使我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皈依到中国文化价值和文明这方面来”。从此，李约瑟把毕生精力贡献于中国科技史研究工作，决心撰著“一本过去西洋文献中旷古未见的关于中国文化中的科学、技术、医药的历史专书”。^①

为了实现自己的宏伟目标，李约瑟开始努力学习汉语和汉字。他向中国留学生学，向著名的汉学家学。在学习汉语过程中，他还创造性地发明了一套学习方法。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李约瑟终于学习和掌握了足够的汉语知识，使他能够在撰写中国科技史时直接利用中文原始资料。他后来说：“我一直觉得，为了东亚研究的课题，以优异成绩通过语言考试而在教室学习汉语，和不带功利目的、作为一件有趣的事而学习，这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自那以后，我阅读汉语开始摆脱初级的‘ABC’阶段，进入了如夏日遨游江河那样的畅达阶段。”^②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历史给李约瑟提供了一次实地考察和了解东方文明的机会。1942年秋，英国政府决定派科学家和学者前去访问和支援战时的中国。当时，英国学者中懂得中文者极少，因此初通中文并对东方文明有着强烈兴趣的李约瑟以及牛津大学的希腊文教授多兹被选中。他俩受英国文化委员会和英国生产部等机构的资助，组成“英国文化科学赴中国使团”，代表皇家学会赴中国进行科学文化交流。

1943年2月，李约瑟与多兹从印度加尔各答出发，飞越喜马拉雅山来到中国云南。他们首先在昆明逗留了数周。期间，李

^①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规划与现状》，见张孟闻编：《李约瑟博士及其〈中国科学技术史〉》，华东师大出版社1989年版。

^② 李约瑟在第一届福冈亚洲文化奖特别奖受奖纪念演讲会上的讲话（1990年9月4日），见王国忠著：《李约瑟与中国》，第59页，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1992年版。

约瑟先后参观访问了西南联大、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等机构，和中国科学家进行了极为广泛的接触，结识了一批著名的中国科学家，这为他日后写作中国科技史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在50年代《中国科技史》第1卷出版之际，李约瑟在该书序言中向在昆明时给予他帮助的诸多中国学者表示了衷心的感谢。他说：“1943年初我刚到昆明时，在这方面给我帮助的人士中间有史学家雷海宗和闻一多（后者在担任民主同盟的领导工作时被暗杀了）。牛津大学的汉学家修中诚博士当时和闻一多教授一起工作，对修中诚博士给我长时间富有启发性谈话的机会，我愿在此表示感谢。在科学家当中，钱临照博士对《墨经》（公元前4世纪）中的物理学原理所作的阐释使我惊叹不已。华罗庚教授曾帮助我了解中国的数学，而经利彬则帮助我了解药理学方面的资料。”^①

在结束对昆明的访问后，李约瑟又飞到重庆。经过一番考察，他认为在中国战时陪都支持和帮助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坚持科学研究的中国科学家们不仅是必须的，而且是大有可为的。他建议英国政府在重庆设立一个为中国科技界服务的机构，具体任务包括保证中国和西方国家科技界的通讯、接触和交流；赠送英国出版的书籍、图片、制作的标本，代购仪器和药品；推荐中国优秀科研成果到欧美出版的刊物上发表；接受科学技术问题的咨询；资助或邀请中国学者赴英研究考察，延请英国专家来华讲学。^②李约瑟的建议得到英国驻华大使霍勒斯·西摩爵士（Sir Horace Seymour）的理解和支持，也得到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中国国防科学促进会的资助。1943年6月，英国政府批准了李约瑟的建议，“中英科学合作馆”（Sino-British Scientific Cooperation Office）终于成立，李约瑟出任馆长。从此，李约瑟以巨大的热情全身心

^①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序言》第1卷导论，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② 徐遵亭：《李约瑟博士与中国科学》，《自然杂志》1980年第12期。

地投入了以科技援华的伟大工作。

科学合作馆的成员除李约瑟外，还有六位英国科学家和十位中国科学家。他们的工作是极其繁忙和艰苦的。他们通常经海陆两路向中国科学界运送科学仪器物资，在紧急情况下便经该馆驻加尔各答的购物代理人在印度购办急需物资，然后由英国皇家空军飞机飞越喜马拉雅山迅速运到昆明，再分发中国有关各地。在李约瑟及其同事的努力下，科学合作馆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战时中国科研机构设备不足、图书资料缺乏的困难，同时还以论文的形式组织中国科学家和盟国同行之间进行了交流。在努力援助中国科技界的同时，李约瑟也在努力进行他的中国科技史研究工作。他的这一工作在战时中国的大后方得到众多中国科学家和学者的大力支持，郭沫若、冀朝鼎、陶行知、邓初民、林祖涵、侯外庐、冯友兰、王星拱、侯宝璋、郭本道、张孟闻、张资拱等人，都曾给李约瑟以指点和帮助。在这些中国学者的帮助下，李约瑟在大后方搜罗到数量极为可观的中国古籍，为他战后回国从事中国科技史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为使中英科学合作馆充分发挥作用，李约瑟需要尽快了解中国大后方各科研和教育机构最需要哪些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同时也需要向国际科学界及时输送战时中国的科研信息动态。为此，在1943—1944年间，李约瑟偕秘书黄兴宗等长途跋涉，历尽艰辛，辗转数千里，前往西南、西北、东南进行了三次考察。

西南之行，李约瑟访问了迁到川西的武汉大学，结识了著名的植物生理学家石生汉教授，以后《中国科技史》农业卷的写作得益于此人之处甚多；参观了川南自贡的自流盐井，这给李约瑟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多年后，他回忆在自贡的见闻仍激动不已，充分肯定现今勘探油田所用的钻深井或钻孔的技术无疑是中国人的发明，大量文献资料证明早在汉代这种技术便已在四川应用。此外，李约瑟等一行还访问了迁到南溪县李庄的同济大学，会见了多年前在比利时相识的实验胚胎学家童第周；参观访问了

同在李庄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学研究所和考古博物馆。在那里，李约瑟遇到“许多最突出的学者”，包括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和年轻的助理研究员王铃，后者1946年赴英留学，开始与李约瑟长达几年的合作，参加了《中国科技史》前五卷的研究和写作，成为李约瑟的忘年交。

西北之行，最令李约瑟难忘的是在疏散到武真寺的河南大学图书馆里发现了集中国道教文献大成的《道藏》。在这部1400函的经典中，数百函与炼丹术有关，历来被化学史家视为瑰宝。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研究受中国道教和道家思想影响很深，因此这次发现使李约瑟终身难忘。李约瑟一行还沿古丝绸之路长途旅行，考察了中国佛教文化的瑰丽宝库敦煌莫高窟，他为那里千佛洞盛唐时期壁画反映的千年前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盛况所深深折服。

东南之行，李约瑟在贵州遵义参观了迁校到此的浙江大学，第一次见到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人、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教授，熟悉了他所做的有价值的工作，并经他的介绍，认识了杰出的数学史家钱宝琮和冶金史、化学史家王进，在以后的岁月里，这几位中国学者为李约瑟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很多帮助。在粤北的碓石镇，李约瑟访问了由广州迁来的中山大学，和对中国农史有精湛研究的梁家勉进行了深入座谈，深受教益。

不知不觉，李约瑟在中国度过了三年的时光。1946年3月，他要回国了，几年里与他建立了深厚友谊的中国科学家和学者依依不舍地为他送别，纷纷高度赞扬他为中西文化交流所做出的杰出贡献。的确，在中国抗日战争的艰难时刻，李约瑟以其出色的工作圆满完成了在中国的使命，为推动中英科技交流、为向西方宣传中国文化做出不懈的努力。在他主持下，中英科学合作馆在成立后的三年里，传递了中国学者的论文138篇，其中85%被西方国家采用发表，其范围涉及数学、化学、工程、药物、植物分

类学等多个学科，不少论文还受到国外科学刊物的较高评价。此外，李约瑟还将战时中国出版的若干书籍和自制的科学仪器设备、标本等送往伦敦供“英国文化委员会10年展览会”展出。这些物品后来还在1946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发明馆举办的国际科学展览会上做过特殊陈列，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在现代科技方面的成就。与此同时，李约瑟在中国期间，利用各种机会接触结识了大量的中国科学家，搜集了大量的中国科技史资料，为回国后的中国科技史研究写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在即将离华之即，李约瑟还在北京访问各著名大学，搜集有关中国科技史资料，并征询意见。他还与一些实践经验丰富的老工匠讨论有关中国器物的制造方法。他还购到许多在以后工作中必不可少的史料珍本，如《太平御览》和许多丛书。

李约瑟回国后，应许多友人的要求，将自己和夫人李大斐在中国三年多的活动记录，包括工作报告、日记、通讯、诗歌、摄影及为英国《自然》周刊撰写的10篇短文，汇编为《科学前哨》(Science Outpost)一书，1948年在伦敦出版。这部书被中国人誉为“外国人替我们写的科学工作者战时在内地艰苦奋斗的第一部实录”。^①

^① 王国忠著：《李约瑟与中国》，第154页。

第五章 中法文化交流

一、留法勤工俭学与中法文化交流

1. 留法勤工俭学的兴起

留法勤工俭学（或称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一般指 1919 年 3 月至 1921 年 11 月间中国青年集中分批赴法勤工俭学的运动（实际上作为一次运动在 1920 年底已基本结束）。此次赴法求学时间虽集中于 1919 年后的几年内，但其酝酿不晚于 1912 年，而中国人赴法留学更早于此。据初步统计，截至 1910 年，大约有五十名留法学生大学毕业。20 世纪初赴法留学的组织及成效甚至不如 19 世纪七八十年代更有力度，不过改变了单一官费的局面，学生自治能力也有所增强，从而为留法勤工俭学高潮的到来做了一定程度的铺垫。

1911 年，历时 267 年的大清王朝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中华民族开始了新的纪元，留法勤工俭学也在民国初年逐渐走向高潮。本来 20 世纪初年的中国青年已将目光转向日本等国，那么稍后为什么会法国情有独钟呢？除了近代以来外出留学（尤其赴法）曲折发展的铺垫外，主要有如下几方面原因。

第一，随着中西交流的逐渐扩大，人们对留学的观念发生一定变化，从不理解到认可，甚至有人认为“若能出洋数年，谋事

较易。”^① 重视出国的人日渐增加，那么去哪里呢？人们一度选中的国家是同为东方的近海邻国——日本。但是，日本军国主义的膨胀和对中国的侵略与威胁，又使中国青年改变了对日本的态度。第二，近代以来，特别是 19 世纪末以来，民族危机严重，救亡图存迫在眉睫，一些有志青年希望通过留学改造、拯救中国。1919 年，有人在致友人信中指出，留法勤工俭学的人“日见其多，皆感于国难”。^② 如果说民族危亡决定了 20 世纪初留学救国（以留日为主）具有迫切性的话，那么在十月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留法勤工俭学更具有自觉性。第三，法国的历史特点和当时（20 世纪 20 年代前后）的社会情况吸引了大批中国青年。西欧是资本主义文明的摇篮，而法国又格外引人注目。陈独秀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一文中指出：“欧罗巴之文明，欧罗巴各国皆有所贡献，而其先发动者，率为法兰西人。”^③ 在留法勤工俭学的组织者看来：法国没有绅民阶级、政府万能等观念，宗教神权较弱，这些都比较适合中国。^④ 当然留学是在两个国家之间进行的，接受国的包容风度和容纳能力也是不容忽视的。法国在一战中男子死亡一百多万，男少女多，这就为中国人提供了一定的就业岗位（1916 年后陆续有近 15 万华工赴法），从而使大批中国的有知识青年赴法勤工俭学成为可能。第四，民国初年北洋军阀当政，留学经费朝不保夕，以 1915 年为例，各省拖欠留欧经费总计 77.7 万元。在这种情况下，留欧学生为继续求学便一边做工，一边学习，通过勤工俭学来解决部分学费，俭学、苦学之风悄然兴起。这种勤工俭学的留学新风为之后的留法

① 《秋瑾集》，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42 页。

② 《吴敬恒为陈延年、陈乔年等赴法事致沈梁函》，张允侯等编：《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一），第 436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③ 《青年》第 1 卷第 1 号，1915 年 9 月。

④ 参见王奇生：《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第 66 页，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勤工俭学提供了经验，而无政府主义者的追求个性解放精神和五四运动中所体现的联合“劳工”的倾向，也都是有力的推动因素。官费指望不上，家境又不可改变，在观念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勤工俭学也是最易实现的留学方式。第五，一批热心而又有活动能量的人功不可没。前四个方面只是为赴法勤工俭学提供了可能，若要转化为现实，还需要在两国之间架起一座“桥梁”。留法勤工俭学的实现，与留法俭学会、留法勤工俭学会和法华教育会等组织的推动是分不开的，而这些组织的中方中坚是李石曾、吴稚晖、吴玉章、汪精卫和蔡元培等人。下面对此给予重点介绍。

1901年，李石曾随新任驻法公使孙宝琦前往巴黎，由于经济上不富裕，便主张“勤俭留学”。此后，他与流亡英法的吴稚晖等联合办起了《新世纪》等杂志，宣传无政府主义，提倡苦学。1909年，李石曾在巴黎创设了中国豆腐公司，并从家乡招收了30人做为工人，组织他们边学习，边劳动。在勤工俭学的组织者中，李石曾当为第一人。在李石曾等人的带动下，留法俭学会、留法勤工俭学会、华法教育会相继成立。

留法俭学会于1912年由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汪精卫、褚民宜等人为“兴勤俭乐学之风”在北京成立。该会吸收有志于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人会，并帮助他们留学法国。通过宣传，俭学会的知名度逐渐扩大，只需600大洋（仅为赴英、美留学费用的1/3）便可留法的许诺吸引了一部分青年。^①俭学会成立后又在北京设立了留法预备学堂，该学堂主要教授法文。第一期和第二期（各四十余人）学员毕业后，分别于1912年11月和1913年6月由西伯利亚乘火车赴法留学。除成批赴法外，还有个别成行

^① 汪一驹著，梅寅生译：《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第127页，台北枫城出版社1968年版。

的，总计一百多人。^① 这些学生有许多是贫寒子弟，贫儿出洋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反响。1913年下半年，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预备学堂被迫（袁世凯指使人驱赶）迁往四川，不久停办，后虽一度重开，影响不大。留法勤工俭学的核心遂让位于留法勤工俭学会和华法教育会。

留法勤工俭学会于1915年6月由李广安、张秀波、齐云卿及李石曾等人在巴黎正式发起成立。该会成立的渊源及原因，一说是成立于大批华工赴法之后，一说是成立于李石曾所办的豆腐公司工人兼学之后，两种说法似乎均不够明确。其实，留法勤工俭学会成立于大批华工赴法之前，当时情况是，“（华工赴法）卒将实行于今日。多数华人输入法国，势所必然。然华工既来之后，其将组织完善，工余求学……惟教育是赖，即吾人（指留法勤工俭学会）所当致力者也”。^② 至于勤工俭学会与豆腐公司的关系似可以这样概括：豆腐公司工人兼学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俭学会成立，而该公司工人又发起了勤工俭学会。豆腐公司成立后，所招华工（30人）每晚工休之时“从事于中法文及普通科学之讲习”。^③ 俭学会成立后，学费不足的学生“乃兼工以济学”。由于“工”、“学”结合已略有基础，于是在中国农村上过小学、后又入豆腐公司为工的李广安等人便发起了勤工俭学会。

该会的宗旨是“勤于工作，俭以求学，以进劳动者之智识”。成立后致力于“介绍华工来法，并以力学为务”。^④ 由于勤于俭学会人力、财力有限，所以此后新成立的华法教育会以更大的势

① 澎济群口述：《回忆留法俭学会、留法勤工俭学会、华法教育会》，郑名桢：《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第140—159页，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4年版。

② 《旅欧教育运动》，张允侯等编：《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一），第51页。

③ 同②。

④ 《旅欧教育运动·勤工俭学会说明节要》，张允侯等编：《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一），第52—53页。

头推动了勤工俭学运动。尽管如此，勤工俭学会在华法教育会成立后并未消失，一方面参与了华法教育会的筹备，部分骨干参加了华法教育会，联合“商组华工学校”等；^①另一方面，仍独立地在国内设立分会及预备学校，安排华工赴法。但到了1918年12月，华工大批赴法已基本结束，该会的保定育德中学开始招收中学毕业生作为勤工俭学生预备赴法，学员学历资格有所提高。^②而对所招华工之要求，在1919年“勤工俭学会所希望者，则应招之有求学之思想，有自修之知识，以得将来良好之结果”。^③也就是说，华工大批赴法结束后，该会对所招华工的文化素质提高了要求，这也许说明当时法国已不需要太多的普通华工（一战结束后军事后勤等工作减少），而需略有知识的人特别是学生为工。

华法教育会于1916年6月22日成立于巴黎，由法国人法士乃（社会学教授）、欧乐（大学教授、法自由教育会会长）和穆岱（下议员）以及中国的蔡元培、汪精卫、李石曾、吴玉章等共同创立。该会宗旨是增进中法友谊，重点是用法国“科学与精神”教育华人，以增进“中国道德、知识、经济之发展”。^④蔡元培等人将该会之计划概括为四方面：促进留法俭学，编译国外名著，将中国“先儒学术”译成西文，加强华工教育。^⑤华法教育会在华工赴法高潮前夕成立，该会工作规划较为宽泛，当华工

^① 《华法教育会、留法俭学会、留法勤工俭学会》（1919年增订再版本），“留法勤工俭学会说明书”，张允候等编：《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一），第57—61页。

^② 保定育德中学招生《说明书》，《教育公报》第六年第一期，1919年1月20日。

^③ 《华法教育会、留法俭学会、留法勤工俭学会》（1919年增订再版本），“留法勤工俭学会说明书”，张允候等编：《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一），第57—61页。

^④ 《旅欧教育运动·华法教育会大纲》，张允候等编：《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一），第75—79页。

^⑤ 《华法教育会公启》，张允候等编：《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一），第80—82页。

大批赴法时便以教育华工“为当务之急”，此后当出现留法勤工俭学高潮时便以组织勤工俭学为主。当然留法勤工俭学高潮的到来与华法教育会的大力推动有直接关系。1918年前后，该会在北京、河北、山东、上海、四川、湖南、福建、广东、陕西等成立分会，接着又在北京、天津、河北（布里村，该地今属高阳）、长辛店、济南、上海、安庆、成都、重庆、长沙、广州、福州等地设立留法预备学校。这些预备学校总数不下20所，虽学制及教学风格各异，但有着共同特征，就是法语启蒙和速成技校相结合，少数毕业生没有赴法便直接在国内就业了。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加上华法教育会的大力推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终于水到渠成，迎来了高潮。1919年3月17日，89名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乘日本邮船驶离上海港，5月10日，抵达法国马赛。从此揭开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序幕。从1919年3月，到1920年12月，先后有20批学生成行赴法（见下表），其留学总人数有1400、1600、1700、2000等不同记载，那么究竟哪一种说法更为准确呢？我们不妨考察一下20批中每一批实际人数（依当事人的记载），其中人数统计有分歧的为如下几批：

第5批，为78人，其中来自四川61人，来自浙江、北京各6人，来自上海5人。^①

第6批，原统计为54人，但其中赴英10人，赴德1人，所以实际当为43人。^②

第7批，原说19人，但内有2人为华工，故当为17人。^③

① 《四川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由沪赴欧六十日船中旅行潭》，张允候等编：《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一），第540—548页。

② 《赴欧中华学生联谊会纪事》，《工读》第3期，1920年1月。

③ 《赴法学生港沪间的船中生活》，1919年10月14日、15日《上海晚报》。

历届勤工俭学学生赴法一览表^①

批次	从上海起程日期	船名	人数	抵法日期及地点	知名人士	实际人数
1	1919年 1月17日	因幡丸 (日)	89	1919年5月 10日抵巴黎	林蔚、欧阳钦	89
2	1919年 3月31日	贺茂丸 (日)	26	1919年5月 20日抵巴黎	周世昌	26
3	1919年 4月14日	伊豫丸	2	1919年6月 6日抵巴黎		2
4	1919年 7月13日	三岛丸 (日)	57	1919年9月 2日抵巴黎	罗学瓚、齐连登、 陈书乐、王书堂	57
5	1919年 8月14日	麦浪号 (法)	78	1919年10月 10日抵马赛	陈毅	78
6	1919年 8月25日	盎特莱蓬号 (法)	54	1919年10月 1日抵马赛	任光	43
7	1919年 9月29日	博尔多斯号 (法)	19	1919年11月 12日抵马赛	徐特立、熊信吾	17
8	1919年 10月16日	渥隆号 (美)	48	1919年11月 25日抵马赛	王若飞、李卓然	42
9	1919年 10月31日	宝勒加号 (法)	207	1919年12月 7日抵马赛	李维汉、李富春、 张昆弟、贺果、 李林	207
10	1919年 11月22日	勒苏斯号 (英)	40	1920年1月 23日抵巴黎	黄齐生、熊芷难	21
11	1919年 12月9日	司芬克斯号 (法)	158	1920年1月 14日抵马赛	聂荣臻、颜昌颐、 钟汝梅、饶未杰	158
12	1919年 12月25日	盎特莱蓬号 (法)	92	1920年1月 28日抵马赛	蔡和森、向警予、 蔡畅、葛健豪	92

^① 本表摘自郑名植：《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第43—45页，其中“备注”一栏，改为“实际人数”。

批次	从上海 起程日期	船名	人数	抵法日期 及地点	知名人士	实际 人数
13	1920年 2月15日	博尔多斯号 (法)	55	1920年3月 25日抵马赛	许德珩	52
14	1920年 4月1日	宝勒加号 (法)	110 余	1920年5月 2日		110
15	1920年 5月9日	阿尔基勃 西号(法)	126	1920年6月 15日抵马赛	赵世炎、萧三、 陈绍休、熊锐、 傅烈、唐铎	112
16	1920年 6月25日	博尔多斯号 (法)	220 余	1920年8月 4日抵马赛	刘伯坚、陈公培	210
17	1920年 9月1日	盎特莱蓬号 (法)	89	1920年10月 19日抵马赛	邓小平、江泽民、 周文楷、冉钧	84
18	1920年 9月1日	博尔多斯号 (法)	197	1920年12月 13日抵马赛	周恩来、傅钟、 郭隆真、王守义	197
19	1920年 11月24日	高尔地埃号 (法)	22	1920年12月 27日抵马赛	刘清扬、张申府	22
20	1920年 12月15日	智利号 (法)	134	1921年1月 20日抵马赛	何长工、穆青、 李季达、肖朴生、 高风	144

第8批，48人，但其中6人为朝鲜人，实为42人。^①

第9批，原本210人（上海上船154人，香港上船56人），其中10人赴美，中途死伤各1人，所以剩207人。《民国日报》1920年2月9日所记到巴黎人数与此相符。

第10批，原说为40人，但其中赴法者19人，又有2人先赴英又转法国（熊志南和张道藩），^②所以实为21人。

第13批，原说55人，但内有3名朝鲜人，所以实数当为

① 《赴欧舟中记》，1919年11月15日《上海晚报》。

② 《赴欧旅客之笔记》，1919年12月1日《时事新报》。

52人。^①

第15批，原说126人，但其中有9位转赴别国，又有韩国5人，所以实际约为112人。

第16批，原说220人，但有10人为朝鲜人，所以实为210人左右。^②

第17批，原说87人，但据《时事新报》1920年9月14日记载为84人。

第20批，原说134人，但据本批赴法学生所记为144人。^③

以上20批总计约为1763人，上述1700人的说法相对接近些。这些勤工俭学生来自全国不同省份，据华法教育会名册所列的1579人中，四川378人，湖南346人，广东251人，直隶147人，福建89人，浙江86人，江苏69人，湖北40人，安徽40人，山西28人，江西28人，河南25人，山东15人，贵州9人，广西7人，云南6人，奉天5人。^④可见湖南、四川两省最多。

留法勤工俭学生的年龄，在1235人中，15岁以下27人，16至20岁500余人，21至25岁600余人，26至30岁100余人，30岁以上约7人。^⑤这里16至25岁之间者占89%，表明勤工俭学生的主流是青年。青年人毕竟思想开放，无牵无挂，胸怀壮志，且不乏冒险精神。当然少年和老人赴法也不乏其人，如王书堂于1919年7月13日赴法（12岁），蔡和森之母葛健豪1919年12月25日赴法（54岁）。值得一提的是，留法勤工俭学生中也有一些

① 萧子章：《我们一路怎么样到的法兰西》，1920年8月12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② 戴启东：《赴法纪略》，1920年11月21日—23日《晨报副刊》。

③ 孙福熙：《赴法途中漫画》，1921年1月11日《晨报副刊》。

④ 见郑名楨编著：《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第37页，《各省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人数统计表》。

⑤ 同④，第40页，表5“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年龄比较表”。

女青年，如向警予、蔡畅、郭隆真等^①。女青年赴法无疑需要更大勇气。

从在国内的学历程度看，留法勤工俭学生绝大部分为中学及留法预备学校学生，少数为大、中专院校学生或留日归国学生。从职业来看，除学校学生外，也有一部分在职人员，据统计，工厂实习技师约 50 人，学校教职员工 60 人，记者约 10 人，政界 10 人以内。^②

留法学生有勤工俭学和俭学之分。俭学生“每年须筹六百元”，外加治装费和路费 400 元。^③勤工俭学生则交 400 元，包括船费、治装费及到法后待工生活费（到后期待工费有所增加）。随着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开展，又出现了半官费的说法。所谓半官费，是指本省或本县出资以部分地解决留法学生的学费。实行半官费的地方主要有福建、广东、山东、山西及安徽等省。如福建，陈炯明“在漳州每一县派一人至三人至法去留学，用半官费的法子”。^④半官费的出现，固然有军阀培植私人势力、收买人心的一面，但至少客观上有利于各省人才培养和促进中法文化交流。当然半官费适应人数不多，钱数有限，并未改变勤工俭学生靠打工求学的命运（仅少数人例外），所以留法青年还是分为俭学生和勤工俭学生两类。至于所占比例，大致勤工俭学生占 2/3 左右，俭学生占 1/3 左右。以勤工俭学生为例，从 1919 年春到 1920 年春赴法学生中（约一千四五百人），勤工俭学生“将近三分之二”。^⑤1920 年北京华法教育会开具的订购船票介绍信（84

① 见郑名桢编著：《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第 40 至 42 页，表 6 “留法勤工俭学女学生名单”。

② 黄利群编著：《留法勤工俭学简史》，第 22 页，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2 年版。

③ 《华法教育会之要函》，1920 年 1 月 5 日《民国日报》。

④ 《汪精卫先生之演说》，1920 年 1 月 19 日《时事新报》。

⑤ 熊志南：《欧行日记》，《学生杂志》七卷七号，1920 年 7 月 5 日。

件)中,介绍了197人,勤工俭学生约占78.7%(超过了2/3)。①可见赴法学生中勤工俭学生占绝对优势,大批中学毕业的穷学生圆了出国留学梦,这在中国还是破天荒的事。

留法学生在赴法前后对留法勤工俭学的态度可分为乐观派和悲观派两大派,而乐观派又分为绝对(盲目)乐观、放任(觉得新鲜)乐观和自发乐观(勇闯难关)三种情况,悲观派有三种原因,一时冲动、爱慕虚荣和不能吃苦。②留法勤工俭学生动机也比较复杂,第一种,心怀爱国之志,“抱莫大牺牲精神”,为改造中国而留法。当时科技和实业救国思潮比较兴盛,人们希望留法学生“各抱‘坚忍’之心,求得最高之学问,回国以兴各种实业”。③第二种,充实自己,上利国家,下便谋生。许多留法勤工俭学生都是将国家与个人联系在一起,用他们的原话来说,“我们既然是国家一分子,要把国家弄好,一定要先把自己弄好”。④第三种,附庸风雅,“赶热闹的”也不乏其人。⑤第四种,认为“只要到了(法国),就可以得一个西洋留学生头衔,将来升官发财,就是从此做基础”。⑥第五种,摆脱国内黑暗的政治气氛,如许德珩当时就有类似想法。除了这五种动机外,还有其他动机。当然,一个人的观念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原来进步的人也可能变得落后甚至反动,原来落后的人也许会变得进步了。

留法勤工俭学生虽情况各异,但均由上海启程,经海路抵达法国马赛,或经英国转法。沿途经过香港,安南(今越南)、新

① 《北京华法教育会为勤工俭学生赴法订购船位事给上海分会的介绍信一覽表》,张允候等编:《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一),465—469页。

② 薛世纶:《留法勤工俭学问题的讨论》,1919年12月29日《时事新报》。

③ 《欢送留法一百五十学生》,1919年10月27日《民国日报》。

④ 《一席话》,1919年9月22日《上海晚报》。

⑤ 《法国通信》,《工友》第6期,1920年3月。

⑥ 张允候等编:《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二),第514—51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加坡、科伦坡（印度锡兰岛）、其布（非洲东岸）等沿岸港口，经苏伊士运河辗转至马赛，全程约行四十余天。学生大多乘四等舱（即货舱），环境极为艰苦，有些人不幸患病甚至死于途中。但大多数人达观向上，终于克服困难，到达目的地。他们先后开始了在异国的学习生活和成长，在中法文化交流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2. 法国文化氛围下的勤工俭学生活

留法勤工俭学学生除个别人曾经留学日本外，大多数人没有离开过祖国，对法国文化或西方文化一无所知。好在他（她）们比较年轻，极富于变革精神，所以对法国文化并无太多抵触之感，而是从感性到理性逐渐地变盲目为有针对性的接受。他们历经艰辛，顽强工作，刻苦学习，勇于思考，终于学有所成，在中法文化交流史上谱写了不同凡响的一章。

留法勤工俭学生刚一踏上法国国土便感受到了法兰西文明的阵阵新风，从此便开始了新的人生旅程。1919年和1920年南京、上海等地的报纸都连篇累牍地介绍他们在法国的求学情况，而这些文章的作者绝大多数为勤工俭学学生本人。透过当时报刊的文章及其他资料，我们可以大体勾画出他们在法兰西文化氛围中的学习、工作与生活简况。

留法勤工俭学生刚到法国的时候，正如一位经法赴英的学生所说那样，“和刘老老初进大观园差不多”，^①即新鲜又陌生，不但不知如何学习、生活，连落脚都成问题。幸好有华法教育会等组织的招待与安排，他们总算迈出了留学生活的第一步。到法国马赛（约有五批经英转赴法国，其余多由马赛入法），一下船便会受到华法教育会的热情而周到的接待，然后乘火车前往巴黎，在那里被分配到巴黎或外地的工厂、学校。有时在马赛即行

^① 彦之：《从上海经过法国到伦敦》，1921年4月21—27日《晨报》。

分配。不论在哪一城市，勤工俭学生主要面临两大选择，即学校和工厂，前者指进入中学学习法语（称为预备），极个别直接进入大专院校；后者指入厂赚钱，积攒学费。

进入工厂和进入中学的比例，起初以入工厂人数为多。但到后来入中学者人数日益增多，其原因，一是随着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发展，许多人没来得及在国内预备校学习，所以到法后不得不先学法语。二是留法人数日益增多，寻找工作越来越难，与其坐等工作，不如先入中学学习法语。

勤工俭学生在初抵法国时所入学校主要是中学，只有个别人入大、中专门学校或大学。截至1920年8月，所入学校及人数如下表。^①

留法勤工俭学生所在学校及人数调查表

校名	人 数		城市英文名及别译
	现在	前后总数	
1. 蒙达尼公学	80余	130	Montargis 蒙塔尔纪
2. 木兰公学	45	116	Moulins
3. 暮岚中学	35	77	Melun 默伦
4. 杜鲁公学	50	72	Drues 德勒
5. 舍多的利公学	55	86	Chateantherg 沙多居里
6. 圣香曼公学	35	83	St germain 圣·热尔曼
7. 枫登白露公学	90	160余	Fontainellean 枫丹白露
8. 方多孟中学	15	42	Rendome 旺多姆
9. 邦达土公学	10	15	Ponedise
10. 地也卜公学	13	16	Dieppe 第厄普
11. 蒙达尼女学	14	16	Montargis
12. 利涉利省学校	10	20	La Careme 利河利省
13. 不诺文公学	18	23	Epiners 布洛文

^① 此表见黄利群：《留法勤工俭学简史》，第42—44页，略有补充。

校名	人 数		城市英文名及别译
	现在	前后总数	
14. 不诺文女学		2	
15. 路易女学		2	
16. 爱伯纳公学		1	Angers 厄比纳尔
17. 占比学校	2		Colomber 古比华
18. 盎涉中学	5		Angers 翁热
19. 底常初等学校	3		Dijon 第戎
20. 瓦方职业学校	2		Voiron 瓦隆
21. 格那司公学	20	23	Grasse 格勒斯
22. 刚恩公学	48		Canner 嘎纳
23. 伍德农校	1		Ouder 伍得
24. 郎西农校及农专	9		Nancy 南福
25. 夫恩内初等学校	1		Fourmies 富米尔
26. 阿恩公学	27		Flens Orne 法莱兹朗恩
27. 刚夫郎公学	25		Confolens 孔福朗
28. 瓦西公学	21		Rassy
29. 圣曼格桑学校	5		St Maixentlecede 圣梅桑
30. 蒙伯利也农校		1	Montpeuier 蒙特利埃
总计	670	880	

这些学校绝大多数为中学，这些中学分布于大约十九座城市，尤以蒙塔尔纪、默伦、枫丹白露等城接收中国学生最多。

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们在中学主要学习法文（专班或插班），但在个别中学（如默伦）也开工艺实习课，学习铁工。^① 中国留学生在法国中学所受教育体现了法国的教育风格，“注重自修”。好在勤工俭学学生们多系贫苦家庭出身，比较珍惜学习生活，不像个别官费生那样毫不用功。

在中学预备的期限，少则两个月，多则两年。严格说来，在

^① 《留法学生陈义君之来函》，1919年10月24日、25日、30日（上海晚报）。

法中学预备仅算“留学”而非“深造”（因为在国内已读过中学），真正有收获的留学是从预备后进入大、中专院校开始的。

他们进入大、中专院校分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抵法后直接进入大、中专院校，但这要具有俭学经费、法语基础和中学以上学历，所以此种情况人数不多。第二种情况是完成中学预备后进入大、中专院校，属于此情况的人是那些没有法语基础的俭学生。第三种情况是勤工俭学生，他们先工作赚钱然后求学，经过了中学预备——工厂勤工——俭学（于大、中专院校）这样一条留学之路。这三种情况只是俭学的先后不同，但迟早要进入大、中专院校（当然也有部分人被提前遣送回国，或一直工作而未能上学）。

当时法国学校分为大学、专门学校（专科）及各种实习学校（中专或职校），情况大体如下：

大学。“其分科为文、理、医、法，而无工科。其毕业年限无定，视本人进步之迟速而定。最速三年，最迟四五年，毕业后即称学士；再经博士考，即称博士”。大学入学不用考试，有中学毕业文凭即可。^①

专门学校。其分科“为农、工、矿、航海等……其毕业年限为三、四、五年不等。”专门学校最难考取，不用说中学毕业，即便是在国内已获专门学校文凭也要参加严格的入学考试。^②

实习学校。此种学校介于大学、专门学校与中学之间。从大的范围说可分为农业实习学校和工业实习学校，农业类学校下面又分植棉、养桑等专业，工业类校又分机械、纺织等学校或专业。实习学校理论与实验并重，经过推荐中国留学生只要中学毕

^① 沈宜甲：《第一次报告书》，见张允候等编：《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一），第249—263页。

^② 同^①。

业便可免费入学。^①

除上述学校外还有两类不大正规的学校，一是工厂所设实习校，一是夜校。工厂实习校的情况，以里昂汽车厂为例，“计每日实习七小时，上课一小时，教员系本厂重要工程师”。讲课全凭口述（无讲义），在机械实物旁讲解原理。^②至于夜校，实为工余学校，为白天工作的勤工生晚上学习而设。

留法俭学生的生活大都比较节省，处于当地较低的标准。有的学生因所租住房伙食太贵，“只好暂时省俭中食一餐，晚间则面包、热水而已”。^③留法俭学生节衣缩食之情可见一斑。

俭学生在1919年、1920年便可入学深造，而勤工俭学生入学深造一般要推迟几年。如勤工俭学生中年龄最小的王书堂，1919年12岁赴法，1922年父亲去世后便一边做工，一边自学，直到1927年考入昂日国立机械大学。^④勤工（俭学）生还有两种情况，一是二人结对，一人勤工供一人上学，上学者于假日寻工；另一种情况是家里补贴百元左右，自己夜里或假日工作赚钱。^⑤差不多法国各著名大学、专门学校皆有中国勤工俭学生的踪迹。他们所学专业十分广泛，出现了许多专门人才，第一类，“纯粹科学人才”，包括地质、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人才；第二类，“应用科学人才”，包括农学、建筑、机械等方面工程师，此外还有文学、艺术、医学等方面人才。^⑥

① 沈宜甲：《第一次报告书》，见张允侯等编：《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一），第249—263页。

② 同①。

③ 同①。

④ 王书堂口述：《赴法勤工俭学的回忆》，郑名植：《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第251—256页。

⑤ 鲍寇儒口述：《回忆在法国索米尔工业学校学习生活片断》，郑名植：《留法勤工俭学运动》，268—270页。

⑥ 江天蔚：《回忆留法勤工俭学》，见《五四运动回忆录》（下），第95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

以上是法国的学校与勤工俭学生的求学情况，那么他们在法国勤工情况如何呢？

勤工的第一步自然是找工作。在寻工过程中李石曾起了很大作用，他用写信等方式，见缝插针、锲而不舍地为大家联系工作。勤工生所入之厂“分布全法”，主要是造船、机械、胶皮、矿冶、家具、汽车等行业，另外商店、缝衣店和照相馆等地也留下了他们打工的足迹。勤工生不一定固定在一厂工作，往往几易其厂（换厂原因有时是因工作太累）。由于这些留学生所具条件不同，因而得到的工作及待遇也有所不同，大体来说，分为力工、技工和学徒三种。

力工。又叫苦工、散工或小工，是“没有技能只用气力”的工作，^① 主要包括抬石、运木、送煤、挑水等。力工往往工作繁重而环境艰苦，一位勤工生回忆说“运煤、石灰等工作时没有防护眼镜，也没有口罩，完工后满脸、满身是黑煤、白灰。下午上班，卸各种骨头，由火车用铁叉子向上卸。骨头上带着脓血，还有无数大蛆，气味实在难闻……真是难以忍受下去”。^②力工虽然很辛苦，工资却较低（每天 10 至 17 法郎）。然而许多人正是凭力工赚了一些钱来作为俭学费用的，其艰辛可想而知。

技工。是指有技术含量的工作，“如制图章及掌管机械等，在国内高等工业学校毕业者可充此任”。另外“金工及各种制造亦是技艺的工作”，在国内预备学校毕业者可以胜任此工作。^③但对于大多数勤工生来说，技工可望而不可及，无法胜任。

学徒。技能、法语及体力条件均不过硬者便入厂当学徒。学徒工工作需人指点，又浪费材料，故没有工资，仅有少量生活费

① 《巴黎通信》，《工读》第 2、3 期。

② 陈书乐《回忆留法勤工俭学》，见郑名桢：《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第 212—219 页。

③ 《巴黎通信》，《工读》第 2、3 期。

(每日2至8法郎),除伙食外,所余无几。学徒工经过几个月适应后,工资会略有增加,学徒期满(有的厂规定为三年)后转为技工。

勤工生不管从事什么工作,衣食住行都非常节俭。他们居住的地方分为旅馆、民房和厂房三种,为了省钱往往几人合租一间。1919年3月赴法的王良翰,入厂为学徒时与另五人租三间楼房,因工资太低,便自己起火,“既不饮酒,又不吃肉(法人每食必酒肉)。”^①能有条件租房情况自然好些,住在厂里要艰苦得多。1919年11月初赴法的郑超麟本身是半官费生,因家中将他的学费花了,便只好在一家橡胶厂做工,和许多中国留学生一起住在工厂免费提供的大木棚里,大家合伙起火,专雇两名中国留学生做饭,工钱大家均摊。^②

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主要有俭学和先勤工后俭学两大方式。有人认为当时还有“半工半读”,这容易造成误解。当时的留法学生及李石曾已明确说过,“在法国无半日作工之办法,亦无半日读书之学校”,因此半工半读“恐不能行”。^③工学结合的方式除先工后学外,主要是工余学习法文(晚上)等,或学余之假期打工维持学费。

留法勤工俭学高潮初期,华法教育会及李石曾等人对勤工的组织较为有效。华法教育会在法的办公地点最初设于巴黎市区,后迁于巴黎西郊的卡莱纳·戈隆勃(La Garene—Colombiers Csenie),并在新址成立华侨协社。华法教育会、留法俭学会、华工工会均在协社楼内办公。留法勤工俭学学生都将这里当做自己的老家,初入法国待工和临时失去工作后都要到这里来。华法教育会对待工

① 《王良翰十月五日自法国来信》,《工读》第1期,1919年12月。

② 郑超麟口述:《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郑名桢:《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第230—238页。

③ 《上海晚报》,1919年10月24日、25日、30日。

同学发给补助，每人每天四法郎，称为“维持费”，学生工作赚钱后再还给该会。^①该会还组织学生参观工厂，学习法文等。

可惜这一局面没能长期维持下去，不久勤工便出现了问题。华侨协社本无宿舍，只是在后院搭了一个帐篷（一法国参议员夫人所捐），没地方住的同学都挤在这里，环境十分艰苦。有时200人挤在一起转不过身来，“里面没有床，就在泥地上铺些草睡觉。尤感不便的是上厕所，只有协社的楼里有，几百人上厕所总得排半天队才行。吃饭多是穷凑和，有的买块面包，喝些凉水就行。”^②如果仅仅是短期生活不便还好些，尤其令人头疼的是工作越来越难找。由于人多工作位置少，所以一有岗位只好抽签解决，抽到者兴高采烈，没抽到者则抱怨终日，“甚至骂人打人”。到后来，就连已找到工作的人也处于朝不保夕之中，待工的人日渐增多。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法国社会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国军人大批复员，走上工作岗位；而且战后法国经济衰退，开工不足。这些对留法勤工生寻工都很不利。从留学生自身来说，他们多为中学毕业生，体力及技术均无优势，故找工作的竞争力不强。从华法教育会来看，起初他们对困难估计不足，结果一批又一批勤工俭学生蜂拥来到法国，安排工作的任务远远超出了华法教育会（李石曾等人）的负荷。一方面重洋之外的法国给勤工生提供的机会十分有限，另一方面，从中国上海登船赴法的勤工俭学生又源源不断，以有限的工作机会去迎接无限增加的求工学生，情况可想而知，华法教育会对此也无力回天。最终留法勤工生与华法教育会关系越来越僵，至1921年6月，蔡元培宣布停止对前者的管理和发放维持费，勤工俭学运动也就夭折了。

① 《留法湘生的通讯》，1920年5月26—30日（长沙）《大公报》。

② 盛成口述：《勤工俭学亲历记》，见郑名植：《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第239—250页。

以上我们探讨了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情况。这些壮举与悲歌虽是以 1763 名留法学生为核心展开的，但却典型地体现了当时中法文化交流的盛况。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是在法国的文化氛围中进行日常生活的，也是在法国的教育体制、用工制度和生活方式下从事学习和工作的，所以，中国文化、法国文化会在每位留学生心中进行碰撞。他们在承受碰撞的同时不断地自我成熟起来，同时还将这种“碰撞”的过程与感受转达给国人（寄发于国内报刊），使国人也不同程度地体味这种感受并增加对法国文化的认识。

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对法国文化的吸收也是从感性到理性进行的。首先，他们在登船之前就接受必要的礼仪引导，抵达法国后便面临“融入”法国社会的问题，逐渐适应法国的衣食住行。法国人喜欢吃面包，而中国的南方籍学生喜欢吃米饭，他们在法国也是经历了一段时期才逐渐克服这一困难的。

其次，勤工俭学生们大都有求学的愿望，并以不同的方式开始学习。学习中，他们面临着中法教育方法的不同和思维习惯的差异，其中最明显的一点就是法国教育提倡发挥学生的自主性，给学生自习时间较多，留学生们凭着求学的渴望和自立的精神很快适应了法国体制和风格。勤工俭学的经验和对法国教育的认识，对留法勤工俭学生影响很大，他们中有人回国后主持学校工作，很多方面都得益于留法勤工俭学的经历。

再次，留法勤工俭学生在从事工作、学习之余，还不断自觉地对法国文化和中法文化之异同进行评价和对比。最先引发他们作对比的自然法国的风景和文化设施。他们未到法国时心中充满向往，来到法国后对法的建筑、风景和文化设施赞不绝口，并写成优美的文章寄投国内报刊，当然，他们也并非对法国一味地肯定，有时觉得现实的法国与心目中美好的法兰西并不十分相符。尤其是当他们在博物馆看到法国从中国抢来的珍宝时，心情十分悲愤，自强爱国之心油然而生。当他们正式入校学习后，对

法国的科技也有了中肯的认识，一致认为，法国的科技虽比中国发达，但和美、英、德等相比工科相对逊色，只是美术、哲学成就十分突出。至于中法的对比，许多人都提到法国人长于机械制造，中国人手指较巧，长于手工制作（刺绣等）。

3. 传播中国文化

留法勤工俭学生对中法文化交流的贡献主要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在留学期间不断向国内的亲朋好友介绍法国文化，其方式是将信件或文稿刊登在国内报刊或留法勤工俭学的宣传材料上，其内容主要是围绕留法的学习和工作介绍法国的教育、工业、社会风情并对法国文化做初步评价。二是通过举办游艺会等活动介绍中国及中国文化。三是在法国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回国后在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中大显身手。其中第一个层次前面已做探讨，第三个层次将在以后加以评价，这里主要介绍一下第二个层次。

留法勤工俭学生虽然是在法求学，但他们本是中国学生，从出生之日起便受中国文化的熏陶。他们也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而是将近两千人的一个群体，在接受法国文化的同时，彼此之间也进行着交往，或多或少、或强或弱地保持着“中国文化的小天地”。他们从未与祖国失去联系，时刻关心祖国的命运，许多人立志将来学成报效祖国。这些也就决定了他们既是法国文化的接受者，同时也是中国文化的传播者，在中法文化交流中承担双重使命。

留法勤工俭学生传播中国文化的有效方式之一是举办游艺会。1920年3月21日在枫丹白露（Fontainebleau）的伯禄大戏院，留法勤工俭学生举行了半天的演出活动。这次游艺会发起的直接原因，是戏院曾上演一出中国戏，戏的内容是猪尿泡吹成球形互相殴击，用来形容中国人打架的方式。当地中学校长恰巧也看了这出戏，便问中国学生是否属实。这表明法国人对中国文化缺乏

了解。有鉴于此，留法学生认为有必要宣传优秀的中国文化。于是，他们便在这座戏院举办了游艺会^①。游艺会的主要程序如下：

- (1) 唱中国国歌和法国国歌。
- (2) 中国武术表演，有单打和双打两种。
- (3) 中国音乐，用琵琶、三弦、胡琴等乐器演奏。
- (4) 女生舞蹈，由蒙达尼 (Montargis) 女校的向警予、蔡畅等人演出。
- (5) 京剧，用西皮、二簧等腔调演唱。
- (6) 滑稽新剧，用法语演出，内容多反映日本的侵华野心。

这次游艺大会效果很好。与会者“中外约千人”。会场气氛热烈，法国观众在观看武术表演时“惊吓万状，掌声如雷”；在看京剧时“大笑欲狂”。会后“法国各报赞扬无比”，认为中国文明并不亚于欧美。^②这次游艺会大大提高了中国文化和中国人在法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令许多法国人对中国学生刮目相看。游艺会后过了一段时间，中国德华球团在与法国队赛球时赢了两球，法国人大喊“中国万岁”，在法的勤工俭学生对此备感骄傲。

中国留学生向法国介绍祖国文化的另一种方式是译书或著书。在这方面以盛成的成就最为突出。盛成，江苏扬州仪征县人，曾就学于上海的南洋路矿学校和震旦大学。五四运动期间考入京汉铁路车务见习所（位于长辛店），1919年11月22日在朋友的资助下赴法勤工俭学，他曾在法国南部蒙伯利叶 (Montpeuier) 的农业学校和大学里学习，主要攻读蚕桑专业，并曾赴意大利求学。1929年回国后在北大教授法语。^③他留法期间曾将

^① 《留法湘生的通讯》，1920年5月26—30日长沙《大公报》。

^② 叶济澜：《法游纪程》，1920年7月5—8日《时事新报》。

^③ 盛成口述：《勤工俭学亲历记》，郑名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第239—250页。

刘鄂的《老残游记》译成法文，并用法文写成《我的母亲》一书。《我的母亲》以一个特定的视角反映了当时的中国社会和风情，在法国乃至在欧洲、中东等地都产生了很大反响。盛成因此声名大振，结识了戴高乐总统，并得到了土耳其总统、埃及国王的访问邀请。这部小说曾被译为多国文字，欧洲的文化名人及科学巨匠罗曼·罗兰、居里夫人、罗素等均给予高度评价。1985年，法国驻华大使代表密特朗总统，将法兰西共和国荣誉军团骑士证书和勋章授予盛成，足见《我的母亲》一书的地位和影响。^①

留法勤工俭学所引发的中法文化交流的三个层次作用各不相同，第一个层次是使国内大城市知识分子对法国文化有了初步了解，第二个层次提高了中国及中国文化在法国人心目中的地位，第三个层次则为新中国培养了一大批缔造者和建设者。第一、第三两个层次属于法国文化对中国的输出，第二个层次则属于中国文化对法国的传播，当然从文化底蕴的含量及影响来说，第一和第三个层次居主导地位，第二个层次居次要地位。

4. 留法勤工俭学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留法勤工俭学之所以在当今备受关注，很大程度是因为该运动中产生了一大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当然这里所说的“一大批”旨在说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成绩斐然，并不是说留法勤工俭学生中绝大多数人都成为共产党员。事实上“勤工俭学生中非共产党者居大多数”，共产党员在全体留法勤工俭学生中占一小部分。^②然而正是这一“小部分”几乎与国内同时成立了共产主义组织。

^① 陈辛仁主编：《现代中外文化交流史略》，第290页，中国书籍出版社1997年版。

^② 盛成：《海外十读十年纪实》，第48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在留法勤工俭学期间，许多有志爱国青年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关注十月革命和西欧工人运动，并积极投身于反对国内军阀卖国的政治斗争，终于锻炼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们中的佼佼者是蔡和森、李立三、周恩来、李维汉、赵世炎等人（赵在出国前已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么蔡和森等人是怎样逐渐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呢？下面分别略加考察。

蔡和森祖籍湖南湘乡县，后入长沙读书。1918年4月，23岁的蔡和森和毛泽东、肖子升等人正式发起成立新民学会。该会会员主张培养一个“奋斗向上的人生观”，^①加强个人自我修养，个人和学会都开始一种新生活。这里“奋斗向上”包含了不断探索求新的内核，这应当是蔡和森找到马克思主义的动力源泉之一。

1918年6月，蔡受学会委托，赴北京筹办留法勤工俭学事宜，在路过洞庭湖时，赋诗《少年行》一首，开头几句是：“大陆龙蛇起，/乾坤一少年，/乡国骚然尽，/风雨送征船。/世乱吾自治，/为学志转坚……匡复有吾在，/与人撑巨艰。”^②从诗中可以看出，他不仅以“自治”这一新民学会的宗旨为自己的宗旨，而且还以改造旧中国为己任，表明他在新民学会成员中思想是非常激进的。

1918年下半年，他进入蠡县布里村勤工俭学预备班学习，为赴法求学做准备。在这年七八月里，他给在湖南的毛泽东等人写了八封信，其中7月24日的信中提到“吾人之穷极目的，惟在冲决世界之层层网罗，造出自由之人格，自由之地位，自由之事功，加倍放大列宁与茅原华三〔山〕（此二人亦不审其果有价值否，暂以为近人近事而假借之）。为达此穷极目的，不必要中

^① 《新民学会会务报告》，《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② 见中共双峰县委员会编：《蔡和森传》，第45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亦有必要在；是以本来厌恶学校也，而竟又欲入学校”。^①从信 中看出他主张改造中国与世界，崇尚自由，赞赏列宁领导的十月 革命，只是尚未认定十月革命之路适于中国。稍后，他还经常向 预备学校的同学介绍十月革命。可见早在 1918 年下半年，蔡和 森就已经常提到列宁和十月革命。

1920 年初，蔡和森来到法国蒙达尼，由于哮喘病复发，所 以没有马上入中学预备，而是上公园一面锻炼身体，一面借助字 典自学法语，记单词，译报纸，了解各国情况。1920 年 5 月 28 日，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到，到法四个月“看报渐有门径， 各国社会运动消息，日能了解一二”。^②从这封信来看，蔡和森 研究的范围主要是各种“社会主义”及各国社会运动。就在 1920 年 5 月，蔡和森和向警予结婚，他俩拍了一张照片，照片 中二人并肩而坐，共同捧着一本翻开的《资本论》。从 5 月 28 日 信和 5 月的结婚照看，蔡和森当时至少已倾向马克思主义。

到 1920 年下半年，蔡和森已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同 年 8 月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他已搜集到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国 际工人运动等小册子上百种，通过“猛看猛译”，认定“社会主 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也就是说蔡确 信，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他还预言，三五年中中国一定会 出现一个军阀政府，然后就需要毛泽东等人发动“十月革命”。 对于这个预言，他“自信有九分对”。^③事实上，他这个预言完 全得到了验证。

总之，蔡和森自 1918 年下半年开始谈论俄国十月革命，并 十分赞赏。到法国后，通过对各种真假社会主义的对比，至迟在 1920 年七八月已坚信科学社会主义，在旅欧青年中最早完成了

① 《蔡林彬给毛泽东——大规模的自由研究》，《新民学会资料》第 56—57 页。

② 《蔡林彬给毛泽东——研究社会主义等》，《新民学会资料》第 124—127 页。

③ 《蔡和森给毛泽东》，《新民学会资料》第 128—133 页。

世界观的重大转变，成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下面再考察一下李立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过程。李立三是湖南醴陵人。1919年勤工俭学运动兴起后，他进入长辛店法文高等专修馆学习。1919年12月来到法国蒙达尼公学。初到法国时他写过一首长诗，开头及结尾几句是：“我是一个断梗的浮萍，/随着那风儿上下飘零。/……今又吹我到西天来了，/呼吸那自由的空气，/瞻仰那自由的女神。/我还要唱那自由之歌，/撞那自由之钟，/唤醒可怜的同胞，/惊起他们的酣梦，/鼓荡雄风，/振作精神，/造一个自由的新世界，/做一个幸福的新国民。”^①从这首诗可以看出他对法国的“自由”非常向往，希望中国也像法国一样“造一个自由的新世界”。

当时法国各种主义十分盛行，李立三也受到影响。起初，他倾向过无政府主义，又相信工读主义，认为又读书又工作可以克服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界限，从而造就新人，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后来他读了较多的进步报纸和一系列马列主义著作，开始摆脱无政府主义影响，逐渐向马克思主义贴近。大约在1921年春，李立三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据他自己回忆，来到克鲁梭铁厂后“受当时法国工人运动影响，并与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工人有接触，逐渐相信只有马克思主义能救中国”。^②但直到此时他对如何革命仍不十分明确，用他自己的话说：“当时我们要革命，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是明确的，但是如何革命，这是不大明确的。”^③到了1921年3月下旬，李立三主动与原来意见不同的蔡和森写信，商讨组建共产党问题。这表明李立三在克服自己思想局限性方面又向前迈了一大步。

^① 见唐纯良：《李立三传》，第11—12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② 李立三于1952年填写的《中国共产党员登记表》，转引自唐纯良：《李立三传》，第14页。

^③ 李立三：《对赵世炎的回亿》，转引自唐纯良：《李立三传》，第18页。

周恩来去法虽晚，但所起作用很大。早在1913至1917年南开学校求学期间，他倾向于教育救国。1917年9月他东渡日本留学，临行前写下了众所周知的“大江歌罢”一诗，其中“邃密群科济世穷”和“面壁十年图破壁”两句便是他崇尚教育救国的反映。到1918年4月，他在给留美的原南开学校的同学信中称“左右居美，所得宏深，甚盼时有以示我，新思潮尤所切望。”^①这里所言“新思潮”范围很广，比如他认为：“日本的米骚动，朝鲜的独立运动，都是受新思潮的波动。”^②就在1918年4月，他开始留心俄国社会主义的报道，1918年下半年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919年4月归国途中经过京都，写了《雨中岚山——日本京都》一诗，最后几句是：“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一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娇妍。”^③诗中反映了他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喜悦心情，但尚未最后坚信。

1919年7月22日，他回国后在“《天津学生联合会会报》旨趣”中写到，本刊以“革心”和“革新”为宗旨，“本民主精神发表一切主张”。可见这时他的思想还是民主主义。1920年1月，他因领导天津学生进行反日爱国斗争而被捕（同年7月获释），在狱中曾于5月14日、28日、31日和6月2日、7日晚上向狱友介绍马克思主义。^④虽尚未确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但却向前迈了一大步。他后来回忆说：“（共产主义）思想是颤动于狱中。”^⑤

① 周恩来：《新思潮尤所切望——致冯文潜》，《周恩来书信选集》，第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

② 怀恩选编：《周总理青少年时代诗文书信集》上，第149—15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③ 同②，第142页。

④ 周恩来：《检厅日记》，怀恩选编：《周总理青少年时代诗文书信集》上，第265—352页。

⑤ 周恩来：《我的主义是一定不变了——致李锡锦、郑季清》，《周恩来书信选集》，第46—49页。

1920年11月7日，周恩来赴法勤工俭学（同年1月一度赴英），初到欧洲比较慎重：来欧主要意旨，“唯在求学以谋自立，虚心考察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之于吾民族间者；至若一定主义，固非今日以弟浅学所敢认定者也。”^①周恩来为人持重，到欧后对各种主义进行了研究，读了许多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终于在1921年10月正式决定“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②1921年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周恩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留法勤工俭学涌现出来的另一个共产党员是李维汉。他赴法后在华法教育会候工期间看了不少无政府主义的书，深受其影响。1921年2月他与李富春等人组织了一个“勤工俭学励进会”（简称工学励进会，把勤工俭学看成是改造世界的方法），1920年8月改名工学世界社。据该社成员贺果日记记载，1920年12月27日、28日和29日他们（及蔡和森）连续开了三天会，头一天，蔡和森发表一天的“长篇谈话”，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社会大变革”，反对无政府主义。第二天，经过争论和蔡和森争取，到“晚九时，才表决了个倾向，各个（人）对现社会都不满足，都以为要革命才行。”^③这表明李维汉信仰马克思主义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转变过程，在这一转变中蔡和森做了许多工作。李维汉后来回忆说：“在我们这些人中间，搞马克思主义，蔡和森是先走了一步，他确实是我们的先驱者。”

留法勤工俭学学生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情况因人而异，蔡

① 周恩来：《来欧主要意旨——致陈式周》，《周恩来书信选集》，第23—27页。

② 周恩来：《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致谌小岑、李毅韬》，《周恩来书信选集》，第35—43页。

③ 蔡博：《蔡和森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的建党活动》，李维汉：《李维汉同志谈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见郑名斌：《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第284—313页、122—125页。

和森、周恩来属于水到渠成型，在国内即有一定思想基础；李立三主要受法国工人运动、法国共产党员及进步刊物的影响；李维汉主要是在蔡和森的帮助下摆脱了无政府主义影响。从中看出，留法青年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原因，有这样几个方面，第一，在国内的经历和思考。蔡和森在国内就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来法的目的便是探求救国方法。由于蔡和森、周恩来在国内较多地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所以来法后较快地转变成为共产主义战士。第二，法国进步报刊的影响及法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启发。西欧是马克思主义的故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曾在法国生活、战斗过。巴黎等地有许多马、恩的英法文著作，一些进步报刊经常刊登各国共产党、工人运动及十月革命的消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环境比国内方便。第三，蔡和森等留法共产主义先驱的带动。当时法国各种主义的书刊泛滥，许多人信奉无政府主义，蔡和森、周恩来等人经过艰苦的争取工作，使一部分人终于成为马克思主义者。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二人便是在周恩来的帮助下，从无政府主义者转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第四，国内的五四运动遭镇压及留法勤工俭学、留法政治斗争受挫，使许多人觉悟起来，认定无政府主义行不通，纷纷加入到共产主义队伍中来。陈毅就是在争取勤工俭学四处碰壁的情况下，于回国后的1922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第二年在北京入党）。

旅法青年完成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转变后，积极投身于共产主义运动中，他们除了不断争取进步青年外，还领导了三大政治斗争，组织旅欧共产主义组织，参预国内中国共产党的筹建，这些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和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中，都占有一定地位。

第一，领导三大政治斗争。三大政治斗争指二·二八运动、反借款斗争和进占里昂中法大学。

二·二八运动发生于1921年2月28日，当时华法教育会停止了对留学生发放维持费。学生派代表向北洋政府驻法公使馆提

出申请，要求政府发放津贴，遭国内电拒。蔡和森、李维汉等所领导的勤工俭学学生五百多人包围了驻法使馆，向北洋政府驻法公使请愿，要求政府每月给学生发放400法郎补助，保证发放四年以上；开放里昂中法大学。后来请愿学生被法国警察驱散。

反借（拒）款斗争。1921年6月北洋政府派专使来到巴黎，准备向法秘密借款和购买军火以扩大内战。勤工俭学学生在蔡和森、周恩来、赵世炎领导下发动了反借款斗争，最终取得了胜利。

进占里昂中法大学。里大是北京中法大学的海外分部，校址是一个炮兵营地，资金来源于法国退出的庚子赔款及国内募捐到的钱。校长是吴稚晖，董事长是李石曾。原来留法勤工俭学出现困难时，李曾回国发表演讲，多次声明将来里昂中法大学建成后可免费对学生开放。但是学校正式开学的时候，吴稚晖却将勤工俭学学生拒之门外，从国内招收了一批官绅子弟入学。蔡和森、李立三和赵世炎等人组织各地学生代表进占里大。管理校舍的人叫来法国军警将大院包围起来。学生先受到囚禁，10月18日被武装押上轮船遣送回国（共104名学生）。

第二，组织旅欧共产主义组织。蔡和森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发起人之一。1920年8月13日，他在致毛泽东的信中说：“将来讨论如得一致，则拟在此方旗鼓鲜明成立一个共产党。”又说“我意中国子两年内必须成立一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一致的党，这事关系不小、望你注意”。前一句指蔡自己在欧发起，后一句鼓动毛在国内参与发起。

1921年二·二八斗争后，赵世炎、李立三等主动与蔡和森联系，统一了意见，认为大家都信仰马克思主义，应该团结起来。赵世炎认为，应成立共产主义同盟会，蔡和森主张组织名称叫少年共产党，赵世炎、李立三表示同意。1921年7月，“工学世界社”在蒙达尼开会，李立三应邀参加。蔡和森主张成立少年共产党，由于有人反对，未能达成统一意见。这次虽未正式成立党组

织，但却是可喜的尝试。后来毛泽东与斯诺谈话时曾对蔡和森等人的建党努力给予高度评价，他说：“在法国，许多勤工俭学的人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几乎是同国内组织同时建立起来的。那里党的创始人之中有周恩来、李立三和向警予。向警予是蔡和森的妻子，惟一的一个女创始人。”^① 蔡和森在法国团结了一批共产主义战士，为旅欧少共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1922年6月，周恩来、赵世炎等人在巴黎发起成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第二年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与会代表18人，选举赵世炎为书记，周恩来负责宣传，李维汉负责组织。旅欧少共的机关刊物是《少年》，该刊物主要宗旨是宣扬马克思主义，介绍共产国际情况，并同无政府主义进行论战。1924年《少年》改名为《赤光》。加入少共的中国共产党员于1922年冬成立中国旅欧支部（1924年前未公开），张申府任书记。^②

第三，参与国内共产党的筹建和国内马克思主义的传播。1920年8月，蔡和森给毛泽东写信，建议毛留意国内共产党的成立（前已提到）。1921年2月，蔡和森又致信陈独秀，指出：“闻公主张社会主义而张东荪欢迎资本主义，两方驳论未得而见，殊以为憾。和森为极端马克思派，极端主张：唯物史观，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所以对于初期的社会主义，乌托邦的共产主义，不识时务穿着理想的绣花衣裳的无政府主义，专主经济行动的工团主义，调和劳资以延长资本政治的吉尔特社会主义，以及修正派的社会主义，一律排斥，不留余地。”^③ 他认为无产阶级面临生存问题，工人要工厂，农民要土地，资产阶级理论解决不

① 斯诺：《西行漫记》，第133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

② 黄利群：《留法勤工俭学简史》，第75页，教育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③ 蔡和森：《马克思主义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新青年》第9卷第4号，1921年8月。

了，只有实行“阶级战争”才能奏效，而在“阶级战争”之后还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蔡和森在理论上确实把握得较为准确，所以回国后号称“小马克思”。

第四，为祖国输送革命骨干。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涌现出一大批马克思主义者，许多人在西欧便加入了共产党或共青团。由于国内革命斗争的需要，他们纷纷赴莫斯科学习，而后回国参加并领导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1923年3月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王若飞、熊雄等12人前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3年11月刘伯坚、尹宽赴莫斯科，1924年9月聂荣臻、蔡畅等二十余人赴苏，1924年底李富春赴苏（同年周恩来回国），1926年1月邓小平等二十余人赴苏。他们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功勋，许多人甚至献出年轻的生命。

二、中法文学艺术交流

1. 蓬勃发展的法国文学翻译

我国对法国文学的翻译早在19世纪后半期便已开始。1871年王韬与张芝轩合作翻译了法国国歌《马赛曲》。1898年，林纾与人合译了《巴黎茶花女遗事》，第二年正式出版。林纾一生翻译外国小说等185种，其中法国作品近三十部。^①林纾小说在20世纪初，特别是民国初年产生了很大影响，美中不足的是他不懂外文（需与人合作）而且用文言翻译。

20世纪初，法国文学的翻译家以伍光健和曾朴为代表。留英归国在北洋水师学堂任教的伍光健（1866—1943年），在1907至1908年出版了《侠隐记》（今译《三个火枪手》）、《续侠隐记》

^① 上泰米：《林纾翻译作品全目》，《读书》1982年第10期。

(今译《二十年后》)和《法宫秘史》三部译作(原作者均为大仲马)。这是伍光健的代表性译作,产生了很大影响。伍光健精通英文却不懂法文,其译作均是从英译本转译。

曾朴(1872—1935年)除著有长篇小说《孽海花》外,曾自修法文,苦学成才,在法国文学翻译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他对法国文学的翻译有两大特征,一是涉猎较广,如大仲马、雨果(Victor Hugo, 1802—1885年)、莫里哀、福楼拜、左拉等人的作品他都曾选译过。二是侧重于雨果作品的翻译。1908年翻译了大仲马的《马哥王后佚史》(未译完),1913年翻译了雨果的《九十三年》(今译《九三年》),此后,他还翻译了雨果的剧本和诗歌等。曾朴较为系统和深入地译介法国文学作品,对法国文学在我国早期的传播,做出了一定贡献。^①

除伍光健、曾朴外,法国文学的翻译家还有苏曼殊、鲁迅、周桂笙、陈景韩、包天笑等人,可谓贤才济济。不仅翻译家较多,而且法国文学翻译在20世纪初的中国文坛中也占有重要地位。

进民国以来,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以来,外国文学翻译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中国新文学的发展离不开外国文学的影响。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和介绍有助于提高中国创作文学的水平,而高水平的创作文学又可增强翻译文学的质量。受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从民国初年到1930年,法国文学翻译取得可喜成就。此间除曾朴不断有新译作问世外,马君武、高君平、周瘦鹃、胡适等人也曾翻译了雨果、莫泊桑(Guy de Maupassant, 1850—1893年)、都德(Alphonse Daudet, 1840—1897年)等人的诗歌和短篇小说。如果说曾朴等人是独自从事文学翻译的话,那么,这一时期的《新青年》杂志、文学研究会等,则一定

^① 参见陈玉刚主编:《中国翻译文学史稿》,第85页,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9年版。

程度上进行了有组织的、团体的翻译，其中也包括法国文学的翻译。

《新青年》创刊后，从1915年到1921年，所发表的法国文学译作主要有龚古尔（Goncourt）兄弟的《基尔米里》（陈赅译），莫泊桑的《二渔夫》（胡适译）、《梅吕哀》（胡适译），《白瑛田太太》（张黄译）。《新青年》并非单纯的文学翻译杂志，但它对中国现代翻译文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20世纪20年代，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和未名社三大文学团体相继成立。其中文学研究会成立于1921年，其机关刊物为《小说月报》。文学研究会聚集了一大批外国文学的翻译家，在法国文学翻译方面译述甚丰。《小说月报》是这一时期翻译文学的重要阵地，据统计，从1921年至1926年该杂志发表外国文学翻译作品数十种，其中俄国文学33种，法国文学27种，日本文学13种，印度文学6种，英国文学8种。法国文学的翻译作品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小说月报》还专门刊出“法国文学专号”，系统介绍并翻译莫泊桑等法国著名作家的生平和重要作品。除创办《小说月报》外，文学研究会还编辑了“文学研究丛书”，搜集各国不同流派和体裁的外国作品近百种，在法国文学方面主要有《怪吝人》（莫里哀著，高真常译），《莫泊桑短篇小说集》（李青崖译），《遗产》（莫泊桑著，耿济之译），《嘉尔曼》（梅里美著，樊仲云译），《一生》（莫泊桑著，徐蔚南译）等。

未名社成立于1925年，由鲁迅、曹靖华、李霁野等人发起。鲁迅早年（1903年）曾依日文翻译了法国科幻作家儒勒·凡尔纳（Jule Verne, 1828—1905年）的《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等，1921年又与周作人合作出版了《域外小说集》，共收两人译文16篇，包括俄国、北欧、波兰等地的作品，其中《月夜》为莫泊桑短篇小说。

在20年代，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数量以俄国作品居首位，法国作品仅次于俄国。许多著名的法国作家及其作品都被译介到

中国，这些作家主要有莫泊桑、莫里哀、罗曼·罗兰、法郎士、都德、雨果、左拉、福楼拜、小仲马、伏尔泰等。在当时中国文坛上也涌现了一批较有成绩的法国文学翻译家，如李青崖翻译了莫泊桑中篇和短篇小说集，顾仲彝翻译了雨果的《欧那尼》、《吕克兰斯鲍夏》等，敬隐渔翻译了罗曼·罗兰的《若望克利司朵夫》（即《约翰克利斯朵夫》），李劫人翻译了福楼拜（Gustaave Flaubert, 1821—1880年）的长篇小说《马丹波瓦利》（即《包法利夫人》），刘半农译小仲马《茶花女》等。这些翻译家大多属文学研究会的成员，特别是李劫人在现代法国文学翻译领域颇有影响。

在20世纪30年代，“左联”的成立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大盛事。“左联”从1930年成立，至1936年解散，聚集了一大批进步作家兼翻译家，不仅成为中国革命文学的中心，而且也是中国创作文学与翻译文学的重要阵地。“左联”所翻译的法国文学作品主要有，《新先生》（都德著，徐声越译），《费加罗的结婚》（博马舍著，柳木森、河济合译），《安琪玲》（左拉著，李青崖译），《唐璜》（巴尔扎克著，蝉声译），《反抗》（罗曼·罗兰著，黎烈文译），《乔治·但丁》（莫里哀著，鲁彦译），《赎罪》（雨果著，腾刚译）。1934年，“左联”领导人之一的鲁迅等人创办了《译文》杂志。该杂志前后存在三年，曾出过法国文学家罗曼·罗兰逝世纪念专刊。

在30年代，郑振铎曾主编《世界文库》丛书，计划一集出60至80册，每月一册，每册四十余万字。从1935年至1936年出版了12个国家的一百多部作品（原计划出600种以上），其中也包括法国作家巴尔扎克（Honore de Balzac, 1799—1850年）、莫泊桑、雨果、司汤达（Stendhal, 1783—1842年）等人的作品。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人民进行了反法西斯的抗日战争。在战争环境中，我国对外国文学的翻译并未中断。抗战期间，文化生活出版社编印了《译文丛书》，该丛书由巴金任主编

(第一任主编为黄源，丛书的第一批书出版于战前，抗战爆发后巴金任主编)，共收入外国文学作品 50 种，其中包括法国作家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情感教育》，左拉的《娜娜》，莫泊桑的《两兄弟》，纪德的《地粮》、《伪币制造者》。^①

从抗战爆发到 40 年代末，翻译法国文学的大家是傅雷、李健吾。除了他们两人以外，赵瑞蕪、高名凯等也较有成就。赵瑞蕪在 1944 年翻译出版了司汤达的《红与黑》（重庆作家书屋出版），1946 年又推出了司汤达的《爱的毁灭》（上海正风出版社），其中司汤达的名著《红与黑》是首次译成中文。高名凯侧重于巴尔扎克作品的翻译，在 1947 年接连推出了《幻灭》三部曲，此外他还翻译了巴尔扎克的其他小说，如《华爱丽黛》（海燕书店 1946 年版），《葛兰德·欧琴妮》（1946 年出版），《杜尔教士》（1946 年出版），《单身汉的家事》（1947 年出版），《老小姐》（1949 年出版）等。他对巴尔扎克作品的翻译做出了一定贡献。

由于不同时期众多翻译家的努力，法国许多著名作家的作品被译成中文，这些作家主要有莫里哀、雨果、大仲马、司汤达、巴尔扎克、都德、莫泊桑、罗曼·罗兰。

莫里哀作品。1914 年至 1916 年，惟一合译《守财奴》（今译《吝啬鬼》）。1926 年世界出版社推出莫里哀代表作之一《伪君子》的中译本，1935 年，王了一译出《莫里哀全集》（一）。新中国成立后，李健吾又翻译了《莫里哀喜剧六种》（1959 年版）和《莫里哀喜剧》（收入 27 种）。^②

雨果作品。在 20 世纪初的十年间，雨果作品八次被译介到中国，主要有《侠奴血》、《孤儿记》、《哀史》、《红窗血泪记》等作品。1913 年，高君平译《妙龄，赠彼姝也》（雨果诗），同年

^① 见黄俊英：《二次大战的中外文化交流史》，第 84—85 页，重庆出版社 1991 年版。

^② 钱林森：《法国作家与中国》，第 44—47 页，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版。

曾朴译《九十三年》（今译《九三年》）。1916年，曾朴译《泉狄》（今译《吕克莱丝·波基亚》）。1944年，微林译《悲惨世界》第一部《芳汀》。1949年，陈敬容译《巴黎圣母院》（上海骆驼书店）。^①50年代闻家骢译《雨果诗选》。

大仲马作品。《真善美》第2卷6号曾统计了1928年所译外国小说的单行本，其中大仲马作品八本，包括《蟹莲郡主》、（《地亚小传》）、《玉楼花劫》（林纾译）、《侠隐记》、《法官秘史》（伍光健译）、《大宝窟王》（包天笑译）、《塞血儿》（冷血译）。1928年夏莱蒂译《莎兰绮》。40年代，徐仲年译《三剑客》，李青崖译《三个火枪手》。1945年，徐蔚南译《基督山恩仇记》。

司汤达作品。1932年，穆木天译司汤达短篇小说集《青年烧炭党》（即《法妮娜·法尼尼》）。1936年，李健吾译《司汤达小说集》，收《迷药》、《葫中人》、《法妮娜·法尼尼》等六个短篇。1944年，赵瑞蕻据英文译《红与黑》，1948年，徐迟译《帕尔玛宫闱秘史》，1949年，罗玉君据法文译《红与黑》。

巴尔扎克作品。1915年，林纾的《哀吹录》收四个短篇。1935年，郑振铎的《世界文库》收了徐霞村所译的两个短篇及穆木天所译的四个短篇。193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由蒋怀青所译的《巴尔扎克短篇小说选》（收了八个短篇）。1945年，云海出版社出版了罗塞译的《戴依夫人》（收了四个短篇）。1945年，重庆出版社出版了陈原译的《巴尔扎克讽刺小说集》（收了20篇）。除了短篇以外，也有长篇译著问世，黎烈文译出《乡下医生》（1938年），穆木天译《欧贞尼·葛朗代》，高名凯译《两诗人》，傅雷译《高老头》等。

都德作品。1912年胡适译《割地》（即《最后一课》），1914年他又译《柏林之围》。1916年，周瘦鹃译《猴》。1922年，李

^① 朱学勤等：《中国与欧洲文化交流志》，第25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劫人译《小物件》(通译为《小东西》), 1924年又译《达哈士孔的狒狒》。1931年, 王了一译《沙弗》。

莫泊桑作品。1904年, 陈冷血译《义勇军》, 1913年至1914年《小说月报》、《小说时报》刊登了瘦鹃等译的《铁血女儿》、《悲观人影》、《巴黎女子》等七篇小说。1919至1920年《晨报副刊》刊登译文26篇。1922年, 李劫人译《人心》。1926年徐蔚南译《一生》, 张秀中译《莫泊桑的诗》。到1926年, 莫泊桑小说集共出了六本。1929年至1941年李青崖又译出八集, 计119篇小说。除短篇小说外, 莫泊桑的长篇小说《我们的心》、《俊友》、《两兄弟》等也在30年代译成中文(雷晋笙、黎烈文等译)。

罗曼·罗兰作品。1926年, 敬隐渔首译《若望·克利斯朵夫》(即《约翰·克利斯朵夫》), 李劫人又译出中篇小说《彼得与露西》。三四十年代傅雷翻译了《约翰克利斯朵夫》和《贝多芬传》。1944年, 贺之才将9部戏剧全部译出。

从1911年至1949年, 我国出版外国文学译著3994种(据1987年版《民国总书目(外国文学)》, 包括重译本), 其中俄苏1158种, 美国555种, 英国777种, 法国580种(见王奇生:《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第322页)。这里, 译著只是单行本, 不包括杂志刊载的译文。如果综合单行本与杂志译文考察, 估计翻译法国文学的数量当超过英国, 而仅次于俄苏。

2. 傅雷等法国文学翻译家的卓越贡献

我国对法国文学的翻译成果累累, 译者众多, 其中的佼佼者当属傅雷、李健吾、李劫人、李青崖等人。

傅雷(1908—1966年), 上海市南汇县人。他中学就读于上海, 1927年自费赴法留学, 1931年秋归国。曾在上海美专、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等处任职, 后长期闭门译书。解放后担任过上海作协书记处书记等职。他在法国文学翻译

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这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1) 译著等身，卷帙浩繁。傅雷自 1928 年（20 岁）开始试译梅里美的《曼尔曼》，1929 年发表第一部译作《圣扬乔而夫的传说》（1 万余字），1933 年（23 岁）自费出版第一部译著《夏洛外传》，至 1965 年译完巴尔扎克的《猫儿打球号》，翻译生涯近四十年。他的翻译成果汇编成一部《傅雷译文集》15 卷，其中译著 31 部（不包括“译文集”第 12 卷中伏尔泰的短篇），文艺译文 20 篇（包括音乐笔记），累计达 500 余万字。^① 其实这只是指一种版本而言，如果加上修订版，字数更多。许多法文名著，每次再版傅雷都做了很大改动。比如巴尔扎克名著《高老头》，傅雷于 1944 年译成，1946 年 8 月由骆驼书店出版。1951 年又重译一遍，由平明出版社出版。1963 年又再次修改，至 1978 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在翻译《服尔德》时，从初译到寄出投稿“已改过六道”。^② 罗曼·罗兰长达百万字的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继 1941 年出版初译本后，1952 年至 1953 年又推出重译本。一百万字的巨著，修订时还要端端正正抄写清楚，比初译一本书恐怕也省不了太多的工夫。如果加上各种重译本，傅译文学作品远远超过五百余万字。

(2) 译作精当，涉猎广泛。从原文作者说，虽以巴尔扎克、罗曼·罗兰为主，但也有伏尔泰、梅里美、莫洛阿、罗素、牛顿的著作。一位翻译家涉及了这么多西方著名文学家（或学者）实在难得。不仅涉及作者很多，而且有重点，并不是蜻蜓点水。比如巴尔扎克的作品，傅雷便译了 15 部（其中《猫儿打球号》译稿丢失），这虽然只占《人间喜剧》的 1/6，却是其中的精华（巴尔扎克的其他小说，傅雷认为不宜译给中国人）。从作品的原文国别来说，以法国文学作品占绝大多数，但也有部分英国作

① 《傅雷译文集》第 1—15 卷，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1 年至 1985 年出版。

② 《傅雷家书》，第 29 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0 年版。

品，如罗素的《幸福之路》、牛顿的《英国绘画》。从篇幅来说，以中长篇居多，但也有一些是短篇或论文。从体裁上说，大致是比例最大者为小说，其次为传记，再次为人生修养专著，最后为音乐、美术论文。这反映了傅雷在法国文学翻译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同时也表明了他学识渊博，文学、音乐、美术样样精通。

(3) 成果影响大。傅雷的译著深受读者欢迎。傅雷在 1963 年 3 月 17 日致傅聪的信中提到，“前五年译的书正在陆续出版”，包括《都尔本堂神父》、《比哀兰德》和《赛查皮罗多》，此外，还再版了《高老头》、《贝姨》、《邦斯舅舅》和《欧也妮·葛朗台》等书。他告诉傅聪，“书一出来，十天、八天即销完”。^①这么多的书刚一出版就全部销完，固然有物以稀为贵的一面（当时外国文学中译本相对较少），但与傅雷翻译的成功也有很大关系。

20 世纪 30 年代至 60 年代中期，“法国文学在中国翻译文学中一直紧随俄苏而位居第二；而在欧美文学中，它则始终居于榜首”。^②俄苏文学的翻译在中国独占鳌头，这主要是政治原因，而法国文学位居第二则更多地由于学术原因，其中与傅雷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傅雷的翻译生涯恰好也是 30 年代至 60 年代中叶，他是法国著名文学家巴尔扎克和罗曼·罗兰作品汉译权威。

傅雷的译文深受读者（其中包括学者）欢迎。非常喜欢傅雷译作的罗新璋，曾把已出版的 200 万字的傅雷译文作为楷模，照原文抄录了一遍。^③

傅雷以其精湛的翻译技巧和流畅的译文风格而树立了人格的魅力。1966 年 9 月 3 日，傅雷夫妇不甘受迫害，愤而自杀。一位只读过傅雷译著而从未见过傅雷的普通女工，冒着生命危险以干女儿的名义将傅雷夫妇骨灰取出并保存下来。她还写了一封信给

① 《傅雷家书》，第 364 页。

② 罗瓦等：《法国文化史》，第 471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③ 金梅：《傅雷传》，第 332 页，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5 年版。

党中央，反映傅雷的死是冤枉的，傅雷是爱国的。信落到了四人帮爪牙手里，为此她受到了审讯。傅雷平反后，其长子音乐家傅聪回国曾向这位女子表示谢意，但她不求任何回报，甚至不愿向世人公布自己的名字。这位女子之所以能有这样的义举，主要基于她品格的伟大与高尚，但也正是由于傅雷的译著才引起了她对傅雷本人的关注与敬仰。

(4) 具有独到的翻译理论。傅雷是位翻译家，而非翻译理论家，他更重视翻译的实践，这和他在音乐、美术方面的造诣只侧重理论正好相反。他在给傅聪的信中提到，“××平日谈翻译极有见解，前天送来万余字精心苦练过的译稿要我看看，哪知一塌糊涂。可见理论与实践距离之大！……三年前北京《翻译通报》几次要我写文章，我都拒绝了，原因即是空谈理论是没用的，主要是自己动手。”^①从信中看出他反对空谈理论，在理论与实践更中更注重翻译实践。但傅雷毕竟是翻译巨匠，尽管他关于翻译理论的论著不多，但他成功的翻译作品本身便是独到的翻译理论的硕果。

傅雷在选择法文原著方面是十分慎重的。他所翻译的巴尔扎克的小说15篇，都是适合当时中国国情的精品，对于那些内容不适于当时中国读者的作品，他不想翻译过来。他说，巴尔扎克“一部分哲学味特别浓的小说，在西方公认为极重要，我却花了很大的劲才勉强读完，也花了很大的耐性读了几部研究这些作品的论著。总觉得神秘气息玄学气息不容易接受，至多是了解而已，谈不上欣赏和共鸣。”^②有些法文小说连文学家都读不下去，那么普通的文学爱好者就更不用提了。姑且不论这些小说从研究的角度是否有译成中文的必要，至少是翻译过来不容易产生较大影响。

^① 《傅雷家书》，第33页。

^② 同^①，第384页。

傅雷在翻译任何作品之前，都要先把该作品读通吃透，然后才下笔翻译。他说：“任何作品不精读四五遍决不动手，是为译事基本法门。”^①翻译之前将作品精读四五遍，这种认真精神是许多人做不到的。傅雷不急功近利，像导演吃透剧本一样，他以译者的身份投入到小说情节中，这也是他成功的要诀之一。

傅雷在翻译过程中对文字也下了许多功夫。他对自己的文笔永不满足，甚至给长子傅聪的信中还自谦“文笔”、“措辞造句”有局限。其实傅雷是颇有文学天赋和功底的，上中学时便发表过小说。他的措辞也很丰富，在家书中曾多次教导傅聪用词要多样化。所以说，他的不满足主要是由于对自己期望过高造成的。由于对自己不满足，所以便阅读老舍的《柳家大院》、赵树理的《三里湾》等语言文字上深受读者喜爱的新文学作品，用他自己的话说，读文艺创作作品“也是‘补课’性质，否则要落伍得不像话了”。^②他不但自己学习解放后的小说，还建议傅聪也学习《柳家大院》等以提高中文水平。

傅雷在翻译时遇到不懂的问题能虚心求教，一丝不苟。如遇到法律方面的问题便同律师朋友探讨。他不但向国内专家请教，也向国外友人求教。书法家裘劭恒回忆说，“他精通法文、英文。在翻译法文原著时，遇上不懂的地方，他常常对照英译本，如果对英译本中的译文有怀疑，他从不人云亦云，而是写信给法国朋友，向他们请教”。^③这种翻译的认真精神，十分难得。

傅雷翻译上的风格，是在忠实原著的基础上侧重于神似。他的一句名言是，“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所谓“形似”，主要是指“死抓字典，按照原

^① 傅雷致罗新璋的信，《傅雷全集》，第209—210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② 《傅雷家书》，第372页、376页。

^③ 裘劭恒：《傅雷真是一丝不苟》，《傅雷与傅聪》，第130页，作家出版社1995年版。

文句法拼凑堆砌”，这种翻译虽然很容易做到，但如果走极端的话会使原来的意思走样。傅雷认为，两国文字、句法、文法、修辞及俗语等多有不同，这些不同又反映了两种思想方式、风俗传统信仰和社会背景等的差异。既然两国文字有许多不同或差异，就不能抱字典拘泥地翻译，那么理想的翻译作品是怎样的呢？傅雷的标准是“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那么原文的意义与精神，译文的流畅与完整，都可以兼筹并顾，不至于再有以辞害意，或以意害辞的弊病了”。这里，傅雷提到了“以辞害意”和“以意害辞”，前者指形似的译法，忠实原文但意思不准确；后者指过分追求神似的译法，光照顾意思，但忠实原文不够。这两种译法，傅雷都反对。所以说，傅雷注重神似，不表明他不忠实原文，他要在忠实原文的基础上尽量不违背中文的句法规律，做到“无生硬拗口之病；又须能朗朗上口，求音节和谐；至节奏与 tempo 当然以原作为依归”。^①说到底，傅雷是要在中西（主要是法）文之间找一个合适的结合点。这一结合点的寻找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做得好更难。他认为自己“眼高手低”、“心长力绌”，远未达到境界，这是自谦之词。事实上，傅雷在翻译中已经做了最大限度的努力，而且所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

傅雷主张翻译要下功夫，多练笔。有人译了一篇 5000 字（指译文字数）的罗曼·罗兰童年的回忆，请傅雷指教。傅雷用了半天时间认真审了一遍，发现许多问题。他分析说，此人文学修养很好，翻译不成功的原因是“译的经验太少，功夫用得不够”。他认为“没吃足苦头决不能有好成绩”！^②从某种意义上说，傅雷自己的成绩全是吃苦换来的。尽管他自己从未承认自己取得了好成绩，但对自己工作的勤奋并不隐瞒。1956 年，他向长子透露，一天工作八九小时，译一二千字，改的时候一二千字又得用

① 傅雷致罗新璋的信，《傅雷全集》，第 209—210 页。

② 《傅雷家书》，第 46 页。

一天。1957年，他说自己修改巴尔扎克初译稿，“改得很苦，比第一遍更费功夫”。1961年底1962年初，每天译书八九小时，译二千字，加上写信、会客等每日工作十一二小时。要知道，傅雷晚年因被错划为右派等原因心情不好，患有关节炎、肾下垂、眼病等多种疾病。在多病的花甲之年尚能如此忘我工作，这是连年轻人都难以做到的。译书在一定意义上说并不比创作轻松，创作可以凭才气和主观愿望，而译书要忠实原文，这反而会受到很大限制，当然如果不负责地翻译就另当别论了，而傅雷恰恰不愿草率从事。傅雷的翻译成果既有质量又有数量，他追求的首先是质量，其次才是保证质量基础上的数量。

以上便是傅雷在文学翻译（特别是法国文学翻译）上所做出的卓越贡献。那么，傅雷为什么会取得如此大的翻译成就呢？除了上海徐汇中学三年的法文学习、在法国四年的留学经历、文学方面的天赋与造诣以及认真刻苦的工作精神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具有中西结合的文化观。

傅雷在翻译中强烈地感受到中西文化的不同，他说：“西方人的思想方式同我们距离实在是太大了，不做翻译的人恐怕不会体会到这么深切。”^①他看到了中西文化的差异，时刻想通过翻译在中西文化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他认为中西文化在语言上的差异比在音乐上的差异大，这也是他从事翻译非常认真的原因之一。

对于西方文化，傅雷多次对基督教提出了批评，他认为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与西方的科技经济发展极不协调，造成了近代人的精神破碎。对于中国文化，他首先肯定了其优点，他说“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从不追求自我扩张”，中华民族“多数是性情中正和平、淡泊、朴实，比西方人容易满足”。^②但他也指出了中国文

^① 《傅雷家书》，第376页、234—235页。

^② 同^①。

化的不足，中国“社会进步迟缓”，封建时代的“道德观、人生观、宇宙观及一切上层建筑，到近百年中还有很大势力”。我们比欧美“一方面是落后，一方面也是单纯，就是说更健全一些”。^①他对中国文化提出了批评，但其中多少又带有几分赞赏的口吻。在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优缺点的基础上，他总的评价是“越研究西方文化越感到中国文化之美，而且更适合我的个性。”^②20世纪60年代的傅雷对中国文化持肯定态度，与他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态度截然不同。

在偏爱中国文化的基础上，他的晚年受两种学说影响最大，“一种是四大皆空的看法，一种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③关于前者，显然是源于老庄与佛教的思想，把一切看得很淡，处于“超脱物外”的境地。这是由于傅雷性格上的因素，在社会上工作没有成功，选择了闭门译书为业，加上50年代的反右使他心情不好，多少有些“出世”（或说超脱现实）的心情。但另一方面，他是一个追求真理的人，一个在学问上不断探究的人，这又决定了他在翻译领域不断进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与儒家有关）。

傅雷虽然偏爱中国文化，但他并不拒绝吸收西方文化，他主张要学习西洋文化，而且称学习得法为“能化”。他还进一步说：“对自己的文化遗产彻底消化的人，文化遗产决不会变成包袱，反面养成一种无所不包的胸襟，即明白本民族的长处短处，也明白别的民族的长处短处，进一步会截长补短，吸收新鲜的养料。”^④他与傅聪的一句共勉发人深思，他说：“东方的智慧、明哲、超脱，要是能与西方的活力、热情、大无畏的精神融和起

① 《傅雷家书》，第236页、407页、363页。

② 同①。

③ 同①。

④ 同①，第377页、268页。

来，人类可能看到另一种新文化出现。”^① 总之，傅雷主张合理继承中国文化的优点，学习西方文化的长处，取长补短，在立足中国文化的基础上造就出一种中西结合的新文化。

如果说法文基础等使傅雷成为翻译家的话，那么他中西结合的文化观则帮助他成为一位出色的翻译家。当然这种文化观是伴随他的翻译实践等逐渐形成的，可一旦形成后，又使其翻译如虎添翼，更上一层楼。

李健吾，山西运城人，清华大学毕业后赴法留学，1933年回国，曾先后在上海戏剧专科学校、文学研究所（北京）等就职。他除了创作小说、戏剧及散文外，还从事法国文学翻译及介绍。1936年撰写出版了《福楼拜评传》。抗战期间在上海主要从事福楼拜小说的翻译，出版了福楼拜的短篇小说集，长篇小说《情感世界》（1948年）和《包法利夫人》（1958）。李健吾的另一翻译重点是莫里哀喜剧，上海解放后由开明书店出了八册，后又译成《莫里哀喜剧》。他还翻译过司汤达的《意大利遗事》（1982年）及罗曼·罗兰的《爱与死的搏斗》。^② 李健吾是当代翻译法国文学的大家，堪称福楼拜小说和莫泊桑喜剧翻译的权威。

李劫人（1891—1962年），四川成都人，著名作家，翻译家。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1924年回国。他一生中翻译法国长、短篇小说和剧本二十余种，主要有福楼拜的《马丹·波娃利》（即《包法利夫人》）、《萨朗波》、莫泊桑的《人心》，都德的《小东西》（初译时名为《小物件》）、《达哈士孔的狒狒》，龚古尔兄弟的《女郎爱丽沙》，左拉（Emile Zola, 1840—1902年）的《梦》（合译），罗曼·罗兰的《彼得与露西》。

傅雷是专门的翻译家，擅长巴尔扎克和罗曼·罗兰作品的翻译，有翻译大师或巨匠之称。李健吾和李劫人既是作家又是翻译

① 《傅雷家书》，第377页、268页。

② 陈玉刚主编：《中国翻译文学史稿》，第304页。

家。其中李健吾以翻译福楼拜小说和莫泊桑喜剧而著称；而李劫人则成名较早，以涉猎广见长。

3. 法国文坛对中国文学的了解

(1) 古典文学的译介。《西游记》，莫郎翻译了其中的部分内容，该选译本于1924年由巴黎笛子出版社出版，书名为《猴子与猪，神魔历险记》。此后，路易·阿韦诺尔（Louis Avend）也选择了《西游记》的章节，1957年由门槛出版社出版，书名仍为《西游记》，选译时绝大部分诗词被删掉了。^①

《西厢记》。法国学者对《西厢记》的研究和翻译当首推苏利埃·德·莫朗（George soulie de Morant）。他所译《西厢记》的选译本出版于1912年，附于由巴黎韦加出版社和梅居尔德弗斯出版社分别出版的《中国文学论集》（*Essai sur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莫朗著）一书中，只译了第一本的第三折“墙角联吟”。他翻译的全译本在1928年由巴黎E. 弗拉马里翁出版社出版，书名为《热恋的少女，中国13世纪的爱情故事》。此外值得一提的是，里昂中法学院文学博士陈宝吉也曾翻译过《西厢记》全本，1934年由里昂博斯克·弗雷公司出版，他的著作共分六章，其中第四章是关于《西厢记》全部内容的翻译。

《金瓶梅》。最早翻译者仍然是前面提到的莫朗。1922年，巴黎夏庞蒂埃与法斯凯尔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节译本，书名为《金莲》，在该书的序言中还对《金瓶梅》做了简要介绍，从此西方人开始了解《金瓶梅》。此后，法国又出现了德文转译本。德译本由库恩所译，1930年出版。1949年让·皮埃尔·柏雷（Jean - Pierre Porrel）的转译本出版了第一卷，1953年又出版了第一卷的修订本，第二、第三卷直到1979年后才陆续出齐。

《水浒传》。1922年北京政闻报社出版了《水浒传》法译单

^① 马祖毅、任荣珍：《汉籍外译史》，第182页，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行本，书名为《中国的勇士们》，是《水浒传》前24回。

《儒林外史》。1933年，贺师俊所译的法文选译本问世，由巴黎L·罗德斯坦书局出版，书名为《儒林外史——文学小说》(Joylin Wai Che: Le Roman des Letters)。

《聊斋志异》。法国学者自19世纪80年代便开始翻译《聊斋志异》，到20世纪初，出版了几种选译本。1912年，莫朗出版了《中国文学选》(Essai sur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一书，其中收有《聊斋》中《画皮》一篇的译文。1922年，由巴兰(Baglin)所译的23篇译文收入《中国故事》一书，在北京政治学会出版(中法对照本)。1940年，由皮艾尔·道丹(Pierre Daudin)所译的《中国故事集——聊斋志异选》，在西贡万方书局出版，书中包括了《聊斋》中的50篇。

在两国文学界的交流中，小说占重要地位。20世纪上半叶，法国对中国古典小说的翻译虽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节本较多，全本较少。法国对中国古典小说的翻译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有长足的进展。

除古典小说外，中国古典诗歌也被译介到了法国。1921年，布律诺·贝尔佩尔所译的《李太白诗四十首》在巴黎国家出版局出版。1930年，留法中国诗人梁宗岱在巴黎出版了《陶潜诗选》(法文)，法国一位大文豪在得到赠书后对诗文和翻译都给予了较高评价。1934年，黄文博的《陶渊明》在巴黎出版，使法国人更多地了解了陶渊明。1942年，罗大冈选译的《唐诗百首》在法出版，1946年(一说1948年)罗又出版另一本译著《首先是人，然后是诗人》，用法文介绍了屈原、陶潜、李白、杜甫、白居易、李贺和李清照等人的生平和诗歌。

法国对中国古典诗歌的集大成译著，是1962年(1954—1957年译)巴黎伽利玛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诗选》，该书由著名汉学家戴密微主持编译，从三代的《诗经》到清人诗词中选译了374首(204位诗人)。这部书是法国汉学家的集体劳动的结晶。

(2) 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译介。中国现代文学名家辈出，在国外也有一定影响。在 20 世纪上半叶，鲁迅、老舍、巴金、茅盾等作家的作品陆续被译介到法国。

鲁迅作品的译介。1926 年，在里昂中法大学留学的敬隐渔（罗曼·罗兰《约翰·克里斯朵夫》的翻译者）将《阿 Q 正传》译成法文，发表在《欧洲》杂志 1926 年 5 月、6 月号。罗曼·罗兰对于《阿 Q 正传》给予了很高评价，说“这是充满讽刺的一种写实的艺术……阿 Q 的苦脸永远留在记忆中”。^① 此后，敬还翻译了《孔乙己》和《故乡》，加上《阿 Q 正传》一起收入了 1929 年出版的《当代中国短篇小说家作品选》，该书由巴德埃苔出版社出版，除鲁迅外，也包括茅盾、郁达夫、冰心、敬隐渔等人的作品。

1931 年，留法学生徐仲年在巴黎《新法兰西杂志》上介绍《呐喊》，1933 年翻译了《孔乙己》，收入他的《中国诗文选》中。40 年代，法国汉学家布里埃（Q. Briere）作有《人民作家鲁迅》，对鲁迅进行了研究，然而法国对鲁迅作品大规模研究和翻译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

老舍作品的译介。1936 年，程济贤翻译的《洋车夫》（即《骆驼祥子》）在巴黎出版。40 年代末，让·布马拉（Jean Poumart）把老舍的《骆驼祥子》英译本（在美国流行）翻译成法文出版，可惜反响不尽如人意。1973 年，老舍的《骆驼祥子》法文重译本（程纪贤译）在法出版，销路比 40 年代好得多。1980 年，《茶馆》在巴黎被搬上舞台，一时间引起轰动。此后，老舍的作品在法国流传较广。

巴金作品的译介。1947 年，明兴礼（Comeille Monsterleet）发表博士论文《巴金“雾”》。七八十年代后，法国出现了研究巴金等中国文学家的高潮。

^① 孙伏园：《罗曼·罗兰评鲁迅》，1926 年 3 月 2 日《京报》副刊。

茅盾作品的译介。其作品《昙》1929年首次由敬隐渔译至法国。其后30年代戴望舒又和法国汉学家艾田浦合作，将《春蚕》译成法文。但茅盾作品较多地译成法文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

沈从文作品的译介，在法国有很大影响。法国著名汉学家于儒伯（Robert Runhlman）在给学生列的四本必读书中，三本是中国古代经典著作，另一本便是沈从文的小说集。有的大学把沈从文的书列为必修课。

总的说来，20世纪上半期，法国人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在二三十年代，法国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了解主要借助于中国留法学生。40年代后，法国的汉学家在中法文学交流中所起作用日渐重要。到1964年中法建交后，法国汉学界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翻译和研究进入全新时期，20世纪七八十年代形成了高潮。

4. 以法国为代表的西洋美术对中国美术的影响

中国绘画自唐宋时期臻于鼎盛，但自明清以来模仿多而创作少。尽管民国初期出现了吴昌硕、齐白石等绘画大师，但总体说来国画改革不够。到了20世纪20年代后，一批留法画家先后学成归国，中国画坛逐渐出现了新的生机。

西洋绘画传入中国始于明代。万历十一年（1583年）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在肇庆建立教堂，悬挂圣母像。万历二十八年传教士利玛窦曾向明神宗献天主、圣母画像。到了清代郎世宁等西洋画师供职内廷。他们本擅长西画，但为迎合皇帝，便“中西法参用”，用中国的笔墨和西洋的画法来画国画。明末清初的宫廷和民间也有一些画家参用西法。^① 20世纪以来中国的西画家大多曾留学日本和法国。留学日本学习西画技巧只能是间接的，因为

^① 朱伯雄等：《中国西画五十年》，第2页、5页，人民美术出版社1989年版。

西洋美术的中心在西欧（李叔同的日本老师便是留法画家）。中国画家留日的时间大多不长，除王悦之等少数画家归国后主要画油画外，其他留日中国画家都以国画见长。1917年，徐悲鸿赴日游历，认为日本画坛已“脱去拘守积习”，但浮华有余而神韵不足。^①

民国以来的中国画坛受以法国为代表的西洋美术影响最大。法国文化以文学、艺术见长。法国是西洋美术的中心，巴黎又是法国文化艺术中心。巴黎有许多博物馆，收藏了西方名画及复制品；巴黎有欧洲一流的绘画大师，如徐悲鸿的老师达仰·布佛来（Daynan Boveret），不仅画艺精湛而且品德高尚；这里有若干专门美术院校及模特馆。中国留欧西画家虽曾游历西欧诸国，但留学生活主要是在巴黎度过的。20世纪上半期，中国西画家的佼佼者，是留学法国的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和颜文梁等。他们不仅自己赴法留学，而且在归国后还将自己的弟子、好友介绍到法国求学。

美术的基础是教育。民国时期较有影响的美术专门学校都是留法画家任校长（或前任校长后留法）。

上海美专由刘海粟创办。1911年成立时名为上海图书美术院，1914年称上海图画美术院。1920年改名上海美术学校，1921年奉教育部之令改为上海美术专门学校，1930年始改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1952年与苏州美专合并，成立华东艺专。

国立北平艺术学院始设于1918年，名为北平美术学校。1926年称国立北京艺术专门学校，以刚刚留法归来的林风眠为校长（不久辞职）。1928年该校并入北大，称艺术学院，院长为徐悲鸿（旋即辞职）。1930年改为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抗战时与杭州艺专合并，1946年复校，徐悲鸿任校长，学制五年。1949

^① 《悲鸿自述》，见李松编：《徐悲鸿年谱》，第18页，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版。

年改为中央美院。

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1928年在西湖艺术院基础上设立国立杭州艺术院，校长为林风眠。1929年，教育部下令改为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该校中、西画同设于绘画系内，互取其长，大部分教师曾留学法国。1939年中、西画分系，解放后该校改名浙江美院。

私立苏州美专，1922年由颜文梁所创。1928年至1931年颜文梁赴法留学，节省生活费用为学校购置了大小石膏像达500座，图书万余册，分别运回国内。1932年（一说1930年）教育部批准定名为苏州美术专科学校，学制三年。抗战后学校于原址复校，改学制五年。^①

中央大学艺术专修科，后改中大艺术系。徐悲鸿刚一回国便被聘为教授，并在教学及系的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些美术院校的校长都是留法画家。他们的画风、艺术主张无疑会在该校教学中居主导地位。他们不仅以其创作实践、创作风格影响画坛，而且言传身教，以中西结合的技法培养一批又一批的美术人才。这些院校的教学除了传统的国画外，还明显受到西洋美术的影响，尤其打上了法国的烙印。如林风眠所主持的杭州艺专，在标语上写着“介绍西洋艺术，整理中国艺术，调和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该校以法文为外语课，教素描和油画的克罗多教授便是法国人。

以法国为中心的西洋画法的引入，使中国画家增加了绘画的立体感和准确度。徐悲鸿的马虽是国画，但吸收了西画中的解剖、透视等技法。他所作的国画《少陵诗意》（仕女画），用中国传统的线勾形，但也吸收了西画技法，增加了明暗和光影的渲染。中国画家在画油画时有时也会体现中国美术所具有的精神与意境。如徐悲鸿“运用中国画的渲染法和西洋画的明暗法相结

^① 《中国西画五十年》，第122页。

合，在某些油画的细部表现了十分微妙的效果。”他所画的油画和素描也具有中国绘画的传统精神和韵味。^①

不仅法国美术对中国画坛影响很大，而且法国画商对中国西画也有一定引导。1926年，徐悲鸿由巴黎去新加坡期间暂时回国，发现“国中西画颇较发展，而受法画商影响，浑沌殆不可救”。^②所谓“浑沌”主要指画派风格而言，当时抽象派、未来派、野兽派等西方现代画派影响中国，徐悲鸿回国后一直反对这些流派。

5. 徐悲鸿等留法画家学习西方绘画的杰出成就

徐悲鸿原名寿康，1895年生于江苏宜兴县屺亭桥。九岁时开始学画，1915年（20岁）来到上海，一边作画一边学习法文。1917年5月东游日本，同年11月由上海抵达北京，任北大画法研究会导师。1919年公费赴法留学，1927年春游历瑞士、意大利，1927年经新加坡回国。此后，除艺术创作外主要致力于美术教育，长期在中央大学（先在南京后一度迁重庆）任教。1946年任北平艺专（1949年改为中央美院）校长，直至1953年去世。

徐悲鸿在出国前已有一定的国画造诣（而且开始尝试运用西画技巧）。在国内的绘画基础是他成功的因素之一，但是如果没有赴法留学的经历，他或许会成为一位名画家，但不会成为融合中西的、一流的油画家，至少其成就会有所不同。事实上，正是在留法期间的1924年，他的绘画风格和技巧臻于成熟。

那么，八年的西欧求学生活（绝大部分时间在法国）究竟使他有哪些收获呢？主要是在欣赏并临摹名画、拜名师学西画技巧、模特素描、画动物、教育方法等方面眼界大开，得到了国内所不具备的机会和条件。

^① 廖静文：《徐悲鸿》，第400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

^② 《悲鸿自述》，见李松编：《徐悲鸿年谱》，第36页。

欣赏、临摹名画。当时巴黎一共有六十多个博物馆，陈列了许多艺术家的杰作，以收藏丰富闻名于世。徐悲鸿刚到巴黎便每天到各博物馆看画，“研究各派的异同，与各家之精诣”。除了看画以外，他还收集印制品并经常翻阅，对欧洲大陆主要画家的作品及风格都比较熟悉。^①此后，在德国柏林和比利时布鲁塞尔期间，他也常去博物馆临画。当时在国内不可能见到这么多真品，即便是印制品也没有法国等欧洲国家丰富。临摹虽不等于创作，却是学绘画必不可少的功夫。徐悲鸿从国外带回了大量美术印刷品，这些印刷品曾令蒋兆和获益匪浅。

拜名师学西画技巧。徐悲鸿在留法期间曾拜巴黎的达仰、弗拉孟、倍难尔为师，也曾向柏林的画家康普（Kampf）求教。达仰是法国最出色的画家，曾获欧洲六国国家院士。1920年，经过法雕塑家唐泼忒（Dampit）夫妇介绍，徐悲鸿认识了达仰先生，此后，他每个星期天都拿着画去达仰先生画室求教。在徐悲鸿造访的第一个星期天，达仰告诫他说：“从事美术是极其艰难的事，不要追求时髦，也不要满足于微小的成就。”他还让徐悲鸿在每次精心地画完素描后，要记住其特征，再背下来画一次，然后细心比较一下改正过来，以便打下坚实基础。这一指教是针对画油画的素描阶段而言的。1923年，徐悲鸿从德国归法，这时他已进入油画的临摹和创作阶段。他向达仰说自己虽未曾松懈却毫无进步。达仰指导他说：除了刻苦学习以外，还要“精描油绘人体，分部研究，务能体会其微”，不要追求爽利夺目的笔触。^②就是说在作人体油画时要严谨准确，注意细节，各个击破。徐悲鸿按达仰的教诲勤加练习，果然进步很快。俗话说“名师出高徒”，对于技巧性极强的绘画来说尤其如此。如果没有欧洲一流画家的指引，徐悲鸿的进步至少不会这么快。

^① 《悲鸿自述》，见李松编：《徐悲鸿年谱》，第24页。

^② 同^①，第32页。

模特素描。油画是以人物为核心题材的，讲求形似和明暗，所以人体素描是油画的基本功，这就像外科医生要学人体解剖一样。中国人体模特的运用遇到的阻力很大。裸体模特与中国的文化背景相抵触，这也是中国油画发展的一大障碍。在法国等西欧国家，描画人体模特比国内方便得多。徐悲鸿到巴黎后，每天上午在美术学校上课，下午去叙里昂研究所画模特。这里的模特是所里雇来的，画家买门票后就可进来描摹。^① 过了模特素描关，才能进入学画油画阶段。

画动物。徐悲鸿从小喜欢画动物，这也是他后来画马取得成功的兴趣动力。国内的马、狮等不很集中，他到了法、德以后，有机会见到跑马场和动物园。在法国，他常去马场画速写，并精研马的解剖，累计画了一千多张画稿，为后来画马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德国柏林期间，他常去动物园画狮。这里动物园铁槛是半圆形的，可从三四面观看，便于速写。徐悲鸿所画狮子积稿颇多，他回国后曾于1943年作“群狮”图（国画）。

教育方法。徐悲鸿在巴黎美术学校求学期间受到了正规的学院教育。学习主要分三大阶段，第一阶段在素描班画石膏像，第二阶段升到模特班画人体，第三阶段“再从名师学绘油画”。除了绘画以外，还要通过理论科目（解剖、透视、美术史等）考试，考试合格才算结业。^② 受系统的西方美术教育以及个人的探索，是徐悲鸿取得成就的经验，所以他回国后从事美术教育或教育管理时比较重视素描。

徐悲鸿在回国之初与田汉等人组织了南国社，成立南国艺术学院并任美术系主任。他在教学中强调：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素描要准确，但也要表现对象的特征和实质。1946年，他被聘为北平艺专校长，他将学制改为五年，又规定各科学生都

^① 蒋君微：《我与悲鸿》，第67页，岳麓书社1986年版。

^② 同①，第67—68页。

要学习素描，国画系和图案系的学生也不例外。他大胆进行国画改革，重视写生，反对一味临摹。北平美专的个别人反对他的改革主张，但他仍然坚持改革。在中国，引进西方的教育方法并非始于徐悲鸿，但徐悲鸿无疑推行得更系统、更执着。他是出色的美术教育家，善于识别真才，桃李满天下。

徐悲鸿除了从事创作和教学外，还宣传并推行其艺术观点，这一观点事实上是从美术角度探讨古今中外文化的吸取与改造。

1918年，徐悲鸿在北大发表演讲，认为中国画颓败的原因在于守旧，抄袭古人。因此要创新，走写实之路。^① 1920年6月，他在蔡元培主编的《绘学杂志》（第一期）上发表《中国画改良论》，指出：“古法之佳者守之，重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画之可采人者融之。”^② 实际上，要在继承中国绘画优良传统基础上合理吸取西方的技法。此文与上次演讲大意相同，表明他在出国前已强调国画改革，而改革的重要途径是继承优秀传统、走写实之路和学习西法。

1929年，他和徐志摩展开论战，反对形式主义美术。1943年他对廖静文说：“中国美术的复兴，即师法造化，采取世界上共同的法则，以人为主题。”1947年，他在北平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书面谈话，题为《新国画建立之步骤》，他说：“建立新中国画既非改良，亦非中西合璧，仅直接师法造化而已。”^③ 他这里旨在强调素描的重要性，认为重素描不会使国画走人歧途；在重素描的基础上进行摸索，才可能将中国画发扬光大。

徐悲鸿受西方古典主义画派影响较大，也带有印象派色彩，但他并未忘记民族优秀传统，这一特点在实际生活和创作中表现

① 郑理：《笔下千骑——绘画大师徐悲鸿》，第66—6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② 李松编：《徐悲鸿年谱》，第25页。

③ 廖静文：《徐悲鸿》，第366页、334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

为：第一，他反对明末以来“屈服于华亭及娄东四王一派”的画风，^①但对唐宋绘画深为赞赏，将珍藏的《八十七神仙卷》视为生命。第二，他的油画无论从技巧到内容上都具有民族特色，《田横五百上》、《徯我后》反映的都是中国古代的题材，借古讽今。第三，他对当代富有创新精神的国画家齐白石、张大千等人非常赞赏，特别是对受孤立的齐白石鼓励备至。第四，他赴西方美展时所带的作品大多是国画，他自己也创作国画。他认为国画反映生活的功能较油画更概括，更易于抒发画家对生活的感受。^②

当然，徐悲鸿也确曾用西画技巧来改革国画。1934年，他赴莫斯科举办画展，在答记者问时说：“学西画之长，补我国画表现技法上之不足，是我的出发点。”在画马时“着重表现了马的精神特征，但也吸取了西画中的解剖、透视等技法，把它同中国画的传统技法结合到一起。”^③总之，他在西画技巧上重古典主义，在国画方面重写实传统，借西画技巧来发挥国画的优点，反映现实生活，这就是徐悲鸿美术观的主要特征。

徐悲鸿另一项突出贡献，是他在1933年至1934年在欧洲成功地举行了“中国近代绘画展览”。徐悲鸿携带了任伯年、吴昌硕、齐白石、高奇峰、张大千、陈树人、张书旗、郑曼青和他本人的作品三百余件，1933年5月在巴黎首先展出。开幕式上，法国教育部长及各界知名人士三千多人到场。画展引起轰动，目录印了三版，观众达三万人以上，报刊评论文章二百多篇。这是第一次将中国现代美术介绍给法国人。画展结束后，法国政府购买了徐悲鸿等人的十余幅国画。1933年冬，徐悲鸿又应邀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意大利的米兰等地举办画展，1934年又先后

① 廖静文：《徐悲鸿》，第366页、334页。

② 郑理：《笔下千骑》，第14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③ 同②，第144页。

在德国柏林和苏联莫斯科举办画展，前后 20 个月。在这期间共展览七次，欧洲博物馆及大学成立四个中国近代美术展览室，赞扬中国文化文章的杂志超过 2 亿份。^① 徐悲鸿受其师达仰的影响，不追求获奖及个人画展，他在欧洲展览期间虽曾应邀举办过个人画展，但主要是代表中国展出近现代诸位名家绘画（他后来赴印度、新加坡举办个人画展也有宣传抗日的宗旨）。他在欧洲举办画展之举，为中国文化在西方的展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刘海粟因创办上海美专和使用人体模特而声名大振，他的绘画作品在出国前即受好评，1927 年赴日举办画展，日本天皇曾购藏数幅。1939 年春，他赴法国等西欧国家观临名作，同时继续作画。他的一幅油画《卢森堡之雪》由法国政府购于美术馆。1931 年 9 月，他回到了祖国。^② 1933 年 11 月，他赴德主持“中国现代绘画展览会”，开始了第二次旅欧。此后又在荷兰、瑞士等地展出画展。1934 年 6 月，他的油画《西湖之秋》和国画《三千年蟠桃》被法国国家美术馆购藏。1939 年至 1940 年，他又赴东南亚举办画展，筹款抗战。刘海粟在一生中不断探索，虽两次中风亦未受影响。他的长寿也使他的艺术生命更为长久，在晚年名气更大。建国后曾多次举办画展，早年以油画成名，晚年则以国画为主。徐悲鸿受古典主义影响较深，刘海粟受现代画派影响较大。徐悲鸿主要得益于师承，而刘海粟则主要靠自学与进修。

林风眠 1918 年赴法勤工俭学，从此未放弃中西结合的努力。他刚到法国便考虑结合民族传统学习西画，并且在欧洲的博物馆研究东方美术。^③ 徐悲鸿是现实主义的，而林风眠则是浪漫主义

① 廖静文：《徐悲鸿》，第 133 页、134 页、142 页。

② 《中国西画五十年》，第 215—217 页。

③ 同②，第 258 页。

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风格。他赴法留学固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回国后的探索对于他的艺术生涯也至关重要。1962年12月，林风眠在上海举办画展，著名翻译家兼美术评论家傅雷评论说：“作品七十余件，十分之九均精，为近年少见。”^①表明回国后的探索令林风眠在艺术上更上一层楼。林风眠在留学归来后长期任美专校长，而刘海粟在出国前便已创办并主持美专。

此外，民国时期著名的西画家还有颜文梁。颜文梁出国前便创办苏州美专，1928年赴法深造，1931年回国。虽然在当时美术界的名气不如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三人，但也足以在现代中国画坛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他对西画追求之执着及对苏州美专办学之诚笃，在民国画坛堪称佳话。他从西欧带来了许多石膏像和图书，这在当时美术界也是一大壮举。

这批留法画家在中国现代画坛中令人瞩目。民国时期影响中国画坛的要素是中国文化传统、日本艺术风格、欧美艺术风格和现实生活。画家就像一个厨师，从四种调料中选其两种或几种加以烹调，至于种数和数量的多少则取决于厨师个人的风格和口味。徐悲鸿、林风眠和刘海粟等人是留学法国画家的代表，同时也是留学欧美画家的代表，他们的风格是侧重于吸取西画营养从而给中国画坛注入新鲜活力。尽管他们的流派、艺术主张和美学观点不尽相同，但都是振兴中国美术大旗下的盟友。他们和古人以及同时代其他画家不同之处在于：第一，吸取西洋技法并在不同程度、不同方面同国画相结合；第二，他们的艺术创作、教育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且从未放弃自己的努力。

上述所提的四要素归根结底是两大要素，一是传统，一是西画。在有成就的现代画家中，只有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等少数人未受到西方影响，而是在充分领略传统之后或是改变风格或

^① 《傅雷全集·傅雷家书》，第441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是贴近现实生活，从而多少有些超脱传统，独创性地自成一派；^①但是大部分画家受到了外界的影响，即便是没有留学的经历，至少也受到了西方绘画的影响，自主不自主地在国画与西画之间寻求着结合。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包括文艺、哲学等学术文化史表明，完全沉迷于传统、与世隔绝是没有出路的，文言文终于被白话文取代，绝大部分新文学大师都有着留学的经历；但是完全背离传统和国情又要摔跟头，画家本人生长在中国，又要长期面对中国的观众或读者，虽然偶尔可以获国际大奖，但眼睛总要盯着中国。中西结合是近代以来时代赋予国人的主要任务，至于怎样结合，是传统多还是西方多，是精神多还是方法多，是重时髦还是比长远，是有自己特色还是人云亦云，不同学科、不同时代及不同的人各有侧重。徐悲鸿等人将权威的西画技法引入中国，不仅给当时的中国画坛注入了生机，也为以后中国的改革打通一条出路。齐白石、张大千、黄宾虹等人的改革主要是在传统之上又向现实生活贴近一步，从这个意义上说，徐悲鸿、刘海粟和林风眠等西画家和齐白石、张大千、黄宾虹等国画家，在改革中国美术过程中岂不是殊途而同归吗？

6. 冼星海留法归来后的贡献

冼星海祖籍广东番禺县，1905年出生于澳门，父亲早逝。1911年，冼星海与母亲赴新加坡谋生，开始接触西方音乐。1918年，与母亲回到广州，继续求学。1926年后又先后在北京、上海等地学习音乐。1929年前往法国留学，1930年初抵达巴黎。

在法求学的六年里，冼星海做过各种杂役：餐馆跑堂、守电话、抄乐谱等，甚至去餐馆拉提琴讨钱。但他凭着刻苦的精神和顽强的毅力，从未间断音乐学习。在马思聪的帮助下，他认识了著名提琴家保罗·奥别多菲尔（Paul ober-doeffler），并跟奥别多

^① 参见张少侠、李小山：《中国现代绘画史》，江苏美术出版社1986年版。

菲尔学提琴，还被破例免收学费。他还从国民学派的著名作曲教授丹地（V. D'Indy）学作曲，又跟拉卑（Labey）先生学指挥。

冼星海成名作为女高音独唱曲《风》（单簧管和钢琴伴奏），该曲在巴黎电台广播，并在巴黎音乐院新作品演奏会上演奏（以前一般只演本院师生的作品）。由于《风》受到好评，所以巴黎音乐院的大作曲家保罗·杜卡斯（Paul Dukas，世界三大音乐家之一）允许冼星海考巴黎音乐院的高级作曲班，以前尚没有中国人报考此班。考试很顺利，冼星海得了个荣誉奖。教授们问他有什么物质要求，他回答说要饭票。在巴黎音乐院，他“专心学作曲，兼学指挥”。^①在学习期间得到了师长们的帮助，1935年他从作曲班毕业。不久，杜卡斯先生去世，冼星海放弃了在法工作的机会，1935年夏回国。

在朋友的推荐下，他担任了上海工部局（外国人统治租界的机构）一支管弦乐队的指挥。这支乐队在中国享有盛名，只是艺术家们都是外国人。由于这些外国艺术家歧视中国人，冼星海一怒之下摔掉了指挥棒。此后，他加入了进步组织——歌曲作者协会。^②在此期间，他写了《运动会歌》、《我们要抵抗》（他的第一首救亡歌曲）、《战歌》、《救国进行曲》等。《战歌》等歌曲由百代公司收入唱片，打破了该公司唱片发行纪录。1937年“八·一三”之后，他参加了洪深组织的上海救亡演剧第二队，到浙江、河南、湖北等地宣传抗战。1937年年底，他来到武汉，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副主任周恩来）第三厅六处（艺术宣传处）音乐科任主任科员，“他和张曙兄两位，事实上领导着当时的抗战音乐”^③。在此前后，他作了《保卫武

^① 冼星海：《我学习音乐的经过》，载马可：《冼星海传》，第25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② 马可：《冼星海传》，第126页。

^③ 郭沫若：《吊星海》，1946年1月5日《新华日报》。

汉》、《游击军》、《到敌人后方去》、《在太行山上》等歌曲。

1938年10月，冼星海扮成侨商前往延安，同年11月到达目的地。他先被聘为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教授，后又任系主任。他的夫人钱韵玲后来回忆说：“在延安时期，是星海的创作最旺盛的时期。他的乐思如泉涌……”^①在延安期间他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等创作，并于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5月离开延安赴苏联，在苏联又写成了两首交响曲、四首组曲等。1945年10月在莫斯科病逝，时年41岁。

虽然冼星海出国以前对音乐满腔热爱，但毕竟系统学习不够，因而谈不上具有多高造诣。六年的留学深造使他得到了极大提高，掌握了现代音乐技巧与理论，尤其在作曲、指挥及提琴演奏方面有较深的造诣和较大影响。

冼星海在巴黎期间便开始作曲，回国后又创作了大量作品。他一生中创作了两部交响曲（第一交响曲即“民族解放交响曲”，第二交响曲即“神圣之战”）、四部大合唱（九·一八、黄河、牺盟、生产大合唱）、两部歌剧（“军民进行曲”等，一说是一部歌剧）、四部组曲，以及五百多种歌曲。^②其中黄河大合唱是其代表作，他是我国第一个用大合唱来表现现实斗争和人民生活的作曲家。

指挥，是冼星海的第二强项。在巴黎期间这便是他主修的专业方向之一，回国后一度受荐为上海租界工部局的管弦乐队（当时是中国最完备的乐队）指挥。1937年八·一三抗战后，他参加了洪深领导的救亡演剧第二队，到内地进行宣传。他们第一批来到开封，冼星海“每天步行很多路，由这学校到那学校，组织歌

^① 钱韵玲：《深情无限忆星海·战斗到生命最后一息》，《音乐爱好者》1980年第3期。

^② 中国音乐家协会编：《中国音乐家小传》，第7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咏队，教大家唱新歌，随手拣起什么柴棒之类就指挥大家唱起来”。^① 1937年9月18日，洛阳举行纪念“九·一八”歌咏音乐大会，第二天的《河洛日报》报道说：“名作曲家冼星海并亲自指导各校歌咏团学生，合唱救亡歌曲，颇引起参加人士之注意。”^②冼星海非常重视这次歌咏音乐大会，把它称为“中华民族的呼声！为民族解放的救亡呼声！”^③ 1938年底，他来到武汉，当时武汉的抗日歌咏运动刚刚形成，还比较幼稚，“星海同志一来，就好像这地歌咏大军有了主帅一样，迅速地发展壮大起来”。^④ 到达延安后，他的指挥才能得到充分发挥。他的指挥十分有生气，能调动每一位演唱者的激情，克服了合唱队员水准不一、乐队乐器有限等许多不利条件，从而达到良好的效果。1939年底，在延安大礼堂举行了一次500人参加的《黄河大合唱》。这在延安是空前规模的大合唱，由冼星海亲自指挥。尽管事先排练得并不十分充分，但冼星海凭借出色的指挥艺术，将这次合唱组织得十分成功。当演唱到“保卫黄河”的时候，冼星海突然转向观众，示意大家一起来唱，顿时礼堂内歌声嘹亮，激情如潮，台下许多人激动得流出了泪水，大合唱仿佛是东方巨龙的怒吼。

冼星海还为祖国现代音乐人才的培养做出了贡献。在武汉，他与友人一道“举办了有一百二十名学员参加的歌咏训练班，培养了一批新音乐工作者”。^⑤ 到延安后他担任鲁艺音乐系主任，常抽时间到“抗大”、“女大”、“医大”教歌。为了尽快培养大批

① 马可：《回忆星海同志》，1945年11月16日《解放日报》。

②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冼星海》，第30页，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年版。

③ 同②，第30页。

④ 林路：《冼星海同志在武汉的时候——纪念冼星海逝世十五周年》，1960年10月30日《长江日报》。

⑤ 阳翰笙：《第三厅：国统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战斗堡垒》（四），《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3期。

音乐干部，他在教学中不拘旧规，能深入浅出、理论联系实际地讲授。他还注意对学员加以鼓励，激发大家创造的积极性。

冼星海也是中法、中苏音乐文化交流的使者。早年赴法留学时虽主要向法国音乐家学习，但同时也带去了东方人的感触和音乐情怀。他在巴黎的成名作——《风》在形式及技巧方面固然属于西洋音乐，但主题和背景方面也反映了他对祖国命运的关心和思念。冼星海一生中与苏联音乐结下了不解之缘。在留法期间，他的《风》受到苏联著名作曲家普罗科菲耶夫的称赞，这位作曲家还提议将《风》在巴黎电台播放。冼星海在延安期间通过苏联搜集到了大量关于世界音乐的乐谱。为进一步学习和研究音乐，他于1940年前往苏联，在苏写成了著名的第二交响曲——“神圣之战”，这是反映苏联卫国战争的作品。1944年1月，冼星海参加了库斯那伊城音乐馆的筹建工作。1944年3月音乐馆建成并举行了盛大的音乐会。冼星海亲自参与了音乐会的组织工作，还登台用小提琴演奏了哈萨克歌曲，受到当地观众的热烈欢迎。在该城期间，他接触了丰富的民谣，完成了著名的《阿曼盖尔达》，这是以哈萨克的英雄阿曼盖尔达命名的作品，后来在纪念大会上冼星海亲自担任小提琴演奏（钢琴伴奏）。^①冼星海在苏期间还研究过苏联民歌和俄罗斯古典音乐，这对他的音乐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不仅作曲技巧有很大提高，风格上也逐渐摆脱法国印象派的影响。

冼星海一生以音乐创作见长，但创作的背后也体现了他的音乐理论。冼星海回国后的音乐实践始终贯彻两大精神，一是西洋音乐与本民族音乐相结合，二是音乐创作与国家命运和时代要求相结合。

冼星海虽在出国前已开始接触西洋音乐，但系统学习还是在

^① [苏] M·科伊什巴耶夫：《回忆杰出的作曲家冼星海同志》（唯民译），《人民音乐》1957年第10期。

法国。他在法国所学的内容中，提琴本是西洋乐器，指挥也属西洋音乐范畴，而作曲也是以西方的五线谱为工具（而非中国传统的工尺谱）。也就是说冼星海的音乐造诣与留法学习西洋音乐有直接关系。

但是，西洋音乐在民国时期还不具备足够的听众，乐器、乐队也十分缺乏。在这种情况下冼星海也不会不照顾国内的实际情况，何况中国民族音乐还有很多精华，迷恋音乐而十分爱国爱民的冼星海又怎能不关注民族音乐呢？他曾说：“民歌，是建立中国新兴音乐不可缺少的。”^①在延安期间，他收编、整理过朋友们收集来的民歌。他在《民歌与中国新兴音乐》一文中对传统戏剧音乐也做了中肯评价，“二簧是圆稳有趣的，西皮是凄楚激昂，梆子是悲壮激越，昆曲是温雅幽静，高腔是朴质有神”。^②冼星海力图将所学的西洋音乐技巧与民族音乐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现代新音乐。他所作的独唱歌曲从音调上看有昆曲等地方戏曲和民歌小调的特征；他还用现代作曲技巧为古诗词谱曲；他在大合唱的伴奏乐器中，中西兼用，为弥补乐器缺乏还加入了中国的打击乐，并运用到空前水平以增强音响效果。

冼星海是一个忧国忧民的进步音乐家，回国后选择聂耳的音乐道路，从事国防音乐的创作，以音乐这一形式宣传抗日救亡，并深入下层研究民歌，与人民大众共命运。他到延安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到莫斯科后又讴歌伟大的卫国战争。冼星海不断追求进步，将西洋技巧、民族音乐与时代要求结合在一起。他的经典之作《黄河大合唱》正是在抗战期间的1939年谱成的，考虑时代的呼唤、民族的需要是他创作成功的因素之一。他无愧于“人民音乐家”之称。

① 安波：《星海同志永远在指导与鼓舞着我们》，聂耳、冼星海学会编：《永生的海燕——聂耳、冼星海纪念文集》，第274页，人民音乐出版社1987年版。

② 谭冰若等：《学习星海独唱歌曲的创作经验》，同上书，第418页。

马思聪（1912—1987年）广东海丰人，提琴演奏家、作曲家。从小喜欢音乐，1923年11岁时随长兄赴法留学，先在枫丹白露（Fortaineblean）等地学习三年，后从巴黎国立音乐院的提琴独奏家奥别多菲尔学习，这是他的第五位提琴老师。1928年，他考入巴黎音乐院 Bouchenif 先生的提琴班，成为第一个考入此音乐院的黄种人。^① 1929年回国探亲，在上海、广州、香港演奏小提琴，被誉为神童。1930年再赴巴黎，拜毕能逢学作曲，1931年回国，在香港举办音乐会受到好评。1937年作小提琴曲《思乡曲》，这是他的代表作（西方乐器结合东方民族特征）。1947年谱写《祖国大合唱》，1948年拒绝了司徒雷登约他赴美的邀请。1949年从香港北上解放区，任燕京大学教授，同年任中华全国音协副主席，1950年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文革期间受到迫害，于1967年经香港赴美国，1987年病逝。

马思聪留法多年，学成归国后在音乐方面造诣非凡，在中法音乐文化交流方面做出很大贡献。首先，他在留法期间以大部分时间专攻提琴演奏，并得名师传授，因而掌握了高超的演奏技巧。回国后曾多次举办提琴演奏会，好评如潮。尤其是抗战期间在昆明、重庆举办音乐会，盛况空前。其次，他从法国著名作曲家学习作曲，颇得西方作曲技巧真传。他结合中西音乐创作了著名的小提琴曲《思乡曲》。可见，他不仅擅长演奏提琴，而且精于提琴曲的谱曲，可谓全才。第三，对中国音乐人才的培养做出了贡献。马思聪幼小出国，在法国著名音乐学院修业多年，学有所成，对法国音乐教育颇为熟悉。回国后，他曾以很大精力投入到音乐教育中，后长期担任中央音乐学院的院长，成为音乐家兼音乐教育家。由精通并熟悉法国音乐技巧、理论及音乐教育体制的音乐家来担任中国音乐学院的院长，这件事本身便是中西音乐

^① 马思聪：《童年追想曲》，载《良友画报》1935年，见叶永烈：《爱国的“叛国者”——马思聪传》，第58—64页，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

文化交流的典型范例。

马思聪与冼星海都是广东人，都在巴黎音乐院这一高等学府学音乐，甚至拜同一名师学提琴，学成以后都回到了祖国。冼星海出身贫寒，留学时靠勤工俭学和师友之助才完成学业，而马思聪留学则靠父兄资助。冼星海留学时 25 岁，已过了学提琴的最好年龄，但他有惊人的毅力和刻苦的精神；马思聪留学时仅 11 岁，学成归国时不过 19 岁，这决定了他少年成名。冼星海回国后致力于国防音乐的建设，积极地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中，马思聪回国后则致力于高雅音乐的演奏与创作。冼星海更注重东方民族音乐，受民歌影响较大；马思聪对西方音乐更为熟悉，当然也不乏东方情调，受民族音乐中的大鼓影响较大。冼星海以大合唱作曲闻名，马思聪以提琴曲《思乡曲》而闻名。冼星海是进步人士，马思聪是民主人士，但二人都为中国现代新音乐的建设做出了贡献。这不能不说是中法音乐文化交流的重大成果。冼星海的英年早逝和马思聪的被迫出走，是中国现代音乐界的重大损失。

三、法国的汉学研究

1. 法国的汉学研究机构

成立于 1530 年的法兰西学院，19 世纪是法国研究中国历史和文明的惟一机构，到 20 世纪仍在法国汉学研究领域举足轻重。该院主要包括数学、物理学、生物学、医学、哲学、语言学、文学及考古学等学科，实行择优选拔教授的制度，每年大约有五十名教授在此任教。^① 学者们自由地选择研究领域，惟一任务是年复一年地介绍他们的研究成果（不授课，但每年要做二十多次演

^① [法]戴仁主编，耿昇译：《法国当代中国学》，第 493—498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讲)。同时人人都可以自由地听课，既不用交学费也不用考试。教授们的研究课题并不重复，如果是某一学科出现了新的分支学科，而某位杰出学者又有能力进行这一分支学科的研究，那么这位学者就会在学院教授指标有空缺的时候被补选进来。法兰西学院是法国乃至西欧最大的汉学研究机构，在这里聚集了法国一流的汉学家。

1929年，法兰西学院教授伯希和（Paul Pelliot）在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即原国立东方现代语言学院），承担了数月的汉语教学，其后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于1930—1945年长期担任该学院中文教授。此外，作为汉语课程的补充，东方语言文化学院还开设了题为“远东国家地理、历史和制度讲座”的文明课，该课的主持者，1889—1925年为考狄（Henri Cordier），1926—1940年为葛兰言（Marcel Granet），1941—1952年为格鲁塞（René Grousset）。在1945年戴密微调离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后，该学院的汉语讲座长年无主持人，只好权宜任命讲课负责人。先后受命为负责人的学者，1946—1948年为列昂·让凯列维奇（Léon Jankélévitch），1948—1952年为石泰安（Rolf Stein）。^①

在巴黎大学文学院，1920年葛兰言开设了简明中国文明史课程，但未能持续下去。直到1957年，巴黎大学文学和人文科学院才开始了“中国语言和文明”讲座。

与巴黎大学略有关系的一家汉学研究机构是汉学研究所。该所成立于1920年，其倡议及创立者为保罗·班乐卫（Paul Painlevé）。初为私人机构，1921年被承认为公益性组织。该所的经费来源于庚子赔款，正式启动是在1926年研究所置于巴黎大学的保护下之后。1929年前后，巴黎大学为汉学研究所提供了办公场所——索邦神学院。汉学研究所的历任所长为：葛兰言，

^① [法]戴仁主编，耿昇译：《法国当代中国学》，第88页、51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1920—1940年；伯希和，1940—1945年；戴何都（Rober des Rotours），1945—1947年；韩百诗（Louis Hambis），1947年前后任职。戴何都等人曾极力争取将研究所归入巴黎大学，直到1959年这一请求才正式被批准，从此汉学研究所一度归巴黎大学负责，并享受一笔预算。1967年，汉学研究所迁到威尔逊总统大街新址。1968年，巴黎大学分裂，汉学研究所暂时隶属不明。1973年，该研究所正式并入法兰西学院，成为后的一个下属机构，主要承担印度和远东亚细的研究。汉学研究所自成立以来主要做了三项工作：第一项便是在语言学、文学、宗教、艺术和史学等诸多领域从事汉语教学，邀请中、法优秀学者举办汉学讲座。第二项是出版汉学著作。起初汉学研究所经常资助中国留法生出版博士论文，后由于经费缺乏而中止资助。在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资助下，汉学研究所自1932年开始出版《汉学研究所文库》，该文库的首部著作是沙畹（Edouard Chavannes）的《汉文三藏经中的500个故事和寓言》，此后又相继出版了戴密微、石泰安等人的汉学研究著作。第三项是收集图书，设立图书馆。汉学研究所图书馆的首批图书大概是由伯希和于1926年后在北京采购的，此后，该馆陆续购藏了一些汉学典籍。另外，北京汉学研究中心一批图书后来也转入汉学研究所图书馆。该中心筹建于1919年，创始人是伯希和，计划成立后以庚子赔款作为经费来源，1941年末，法国外交部在北京设立了法国汉学研究中心。

国立科学研究中心成立于1939年，隶属于国家教育部，共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两大类，人文科学方面又分为13个部门，其中有一个部门从事“东方的语言和文明”领域的研究。该中心向各部门的研究者提供科研经费和出版津贴，许多汉学研究著作正是由于获得了中心资助才得以顺利出版。

在法国高等研究实验学院，从事汉学研究的主要是两个系，即第四系（史学和英文系）和第五系（宗教科学研究系）。第四系与学院同时诞生（1868年），19世纪末开始开设佛教汉语启蒙

课，20世纪初该系讲师施佩希特开始介绍佛经的汉译本以及马瑞林著作中有关西域的内容。1926年，普祖鲁斯基开始讲授佛教语言文献学。此后，戴密微等人也开设了一些课程。第五系成立于1886年，后多位汉学家在此承担课程。

成立于1822年的巴黎亚细亚学会是一家私立机构。1935—1945年间担任会长的是著名汉学家伯希和。该学会每月举行一次会议，由会员做学术报告。此外，还主办《亚细亚学报》，该杂志堪称法国汉学界的喉舌。该学会拥有自己的图书馆，中西文藏书不少于八千册。

在巴黎以外，里昂大学自1900年便开设了汉学讲座，1935年以前讲座一直由古兰（Maurice Courant）主持，1935年后由乔治·迪巴比埃（Georges Dubabier）主持。

在法国本土之外的越南河内，还设有法兰西远东学院，并主办过《法兰西远东学院丛刊》和《考古论丛》等。该学院邻近中国，其成员常受命赴中国考察。由于诸多便利条件，所以该学院培养出了20世纪上半叶几乎整整一代法国汉学家。^①学院起初归印度支那总督政府领导，1957年学院的领导机构迁至巴黎，而学院图书馆则留给了越南政府。

2. 法国著名汉学家及其汉学研究

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杰出的汉学家是沙畹（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年）。他毕业于巴黎师范学院，1889年24岁时来到北京，开始翻译《史记》，在北京逗留了三年。他回国后于1895年至1905年出版了译稿的三分之一（47篇），共分为五卷。他在28岁时（1893年）被选人法兰西学院，这是西方汉学史的一件大事。他的研究范围很广，涉及考古、碑文、图画、艺术、宗教、唐朝与中亚的交往及唐人赴印取经等许多领域。他

^① 戴仁主编：《法国当代中国学》，第43页。

的一部关于佛教的著作是《中国三藏中节选之百种神话故事和寓言》，全书共3卷，于1900至1911年出版，1962年再版。沙畹是第一位用欧洲的考证方法来研究中国文献的学者。他和许多老一代汉学家一样，作风严谨，思想开放，为法国培养了一大批出色的汉学家，20世纪上半期法国最出色的三位汉学家都是他的学生，这三位汉学家是葛兰言（Marcel Granet）、马伯乐（Henri Maspero）和伯希和（Paul Pelliot）。

葛兰言属于杜尔克姆（Emile Durkheim）和莫斯（Marcel Maus）所创的社会学派。他致力于中国古代神话、社会和思想研究，对中国古代神话、歌谣和风俗的研究多以近代社会学为理论依据，1919年出版了《中国古代的歌谣与节日》。1940年去世。

马伯乐是法国优秀的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兄弟都是汉学家。他曾是法远东学院（设于河内）的研究人员，后在法兰西学院中主持“中国语言和文字”讲座。1945年惨死在德国集中营。

伯希和是法国著名的汉学家，在文献学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他于1909年来华，搜得敦煌秘籍，并购数万卷汉文图书带回法国。他曾对唐杜环的《经行记》的部分内容做过翻译和研究，1945年去世。

沙畹最年轻的弟子是戴密微（Paul Demieville，1894—1979年）。戴密微原籍瑞士，后定居法国。1921年至1924年在河内的法远东学院做研究工作，此间，他曾赴中国执行任务，历时八个月。1924年至1928年在新建的厦门大学任教授。此后，他又赴日本，在东京“日佛会馆”从事了四年的研究工作。在日本期间，他受命编纂了一部有关日本和中国佛教的百科词典，名为《法宝义林》，1929年至1931年先后出版了三卷，从此，他成为世界上最出色的中国佛教问题专家。他精通佛学理论和历史，熟知中国的佛教文献，在研究中常将佛教文献的中译本和印度原本、藏文译本进行对比考证。他在东亚工作了10年之后回到巴

黎，入选为法国国立东方语言学院的第三任讲座主持人。^①

研究佛学只是工作的需要，实际上他更喜爱中国哲学和文学，尤其是诗歌。以致于后来在佛学及哲学两大领域的研究均取得重大进展。1945年入选高等实验学院，讲授佛教文献学。他进入法兰西学院后主持“中国语言和文字”讲座。他不仅精通欧洲的各种语言（包括俄文），而且中文、日文的水平也很高，对越南文、梵文和藏文也很熟悉。他的研究领域十分宽泛，成果丰硕。

他对《庄子》一书做过多年研究。他认为《庄子》从汉末到三国渐受重视的原因，首先是战国时代的哲学再度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其次是三国时清谈和玄学盛行。他在参考古人注释和近人研究成果基础上，对《庄子》“逍遥游”、“齐物论”和“秋水”等篇做了详尽的阐释。

他对中国古代的哲学概念及演变也做了探讨。对于“理”，他探讨了战国、4世纪（佛教传入）和宋元三个时期“理”的含义和演变。对于“分”，他研究了这一名词的最早出现，以及韩非、吕不韦、王弼、郭象思想中所包含的有关内容。此外，他还探讨了印度佛教和中国哲学中“顿”和“渐”的概念。

他还对清代思想家颜元、戴震和章学诚等人进行了研究，填补了法国汉学界有关研究的空白。

戴密微在法兰西学院任职期间并未放弃中国佛教研究。他考察了武则天时期的佛教和当时编制的伪经，还对唐代高僧临济的《临济语录》做了研究，并出版了法文译注。他还研究了禅宗对诗的影响，晚年讲座的主要内容便是笃信佛教的谢灵运的生平及其诗作。

他还对敦煌的首批民间文献和变文作过材料搜集和研究，他

^① 见谢和耐：《一战以来法兰西学院的中国学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95年第3期。

在法兰西学院期间的一部分著作就是以敦煌卷子做材料的，如《吐蕃僧诤记》是一部关于中国和印度佛教徒间争论的著作，《王梵志诗集》是一部根据敦煌卷子辑成的诗集。戴密微擅长中国古典诗词的翻译研究，1965年译成《毛泽东诗十首》，在欧洲反响良好。

戴密微1964年退休，1979年去世，他是当代法国汉学研究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他的学生既有法国人，也有外国人，有的成为文学史、思想史和中国佛教史专家。

葛兰言、马伯乐、伯希和与戴密微都是沙畹的弟子，而石泰安（Rolf Stein）和谢和耐则是沙畹的再传弟子。

石泰安是犹太人，1911年出生于德国，年轻时因受纳粹迫害而被迫离德，后拜葛兰言为师，成为汉学家。1940年至1946年在法国远东研究学院（设于河内）工作，后被院长赶走（因为是犹太人），转赴中国。1949年，他又离开中国。

石泰安是西藏和越南问题专家，同时兼通蒙文和日文。他对宗教问题有独到研究，采用对比的方法研究过汉藏的神话和礼俗，从而取得了可喜成就，他的代表作之一是《微观世界：远东宗教思想中的花园和住所》。他从1966年开始在法兰西学院任教，1981年退休，前后16年，其间所主持的讲座题为“中国的社会研究：制度和观念”。

谢和耐（Jacques）1921年生于法国殖民地的阿尔及尔，1942年参加抗德战争，1945年至1947年在法国巴黎东方语言学院学汉语。1948年至1950年在河内远东研究学院学习，其间曾因公务前往中国云南昆明（时间不长）。回法后于1951年至1955年在法全国科研中心工作，1955年后任高等实验学院研究导师，1957年至1969年间兼任巴黎大学文学院教授，1969年至1973年又任巴黎第七大学教授。1975年至1992年在法兰西学院工作，主持“中国社会和文化史”讲座。曾与人共同主编国际汉学杂志《通报》。

谢和耐受其师戴密微影响较大，对中国佛教进行了研究，著有《中国五—十世纪的寺院经济》一书（1956年出版）。他对晚明历史较感兴趣，入法兰西学院后致力于明末清初的社会史和经济史的研究，已出版著作八部，发表论文八十余篇，大部分在50年代以后出版。^①

法国一度是欧美汉学研究中心（后这一地位被日、美取代），在国际汉学研究中处于领先地位，其主要表现有三：一是法国汉学起步较早，在17世纪80年代，路易十四的朝臣便向中国派遣了六位懂数学的神父，其中五位到了北京。他们虽不是汉学家，却为后来世俗汉学家的培养奠定了基础。二是出现了大批汉学家，如马伯乐、伯希和、葛兰言和戴密微等人，在欧美都非常有名。三是资料和研究成果较多，如敦煌的逸书散于巴黎等地。沙畹对古简的研究成果便利了罗振玉、王国维等人的研究，因为有的资料在巴黎比中国反而更丰富，巴黎国家图书馆的汉籍在全欧最多。^②

四、法国教会教育在中国

1. 法国在华教会学校的中小学教育

基督教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主要盛行于欧美。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是基督教世界，基督教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资本主义具有较强的扩张性，传教、通商和建立殖民地是其扩张性的重要表现。这三者即彼此独立又互相关联。明清之际耶稣会士纷纷来华，他们带来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同时

^① [法] 谢和耐著，耿昇译：《中国社会史》，第684—691页，谢和耐著作目录及“译后论”，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② 梁容若著：《中日文化交流史论》，第76—77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在华传教也略有进展。英国向中国提出了通商要求，但遭到乾隆帝的拒绝。为达到目的，英国殖民者于1840年悍然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英国等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相威胁，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不仅实现了对华通商梦想，而且也使远东的传教事业获得重大进展。在鸦片战争后来华的传教士中，既有潜心于传教的虔诚使者，也有披着教士外衣的殖民侵略的帮凶。随着西方列强一次又一次的对华侵略战争（以及强迫清朝签订不平等条约），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

1840年以后，外国在华的教会教育呈曲折发展趋势，直到20世纪初仍是如此。那么，为什么教会学校会在中国兴起甚至不断发展呢？1923年12月《前锋》第二期发表了《教会教育盛行的原因》一文，该文列举了四点原因：第一，西方“藉教育为传教的一种手段……使中国成为一个基督教化之国”。而中国人自1900年以来也产生了媚外和苟安的心理。第二，西方需培养华人办事员和买办，教会学校毕业生谋职较易，所以不乏生源。第三，主要是“中国人自办的学校既有供不应求之势，当然仍以教会学校为归宿”。第四，中国政界及教育界抵制不力。该文刊于1923年，主要指民国初年的情况，所作分析还是很有启发性的。

基督教有天主教、基督教和东正教之分。天主教主要分布于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教中的多明我会、耶稣会等组织都曾来华传教并设立分会。基督教即新教（中国常将新教称为基督教）是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中脱离天主教而产生的新教派，主要分为长老会、公理会等宗派，分布于英、美、德等国家。东正教分布于希腊、俄罗斯、东欧等国家。^① 在华传教并广办教会学校者主要是天主教和基督教，总体倾向为，基督教侧重于办大学，天主教侧重于办小学和神学。

^① 参见：《辞海·哲学分册》，第312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版。

从1900年到抗战前夕,中国的教会学校呈不断发展趋势。20世纪前14年发展最快,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稍稍减慢,1919年后又获得较快发展,从1922年后发展速度再度减慢,1932年至1937年间才得以逐渐发展。这是基督教新旧两派总体的发展脉络。^①单以法国等国天主教在华所办学校来看,1912年度,小学性质的学校6877所,学生12.6305万名(男生77771名,女生48534名)。1914年共有学校8034所,学生13.285万名。1926年,天主教所办学校共有9000余所,其中大学3所,中学200余所(其余为小学及神学),学生50余万人。1937年,教会学校学生总数大概有100余万人,其中大学生约8000余人,中学生约9万余人,其余为小学生及神学院校学生,这里天主教学校学生所占比重为:小学四分之三,中学十分之四,大学十分之一。^②抗战期间沦陷区的教会小学有的停办或内迁,但也有部分小学未动,在当地较受欢迎(因家长不愿送孩子上日伪学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基督教小学全部停办,学生纷纷转到天主教学校学习。^③1948年,全国天主教小学共776所,中学154所,小学生近15万人,中学生7万人。^④上述天主教在华学校及学生数主要指小学和中学,大学较少。

从地区来说,以法国为主的天主教教会学校分布较广,而且中小学在上海、天津等地还比较集中。如天津设有圣路易学校、圣约瑟学校、法汉学校等,此外还有95所男公学、30所女公学。^⑤上海天主教中、小学或为法国教士所办,或“常带法国形式”,其中中学有徐家汇公学、启明女学校和圣方济学校,小学

①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36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② 同①,第337页。

③ 高时良主编:《中国教会学校史》,第61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④ 据《全国公教中小学学校统计表》统计,见李楚材:《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第23页,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⑤ 高时良:《中国教会学校史》,第31页。

包括圣约瑟学校、六童学校、新闻学校、土山湾孤儿院、圣鲁意学校、黄家度学校、圣心学校、启明弃儿院、圣家学校、扬子浦学校、嘉兴路学校等。^①

法国传教士所办中学以上海徐汇公学最有名。徐汇公（中）学设立于1850年，在此前一年夏天，江南发生水灾，上海徐家汇天主教教堂意大利耶稣会士晁德莅（Angelo zottoli）司铎，设法收容难童，“并施以教育”。至1850年扩充规模，正式建校，定名徐汇公学。1853年，“耶稣会总长之文凭颁到，得与罗马总会通功而正式成立”。也就是在1853年得到了耶稣会与罗马教廷的批准。起初，该校由晁德莅司铎任院长，后改法藉神甫担任。至1904年将高年级小学生编入下院，中学程度学生编入上院（教内生），教外学生编入中院。1912年至1913年依教育部所颁学制改为高小三年，中学四年。1932年又将中学四年制改为三三制。1934年添设备修院（又叫拉丁院），以高中部选修拉丁文的学生移入该院，毕业后进入修道院。1940年小学部与徐汇师范附小合并，下院从此取消。^②

徐汇中学的课程设置前后有所变化。在19世纪后半叶，国文占有很大比重，新生入学先习国文，到一定程度后兼学法文、图画、音乐等科目。1900年以后“乃一改从前以国文为主之课程，规定法文及其他科目为必修课”。1904年，外语改为法、英文任选其一，对水平较高的学生用法文教授算学、物理和史地等科目。1941年增加日、德文课。

徐汇中学管理较严，“每星期内学生出校散步三次，以换空气”。学生来往信件，“校长得检查之”。^③ 主管该校的个别教士

① 李楚材：《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第20—21页。

② 《徐汇中学校史》，《徐汇中学校刊》1945年，载李楚材：《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第201—202页。

③ 《徐汇公学章程》，载李楚材：《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第93—96页。

“滥用笞刑，滥用之于学生……待学生甚酷，稍不当意，辄拳足交施”。甚至命仆人按腿，执板挥鞭对学生用刑，打得学生鲜血直流。^① 这虽为 1910 年前后的事情，但法国教士管理之严酷可见一斑。抗战胜利后学校改为由美国神甫主持，法文课改为英文课。徐汇中学学生毕业后多为神职人员、巡捕、翻译等，或升人震旦大学（早年也参加科举考试）。

以法国为主的天主教教会小学比较重视宗教课教育，外语则教法语，此外还教授国文及其他学科知识。教学方法以讲授为主，但也注重启发式教学和实验。教会小学校长初由外国人担任，教育部要求私立小学立案（登记得承认）后改由中国人任校长，但校务仍控制于教会手中。^②

2. 法国在华教会学校的高等教育

法国等天主教在华教会学校数目虽然很多，但绝大多数为中小学，大学在全国仅有三所，^③ 分别为上海震旦大学、天津工商大学和北京辅仁大学，其中与法国传教士有关者为前两所。

震旦大学成立的促成者为梁启超和蔡元培，创立者为马相伯。马相伯为江苏丹徒人，天主教徒，曾任徐汇公学校长，后奉调游历英、法、意、美等国。他创立震旦大学的动机是发展中国的高等教育，使之与欧美大学并驾齐驱。1903 年，时机终于成熟，在与耶稣会协商之后于上海徐家汇老天文台创立了震旦学院，后改名震旦大学。1904 年，耶稣会司铎南从周（Perrin）任震旦教务长。他乘马相伯病重期间尽改旧章，遭到学生强烈抵制。马相伯为避免冲突，“辞职而去”，学生们也都集体离校，震

① 浮邱：《徐汇公学之笞刑》，《教育杂志》第 2 卷第 1 期，1910 年 1 月。

② 高时良主编：《中国教会学校史》第 62、66 页。

③ 除大学外，天主教还在中国设立了一些高、中等师范学校，1920 至 1921 年间全国共 16 所。见高时良主编：《中国教会学校史》第 102 页。

旦暂时停办。不久，马相伯与离校学生在吴淞另组复旦公学，这就是复旦大学前身。^①

震旦停办之后，学者们都觉得可惜，纷纷请求复校。于是震旦在1905年重新开课，校长为李问渔司铎，1908年学校从徐家汇迁到法租界卢家湾。李问渔之后，南从周继任校长，南从周之后多以法侖神甫为校长，震旦完全控制于法国等天主教传教士手中。1917年，震旦学院改为震旦大学院，1930年改称震旦大学。

震旦最初学制为两年或三年（三年中一年为预科，两年为本科）。李问渔任校长后改为四年；预科两年，第一年用中文讲授，第二年用法文讲授；第三、第四年为本科，开设法文、英文、中外史地、哲学、经济学、算学和博物学等课程。其后又改为预、本科各三年，学制共为六年。1914年本科又分为三个专科，即法政文学科（学制三年）、算术工学科（学制三年）、医学科（学制四年）。1932年经教育部核准立案后共设法、文、理工、医四个学院，其中法学院设法律、经济二系，理工学院设化学、生物、物理数学、土木工程、电机工程和化学工程六系，文学院设中国文学、英国文学、法国文学、教育、家政、社会六系，医学院不分系，附设牙医专修科。^②其中医学院和法学院名气较大。

震旦大学为法国耶稣会士所办大学，所以校中宗教色彩浓厚，教内学生与教外学生分开，对于教内学生在早课、晚课和星期日要督促他们参加弥撒活动，对于教外学生则设法劝其入教。震旦大学十分重视法语，许多科目都用法语讲授。考试也实行法国模式，而且十分严格。虽然法国教士对学校实行严密控制，但震旦的爱国学生也曾在五四运动期间参加罢课斗争，以声援北京学生的正义斗争。

天津工商大学是北方的一所天主教会大学。该校的酝酿始于

^① 《震旦大学创立概略》，《圣教杂志》1928年第17卷12号。

^② 高时良主编：《中国教会学校史》，第203页。

1913年。当年罗马教廷及天主教在华神甫商议在河北河间县建立一所工商大学，具体校址选于县城西门附近。在即将破土动工之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学校筹建被迫中断。到了1920年，该校筹建又一次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罗马教廷责成华北教区总堂——河北献县耶稣会负责此事。在华耶稣会认为河间作为校址远不如天津理想。最后经罗马教廷批准，学校改建于天津，由溥泽神甫负责在马场道清鸣台一带起建校舍。1921年部分楼舍建成并开始招生，第一任校长为溥泽，先设两年学制的预科，后又设四年学制的工商本科。1930年停办预科，改为附属高中和初中。1933年经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立案，改名天津工商学院，学制四年，分为土木工程、建筑工程、会计财政、国际贸易等系。1943年增加文学院，开设中国文学、外国语文、史地、家政等系。1946年又在工科中添设机械系，在商科中添设工商管理系，总计10个系。另外，该校还建有北疆博物馆，收集动、植和矿物标本储存，供教学和科研使用。1948年学校改名津沽大学，1951年与天津私立达仁商学院和天津市土木工程学校合并。

天津工商学院初由天主教神甫负责，在教育部立案后改由中国人任校长，但并未脱离教会控制。全国解放后改为公立大学，该校与天主教脱离关系。天津工商大学规模并不很大，但对学生要求较严，也曾为北方培养了一批工商业人才。^①

通观以法国为主的天主教教会学校的情况，以下几点值得重视：

从数量来看，以法国为主的天主教教会学校（包括中小学和大学等）总体数额较大，1914年，天主教在华的教会学校为

^① 王喜辰编：《河北大学校史稿》上编，1985年，参见高时良主编：《中国教会学校史》，第213—215页。

8034所，基督教为4100所，前者为后者的两倍^①。天主教教会大学数目虽少，但也可打破美国对中国教会大学的一统天下局面。

从比例来看，天主教教会学校不仅在全国学校中占有很大比重，而且在全国学校（包括非教会学校）中也占一定份额。1914年，全国国立学校57267所，天主教教会学校约占公立学校总数的七分之一。另外，教会学校聘有部分外籍教师，而且相当重视法语、英语等外语，这些都是不同于国立学校的特征。特别是重外语这一点，为学生出国留学奠定了基础，如徐悲鸿曾考取震旦大学，傅雷一度就读于徐汇公学，二人后来都留学法国。

从教学上看，天主教教会学校开设新学科，实行启发式教学，广招女学生，这些举措不仅对中国传统的科举教育是一种冲击，而且对民国时期新式学校的办学也有借鉴意义。如徐汇中学“能独得风气之先，举凡辣（拉）丁、英、法各文，与夫声、光、化、电诸学，时人所未及窥见者，已莫不一一讲授，作新学上之宣传提倡”。^②也就是说该校率先开设了西方新学科。天主教教会不仅设有女学，而且普通学校中女学生也占有相当比重，如1947年震旦大学中男生721人，女生520人，女生约占41.9%。^③教会学校大兴女子教育，这在中国有率先垂范之功，不仅为我国学生男女同校奠定了基础，也有利于实现男女平等。

从结果来看，天主教教会学校（和基督教教会学校一样）为新中国的大、中、小学校的建设奠定了基础。20世纪2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发起了收回教育权运动，该项运动有三项收获：第一，各主要宗教学校先后登记立案；第二，教会学校的宗教课

① 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第37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② 研治室主：《徐汇中学之真精神》，见李楚材：《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第198—200页。

③ 见南京民国政府教育部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五编第2章，“公私立大学概况”，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

程、宗教活动受到很大限制；第三，各校校长改由中国人担任。但是这次活动并未彻底收回教育主权，各类教会学校实权仍控制在外国传教士手中。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接收了教会学校，1952年调整全国高等院校，教会大学有关院系合并到其他院校，其中包括震旦大学和天津工商学院，原来的教会大学校名从此取消（天津工商大学于1948年改名津沽大学，1952年改为河北大学，迁到保定）。对于中小学，1953年后各省市县将私立中小学和教会中小学一并接收，并将教会学控改名或与它校合并，砍断了学校与天主教之间的联系。

宗教的传布不失为文化交流的一种有效方式，而教会学校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无疑更为直接和全面。法国等西方在华教会学校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不无积极影响。主要表现为：其一，教会学校教育在中国教育发展中占有一定地位。中国的新式教育是传教士首创的。民国时期国内官、私立大学虽然得到了一定发展，但教会学校仍占有一席之地。1914年，中国教会学校数目为官立学校的五分之一强。1918年，全国教会大学为14所，而当时国立、私立大学总计8所。教会学校对中国新式学校不无推动之功，民国初年中国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余日章称：“中国新式教育，学校之创立，精神形式，悉有基督教会，梯山航海，转运面东，基督教对于中国教育之一途，为今日新教育规矧，早为国民公认。”^①此外，教会学校在教法、课程设置方面也作了开创性的工作。其二，教会学校为中国国民文化知识的提高和人才培养做了有益的工作。教会学校的经费一部分源于国外捐助，从而增加了中国教育经费的来源。教会中、小学的兴办增加了中国受教育的人数，教会大学的兴办则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新式人才。仅以天主教所办的辅仁大学为例，从1931

^① 余日章：《基督教教育之高等教育之特色》，载《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14年第1期。

年至1946年国文系毕业生共为327人，历史系为268人。其三，教会学校大多开设自然科学课程，把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带到中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其四，教会大学为中国的国学研究做出了贡献。教会大学吸纳了一大批国学大师，创办了学报等杂志，资助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学术研究著作。教会大学不失为当时国学研究的重要阵地之一。其五，教会大学里中西学者荟萃，他们受过较好的教育，长期相处，互相沟通，这样教会大学便在传统文化、思想观念和风俗习惯等方面为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特定的舞台。这一舞台与中国社会变迁息息相关，中国社会的政治形势又促进了教会大学向非宗教化的改革，从而使后者的教育色彩加重。

但是应该看到，法国等教会学校开办的宗旨是为传教和西方资本主义利益服务的，其发展的后盾和保护伞是炮舰和不平等条约，其教育主权控制在外国人手中，其校园特征充满宗教色彩，这些方面不仅有损中国主权和民族尊严，而且背离当代教育科学的发展趋势。所以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及时收回了教育主权，将教会学校改造成人民自己的学校。

第六章 中德文化交流

一、德国哲学在中国的传播

1. 康德哲学在中国

德意志民族是一个善于思辨的民族，历史上曾产生了一大批如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那样的伟大哲学家和思想巨人。他们辉煌的思想成就及其影响，远远超出国界，也远远超出他们的时代，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永恒的精神财富。

从本世纪最初几年起，中国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关注德国哲学，从康德到黑格尔，从费尔巴哈到马克思、恩格斯，从叔本华到尼采，都成为人们研究介绍的对象。其中，康德哲学更是许多有影响的思想家、学者关注的热点。

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年）是德国古典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他的学术成就涉及科学、哲学和艺术等诸多领域，著有《自然通史与天体论》、《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等一系列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著作。在自然科学上，他曾提出关于地球自转速度因潮湿摩擦而延缓和关于太阳系起源于原始星云的两个假说，对后来理论自然科学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对主张宇宙是一成不变的形而上学是一个沉重打击。在哲学上，他主张“自在之物”（即本体）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它是感觉的源泉，但又不能被认识；他区别了知性和理性、现象和本体，批判了自然论，导致德国哲学界和思想界的

一次革命。在美学上，他提出了不以利害关系判断美、美的普遍性和美的必然性等观点，成为后来纯艺术观点的理论依据。

对这样一位影响巨大而深远的古典哲学家，中国新知识界的人们是热中于介绍研究的。以介绍研究的规模、深度及影响论，这种工作大体可划分为五四前的20年和五四后的30年两个时期。^①第一个时期的传播者主要是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严复等一批资产阶级的政治人物。传播的内容局限于康德学说的片断介绍。譬如康有为在他的著作《诸天讲》（写于1886年）中，便介绍了康德的星云说：

“德之韩图（即康德——引者注）、法之立拉士（即拉普拉斯——引者注）发星云之说，谓各天体创成以前，是朦胧之瓦斯体，浮游于宇宙之间，其分子互相引集，是谓星云，实则瓦斯之一大块。”^②

这是康德星云说首次介绍到中国。同时，康有为还援引了康德的不可知论。

康有为之后，严复、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等人也都先后从各自的角度、以不同的态度或间接或直接地介绍了康德学说。其中，有热情的传播，如严、梁；也有尖锐的批评，如章、王。严复在其所译《天演论》中曾提到康德并大量发挥了康德的不可知论观点，他说：“人之知识，止于意验相符，如是所为，已足生事，更骛高远，真无当也。”^③这样的观点在其为《天演论》所写按语中多处可见，其后在《穆勒名学》中更加以发挥补充。与严复相比，梁启超对康德学说的介绍鼓吹更直接更系统。他在戊戌变法后遁居日本初期，以极大的政治热情撰写了大量宣传西

① 参阅贺麟：《康德黑格尔哲学东渐记》，《中国哲学》第二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

② 康有为：《诸天讲·地篇第二》，第14页，中华书局1990年版。

③ 《天演论》卷下论九真幻按语，见王拭主编：《严复集》第五册，第1378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学的文章，其中《西儒学案》就介绍了包括康德在内的一大批西方哲学家的生平和思想。1903年，他又写成一篇专门介绍康德学说的长文《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在《新民丛报》上分多期连载。这是中国第一篇系统介绍康德生平及思想的文章。文中，梁启超评价康德哲学“以良知说本性，以义务说伦理，然后砥柱狂澜，使万众知所趋向”。他高度评价康德为“百世之师”、“黑暗时代之救世主”；评价康德“非德国人，而世界之人也；非十八世纪之人，而百世之人也”。这些看法大体上是站得住脚的。但梁用康德哲学比附佛学，认为其“大近佛学”；^① 又用王阳明的心学和康德学说做对比，认为双方“桴鼓相应，若合符节”，这就难免有牵强附会之嫌了。难怪治学一贯严谨的王国维讽刺他“虽时有学术上之议论，不但剽窃灭裂而已。如新民丛报中之汗德（即康德）学说，其纰谬十且八九也”。^②

和梁启超相比，王国维在西方哲学上的造诣显然更深厚。他曾在日本专门钻研西洋哲学，对康德著作亦颇致力。但他对康德学说的态度显然和梁不同。偏爱叔本华哲学的王国维明显带有贬康（德）扬叔（本华）的学术倾向，他曾说：

“汗德（即康德——引者注）之学说仅破坏的，而非建设的，彼憬然于形而上学之不可能，而欲以知识论易形而上学，故其说公可谓之哲学之批评，未可谓之真正之哲学也。叔氏始由汗德之知识论出而建设形而上学，复与美学、伦理学以完全之系统。然视叔氏为汗德之后继者，宁视汗德为叔氏之前驱者为妥也。”^③

其实，王国维的思想尤其是其美学观是深受康德学说影响的。

^① 梁启超：《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第49—51页，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版。

^② 《静庵文集》，第113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③ 同^②，第51页。

如果说王国维对康德学说稍有贬抑，那么章太炎的态度则是批判了。他在1906年发表的《无神论》、《建立宗教论》等文章中，批判了康德的不可知论，他说：“夫有神之说，其无根据如此，而精如康德犹曰：‘神之有无，超越认识范围之外，故不得执神为有，亦不得拨神为无。’可谓千虑一失矣。”^①他还批评了康德的时空说，对星云说虽有过介绍，但亦未接受。

总起来讲，五四前的20年对康德哲学的介绍工作是粗疏浅薄的，一鳞半爪，牵强附会，有较大的局限性。但这些工作，无论是热情的传播介绍，还是尖锐的批评贬低，客观上都把康德学说引进到中国，为下一阶段的传播工作打下了必要的基础。

和五四前相比，五四后30年的传播，无论广度还是深度都要令人满意得多。

第一，此阶段涌现出一大批研究论述康德的文章，尤其是20年代两期康德专刊的出现，形成了当时中国鼓吹康德哲学的高潮。1922年，德国哲学家杜里舒（H. Driesch）来华讲学。1923年，他在北京做了一次题为《康德以前之认识论及康德之学术》的演讲，对康德哲学做了重点阐述。这篇演讲稿发表在《文哲学报》第3期和第4期上，对康德研究热的出现起了发端作用。翌年，《学艺杂志》6卷5期便刊出了康德专号，收录了15篇论述康德学说的文章，如张铭鼎的《康德学说的渊源与影响》，范寿康的《康德知识哲学概说》，罗鸿诏的《康德伦理说略评》等。1925年，《民铎杂志》6卷4期借康德诞生200周年之际也出版了一期《康德号》，收录了胡嘉的《康德传》、吴致觉的《康德哲学的批评》，杨人楩的《康德理性批评梗概》，张铭鼎的《康德批判哲学的形式说》，以及《康德年谱》、《康德之著述及关于康德研究之参考书》等共15篇译著文章。这两期专刊的文章虽不很

^① 章太炎：《无神论》，见朱维铮、姜文华编注：《章太炎选集》，第34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深入，但毕竟形成康德研究的浓厚氛围，引起一些学人的关注，对传播康德学说有所裨益。

第二，在此期康德学说的传播工作中，一批留德（欧美）学习西方哲学的学者无疑是中坚力量。他们包括蔡元培、瞿菊农、洪谦、贺麟、郑昕等。

在这批学者中，蔡元培是较早留德的。他曾于1907年至1911年在德留学，其间有三年时间在莱比锡大学学习哲学、心理学、文学和艺术史，对康德哲学尤其是康德美学兴趣浓厚，用力颇勤。他自己曾回忆这段生活说：

“我于讲堂上既常听美学、美术史、文学史的讲演，于环境上又常受音乐、美术的熏习，不知不觉的渐集中心力于美学方面。尤因冯德讲哲学史时，提出康德关于美学的见解，最注重于美的超越性与普遍性，就康德原书，详细研读，益见美学关系的重要。”^①

在留德归国后的岁月里，蔡元培多次介绍了康德的哲学和美学思想。在1919年写的《哲学与科学》一文中，他介绍说：“康德作《纯粹理性批判》，别人之认识为先天后天二类：先天者，出于固有，后天者，本于经验；前者为感觉，而后者为分析法；前者构成玄学（即哲学），而后者构成科学。于是哲学与科学，始有画然之界限。”^② 1921年，他在湖南做了题为《美学的进化》的讲演，介绍“康德的哲学，是批评论。他著《纯粹理性批评》，评定人类知识的性质。又著《实践理性批评》评定人类意志的性质。前的说现象界的必然性，后的说本体界的自由性。这两种性质怎么能调和呢？依康德见解，人类的感性是有普遍的自由性，有结合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的作用。由快不快的感情起美不美的

^① 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验》，《蔡元培选集》，下卷，第1394页，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② 同①，第58页。

判断，所以他又著《判断力批评》一书”。^①娓娓道来，如数家珍，看得出，蔡元培对康德学说是欣然加以接受的。

瞿菊农曾留学于美国哈佛大学，受教于美国新黑格尔主义者霍金（Hocking）教授。他在我国二三十年代介绍康德和黑格尔哲学的工作中，起了一定的组织宣传作用。他自己在1928年的《哲学评论》2卷2期上发表的《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导》一文，阐述了康德哲学的中心问题，研究颇见功力。

久负盛名的西方哲学史专家贺麟曾先后在美、德专研西方哲学。据他自述，在美留学时代（1926—1931年），他由于要研究黑格尔哲学而不能不关注和研究康德。他认为康德哲学是通向黑格尔哲学的源泉，要理解黑格尔哲学，非先从康德哲学出发不可。1936年，他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康德名词的解释和学说的重点》一文，深入阐述了康德哲学名词的中文翻译问题。此外，他的《时空与超时空》一文，论述了康德的时空观，称赞它是“康德的先天直观学之不朽的伟大发现”。^②

洪谦1927年赴德，求学于柏林、耶拿大学，主修哲学、数学及物理学，后在奥地利从师于维也纳学派创始人M·石里克（Moritz Schlick）教授多年，成为该学派在中国的著名代表。1947年，他写了《康德的先天论与现代科学》一文，以维也纳学派的观点批判了康德的时空观、因果律和物自体的学说，得出结论说：“康德的先天论与现代科学，无论从理论原则和思想方法上而言，都是根本不相容的。”^③

和上述学者相比，郑昕对康德学说的研究更全而更深入。他是中国第一个赴德国专研康德的学者，他花费大量心血撰著的

① 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验》，《蔡元培选集》，下卷，第246页，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② 贺麟：《康德黑格尔哲学东渐记》，《中国哲学》第二辑。

③ 1947年《学原杂志》1卷6期。

《康德学述》一书 1946 年由商务印书馆印行，^① 是民国时期惟一一部专论康德哲学的著作，对康德哲学研究有独到见解，显示了他精研康德学说的深厚功力。

这批留德（欧美）学者的工作为中国的康德研究、为康德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杰出贡献。

第三，涌现了一批康德原著的翻译本。外来学说在域内流传，原原本本的原著翻译是必不可少的。在著书撰文介绍康德学说的同时，一些学者陆续翻译了一些康德原著。1935 年，胡仁源译的《纯粹理性批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36 年，张铭鼎译的《实践理性批判》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39 年，唐钺译的《道德形而上学探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外，蓝公武于 1935 年亦译出《纯粹理性之批判》，可惜当时没有问世，直到 1957 年此书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第四，康德学说在此阶段进入中国大学讲坛，为更多的青年学子所熟悉和掌握。1923 年，先后在美、英、德三国留学西方哲学达十年之久的张颐回到国内，主持北京大学哲学系，并讲授康德黑格尔哲学。从此，西方古典哲学开始进入中国大学讲坛。此后，郑昕、贺麟、蓝公武、周辅成等人也都在大学哲学系讲述包括康德学说在内的西方哲学，培养了一批研究康德及西方古典哲学的学者。

应该说，康德学说在五四后 30 年中的传播工作是卓有成绩的。一批学者边研究边翻译边介绍，把康德研究推到一个新的高度。其缺陷在于，这些研究传播大都以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观为基础，或以康德释康德，或新康德主义，或维也纳学派观点，等等。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康德，尚没有开展。此外，康德原著的翻译工作显得较为薄弱，只有很少的译本出现，大批译本问世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事情了。

^① 该书 1984 年由商务印书馆重版发行。

以上是康德学说在中国传播的大致情况。看的出来，尽管康德学说传入中国较晚，但输入中国后的介绍研究工作的进展却不算太慢，成果亦是显著的。原因就在于，作为欧洲启蒙盛期的哲学，康德学说所蕴涵的人类认识的批判精神，其意志自由和实践理论，为中国正在兴起和发展的民主科学精神提供了一种理论武器；他把宗教、信仰等清除出知识的地盘的方法，为近现代中国人认识批判传统哲学的特征及缺陷，提供了方法论的依据。

2. 黑格尔哲学的传播^①

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年）是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最重要的代表，是自康德以来最著名的古典哲学家，著有《精神现象学》、《逻辑学》、《哲学全书》（含《小逻辑》、《自然哲学》、《精神哲学》）、《法哲学原理》、《哲学史讲演录》）等大批著作。他主张思维与存在同一，二者同一于绝对理念，绝对理念是独立的主体、万物的根源，世界的发展过程即是绝对理念展开的过程。由此出发，黑格尔建立了他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其中包括逻辑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三个有机组成部分。他的哲学的精华主要包含在他的逻辑学中。他以唯心主义的形式阐述了质量互变、对立统一、否定之否定等一系列辩证规律，在人类认识史上第一次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和形式，并成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来源之一。

黑格尔哲学在人类文化史上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可以说“黑格尔到哪个国家早，就对哪个国家早有帮助，哪个国家的文化就会早兴盛”。然而，黑格尔哲学传入中国，为时甚晚。据贺麟先生统计，在20世纪30年代前，讲述黑格尔的文章大概只有三篇。一篇是马君武1903年发表在《新民丛报》第28期上的《唯心派巨子黑智儿学说》，一篇是严复写于1906年、发表于

^① 参阅贺麟：《康德、黑格尔哲学东渐记》。

1916年《寰球学生报》的《述黑格尔唯心论》，再一篇是瞿菊农1921年10月发表在《时事新报》上的《黑格尔》。马文较客观地介绍了黑格尔的生活、学风、绝对唯心论、论理学（即逻辑学）、历史哲学，对黑格尔哲学做了较高评价；严文主要发挥了黑格尔否定性的辩证发展思想，颇有真知灼见；瞿文概括了黑格尔哲学的优点在于“历史的方法”、“发展的概念”、“三段论法”、“注重总体的思想”，某些方面也抓住黑格尔哲学的要害。这几篇文章在传播黑格尔哲学的历史上是有价值的，毕竟是开先河之作。但它们带有早期传播不可避免的弱点，即比较粗浅，不够全面，许多问题没有讲清楚。相对于在20年代已形成传播高潮的康德学说，黑格尔哲学是遭冷落的，传播的质量比较低。

这种状况从30年代始发生大的转机。1931年，逢黑格尔逝世百年纪念，在瞿菊农的倡导下，《哲学评论》^① 5卷1期刊发了一册《黑格尔专号》，收录了张君勱、瞿菊农、贺麟、朱光潜、姚宝贤等人论述黑格尔哲学的文章。尽管这些研究不够深入，但集中于专刊出现，声势较大，开始引起读者注意黑格尔哲学。接下来又发生一场关于如何理解黑格尔哲学的辩论。辩论发生在张颐和张君勱之间。张颐（1887—1970年）是中国最早研究黑格尔哲学的专家。从1912年起，他先后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学习西方哲学，以用英文撰成的《黑格尔的伦理学》^②一书先后在美、英获得博士学位。1921年他又赴德国黑格尔故乡，访晤德国的黑格尔研究专家。1923年回国后在北大讲授西方哲学。张君勱也曾留学德国，受德国哲学尤其是生命哲学影响较深，对黑格尔哲学亦有钻研。1931年，张颐、张君勱就黑格尔

^① 这是中国第一份专业性质的哲学刊物，1927年由张东荪、瞿菊农等创办。

^② 该书1925年由商务印书馆刊行，在国际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美国芝加哥《国际伦理杂志》（《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Ethics》）、德国《康德研究》（《Kant Studien》）分别载文予以评论。

哲学名词译法及如何理解黑格尔的政治观点和逻辑思想，在《大公报》、《北平晨报》上展开辩论。数篇文章，几个回合，虽无定论，却进一步引起学界对黑格尔哲学的关注。

此后，一批学者著书撰文或翻译原著，大大推进了黑格尔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其卓有成绩者，包括郭本道、周谷城、张铭鼎、贺麟等人。

郭本道在1934年出版了《黑格尔》一书。全书10万字，分四编，分别介绍了黑格尔哲学的渊源，黑格尔的逻辑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认为在近代思潮中，黑格尔哲学实占一重要地位，无论信仰他或反对他的，皆不能否认其价值。此书是我国最早全面介绍黑格尔哲学体系的一本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同年，郭本道还在《行健月刊》4卷5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对于黑格尔辩证法的几点意见》的文章，阐述了黑格尔辩证法的渊源、意义及特点，亦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和高度评价。

周谷城的研究介绍主要侧重于黑格尔的逻辑学。他于1933年和1934年先后发表了《黑格尔逻辑引论》、《黑格尔逻辑中之“质量”论》两篇文章，对理解黑格尔的《小逻辑》有一定意义。1934年，周谷城还翻译出版了黑格尔的《逻辑大纲》，这是黑格尔逻辑学最早的中文译本。

以研究康德学说见长的张铭鼎，1934年翻译了《论理学》（即黑格尔的《小逻辑》），1933年翻译了《黑格尔之历史哲学》，对传播黑格尔哲学有一定价值。

此外，朱光潜、谢幼伟、施友忠、唐君毅等人，也都或介绍黑格尔哲学原理，或依据黑格尔学说阐述哲学问题，直接间接宣传了黑格尔哲学。

在黑格尔哲学传播史上，贺麟的名字是不能忘记的。可以说，他是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第一位系统全面地研究介绍黑格尔哲学的学者，国内外久负盛名的黑格尔哲学专家。早在清华读书期间（20年代初），他就树立了以介绍传播西方古典哲学为自己终

身“志业”的理想。在美国留学时期（1926—1930年），受英国新黑格尔主义者格林（T.H.Green, 1836—1882年）和美国新黑格尔主义者鲁一士（J.Royce, 1855—1916年）的启发影响甚大，开始着手翻译鲁一士论述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文章。1930年赴德国，在柏林大学专研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学说。1931年回国后在北大、清华讲授西哲学、黑格尔哲学、现代西方哲学等课程。

贺麟第一篇论述黑格尔的文章是《朱熹与黑格尔太极说之比较观》，发表在1930年《大公报》文学副刊第149期上。此文以对勘比较朱熹的太极和黑格尔绝对理念的异同，来阐发两家的学说，开了比较哲学之先河，很有学术价值。1931年，他又写了《德国三大哲人康德、黑格尔、费希特处国难时之态度》，这是“九一八”事变后旨在唤醒民族精神的应时之作，在当时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此后，他边讲课、边翻译、边写作，在黑格尔哲学研究上取得卓越成绩。1936年，他将翻译的鲁一士《近代唯心论讲演集》中有关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几章和其《近代哲学之精神》中“黑格尔：为人及其学说概要”一章合为一书，名《黑格尔学述》，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同年，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他译的开尔德的《黑格尔》。1938年，他将自己十几年来系统研究黑格尔逻辑学的成果撰成《黑格尔逻辑学简述》。在这部专著中，贺麟完整地阐述了黑格尔逻辑学的基本思想，并对黑格尔哲学体系及其其中的基本范畴，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为后来研究黑格尔哲学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1949年，他集10年之功翻译的黑格尔的《小逻辑》终于译毕，翌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直到晚年，他仍孜孜不倦地研究黑格尔哲学，并汇编了他毕生研究黑格尔哲学的大成《黑格尔哲学讲演集》。可以说，黑格尔哲学在中国的研究传播，贺麟功不可没。他的译著用词准确行文流畅，完全避免了原著的艰深晦涩，深受读者喜爱，均列入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名著。因此贺麟又称得上现代著名翻

译家。

黑格尔哲学之传播所以在 30 年代出现大的转机，也是时代需要使然。正如马克思所讲“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思想传播也是如此。这里，贺麟的一段自述很可以代表当时一批学者热中于传播黑格尔学说的思想动因。他说：

“我之所以钻研黑格尔哲学，与其说是个人的兴趣，还毋宁说是基于时代的认识。……我们所处的时代与黑格尔的时代——都是政治方面，正当强邻压境，国内四分五裂，人心涣散颓丧的时代；学术方面，正当开明运动之后；文艺方面，正当浪漫文艺运动之后——因此很有些相同，黑格尔的学说对于解答时代问题，实有足资我们借鉴的地方。而黑格尔之有内容、有生命、有历史感的逻辑——分析矛盾，调解矛盾，征服矛盾的逻辑，及其重民族历史文化，重自求超越有限的精神生活的思想，实足振聋起顽、唤醒对于民族精神的自觉与鼓舞。”^①

这个时期黑格尔哲学传播的主要缺陷是以新黑格尔主义解释黑格尔。真正超越新黑格尔主义而站在更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立场上研究黑格尔则是新中国建立后的事情了。

3. 引进叔本华与尼采

最早将叔本华与尼采哲学引进到中国来的，恐怕要数王国维了。被蔡元培先生誉为“五十年来介绍西洋哲学第二人”的王国维，一生受叔本华哲学影响极深，也以宣传叔本华学说为己任。早年他曾用叔本华哲学研究《红楼梦》，写出脍炙人口的《红楼梦评论》，其中大段摘引了叔氏《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的论述，直接搬运了叔氏的美学学说。此外，他还撰写了《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在《静安文集·自序》等文章中也多次介绍了叔本华哲学。由醉心叔本华的哲学理论，又对叔氏弟子尼采

^① 贺麟：《黑格尔学述》后序，见《康德黑格尔哲学东渐记》。

之哲学产生兴趣，1904年写作了专论《叔本华与尼采》，对此师徒二人详加比较，认为其相同之点，都是“以意志为人性之根本”；其不同之点，一是尼采不同意叔本华意志寂灭说，二是尼采不同意叔本华“由意志同一之假说而唱绝对之博爱主义，”而是“唱绝对之个人主义”，提出了“超人”。他的结论是：

“自吾人观之，尼采之学说全本于叔氏。其第一期之说，即美术时代之说，其全负于叔氏，固可勿论；第二期之说亦不过发挥叔氏之直观主义；其末期之说，虽若与叔氏相反对然，要之不外以叔氏之美学上之天才论，应用于伦理学而已。”^①

在本世纪初年知识界只知德国资产阶级哲学一点皮毛的情形下，王国维对叔本华尼采哲学的介绍研究无疑是深刻的。

王国维之后，叔本华哲学在中国虽仍不断有所介绍，但在德国哲学的传播中，其分量显然不及尼采哲学。从王国维开始，尼采哲学逐渐被介绍到中国，大批的知识分子称道或服膺于此学说，并热中于研究宣传，终于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和40年代初形成知识界的两次“尼采热”。

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尼采热”的大致情形，可参看下表：^②

看得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战将们几乎都不约而同地关注和称颂尼采，对宣传尼采学说抱以极大的热情。尽管他们对尼采思想的理解不尽相同，但都抓住了尼采对宗教无情批判、倡导破坏偶像的思想特点和其“超人”理论。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即用以批判旧道德、反对旧文化，启封建之蒙，激扬个性，鼓励奋进。尼采对西方基督教文明的批判被当做了批判中国封建传统的武器。这里，对尼采思想的介绍宣传已远远超出王国维式的纯学

^① 《静安文集》，第84—85页。

^② 此表据有关资料并参阅李步楼主编：《冲击与思考——西方思潮在中国》（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制成。

作者	论(译)著	刊物	主要观点
陈独秀	《人生真义》	《新青年》1918年第4卷第2号	介绍尼采的超人学说“尊重个人的意志,发挥个人天才”,符合人生目的。
胡适	《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		尼采超人哲学虽然带着一丝“过屠门而大嚼”的酸味,但他对于传统的道德宗教下了很无忌惮的批评,重新估计其价值,确有很大的破坏功劳。
鲁迅	《随感录四十六》	《新青年》1919年第6卷第2号	人类进步孕育在对旧偶像的破坏之中。旧偶像越破坏,社会越进步;西方多有偶像破坏者,如尼采,社会的进步也就越显著。
茅盾	《尼采的学说》	《中学生杂志》1920年第2卷第5期	“把哲学上一切学说,社会上一切信条,一切人生观道德观,重新称量过,重新把他们的价值估量,这便是尼采思想卓绝的地方”。
傅斯年	《随感录》	《新潮》第1卷第5号	号召:“我们须提着灯笼沿街寻超人,拿棍子沿街打魔鬼”,称颂尼采是一个“极端破坏偶像者”。
李石岑	《尼采思想之批判》	《民铎》杂志1920年2卷1号(尼采专号)	全面介绍研究尼采思想
白云铎 符仲人 朱伯云 J. T. W	《尼采传》 《尼采之一生及思想》 《超人和伟人》 《尼采的真价值》 《尼采之著述及关于尼采研究之参考书》	《民铎杂志》1920年2卷1号(尼采专号)	
田汉	《说尼采悲剧之发生》	《少年中国》1卷2期	强调“人生越苦,我等越要有强国的意志”。
郭沫若	译《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一部全部及第二部之部分	《创造周报》连载39期	
鲁迅	译《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序言	《新潮》1920年	
张叔丹	译《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序言	《民铎》杂志1920年2卷1号	
刘文超	摘译《人类的、太人类的》片断		

理的探讨，而具有了现实的政治功利目的。

在对尼采学说的赞扬声中，知识界也有一些人指责尼采，认为德国之所以挑起惨无人道的战争，是因为受了尼采战争理论的鼓动。蔡元培就说：“达氏虽有自然淘汰优胜劣败之说，然亦就生物界之现象而假定之，初未尝用以推断一切之事物。自尼采以此义为世界进化之惟一条件，而悬为道德之标准，于是竞强汰弱之义大行，而产生德国之军国主义。”^① 凌霜的批评则更尖锐，他说：“积数世纪历史之所未有，而为纪元以来所仅见之惨祸，发于顷刻，其悲苦之声，继之以无人道之事，震荡耳鼓，皆此等学说为之厉阶。”^② 这些批评正确与否姑且不论，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从反而宣传介绍了尼采学说，构成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尼采热潮的组成部分。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引进尼采的热潮中，鲁迅是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鲁迅受尼采哲学影响至深，以至被称为“中国的尼采”。^③ 刘半农赠送的联语评价鲁迅“托尼学说，魏晋文章”，更是传诵一时。

早在辛亥革命前的三四年里，鲁迅就开始表现出对尼采哲学的热情。他在《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文章中大量引用复述了尼采《查拉斯图拉如是说》中的内容，称颂尼采是具有非凡洞察力、有远见的哲学家，确信尼采所代表的19世纪末叶的哲学思潮乃是对本世纪文明历史的全而反省和批判，预言它是未来新思想的朕兆，新生活的前驱。此时，鲁迅所关注的不是尼采精深的哲理，而是尼采对早期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唯意志论学说，借助尼采的认识来冲决中国传统的封建思想束缚，鼓励民众对黑

① 《蔡元培选集》，上卷，第51—52页，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② 凌霜译述：《德意志哲学家尼采的宗教》，《新青年》第4卷第5号，1918年5月。

③ 徐志摩：《关于下面一束通信告读者们》，1926年1月30日《晨报副刊》。

暗现实的反抗和对坚强个性的执着追求。这种特点在五四时期表现得更为明显。此时鲁迅特别赞扬尼采学说中那种特立独行、不惧时俗、敢于打破偶像重估一切价值的精神，号召中国青年向这种精神学习。针对当时知识界那种对象不明而随意褒贬的趋时风尚，鲁迅还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1918年，他用文言翻译了《查拉斯图如是说》序言的一部分；1920年又用白话翻译了此序言的全部并在《新潮》杂志上发表；1925年，他还托人购买了此书的日译本及研究著作，希冀日后能重译此书，“来填一填高谈中的空虚”。

随着学界对尼采思想争论的展开和研究的深入，更随着自己世界观和人生观向共产主义的转变，鲁迅也开始重新思考尼采学说的价值。20年代后期，他对尼采思想中脱离社会、仇视社会的观点提出批评；对先前极力称赞的尼采“格言式的文章”也不再感兴趣。到晚年，他对尼采自诩为太阳表示厌恶，明确提出“尼采就自诩过他是太阳，光热无穷，只是给予，不想取得。然而尼采终究不是太阳，他发了疯”。在否定尼采的同时，鲁迅提出了著名的“拿来主义”观点。1935年，鲁迅最后一次谈尼采，指出了尼采对中国文艺界的消极影响，斥责他是“‘世纪末’的果汁”，代表了没落思潮，并断言“超人哲学”逃避不了“空虚的命运”，它的创造者也不得不以“发狂和死”作为下场。至此，鲁迅对尼采哲学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转变。^①

鲁迅对待尼采哲学取其精华、为我所用并批判其消极面的拿来主义态度，为中国人正确对待外来文化提供了惟一合理的途径。

就在鲁迅指斥尼采学说为没落思潮几年后，中国知识界又掀起一次尼采热。1940年4月至1941年7月，云南大学、西南联

^① 参阅钱碧湘：《鲁迅与尼采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哲学论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合大学教授林同济、陈铨、雷海宗在昆明主办了一份《战国策》半月刊；之后又于1941年12月至1942年7月在重庆《大公报》上开辟《战国副刊》，以此为阵地形成一个称之为“战国策派”的学术派别。他们连篇累牍，多方面宣传尼采，并在政治、社会、道德、文艺等方面运用尼采的学说，形成一股颇有气势的尼采研究宣传热潮。关于他们此期研究宣传尼采的主要论著，请看下表：^①

作者	论著	刊物
陈铨	《从叔本华到尼采》	《清华学报》11卷2期，1936年4月
陈铨	《尼采与近代历史教育》	《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4卷3期，1937年10月
林同济	《尼采萨拉图斯的两种译本》	《今日评论》1卷16期，1939年4月16日
陈铨	《论英雄崇拜》	《战国策》第4期，1940年5月15日
林同济	《萨拉图斯达如此说——寄给中国青年》	《战国策》第5期，1940年6月1日
陈铨	《尼采的思想》	《战国策》第7期，1940年7月10日
	《尼采心目中的女性》	《战国策》第8期，1940年7月25日
	《尼采的政治思想》	《战国策》第9期，1940年8月5日
	《尼采的道德思想》	《战国策》第12期，1940年9月15日
	《尼采的无神论》	《战国策》第15、16期合刊，1941年1月1日
	《文学批评的新动向》	《战国策》第17期，1940年7月20日
贺麟	《英雄崇拜与人格教育》	《战国策》第17期，1940年7月20日
林同济	《我看尼采》	《从叔本华到尼采》序言，在创出版社1944年

^① 此表据温儒敏、丁晓萍编：《时代之波——战国策派文化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编制。

作者	论著	刊物
陈 铨	《尼采与红楼梦》	《文学批评的新动向》，正中书局 1943 年
	《再论英雄崇拜》	《战国副刊》第 21 期，重庆《大公报》1942 年 4 月 21 日
	《廿年来思想转变与综合》	《战国策》第 17 期，1941 年 7 月 20 日

“战国策派”兴起于抗战方殷的 40 年代初，其学术宗旨在于反思和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惰性和弊端，吸收中外文化的长处，进行文化重建，中心问题是健全国民性格，激扬民族活力。因此尼采学说便成为其借重的思想和重要的理论来源。

在“战国策派”看来，尼采是近代“最前进的、最革命的、最富于理想的政治思想家”；他的著作是“生命力饱涨的象征”，是“生命的顶峰”、“创造的纯火”。^① 他们指出：“中国处在生存竞争的时代，尼采的哲学对于我们是否还有意义，这就要看我们愿意做奴隶，还是愿意做主人；愿意做猴子，还是愿意做人类。”^② 对尼采及其学说做了极高的评价，对中国借鉴尼采哲学的意义做了充分肯定。

在这次“尼采热”中，被“战国策派”宣传和借用得最多的一是权力意志，二是英雄崇拜。“权力意志”是尼采哲学的核心概念，可以理解为“强力意志”。“战国策派”推崇此概念主要是针对传统文化中的惰性，强调的是积极的进取精神。譬如林同济仿尼采《查拉斯图拉如是说》的文体，写了短文《萨拉图斯达如此说——寄给中国青年》，强烈抨击了中国人胆小懦弱、明哲保身、息事宁人的国民性格，号召青年们勇敢投身到抗日战争中去。“战国策派”鼓吹英雄崇拜，目的也主要在于纠正国民性的庸惰，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因此，借尼采哲学提高民族活力，

① 林同济：《我看尼采》，《从叔本华到尼采》序言，在创出版社 1944 年。

② 陈铨：《尼采的思想》，《战国策》第 7 期，1940 年 7 月 10 日。

更好抵御外来侵略，同时传播西洋哲学，重构中国文化，主观意图显然是好的。但自从希特勒把尼采尊奉为他们的思想前驱并利用尼采哲学为其法西斯主义张目后，尼采哲学已经受到人们的严肃批判，此时张扬尼采学说，尤其是其“权力意志”，甚至于把希特勒也当做尼采式的强者加以称颂，不仅不合时宜，而且有重要错误。在全民族抗战的形势下，大肆鼓吹英雄崇拜贬低人民群众也不仅是一种唯心史观，更不利于发动全国民众。因此，这股热潮也受到当时一些学者的批评。胡绳 1940 年发表文章《论反理性主义的逆流》提出：“法西斯主义者高捧尼采，我们的学者也高捧尼采”，严厉批驳了“战国策派”的理论观点。

4. 奥伊肯、杜里舒与中国

在近代以来传入中国的各种西方哲学思潮中，生命哲学^①是影响较大的一派。它的重要代表一是法国的柏格森，二是德国的奥伊肯。此外属于此学说的还有德国的杜里舒等。

奥伊肯（Rudolf Eucken, 1846—1926 年），又译为“沃伊肯”或“倭伊铿”，是德国耶拿大学的教授，1908 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著有《近代思想的主潮》、《精神生活的统一性》、《为精神生活的内容而战斗》等大量著作。他的生命哲学，用他自己的名词，可称为精神生活哲学，强调人的内心精神生活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反对自然主义和理智主义。他的著作，文字清新流畅，毫无康德、黑格尔式文体的晦涩，受到德国较多社会人士的喜爱。

杜里舒（Hans Driesch）亦主张生命哲学，不过他强调较多的是动力生命说。他的影响较奥伊肯要小一些。

^① 生命哲学：一种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学说，19 世纪后半期开始流行于西方各国，它试图用生命的发生发展来解释世界，反对用经验和理性的方法认识世界，强调直觉，主张生命冲动是宇宙万物的本源。

民国以来的中国知识界了解奥伊肯和杜里舒，和张君劢的介绍是分不开的。

1918年底，张君劢随梁启超赴欧洲游历。在旁听了巴黎和会后，他和梁启超等一起访问了奥伊肯。对此，奥氏的《自传》曾有所记载。^① 传中说，1920年中国财政部长梁启超^② 借在法国凡尔赛开和平会议之便，曾和两位中国教授^③ 访问他，邀请他到中国讲学，^④ 并协议先把奥伊肯的主要著作译为中文，首先译《近代思想的主潮》一书。此次会谈，使张君劢对奥氏哲学备加赞赏，他说：“以倭氏（即奥伊肯——引者注）七十老翁，精神闪烁，一如少年，待异国之人，亲切真挚，吾乃生一感觉，觉平日涵养于哲学工夫者，人生观自超人一等，视外交家以权谋术数为惟一法门者，不啻光明黑暗天堂地狱之别，吾于是弃其归国之念，定计就倭氏而学焉”。^⑤ 1920年，他送梁启超一行回国后，移居耶拿，从奥伊肯学习哲学，系统地受到生命哲学的影响，并为后来接受柏格森哲学奠定了基础。1920年6月27日，张君劢从德国耶拿旅舍给国内写信，第一次介绍了奥氏哲学体系：

“其学说大概：第一，世间实相（非绝对不认物界）不外心物二者，贯彻此二者厥在精神生活；第二，昔日哲学（德黑格尔以来之学说）家以‘思’为真理之源，奥氏曰‘思’不过精神生活之一部，徒思不足以尽真理，尽真理厥在精神生活之体验；第三，人心易为外物之束缚，故当以精神生活克制之，（然后人生

^① 《奥伊肯自传》，1922年德文版，第113—114页，参见杜任之主编：《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述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

^② 梁任段祺瑞内阁财长时间为1917年7月至11月，此时已退出政坛致力文化教育事业。

^③ 一是张君劢，另一个可能是蒋百里。

^④ 后奥氏以国内事忙且年老需人照顾为由辞谢访华邀请。见台北《张君劢传记资料》（二），第302页，天一出版社1979年版。

^⑤ 《张君劢年表》，《现代中国思想家》，第6辑第108页，台湾巨人出版社1978年版。

乃能精莹透澈)精神生活与为外物所束缚之心相争竞,故应有一种奋斗工夫;一言以蔽之,以人生为中心。”^①对奥氏哲学的概括是准确的,但他同时又声称介绍奥氏哲学是“欲以奥氏之言药吾国人也”,则开错了药方。此后一段时间,张君劢不断向国内介绍奥伊肯哲学思想,其文章大都发表在《改造》杂志上。此外,他还和奥氏合著了《中国与欧洲的人生问题》一书,在莱比锡出版,宣传奥氏的生命哲学观。

在宣传奥氏学说的同时,张君劢受国内讲学社的托请,在德国力邀杜里舒访华。通过奥伊肯的介绍,张君劢和杜里舒取得了联系,杜里舒接受了访华邀请。1921年底,张君劢偕杜里舒回国,1922年1月抵达上海。此后,在张君劢、瞿菊农等陪同翻译下,杜里舒先后在南京、汉口、北京等地做学术演讲,历时一年,于1923年初离华返国。作为此次访华讲学的成果,讲学社编辑了《杜里舒讲演录》,1923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刊共10期,全面收录了杜氏在华的学术演讲。现存北京图书馆的第1期收录了杜氏讲演两篇,即《康德与最近哲学潮流》、《生机体之哲学》。此外,书内还收录张君劢的《杜里舒教授学说大略》、瞿菊农的《杜里舒与现代精神》两篇文章。杜里舒来华在当时中国知识界产生较大影响。

在宣传德国生命派哲学的队伍中,除张君劢外,钱智修、江绍原、瞿菊农等人也做了一些介绍研究工作。钱智修编著了《德国大哲学家郁根传》,1917年6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简要介绍了奥伊肯的生平事迹及其思想著述。江绍原翻译了杜里舒著作《实生论大旨》,1923年12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全书分“实生论的三大证明”、“实生论与一元玄学”等5章,书末还附录杜氏著述简目,较有参考价值。瞿菊农翻译了英国学者部兹(M. Booth)著的《倭伊铿哲学》,1925年9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

^① 《通信》,《改造》3卷4号,1920年12月15日。

出版，并于1926、1933年两次再版。该书分“倭伊铿之一生及其著作”、“人与精神生活”等12章，较全面论述了奥伊肯的生平及哲学观点。

二、德国的文学艺术与中国

1. 译介德国文学

德国不仅是哲学的国度，也是产生诗人和文学家的摇篮。随着18世纪中期以后“狂飙突进运动”^①的兴起，德国诞生了歌德（Johann Wolfgang Goethe, 1749—1832年）、席勒（Friedrich Von Schiller, 1759—1805年）、海涅（Heinrich Heine, 1797—1856年）等一批影响世界的伟大文学人物，创造了自己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学，给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现代文学带来深刻影响。

早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前，中国就有人关注德国文学了。1907年，鲁迅在其所著《人之历史》中称歌德为达尔文之先驱；1908年，作新社译有《德意志文豪六大家列传》，对歌德等做了详细介绍；1913年至1914年，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重要人物，曾留学日本、德国，生平著译甚多的马君武，以旧的诗词格律体裁翻译了歌德、席勒的诗，并收入1914年出版的《君武诗稿》，为知识界的许多人所传诵。

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译介德国文学更形成一股热潮。其中，走在最前面、成果最丰硕的当数郭沫若。留日期间，他学会了德文，阅读了德国作家的大量作品，培养起对德国文学的浓厚

^① 狂飙突进运动：18世纪中期后兴起的德国资产阶级文学运动，是德国人文主义运动和启蒙运动的继续和发展，因德作家克林格尔（Friedrich Maximilian Klingler, 1752—1831）的剧本《狂飙突进》得名。该运动推崇卢梭的民主主义思想，反对专制，提倡个性解放；歌颂自然，宣扬天才，强调民族意识和民族风格。代表人物有歌德、席勒、赫尔德等人。

兴趣，五四时期几乎把主要精力花在德国文学的翻译上。1919年夏，他开始翻译歌德积毕生心血的代表作、长篇诗剧《浮士德》，^① 1921年完成了第一部的翻译。同年，翻译出版了德国作家施笃谟（今译施托姆——作者注）的《茵梦湖》；1922年翻译出版了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1927年至1928年，合译了《歌德诗选》；1928年出版了《浮士德》第一部。此后，还翻译出版了霍普特曼的《异端》、席勒的《华伦斯坦》、《浮士德》的第二部等德国文学作品。郭沫若的译文如行云流水，充满了浪漫主义激情，和原作极为吻合，引起读者的强烈共鸣。这些译作，每部都有好几个版本，出版后风行一时，为人们喜闻乐见。

在郭沫若联翩出版译作的同时，新文学的其他实践者们也都不遗余力地介绍德国文学。当时的《少年中国》、《时事新报·学灯》、《创造季刊》、《小说月报》等刊物都发表过歌德的诗文，《时事新报·学灯》为纪念歌德逝世90周年还出了专号。郭沫若、宗白华、田汉等人还计划筹办歌德研究会，后虽因种种原因未能成功，但却为人们留下了“大体以歌德为中心”的书信集《三叶集》。这部书信集被时人称为中国的《少年维特之烦恼》。

可以看出，五四时期德国文学的译介主要集中于歌德的作品。个中原因，郭沫若说得很清楚。他说：

“我开始翻译《浮士德》已经是一九一九年的事了。那年就是五四运动发生的一年，我是在五四运动的高潮期中着手翻译的。我们的五四运动很有点像青年歌德时代的‘狂飙突起运动’(Sturm und Drang)，同是由封建社会蜕变到现代的一个划时代的历史时期。因为有这样的相同，所以和青年歌德的心弦起了

^① 《浮士德》：取材于德国16世纪民间传说，叙述浮士德与魔鬼订约，漫游世界，满足各种欲望，享受人间欢乐，最后惨死于魔鬼之手的故事。具有庞大的艺术结构，内容丰富多彩，是迄今为止德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品，在世界文学史上享有崇高声誉。

共鸣,差不多是在一种类似崇拜的心情中,我把第一部译完了。……我颇感觉在自己的一生中做了一件相当有意义的事情。”^①

他在谈到翻译《少年维特之烦恼》时也说:“我译此书,于歌德思想有种种共鸣处。……第一,是他的主情主义……;第二,是他的泛神思想……;第三,是他对于自然的赞美……;第四,是他对于原始的景仰……;第五,是他对于小儿的尊敬……。”^②

郭沫若正是通过对歌德作品的译介,将浪漫主义注重感情、强调自我表现,冲破封建主义羁绊的特质予以揭示,它与五四时代新知识界强烈要求的思想解放、争取民主自由的时代精神是合拍的,他的话说出了五四新文学倡导者和实践者的心声。

以歌德为主体的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的译介,给五四新文学的先驱者们带来深刻影响。郑伯奇在《忆创造社》文中提到“对创造社一些主要作家最有影响的,毋宁说是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作家,而德国的歌德、席勒和海涅的影响特别显著”。^③郭沫若的《女神》、《三个叛逆的女性》、《棠棣之花》等诗、剧的创作无疑受到歌德的影响;郁达夫更是“拜倒”在德国文学脚下,对其推崇备至。就是创造社之外的新文学作家们,如鲁迅、冰心等人也无不深受德国文学的影响。

在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基础上,译介德国文学的工作在20年代后期继续向前发展。一是译介队伍更加壮大,除郭沫若外,郁达夫、梁宗岱、冯至等新文学作家也加入了进来;杨丙辰、陈铨等学者也成为介绍德国文学的重要成员。二是译介范围远远超出

^① 郭沫若:《浮士德·第二部译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② 郭沫若:《〈少年维特之烦恼〉序引》,《创造季刊》第1卷第1期,1922年5月。

^③ 郑延顺编:《忆创造社及其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

五四时期以歌德为主的介绍局限，扩大到更广泛的德国文学作品，不仅有著名作家作品的介绍，也有不太知名的作家作品的介绍；不仅有个别作家作品的具体分析，还有对德国文学的宏观研究。

在新文学作家中，除郭沫若外，郁达夫译介德国文学的成绩也很显著。和郭沫若一样，郁达夫也是留日生，也是从日本教育中学会了德文，和德国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从1927年起，他先后翻译了德国诗人、作家婆塞（Carl Busse）的《春天的离别》，理查·戴默尔（Richard Dehmel）的《我俩的黄昏时候》，法尔盖（Gustav Falke）的《祈祷》，台奥多·斯笃姆（Theodor Storm）的《马尔戴和她的钟》，鲁道夫·林道（Rudolf Lindeu）的《幸福的摆》等十数篇诗歌和小说。他的翻译，始终坚持“严格主义”的态度，力求用原本直译，并参照多种译本和相关资料，每篇译作后还附有原作者和原作的介绍与评述，因此质量较高。^①

冯至、梁宗岱也是新文学作家中介绍德国文学较有成绩的。他们都曾留学德国，受德国文学浸染较深，一生中也以译介德国文学为己任。冯至的著译包括：《歌德的晚年》（1941年）、《〈浮士德〉里的魔》（1943年）、《从〈浮士德〉里的‘人造人’略论歌德的自然哲学》（1944年）、《歌德论述》（1948年）、《里尔克〈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1938年）^②。梁宗岱曾翻译歌德的《流浪者之夜歌》、《幸福的憧憬》，尼采的《流浪人》、《太阳落了》等十几首诗歌，1934年收入译诗集《一切的峰顶》。新中国成立后，冯、梁二人继续从事德国文学译介工作，为中德文学交

^① 郁达夫的译作，生前曾收入《达夫全集》第四、五、七卷及《达夫所译短篇小说》、《几个伟大的作家》、《小家之伍》中，但仍有一些译作未曾编入。1983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将他的全部译作收入《郁达夫文集》中出版。

^② 冯至的主要译著见北京师院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冯至学术论著自选集》。

流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除新文学作家外，一些留德的学者在三四十年代也致力于德国文学的介绍工作。据西方哲学史专家周辅成讲，北京的杨丙辰和南京的宗白华“在当时中国是了解歌德最深的专门研究者”。^①杨丙辰，任职北大德文系主任十几年，曾翻译出版席勒的《强盗》，歌德的《亲和刀》、《歌德短篇小说集》，赫贝尔的《短篇小说集》等德国文学作品。宗白华，少年时代就曾接受德式教育，20年代又留学德国，成为我国现代美学研究的开拓者，同时又是一位有着独特风格的翻译家。他的德国文学译作尽管数量不多，但《歌德研究》、《海涅生活与艺术》、《席勒和歌德的三封通信》等，译文考究，很有分量。此外，作为“战国策派”重镇的陈铨，也可谓译介德国文学的大家，曾在30年代出版《中德文学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初版），40年代初撰有《狂飙时代的德国文学》、《浮士德精神》、《狂飙时代的席勒》、《狂飙时代的歌德》等文章，较全面地介绍了“狂飙突进运动”时期的德国文学。另外，20年代中期后综合性介绍德国文学的，还有刘大杰的《德国文学概论》、张傅普的《德国文学史大纲》等著述。

在民国时期的中德文学交流史上，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即对二战期间德国反战文学的介绍和德国法西斯文学研究。德国的反战文学作品进入中国极少，但有些作家的作品深得中国读者的喜爱。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德国作家列普曼的长篇报告文学《地下火》。^②列普曼原是一位富有的中产阶级作家和记者，一生坎坷曲折，但从未丧失为人正直的品格。在纳粹执政初期，他为了坚持信仰，放弃了优裕的生活环境，投入到反法西斯抵抗运动，不久被盖世太保投进监狱，后来越狱逃亡，写成这部著作。

^① 周辅成：《平凡的一生》，《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3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

^② 朱雯翻译，上海万叶书店1939年出版。

在这部书中，作者以剪辑性的实录，多角度多侧面地揭示了纳粹暴虐统治下的德国社会面貌，描述了德国内部反法西斯的英勇奋斗和艰苦抗争。此书在中国翻译出版后，立即成为流行书籍，抗战文艺界纷纷撰文，指出此书的现实意义，对此书予以高度评价。除《地下火》外，另外一些介绍过来的反战作品如《西线无战事》、《纳粹贫血症》、《谁无儿女》、《马门教授》等，影响虽不及《地下火》，但对人们认识纳粹实质，认识战争，鼓舞人民抗战，也发挥了积极的教育作用。

对德国法西斯文学研究做出贡献的主要有刘盛亚、铁弦、季羨林等人，影响最大的是刘盛亚。他于1935年赴德法兰克福大学留学，1938年回国后从事进步的文化救亡活动。他撰写的《德国文学近况鸟瞰》、《第三帝国的戏剧》以及《卍字旗下》中的许多文章，对德国文艺界的种种现象做了精辟分析，尤其揭示了在德国严酷思想统治下官方意志与读者意志的离心倾向。这些研究，说理充分，文笔细致，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较高的学术价值。^①

2. 传播德国音乐

德国是著名的音乐之乡，那里曾产生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 1685—1750年）、亨德尔（Georg Friedrich Handel, 1685—1759年）、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 1770—1827年）等一大批具有世界影响的音乐大师。音乐对建设德国的民族精神，推动德国的民族进步发挥了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

在民国时期的中德文化交流史上，王光祈、萧友梅、青主等一批留德学生充当了传播德国音乐的使者。

王光祈（1891—1936年），四川涪江人，早年考入北平中国

^① 刘盛亚还译有歌德的《少年游》、《歌德诗选》、《海涅诗选》、《蔡特金传》等德国文学作品，在外国文学翻译界享有一定声望。

大学攻读法律，五四前后曾参与组织“少年中国学会”和“工读互助团”。1920年，他作为《申报》、《时事新报》、《晨报》的特约驻德通讯记者，赴德国学习德文和政治经济学。1923年改学音乐。1927年入柏林大学专攻音乐学。1934年以《中国古代之歌剧》一文获音乐博士学位。1936年病逝于柏林。在德16年间，除写作翻译大量有关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文章和资料外，还出版了20种音乐论著，发表大量用德、英文字撰写的介绍研究中外音乐的文章。

在王光祈看来，音乐是可以救国的。中华民族本是以音乐立国之民族，但现在堕落昏愤，不知音乐为何物。因此一方面要整理中国古代音乐使之发扬光大，另一方面则要大量输入西洋音乐，二者融合产生一种可以代表中华民族的国乐以激扬民族精神，使民众立志向上。^①本着音乐救国的目的，王光祈大量介绍了西方音乐，特别是德国音乐。他认为在近代西洋音乐中，“最足供吾人研究者，当首推德国”。为此，他做了不懈努力，先后创作出版了《德国人之音乐生活》、《德国国民学校与唱歌》两本专门介绍德国音乐的著作。前者叙述了德国音乐的基本状况、特点及普通民众的音乐生活，号召国人一定要像德国人那样重视音乐；后者阐述了德国国民学校音乐教育的全过程，并选译德国歌曲10首以为佐证。王光祈对德国音乐的介绍，通俗易懂，极富情趣。此外，他还出版了《欧洲音乐进化论》、《西洋音乐与诗歌》、《西洋音乐与戏剧》、《东西乐制之研究》、《各国国歌评述》、《西洋乐器提要》、《西洋制谱学提要》、《西洋音乐史纲要》等十几种介绍西洋音乐文化的论著，^②均主要以德国音乐书籍为素材，也重点介绍了德国的音乐学及其技术理论。这些论著为人们系统地认识包括德国音乐在内的欧洲音乐文化，对促进人们重视

① 王光祈：《东西乐制之研究》自序，第9—10页，上海中华书局1926年版。

② 这些著作出版于1924年至1937年，出版者主要为上海中华书局。

以科学的方法来整理我国的民族音乐遗产，都起了积极作用。

在向国人传播德国音乐、西洋音乐的同时，王光祈还特别注意将中国的传统音乐介绍给德国和西方其他国家人民。从1926年起，他在德国的《德累斯顿报》、《科学导报》等刊物及精神出版社先后发表、出版了《音乐在中国的意义》、《论中国音乐》、《中国古典歌剧》、《千百年间中国与西方的音乐关系》等论著，还为《大英百科全书》、《意大利百科全书》撰写了有关中国音乐方面的条目。

王光祈为沟通中德、中西音乐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萧友梅（1884—1940年）于1912年留学德国莱比锡音乐学院，深受德国音乐的熏陶，他后来编写的《普通乐学》、《和声学纲要》、《钢琴教科书》、《小提琴教科书》、《中西音乐的比较研究》等音乐论著，传播了包括德国音乐在内的西方音乐，对推动中国现代音乐教育也起了积极作用。

青主（1893—1959年）早年曾参加辛亥革命，后赴德国学习法律，兼学钢琴和作曲理论。1922年回国后参与国内进步的政治活动。后专事音乐编辑和德文教学工作。他在《乐话》、《音乐通论》等音乐论著中，以富于感情的笔触介绍了包括莫扎特、贝多芬、瓦格纳等德国音乐大师在内的欧洲19世纪的音乐家，对他们的创作风格和成就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传播德国音乐亦有一定贡献。

3. 介绍德国美术

在引进近代西方美术的历史上，鲁迅先生对德国版画艺术的介绍，堪称一桩盛事美谈。

作为中国新文学旗手的鲁迅，对美术同样有着精深的研究。他对西方美术史从古希腊的雕塑、文艺复兴时期的壁画，到十八九世纪的欧洲美术，都有着极为渊博的知识；对各艺术流派，有着丰富的画册、史料的收藏。其中对19世纪中期后享誉世界的

德国版画艺术，更是情有独钟。在他的美术藏品中，德国版画有四百多幅，收藏极为丰富。

在广泛收藏德国版画作品的同时，鲁迅努力将这些作品介绍给中国的美术青年和美术爱好者。1929年2月，他在《艺苑朝花》第1期第3辑中，编选了包括德国木刻作品在内的外国木刻12幅；同年，计划将自己所藏德国版画编印出版，后因受经济和印刷的限制，未能实现；1930年，他编定德著名版画家梅斐尔德（Meffert）的七幅连续画，名《你的姊妹》，并亲自为画册题名（此画册鲁迅生前未出版）；1931年，他在自己编印出版的苏联小说《士敏土》中收入了梅斐尔德的木刻10幅，并对作者作品做了介绍，称赞梅氏作品“含有革命底内容”，“很示人以精豪和组织的力量”。^①在编选画册的同时，鲁迅还致力于举办木刻展览会，从1930年至1933年共举办三次，其中展示了德国的许多版画作品，引起广大文艺爱好者的兴趣。1931年底，鲁迅与当时在上海的德国友人汉堡夫人合作，筹办了德国作家版画展，鲁迅亲自动笔，为展览会撰写了介绍文章：

“近闻有德国的爱好美术的人们，已筹备开一‘创作版画展览会’。其版类有木、有石、有铜。其作家都是现代德国的，或寓居德国的各国的名手，有许多还是已经跨进美术史里去了的人们，……。闻有百余幅之多，大者至二三尺，且都有作者亲笔的署名，和翻印的画片，简直有天渊之别，是很值得美术学生和爱好美术者的研究的。”^②

用简洁的文字引导人们的鉴赏，对德国版画艺术的熟稔和关爱也溢于言表。他还为展品一一做了说明。

在德国现代版画家，凯绥·珂勒惠支是鲁迅最为重视、介

^① 鲁迅：《〈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序言》，张萼编：《鲁迅论美术》，第91页，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年版。

^② 鲁迅：《介绍德国作家版画展》，张萼编：《鲁迅论美术》，第93—94页。

绍用力最多的画家。

凯绥·珂勒惠支 (Kathe Kollwitz, 1867—1945 年) 是享有世界声誉的德国女版画家, 也是现代美术史上最早以自己的作品反映劳动者生活和斗争的画家之一。她的组画《织工》、《农民战争》、《死亡》等深刻刻画了被压迫者的苦难、抗争以及战争给人们带来的创伤, 具有扣人心弦的艺术感染力。鲁迅曾介绍说: “她以深广的慈母之爱, 为一切被侮辱和损害者悲哀, 抗议, 愤怒, 斗争; 所取题材大抵是困苦、饥饿、流离、疾病、死亡, 然而也有呼号, 挣扎, 联合和奋起。”^① 鲁迅不仅欣赏她的艺术, 更钦佩她站在德国劳动者一边、反专制反战争的战斗精神。把这样一位“新的战斗的作家”介绍到中国, 在鲁迅看来, 对中国新兴的进步美术运动的发展无疑是有意义的。

1931 年 9 月, 为纪念此前被国民党杀害的左翼文学青年柔石^② 等人, 鲁迅选了一幅珂勒惠支的黑白木刻《牺牲》, 刊登在“左联”新创刊的文学刊物《北斗》上。这是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幅珂勒惠支版画。1931 年底举办的德国版画展也展出了珂勒惠支的作品。1932 年 10 月, 鲁迅发表《‘连环图画’辩护》一文时, 又选发了珂勒惠支的组画《无产者》中的两幅木刻。1935 年 9 月, 在《译文》期刊终刊号上又选发了介绍她的黑白木刻《纪念李卜克内西》; 与此同时, 鲁迅不顾越来越严重的肺病的折磨, 着手编辑自费出版珂勒惠支版画集, 1936 年 7 月终于刊印出版。

《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共收石版画 7 幅, 铜版画 14 幅, 黑白木刻 3 幅。其中包括珂勒惠支自己选送给中国的自画像,

^① 鲁迅:《〈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序目》, 张望编:《鲁迅论美术》, 第 168 页。

^② 柔石 (1902—1931 年): 左翼作家, 中共党员, 著有《旧时之死》、《二月》等作品, 1931 年 2 月被国民党杀害。生前曾与鲁迅一起研究过搜集介绍珂勒惠支版画的事。

《织工》、《农民战争》两套组画及其他作品。画集的序言由史沫特莱撰写^①（由茅盾译成中文），鲁迅自己为画集写了《序目》。《序目》详细介绍了珂勒惠支的生平和作品的社会影响，并对所选的21幅作品逐幅做了详细说明，对作品的艺术性思想性皆做了精辟分析，对版画艺术的欣赏和创作具有指导意义。这本画集至今仍是珂勒惠支画集中的名著。

在画集出版过程中，为了确保质量，鲁迅决定自己负责配页成集。1936年夏，酷热难当（温度高达摄氏38度）。鲁迅冒着酷暑把画页搬回家，发动全家把画一迭一迭摊在地板上，一张一张编排次序，一张一张夹衬纸，一本一本归拢，然后送去装订。画集的出版浸透着鲁迅的大量心血。

《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在中国进步美术运动中的影响是深远的，可以说几乎所有的进步木刻青年，无论创作思想还是技法，都深受过珂勒惠支作品的良好影响。

鲁迅为介绍德国版画艺术，推动我国的新美术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民国时期德国美术在中国的传播，除鲁迅对珂勒惠支等人作品的介绍外，尚有如下作品：

1935年8月，吴朗西选编、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德国亨利·遮勒（Heinrich Zille）的《柏林生活素描》，收30幅漫画；

1939年8月，香港新艺社编辑出版了《凯绥·珂勒惠支画册》，收版画32幅；

1946年3月，上海星艺社出版德国鲁斯·萧曼作的《一个女人的一生》，收连续黑白画21幅；

1947年12月，郭沫若编、上海群益出版社出版F·Staffen绘的《浮士德百三十图》，收歌德《浮士德》第一、二部的插图

^① 史沫特莱是珂勒惠支的好友，鲁迅曾托请她去信求购珂勒惠支作品。

130 幅；

1949年8月，香港人间画会出版《凯绥·珂勒惠支之画》(1897—1932作品选)，收版画37幅。

三、中德教育科技交流

1. 在华德国人的教育科技活动

与西方其他主要国家相比，德国人的在华教育活动要弱得多。他们于清末在华开办的一些学校，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停办。战后，有的学校再度开办，有的则没有恢复。据目前所见到的材料，战后德国的在华学校以上海、青岛、天津等地为多。其中，规模最大、程度最高、对中国教育具有影响力的，首推上海同济大学。

同济大学的前身为同济德文医学堂和同济医工学堂。德文医学堂1906年由德国医学博士埃里希·宝隆(Erich Panlun)开始筹办，先在柏林成立了中德文化促进委员会，在德国工商金融界的赞助下，筹集了价值700万马克的医疗器械和书刊，之后于1907年6月3日，医学堂正式成立，推举宝隆为校董会总监督兼学堂首任总理；同时成立医学堂基金会和由几名德国医生组成的教务团。学堂设德文、医学两科，德文科是为医科附设的预备学校，学制三年；医科又分预科(学制二年)和正科(学制三年)，学制五年。民国以前，该学堂规模甚小，仅有教师三人，学生三十多人，但学风谨严，为社会所瞩目。1909年，宝隆病逝，德国医学博士福沙伯(Oscar Von Schab)继任学堂总理。

1910年12月，德国工商科技界组成中德工学堂协会，开始筹备在上海建立工学堂。在募集了175万马克的经费和价值20万马克的机器模型、试验设备后，1912年4月，工学堂在上海成立，随即并入同济德文医学堂，校名更为同济医工学堂，设德

文预备学校和医、工两科。1914年11月，英、日联军侵占青岛，德人在青岛开设的黑兰大学停办，部分师生转到上海，也并入同济医工学堂，为此学堂又增设了土木科。1915年再增设机师科。至1916年，全校已有教师35人，学生508人，校园占地47.5亩，附设附属医院（宝隆医院）、实习工厂，具备了一定的办学规模和实力。

1917年3月，法国军队以同济医工学堂不得在上海法租界开办为由，强令该学堂解散。自此，该学堂转由中国人接办，改称私立同济医工专门学校。1924年5月改称国立同济大学。同济大学设医学院、工学院、理学院三院，附设机师学校、高级中学、德文补习所及实习医院、实习工厂等，成为中国的著名高等学府。从同济德文医学堂到国立同济大学初期，学校始终显示出德国教育的特色。一是教师多系德国学者。据统计，在1916年的35名教师中，德籍教师占了26人；^①在20年代大学部的30名教师中，德籍教师占了27人；^②至1937年尚聘有多名德籍教师任教。二是使用德语教学，教材多采自德国，学生的德文水平在全国学校中首屈一指，直至今日同济大学仍是留学德国人员的德语预备学校。三是学校的管理权由德国人操纵，在办学模式、方法和学风上带有德式学校的特点，如注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设备完善，学风敦厚谨严。譬如德文医学堂德文科主任沈德莱（Dr. Schindler）、德籍教师安勒司（Dr. Ehlers）等，教学态度极为认真严肃，举凡学生的起居饮食、坐立行卧、课业实习，无所不问，无所不管，动辄罚抄书10遍。^③这种管理尽管过于严厉苛刻，但于养成严谨的治学风格不无好处。办学几十年，学校培

^① 郭卫东主编：《近代外国在华文化机构综录》，第18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② 《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丙编，第53页。

^③ 胡颂平：《朱家骅年谱》，第4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9年版。

养了一批高级专门人才。至 1927 年，先后毕业医科学生 139 人，工科学生 174 人，其中很多人赴德国留学深造。^①

除上海同济大学外，德人在华所办学校较有名的还有上海“威廉皇帝学校”、青岛礼贤甲种商业学校、青岛德华特别高等分科学校、天津德华学校、汉口德华学堂等。

“威廉皇帝学校”原名上海德国学堂，一战期间其房产被中国没收，战后发还房产，1924 年开始恢复上课，称“威廉皇帝学校”，程度相当于中等专科学校。1932 年起获上海市政当局的补助，1935 年在校学生达 265 人。

青岛礼贤甲种商业学校原名德文学堂，1900 年由德国同善会牧师花之安创办，不久由卫礼贤接任，定名礼贤书院。1919 年改为礼贤甲种商业学校，1923 年改为中学。1931 年在中学内设高级工程科，后又增设高级德文科、高级制图科，培养土木建筑和德语人才。

青岛德华特别高等分科学校位于青岛原黑兰兵营旧址，故又称黑兰大学，1909 年建成。学校设有工、农、医、法四科，学制分别为三至五年。教员多为德国人，教学多用德文，经费和器材主要来自德国的捐助，在校学生约二百人。一战爆发后，该校停办，部分师生归并到上海同济医工学堂。

天津德华学校 1910 年创办，是一所女子学校，设小学、初中部。一战后该校由天津教育界知名人士李金藻接办，改为大营门中学。

汉口德华学堂 1908 年由一德国传教士创办，1919 年中国政府接办，改名汉口中学。1928 年德国又收回产权，出让给汉口天主教堂，更名私立上智中学。

一战后德国人在华的教育活动，由于材料的局限，我们只能叙述如上，实际情况可能还要丰富得多。

^① 季啸风主编：《中国高等学校变迁》，第 382 页，华东师大出版社 1992 年版。

而这一时期在华德国人的文化活动，除办学外，科技交流是另一主要内容。1923年，西门子中国公司经理勃吕歇尔博士(Dr. Bruecher)成立了“德国工程师中国协会”，得到私人、国家、公共机构的资助，并对中国的经济立法产生很大影响。此外，上海的德国医生还组成“德国医生联合会”，开展医学交流，也产生较大影响，东北的30名医生曾结社加入此会。^①留学归国的朱家骅，在出任中山大学代理校长期间，先后延聘德国的医学、地理学、物理学、化学、农学等学科领域的十几名知名教授来中山大学任教，传播了德国的先进科技，为中国培养了一些科技人才。辅仁大学、同济大学等学校也聘有一批德国科技专家，对中德科技交流做出贡献。

2. 中国学生赴德留学

在民国时期的中德文化交流史上，中国学生赴德留学是一个颇值得研究的课题。这不仅在于留德学生人数广大（在留日、留美、留法人数后，居第四位），更在于这个留学群体对传播近代德国和西方文化、加强推进中德文化交流所做出的突出贡献。

中国学生留德，始于晚清，主要出于洋务运动和建立近代海陆军的需要，人数少（最多几十人），学科单一（主要学军事及与军事有关的造船技术），影响较小。真正在留德史上形成规模并产生较大影响，还是在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20年里。其间，一战后的五六年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的七八年，可称为留德史上的两段黄金时期。

关于一战以后几年的留德情况，我们先看如下简表：^②

^① 丁建弘：《视线所窥，永是东方——中德文化关系》，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第133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② 据林子勋：《中国留学教育史》第442—443页表格编制，台北华冈出版有限公司1976年版。

年 类 别	1921年	1922年	1923年	1924年	1925年	合计
官费生	8	88	13	15	3	127
自费生						112

据表格统计，从1921年至1925年的五年里，中国派出的赴德留学生有239人。这个统计数字来源于南京国民政府后来的统计材料，远非此期留德生的全部人数。实际数字恐怕还要多一些。有人统计，仅1924年的柏林一地，就有中国留学生近千人。^①这在中国留德史上是空前的。

战后留德人数的激增，主要原因有二：第一，战后《中德协定》的签订及中德文化交流的加强，使大批学生留德成为可能。一战中，中国站在协约国一边，与德国是敌对国。战后，中德两国结束敌对状态，于1921年5月20日签订了新的邦交协定《中德协定》。从此，两国完全处于平等地位，德国政府把在华的发展重点转向文化和经济领域。留学，作为中外教育交流的主要形式，它随国家间关系变化而变化，随政府政策发展而发展。一战后中德关系的变化和德国对华政策的转向，理所当然影响到中国的留德状况。第二，战后德国通货膨胀极为严重，马克大幅度贬值，持美元等硬通货的外国人在德国生活的各种费用较战前大为减少，这种状况刺激了外国学生流向德国。中国学生大都较穷，出于生计考虑，他们不得不随各国物价的变动而更换留学国家。因此，当时留学欧美其他国家的中国学生，许多便转到德国留学。^②如林语堂，本在美国哈佛大学学习，由于经济原因1920年便转到德国莱比锡大学学习并获博士学位。

^① 丁建弘：《视线所窥，永是东方——中德文化关系》，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第134页。

^② 民国时期许多留学生曾辗转数国留学，这种经济原因恐怕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除上述原因外，德国的丰富文化、战后重建的热情及成绩，也吸引着大批中国青年把目光投向德国。少年中国学会的一批留德成员就认为，世界和平与人类幸福建立在各民族的“了解和同情”上，德国是一个西方文化大国，值得中国学习的东西很多，应“力谋中德两民族的了解和同情”，最佳的途径就是留学德国，沟通中德文化。^① 前面曾提到的王光祈，对德国战后重建时期“上下竞竞图存”深感钦佩，认为“国内青年有志者，宜乘时来德，观其复兴纲要”，^② 以便中国仿效。

1925年以后，德国的通货膨胀得到控制，马克回升，物价和生活费用跃居欧洲各国之首，加上欧洲的经济危机，许多外国学生又离开德国。中国学生居留德国人数开始大幅度减少：1925年为232人，1926年为214人，1927年为174人，1928年为153人。^③ 每年中国派遣留德学生数亦减少许多。

进入30年代后，留德学生数开始回升，进人民国留德史上的第二个高潮期。请见下表：^④

年份	1929	1930	1931	1932	1933	1934
人数	86	66	84	64	68	61
年份	1935	1936	1937	1938	1939	
人数	101	117	52	22	—	

从1929年至1938年，总共派出721人留德，其人数在留欧生中仅居留法生之后。与此同时，居留德国学生数也大幅度上

① 《留德学生中德文化研究会简章》，《少年中国》3卷2期，1921年9月1日。

② 《王光祈先生纪念册》，（台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19辑第188号，第35页，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③ 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第134页。

④ 此表据《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丁编第63页和陈启天《近代中国留学史》第374页编制，天一出版社1979年版。

扬：1934年约400人，1936年为500人，1937年为700人。^①

30年代留德学生数的增加，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南京国民政府的提倡和驱动。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和全国统一局面的形成，各项建设事业较前有较大发展，留学教育也开始走上正规发展的道路。1929年，国民政府颁布了《选派留学生暂时办法大纲》，1933年又制定了比较规范的《国外留学规程》，在严格管理的基础上鼓励留学，尤其注重理工科的派遣。而德国的医学、化学、机械工程等学科的确在世界上保持领先地位。这都促使大批青年学子涌向德国。

第二，大力吸收中国留学生是当时德国政府的一种政策。出于加强德国在华影响的目的，德国政府希望有中国学生留德。1936年2月，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亲自在国民党中央电台发表讲话，介绍德国的大学情况，欢迎中国学生前往留学。^②为此，德国还与中国互换留学生，以吸引中国学生前往。30年代中期留德的季羨林、乔冠华等人就是作为同德国学术交流处（DAAD）的交换研究生赴德留学的。

这样，国民党中央政府从国家建设的角度鼓励留德，德国政府出于加强在华影响的目的欢迎留德，两方面结合构成30年代大批中国青年留德的主要推动力。

造成30年代留德人数上升的第三个原因是当时弥漫在青年学子中的出国“镀金”思想。这里有两种情况。对于一般的国内学子来讲，“毕业即失业”，一个大学毕业生，如果没有后门，照样找不到工作。这是他们面临的严重社会问题。但如果一个人能出国一趟，镀镀金，一回国身价百倍，立刻成了“抢手货”。^③

^① 《我国留德学生之状况》，《兴介日报》1937年3月5日。转引自王奇生：《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第84页。

^② 《全国学术工作咨询处月刊》第2卷第2期，1936年2月。

^③ 参见季羨林：《留德十年》，第7页，东方出版社1992年版。

对于一些权贵子弟来讲，当然不存在失业问题，但出国镀金于将来发展更有好处。30年代，许多国民党显要的子弟纷纷到德国留学，如蒋介石的儿子蒋纬国、戴季陶的儿子戴安国、居正的儿子居伯强以及孔祥熙、宋子文、商震等的亲属，都聚集在柏林，便是出于此种目的。第四，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着力于军事建设，在聘请大批德国军事顾问训练军队的同时，也选派一些现役军官赴德深造，如邱清泉、周鸿恩、陈介生等人。这也扩大了当时的留德队伍。

抗日战争爆发后，留德教育由盛转衰。不少留德生纷纷辍学归国，而赴德者寥寥无几。1937年为52人，1938年为22人，德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赴德留学完全中止。不得已而居留德国的中国学生战后也陆续撤回。

中国留德教育的发展历程大体如上。

这些留德学生主要集中在柏林、慕尼黑、耶拿、达姆施塔特、布伦瑞克、汉诺威、哥廷根等城市的大学和工科高等学校学习。所学专业主要是医学、化学、生物学、工程技术、地质学等理工科，极少部分人学习人文社会科学。据统计，1919年至1933年间总共有265名留德学生获得博士学位，理工科占了225名，其中159名医学博士，49名数理化博士，11名工程学博士。而学人文社会科学的总共只有40名^①。又据1937年的统计，在700名留德学生中，50%学习化学、机械和电机，40%学习医学和陆军，其余只有10%学习文科。^②另据袁同礼的统计，自1907年至1961年间，中国留德学生共有732人获得博士学位，其中

^① 丁建弘：《视线所窥，永是东方——中德文化关系》，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第135页。

^② 《我国留德生之状况》，《兴介日报》1937年3月5日。转见王奇生《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第85页。

最多的是医学博士，其次是数理化和工程学博士。^① 这种状况是和当时德国上述学科在国际上的先进地位相符合的，也和民国以来知识分子中流行的“科学教育”、“科学救国”思想相呼应，当然也和南京国民政府注重理工科的留学政策的驱动相关联。

无论是学理工，还是学人文社会科学，留德生大都受到德国最好的教育。德国许多杰出的学者教授把自己的研究心得和生平绝学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中国弟子，表现出学术无国界的高尚敬业精神。如后来为新中国的核科学技术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著名核物理学家王淦昌、何泽慧，30年代分别在德国柏林大学和高等工业大学学习，受到德国第一流物理学家的指导，为他们后来的核研究打下了良好基础。后来成为中国著名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的杨钟健，20年代在慕尼黑大学地质系学习，在德国学者的指导下，撰成中国第一部古脊椎动物学专著，从而把这一学科从德国引进到我国。哲学家张君勱，五四前后曾得到德著名哲学家、西方生命派哲学重要代表人物奥伊肯的亲传，师徒还共同研究，合作撰书，对张君勱的学术思想影响甚深。哲学家张颐、贺麟等人，也都受到过当时德国研究古典哲学大家的指导和点拨。30年代至40年代在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和比较语言学的季羨林更是受到西克教授、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等梵学和比较语言学大师们的悉心教诲，耳提面命，成为中德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话。

德国学风，一向严谨求实，对学生要求较高。学理工的不仅要学习理论知识，还要在工厂、药厂、矿山等地方工作实习，边学习边工作边研究；学人文社会科学的则要掌握多门语言，也很不易。尤其要获得博士学位，除主系外，还要修习两个副系课程，论文要求就更严格。据季羨林先生讲，德国大学对论文要求

^① A Guide to Doctoral Dissertation by Chinese Students in Continental Europe, 1907—1961.

十分严格，看学生的能力，主要是通过论文。论文题目一般都不大，但必须有新东西才能通过。而中国留学生大都学习努力、刻苦钻研，表现出强烈的求知欲望和顽强的拼搏精神。因此，博士论文通过率是很高的，许多论文还受到德国著名学者的高度评价。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中国学生以自己的勤奋和聪明才智赢得德国师生的尊重。据南京国民政府 40 年代的调查，大部分留德生“均真正埋头苦干，多数同学能在德工作者，皆受人相当敬重”。^①

也有一些留德的纨绔子弟，情形则截然相反了。季羨林先生初到柏林时，就亲见他们游手好闲的情景。他们热中的话题，不是怎样去跳舞，就是国内某某人做了科长、司长了。他们既不用上学听课，也用不着说德语，留德几年，只需会“早安”、“晚安”、“谢谢”、“再见”四句简单用语，语言之功即毕矣。季羨林为此曾动念头要写一部《新留西外史》。^②当然，这种人是极少数的。

留德学生的生活，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相当苦的。战争期间，欧洲各国邮政与金融机关陷入停滞状态，汇款不能收到，存款不能提取，食品短缺，还要躲避战火，苦不堪言。一战后的最初几年，欧洲经济凋零，国内所给经费又很少，留德生也着实过了一段苦日子。20 年代后期和 30 年代，情况有所好转。1931 年，国家公费派出的留德生，每月经费 350 马克，1935 年增加到 800 马克，这种官费生在德国可以过很舒适的生活。相比之下中德间交换的留学生，所给经费要少得多，如清华与德学术交换处的交换生，月费只有 120 马克，只够勉强支付食宿费用。^③ 自费

① 《1946 年留德返国学生登记表》，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 季羨林：《留德十年》，第 38—40 页，东方出版社 1992 年版。

③ 《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丁编，第 66 页，季羨林：《留德十年》，第 10 页。

生除少数官宦子弟，绝大多数留学生的生活就更苦了。他们在紧张学习之余，还要四出打工为生计奔波，否则就要饿肚子。

3. 留德生与中德文化交流

留德生大都学有所成。他们归国后，在社会的广泛领域内发挥了重要作用，许多人成就卓越，成为中国现当代史上的著名人物。如周恩来、朱德、乔冠华等人，^① 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或高级干部；朱家骅、邱清泉、蒋纬国等人，^② 则成为国民党的重要人物。他们对现代中国的社会进程产生重要影响。不过，留德后成为重要政治人物的毕竟是少数人，绝大多数留德名人，其成就主要还在文化领域。他们在归国后的漫长岁月里，努力传播德国和西方的先进文化，对推动中国学术领域的发展，促进中德文化交流，做出了突出贡献。以下从四个方面详细介绍。

(1) 促进科技发展。中国现代科技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果。在引进西方现代科技的过程中，归国留学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其中民国时期留德生的作用相当显著。为了清楚地说明民国时期留德生与中国现代科技的关系，我们以新中国成立后三次（1955年、1957年、1980年）选出的469位中科院学部委员为资料，统计出其中有留德经历科学家的情况如下：

^① 周恩来 1923年在哥廷根学习；朱德 1923年至1926年在哥廷根学习；乔冠华 1935年在柏林学习。

^② 朱家骅 1914年至1924年期间，曾两次留德学习地质学，1922年获博士学位；邱清泉 1934年至1937年在德专攻军事；蒋纬国 1936年至1940年在德学习德文、军事。

中科院学部委员民国时期留德情况一览表^①

姓名	留德时间	留德学校	学习专业	备注
王淦昌	1930—1934	柏林大学	高能物理	获博士学位
何泽慧	1936—1939	高等工业大学	核物理	获博士学位
	1940、1942	柏林西门子弱中子实验室、海德堡皇家学院		工作
周培源	1928—1929	莱比锡大学	物理	留美物理博士，此时在德从事研究工作
饶毓泰	1929—1932	莱比锡大学	物理	留美物理博士，此时在德从事研究工作
胡世华	1936—1941	德国敏思特大学	数学	
庄长恭	1931	哥廷根、慕尼黑大学	化学	留美化学博士、教授，此时在德从事研究工作
吴学周	1932—1933	达摩城高等工业学校	化学	留美博士，此时在德从事研究工作
邢其毅	1936—1937	慕尼黑大学	化学	进行博士后研究
汪猷	1935—1939	慕尼黑大学	化学	获博士学位
张大煜	1929—1933	德累斯顿大学	化学	获博士学位
张青莲	1934—1937	柏林大学	无机化学	获博士学位
赵宗燠	1935—1939	柏林工业大学	化工	获博士学位
黄鸣龙	?—1924	柏林大学	有机化学	获博士学位
梁树权	1934—1937	慕尼黑大学	分析化学	获博士学位
虞宏正	1936	莱比锡大学	胶体化学	教授进修
贝时璋	?—1928	土宾根大学	生物学	获博士学位
庄孝惠	1936—1942	慕尼黑大学	胚胎学	获博士学位
钟惠澜	1934—1936		医学	

^① 根据《中国科苑英华录——新中国之部》（上、下册，科学普及出版社1985、1988年版）统计。

姓名	留德时间	留德学校	学习专业	备注
盛彤盛	1932—1938	柏林大学	医学、兽医学	获博士学位
梁希	1923—1927	塔耶脱高级林学院	林业科学	
梁伯强	1922—1925	慕尼黑大学	病理学	获博士学位
蔡邦华	不详	昆虫研究院、慕尼黑大学	昆虫学	教授进修研究
蔡翹	30年代初	法兰克福大学	生理学	留美博士, 进修
王之卓	1935—1939	柏林工业大学	航测学	获特许工程师和博士学位
乐森珺	1934—1936	哥廷根、马尔堡大学	地质学	获博士学位
孙云铸	?—1927	哈勒大学	地层古生物学	获博士学位
李春昱	1934—1937	不详	地质学	获博士学位
陈永龄	?—1939	柏林工业大学	大地测量学	获博士学位
杨钟健	1923—1928	慕尼黑大学	古生物学	获博士学位
赵九章	1935—1938	柏林大学	气象学	获博士学位
夏坚白	1935—1939	柏林工业大学	测量学	获特许工程师和博士学位
谢家荣	1929—1931	弗茵堡大学等	地质学	教授进修
斯行健	1928—1933	柏林大学	古植物学	获博士学位
支秉彝	1935—1940	莱比锡大学	电信工程	获博士学位
毛鹤年	1936—1939			工作进修
孙德和	1935—1943	柏林高等工业大学、阿亨工程大学	钢铁冶金	获博士学位
李文采	1933—1939	德累斯顿高等工业大学	钢铁冶金	获博士学位
李国豪	1938—1942	达城工业大学	桥梁工程	获博士学位

姓名	留德时间	留德学校	学习专业	备注
张维	1938—1944	柏林高等工业大学	工程力学	获博士学位
徐上高	1937—?	柏林工业大学	电机	获博士学位
张德庆	1927—1929			工作进修
龚祖同	1934—1938	柏林技术大学	应用光学	获特许工程师
靳树梁	1937—1938			考察德钢铁业
魏寿昆	1931—1936	柏林工业大学	冶金学	获博士学位

在 469 位学部委员中，有留学经历的 389 人，其中 44 人是留德生，占有留学经历之学部委员的 11.3%，仅在民国时期留美、留英生之后而居第三位。

学部委员（即今天的科学院、工程院院士）是国家设立的科技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代表着中国科技队伍的水平 and 声誉。留德生在中科院学部委员中所占的比例，反映了他们在中国科技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事实也正是如此。这些留德生（也包括没有进入学部的其他留德科学家）将德国先进的学科领域及科学的思维研究方法带回国内，致力于中国现代科技的开创和发展，获得了惊人的学术成就。如核物理学家王淦昌、何泽慧，以在德所学高能物理、核物理学为基础，创造性地开展 work，为我国核武器的研制和核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有机化学家黄鸣龙，他所改良的一种还原法，被称为“黄鸣龙还原法”，已编入各国有机化学的教科书中；有机化学家汪猷，成为我国抗生素研究的奠基人；病理学家梁伯强，对中国近代病理学的奠基和发展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气象学家和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在德完成的博士论文被认为是新中国建国前理论气象学研究上最重要的收获，此后他又为

研制中国的人造卫星做出重要贡献；杨钟健将古脊椎动物学引入中国；斯行健成为中国古植物学研究的先驱者；著名桥梁力学专家李国豪，为武汉、南京长江大桥的建造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他的某一理论被国内外学者称为“李氏理论”。总之，在化学、医学、生物学、物理学、地质学、工程技术等学科领域，留德的科学家们都做出了重大贡献，于中国现代科技的发展功不可没。^①

(2) 传播德国哲学和文学艺术。资料统计显示，民国时期赴德学习人文学科的留学生并不多，但却产生一批声誉卓著的大师级学者，尤其在哲学领域。这恐怕主要与受德国丰富的哲学遗产影响有关。关于德国哲学在中国的传播，我们在前面已做了详细阐述。可以看出，传播德国哲学的主力军是一批留德学生，其佼佼者有蔡元培、张君勱、张颐、宗白华、李石岑、郑昕、洪谦、贺麟等人。他们传播德国哲学的范围相当广泛，几乎涉及从古典到现代的所有大哲学家。传播的方式既有原原本本的原著翻译，也有扎扎实实的深入研究，还有大学讲坛上的悉心讲授。这些传播尽管存在一些缺失，如大都以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观为基础，或新黑格尔主义，或新康德主义，或维也纳学派观点，而较少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上进行分析研究；又如原著翻译的数量较少，译本质量与新中国成立后的某些译本相比还不高，等等。但这些传播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第一，康德、黑格尔等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来源之一，它们的传播有助于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全面的理解；第二，德国现代哲学包括尼采、奥伊肯、杜里舒等非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传入，也是人们在寻求西方真理中的一种选择，对丰富中国文化，从中汲取有益营养，不无好处；第三，留德生民国时期直接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工作虽然不多，但也构成新中国成立前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组成部分。

^① 参阅《中国科学家传略辞典》现代第一辑、第二辑，1980年印行。

留德生既是传播德国哲学的中坚力量，同样也是译介德国文学艺术的主力军。德国的文学艺术辉煌灿烂，和哲学一样具有世界影响。留德生深受其浸染并以介绍传播之为己任，是理所当然的。在此过程中，马君武、冯至、杨丙辰、梁宗岱、刘盛亚、王光祈、萧友梅、青主等人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德文学艺术交流史上写下光辉的篇章。对此，我们在前面已有详细介绍，这里不再赘述。

(3) 引进东方古代语言。长期以来，德国的梵文和比较语言研究的成就举世公认，一些东方古文字就是由德国学者揭开奥秘的。而中国古代西北史地的研究需要通晓多种语言，西域出土文书相当一部分是由这种语言写成的。由于中国历来缺乏这方面的研究，因此民国以来便有一些中国学生赴德学习这种科目，^①颇收到“人耕我获”之效，涌现出陈寅恪、韩儒林、季羨林等数位大师级的学者。

陈寅恪曾先后两次（1910—1911年、1921—1925年）赴德柏林大学学习，亲炙德著名的印度学家海里·吕德斯教授（Heinrich Lueoters, 1858—1943年），在他的指导下攻读梵文、巴利文等东方古代语言。学习的方法是用西方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即用一种文字的佛经与同一佛经的不同文字译本相比较，掌握其语言规律。^②

季羨林 1935 年就读于哥廷根大学，那里有研究梵文和比较语言学的传统，一些最伟大的梵学者都曾在那里任教，可谓“梵学天空，群星灿列”。^③季羨林在这里先后师从于著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E. Wald Schmidt, 1897—1985年）和著名的

① 张国刚：《德国的汉学研究》，第 75—76 页，中华书局 1994 年版。

② 胡守为：《陈寅恪传略》，《晋阳学刊》编辑部编：《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 7 辑第 237 页，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③ 季羨林：《留德十年》，第 49 页。

印度学、吐火罗学大师西克教授 (E. Sieg), 学习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 (我国古代新疆的焉耆——龟兹语)。学习法亦是“典型的德国式”的, 或死抠语法 (学梵文), 或直接读原文 (学吐火罗文)。

韩儒林于 30 年代初到比利时和巴黎攻读欧洲中世纪史和蒙古史、中亚史, 但在 1936 年回国前主要在柏林大学深造, 学习蒙古文、藏文、突厥文和波斯文, 当时在那里执教的是著名的汉学家和蒙、藏文学家海尼士 (E. Hacnisch, 1880—1966 年)。

有如此卓越的古代语言学大师任教, 加之陈、季、韩等人的勤奋努力, 因此德国学者的“绝学”便成为中国学生手中的利器。他们通晓了多种古代语言, 并在学习语言中熟习了佛典。有此基础, 在后来的史学、古代语言学和佛学研究中便显示出自己的优长之处, 为他人所不能及。如陈寅恪, 他对古文字和佛经的学识, 使后来发现的梵文、西夏文等不易辨识的古文字残经断片, 到他手上便能迎刃而解; 他撰著的《蒙古源流》、《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夏梵藏汉合璧校释序》等论文, 反映了他利用多种文字史料进行文献考释的功夫, 所论极为精辟。季羨林在德学习时所撰博士论文即受到世界梵文学界的瞩目, 其后写作的《印度古代语言论集》、《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 引证大量的东方古文字材料和佛典原始资料, 匡正了一些国际学者的错误结论, 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韩儒林关于突厥三碑的考释和蒙古史、元史研究, 因有东方古代语言文字材料作根底, 亦为他人所不逮。

(4) 成立中德文化交流组织。许多留德生因长时间在德学习工作, 对德国文化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 希望将其介绍给祖国, 同时也希望将祖国的优秀文化遗产介绍给德国。为了搭起中德文化联系的桥梁, 他们在留德期间或学成归国后, 便致力于成立一些中德文化交流组织。

民国时期最早成立的中德文化交流组织是“留德学生中德文

化研究会”，其成员主要是“少年中国学会”中的一批留德青年，包括王光祈、宗白华、郑寿麟、魏嗣銮、孙少荆、张梦九、詹学时、陈鹤鸣、金其眉、吴屏、王达生等人。该会以“介绍研究中德两国文化为宗旨”，希望“东西两种文化结婚”，以“产生第三种文化”。^①本着这种精神，他们一方面“随时发表德文著述，介绍中国学术上、社会上、政治上的思想或消息”，另一方面向国内大量译寄介绍德国的文章、消息。仅从《少年中国》杂志发表的文章看，就曾介绍过叔本华、尼采、歌德等人的生平和著述，刊登过爱因斯坦的亲笔信，介绍过留德生在德生活学习的日记、书信，等等，内容相当丰富。魏时珍、王光祈等人都曾留下记载留德生活的日记，是研究民国早期留德史的珍贵史料。^②

继“留德学生中德文化研究会”后，1933年，部分留德生又和在北京的德国汉学家一起共同成立了一个“中德文化协会”。1935年更名为“中德学会”。发起人是曾参与组织“留德学生中德文化研究会”的郑寿麟。学会得到他的所有私人藏书，后来又得到德国学术交换处（DAAD）的支持，成为一个既介绍德国学术文化、又研究传统中国文化的学术团体。学会出版了德文版学术杂志《汉学集刊》（《Sinologische Arbeiten》），并在30年代推出21种德国学术译著，如《德国史纲》、《德国民族性》、《汤若望传》、《历史之地理基础》、《哲学译丛》、《拉奥空论》等，在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学会还编译了《北平中德学会会务概况》、《北平中德学会工作报告》、《北平中德学会工作年报》分别以中德两种文字出版。^③

以上就民国时期留德生的总体状况及留德生与中德文化交流

① 《留德学生中德文化研究会简章》，《少年中国》3卷2期，1921年9月1日。

② 魏时珍《旅德日记》见《少年中国》3卷4期，1921年11月1日；王光祈《旅德存稿》1926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

③ 北京图书馆现存从1935年至1941年的中德学会工作报告、年报。

的关系做了大致阐述。可以认为，民国时期的中国留学生是中德文化交流的中坚力量。他们在推进中德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各展其才，勤奋努力，终于成就了学术大业，在中国文化史和文化交流史上留下自己光辉的名字。

四、德国的汉学研究与中国文化在德国的传播

1. 德国汉学学科的建立^①

德国的汉学研究起步并不晚。早在 19 世纪，库尔兹 (Heinrich Kuze)、帕拉特 (Johann Heinrich Plath)、硕特 (Wilhelm Schoot)、G·嘎伯冷兹 (Georg Von der Gabelentz) 等学者怀着浓厚的兴趣治理汉学，取得相当一批成果。然而，这个时期的汉学只是德国东方学范畴中的附属品，汉学研究只是东方学者兼任的副业，德国汉学还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建立起来，相比之下，欧洲其他国家的情况要好得多：法国早在 1815 年就在法兰西大学设立了汉学讲座；俄国 1855 年在彼得堡大学设立了汉学讲座；英国 1875 年由理雅各 (James Legge) 在牛津大学、1876 年由威妥玛 (Thomas Wade) 在剑桥大学先后创建汉学系；荷兰 1875 年由萨力赫 (Gustav Schlegel) 在莱顿大学创设汉学研究院。“德国汉学的相形见绌是十分明显的”。对此，一些富有远见卓识的德国学者提出尖锐批评，指出在最小的德国大学里都有印度学和阿拉伯学的教授职位，其中大多数还有埃及学和亚述学，但整个德国竟然没有一个教授讲座是中国学专业，这和中国学研究的重要性太不相称了！与一批学者提出批评意见大致同时，一支普鲁士探险队先后几次在吐鲁蕃地区进行考古发掘，收集到大批文物和文书，其中不乏汉文文献。如何估计这批文书的价值并进行研

^① 参阅张国刚：《德国的汉学研究》，中华书局 1994 年版。

究，向德国汉学界提出了挑战。汉学对于中亚研究的意义，提高了它在德国学术界的声誉，使得在德国大学建立学术性的汉学研究机构愈加显得迫切和必要。

在各方面的呼吁下，德国的汉学研究终于出现大的转机。1912年，柏林大学汉学讲座设立，荷兰莱顿大学的学者高延(J. J. Maria de Groot)被聘为首任教授兼所长。高延之后，福兰克(Otto Franke)、海尼士(E. Haenisch)先后主持该所的研究与教学工作，使柏林成为德国20世纪上半叶汉学研究最活跃的地区，学生数显著增加，以蒙古史、满清史和满文研究为主要范畴的成果大量涌现。

1918年，汉堡殖民学院联合汉堡的其他几个学术机构成立汉堡大学，原学院的“东亚语言和历史研究所”也分为“中国语言与文化研究所”和“日本语言与文化研究所”。汉堡大学中国所将汉学研究 with 汉语教学合二为一，成为继柏林大学汉学所之后的又一重要的汉学研究机构。福兰克、佛尔克(Alfred Farke)、颜复礼(Fritz Jaeger)先后担任该所的讲座教授。

1922年，莱比锡大学也设立了汉学讲座，著名汉学家孔拉迪(August Conrady)任汉学教授。孔氏在莱比锡数十年，培养了一大批弟子，创造了以东方语言学为基础的汉学研究特色，涌现出一大批研究成果，在二三十年代的德国汉学界享有一定声望。

1925年，法兰克福大学得到基金会的赞助也设立汉学专业。一生致力于沟通中德文化尤注重向德国译介中国古代经典的卫礼贤(Richard Wilhelm)被聘为首任讲座教授。作为20世纪初德国最重要的汉学家，卫礼贤在法兰克福继续他原在中国时即已开始的汉学研究事业，获得巨大成功。法兰克福大学的汉学研究亦因卫礼贤的存在而一度兴旺。

与法兰克福大学成立汉学专业大致同时，哥廷根大学聘请了几位获得教授资格的特别讲师讲授中文，30年代初又由孔拉迪的学生哈隆(Gustav Haloun)建立了汉学研究所并任所长。哈隆

在古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方面均有造诣，其名作《中国人知道大夏人或印欧人始于何时》、《月氏考》享誉国际士林。他对哥廷根大学的另一重要贡献是汉学图书建设。当年在哥大学习梵文和比较语言学的季羨林先生，因此时在哥大汉学所兼职（讲授中文），曾替他向中国许多旧书店订购中国古籍。由于哥大汉学所藏书丰富，招徕了不少汉学家来此看书。^①哥廷根大学因哈隆的存在成为30年代德国汉学研究的又一基地。

“在德国大学里，教授是最高主宰。专业的设置是以教授为中心的。只有设置了讲座教授职位，才称得上建立了一个学科专业。”从1912年至30年代，兴起于柏林、汉堡、莱比锡、法兰克福和哥廷根诸大学的汉学讲座及研究所，标志着德国汉学学科在历经长期曲折后终于建立了起来。

在汉学教研机构相继设立的同时，关于东亚和汉学的杂志纷纷创刊。1916年，德中协会创办了《中国档案》，旨在“唤起德中双方相互间的兴趣”；1919年，“汉堡—不来梅协会”、“柏林远东协会”等机构编辑出版了《东方舆论》，设置“东亚经济”、“立法和法律”、“文化、艺术和科学”等栏目，重点报道中德经贸情况；1923年，《亚洲学刊》在莱比锡创刊，是当时以研究汉学为主的学术性刊物；1926年，卫礼贤的“中国学院”创办的《中国学报》问世。这些杂志的创办，为日益壮大的德国汉学家队伍提供了在学术领域自由耕耘的园地，为德国汉学学科的建立和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20世纪上半叶的德国汉学研究随着德国汉学学科的建立，取得了长足进步，其兴盛情况已不亚于其他任何国家。这除了德国汉学家本人的主观努力外，最主要的原因恐怕应归于一战后中德关系的巨大改善和中德文化交流的不断加强。此外亦和欧战后的社会状况不无关系。欧战使西方文明所遭受的灾难和混乱不仅

^① 季羨林：《留德十年》，第63页。

表现在物质贫困和社会矛盾尖锐，还表现在全欧洲笼罩着“世界末日”、“文明灭绝”的悲观主义情绪。用东方古老文化来“救拔”西方，成为西方许多思想家所追求的目标。德国汉学兴盛于一战后的二三十年代，当然也就不为无因了。

2. 沟通中德文化的卫礼贤

德国汉学的兴盛是靠一批成就卓越的汉学家支撑的，卫礼贤就是20世纪初叶德国最重要的汉学家之一。他把毕生精力贡献于译介中国古代经典、沟通中德文化的伟大工作中，建树了不朽业绩，赢得国际汉学界及热爱中国文化的人们的普遍尊敬。

卫礼贤原名理查德·威廉（Richard Wilhelm，1873—1930年），“礼贤”是他自取的汉名。1873年他出生在德国的斯图加特市，中学毕业后进入土宾根大学攻读神学。期间，表现出对哲学、文学、艺术的强烈兴趣和热爱，以莎士比亚、斯宾诺莎、歌德、贝多芬为代表的欧洲进步的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对他影响甚深。尤其歌德的作品和思想，更陪伴了他一生，影响了他一生。据他的同学和朋友奥托教授回忆，卫礼贤学生时代就喜爱歌德的《中德四季晨昏杂咏》的诗句，这对他一生的事业产生很大影响。^①歌德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和赞颂，成为卫礼贤“中国文化缘”的早年基础。

1899年，卫礼贤作为德国同善会征募的传教士来到中国的青岛。那时的青岛还是一个荒芜的小渔村，卫礼贤连一句中国话也不会讲，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却很快有了一些“带根本意义”的发现，如中国压根儿就不存在需要他去感化或惩戒的异教徒，相反倒有着悠久而发达的值得尊敬的精神文化。这一发现的确是相当重要的，它使得卫礼贤从此不是致力于传经布道，而是

^① Salome Wilhelm: Richard Wilhelm——Der geistige Mittler Zwischen China und Europa, Eugen Diederichs Verlag, Duesseldorf Koeln, 1956.

学汉语，读古籍，接触中国民众，熟习中国历史与现状。在华二十多年，他对本职传教工作毫无作为，没有发展一名教徒，自己却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服膺者和传播者。中国文化的魅力征服了卫礼贤，使他与之结下了不解之缘。

卫礼贤一生两次旅华（1899—1920年、1922—1924年），绝大部分时间寓居青岛。在世纪之交青岛成为德租界后，许多政坛失意和不满时局的名流把这里作为避风港。民国成立后，更有一批前清的孤臣遗老来到这里。卫礼贤与他们有着极为密切的交往。卫礼贤夫人回忆录中提到的中国人就有周馥、周叔弼父子，劳乃宣、赵尔巽等人。这些人中国旧学根底深厚，卫礼贤从中获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染和研究的指导。如曾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的晚清名儒劳乃宣，就长期成为卫礼贤家中的座上客，被卫尊为老师和体现儒家思想精神的活着的孔夫子。正是在劳乃宣指导下，卫礼贤开始钻研《易经》，前后花费10年功夫，将这一古奥难懂的经典译成德文出版，并撰写了一批释《易》文章，成为西方首屈一指的《易》学家。又如康有为和辜鸿铭，也是卫礼贤家中的常客。康是晚清有名的今文经学大家，辜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决维护者。他们对卫礼贤的影响也是很深的。这些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对卫礼贤研究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推波助澜，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卫礼贤无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维护者和传播者，但他不主张以中国文化取代西方文化。他认为，“在当今现有的所有文化中，西方文化和中华文化各代表一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类型。它们各自都在深刻的意义上独立不倚，都从自己独特的方面深入到了共同人性的本源。因此它们特别适合于相互影响，相互提高，相互促进。”^①他的理想是通过中西文化的交流和融通，以中国精神的

^① Salome Wilhelm: Richard Wilhelm—Der geistige Mittler zwischen China und Europa.

诸多方面补西方文化中之不足，最终造成人类共同的世界新文化。这种开放的文化观是卫礼贤致力于传播中国文化的内在动力。

总之，在德国的早年教育，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深刻影响以及本人开放的文化观念，构成卫礼贤一生努力译介中国经典、沟通中德文化的综合原因。

卫礼贤对中德文化交流的最大贡献是将中国古代经典介绍给德国和西方。1910年，他在耶拿的一家出版社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德文译著《论语》。此后，又陆续翻译出版了《道德经》（1911）、《列子》（1912）、《庄子》（1912）、《孟子》（1916）、《大学》（1920）、《易经》（1924）、《吕氏春秋》（1928）、《礼记》（1930）等中国古代哲学的几乎所有重要经典。这些译著，行文准确、顺畅、典雅，质量很高，受到德国和西方广大读者欢迎，许多译本一版再版，流传至今。尤其是他穷十年之功译成的《易经》，更先后译成英、法、荷兰、西班牙、瑞典、丹麦等多国文字，享誉西方世界。

中外学者高度重视卫礼贤的译著。我国学者陈铨在《中德文学研究》一书中辟专章谈卫礼贤的翻译，对他译的以关于庄周的传说为题材的《蝴蝶梦》和《辟棺》两个剧本备加称颂；还有学者专文评价卫氏及其译著，认为他的德文译本与英国汉学家翟理斯、理雅各的英译文相比，“非但毫无逊色，而且更为顺达。真是又信又达又雅。原因是他能体验华人的逻辑，深悉汉文的风格”。^①德国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黑塞（Hermann Hesse）不但自己喜爱卫译著作，还经常向友人推荐。从1912年至1932年的20年间，每有卫译问世，他都要写文章加以评述。

卫礼贤在翻译中国经典的同时，还撰写了大量介绍中国思想文化的论著，仅专著就有十几种。主要是：《孔夫子在人类杰出

^① 方志彤：《卫礼贤教授及其著作》，《研究与进步》，1939年1卷4期。

代表中的地位》(1903)、《中国：国土与自然》(1911)、《中国人的生活智慧》(1922)、《孔子的生平及其著作》(1925)、《老子与道家》(1925)、《中华之魂》(1926)、《中国文学史》(1926)、《孔子与儒家》(1928)、《东亚，中华文化圈的变迁》(1928)、《中国文化史》(1928)、《中国哲学》(1929)、《中国经济心理》(1930)。这些著作是他多年来勤奋钻研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珍贵收获，功力深厚，深得中国文化之底蕴，在西方同样产生重要影响。其代表作《中华之魂》、《中国文化史》一出版即被译成英文和法文，尤其《中华之魂》在初版发行近五十年后，由联邦德国精印再版，仍受到人们的重视。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卫礼贤曾短期回国，后来在德国驻华使馆任学术顾问，离职后受聘任北京大学德国文学教授。在此期间，进行了一系列促进中德文化交流的工作。1922年是歌德逝世90周年，卫礼贤应邀做了多场关于歌德及其代表作《浮士德》的报告；1924年他应邀在北京大学做了关于老子、孔子和康德的伦理学比较研究的学术报告；他与张君勱合作编纂了《德英汉哲学辞典》；发起成立了中国留德学生后援会并担任该会主席；他举办“北京之夜”活动，邀请欧美学者和中国朋友前来欣赏中西音乐节目；他还联合中国学者罗振玉、王国维、沈曾植、辜鸿铭等人，筹建了“东方学社”，旨在沟通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科学的联系。

1924年，法兰克福大学哲学系授予卫礼贤名誉哲学博士，旋即聘请其担任该校新设立的汉学讲座教授。在旅华25年后，卫礼贤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离开了他作为第二故乡的中国。

回国后，卫礼贤在法兰克福大学主持汉学讲座，讲授中国历史、文化、哲学、艺术等课程，同时倾注最大心力，多方呼吁奔走，筹建“中国学院”(China Institute)。在包括蔡元培、杜里舒在内的中德著名学者的支持下，法兰克福“中国学院”于1925年11月正式成立，卫礼贤出任学院院长。在此后若干年里，中

国学院采取多种形式广泛传播了中国文化。

中国学院的主要工作之一是每年举行一次学术年会，邀请国内外学者参加，就中国文化进行研讨交流。年会规模盛大，内容丰富，吸引了包括德国学者杜里舒、马丁·布伯、作家黑塞以及瑞士著名心理学家容格（Carl Gustav Jung）等在内的大批关心中国文化之士。譬如，1926年的年会，重点讨论中国的文学艺术，应邀在会上做报告的就有中国的胡适（报告题为《中国的小说艺术》）、法国的伯希和（Paul Pelliot，报告题为《中国的戏剧》）、德国的鲍慈恩（Ernst Boerschmann，报告题为《中国的建筑艺术与景观》）等人。

中国学院另一项经常性的活动是举办关于中国绘画、陶瓷、剪纸、铜镜、碑刻拓片和建筑艺术的展览。如1926年举办的“中国艺术展”，包括“中国建筑艺术与景观”、“中国青铜器”、“东方手工艺品”等内容，且礼贤还在节目单上印上了“四海之内皆兄弟”及歌德的名言“东方和西方永远不再相隔”。又如1928年举办的中国书籍展览，展出了中国历代出版的图书、画谱及国外介绍中国的出版物共1400多种，参展的有包括苏联在内的欧美各国的31家图书馆、博物馆，19位私人藏书家和近百个出版社，是宣传中国文化的一次盛举。

中国学院的第三项重要工作是编辑出版《中国学报》（Sini-ca），发表学院内部及其他学者研究中国和中国文化的成果。此刊很快成为全德乃至全欧的汉学权威刊物之一。

除上述工作之外，中国学院还成为“中国留德学生之家”。1927年3月，学院邀请在德的所有中国留学生假期到法兰克福聚会，共有63位男生、3位女生出席。大家被安排在学生宿舍或中国学院成员家中住宿，除了听报告外，还有参观、郊游等活动，内容丰富，令人愉快。当年夏季，法兰克福为纪念贝多芬逝世100周年举行“音乐之夏”演出活动，中国学生再次汇聚法兰克福。8月上旬，是中国学院主持的“中国音乐周”。在这一周

里，除由卫礼贤等做了一系列关于中国音乐的报告外，还举办了
中国民族乐器展览。来自欧洲各国和德国各地的中国留学生们一
展身手，演奏了五天中国音乐节目。德国大地上响起了华夏古乐
之声，令德国听众耳目一新。

作为一名外国汉学家，卫礼贤无论对中国文化的热爱还是研
究传播中国文化的成就，都是无与伦比的，为中德文化交流树立
起一座丰碑。为此，他呕心沥血，积劳成疾，在处于学术研究的
黄金年龄时，就溘然长逝（1930年，享年57岁），令人叹惜。

卫礼贤毕生致力于向德国、西方传播中国文化，厥功甚伟，
影响巨大。对此，许多汉学家都有定评。瓦拉文斯（H.
Wairavens）博士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对中国的兴趣达
到了一个小高潮”，为此，“我们应该特别感谢卫礼贤，他有那么多
译作、论著，作了那么多学术报告”，还建立了中国学院，^①架起
了东西方联系的桥梁。著名汉学家福赫伯（Herbert Franke）指
出：“儒家和道家经典著作所反映的中国思想世界，（以前）一般
来说没有受到德国哲学界的重视，只有极少数哲学家在他们的著
作里或课堂上多少提及一点中国哲学。有一阵子读书人对中国思
想的兴趣变得浓厚起来，这首先要归功于卫礼贤。……他那数不
清的著作已经或多或少地把中国的形象印刻在德国读者的心中。
卫礼贤的作品从整个成就来看不会很快被超过，至今还没有更新
的中国古典哲学的德文译本问世。”^②德国当代汉学权威鲍吾刚
（W. Bauer）更进一步点明，是卫礼贤在“短短十年间的努力，
彻底改变了中国在欧洲的形象”，这种由卫礼贤所唤起的对于中
国古老文化的景慕之情，在德国人民中一直保持到了今天。^③联

① Hartmut Wairavens: Sinica und andere Periodische Publikationen des Frankfurter China Institut, Bibliographie und Register, 1925—1942, Muenchen, 1981.

② Herbert Franke: Sinologie an Deutschen Universitaeten, S. 17—18, Wiesbaden, 1968.

③ W. Bauer: Richard Wilhelm — Botschafter zweier Welten.

系到卫礼贤译介中国经典、沟通中德文化的可贵努力，这些看法都是可以成立的。

3. 福兰克、佛尔克等人的汉学研究^①

20 世纪上半叶的德国汉学界，群星灿烂，名家辈出。除卫礼贤外，福兰克、佛尔克、孔拉迪、海尼士也都是蜚声西方学术界的人物。

福兰克（Otto Franke，1863—1946 年）早年曾在哥廷根大学、柏林大学攻读梵文、法律和中文，后来作为外交译员被派到中国，先后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德国公使馆服务达 13 年之久。1903 年至 1907 年受聘任清政府驻柏林公使馆秘书，并在柏林大学取得教授资格。因此，福兰克可称是一个“外交官出身的汉学家”。1909 年，汉堡殖民学院创办东亚语言与历史研究所，福兰克应聘为教授并担任所长。此后又出任汉堡大学中国所、柏林大学汉学所教授兼所长，并荣膺汉堡“德国学者联盟”主席和柏林普鲁士科学院院士，成为德国汉学界的权威人物之一。

福兰克为德国汉学学科的建立和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1910 年他曾发表长文《德国汉学学科》，尖锐批评德国大学忽视汉学的保守态度，呼吁在大学设立汉学专业，对德国汉学学科的建立起了“催生”作用。在汉堡中国所，他曾礼聘清末最后一位翰林商衍鎏前来任教，对这里的中国学教学科研做出了贡献。在主持柏林大学汉学所后，他努力开拓，吸引了大批学生前来就学，当年留德的中国学生蒋复聪、俞大维、姚从吾等人，都曾参加过他的讨论班课程；30 年代后在德国学术界崭露头角的汉学家，也多半对他执弟子礼。柏林之所以成为德国汉学的研究中心，和福兰克的工作是分不开的。

福兰克一生著作等身，共发表文章和专著二百多种，书评一

^① 参阅张弼刚：《德国的汉学研究》，中华书局 1994 年版。

百多篇。其中最负声誉的是五卷本《中国通史》。这部著作以原始中文资料、正史和《资治通鉴》为依据，讲述了中国从先秦到五代辽宋金元的历史，并对所涉及的史料进行了详细考释，功力深厚，富有真知灼见，在西方第一次用丰富的历史事实纠正了以往错误的中国历史知识，把德国的中国史研究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对此，德国汉学界评论说：“我们的中国历史知识直到不久前还几乎全靠冯秉正（De Mailla）编纂的《中国通史》，这本大部头的书其实只是充满了儒家道德说教的朱熹的《通鉴纲目》的改编”，而“每位对历史感兴趣的人通过读福兰克的这部著作，一定会毫不犹豫地确认：中国历史其实是整个人类发展中最重要、最富有教育意义的和最吸引人的一部分”。^①

同福兰克一样，佛尔克（Alfred Forke，1867—1944年）也是一位外交官出身的汉学家。他早年曾在日内瓦大学和柏林大学学习法律并获博士学位，同时学习了柏林大学东语所的中文课程。1890年来到北京公使馆供职，奠定了丰富的中国文化基础。1903年，他辞职回国，担任柏林大学东方语言研究所教授。此后曾在美国讲学。从1923年起，他担任汉堡大学中国语言与文化研究所教授兼所长，直至1935年退休。

佛尔克在德国汉学界享有崇高地位。在他70岁生日及逝世时，《中国学报》与《亚洲学刊》（Asia Major）曾分别发表过纪念专号；还有学者将他与卫礼贤、福兰克并列为德国汉学研究中各具特色的“三大师”。^②

佛尔克最重要的汉学研究成果是关于中国古代哲学著作和哲学史的研究。他先后翻译了《论衡——王充哲学散文选》（从

^① Fritz Jaeger: Otto Franke (Nachruf), ZDMG, Vol.99 (1945—1949), S. 19—36. 转引自张网刚：《德国的汉学研究》，第52—53页。

^② 梁容若：《欧美与日本的汉学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史论》，第73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1906年起连载发表并出版英文单行本)和《墨子》(1921年),这是这些著作第一次译成欧洲文字,“在中国哲学概念术语的翻译和界定上具有示范性意义”;他还撰写了《政治家和哲学家晏子与〈晏子春秋〉》,在西方第一次介绍了晏子和《晏子春秋》。佛尔克在译介中国古典文献方面卓有成绩,但影响更大的还是他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他的三卷本《中国哲学史》(分别出版于1927年、1934年、1938年),叙述从先秦到明清和20世纪的中国哲学,介绍了一百五十多位中国哲学家,内容宏富,资料翔实,是一部关于中国哲学史的鸿篇巨制。该书被德国汉学界誉为“长期以来它都是西文著述中有关中国哲学史的最便利、完备的参考书,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后人难以企及的哲学史著作”,^①足以代表德国的汉学研究水平。此外,他还著有《中国人的世界观》(1925)、《中国文化的思想世界》(1927),用西方哲学概念阐述中国哲学思想,具有较高学术水平。

孔拉迪(August Conrady, 1864—1925年)与福兰克、佛尔克的经历有所不同,他属于德国“土生土长”的汉学家。他最初在大学学习古典语言学和考古学,后来转向比较语言学并获博士学位。1891年,他在莱比锡大学以印度支那语为题通过教授论文,进而又研究藏文、泰语和中文,并以后者作为终身的主要事业。

孔拉迪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在语言学方面,他早年发表的《印度支那语使役动词和派生动词的构成》,被誉为是开辟了汉藏语言比较学研究领域的著作。他晚年的《东西方的古文化词汇》一书,研究古代语言中的印欧外来语成分,也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他还写作了不少纯古汉语的研究论文。但孔拉迪不仅仅局限于纯语言学的研究,而是扩及到文化、历史、民俗、民族等研究领域。他的《易经研究》、《乌尔斯泰世界史》第三卷、《斯文赫定楼兰所获汉文写本与其他文物》、《〈天问〉——中国艺术史上

^① Herbert Franke: Sinologie an deutschen Universitäten, Wiesbaden (1968), S. 19.

最古老的文献》，都是他汉学研究的重要成果。此外，他还留下了大批手稿，其中绝大部分是研究先秦语言、历史、地理和宗教文化的。

孔拉迪对德国汉学研究的另外一大贡献是培养出一批学有所成、后来居上的知名汉学家，形成著名的“莱比锡学派”，在二三十年代的德国汉学界产生一定影响。除我们前面提到了哈隆外，此学派中较有成绩的还有申得乐（Bruno Schindler）、魏勒（Friedrich Weller）等人。他们整体上都保持了孔拉迪创造的以东方语言学为基础的汉学研究特色，但各人的治学范围和成绩在某些方面则超过了他们的老师。

海尼士（Erich Haenisch，1880—1966年）比福兰克、佛尔克、孔拉迪出生稍晚，但在汉学研究上大体应算做一代人。他的研究工作主要体现了二战前柏林汉学的特色。早年他曾在柏林大学攻读中文、满文和蒙文并获博士学位。在柏林大学东语所短期工作后，于1903年赴中国任武汉新军教堂德文教员，直至清政权被推翻。1913年他以《论吴三桂起兵》为题在新成立的柏林大学汉学所通过了教授论文。此后，除中间一段时期受聘为莱比锡大学汉学系教授外，从1920年至二战结束，他一直在柏林大学汉学所任教授，1932年起又兼任所长。他一生发表的论文和专著有一百四十多种，主要的研究范围是关于蒙古和满清时代的中国语言和历史，尤以关于《蒙古秘史》的研究最为杰出。他根据对中文音译的研究，复原《秘史》的蒙文原文，从而为《秘史》的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为此，他先后发表了《元朝秘史的研究》（1931年）、《关于成吉思汗最后一次远征及其死亡》（1933年）、《蒙文〈元朝秘史〉——根据中文恢复〈元朝秘史〉的蒙文原文》（1937年）、《元朝秘史辞典》（1939年）等论著。为了表彰海尼士为德国汉学所做出的贡献，德意志科学院、萨克逊科学院和巴伐利亚科学院吸收他为院士，政府授予他德国星级大十字勋章。

4. 库恩的中国古典文学翻译

在本世纪的德国汉学家中，库恩（Franz Kuhn，1884—1961年）是一个自成一格的人物。他既不曾曾在大学任汉学教授，也不像前述汉学家那样主要致力于中国哲学、历史等学术文化的研究，而是把毕生心血献给中国古典文学翻译事业，并获得极大成功。

库恩出生于德国工业城市萨克森的弗兰肯贝格城，家庭中向有研究东方文化的传统。他早年曾在莱比锡大学学习法律并获博士学位，还曾在柏林大学东语所兼修了两年中文课程。1909年，他到中国任外交译员，1912年辞去公职到新创办的柏林大学汉学系攻读汉学。在著名汉学家高延教授的指导下，他很快撰写了几篇研究中国哲学、历史的论文。正当高延对他的汉学研究寄予厚望的时候，他却被独具艺术魅力的中国古典小说所吸引，并译出《今古奇观》中的《卖油郎独占花魁》。高延认为他不务正业，一怒之下将他赶出汉学系。而他也乐得放弃传统的汉学研究道路，从此致力于中国文学翻译事业。

库恩的文学翻译数量惊人，仅明清时期的长篇小说就有《好逑传》（1926年）、《二度梅》（1927年）、《金瓶梅》（1930年）、《红楼梦》（1932年）、《水浒传》（1934年）、《三国演义》（1940年）、《儿女英雄传》（1954年）、《肉蒲团》（1959年）等10种；明清时期的短篇小说有《今古奇观》中的作品15篇，李渔《十二楼》中的作品9篇及《聊斋志异》中的《促织》，《东周列国志》中的部分篇章；唐代传奇有《李娃传》、《无双传》、《昆仑奴》3种。此外还译有茅盾的长篇名著《子夜》等现代文学作品。

这些译作文字优美，生动传神，不拘泥于原著的一字一句，但却能传达出原著的风貌，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每部译作中还有库恩精心撰写的长篇序言或跋文，对作品产生的时代背

景、思想内容、艺术品位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进行了评述，对引导西方读者阅读理解该作品很有帮助。如在所译《水浒传》的“跋”中，库恩对此书价值进行了这样的阐述，他说：“《水浒传》这本书的写出，对当时的朝廷腐败、经济凋敝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它是“民间的诗篇”，与《金瓶梅》的关系“犹如母子关系”；它“对于研究中国的历史家、政治家、汉学家、军事家来说，都是非常宝贵的材料；而从文艺的角度来说，一个文学家如果不知道《水浒传》这部著名巨著，那将成为笑柄”。又如对《金瓶梅》的分析：“《金瓶梅》这部著作使那些正统的孔教道德维护者恨之入骨，因而它问世不久就被列为禁书，但这无损于这部著作的崇高声誉及其广泛的传播”；它的“手法是现实主义的”，是“不可多得的明代文献”；“谈到它的艺术性，那无可争辩地属于最好的作品”。^① 所论极富见地，字里行间反映出他对中国文学的热爱和精湛的造诣。

库恩的译作在西方产生极其广泛的影响，很多译作多次再版，广为流传。《金瓶梅》1930年在莱比锡岛屿出版社初版后，仅在德国就再版13次；英文转译本在英国印行的有7版，在美国印行的有4版；荷兰文转译本在荷兰印行的有4版，在比利时印行的有1版；法文转译本有5版；意大利文转译本有4版。《红楼梦》由莱比锡岛屿出版社1932年初版后，在德国再版10次，在荷兰、比利时、法国、美国、英国、加拿大、意大利等国出版了数十版。《水浒传》1934年印行后，在德国、瑞士、南斯拉夫、匈牙利等国共出版了十几版。这些数字足见库恩所译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在西方受欢迎的程度。

库恩的中国文学翻译在德国、西方赢得了广大读者，同时也受到西方学人的高度评价。有人称之为“中国文学的伟大翻译

^① 转见王丽娜：《德国著名汉学家弗朗茨·库恩及其译著》，《中华文史论丛》第46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出版。

家”；有人认为他是“中西文化的媒介人”；还有人誉之为“热爱中国古典文学的语言大师”。德国著名汉学家福赫伯教授则这样评价：“中国拥有博大精深的文化遗产。库恩翻译的这些文学作品使广大读者得以对此获得直接的认识，从而有助于在我国形成一个建设该专业的最佳气候。他的工作使中国文化在最广大的范围内获得了一个可感觉到的实在的轮廓。”他还说：“对于许多德国读者和文学爱好者来说，是库恩的这些中国古典中篇小说把他们第一次带进中国文化世界”，“库恩以他自己的方式帮助我们创造了一个学术性汉学研究成长所需要的良好气候”。^① 这些誉美之辞，库恩是当之无愧的。

^① Herbert Franke: Geleitwort, in: Hatto Kuhn: Dr. Franz Kuhn (1884—1961), S. 2—4. 转引自张国刚：《德国的汉学研究》，第79页。

第七章 中日文化交流

一、甘苦参半的留日学生运动

1. 负笈东渡

中国自近代以来，内忧频仍，外患日迫，众多有识之士和莘莘学子为挽救民族危亡，纷纷负笈东渡，留学扶桑。计自1896年首派留日学生起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全面停派止，中国人留学日本者总数不下五万人，从而形成几经起伏、蔚为壮观的留日学生运动。留日生忧患意识强烈，通过在日本接受各种先进的学说，萌生了变革中国社会的强烈愿望，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对中国的政治、军事、教育、思想和学术等方面均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辛亥革命前夕，留日学生界的革命形势如风雷激荡，大批留日学生放下学业，秘密潜回国内，投身于推翻封建专制的革命活动。为此，清政府重新拟定了留日章程，并采取了一系列限制和防范措施。一时之间，留日学生活动转入了低潮。据日方记载：1909年夏天，一度拥有五所分校，而为留学生教育重镇的日本宏文学院，首先被迫停办，此后早稻田大学、东斌学堂、法政大学等学校的留学生部相继停办。^①到1912年，留学生人数降至

^① 实藤惠秀著，谭汝谦、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86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

1400人左右。

清朝覆亡、民国肇元以后，国体政制新旧更替，留日学生运动也呈现了新的变化。1913年4月发行的《说报》（留日共和党机关刊物）刊登《日本东京留日学生经理员会议处广告》说：“民国成立以来，青年好学之士，纷纷负笈东渡，现在东京者已达二千人以上，来者日众。”当时民国政府对中央教育行政进行了重大改革，于1914年成立教育部，并先后呈准公布了《经理留学日本学生事务暂行规程》和《管理留日学生事务规程》，既有对清末留学制度的继承，也有在此基础上的变革及发展，对民初的留日活动做了派出、管理、官费给付等各方面的约定，在留日运动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在文化教育界中，新思想日趋活跃，各种西方新学说源源传入中国，许多外国著名学者相继来华演讲，遂在社会上掀起一股趋同西方文化的热潮，不少颇有影响的知识界人士极力提倡留学教育。如吴稚晖提出“移家就学”的主张，认为中国教育是世界教育的一部分，中国的普通教育虽有发展，高等教育却比较薄弱，因此应通过“移家就学”等途径加强同各国的交流。加之民国建立后给予科名的奖励已全部取消，世人皆视留学为变相的科举，对革命有功人士的子弟，很多都被派到日本留学，仅黄兴部下的留日学生就一度多达六百余名。

借共和声浪浮泛面起的袁世凯窃国之后，以“统一”为遮掩大肆推行集权专制，以暗杀为手段扼制了遗留民主氛围的“政党政治”，政治日非，全国人心鼎沸，呼吁诛奸讨逆。1913年7月，在革命党人领导下，江西爆发了“二次革命”，但旋即为袁所扑灭，孙中山、黄兴等人相率逃亡日本，大批亡命客和留学生亦追随而至，群集东京。寄寓日本期间，孙、黄二人除从事反袁活动外，还创建了浩然庐和政法学校，专门招收二次革命后流亡日本的中国革命志士，从而壮大了留日运动的力量，丰富了留学活动的内容。此后，留日学生活动重又趋盛，1913年至1914年，

中国留日学生人数回升到五千人以上，仅次于日俄战争前后的最盛时期。^①

与此同时，日本对华侵略的野心日益彰显，当时留日的中国学生，自发地滋生着强烈的反日情绪。1915年，日本向北洋政府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留日学生得知消息，莫不悲愤填膺，纷纷弃学归国，以不同方式参加反日运动。如郭沫若当时即怀着“冲冠一怒与天齐”的爱国义愤，一度回到上海。李大钊则代表中国留学生总会，起草《警告全国父老书》，编印《国耻纪念录》，发表《国民之薪胆》，深刻揭露了日本自甲午战后对中国的侵略罪行，并号召国人发扬“卧薪尝胆”的精神，保卫“锦绣之江山”。文章一出，震动留日学生界，尤其是《警告全国父老书》，影响及于全国，在反对“二十一条”斗争中起了重大作用。由于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日本不得不把“二十一条”的最后数条撤回，才于5月9日得到北洋政府的承诺。事态稍安之后，留日学生陆续返回日本，继续未竟的学业。

1918年，日本为打击新生的苏联，秘密向北洋政府提议共同出兵西伯利亚，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并欲借此机会进一步攫取在中国的各种权利。留日学生得此消息，深表愤慨，为唤起国人救亡图存，纷纷罢课，组成“留日学生救国团”，“在留日学生总会会长阮湘、王洪宾领导下，全体罢课归国”。^②留日学生回国后，或去上海，或去北京，或回本省，相继展开了广泛的救亡宣传活动。

紧接着五四爱国运动爆发，排日运动风起云涌，再加上国内政权更迭、军阀角斗，各省留学费用被挪作军费开支，因此留日

^① 松本龟次郎：《中华留学生教育小史》，第69页。转引自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88页。

^② 胡俊：《记五四运动前后留日学生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回忆录》（续集），第45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

学生数目骤减。据日方出版的《留东外史补》所载，1919年的留日学生数目较两三年前减少八至九成，归国的学生中，十分之三四是为了表示排日；十分之五六是因军阀混战而丧失留学公费。《私立成城学校留学生部沿革》也说：“……如1906年、1912年、1916年及1919年几次全体学生归国，都予学校经营者甚大的打击。”^①也证明了当时留日学生减少的情形。随着国内爱国运动的发展，没有归国的留日学生也在日本或集会演讲，或请愿游行，积极声援国内的学生运动。日本国内不少正直人士也纷纷发表言论或文章支持中国人民的正义行动，如吉野作造于1919年6月发表《勿要谩骂北京学生团的行动》（《中央公报》6月号）、《关于北京大学学生风潮事件》（《新人》6月号）等一系列文章，声援中国五四运动。

1918年以后，中国人留学欧美热潮兴起，留日学生人数锐减，而且留学日本的学生对日本充满敌对情绪，这种情况引起日本朝野的关注。1918年，日本国会高橋本吉等五名议员向第40届国会提出《有关中国人教育的建议案》并最终获得通过。该议案除了提请日本政府应效法英美两国在中国办学外，还希望日本改变对中国留日学生的待遇。这是日本将中国留日学生教育问题的议案第一次提交国会讨论。此后，1921年的第44届国会，1922年的第45届国会上，都有议员提出有关中国留学生问题的议案，其主旨都是要求政府改变对中国留学生的态度，为他们创造学习和生活的方便条件。

日本政府开始改变对中国留日学生冷漠无援的态度，先后采取了一些有关措施。1918年5月，日本设立了统筹留日学生事务的机构日华学会，会长由日本枢密院副议长小松原英太郎担任，顾问大都是中日两国知名的热心人士。该会创立的宗旨是：“为对中国留学生聊表薄意，稍减其作客异乡之不便，兼为中国

^① 转引自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93页。

赴日视察观光之人士作东道，期效斡旋之劳。”^① 1921年日本政府向日华学会提供15万元，经营留日学生宿舍，日华学会逐渐发展成为中国人留学日本的门户和接待处。

1922年3月，在日本各界有识之士的强烈要求之下，日本第45届国会通过了关于中国留学生的建议案，其内容主要为：

(1) 中国留学生特约教育的五校^② 协定于1922年期满后，日本政府将应中国政府要求继续延长协定。

(2) 对每年数百名成绩优秀的留学生给予相应的学费补助。

(3) 为了达到留学教育的目的，对留学生基础教育的预备学校，由国库补助相当数额的经费。^③

至此，日本政府把在经济上援助留学生、扶持中国人留学日本正式作为一项国策确定下来，这也是20年代留日学生运动中一个最引人注目的变化。

1922年中日特约五所预备学校期满，各省大多停止再派留学生，留日学生人数又趋减少。1923年日本关东发生大地震，给留日运动带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留日学生集中居住的东京神田、本乡、下谷等地区，正是地震灾区中心，多年来招收中国留学生的东京帝国大学、东京商科大学等院校在地震后的大火中付之一炬，留学生居住的房屋多被烧毁，书籍及其他物品也荡然无存，这次地震还使四十余名中国留学生不幸丧生。许多学生由于衣食无着，纷纷弃学归国，少数学生即使勉强留在日本，也多是艰难度日。此后一些学生陆续返日，各省又指定原有特约学校为官费学校，考人者核发官费，留日学生运动渐有起色。

① 转引自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93页。

② 1908年清朝驻日公使与日本文部省之间有“特约五校”（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千叶医学专门学校、山口高等商业学校）之约定，考上这五所学校的每名留学生，清政府支付200元至250元作为委托费，由日本文部省转拨给五所受托的学校，作为教育留学生的费用。

③ 转引自沈殿成：《中国人留学日本百年史》，第412页。

继向日华学会提供资助后，日本外务省于1924年成立对华文化事业部，用以推动对中国的教育和文化往来。该部确定利用庚子赔款资助下列事项：（1）关于在中国应办之教育、学艺、卫生、救恤及其他发展文化之事业；（2）对居住日本之中国人士推展前项所述之事业；（3）在日本进行有关中国学术研究之事业。日本政府推出上述政策后，遭到了留日学生的反对，认为此举具有文化侵略的企图，中国国内各方面对此也提出了各种疑议。最终结果是中国政府与日本签订中日文化协定，利用庚款补助320名留日学生，每人每月补助70日元。然而几经变故之后，日本希望改善留日学生对日感情以及增加留日学生人数的愿望，却始终没有实现。

1928年，国民党北伐军北上之际，以田中义一为首相的日本政府，借“保护侨民”之名，出兵济南，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留日学生闻讯之后，组成中华各界反日大同盟，再度大举归国。日人三神良田曾回忆当时的情形：“当时，他们每晚都在我的友人的邻室集会，讨论应该回国好呢？还是留下来继续读书好呢？他们年轻的活力和高昂的声音现在还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济南事变是他们归国的一个主因。昔日为数众多的中国留日学生，自此之后便大为减少了。”^①

进入30年代以后，随着日本侵华步骤的加快，留日学生与日本当局之间的对立气氛愈演愈烈。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一·二八”事变的爆发，对留日学生尤其是东北四省的留日学生而言，不啻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们深感事关民族存亡，没有因顾虑学业而迁延观望，决意一致归国，并拒乘日本船只，改搭他国轮船，陆续返回国内。至10月底，留日学生几乎全部返国，留下来的不过二十余人，其中多是无家可归的东北学生或身无川

^① 《早稻田学报》，1958年4月号，转引自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419页。

资的贫寒子弟。留日学生运动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冷落局面。

战火渐熄之后，留日学生零零星星地重回日本，返校复课（但须留级），其中也加入了一些新来的留日学生。此后数年间，中国学生赴日留学人数持续保持上升趋势。正当日本军国主义加紧侵华之际，中国学生反而远涉重洋，群趋日本，个中缘由主要是：由于抗日救国而需要了解日本的政治目的；当时中国货币对日元汇价大幅上扬的经济原因；南京国民政府在留学政策方面采取了一些改进措施，如1933年，国民政府公布了《国外留学规程》，对留学生的资格、考选、管理和回国效力等做了全面详尽的规定，鼓励学生赴国外学习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以应用于国内建设的需要，从而为当时的青年学子坚持走科学救国、艺术兴邦道路提供了机缘。正是出于这几方面原因，留日学生运动再度掀起热潮。然而，在留日学生界，“对日本怀有好感的人几已绝迹，若说留日学生至此已完全采取抗日态度，亦不为过”。^①

至1935年，留日学生人数增势尤为惊人。据《东亚学校沿革概评》所述，1935年秋，东亚学校竟出现“由于学生激增，12月多达1980人，为创校以来的最高记录，校舍诸般设备均告不足，遂不得已停止办理入学申请”的情况。东亚学校和成城学校都相继开设夜校班，也反映出留日学生的泛滥。这些学校的教科书和参考书，乃至有关学习日语的一切书籍深受留日学生欢迎，其需求量持续上升，因此有关日语书刊的出版事业空前兴盛。留日学生界中，用中文编撰有关日语研究文章的杂志，也在此时出现，数目多达七种，虽然杂志的寿命长短有异，但足证当时研习日语风气之盛。

然而随着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海外学子更深地体味到亡国无家之恨，于是纷纷辍学归国，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抗战前夕，中国在日本的留学生总数达6000人，中日战端一开，

^① 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420页。

中国驻日大使馆和留日学生监督处即行关闭，留日学生全体归国，其势如潮，不绝于途。除了沦陷区（主要是东北和台湾）仍有少数人留日外，中国人为挽救民族危亡而负笈东渡的历史至此暂告终结。

2. 忍辱负重学文化

近代以来，大批中国学子先后挂帆东渡，负笈扶桑。这当中难免泥沙俱下、沉渣泛起，但是在国势日危、内外交煎的民族危机面前，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以“求学如求药”的精神，试图师法日本，以寻求救国救民的良方，从而把赴日留学和挽救民族危亡紧紧相联，可以说，他们的“去国”，正是为了报国。这在当时留日学生所编的《留学生鉴》中得到了坦率的表陈：“吾人不远万里，乘长风，破巨浪，离家去国，易苦以甘，津津然来留学于日本者，果何为也哉？留学者数千人，问其志，莫不曰：‘朝政之不振也，学问之不修也，社会之腐败也，土地之日狭也，强邻之日薄也，吾之所大惧也。吾宁牺牲目前之逸乐，兢兢业业，以求将来永远无譬之幸福，此则吾之所大愿也。’”^①

中国学子从贫弱落后的家国来到蒸蒸日上的日本，顿觉眼界开拓。“目之所见，身之所接”，“不觉向者狭隘之心，化为恢宏矣，偏视之见，化为大公矣，非特知识因之而增，即爱国爱人之亦因而发”。^②他们目睹日本工业的发达、教育的普及，震惊钦佩之余，不禁感慨万分：“自进入长崎以来，流连异土，百感交并，及达东京，益怦怦不能持者”。“今几何时，昔日之蓝，不如今日之青，昔日之师傅，不如今日之弟子”。^③不甘落后、师

^① 东京启智书社：《留学生鉴》，第15页，转引自实藤惠秀著《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148页。

^② 李宗棠：《东游纪念第五—护送游学者绅学生日记》，第5页。转引自王晓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第479页，中华书局1992年版。

^③ 周家纯：《致湖南青年劝游学外洋书》，《游学译编》，第4期，1903年2月。

法日本的决心因而更加坚定。然而，对中国留日学生刺激更深的是，由于祖国贫弱而时时遭致日本朝野的轻慢和侮辱。可以说，在负笈海外的过程中，炎黄子孙的民族尊严感与弱国子民的屈辱心态、感时忧国的赤子情怀和羁旅漂泊的彷徨之感，始终纠结在远离家国的留日学生心中，他们的留日生涯亦因之成为了甘苦难言的代名词。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举国以西洋为师，对中国文化的关心渐趋淡漠。甲午一战，中国一败涂地，老迈衰朽之态毕现无遗。昔日对中国执弟子礼的日本人，从此不论在政治上、经济上还是文化上，对中国皆抱有轻藐之心，甚至把以往的先生视为首要侵略目标，以灭亡中国为基本国策。中国在遭受西方列强蹂躏的同时，更承受着来自日本的覬覦和侵逼。在求学和救亡的双重压力之下东渡的中国学生，自然是首当其冲，往往受到学校的冷遇，房东的剥削，以及一般日本人的轻慢和侮辱。

郭沫若在日后回首留日生涯时，曾深有感触地说：“我们在日本留学，读的是西洋书，受的是东洋气。”中国首批赴日的13名学生中，韩筹南、李清澄等人就是因饮食不惯和不堪忍受“豚尾奴”、“清国奴”之类的嘲骂，赴日不久便愤而归国。许多留日学生经过马关订约之处，或是看到东京靖国神社陈列的甲午战争“战利品”，往往深受刺激，痛不欲生。他们悲愤地倾诉：“我等寄学海外，目睹外人对我之政策，枪种族之不保，痛神州之陆沉。”^①他们的生活，实已处于“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境况之中。

挥抹不去的民族屈辱感时刻充溢在留日学生的心中和笔下。在郁达夫的散文《归航》中，多处抒写了那该诅咒的民族歧视和屈辱感：“啊啊，日本呀！世界第一等的日本呀！国民比我们矮小，野心比我们强烈的日本呀！我去之后，……我的同胞的青

^① 《译书汇编》，第6期，1902年7月。

年，大约仍旧要上你这里来，受你的欺辱的……”^① 在夏衍的剧作《法西斯细菌》第一幕中，留学生赵安涛痛苦地说：“国家到了这个田地，我再也不能安心住下去了。号外满街飞，我在街上走，觉得每一个日本人的眼光，都是一根刺……”^② 在郭沫若、郑伯奇、张资平等人的文字作品如《行路难》、《最初之课》、《她怅望着祖国的天野》中，也屡屡可见类似的沉痛之辞。

这种情况到了大正时代（1912—1926年）更是变本加厉。由于日本肆意推行其露骨的侵华政策，中日两国间的冲突更加尖锐，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的遭遇较前更为不堪，当时留日学生憎厌日本人开口“支那”、闭口“支那”，已达到忍无可忍的地步。他们一听此名，即如芒刺在背，痛苦愤懑之情溢于言表。留日学生的遭遇连日本当局也不否认。1922年3月9日，荒川五郎在众议院就《关于退还庚子赔款之建议》发表演说时承认：“负笈东来之留学生——将来前途皆未可限量者，惟我辈日本人平素对彼等之待遇，实多值得遗憾。连宿舍之女佣及商店之伙计，亦持冷骂冷笑态度。……是以彼等学成归国之后，殆成排日之急先锋，是亦不得已者也。”“九一八”以后，随着日本侵华步伐的加剧，留日学生的处境更趋艰难，时遭日本当局无故逮捕，横加压迫。直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这种情况有增无减。

对留日学生而言，先进的文化，同时又是侵略者的文化；分明是侵我中华的凶狠敌国，却不得不以之为师，这使得他们时时处于进退维谷的困境。虽然在留学期间也得到不少正直善良的日本人的真诚相待，其中有许多事迹还传为佳话，但总的说来，留日生涯中饱含着艰辛和困苦。然而，为了觅求救国良策，力挽神州于既沉，大多数留日学生不得不忍辱负重，怀着对祖国积弱的

^① 郁达夫：《归航》，卢今、范桥编：《郁达夫散文》，第366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

^② 《夏衍选集》，第515页，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痛惜和对祖国强大的热盼，发愤学习西方的先进科技文化知识，并在许多方面取得了斐然的成就，涌现出一大批中国近现代史上家喻户晓的风云人物。

与去西方留学者注重理工相反，去日本留学者学文科者占绝大多数，其中政法和军事是所有科目中的最热门。而且绝大多数留日学生以学习速成科和普通科（相当于中等学校）为主，真正进入大学本科的不多，能够获得硕士、博士的则更如凤毛麟角，有人曾回忆说：“从清末到本世纪30年代初，不过几个人而已。”^① 这种说法不一定准确，但获得高等学历的中国留学生为数不多则是可以肯定的事实。

进行革命思想宣传，发行革命报刊，是留日学生最重要而取得成效最大的活动内容。早在1910年的《留美学生年报》中，即有过这样的论列：“当吾华似醒未醒、初醒之际，新软旧软、彷徨莫定之时，有日本留学生之书报，有日本留学生之詈骂，有日本留学生之通电，以致通国之人之为之大醒。已明者因而更明，顽固者因其詈骂而醒悟，前进者有其驱策而更前，后退者有其鞭策而前进。故曰：中国之醒悟，受日本留学生之影响巨矣！”可以说，在20世纪前半期的留日运动中，相当一大部分的中国留学生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同一时期中国历史上一系列重大的政治运动，并对中国的政治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留日学生在日本接触并接受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人权等学说后，思想倾向为之一变，产生了救亡图存、拯救民族危机的政治愿望，成为民主革命运动中首先觉醒的一部分人。留日学生中有不少人屏弃改良思想，转而大力宣传革命。当时留日学生聚集最众的日本东京，“遂以中国革命渊藪闻”，成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海外中心。1905年，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其成员出身可考者，九成以上为留日学生。1921年，

^① 陈新宪：《留东杂忆》，《邵阳文史资料》，第7期，第181页。

中国共产党诞生，一大代表有超过半数的人曾先后留学日本。

辛亥革命胜利十年后，孙中山回顾并高度评价了留日学生的历史性贡献，认为留日学生在推翻满清封建统治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赴东求学之士，类多头脑新洁，志气不凡，对于革命理想，感受极速，转瞬成为风气。故其时东京留学界之思想言论，皆集中于革命问题。”他还指出革命思想由“留东学生提倡于先，内地学生附和于后，各省风潮从此渐作”。^①毛泽东在评论民主革命时期知识分子时也指出：“他们或多或少地有了资本主义的科学知识，富于政治感觉，他们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和桥梁的作用。辛亥革命前的留学生运动……就是明显的例证。”^②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留日学生中的先进分子不愧为中国近现代革命的先驱。直到抗战前夕，留日学生依旧在忍辱负重学习救国知识的同时，艰难而切实地从事着救亡工作。他们把耳闻目睹和研究所得通过书籍、报刊、信件、传单等媒介传入国内，对提高国民的抗日救国意识，对政府当局制定内外政策，都起过一定的作用。

留日学生还以译介和传播西方先进科学文化为己任。由于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着意汲取西方近代思想文化，因此欧美各国的学术名著，无论政治、法律、经济、教育、科学、思想以及文学艺术等，皆有日文译本及有关研究论著，这对于中国学生来说，无疑是极好的思想养料。因此他们不遗余力地组织翻译团体，把日本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著作及教科书大量译成中文，并且创办报刊，介绍和宣传欧美及日本的先进理论和文化。正如留日学生中第一个翻译团体译书汇编社所宣称：“同人等负笈他

^① 孙中山：《有志竟成》（《建国方略·心理建设》第8章），《孙中山文选》上卷，第175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②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04页，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

邦，输入文明，义不容辞。”^① 另一个留日学生翻译团体游学译编社也申明：“游学诸人原有输入文明开通本国之责务。”^② 实际上，翻译日文书也确实成为留日学生推动中国近代化和促进中日文化交流的一大贡献。当时“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辄数家，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③ 可见留日学生界译风之盛。西方的政治经济学、史学、哲学、文学、法学、社会学以及社会主义等众多新理论，尽皆通过留日学生的“中转”，源源不断地进入了中国，并对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为数众多的中国留日学生中，固然不乏碌碌无为的平庸之辈，但更多的是一大批成就斐然的出类拔萃者。从黄遵宪、孙中山、黄兴、廖仲恺、蔡锷、陈独秀、李大钊、董必武、周恩来、宋庆龄、何香凝等政界要人，到王国维、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文坛巨匠，无不先后游学日本。所以西方学者詹森在其《日本与中国的辛亥革命》一书中指出：近代日本不仅是孕育中国近代民主革命领袖的摇篮，而且是中国近代新型的知识分子窥望和学习西方现代文化的驿站。

二、中日文学艺术交流

1. 日语词汇对现代汉语的影响

词汇是语言中反映社会发展最敏锐的部分，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从词汇的变迁中，可以看出语言和时代的关系。汉语词汇之所以博大精深，与其在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不断吸纳和内化

① 《译书汇编发行之旨趣》，《译书汇编》第2年第1期，1902年4月3日。

② 《游学译编简章》，《游学译编》第2期，1902年12月。

③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四，第76页，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版。

众多外来词语有着莫大的关系。中日两国自古以来在政治、经济、文化和语言等各方面相互都有很大的影响。早在公元3世纪，日本就已有汉字流传，并在日语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而日语对汉语也有不小的影响，尤其是近代以来，我国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接触更为频繁，在积极学习西方文化的过程中，汉语吸收外来词的数量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到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吸收外来词汇尤其是日语词汇数量之巨、类型之多，更是蔚为可观。

清末以后，大批学子负笈东渡，游学日本，并翻译了大量欧美及日文书籍，在这个过程中，引进了很多日本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至于一般用语的词汇。1911年刊行的《普通百科新大词典》承认，“吾国新名词大半由日本过渡输入，然所用汉字有与吾国习用者相同而义实悬殊者，又有吾浑而彼画易涉疑似者，皆随条分析”。诸宗元在《译书经眼录序例》中形容当时“日本文译本遂充斥于市肆，推行于学校，几使一时之学术，浸成风尚，而我国文体，亦遂因此稍稍变矣”。^① 实藤惠秀也指出“中国因为流行着广含日本词汇的翻译及掺入日本词汇的新作，所以中国的文章体裁产生了明显的变化”。^② 可见，随着日语词汇的大量流入，中国的文体为之遽然一变。当时大多数留日学生几乎都在文章中使用过日本词汇，或多或少受到日本文体的影响。如文坛巨擘梁启超在行文中不但采用日本词汇，而且融入了日本式的文气，被称之为“启超体”或“新文体”，读来新颖可喜，颇具魅力。

辛亥革命之后，新名词风行一时，趋新人士都争相使用。这种情况引起了不少守旧人物甚至包括一些留学生的不安和忧虑。

^① 诸宗元：《译书经眼序录例》，转引自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292页。

^② 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291页。

1915年，留日学生彭文祖撰成一本专门非难日本词汇的书《盲人瞎马之新名词》，大声疾呼慎用日语词汇，认为不分优劣地滥用来自日语的新名词，流弊实在太多，甚至会导致“亡国灭族”的严重后果。例如“取缔”一词的使用毫无道理，实际上不如用“禁止”、“管束”等中国语，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尽管彭文祖等人从民族感情出发，或者基于维护汉语纯洁性的考虑，对日本词汇的大量流入深恶痛绝，然而在中西方文化碰撞、交融的过程中，外来词汇包括日语词汇的引入却是难以逆转的大势所趋。

中国从日语借用过来的词汇，不仅使汉语词汇更加丰富，也使中国人接受近代先进的科学文化更为方便。据有关学者统计，在现代汉语中，日语来源的词语至少有一千多个。源于日语的外来词，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几种情况：

第一，日语利用古汉语中既成的词语意译了从西方学到的新词语，只不过涵义有新的引申。例如“革命”，《易经》中已有“汤武革命”的说法，日语用以翻译了英语词“revolution”，又被我们重新吸收回来。又如“列车”，原指“一列马车”，王粲《杂诗》云：“列车息众驾，相伴绿水湄。”日人以之翻译了英语词“train”，我们再从日语转引回来。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机械”、“具体”、“演说”、“干部”、“同志”、“专制”、“组织”、“杂志”、“劳动”、“社会”，等等。第二，日语利用古汉语中两个单音词组合起来意译西方语言的新词，如“历史”、“反应”、“改良”、“批评”、“企业”、“消极”、“抽象”、“概括”、“演绎”、“背景”、“单位”，等等。第三，借自日语原有的用汉字表示的词汇。一种是意义与原义相同或相近的词语，如“手续”、“场合”、“引渡”、“见习”、“取缔”等。另一种则是借用后意义与原义不同，如“劳动者”，日语指产业工人，汉语指劳动人民；“辩护士”，日语指律师，汉语指辩护者；“物语”，日语指演义小说，汉语指动物童话，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第四，汉字字形词义为日本人所造，为汉语吸收。如“腺”、“癌”、“吋”、“吨”，等等。

随着大量日本词汇的输入，国人渐渐觉得有应接不暇之虞。日本词汇不但深入中国的教育和法律方面，也深入到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等许多领域，以一人之力，是无法完全读通各方面书籍的，再加上阅读翻译书籍时，难懂的非专门的词汇亦会源源不断地出现，因此自20世纪初以来，各种类型的辞典应运面生。举其要者，如日本新法典讲习会编著、徐用锡译，京师译学馆1905年出版的《汉译新法律词典》；日人田边庆弥著、王我臧译，商务印书馆1909年出版的《汉译日本法律经济辞典》；黄摩西编纂、中国词典公司1911年刊行的《普通百科大词典》；唐敬泉编纂、商务印书馆1923年发行的《新文化辞书》；吴念慈、柯柏年、王慎名合编、南强书局1929年发行的《新术语辞典》；李鼎声编纂，上海光明书局1933年发行的《现代语辞典》；春明出版社编纂、并于1949年发行的《新名词辞典》等。

可以说，活跃在现代汉语中的大量日语外来词，是中日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民族性和国际性相结合的产物，也是中日古今学人共同努力的成果。如果没有大量的古汉语词汇作为依据，如果得不到中日学者持续不断的发掘和利用，这些词汇只能是过眼烟云，难有长久的生命力。而现代汉语也正是因为不拒绝多方吸纳养分，才得以汇成如今这样丰富浩繁、难以计量的词汇之海。

2. 日本文学译介及其对中国文坛的影响

近代以来，在中西文化之间的迎拒、冲撞和砥砺中，中国文学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由此开创的新文学既与此前的传统文学血脉相通，更与现实社会息息相关。此后，中国文学的发展主要在于通过日本引进西方文学，即以日本的翻译文化为基础，将西方文化引进到中国，日本遂成为中国向西方摄取文化的重要走廊。

新文化运动的前驱者大都是留学生或青年学子，中国传统文化对他们虽有影响，却不足以框固其思维视角，因而他们能够比

较清醒地了解到世界文学发展的趋势，以及中国文学在其中所处的地位。如周作人认为：“日本新文学便是不求调和只去模仿的好；又不只模仿思维模式，却将他们的精神，倾注在自己心里，混和了，随后又倾倒出来；模拟而独创的好。”^①认为要想使中国文学现代化，首先必须打破“不肯自己去学人，只愿别人来像我”的心理障碍，“真心的先去模仿别人”。^②正是出于这种向异域寻求新质、借取武器的企望，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契机，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学界掀起了大量译介日本文学作品及文艺理论书籍的热潮。当时中国的重要文学团体，如以鲁迅为中心的语丝社，郭沫若、郁达夫为代表的创造社，都致力于日本文学的翻译介绍，通过大量翻译日本文学作品和文艺理论，借鉴日本文学，推动了中国文学创作的繁荣和文艺理论的活跃。

当时正值日本白桦派文艺思潮席卷日本文坛，其肯定积极人性的立场，尊重自由和个性解放的精神，提倡人道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主张，风行一时，影响颇为深远。中国的新文学前驱者寄希望于“用深沉的人道的心灵，轻轻地把一切隔阂扫除掉”，强调中国现代的文学应是描写社会现状的文学，是“人的文学”、“平民文学”，要写下层社会，写一切痛苦情形，为人民指出正确的方向，因此大力介绍日本的人道主义文学作品。被介绍最多的白桦派代表作家有武者小路实笃、志贺直哉、有岛武郎、铃木三重吉、江马修、加藤武雄等人。

武者小路实笃是日本文坛白桦派的中心人物，同时在中国文学界也享有盛誉。1922年鲁迅翻译出版了武者小路实笃的名篇《一个青年的梦》，因其内容讴歌反战、颂扬人类之爱，再加上周作人对武者小路创建的“新村”所做的访问和大力介绍，使得该

^① 周作人：《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282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36年、1937年版。

^② 同^①。

书一经出版，立刻风行全国。武者小路实笃的其他作品随之被大量翻译过来，仅单行本就多达十余种，重要的译本有《爱欲》（章克标译）、《妹妹》（周白棣译）、《母与子》（崔万秋译）、《戏剧研究》（沈宰白译）。此外，还有商务印书馆版《武者小路实笃集》、中华书局版《武者小路实笃戏曲集》等流传颇广的合集。当时译本广告上往往只写着“武者小路最近的巨著”，既不标日本，也不提实笃，可见其深入人心之程度。白桦派其他作家的作品如志贺直哉的《老人》、《到网走去》；江马修的《小小的一个人》；有岛武郎的《与幼小者》、《阿末的死》；铃木三重吉的《金鱼》等作品，皆因其中充盈着人道情怀和赤诚爱心，故而也为当时中国文学界所青睐和推重，先后被译成中文出版。

新思潮派是日本文坛继白桦派之后又一大流派，其代表作家菊池宽、芥川龙之介在文坛享有盛名。菊池宽的作品中蕴含着对人性深层世界的观照和开掘，因而深为时人所瞩目。鲁迅认为：“菊池宽的创作，是竭力地要掘出人间性的真实来。一得真实，他却又慨然地发了慨叹，所以，他的思想是近于厌世的，但又时时凝视着遥远的黎明，于是又不失为奋斗者。”^① 鲁迅尤其对菊池宽在其作品《三浦右卫门的最后》中敢于对“武士道”施以斧钺的勇猛精神称许不已，遂将此书翻译出版。此后，鲁迅还翻译有菊池宽的《复仇的话》。刘大杰翻译有《恋爱病患者》、《模仿》，胡仲持译有《投票》、《藤十郎的恶》，沈端先译有《败北》等。

新思潮派更具代表性的作家是芥川龙之介，他被后世学者誉为“能融合和、汉、洋三种趣味，文字的高雅清澄独步当代”，^② 其作品亦被大量翻译引入中国。最早译过来的是《鼻子》，其次

^① 鲁迅：《〈三浦右卫门的最后〉译者附记》，《新青年》第9卷第3号，1927年7月。

^② 梁容若：《中日文化交流史论》，第36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是《罗生门》。这两篇都是历史题材的小说，作者“取古代的事实，注进新的生命去，便与现代人生出干系来”，^①这“新的生命”就是对人性的深刻洞察。作品的主旨分明是要告诉人们：对人性不要存美丽而虚假的幻想，人性中本来就存在着令人恐惧的恶。1927年，芥川龙之介因“对将来模糊不安”而自杀，中国文坛随即掀起一阵芥川龙之介热。各大文艺杂志争相出版追悼专号，其作品大量风行于中国，先后出版的有方光焘译的《袈裟与盛远》、《手巾》，夏丐尊译的《秋》、《南京的基督》、《湖南的扇子》，沈端先译的《绝笔》等。

森鸥外是日本近代文学的元老，曾创作大量影响广泛的作品。而后虽恋栈官场，创作时断时续，还是留下了诸如《青年》、《鱼玄机》等颇具分量的名作。1923年鲁迅翻译出版的《现代日本小说集》中收入了他的《游戏》和《沉默之塔》。其中尤以《沉默之塔》在中国影响最大。森鸥外于1910年11月发表的这篇寓言体小说，是对天皇以莫须有罪名迫害数百名社会主义者的“大逆事件”的抗争，而中国自新文化运动兴起以来，亦屡屡发生“因文获罪”之事，所以鲁迅将《沉默之塔》译介过来，“正可借来比照中国”，^②以之作为批判封建专制的匕首和投枪。

1927年后中国文学界除继续翻译日本资产阶级作家的作品如夏目漱石的《草枕》、《我是猫》、《哥儿们》之外，日本无产阶级作家作品也进入了中国文学界的视野。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前身是明治时代的社会文学、社会主义文学。1921年，其机关刊物《播种人》创刊，后因1923年关东大地震而一度受挫。1924年又发刊《文艺战线》，再度焕发生机，直到1931年9月18日柳条湖事件爆发为止的几年间，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几呈席卷日本文坛之势，并对中国文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① 鲁迅：《〈罗生门〉译者附记》，1921年6月14日《晨报》副刊。

② 鲁迅：《〈沉默之塔〉译者附记》，1921年4月24日《晨报》副刊。

当时有署名“一切”的人，译出著名的日本无产阶级作家秋田雨雀的《骷髅的跳舞》，与《国境之夜》、《首普罗人的喷泉》共三篇合为一集，孙百刚译出《先生的坟》、《佛陀的战争》、《白鸟的国》三篇，辑为一册，题名为《先生的坟》。另一位藤森成吉曾隐名埋姓，体验劳动生活，其作品由森堡译出小说七篇，为《土堤大会》、《应援》、《来自病榻》、《云雀》等，并附人童话《金目王子》、《戏曲快车》，散文《不怕水的人》，合编为一册《藤森成吉集》。此外，张资平译有其《马车》、《地主》，叶沉译有《创作法的唯物辩证论》，适夷译有《高尔基访问记》。

1929年，杰出的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写的《蟹工船》问世，此外，他还写了《工厂支部》、《地下党员》等作品。另一位著名无产阶级作家德永直亦于1929年发表长篇小说《没有太阳的街》，反映1927年东京印刷工人大罢工运动。这部小说与《蟹工船》同被誉为日本无产阶级的“文坛双璧”。1931年，潘念之翻译了《蟹工船》，1932年，何鸣心翻译了《没有太阳的街》。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在日本被禁的石川达三的《活着的士兵》，由张十方、夏衍和白木等人译成中文，成为抗战的宣传材料，分别在广州、桂林、上海等地出版，反映出当时的现实需要。

在文艺理论书籍方面，主要是翻译厨川白村、本间久雄、官岛新三郎、木村毅、小泉八云等人的著作，他们在介绍以英美文学为基础的社会派近代文学理论及文艺批评方面做出了启蒙性贡献。其中尤以厨川白村的影响最为卓著。“厨川白村的文艺思想，一度成为中国文艺理论的准绳”。^①鲁迅在大学讲授文学批评，所用的讲义就是厨川白村的遗稿《苦闷的象征》汉译本。厨川白村的主要著作几乎全部译成中文出版，如罗迪先译《近代文学界十讲》、鲁迅译《出了象牙之塔》、绿蕉译《走向十字街头》、夏

^① 转引自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243页。

丐尊译《近代的恋爱观》，等等，厨川白村在中国所享的盛名，可以说是在本国以上。

除了大量翻译日本无产阶级文学作品和文艺理论著作外，1927年以后弥漫在上海刊物的左倾普罗文艺思潮，也多由日本转贩而来。正如日本辛岛骁氏所说：“到了1928年（民国十七年）以后革命文学时代，泛滥在日本文坛的苏俄的文艺理论，差不多次月上海已有翻译，接近到那样。日本左翼评论家的议论，强烈地影响着中国的左翼文学运动。特别是平林初之辅、片上伸、冈泽秀虎、青野秀吉、藏原惟人、川口浩等的文章，曾经和普列汉诺夫（Plehanov）、卢那察尔斯基（Lunatcharskii）的文章并列着，在中国评论家的论说中，像金科玉律地引用过。”^①创造社初期具有强烈的艺术至上主义倾向，但到了20年代后期急速左倾，跟当时主导日本无产阶级文艺的福本主义理论有着紧密关联。而此后“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发起成立，也是受到了日本文坛的影响。

从20年代初期到30年代末，大约出版了日本文学翻译单行本近二百种，合集、选集共三十多种，还有零散发表在全国各地报刊的译文不下三百篇，被译介的作家、评论家有八十多人。虽然在不同时期对日本文学的择取和翻译在内容和文体上各有侧重，但其总体精神是一致的，即在沟通与交流中，迅捷反映日本文学的最新成果，为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提供借鉴，从而使中国文学自觉汇入世界文学发展的潮流之中。

新文学运动虽然由留美学生胡适等人发端，而辅翼和完成之的，大半是留日学生。可以说，在构筑中国现代新文学的过程中，留日学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郭沫若曾言“中国的新文艺是深受了日本的洗礼的”，这一论断的根据是“中国文坛大半

^① 转引自梁容若：《中日文化交流史论》，第30页。

是由日本留学生建筑成的”。^①且不说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鲁迅、周作人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轫者，前期创造社成员郭沫若、郁达夫等人更几乎是清一色的留日生。实藤惠秀氏也曾指出，中国文学家大多是从日本回来的，不是日本学校出身的人，在成名之后也一定要游日本一遭，如蒋光慈、长虹、谢冰莹、巴金、觉樱、梁宗岱等。可以说，正是在日本文学的熏陶和影响之下，中国新文学才得以发生发展起来。

五四时期的留日作家群，大都是在清末民初留学日本的。在当时积贫积弱、内外交困的时代背景之下，他们最初怀抱“科学救国”之志，在日本学习政法、医学等科目。但后来或转而欲以文艺救国，或为当时日本新文学的兴盛所刺激，先后放弃了原来所学，转向于文学的研究和创作。其显著者如学医的鲁迅、郭沫若，学海军的周作人，学法制经济的郁达夫等，以后都成了中国新文学创作或评论的大家。从他们的艺术观和创作实践中，不难看出日本文学的深厚渊源。

鲁迅于1902年赴日，1909年返国。七年多的留学生活，深刻地影响了他的文化观念和文学思想。日后，鲁迅把这段时期看做是决定自己走上文学之途的光辉“华年”，时时心随东棹，追怀不已。留日期间，鲁迅阅读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尤其是欧洲的近代文学作品，其中也包括日本文学作品。他在《答北斗杂志社问》中曾说：“看外国的短篇小说，几乎全是东欧及北欧的作品，也看日本作品。”广泛地向中国人民介绍日本文化，成为鲁迅文学生涯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抨击现实，救治人心，鲁迅不断地推荐“从外国药房贩来的……泻药”，其用心可谓良苦矣。

在当时日本文坛诸大家之中，鲁迅最敬服的首推夏目漱石。夏目漱石堪称日本近代文学主潮的代表作家，其作品中时时流露

^① 郭沫若：《桌子的跳舞》，《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6卷），第5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的诙谐幽默与贯穿始终的忧愤深广，深受鲁迅的喜爱。据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画谱》中回忆说：“他对于日本文学不感什么兴趣，只佩服一个夏目漱石，把他的小说《我是猫》、《漾虚集》、《鸭笼》、《永日小品》，以至于干燥的《文学论》都买了来，又为读他的新作《虞美人草》订阅《朝日新闻》，随后单行本出版时又去买了一册。”直到1935年岩波书店开始出版《漱石全集》的最终版本以后，鲁迅还通过上海内山书店陆续购买，去世前10天购得1936年9月版的第14卷。

鲁迅深受夏目漱石文学创作艺术的影响，他那嘲讽中不无轻妙的笔致之中，隐约可见夏目漱石的面影。夏目漱石的名篇《我是猫》对东方国家近代化初期盲目引进西方精神文化，从而导致价值失衡的现状所流露出的焦虑与批判精神，曾经引起过鲁迅的强烈共鸣。《阿Q正传》那独特的叙述描写手法和结构形式，或多或少受到了《我是猫》的启发。《藤野先生》与夏目漱石的《克莱喀先生》也存在着艺术上的联系。当五四新文化运动落潮之后，鲁迅再度陷入难耐的苦闷与彷徨之中，他此期创作的《野草》、《彷徨》等作品中，亦可见其对夏目漱石文学精髓的回应。

鲁迅还与其他日本作家如菊池宽、武者小路实笃、芥川龙之介、有岛武郎等人互有往来，并翻译了他们的大量作品，在创作过程中亦多有借鉴。鲁迅于1921年6月翻译了芥川龙之介、菊池宽的历史题材作品，受其影响，开始重视从历史素材中提炼有现代意味人生哲理的思想，并于次年11月开始了同类题材作品《故事新编》这一艺术形式的尝试，创造了独树一帜的文体。这与他译介芥川龙之介、菊池宽的作品是不无关系的。鲁迅还于1924年、1925年翻译出版了日本文艺评论家厨川白村的理论著作《苦闷的象征》和《出了象牙之塔》，并把它们作为教材在大学的讲授。鲁迅在此期间创作的散文诗集《野草》，无论思想内涵或创作手法，均明显受到了厨川白村这两部著作的影响。

周作人于1906年追随其兄长鲁迅赴日留学，进入立教大学

学习古希腊语及英国文学。同时，他对日本的民俗与文化由衷地怀有一种“入化”的体味和热爱，尤其对于日本文学有着极深的造诣。周作人不仅对日本的“雅文学”如和歌、俳句、汉诗及古典小说深感兴趣并卓有研究，对日本的“俗文学”如狂言、落草的研究亦颇有成就。和歌，俳句，是日本独有的一种诗歌形式，是表现刹那间的感情、捕捉瞬息间的思想火花的利器，深受日本民众的欢迎。这种诗歌形式是日本人大胆地吸收汉诗的联句而加以创造成功的。著名的俳句大师芭蕉、千家元胤、川柳等给五四时期的新诗运动以巨大的影响，其中以周作人、郭沫若所受影响最为明显。

回国以后，周作人在大学里讲授日本文学，并在五四前后以激进姿态投入并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周作人最突出的贡献是直接借鉴了当时日本文坛中流行的“白桦派”人道主义理论，以“人的文学”来概括新文学的本质特征。他所撰写的对五四新文学发展影响巨大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等论文，可以说是武者小路实笃、有岛武郎等人文学理论的发挥。

终其一生，周作人一直坚持翻译介绍日本文学，翻译狂言，介绍俳句，对于俳句诗人的其他作品也尽力介绍，且与他们有直接的书信往来。1919年秋，周作人翻译了千家元胤的小说《深夜的喇叭》，并且对作者做了详细介绍。20年代初期，周作人在《小说月报》第12卷第5号（1921年3月）发表了题为《日本的诗歌》一文，上自万叶时代的长歌、短歌、旋头歌、下至明治时代的正冈子规与谢野晶子等，纵论日本的传统诗歌及其诗人，而其中对于俳句的介绍所用篇幅最多。此后，周作人还陆续写下《日本诗人——茶的诗歌》、《石川啄木的短歌》等文章，并举行各种演讲。再加上印度诗人泰戈尔的《飞鸟集》也于此时介绍到了中国，而它所使用的也是短小精悍的诗体，于是从1921年开始的四年间，中国兴起了“小诗”热，小诗创作空前高涨。“小

诗”的形式多种多样，但多是以三言两语寄寓无穷之意蕴，诗中所赞美的世界，不仅仅限于对自然的观照，也有不少是具有思索性倾向的作品，其中冰心创作出版的诗集《繁星》影响极为深远。

郭沫若早年留学日本，在那里阅读并翻译了不少欧美及日本作家的作品。如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葛西善藏、志贺直哉的小说，德国诗人歌德、海涅、印度诗人泰戈尔、美国诗人惠特曼等人的诗篇。后来他在谈及自己前期的诗作和创作时的环境时曾说，《女神》、《星》的时代，他“渴望中华民族复兴”，在思想上接近泛神论，“对当时日本的新思潮”，“自然也很受了影响”，^①因此他把在日本求学这段时期作为自己一生的“第二个转折点”。

虽然郭沫若在五四时期很少译介日本文学作品，但实际在艺术观与创作实践中却深受日本文学的影响。郭沫若早期的文学主张是“要本着内心的冲动以从事创作”，与当时风行日本文坛的“私小说”^②的理论多有吻合之处。他的早期作品如《漂流三部曲》、《阳春别》、《湖心亭》等，在创作方法和思想意蕴上均和“私小说”结下了不解之缘。郭沫若的诗《匪徒颂》与戏剧集《三个叛逆的女性》，也能够从有岛武郎的《叛逆者〈罗丹考察〉》等文章中找到若干渊源。有岛武郎的“叛逆”是“对本国现行的政治、产业、宗教和教育的叛逆，对平民百姓的热爱的实践”，^③而郭沫若的“叛逆”同样也是对本国血腥的专制统治、污浊的腐败现象与根深蒂固的礼教传统做出的奋争和决裂。有岛武郎曾在《叛逆者》中把 Millet（即米勒）视为叛逆者的首领，郭沫若在诗歌《电火光中》里而，抒写米勒绘画给他带来的激励，并且这种

① 蒲风：《郭沫若谈诗》，《现世界》创刊号，1936年8月16日。

② 私小说，也译为“自我小说”、“心境小说”。日本独有的文学体裁，产生于明治时代，盛行于大正时期，代表作家主要有冈山花袋、德富芦雄等。

③ 山田昭夫：《有岛武郎——姿态与轨迹》，右文书院1973年版。

从绘画中汲取作诗灵感的审美方式也与白桦派作家颇为相似。

1921年，郭沫若集合同道在日本成立创造社，并成为其中坚作家，在诗歌、小说、戏曲等领域发表多部具有强烈浪漫主义倾向的作品，20年代后期急遽左倾，成为“革命文学”的倡导者。综观郭沫若的文学生涯，其文学素养的根柢，毋庸置疑是与他留学日本时的经历密不可分的。

在五四新文学作家中，前期创造社可以说是和日本文学联系最为密切的文化群体，其所倡导的“为艺术的艺术”的浪漫主义思潮正是从日本转贩而来。除郭沫若外，才气横溢、命运多舛的郁达夫堪称前期创造社成员中的出类拔萃者。在日本留学期间，郁达夫广泛涉猎了西洋文学，特别是近代欧洲文学和日本文学，从中汲取了很多滋养，其中尤以“私小说”对其影响最大。

在将近十年的异国生活中，郁达夫同当时许多留学或侨居海外的中国人一样，受过种种歧视和轻慢，从而激发了他的爱国热忱，也形成其愤世嫉俗、忧郁感伤的思想性格，这些在他的作品均得到了鲜明的反映。郁达夫不仅对“私小说”作家葛西善藏的心境小说“感佩得了不得”，^①而且还“最崇拜”佐藤春夫，所以每每在自己创作中进行模仿。郁达夫以《沉沦》蜚声文坛，稍加考索，便可看出该作与佐藤春夫《田园的忧郁》之间的关系。此外，郁达夫的《银灰色的死》、《还乡记》等早期作品大多采用“私小说”的创作手法，从其小说人物形象的漂泊身世、不幸遭遇、哀怨情愁和抑郁苦闷中，不难辨认出作者本人的气质或窥见作者自己的身影，可谓是半真半假的“夫子自道”。

以文艺理论家、诗人而知名的胡风（本名张光人）于1929年踏上留日旅途。抵日后，胡风先后在东亚日本语学校、庆应大学学习。在此期间，胡风阅读了日本出版的大量普罗（无产阶级）文学的书籍、报刊和苏联文学作品。他当时在庆应大学学的

^① 郁达夫：《村居日记》，《日记九种》，上海北新书局1927年版。

虽然是英文科，但其主要兴趣和精力在于从事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投入日本的普罗文学运动。1931年，经日本同窗泉充的介绍，胡风参加了日本普罗文化联盟所辖的普罗科学研究所的艺术学研究会，并在季刊《艺术学研究》上介绍中国的反战文学，以谷非的笔名撰写《无产阶级文学讲座》，热切参与日本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而且，胡风还在此时结识了日本普罗文学作家大宅壮一、江口涣、小林多喜二、秋田雨雀等人，通过与他们的接触和交往，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了解和对中国新文学中以鲁迅精神为主导的革命传统的理解。

1931年底，胡风和留日学生方天一、王承志参加了日本的反战同盟，成为中国小组的成员。同时，胡风又和方天一加入了日本共产党《赤旗报》的读者小组。后来根据日本共产党的通知，这个小组被批准为日共党员小组，从而集体加入了日本共产党。不久，胡风和谢冰莹等三人一起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东京支盟。1932年，胡风和方天一邀集中国留日学生聂绀弩、周颖、邢桐华、王承志等发起成立了“新兴文化研究会”，其下分设社会科学研究会和文学研究会。胡风为文学研究会的负责人，主持召开过多次学术讨论会，研究国内刊物的创作倾向，讨论国际反战文学的现状以及中国反战文学的情况。

在向日本读者介绍中国的同时，胡风也不断地向中国的读者介绍日本及其日本的普罗文学。他从普罗诗人远地编辑的《普罗歌人集》中选译了两位日本女工写的诗，一首是京山爱子的《给妹妹》，一首是东园满智于的《妈妈》。胡风把这些具有鲜明、浓郁的普罗色彩的文艺作品推荐给中国的读者，无疑对推动中国左翼文艺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①

^① 胡风：《胡风回忆录》，第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

3. 日本戏剧与中国戏剧界

20世纪初年，由于国内反封建斗争的需要和国外戏剧文化的袭入，中国戏剧界的有识之士在对传统戏曲文化的批判中，呼唤着一种全新的戏剧。在他们看来，“戏园者，实普天下之大学堂也；优伶者，实普天下人之大教师也。”^① 甚至有人还把小说和戏剧进行对比，认为“戏剧之效力，影响于社会较小说尤大”。^② 从而继“诗歌革命”、“小说界革命”之后，中国戏剧界亦高举起“戏剧革命”的大旗。

正是在这种强烈的斗争精神和民族情感的裹挟之下，话剧从日本和法国辗转进入中国，以其反映现实的“真”与有益世道的“善”，同革命时期中国的社会需求和审美需求相契合，得到了中国革命家、戏剧家的青睐和推崇。最先接受话剧形式，做比较正规演出的是留日学生在东京组织的春柳社。早期话剧著名活动家李叔同、曾孝谷、陆镜若、欧阳予倩等，都是在日本接受艺术启蒙，开始从事戏剧活动的。早期话剧（也即文明新戏）亦主要是在日本新派剧和新剧艺术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从戏剧观念、演出形式、演出剧目，乃至表演风格和舞台美术，无处不打着日本戏剧的深深烙印，因此当时就有人认为“所谓新剧者，日本戏剧也”，^③ “话剧初入中国之时，完全是受了日本的影响”。^④

“誓渡众生成佛果，为现歌台说法身。”^⑤ 欲借重戏剧舞台，抒发胸中块垒，行教化之职，弘扬兴邦主张，成为蕴积在中国戏剧变革者胸中的孜孜追求。辛亥革命前夜，留日学生任天知率进化团在上海、南京、苏州等地编演《血蓑衣》、《东亚风云》、《黄

① 三爱（陈独秀）：《论戏曲》，《新小说》第2卷第2期，1905年3月。

② 铁：《铁瓮烬余》，载《小说林》第12期，1908年10月。

③ 剑啸：《中国的话剧》，载《剧学月刊》第2卷第7、8期合刊，1907年9月。

④ 《春柳社演艺专章》，载《北新杂志》第30卷，1907年6月。

⑤ 沈所一：《劝学篇》，载朱双云《新剧史·杂俎》，《新剧小说社》第14期，1909年8月。

《金赤血》、《共和万岁》等“即事之作”，以非戏剧的意识，冲击了传统的戏剧观；春柳社诸人亦先后回国以新剧同志会、文社等名义，上演《黄花岗》、《家庭恩怨记》、《不如归》、《社会钟》等社会问题剧，针砭现实，发人深省；刘艺舟、王钟声等北上天津、北京演出《孽海花》、《官场现形记》、《新茶花》等剧，矛头所向，直指昏聩衰朽的清政府。可以说，伟大的辛亥革命推动着新剧的蓬勃发展，而新剧也以其革命宣传和斗争呐喊，将辛亥革命的风云席卷神州大地。然而，也正是因为早期话剧过多地承载了启蒙主义和政治思潮的功利内容而超重和失衡，难以自如地起飞和翱翔，尽管轰动一时，却只是昙花一现。

辛亥革命之后，军阀割据的黑暗现实笼罩神州，为宣传革命而繁衍生存的文明新戏无所附藉，失去了维系生命的精神支柱。新剧发源地上海的形势更为严峻，至1912年下半年，大多数新剧团体或被迫就此解散，或黯然离开上海，喧嚣一时的上海新剧剧坛一时陷入了沉寂。

为求生存，一些文明戏艺人组成“新民社”，迎合小市民意懒心灰、逃避现实的心理，“不志兴亡志滑稽”，大做游戏文章，试图超脱社会而幽默人生，编创了大量家庭戏、神怪戏和宫廷戏，上演后获得普遍欢迎，封建文化因而在文明戏中悄然回潮。新民社的走红与成功，引起一些资本家和商人的覬覦，于是他们开始插手剧坛，以资本控制艺人。1914年间，上海的职业文明戏团体相继开锣登场，剧团有数十个之多，职业演员在千人以上，演出剧目达数百出。这次突如其来的“繁盛”在当时被称为“甲寅中兴”。新剧界一时之间畸形繁荣，而剧目质量却江河日下，充满了诲淫诲盗、低级庸俗的糟粕，已彻底违背新剧的初衷，在表面的风光中埋下了没落的种子。当时有人著文慨叹道：“吾国新剧界，每况愈下，春柳后，广陵散盖绝响矣。呜呼，靡

靡之音，足以亡国。”^① 日渐堕落的文明戏旋即为时代和民众所唾弃，最终走向了滥俗和末路。

与此同时，日本剧坛进入大正时代（1912年至1925年），新派剧已由盛转衰，代之而起占据主流地位的是有“现代话剧”之称的新剧。新剧是在欧洲近代剧运动的直接影响下，以否定歌舞伎和新派剧的姿态出现的，它以欧洲近代剧为目标，接受欧洲近代剧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大量搬演介绍易卜生、契诃夫、高尔基、托尔斯泰、梅特林克等近代世界戏剧大师的作品，其中以易卜生的影响最大。当时的日本剧作家几乎都程度不同地受到易卜生戏剧的影响，如著名剧作家秋田雨雀、长田秀雄等，此时都转向了现实主义，接受欧洲近代剧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创作出了像《被埋葬的春天》、《欢乐鬼》之类现实主义的杰作。

虽然此时中国的早期话剧日益商业化、低俗化，但仍然有不少正直艺人和学生演剧社团在困顿无援中，坚守艺术的追求。孙玉声、周剑云、凤昔醉等入于1913年创建启民社，就是抱着“启发人心、改良社会的志愿，以实行社会教育为宗旨”，^② 致力于早期话剧的创作和演出。刘艺舟亦在茫茫黑暗中重整旗鼓，创建励群社，“在讴歌俚曲之间，而觅爱国励群之道”。以天津南开学校和北京清华学校为代表的许多学生演剧社团，在经费难以为继的困境中，依然坚持创作剧本、排练剧目并组织公演。

早期话剧界正是通过学习日本新剧而间接接触了欧洲近代剧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并开始了最初的尝试。“二次革命”失败后，刘艺舟亡命日本，在日本剧界松竹合名诸公的帮助下，结集革命党人和留日学生，于1914年夏天创立了“光黄新剧同志社”，并邀来上海的开明社计划合作演出。经过两个月的编选剧

^① 宋春舫：《宋春舫论剧》第1集，中华书局1922年版，转引自葛一虹主编：《中国话剧通史》，第30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

^② 《欧阳予倩戏剧论文集》，第209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日和认真排练，于11月、12月上旬先后在大阪、东京公演了《豹子头》、《复活》、《西太后》、《茶花女》等剧。其中《复活》和《西太后》两剧，就是受到大正初期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影响而编演的。他们的探索和尝试，为欧洲现实主义创作思潮和方法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风行于中国奠定了基础。

早期话剧时代是中国戏剧迈向现代化的历史性转折时期，可以说，没有早期话剧革路蓝缕的草创之功，便没有现代话剧的日渐成熟与繁荣。我国早期话剧接受日本近代戏剧之影响是多渠道、多途径的，而翻译和搬演是其中最主要的途径。虽然在早期话剧时代很少有完整的翻译剧本出版，但翻译活动自始至终地存在着、活跃着，像早期话剧活动家李叔同、曾孝谷、欧阳予倩、陆镜若、刘艺舟、徐半梅等人，同时又都是出色的日本戏剧翻译家，翻译了不少作品。尤其是陆镜若，在短短十几年间就编译搬演了近十个日本新派剧剧目，产生了巨大影响。他寄热望于介绍莎士比亚和俄罗斯古典戏剧，进而“一步一步介绍现实主义的欧洲近代剧”，^①但因其贫病早逝而没能实现夙愿。徐半梅、许啸天、刘半农等人翻译或创作的话剧，虽然在当时没能成为新剧活动的主潮，但他们的追求和努力毕竟在整个新剧运动的不景气之中，透露出生机和希望。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展开，给中国现代戏剧带来了新的机运，使它走出了以文明新戏的没落为标志的历史低谷，掀起全面介绍外国戏剧理论、翻译和改编外国戏剧创作的热潮。据不完全统计，从1919年至1924年，全国28种报刊共翻译剧本81部，涉及到46位外国剧作家。^②西方戏剧史上各种流派，从现实主义、

^① 欧阳予倩：《回忆春柳》，载《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第1辑，中国戏剧出版社1958年版。

^② 王嘉良、金汉主编：《中国现当代文学》，第108页，杭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浪漫主义戏剧到现代象征派、未来派、表现派、唯美派、新浪漫派戏剧，几乎同时涌入中国，短短十数年间，便错综地敷演出欧美戏剧数百年来曲折发展的历史，将中国话剧剧坛装点得绚丽多姿。

同时，五四时期个性解放和精神解放的狂飙，民主与科学的理性追求，及其彻底扫荡封建污浊、现实丑恶的气势，自然使五四一代有志于话剧事业的先驱者们在新思潮的鼓舞下，通过对文明新戏的批判，从不同的方面和领域，对话剧艺术的理论知识、文学创作和舞台艺术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和尝试。在动荡纷扰的时代背景下，五四剧作家更多地采用那种直面现实而把社会人生真实地描写出来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创作中注重大众的喜怒哀乐，观察社会的脉搏跳动，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留日归来的田汉堪称五四剧作家中的佼佼者。

田汉是中国现代话剧的奠基人之一，在中国话剧史上有着深远影响，其作品至今盛演不衰。不论是他的戏剧创作，还是他领导的戏剧运动，都受到了日本戏剧的直接影响。田汉于1916年赴日留学，在那时接触到各种戏剧演出和有关书籍，深受菊池宽、秋田雨雀、武者小路实笃、厨川白村等文坛巨匠的影响。当田汉第一次读完秋田雨雀的《国境之夜》后，立刻对他的创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说：“这一篇《国境之夜》与其谈技巧，无宁讲他的热烈的中心思想。……一言以蔽之，此剧主意在攻击个人主义，其反而便是力说社会主义。得暇想尽读其所作剧，庶几能尽他的‘全图’。”^①田汉不仅阅读日本剧作家的剧作，还动手翻译了不少日本戏剧作品，主要有《日本现代剧选、菊池宽剧选》、《日本现代戏三种》、《围着棺的人们》（秋田雨雀著）、《桃花源》（武者小路实笃著）等。

日本戏剧的影响，不仅坚定了田汉做一个戏剧家的信念，面

^① 田汉：《蔷薇之路》，第14页、15页，上海泰东图书局1922年版。

且直接启发了他的创作思想。1922年田汉回国，受聘于上海中华书局编辑所。此后，田汉还致力于开展戏剧运动，提倡“在野的戏剧”，目的就是为了给沉闷的中国文艺界“鼓动一种新鲜芳烈的空气”。^① 1924年，田汉与妻子易漱渝创办《南国半月刊》，发表独幕悲剧《获虎之夜》，引起轰动，上海各学校竞相上演。1927年，田汉主持上海艺术大学时，会同欧阳予倩、唐槐秋、周信芳等人举行了著名的为期一周的“艺术鱼龙会”，震动了上海戏剧界，开拓了我国戏剧运动的新路。

1928年，田汉与徐悲鸿、欧阳予倩组建南国艺术学院，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创作剧本、训练演员并组织公演。同年秋，田汉创办南国社，“大体上也是模仿小山内薰的筑地小剧场而建成的”，^② 并且确定了“团结与时代共痛痒之有为青年，作艺术上之革命运动”的宗旨，成为中国最早具有专业性质的话剧团体之一。南国社剧人直面社会，以狂飙精神推进新戏剧运动，曾多次到南京、杭州、广州等地演出。南国社的创作和演出，不仅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而且培养了一批艺术骨干，对话剧事业的开拓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一时期，田汉还主编了《南国月刊》，写作了《古潭的声音》、《颤栗》、《南归》、《第五号病室》、《火之跳舞》、《孙中山之死》等剧本和一系列关于戏剧运动的文章。1930年秋，国民党当局下令查封南国社，田汉等人被迫解散剧社，投身于左翼戏剧运动的洪流之中。

直到30年代，在留日学生中新剧运动仍然有很大影响。《雷雨》在日本的公演和日译本的出版，堪称中日戏剧交流史上的一件盛事。《雷雨》于1934年在《文学季刊》发表以后，立即受到了日本戏剧界的关注。当时两位关注中国文坛的青年学者武田泰淳和竹内好，看过《雷雨》剧本后，深深为之感动，认为《雷

^① 田汉：《我们的自己批判》，《南国月刊》第2卷第1期，1930年5月。

^② 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205页。

雨》虽受到欧洲古代命运悲剧和近代易卜生的明显影响，但它是中国戏剧创作上的重要成果，遂决定把《雷雨》搬上东京舞台。

于是，“在（中国）人不知不觉间，《雷雨》突然为一群流浪东京的爱好演剧的青年搬上舞台”。^① 1935年4月，在武田泰淳和秋田雨雀等人的鼓励和帮助下，《雷雨》以中华话剧同好会的名义，在东京神田一桥讲堂举行首次公演，这是《雷雨》历史上的第一次域外演出。之后在秋田雨雀的力荐之下，由影山三郎和郑振铎合译的《雷雨》于1936年1月由日本汽笛社出版。秋田雨雀不但支持《雷雨》日译本的出版，并且在即将出书前在《汽笛新刊月报》（1936年1月19日第7号）发表了题为《关于中国现代悲剧〈雷雨〉的出版》评论文章。《雷雨》的域外演出，在中国国内也产生了极大影响，“中华话剧同好会自本年春上演《雷雨》以来，国内亦争相演出这个剧本”。^②

1935年，留日学生还组织成立了“中华国际戏剧协进会”和“中华戏剧座谈会”，公演了多出戏剧，在演技、布景和效果方面，得到了包括秋田雨雀、伊藤熹朔、岩村成允许等在内的许多日本艺术家提供的指导和帮助。这几个团体于1936年合并为“中华戏剧协会”，到1937年又诞生了“中国留日剧人协会”，可见即使是在中日关系日益恶化的30年代，中日之间的戏剧文化交流仍然没有中断。

4. 梅兰芳与中日戏剧文化交流

梅兰芳是把中国戏曲传播到国外去并获得国际盛誉的第一个戏曲表演艺术家，他在国外的演出活动，增进了各国人民对中国古典戏曲的了解，有助于中外戏剧的交流。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京剧艺术高度成熟、并跻身于世界戏剧艺术之林的鼎盛时

^① 《杂文》第1号，转引自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205页。

^② 《留东新闻》第5期，1935年9月27日。

期，梅兰芳在这一时期两度率团出访东瀛，堪称近代以来中日戏剧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盛事。

1919年4月，梅兰芳应日本帝国剧场董事长大仓喜八郎之邀，在曾留学日本的许伯明、舒石父等人陪同之下，率领剧团二十余人赴日演出。同年5月，在当时东京规模最大、设备最全的帝国剧场与日本歌舞伎同台演出12场，剧目为《天女散花》、《御碑亭》、《黛玉葬花》、《虹霓关》等，受到了日本观众的广泛欢迎，在为期12天的演出中，10天座满，只有两天空了几个座位，到处是“万人空巷，争看梅郎”的热烈场面。^①

在东京，最受欢迎的剧目是《天女散花》和《御碑亭》。《天女散花》是梅兰芳继《嫦娥奔月》后新编的另一出古装歌舞戏，其中最拿手、也叫座的一段绸带舞是梅兰芳根据古画里一些舞蹈造型以及老戏中“耍龙筋”、“舞彩绸”等身段动作重新编排的，在北京舞台上演出就得到了观众的认可和喜爱。大仓喜八郎就是在北京观看了这出《天女散花》后，才萌生邀请梅兰芳赴日演出之意的。梅兰芳此次赴日演出，第一场戏就是《天女散花》，并受到日本观众的热烈欢迎。《御碑亭》演出场次不及《天女散花》，却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日本观众非常喜爱这出戏。有“中国通”之称的彼多野乾一对梅兰芳说：“《御碑亭》演出时，观众的反映也异常强烈，有些女观众掩面而泣，因为类似王有道休妻的事在日本是屡见不鲜的，她们有身世之感，所以流下同情之泪。”^②

昆曲《思凡》一折，尤其受到日本戏剧舞蹈家的高度赞誉。《思凡》是一出唱做并重的歌舞剧，描写尼姑赵色空因不愿在青灯古佛旁了此一生，决心脱离佛门，追求美好自由生活的故事。

^① 刘彦君：《梅兰芳传》，第108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② 许姬传、许源来：《忆艺术大师梅兰芳》，第18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86年版。

她手执佛尘，身段动作优美自然，大胆激奋地唱出“奴把袈裟扯破，埋了藏经，丢了木鱼，丢了饶钹”的心声，反封建色彩异常浓烈。不但许多观众为之如醉如痴，同时也引起了一些中国戏曲研究专家如青木正儿等人的关注，并进一步对昆曲的表演技巧、唱腔风格、源流发展等进行了细致的探讨。日本著名舞蹈家藤荫静枝受其影响，于1921年把著名剧作家福地信世改编的《思凡》搬到日本舞台上演出，因其正符合日本大正时期追求个性解放的思潮，公演后引起轰动，或褒或贬，毁誉不一，给日本的新舞蹈运动以巨大影响，藤荫静枝亦因此被称为新舞蹈运动的觉醒者。

梅兰芳剧团在东京每演一场，东京各大报纸都抢登评论文章和梅兰芳的大幅剧照。文化界的许多知名人士如内藤虎次郎、狩野直喜、藤井乙男、冈崎文夫、丰冈圭姿、青木正儿等人均提笔著文，或评论介绍梅兰芳的表演艺术，或追溯考订中国古典戏剧的源流演变，并由汇文堂辑为《品梅记》行世。

在帝国剧场演出获得巨大成功之后，梅兰芳又应《大阪日报》和《关西日报》社的邀请，率剧团奔赴大阪演出两场，剧目为《思凡》、《御碑亭》、《琴挑》、《天女散花》等，这是京剧在日本的第一次专场演出。随后梅兰芳一行又应神户侨商马聘三、王敬祥等人之邀，为华侨举办的中华学校募集资金演出三场。梅兰芳一行所到之处，广受欢迎，正如当时北京一家报纸所形容：“彼都士女空巷争看，名公巨卿多有投高纾赠之雅。名优竞效其舞态，谓之梅舞。”

在日本演出期间，梅兰芳还与日本著名歌舞伎演员中村歌或卫门、市川左团次、中村雀右卫门、尾上梅幸、守田勘弥（守田勘弥是日本歌舞伎演剧场和俳优的名称，自1660年传下来的名家，此处指十三世，1885—1932年）、松本幸四郎等结下了深厚友谊，或同台演出，或交流经验。如梅兰芳曾向中村雀右卫门请教过一些日本歌舞会的化妆技巧。梅兰芳一行载誉而归后，日本的不少剧团还排演了《天女散花》等剧目。

梅兰芳首次访日演出的成功，为中国京剧艺术进一步与世界各国戏剧艺术的交流起到了推动作用，同时也使日本民众对中国文明与文化有了更为感性的认识。正如欧阳予倩在《梅兰芳到日本后之影响》一文指出的：“甲午后，日本人心目中，未尝知有中国文明，每每发表言论，亦多轻侮之词，至于中国之美术，则更无所闻见。除老年人外，多不知中国之历史。学校中所讲授者，甲午之战也，台湾满洲之现状也，中国政治之腐败也，中国人之缠足、赌博、吸鸦片也。至于数千年中国之所以立国者，未有研究之。今番兰芳等前去，以演剧而为指导，现身说法，俾知中国文明之万一。”^①

1923年9月，日本东京因关东大地震引起大火，市内中心地区，包括几个大型剧场，顷刻间均遭破坏。梅兰芳闻讯后，率先举行募捐义演，把全部收益1万元悉数捐给了日本的救灾组织。1924年10月，东京帝国剧场重新修复，大仓喜八郎再次来函邀请梅兰芳赴日演出，以庆祝剧场隆重开幕和大仓的88岁寿诞。梅兰芳欣然应邀，再次率承华社四十余人前往日本，在帝国剧场演出15场，剧目是《麻姑献寿》、《廉锦枫》、《红线盗盒》、《奇双会》、《审关刺汤》、《虹霓关》、《御碑亭》、《贵妃醉酒》等。10月21日的《东京朝日新闻》曾报道过开幕式当晚的盛况：“由梅幸、幸四郎上演《神风》后，梅兰芳上演了《麻姑献寿》，当晚有东京、横滨一带的知名人士和文艺界专家一千二百余人。”

演出获得了巨大成功，而观众的眼光和评价，也比第一次梅兰芳来东京时更加内行。一些评论文章不仅能指出中国京剧歌舞的特点，而且还能区别各种不同的声腔。如10月27日的《东京每日新闻》发表的高泽初风题为《帝剧实效演出》的评论文章指出：“二十五日演《麻姑献寿》，梅兰芳扮麻姑，舞姿很美，嗓音响亮，舞台绚丽，十分精彩。在音乐上，西皮、二黄和昆曲齐

^① 《春柳》，1919年第5期。

备，登场人物又多，再加上服装道具灿烂夺目，观众一看到就大吃一惊……”《万朝报》也刊载了类似的评论文章。

随后梅兰芳又在大阪和京都演出六场。当时大阪市的宝冢电影制片厂还为梅兰芳拍摄了《红线盗盒》全剧、《虹霓关》中的“对枪”一场和《廉锦枫》中的“刺蚌”一场，并且随着这一电影厂的发行渠道传遍了整个日本乃至欧美许多国家。日本蓄音器商会还为梅兰芳录制了五张唱片在日本出售，其中包括《红线盗盒》、《御碑亭》、《天女散花》、《贵妃醉酒》等名剧的唱段。

回国之后，梅兰芳继续保持着和日本戏剧界的来往。1926年8月，日本著名戏剧演员守田勘弥和村田嘉久子等一行五十余人到北京献艺。梅兰芳热情接待了他们，并借大方家胡同李宅为他们洗尘。日本剧团借开明剧场进行了为期三天的表演，梅兰芳与王凤卿、刘景然、朱桂芳、龚云甫等人也同台演出了《战蒲关》、《金山寺》、《六月雪》等剧目。

5. 日本美术与中国美术界

对中国而言，20世纪前半期是一个充满矛盾冲突的时代，亦是一个东西方文化冲撞与融合的时代，近现代中国文化的一切变革，可以说都是在西方文化的强力介入之下发生的。随着西方民主与科学思想的引进，西方艺术思想和西画也叩关而来，加速了中国美术由古典向现代递嬗的过程。而在引入西方美术的过程中，时而大门洞开，时而高墙垒筑，充满了种种曲折和艰辛。

曾经辉煌的中国绘画到近代以来已趋于式微。伴随着文化界声势夺人的全盘西化的呼声日甚一日，绘画界对西方先进而科学的绘画技艺和理论渐趋向往，再加上不满于旧文人画一味追求个人渲泄式的笔墨游戏或陶醉于玄远淡泊不问世事。当时人们对绘画界的批判也愈益猛烈。早在1917年，改良派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康有为便慨叹本国绘画技艺疏浅，较之西方远远不如。此时蔡元培、陈独秀、鲁迅等人均有类似对于中国文人画陈陈因循而脱

离现实之弊病的指摘。如蔡元培发表《以美育代宗教说》一文，认为“鉴刺激感情之弊，而专尚陶养感情之术，则莫如舍宗教而易以纯粹之美育”，寄希望于借美育作为改造国民精神的手段。他还指出：“今世为东西文化融合时代，西洋之所长，吾国自当采用。……彼西方美术家，能采用我人之长，我人独不能采用西人之长乎？”

正是在蔡元培等人的竭力提倡和影响之下，拉开了属于新文化范畴的中国现代美术的序幕。艺术教育开始在普通教育中占有相当的地位。许多外籍西画家，如日本的秋田羲一、有岛生马、长谷川升、中川纪元等人，或来华暂居，或旅游写生，与中国美术界交往颇多。中国的插图木刻版画艺术，同日本的“浮世绘”版画艺术，均拥有数百年发展历史，代表了各自民族艺术的传统。但西欧的新版画刻法，却是由日本先行接受，继而中国辗转引进的。

同时，鉴于近代西方美术的东渐和渗透，走出国门、负笈游学欧美或日本成为学习西方美术的两大潮流。正如蔡元培所指出：“至近今数十年，欧洲美术渐渐输入，其技术与观念，均足为最良好之参考品，是以国内美术学校均兼采欧西；而游学欧洲，研究美术者，亦日盛一时。”“现今各地方都设新式学校，年年派学生到欧美各国留学，翻译欧美学者的著作，都十分尽力。”^① 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日本既是引入西方美术的最近之路，坐拥“文同、路近、费省”之便，同时又在师法西方文化方面颇有成效，因此大批留学生东渡日本，“青衿之子，挟希望来东邻者如鲫鱼”，^② 日本遂成为中国美术学子学习西方现代绘画艺术和理论的驿站。

^① 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说》，《蔡元培选集》（上），第210页，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② 见《浙江潮》，第3期，1903年4月。

中国美术界大规模的留日活动如果从陈师曾留日的1902年算起，至1937年结束，前后共35年，超过三分之一个世纪。据不完全统计，这段时期去日本留学或游历的中国著名美术家多达三百人以上，囊括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美术俊才。其中如高剑父、高奇峰、李叔同、陈师曾、王悦之、何香凝、郑锦、姜丹书、沈尹默、吕凤子、王梦白、丰子恺、刘海粟、潘天寿等人都曾先后游学日本，主要就读于东京美术学校、川端画学校、京都绘画专门学校、日本女子美术学校等几所颇具声望的美术学校。学习美术的留学生留学的目的以学习油画为主，约占80%，其余有学雕塑、陶艺、漆艺、图案、美术史者，只有极个别的人学日本画。

在1937年以前，西方现代美术诸流派正源源倾入日本，各种流派和思潮风起云涌，异彩纷呈，形成日本近现代美术史上最开放、风格面貌最多的一段时期。中国留学生适逢其时，既在学校师从学院式写实油画，同时又深受社会上现代主义的影响，均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现代主义诸流派的熏陶。如梁锡鸿等留日学生于1934年在东京成立了中华独立美术研究所，主张以超现实主义为效仿对象来独立地从事创作，反对以模拟现实生活为艺术目的，旨在把西方和日本的现代主义艺术介绍到国内，以期实现东西方艺术的交流与融合。西方现代艺术的许多概念，都是先由日本人译为汉字，再由中国留学生传入中国的，如印象主义、后印象主义、新印象主义、达达主义、野兽主义、抽象主义、超现实主义，等等。留日学生身上所具有的使命感和学以致用的理性态度，使他们中的大多数在回国后，或投身于美术教育事业，或在教书作画之余著书立论，致力于引入和传播西方美术技艺和理论，成为东西方美术交流的先导和桥梁。

清末以来，随着学堂的建立，对美术师资的要求越来越迫切，专门培养美术教师成为社会的急需。在师范学堂里，首先兴办起的图画手工科，就是这种新型美术教育的最初形式，除聘请

日本教师任教之外，从欧日学成归国的留学生亦成为美术教育的主要师资来源。留日学生中的李叔同、李超士、陈师曾、高剑父等人为图画手工科的创建和教学做出了很大贡献。其中尤以李叔同最为人瞩目。

李叔同，名岸，字息霜，号叔同。于1905年东渡日本，进东京国立美术专门学校研习绘画，曾向日本著名油画家黑田清辉学画，绘画风格受印象派影响，学理与技巧并进，造诣颇深。1910年毕业归国后，初任天津直隶模范工业学堂图画教员。辛亥革命后，赴上海任太平洋社主笔，主办太平洋报画刊，曾绘制过不少装饰图案。又与柳亚子创办“文美会”，主编《文美杂志》。不久，浙江两级师范学校改组为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经亨颐开设高师图画手工专修科，聘请李叔同主讲专修科图画和全校音乐。中国现代美术史上的大家吴梦非、丰子恺、刘质平等都是他的得意门生。辛亥革命前后，在介绍外国文学艺术特别是西洋美术、音乐方面，李叔同做出了卓越贡献。

在社会美育思潮的推动下，兴办艺术教育团体的活动达到了高潮，官办私立的艺术学校如雨后春笋蓬勃出现。据不完全统计，到1930年以前已有25所。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私立的上海图画美术院、上海艺术大学、武昌艺术专科学校、苏州美术专科学校、中华艺术大学以及国立的北京美术专科学校、中央大学艺术系和杭州国立艺术院等。北京美术专科学校是国家正式建立的第一所美术学校，首任校长便是留日归来的郑锦，教授中也多以留日学生居多，如陈师曾、李毅士、王梦白、萧谦中、吴法鼎、萧俊贤等。我国早期的美术学校在介绍西方美术，弘扬民族文化、培养艺术人才、促进美学教育等方面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随着美术教育的逐渐展开，对西方美术理论和美术史的引进也成为必然。对西方美术史的介绍和翻译，一方面是直接从欧洲学者中的美术史著作翻译而来，另一方面则从日本学者研究西方

美术史著作翻译过来。或者由日本学者翻译西方著作，再从日文转译成中文。译介西方美术理论和美术史的工作，主要是由一批画家、翻译家和理论家承担的。这些学者或曾游学欧洲，或曾赴日深造，或一直在国内从事教育和研究。他们把来自异国的重要美术史著作及最新的美术思潮加以译介，取得了一批翻译和研究成果，成为中国艺术家和学者学习、研究西洋美术史的重要依据。

二三十年代，对日本美术史家上田敏、木村庄八和板垣鹰穗等人的系列西洋美术史著作的译介，成为引进西方美术的重要成果。其中尤以板垣鹰穗美术史著作及其美术思想在中国产生过深刻影响。192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郭沫若撰写的《西洋美术史提要》，就是以日人板垣鹰穗所著《西洋美术史》为蓝本撰著而成的。

板垣鹰穗的《近代美术史潮论》由鲁迅译成中文，1929年由上海北新书局初版，1957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该书不仅为我国美术界提供了近现代新的艺术及思潮的信息，而且也为我国美术史研究提供了可资参考的方法，影响极为深远。板垣鹰穗的著作译介还有萧石君翻译的《美术的表现与背景》、赵世铭翻译的《近世美术史概论》，等等。其他美术史家、艺术理论家的著作如上田敏的《现代的艺术》、木村庄八的《少年艺术史》、中井宗太郎的《近代艺术概论》等也都被介绍到了中国。

通过对西方现代美术论著的翻译和引进，扩大了西方现代美术在中国的影响，也有助于人们正确地分析和认识现代美术，因此当时对日本美术史著作和其他理论文章的译介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6. 日本音乐与中国音乐界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音乐对中国传统音乐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并迅速改变了中国音乐发展的面貌。在当时中国文化界

提出的“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体革命”等口号的影响下，音乐界提出了改良音乐的要求，主张效法日本，用输入西洋音乐来振奋起国民精神。

梁启超与曾志忞的音乐改革观点，代表了当时音乐改良思潮的主要倾向。梁启超认为，“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①他还热心提倡用西方技法创作新的音乐。曾志忞亦认为“泥古自恃”是阻碍中国音乐进步的原因，提出“欲改良中国社会者，盍何造一种二十世纪之新中国歌”？^②寄希望于效法日本和欧美各国，借西洋音乐之力来创造中国的新乐。

在这些主张影响之下，一批最早在日本学习西洋音乐的音乐家，包括沈心工、曾志忞、李叔同等人，会同新学界的人士，展开了多方面的音乐活动。他们举办讲授西洋音乐的“音乐讲习会”，发表鼓吹以西乐改造中国旧乐的文章，编写用外国曲调填配新词的歌曲，翻译并编印大量介绍西洋音乐和新歌曲的书谱及音乐刊物，创建音乐社团和管弦、铜管乐队，从事学堂乐歌教学和组织音乐演出等。这些活动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学堂乐歌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学堂乐歌大量产生于本世纪初期，当时清政府为挽回国势人心，推行新政，废止科举，在全国各地建立了大量新式学堂，音乐亦被作为“随意科”列入课程。“学堂乐歌”是当时人们对这些新式学堂中所设音乐和唱歌课程的称呼。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乐歌课便正式列为小学、中学、师范各类学校的正式课程。当时公布的“中学校令施行细则”规定中学设“乐歌”一课，每周一小时，把音乐作为必修课。从此以唱歌和讲授基础乐理为内容的普通学校音乐教育体制遂告确立。

学堂乐歌可谓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出现的新生事物，其中

^① 梁启超：《饮冰室诗话》，《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上，第77页。

^② 曾志忞：《音乐教育论》，《新民丛报》1904年第14号、20号。

绝大多数是填词之作，曲调主要来自日本，其次来自西欧各国。最早的乐歌课多是日本教习任教，传播乐歌的简谱记谱法也来自日本，甚至歌集都是在日本排版印刷而成的。学堂乐歌的内容多以反帝、强兵、御侮等爱国思想为主题，有些乐歌如《中国男儿》、《何日醒》等号召民族觉醒，宣传自强意识；有些如《女子体操》、《勉女权》等提出了妇女解放的思想；更多的学堂乐歌如《体操兵操》等，是专门向学生、儿童进行思想教育和知识教育的。除此之外，学堂乐歌中也掺杂着一些宣扬封建思想和鼓吹君主立宪的作品，反映新旧两种观念的斗争和对垒，但其主流是进步的。据不完全统计，刊载在1912年前后出版的唱歌教科书和各种报刊上的学堂乐歌，大约有一千四百多首，足可见其盛况。直到北洋政府时期，仍有不少军队采用日本军歌的曲调来唱军歌。

然而，由于学堂乐歌基本上都是填词歌曲，其曲调大部分来自日本和欧美，甚至有些曲调还被不同的作者反复填上不同的歌词。因此，学堂乐歌时期西方音乐对中国的影响，主要是体现在音调和节奏方面。仅有少量乐歌采用了中国民间曲调，真正创作的曲调则更如凤毛麟角。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当时绝大多数从事歌曲编配的知识分子以及后来在学校中担任音乐课的教师，只是一些爱好音乐、关心新式教育的民主主义者，有些则是应聘来华教书的日本教师，他们大多对我国的民间音乐并不熟悉。而且，当时这些知识分子受“维新运动的影响”，比较片面地认为只有这些欧美近现代音乐的曲调才能起到鼓舞士气的作用，如1914年出版的《中小学唱歌教科书》（李雁行、李英悼编）的序言中，曾认为：“若夫欧西之乐，其声壮厉，其状促遽，方之古乐虽远不及，比之郑卫能无犹贤？……当今之世，将欲以正教化，挽颓风者，舍西乐其奚自哉？”

面对“举国无一人能谱新乐，实为社会之羞”的局面，早在日本留学期间就已创办我国近代最早的音乐期刊《音乐小杂志》

的李叔同，率先于回国后出任城东女学音乐教习，并为学堂乐歌选曲填词。先后创作了《送别》、《忆儿时》、《早秋》、《大中华》、《隋堤柳》等歌曲，词意隽永、富于韵味，一经问世便不胫而走，至今传唱不衰。李叔同还编辑出版了《教育唱歌集》一书，辑录歌曲 26 首，其中幼儿歌曲 8 首，中小学生的歌曲 18 首。这些歌曲通俗明快，易于上口，在继承中国音乐传统的同时又注意吸收西方音乐技巧，贴近现实，催人奋发。此后，填词创作很快发展到由民族作曲家自行创作，李叔同自己首开新风，创作了我国近代最早的一部多声部声乐三部合唱作品《春游》。

同样留日归来的沈心工在学堂乐歌的填词、编配、推广和创作等方面亦成就斐然，他采用通俗浅近的白话文来写儿童歌词，词意浅而不俗、意味深长，并注重词曲的相互结合，例如《体操兵操》、《赛船》、《铁匠》、《黄河》、《竹马》等歌曲，不仅唱起来顺口，并且具有生动的形象性。沈心工还编印了《学校唱歌集》、《心工唱歌集》、《民国唱歌集》等歌集，对推动新式学堂的音乐教育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被誉为“中国近代音乐教育之父”的萧友梅，在促成近代音乐得以形成发展方面功绩卓著。他于 1901 年赴日本学习教育、钢琴和理论，打下了深厚的艺术功底。1912 年赴德国莱比锡音乐学院学习音乐理论，兼修教育学。1920 年回国后，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任教，创作了大量的歌曲，成为近代专业音乐创作的主要开拓者之一。著名教育家丰子恺，也曾游学日本，写过许多有关音乐教育的书籍，对中国音乐界贡献很大。

通过学堂乐歌运动兴起和发展，引入欧洲和日本的各种歌曲体裁，如儿童歌曲、舞蹈游戏歌曲、摇篮曲、进行曲等，使很多新的音调为人们所熟知，成为我国音乐的构成因素。许多音乐术语，如“旋律”、“和声”、“音阶”、“音程”、“对位法”以及“交响乐”等，都是先由日本学者所译，后才通行于中国并沿袭至今

的。同时还引进了诸如集体歌曲、唱歌游戏、演奏各种西洋乐器和举行音乐会等活动方式，特别是对五线谱和简谱这两种新的记谱法的介绍，对我国现代音乐文化的发展和普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五四运动以后我国现代专业音乐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举国掀起批判封建文化和探求发展新文化的热潮，促使音乐界普遍关注中国音乐的发展前途，不断从理论上进行研究和探讨。从20年代至30年代末，音乐界人士在各种音乐期刊和其他报刊上发表了各种见解，其中既有保守复古论者的说教，也有全盘西化论者的鼓吹，但其主流始终着眼于批判封建意识对音乐发展的束缚，从中西音乐的对比中列论中国音乐落后的原因，以及从不同角度探求发展中国新音乐的途径。这个时期一些作曲家也先后开始了专业音乐创作活动，促进了中国现代音乐的迅速发展。

三、日本思想界学术界对中国的影响

1. 日本无政府主义学说在中国的传播

无政府主义，旧译亦作“安那其主义”，其原文是法文 *anarchisme*。这是一种反映小资产阶级和流氓无产者要求的社会政治思潮，盛行于19世纪后半期的欧洲，代表人物有德国的施蒂纳、法国的蒲鲁东和俄国的巴枯宁、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宣传取消一切权力和权威，反对限制任何个性自由，因此反对任何国家政权（包括无产阶级专政），要求建立无命令、无权力、无服从与无制裁的“无政府社会”。

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是首先在国外出现的。1907年，李石曾、吴稚晖等在巴黎创办《新世纪》周报，开始介绍和宣传无政府主义。同年，刘师培、张继等在日本组织留学生的无政府主义

团体“社会主义讲习会”，并创办《天义》半月刊以宣传无政府主义，次年《天义》停刊，另出《衡报》以续之。“是时东京之中国留学生数以万计，张刘以著名之革命党，提倡斯道，以故留学生社会中，对于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诸名词，颇耳熟而能详”。^①但是在辛亥革命以前，无政府主义对中国的知识界和政治活动家的影响并不是太大。到1908年10月，《衡报》出至第11号为日本政府所禁，11月刘师培何震夫妇回国，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随之减少。

在国内，正式组织无政府主义团体和创办无政府主义刊物，是在民国肇元之后，由刘师复发起的。辛亥革命后，黑暗的社会现实使得知识分子中许多人陷入苦闷消沉之中，主张高蹈远引，脱离政治，一些人愤世嫉俗，偏激情绪又有所发展，这就为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一度相当流行提供了社会思想基础。于是，“欲救其弊，必从根本上实行社会革命，破除一切强权”^②的无政府主义，逐渐在国内产生比较广泛的影响。

当时影响最大的传播者是刘师复。刘师复，广东香山人，早年留学日本，并加入了同盟会。1906年回国筹划暗杀广东水师提督李准事宜，事未遂而被监禁。两年后保释出狱，不久即至香港，一面研究无政府主义，一面邀集高剑父、陈炯明等人组织“支那暗杀团”。辛亥革命后，刘师复于1912年5月在广州筹划成立中国第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组织“晦鸣学舍”，参加者有彼岸、佩刚、扈离、天放、抱蜀、无为等。1913年，刘师复创办《晦鸣录》（从第三号起更名为《民声》），作为“晦鸣学舍”的机关刊物。《晦鸣录》以平民之声自勉，其“言论即直接为平民之机关”，又名“平民之声”。刘师复亲自撰写了《晦鸣录》发刊词。并发表了《无政府浅说》一文，提出反对政府，破除强权，

① 《致无政府党万国大会书》，《民声》第16号，1914年6月27日。

② 《晦鸣录·编辑诸言》，《晦鸣录》第1期，1913年8月12日。

而且反复申论：“无政府主义不但理论正确，且必可实行。”^①

此后，刘师复等人利用这个阵地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想，介绍无政府主义者的动态，并翻印了大量在巴黎出版的无政府主义小册子。从学舍成立到1914年5月，不到一年时间就出版了16种出版物，流传各地，扩大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1913年，晦鸣学舍被查封，《晦鸣录》亦被迫停刊。经过许多曲折之后，刘师复于1914年7月，在上海发起成立“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并发表《无政府共产党之目的与手段》一文，提出了无政府党的纲领。其中包括“无政府共产主义之最终目的、废除私有财产、废除国家、废除婚姻制度、人人劳动和受教育”等十四条。^②刘师复还与国际上的无政府主义者如克鲁泡特金、大杉劳等保持密切联系。1914年8月，他致书无政府主义万国大会，报告了中国无政府主义的历史和现状，并提出了组织万国机关、与工党团联络、万国总罢工等多项建议。

从1914年开始，黄凌霜、区声白、易家铨等人先后在常熟、南京、广州、北京等地成立了“无政府共产主义传播社”（不久改为“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会”）、“无政府主义讨论会”、“群社”、“平社”等无政府主义团体。他们虽对不平等的现实愤懑，却反对无产阶级有组织、有纪律的阶级斗争；他们虽然痛恨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国家、法律等“强权”，却又反对社会主义的“集产主义”，其主张虽有悖于马克思主义，却风行一时，颇能干扰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

五四运动前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中国进一步流行。正如当时马叙伦在《二十世纪之新主义》一文中说：“专制政治愈甚者，则所制造无政府党

① 《无政府浅说》，《晦鸣录》第1期，1913年8月20日。

② 《民声》第19号，1914年7月18日。

愈众，此比例百不爽一。”^① 团体众多，刊物丛生，是这一时期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一个特点。据民声社统计，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1921年7月，全国各地出现的无政府主义小团体不少于五十个，其出版的刊物和小册子不少于八十种。其中以继承刘师复衣钵的黄凌霜、区声白等人为首，由民声社、群社、实社、平社诸团体联合组织起来的进化社及其出版的《进化》月刊的影响最广。

这一时期是无政府主义最具号召力的年代，不但一般思想比较进步的知识分子奉之为圭臬，包括一些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学者，如孙中山、李大钊、梁漱溟等人，他们虽与无政府主义者有别，但或多或少受到了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互助论认为人类通过互助即可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社会，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即使已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李大钊也曾对之推崇备至，认为克鲁泡特金互助论的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补充。在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展开论战以前，特别是在1920年以前，对二者还不能严格地区分，这是中国思想界普遍的现象。李大钊尚且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其他人可想而知。恽代英在五四时期曾明确谈道：“我信安那其主义已经七年了，我自信懂得安那其的真理，而且曾经细心的研究。”^② 至于像高君宇、何孟雄、邓中夏、夏衍等人，无一不是经过无政府主义这个环节，走向马克思主义的。

五四运动前，无政府主义思想散布之广，远胜于马克思主义。这个时期，以黄凌霜、区声白为代表的刘师复派非常活跃，他们奉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和《互助论》为圭臬，

^① 马叙伦：《二十世纪之新主义》，见葛懋春等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第1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② 恽代英：《致王光祈信》，《恽代英文集》上卷，第109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影响非常大。此外，在无政府主义范畴内还有新虚无主义、新村主义、托尔斯泰的不抵抗主义、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等，都曾一度产生较大影响。其中以来自日本等国家的新村主义最为风行。

新村主义的主旨是幻想脱离现在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另辟一块小天地，建立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互助友爱的新社会。主张把新村作为“改造旧社会的旧生活，另创一种新社会的新生活”的“试验场”。较为著名的新村主义试验地有法国的“鹰山共产村”、美国的“兰路共产村”、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都在五四前后流传到中国，其中以“新村”影响最大。

新村主义的创始人是武者小路实笃，他深受空想社会主义及互助论和泛劳动主义的影响，于1910年在东京创办《白桦》杂志，鼓吹新村主义，目的“便在提倡实行过人的生活”。1918年12月，武者小路等二十余个新村主义者在日本九州的日向地方买了四十余亩土地，建房筑舍，组成了第一座“新村”，俨然一“世外桃源”。武者小路还梦想全世界普遍建立“新村”，届时一个人“无论到了何处，只要劳动，或是执有劳动义务期满的证据，便不要金钱，可以生活；可以随意旅行，随意游览，随意学习。……一个人到了无论哪里，都有同一的义务，同一的权利。先是以人类的资格而生活，更以个人的资格而生活；先在世上为了生存而劳动，更为发展自己天赋的才能而生存。……每人须尽对于人类的义务，又能享个人的自由”。^①

新村主义在中国颇有影响。新村的田园诗一般的生活，新村主义中的“爱”、协力、个性自由等，似乎创造了一种无政府、无剥削、无强权、无压迫、没有脑力和体力劳动对立的一种新生活。这种理想社会的美好蓝图，深深吸引了当时苦闷于中国黑暗现实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对新村主义展开了热烈的宣传和实践活动。

^① 周作人：《日本的新村》，《新青年》第6卷第3号，1919年3月。

中国宣传新村主义比较早的，是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1908年在法国时，吴稚晖应邀专门到沙利威尔附近的“鹰山共产村”参观访问过三个月之久，以后在《新世纪》第57号上发表了《游鹰山村殖民地记》一文，对新村主义大加赞扬。辛亥革命后，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领袖刘师复和郑彼岸曾计划在必龙宋王台畔建立新村，该地枕山面海，风景天然，遍植荔枝，郑彼岸原拟名之为“红荔山庄”，后因二次革命爆发而无法付诸实施。

在五四运动前后，《新青年》、《新潮》、《间星》、《新生命》、《新人》、《批评》等杂志上都报道过“新村运动”的情况，特别是介绍日本武者小路所办的“日向新村”的情况。周作人于1919年7月访问了“日向新村”，写了《日本的新村》一文，较为详细地介绍了武者小路的新村主义思想及其实践活动。文章说：“近来日本的新村运动，是世界上一件很可注意的事。从来梦想 Utopia（乌托邦）的人，虽然不少，但未尝着手实行，英国诗人 Coleridge（哥尔利治）等所发起的‘大同社会’（pantesocracy）也因为缺乏资本，无形中消灭了。俄国 Tolstoj（托尔斯泰）的躬耕，是枉泛劳动主义了；但他专重‘手的工作’，排斥‘脑的工作’；又提倡极端的利他，抹杀了对于自己的责任；所以不能说是十分圆满。新村运动却更进一步，主张泛劳动，提倡协力的共同生活。一方面尽了对于人类的义务，一方面也尽各人对于个人自己的义务；赞美协力，又赞美个性，发展共同的精神，又发展自由的精神，实在是一种切实可行的理想、中正、普遍的人生的福音。”周作人还于回国后在天津、北京等处做“新村”问题演讲，继续撰文鼓吹，并组织了一个新村北京支部，负责宣传工作和介绍人们去日本参观新村。这些介绍对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颇有影响。

“新村”对田园诗般生活的幻想，对现实不满但又不想进行流血斗争的思想，对小资产阶级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于是对新村主义展开了热烈的宣传和实践活动。他们说：“新村是一种新组

织，是物心两面改造的，是皮肉一致、表里相应的，是要打破现在知识阶级的，是要加入劳动团体的，是以现在为基础的小组织，是以将来的世界为扩充小组织的大联合。”认为“现在中国青年最丰富、最优美、最有幸福而最有价值的生活，就是新村的生活”。^①

在新村主义的传播和影响下，不少具有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人，多想以“新村”为试点，来实践他们的理想，并且有着很具体的建设新村的设想和计划。1918年墨西哥归侨余毅魂、陈视明等向往新村运动，在昆山子红村购田置屋，建立“知行新村”，披荆斩棘，躬耕其间，所得收入共同消费，幻想以新村作为理想试验园地，时人誉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1919年，少年中国学会在讨论如何创造一个理想的“少年中国”时，提出了各种主张，其中就有人主张从建立无政府的“新村”着手，试图通过使知识分子做工和帮助劳动者求学的办法，来打破劳力与劳心的差别，实现对社会的改造。少年中国学会执行部主任王光祈，把当时颇为流行的互助论、工读主义、泛劳动主义、新村主义等新思潮加以糅合和提炼，创造了一种“中国式……主义”，王光祈说：“这种主张如果没有适当的名词，就叫它为‘中国式……主义’。”^②

王光祈的具体设想是在城郊租个菜园子，参加者一面劳动种菜，一面读书、翻译和办平民学校，这样“半工半读，身体是强壮的，脑筋是清楚的，是不受衣食住三位先生牵掣的，天真烂漫的农夫，是与我们极表示亲爱的。我们纯洁青年，与纯洁农夫打成一气，要想改造中国，是很容易的”。^③王光祈把这种城市

① 郅光典：《文化运动中的新村谈》，《新人》第4号，1920年8月。

② 《王光祈致君在》，《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第4期，1919年6月。

③ 王光祈：《讨论小组织问题》，《少年中国》第1卷第2号，1919年8月。

“新生活”的小组织定名为工读互助团，并得到了思想界、教育界人士的广泛支持，消息传出之后，吸引了众多先进知识分子，前后有数百人报名参加。在北京工读互助团的影响下，1919年12月，南京师范学校32个学生发起组织“工读互助团”。次年1月，天津觉悟社成员谌志笃等发起“工读印刷社”。2月，武汉利群书社恽代英等发起成立“武昌工学互助团”等。于是，在1920年上半年，中国知识界出现了一次工读互助运动。然而，由于经济的拮据和人心的涣散，北京互助团只存在了三个月即告解散，各地的互助团尽管风行一时，也莫不以夭折告终。

此外，还有一些小组织的尝试。中华职业教育社附设学校的学生，在1919年至1920年间，几乎都按照小组织的形式组织起来，把所住的宿舍命名为“新村”、“平民村”、“友谊村”、“大同村”等。他们在所订的章程中也程度不等地反映了新村主义。

由于近现代中国的特殊历史条件为无政府主义思潮提供了较为适宜的环境，无政府主义一经传入中国这个小生产者汪洋大海的国度，就如同找到了滋生的温床，得到迅速广泛的传播，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时许多青年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向往，常常是以无政府主义为过渡的，无政府主义在不知不觉之中成了人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老师。但是，正如列宁所指出：“无政府主义是绝望的产物，它是失常的知识分子或游民的心理状态，而不是无产者的心理状态。”^① 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基础是极端的个人主义，其所要求实现的绝对自由与绝对平等，是一种在任何社会都实现不了的空想，如同“一朵不结果实的花”，虽然瑰丽动人，却注定只能化为泡影，没有也不可能给中国指出真正的出路。当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并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时，无政府主义思潮必然从鼎盛走向衰落。

^① 《列宁选集》第1卷，第218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 马克思主义思潮对中国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理论进入中国人视野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年。当时以爱国救亡为主旨的思想启蒙运动正风云激荡于思想界，一些有识见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开始意识到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种种弊害，试图通过对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研究和介绍，找到弥补这些弊害的良方。马克思主义正是作为欧洲社会主义学说的一个派别在这个时期被介绍到中国来的。

1920年，蔡元培在为英国人克卡普（1844—1912年，又译为柯卡普）《社会主义史》一书中译本所写的序言中曾指出：“西洋的社会主义，二十年前，才输入中国。一方面是留日学生从日本间接输入的，译有《近世社会主义》等书。一方面是留法学生从法国直接输入的，载在《新世纪》周刊上。后来有《民声》周刊简单的介绍一点。俄国广义派（即布尔什维克）政府成立以后，介绍马克思学说的人多起来了，在日刊、月刊中常常看见这一类的题目。”的确如此，社会主义学说的传入最初有三个渠道，首先就是日本，其次才是西欧和俄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虽然契机是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但由于当时北洋政府对苏俄的防范和封锁，中国和苏俄几乎没有直接联系，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初传播实际上是经过了日本这个渠道。在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上，日本起着重要的媒介作用。我国早期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宣传中的观点和概念，诸如“唯物主义”、“剩余价值”、“生产力”、“生产关系”之类的译语，就是来自日本宣传社会主义的著作，以后约定俗成，沿用至今。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年，社会主义学说不仅风靡欧美，而且已经越洋而来，猛烈冲击着与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在这里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这个时期被誉为日本社会主义传播史上的黄金时代。随着留学运动的急速展开，大批中国学子来到日本，与正在兴起的日本社会主义运动有了直接接触，读到了以往在国内见所未见的一大批社会主义著作。因此留日学生在他们译书和

创办杂志的活动中，介绍了社会主义的各种学说，同时也译介了一些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一度形成了译介日文社会主义著述的热潮。

翻译过来的比较有影响的日本早期社会主义理论著作，举其要者，主要有村井知至所著《社会主义》（罗大维译，上海广智书局1902年版），此书是较系统介绍马克思生平及其学说的第一部译著；幸德秋水著《广长舌》（赵必振译，商务印书馆1902年版）；福井准造著《近世社会主义》（赵必振译，广智书局1903年版）；久松义典著《近世社会主义评论》（杜士珍译，《新世界学报》1903年第2至6期连载）。其中幸德秋水所著《社会主义神髓》一书尤为中国进步思想界所推重，迄今为止，至少发现有三个中文早期全译本：一是中国达识译社译、浙江潮编辑所1903年的版本；二是蜀魂遥（生）译、日本中国留学生会馆社会主义研究社1906年的版本；三是创生译、东京奎文馆书局1907年的版本。

完全可以说，几乎日本早期重要社会主义的著作在当时都有全本或部分的中译，一些代表性的观点都或多或少地被介绍到中国，给中国思想界注入了新的内容。但是，此时的中国尚缺乏社会思想移入的土壤，虽然社会主义学说对资本主义制度弊端的批判，正好迎合当时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反帝心理，但由于此时辛亥革命正处于酝酿之中，中国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推翻清朝的封建统治，在反清革命压过一切的情势之下，这次留日学生译介社会主义学说的热潮很快冷却了。

民国肇元以后，在孙中山的倡导之下，谈论和研究社会主义风靡一时。1912年4月，孙中山发表演说《社会革命谈》，认为“今之吾国之革命，乃为国利民福革命。拥护国利民福者，实社会主义”，并表示他“竭力赞成社会主义”，号召“广为鼓吹”，“使其理论普及全国人心目中去”。孙中山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虽然还不是科学的，难免带有空想的色彩，但他不仅对马克思主义取

赞赏态度，而且在阐述其社会主义主张中也有诸多合理因素，^①因此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的传播是有意义的。

与此同时，一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纷纷成立研究社会主义的团体，江亢虎的中国社会党和刘师复的晦鸣学社就是其中的代表。他们在宣传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同时，也提到过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学说，如江亢虎在《社会主义学说》一文中曾说：“各国社会主义学者，鉴于将来社会革命之祸，汲汲提倡马克思之学说主张分配平均，求根本和平之解决，以免激烈派之实行均产主义，而肇攘夺变乱之祸。”他们所宣传的诸如社会主义已成为“二十世纪最流行之主义”，“其学说之弘扬，势力之扶植，日进千里，风靡全球”^②等思想，具有一定进步意义，但他们从自己的需要出发所标榜的社会主义，仍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还是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狭隘圈子里被不同程度地曲解和误识。这种情况到了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后，才开始得到根本的改变。

十月革命后，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再次蓬勃发展起来，并逐渐接近于科学社会主义。当时的日本舆论界，“差不多可以说是马克思底时代”，^③报刊没有一个不谈社会主义，不谈劳动问题，各大学中自由研究社会主义学说也蔚成风气。虽然其中难免出现泥沙俱下、龟龙混杂的情形，但是，这股风潮对于置身其中、或虽已回国但仍密切关注日本思想界的中国留学生来说，无疑是学习社会主义学说的便利条件。于是，继清末民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初步介绍之后，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推动，留日学生中的先进分子再度充当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

^① 李其驹等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第3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② 《社会星》，第1号，1911年7月。

^③ 渊泉：《东游随感录》，连载于1919年10月20日—11月21日《晨报》。

媒介和桥梁，在1917年至1920年间，第二次掀起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与第一次热潮相比，这次热潮有三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增加了介绍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及其领导下的十月革命的内容；二是注意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开始比较有系统的译介和研究；三是由理论宣传走向实践。

中国共产党发起人和早期成员中，留日学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举其显要者，如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陈独秀、李达、李汉俊、陈望道、林伯渠，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李大钊、黄日葵、江浩，湖北共产主义小组的董必武、张国恩，日本共产主义小组的周佛海、施存统，此外，还有其他地区共产党组织的创建人和活动家周恩来、彭湃、周逸群、张闻天、邓子恢等人，他们留日的时间或长或短，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程度也深浅不一，在翻译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做出了各自的贡献，其中，李大钊、李达、李汉俊和陈望道等人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较深，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的贡献也较大。在他们接触、接受乃至信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日本早期社会主义思潮无疑产生了重要影响。李大钊的情况可称做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例。

在中国大地上，率先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的是李大钊。早在1913年至1916年留学日本期间，李大钊就初步接触了社会主义思想，受到了安部矶雄、河上肇等日本社会主义先驱者的影响。他在早稻田大学学习时，安部矶雄正在该校担任教授，以社会主义立场讲授经济学，并对有关的社会问题进行先驱性的研究。安部曾给李大钊讲授过“都市问题”和“社会政策”等课程。李大钊于1918年回忆当时情形：“在东京，我同安部矶雄接触中受到他的影响，而从大山郁夫那里没有受到那样一种程度的影响。”^①可见留日期间李大钊在日本社会主义学者的影响下，已开始较多

^① 森正夫：《李大钊》，转引自《李大钊史事综录》，第10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

地注意社会主义。

河上肇给予李大钊的影响也是明显的。河上肇早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律系，1913年赴欧洲留学，归国后受聘为京都帝国大学教授。作为亚洲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毕生致力于《资本论》的研究，著有《近世经济思想史论》、《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历史的发展》、《资本论入门》、《经济学大纲》等。他的理论和著作在五四前后被大量译介到中国，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产生过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中国最早介绍唯物史观的著作就是《晨报》转载的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这部著作是有关马克思经济学说的著作，同时也包含着唯物史观的思想。《晨报》还连载了从他的译本转译的马克思著作《劳动与资本》，也是当时在中国传播唯物史观的主要经典著作之一。

中国老一代的包括李大钊在内的许多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如周恩来、徐特立、谢觉哉、郭沫若等，也都曾接触过河上肇的著作。郭沫若于1924年翻译了河上肇的巨著《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该书1925年5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这对促进郭沫若的思想从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转变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在给成仿吾的信中说：“这本书的译出，在我一生中形成一个转换时期，把我从半眠状态里唤醒了的是它，把我从歧路的彷徨里引出了的是它，把我从死的暗影里救出了的是它。我对于作者是非常感谢，我对于马克思列宁是非常感谢。”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郭沫若还计划用五年的时间把马克思的巨著、四百万字的《资本论》全部翻译出来，只是由于商务印书馆没有同意出版而作罢。而中国马克思主义先驱者李达和李汉俊早在留学日本时就师从河上肇，受其影响很深。直到20年代末，李达还翻译了河上肇的不少著作，对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起到了推动作用。

河上肇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影响，还表现在中国人自己撰写的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之中。李大钊在《我

的马克思主义观》这篇不朽文献里，特别说明了自己文中关于唯物史观原著的评述主要是来自河上肇博士的《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胡汉民在其《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一文里，在说明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和唯物史观的关系时，也特别注明“以上本河上肇的解说”。直到1960年，毛泽东在接见日本学者竹内实时还说道：“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日本比中国更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是从日本传入的，我们从日本的书上学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京都帝国大学教授河上肇写的东西，直到现在还是我们的参考书。”^①

综观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原著的翻译还是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述，大体上是经过旅日、旅欧、旅苏知识分子和革命者的共同努力进行的，体现了马克思在中国传播三条渠道的殊途同归。而在清末民初乃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来自日本思想文化界的影响可以说是最具分量的。

3. 中国社会学萌芽与日本学术界的关系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学东渐之风日盛，各种新思潮、新知识、新学科纷至沓来，对中国的思想文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社会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除从西方直接传入中国外，还通过留日学生或回国开科授业，或译介日文社会学教科书及社会学专著，间接从日本传入中国。

当时社会学在日本已颇为兴盛。据李剑华说：“东京大学社会学讲义或讲读，始于明治十三年（1880年）。外山正一博士是社会学教授之第一人……东京帝国大学社会学科隶属于文学部，明治十三年该大学已有社会学讲义。”^② 社会学课在日本的一般

^① 竹内实：《毛泽东笔记》，日本新泉社刊1971年版。

^② 李剑华：《日本之社会学界》，载《社会学界》，1927年第1卷，第222页。

学校已普遍设立，尤其在法政学校和师范学校更为普遍。因此，中国留日学生中有不少人接触过社会学。这些留学生学成回国后，成为在中国传播社会学的先导。

许多留日学生在攻读课业之余，还翻译了大量日文社会学教科书及社会学专著，将社会学介绍到中国。举其要者，如岸本能武郎著、章太炎译、广智书局 1902 年出版的《社会学》；有贺长雄著、广智书局 1902 年出版的《族制进化论译本》；市川源三著、吴建常翻译的《社会学提纲》；建部豚吾著、汤一颢翻译的《普通理论社会学纲领》等，此外，还有几本未署名的从日文译介过来的《社会学》（上海作新社出版）、《社会学原理》（上海国民日报登载）等社会学论著以及《政法述义》等颇为畅销的日本社会学教科书。

1911 年，欧阳钧编译的《社会学》一书的出版，尤其值得称道。这本书是根据日人远藤隆吉的社会学讲义，并参照了他的其他社会学著作，编译而成。全书共 13 章，所持理论与吉丁斯相近，属于心理学派，较之从前的社会进化论，即生物学派的思想更进一步，议论也相当中肯。同时这部书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上也有较全面和新鲜的观点，书中所举研究方法有五：即经验观察、单位研究、网罗无遗、抽象研究与综合为一。已把现在社会学研究方法中所谓访问法、个案调查、普查、归纳与综合等方法大体都做了介绍。书中还指出研究社会学的用处有四：“一曰发生爱国心，二曰匡正学术，三曰改良政事，四曰完备教育，此书特别重视教育，从中可看出译者之苦心。后人谓之：它在当时一般思想界所引起的影响，比严氏的《群学肆言》，实有过之而无不及。”^①此后，还陆续翻译出版了一批日文社会学著作，其中以 1920 年覃寿公译日人远藤隆吉著《近世社会学》影响较为广泛。

^① 转引自韩明汉：《中国社会学史》，第 37 页，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20年代后，在国外攻读社会学的留学生陆续回国，他们在各个国立、私立和教会大学纷纷成立社会学系，增设社会学课程，传授社会学知识，培养社会学人才。我国第一位自授社会学的教授康心孚就是学法政出身的留日生。康心孚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门生，曾留学日本学习法政。回国后在北京大学讲授社会学、伦理学和中国法制史。他讲课详明透彻，深受学生欢迎。他所讲授的社会学课，教材是自己编撰的，文笔典雅，含义精深，曾造就了包括我国第一代社会学家孙本文在内的不少社会学人才。最早用中文编写的社会学教材，就是孙本文主编的社会学丛书15种，后于1931年合编成《社会学大纲》出版。

这个时期社会学的学术团体和期刊也已出现，1922年余天休发起成立中国社会学学会，出版《社会学杂志》，该会由于本身实力不足和当时政治原因而中断。1930年“中国社会学社”的成立被视为中国社会学成长的里程碑。此后通过学术团体的活动、学校的教育、社会调查和大量译著的出版，推动了社会学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和发展。

四、日本的汉学研究

1. 遍及全国的汉学研究团体和机构

明治维新后日本进入近代社会，传统汉学拥有了不同以往的崭新内涵。当时知识界许多学者、思想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和看法发生了变化，由过去的顶礼膜拜转向了冷静审视。他们一方面从传统中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对自身民族文化发展的价值意义，认为日本文化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受益匪浅；另一方面却又在内忧外患的严酷现实面前不得不承认传统对于实现文明开化和富国强兵的匮乏无力，于是有不少学者致力于摆脱传统，转而引进欧美文化，一时间西方各种社会思潮皆蜂拥而入，从而导致日本

人观念形态的重大变革。日本学术界开始从意识形态方面摆脱以往对于中国文化的依赖，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也逐步演变成为日本近代世界区域性文化研究的一部分。

在更新文化观念、否定传统汉学的过程中，日本汉学界学者辈出，机构丛生，形成了遍及全国的汉学研究团体，并建立了一系列的文化研究设施。其中较为著名的主要有斯文会、支那学社、东方文化学院、中国文学研究会、东洋文库等几个研究团体和机构设施，并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里都取得了重要成就。

20世纪一二十年代中日两国风云变幻的政治文化形势，给日本汉学界以极大的刺激，使日本汉学界各学派思想与学术倾向上的差异进一步扩大，一些学者加强了对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儒学的褒扬，试图从中寻求日本向亚洲乃至世界的发展之路。另一些学者则加剧了对于中国古典文化与日本传统汉学的批判，尝试以新的方式研究中国文化，同时对中国的未来亦表示了强烈的关注。在这种形势影响之下，“斯文会”和“支那学社”的出现，无疑反映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汉学发展的趋势和走向。

1918年（大正七年），东亚学术研究会联合当时日本汉学界中主张“尊孔”与“修身”的一些社团，如“研经会”、“汉文学会”等，合并为“斯文会”。“斯文会”的根本宗旨，在于依靠日本传统儒学来扭转日本人“精神文明”之衰颓。这在其成立伊始即行公布的《设立趣意书》中便有坦率的表陈：“自明治维新以来，西洋文化流入，国民之知识技能进步，然而却轻视精神文明，以至古来道德渐而减弱，已见动摇之兆。乘人喜新厌故之常情，倡诡激之言辞，以搅乱我思想界者则大有人在。”

在欧化风潮日甚一日，西洋“物质文明”风靡日本之际，“斯文会”深感日本人“精神性文明”的日渐淡漠，从而致力于传统儒学的复兴，以挽救精神上的真空状态，解除思想上的彷徨无助。他们认为“利用厚生之关系”而求得的“特技”，可以取自他国，但“精神文明”必须是本邦固有的传统。因此，他们

“同志相谋，同尤相会，以期大大振起儒道”，“斯文会”由是而生。“斯文会”提倡重儒尊孔，许多年以东京汤岛圣堂（孔庙）为活动中心，每年4月祭孔子，11月祭先儒。“斯文会”出版有《斯文》，1919年创刊，是提倡儒学尊孔、推广汉文教育的通俗刊物，由宇野哲人、盐谷温、高田真治等人先后主持。

“斯文会”的建立，实际上意味着在中西文化交融与碰撞之下，日本汉学研究中的中国古典哲学学派（亦称新儒家学派）在日本思想学术界发起了一场儒学振兴运动。在这种形势下，1923年日本帝国议会通过了关于振兴汉学的建议，并相应做出了预算措施，此后不久成立了“大东文化协会”。这场儒学复兴运动在发展中逐步与日本政治思想界的超国家主义派别结合在一起，构成了日本主要的国家意识形态。

1920年（大正九年），日本一批汉学研究家铃木虎雄、小岛佑马、武内义雄和青木正儿等以京都大学为中心，发起创设了“支那学社”，并于同年出版学会杂志《支那学》月刊，影响颇大。“支那学社”的成立，与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形成与发展处于同一时代。当时无论是在日本还是中国，社会与思想都发生急遽的变化，从而迫使这些学者在其研究领域已有业绩的基础上，从实证主义的角度出发，对传统儒学进行再研讨。

“支那学社”成立伊始就表现出对中国正在发生的新文化运动的强烈关注，并把它介绍给日本汉学界及民众。1920年《支那学》创刊号刊载了青木正儿的长篇论文《以胡适为中心正在卷起的文化革命》，文中满怀热情地介绍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并对中国白话诗和鲁迅的《狂人日记》做出评论。该刊第2卷第3期还刊载了他的《吴虞的破儒教论》，文中赞扬了吴虞“只手打孔家店”的胆气，认为“儒教是前世时代的遗物，它曾使疲弊，至今已没有前途”。^①稍后又刊

^① 《支那学》第2卷第3期，1921年3月。

载了小島佑马的《儒家与革命思想》，认为“孔子思想本身就包含着革命认识论与革命否定论两大要素”。在当时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支那学社的学者在对传统文化重新审视的过程中，推动了日本汉学的迅速发展。

进入20年代后，日本官方一直在酝酿建立一个研究中国文化的机构。1923年3月，日本政府公布了《对支那文化事业特别会计法》，决定为有关中国文化的事业提供经费。并于1927年7月、1931年4月分别在北京设立了人文科学研究所，在上海设立了自然科学所。关于在日本国内开展对中国文化的研究问题，许多学者均主张建立专门机构。1928年10月，东京、京都两地33名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学者通过了《趣意书》和《规程》，倡议成立研究中国文化的研究机构。

从1929年起，日本外务府先后以中国庚子赔款的一部分，设立了文化事业委员会，并建立东方文化学院，由服部宇之吉担任院长，下设东京、京都两个研究所，东京研究所于1933年正式开办，主任为服部宇之吉，京都研究所于1930年开办，主任为狩野直喜。东方文化学院出版《东方学报》，作为刊登该院研究成果的刊物，在日本学术界有较大影响。《东方学报》每年一册，分为东京版和京都版两种。东京版由东京研究所编辑，从1931年4月创刊，到1944年8月，共出版了15册。京都版由京都研究所编辑，从1931年3月创刊，到1947年，出版了15册34期。

东方文化学院设立后，在日本政府资助下建馆筑舍，搜罗典籍，并开展了多项有关中国文化课题的研究，先后聘请过不少著名教授，同时拨出一部分款项资助一些专门学者治学。在东方文化学院鼎力支持之下，受助的学者可以不必投市场所好而一心著书，因而取得了不少实绩。东京研究所的研究课题主要有宇野哲人的《支那家庭制度的研究》、市村瓊次郎的《读史方輿纪要地名索引的编纂》、伊东忠太的《支那建筑装饰》以及小柳司气太

的《道教的研究》、《支那历代帝王陵研究》等。京都研究所的研究课题则主要是仓石武四郎的《礼疏校伪》、吉川幸次郎的《三仿郑义考的研究》、浜田耕等人的《支那古代雕塑艺术的考古学研究》、小島佑马等人的《唐六典特别是其历史构成的研究》等。整理影印中国古代文献是东方文化学院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学院成立古书复制委员会，由荻野仲三郎做事业主任，该会曾先后整理影印《文镜秘府论》、《春秋正义》、《庄子》等中国古代文化典籍。

1938年以后，东京研究所与京都研究所各自独立，京都研究所改称为东方文化研究所，自有编制和经费；东京研究所仍称为东方文化学院，下设经学文学历史、宗教、艺术史、考古学、近世法制经济五个部，实际上成为东京帝国大学的上层研究机构，规模和声势颇为可观。1945年8月日本战败后，东方文化学院与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合并，京都的东方文化研究所与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合并。

东方文化学院着重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对中国现代文化，特别是中国新文学运动几乎不做研究。这种厚古薄今的情况引起汉学界不少年轻学者的忧虑和不满，遂开始筹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团体，中国文学研究会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个。中国文学研究会创立于1934年，其主要成员有竹内好、冈崎俊夫、武田泰淳、增田涉、松枝茂夫等人。他们是从事中国文学研究与翻译的青年文学工作者，其中一些人早在20年代就开始翻译、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并取得了较大成就。

中国文学研究会成立后，开展了多方面的研究活动。1935年3月，该会创办了《中国文学月报》（1940年改名为《中国文学》）。该刊以研究、介绍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主要任务，如第1号刊登了《今日的中国文学问题》，第5号发表了《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现状》。与此同时，该刊还介绍了中国现代作家鲁迅（第1号）、郭沫若、郁达夫（第44号、第27号）、钟敬文（第2号）

等，刊登了老舍的《南京豆》的日文译稿（第7号）。此外，中国文学研究会还举行多次便会、交流会。1936年11月郁达夫访日，文学研究会还专门举行了欢迎会，其主要成员都到会与郁达夫面晤叙谈。^①

东洋文库是日本汉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设施，原为日本财阀三菱岩崎久弥男爵的私人图书馆。1917年，岩崎久弥接受日本史学界敦劝，以重金收购了当时担任北洋政府总统府顾问的莫利逊的藏书，建立了这座以汉籍为主的图书馆，定名为东洋文库。1923年正式开放，事实上成为日本全国东洋史研究的图书馆。其中敦煌古文书的搜集，中国地方志、族谱、缙绅录、机关职员录、同学录等的收藏，可谓洋洋大观，极为切实有用。羽田亨、白鸟库吉、石田干之助、和田清等汉学大家，都借文库以促进汉学研究，同时也均以全力协助文库的发展与充实。郭沫若30年代侨居日本时，就经常去东洋文库借阅书籍。东洋文库所藏的甲骨文、金文著作和有关文献，是他研究、撰写《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等史学名著的重要依据。

东洋文库除图书部外还设立宋代史、清代史和近代中国研究委员会等研究机构。这些研究机构常常举办学术讲演会和展示会，不仅邀请日本专家学者，也邀请中国学者参加。东洋文库还出版了众多的学术刊物、丛书，其中主要有《东洋文库论丛》、《东洋文库欧文论丛》、《东洋文库丛刊》等，此外还有数十种目录，这些出版物刊登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介绍研究动态，对日本汉学界的研究起到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

可以说，日本全国的汉学界几乎是作为一个有机体进行活动。大至全国性的学会、地域性的学会，小至一个学校的学会，名目繁多。学会或编书出刊，或讲演讨论，各种资料公开交流，同一范围研究者合作互助，并取得众多学术成就，促进了日本汉

^① 《达夫的来访》，《中国文学月报》，1937年6月号。

学的长足发展。

2. 汉学研究的重要成就

进入 20 世纪以来,日本汉学界无论是在中国古典文化研究方面,抑或在现代中国文化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不少宝贵的实绩,为国际汉学的发展做出了令人瞩目的巨大贡献。

日本学者研究我国学术,用力最多的是在满蒙史地和边疆国际关系方面。为配合日本近代以来的大陆发展政策,南满铁路株式会社投入大量资金,协助有关学者从事对满蒙史地的研究,从而形成日本东洋史研究以满蒙为中心的风气,经久而不衰。在这个领域里,内藤湖南、津田左右吉、稻叶岩吉都取得一系列成果,其中尤以内藤湖南贡献最大。

早在本世纪初,内藤湖南即从中国学者文廷式处获赠手抄本蒙文《元朝秘史》一部,是为此书传入日本之始。日后著名东洋史学家那珂通世根据此书译纂而成《成吉思汗实录》一书,对后来日本研究元史、蒙古史,影响很大。内藤还于 1905 年、1912 年两度亲赴中国东北,多方调查和搜集清朝史料,并把《满文老档》等珍贵资料携归日本。

在内藤主持之下他把耗费十几年心力搜罗的有关中国“满蒙”地区的珍贵史料书籍共 97 种,由其学生们协助进行标点并撰写题解,编印成《满蒙丛书》,自 1919 年起出版刊行。原拟每年 8 册,共计 24 册,最后因故只出版 9 册,即告中止。这些重要史料,后经内藤的学生加以整理,陆续翻译出版。例如《满文老档》,先由鸳渊一、三田村泰助、今西春秋等进行整理和归类。至 30 年代由今西春秋译成日文,用满文与日文对照编排出版。这对于日本汉学界,对于中国清史的研究,均有极大助益。

日本学术界对中国哲学思想史的研究,萌发于 19 世纪末叶,并有井上哲次郎、松本文三郎、远藤隆吉等人致力于此,皆有专著问世,但仍处于草创阶段,并未形成体系。狩野直喜在吸收前

人或同辈学者诸家学术的基础上，率先将实证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引入对中国的研究，开创了实证主义中国研究，使这一领域进入了一个与以往完全不同的形态——近代人文科学形态，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近代日本汉学实证学派中最重要的学术组成部分即“狩野体系”。

在中国哲学思想史领域内，狩野直喜突破传统，首开近代学术研究之新风，但他毕竟未能脱尽传统的经学观念，尤其倾向中国清代考证学。此后，小岛佑马和武内义雄继承了狩野直喜的观念和方法，并加以改造和推进，分别以各具特色的《支那思想史》闻名于汉学界。至此，日本汉学界对中国哲学思想史的研究，才真正开始摆脱旧形式的束缚，逐步具备了近代性的研究内容。

在文学研究领域尤其是中国戏曲史研究方面，日本学者亦取得了重要成就。日本对中国戏曲的近代性研究，大概起始于1898年川临风撰著《支那文学史》。书中收入“金元文学编”，其中有“小说与戏曲发达”一章，概述了《西厢记》和《琵琶记》等剧作。盐谷温是日本第一个以戏曲研究获博士学位的人，也是第一个以戏曲研究为终身事业的学者。他曾译过高则诚的《琵琶记》、洪昇的《长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收入1920—1929年由东京国民文库刊行会出版的《国译汉学大成》。盐谷温的另一译著《国译元曲选取》，于1940年由目黑书店出版。此外，日本作家幸田露、汉诗人森槐南等，于中国戏曲研究，亦多有论述。

“支那学社”学者青木正儿是日本汉学界研究中国戏曲的大家，在该领域承前启后，建树颇多。青木正儿毕业于京都大学汉文科，师从内藤虎次郎、狩野直喜等治经史之学。后因受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的影响，决定毕生致力于中国戏曲的研究。青木于1925年游学中国，适逢胡适考订小说史，他曾搜罗日本版本为助，同时也接受了中国整理国学的新方法。归国后，先后执教

于仙台东北大学及京都大学。

1930年，青木正儿耗费多年心力撰著而成《支那近世戏曲史》一书，交付弘文堂刊行。该书是青木正儿集合先辈成果、博采众家所长的结晶。全书的第一编和第二编，论述宋元戏曲，第三编之后，论述昆曲花部，从曲文到演出，乃至剧场构造和角色分配，皆考之甚详，堪为最见功力之处。《支那近世戏曲史》的问世，是日本学者早期在中国古典戏剧研究中树起的丰碑，使中国明清戏曲第一次获得了一个明晰的、堪称精密的体系。此后，青木正儿又刊出弘文堂版《元人杂剧序说》，对元杂剧做了进一步的研究，推动了这一研究方向的发展。

在宗教史、美术、建筑史方面，日本学者亦有不少成就。他们勤于搜集资料，观念新颖，而且师徒衣钵相承，逐步前进，论著颇为丰富。如宗教史方面，常盘大定、关野贞合编有《中国佛教史迹》（1925—1928年东京佛教史迹研究会印），《中国文化史迹》（全12辑，1939—1940年东京法藏馆刊）。琢本善隆的《中国佛教史研究北魏篇》（1942年弘文堂刊）、《日华佛教交涉史研究》（1944年弘文堂刊）等著作，较之常盘大定、让善之助时代，研究更为深入。

由辞典、索引、目录等工具书的编纂状况，亦可管窥一个国家学术的水准和活跃动态。日本汉学界在这一方面勤于耕耘，收获极为丰富。辞典如池内宏、桥本增吉所监修的《东洋历史大辞典》（8册，1937年东京平凡社出版）、近藤奎所编的《中国艺大辞汇》（1939年刊），龙谷大学所编的《佛教大辞典》（6册，1935年富山房版）。索引的编纂兴起于30年代，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先后出有《国语索引》（1934年刊）、《辽史索引》（1936年刊）、《册府元龟索引》（1937年刊）等，广岛大学斯波六郎编有《文选索引》（4册，1933—1934年刊）。书目因其著录详而翻检便，故而也颇受重视，先后编印有数十种之多。

3. 汉籍的日译

进入20世纪以来，中国时局风云变幻，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国民革命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接踵而至并带来深远影响，从而引起日本各界的强烈关注，辛亥革命后在日本出现许多研究中国问题的团体，如有邻会、中国问题同志会、对华研究会等。出于了解和研究中国的迫切需要，日本汉学界掀起了大量翻译中国书籍和资料的热潮，其范围之广、数量之多，在世界上实属首屈一指。

日本汉学界素来对中国古典文化推崇备至，早在江户时代（1603—1867年）日本就翻译引进了大量汉籍。明治以后欧化热潮日甚一日，在西洋物质文明风靡日本之际，一些知识分子和青年中产生了空虚迷惘的情绪，有的甚至悲观厌世。因此汉学界中不少有识之士主张向东方文明回归，致力于传统文化的复兴。正如服部宇之吉所指出的：“输入西洋文化以来，我国只重物质文明，以致精神文化完全不受重视，而社会百般事物的弊病丛生矣。世人有见及此，人格修养之声又起。是故有识者又再研读二千年来成为我国德育权威之孔教，而孔子之人格又再成为世人景仰之标的矣！”^①

在这种情况下，不少人转而研读中国古代文化典籍。1912—1937年间，中国儒家经典和哲学著述的日文译本相继问世。举其要者，如《先哲遗著汉籍国字解全书》（1912—1914年），13册；《先哲遗著追补汉籍国字解全书》（1914—1917年），20册；《汉文丛书》（1912—1914年），12册；《日本名家四书注释全书》（1922—1926年），10册；《现代语译支那哲学丛书》（1925年起），12册。日本佛教各宗派亦纷纷在京都等地设立佛教大学和佛学研究所，并大规模翻译出版中文的佛经与佛学著作。佛教经典书籍遂成为20世纪一二十年代日译汉籍中数量最

^① 服部宇之吉：《孔子及孔教序》，第1页，东京出版社1916年。

大的一类。其中有很多大部头多卷本的译丛。如《国译大藏经》(1917—1928年),包括经部12册、论部15册,附录戒律研究2册。《国译禅宗丛书》,共20册。《国译密教》(1923年起),共143部。《现代意译佛教经典丛书》(1923年起),12册。《国译一切经》(1929年起),共155册。而规模最大的当数由高楠顺川郎、渡边旭海等佛学家从1922年开始编译的《大正新修大藏经》,耗费十余年心力,至1934年才竣工。该书共收录佛典3493部,13520卷,分为100册精装刊行。

这一时期中国文学作品的日译本也多达百余种。从总体上看,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最受日本社会青睐,因而译本数量也最多。举其要者,有中国古典和通俗小说中的《搜神记》(盐谷温译,1920年),《红楼梦》(春风岸楼译,1916年),《三国演义》(三浦理编译,1914年),《水浒传》(川临风译,1939年),《西游记》(宇野浩二译,1936年),《金瓶梅》(村上知行译,1948年),《聊斋志异》(柴田天马译,1919年),《儒林外史》(冈本隆二、稻田孝合译,1944年),《剪灯新话》、《剪灯余话》(盐谷温译注,1921年),《宣和遗事》(盐谷温译,1922年)等;中国古典戏曲中的《西厢记》(宫原平民译注,1921年),《琵琶记》(岸春风楼译,1916年),《金钱记》(吉川幸次郎译,1943年),《风筝误》(宫原平民译,1926年)等,此外对于中国古典诗文如唐诗、宋词等,日本汉学界亦花费大量精力进行翻译和研究,取得了极为丰硕的成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内容丰富、规模庞大的《国译汉文大成》,在幸田露伴、盐谷温、铃木虎雄等汉学大家的努力下,于1921年出版。该书卷帙浩繁,收录了《楚辞》、《唐诗选》、《昭明文选》、《唐宋八家文》、《李白诗选》、《杜甫诗选》等数十种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译本。

进入20世纪以后,日本汉学界不遗余力地翻译引进了一大批中国古代典籍,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自甲午战争开始,日本逐渐轻视中国,虽然也研究现代中国及其文化,但这种

研究只不过是為了將現代中國變為日本的附庸。因此，在較長一段時期內，日本漢學界相當忽視對現代中國文化典籍的翻譯和研究。直到五四新文化運動震撼日本漢學界以後，中國的現代文化典籍主要是文學作品才引起日本譯者的興趣，如魯迅、郭沫若、老舍、茅盾、巴金、曹禺、丁玲、蕭紅等人的作品均先後被譯成日文出版。其中尤以魯迅、郭沫若最為日本漢學界所矚目。

日本不僅是翻譯和出版魯迅著作最早和最多的國家，同時也是研究魯迅最早和出版有關研究魯迅論著最多的國家。早在魯迅生前，他的作品就已被翻譯成日文，流傳于日本。1922年6月，日本人丸山昏迷在其主辦的《北京周報》（北京遠東新信社以在京日本為對象發行）上譯載了魯迅的作品《孔乙己》，1923年初，該刊又譯載了《兔與貓》，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魯迅的小說最早在日本國內翻譯刊載的應該是1927年12月武者小路實篤主編的《大調合》雜誌（日本春秋社發行）上的《故鄉》一文。此後，魯迅的作品陸續被譯成日文在日本出版。1928年，僑居上海的日本浪人、所謂的“中國風俗史研究家”井上紅梅最先翻譯了魯迅的代表作《阿Q正傳》，發表在《上海日日新聞》上。次年，他又改用《支那革命畸人傳》為題，刊載在日本出版的《奇譚》雜誌的11月號上。井上紅梅還翻譯了《吶喊》和《彷徨》兩本小說集，于1932年用《魯迅全集》的名義由改造社出版。魯迅對他的譯文並不滿意，在1932年11月7日《致增田涉》的信中說：“井上紅梅翻譯拙作，我也感到意外，他和我並不同道。但他要譯，也是無可奈何。近來看到他的大作《酒·鴉片·麻相》，更令人感嘆。”

1931年9月白楊社出版的《中國無產階級小說集》，第一篇就是魯迅的《阿Q正傳》，集中還有魯迅的《孔乙己》和《狂人日記》，都是由松浦圭三翻譯的。同年10月，四六書院出版了“國際無產階級文學選集”之一《中國小說集》，收了魯迅的《阿Q正傳》，譯者是日本共產黨早期活動家山上正義。就在這一年，

还有长江阳和松浦圭三分别翻译的《阿Q正传》日文本。

从1932年以后，日本文学界开始编辑《鲁迅全集》，当年日本改造社出版了井上红梅的《鲁迅全集》。1935年岩波书店出版了佐藤春夫和增田涉合译的《鲁迅选集》，其中除《故乡》和《孤独者》两篇出自佐藤之手外，其他七篇小说和两篇讲演稿都是增田涉所译。1934年日本成立了以东京大学文学部毕业生竹内好、增田涉等人为骨干的“中国文学研究会”，为译介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936年10月鲁迅逝世之后不久，日本改造社就通过内山书店，约请茅盾、许广平、胡风等人，并请内山完造、佐藤春夫共同担任编辑顾问，在东京和上海合力编辑七卷本的《大鲁迅全集》，该书于1937年出齐，第一次用日文比较全面地介绍了鲁迅的著作，其中除小说外，还有杂文、书简、日记等，被誉为日本翻译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里程碑。40年代以后，阅读和研究鲁迅著作在日本蔚然成风，不但继续大量翻译鲁迅作品，而且还涌现出一批研究鲁迅的论著，如竹内好的《鲁迅》、丸山繁的《鲁迅与革命文学》，小田嶽夫的《鲁迅传》等。

郭沫若的作品，在日本也有大量的翻译。1922年大西斋等编译的《文学革命与白话新诗》，收入了郭沫若的七首新诗。1926年7月，日本《改造》杂志发表了郭沫若的《王昭君》，这是日本首次发表郭沫若的剧作。1927年，《满蒙》2期至5期上连载了《卓文君》。1929年9月日本《诗和评论》第5册刊登了郭沫若诗抄，郭沫若遂以诗闻名于日本文学界。

30年代以后，郭沫若的小说、回忆录开始翻译成日文出版。1936年，河出书房出版的《中国印度短篇录》，收入了郭沫若的《函谷关》。1938年，松枝茂天翻译出版了郭沫若的《北伐》（中文版原名《北伐途次》）。1946年和1947年，京都圣光社分别出了村田牧郎译的《飘流三部曲》和《我的回忆》（即《我的童年》）。郭沫若的历史学著作也于此时得到译介。从1931年起，

藤枝茂夫翻译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田中震二翻译出版了《青铜器研究要纂》（原名《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等。

除鲁迅、郭沫若之外，日本文化界还翻译了不少中国现代文学作家的作品。如茅盾的《秋收》、《大泽乡》（小田嶽夫，1938年），《烟云》（柳泽三郎译，1946年）；老舍的《小坡的生日》（兴亚书局译，1940年），《牛天赐传》（神谷衡丰译，1942年），《骆驼祥子》（竹中伸译，1943年）；巴金的《灭亡》（山县初男译，1940年），《家》（服部隆造译，1941年），《沙丁》（村田孜郎译，1946年）；曹禺的《雷雨》（影山三郎等译，1936年）；丁玲的《水——问题小说》（中西均一译，1935年），《松子》（奥野信太郎译，1937年），《我在霞村的时候》（冈崎俊夫译，1949年）；萧红的《马房之夜》（高杉一郎译，1937年）等。

第八章 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文化交流

一、中印文化交流

1. 泰戈尔：中国新知识界的嘉宾

15世纪末期，欧洲的殖民势力开始侵入印度。英国经过一系列的战争，终于在1849年完成了对印度的全部占领。至此，文明古国印度完全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几乎与此同时，东方的另一文明古国中国也开始在殖民主义的侵略下一步一步地滑向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深渊。在殖民主义残酷的侵略、掠夺、剥削、压迫之下，印度和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受到了极大的摧残，两国之间几千年文化交流的传统从此几乎陷于停滞状态。但是，两国文化界的有识之士并不甘心处于这种彼此隔绝的境地，他们一直在为恢复两国的文化交流而积极地努力着。20世纪初年，苏曼殊和鲁迅先后注意到了印度独具特色的梵语文学，并给予高度的评价。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些杂志陆续发表了一批关于印度文学、哲学、佛学等方面的文章，一些大学也开始开设有关印度学的课程。印度方面，加尔各答大学于1918年开设了中国语言和文学课，创办于1921年的国际大学也对中国学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在暂时的中断之后，中印两国的学术界终于重新开始了对对方文化的认识和研究，但是，两国的文化界仍然没有正式的往来。直到1924年印度大诗人泰戈尔应邀访华，才重新打开了两国文化交流的通道，由此揭开了中印文化交流史上新的一页。周

周恩来总理于1956年在印度国际大学接受名誉博士学位时的讲话中谈到：中国人民至今“还以惦念的心情回忆着1924年泰戈尔对中国的访问”。^①

泰戈尔 (Rabindranath Tagore)，印度孟加拉语诗人、作家、艺术家、社会活动家。他一生创作了50多部诗集、12部中篇小说、100多篇短篇小说、30多部剧本、2000多首歌曲、1500多幅画，还有大量关于文学、哲学和政治的论著。1913年，泰戈尔以其诗集《吉檀伽利》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泰戈尔重视中国文化，他特别喜欢中国的线装书，认为李白、杜甫等人的诗词对他的影响很大。泰戈尔关心、热爱中国，他认为“中国和印度是极老而又极亲爱的兄弟”，^②表示自己“终究必要到中国去一次的”。^③1923年，经恩厚之、徐志摩等人的多方努力，讲学社终于向泰戈尔发出了热情洋溢的邀请信，文学研究会、新月社等文化团体也准备参加接待。泰戈尔是作为个人被邀请的，但他希望能作为国际大学的代表访问中国。国际大学的领导机构同意了泰戈尔的要求，授权他作为国际大学的代表。与泰戈尔同行的有国际大学梵文学者克提·莫亨·沈教授，国际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画家兰达拉尔·鲍斯，国际大学乡村建设指导、英国人恩厚之，加尔各答大学历史学家卡里达斯·纳格教授，美国社会工作者葛玲，共五人。

1924年4月12日，泰戈尔一行抵达上海，受到文学研究会、上海青年会、江苏省教育会等有关团体和郑振铎、瞿世英、徐志摩等知名人士的热烈欢迎。讲学社特邀徐志摩担任泰戈尔的翻译，还邀王统照为泰戈尔编辑演讲记录。泰戈尔在近五十天的时间里先后访问了上海、杭州、南京、济南、北京、太原、汉口等

① 张光璜：《中国名家论泰戈尔》，第88页，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年版。

② 季羨林：《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第152页，三联书店1982年版。

③ 冯友兰：《三松堂学术文集》，第1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七个城市；游览了龙华、西湖、明孝陵、故宫御花园等名胜古迹；在江苏省教育会、东南大学、山东省议会、清华大学、讲学社等处进行了多次公开演讲；在文学研究会、英美协会、佛学会等团体的欢迎会上发表了一系列即席演讲；与梁启超、胡适、梁漱溟、梅兰芳等人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北京是中国的文化中心，而且泰戈尔此行的主要目的是为讲学社讲学，因此他在北京停留的时间最长，讲的也最多。此外，随泰戈尔来华的克提·莫亨·沈教授、画家兰达拉尔·鲍斯和卡里达斯·纳格教授也做了学术报告。在主人方面，梁启超做了报告，北京画界举办了书画展，梅兰芳演出了神话剧《洛神》。总之，在泰戈尔访华期间，宾主双方就许多问题进行了探讨与交流。泰戈尔访华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可与菩提达摩、真谛、不空、维摩卡南达及法显、玄奘等人的文化交流活动相媲美。

呼吁恢复中印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呼吁加强两国文化界的了解与交流，这是泰戈尔演说的主要内容和他此行的主要目的。在来中国后的第一次公开讲演中，泰戈尔即满怀激情地讲道：“在这千年内我们往来的道上也许满长了蔓草，但我们却不难发现原来的踪迹。我们共同的事业就在祛除我们胸隔间壅积着的杂欲，再来沟通这名贵的情感的交流。”^① 在法源寺，他再次讲道：“我想继续印度以前到中国来的大师所未尽之事业。”^② 泰戈尔非常重视中印文化的交流与合作，他希望此次访华能取得实质性的成果，他希望中国学者能到他创办的国际大学去工作。在济南文化界的欢迎会上，泰戈尔真诚地发出邀请：“余现有一大学，拟集各国学者一堂，以为国际联合之表现，诸先生倘能惠然前往，当竭诚款待。……甚望诸先生襄助一切。”^③ 泰戈尔还希望有关

① 《第一次的谈话》，《小说月报》，第15卷第8号，1924年8月。

② 《太戈尔在法源寺之演讲》，1924年4月30日《申报》。

③ 《泰戈儿过鲁之盛况》，1924年4月26日《晨报》。

人士能组织“中印学会”，以“共谋发扬东方文化”。^①在中印文化界人士的努力下，一些中国学者开始前往国际大学访问，中印学会也分别在中国和印度成立，中印文化交流在此基础上有了很大的发展。

泰戈尔访华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文学界对其作品的翻译、介绍与研究，将中国的“泰戈尔热”推向了极点。1913年泰戈尔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后，欧洲立即掀起了一股“泰戈尔热”，这股热浪很快便涌入日本，波及中国。当时的中国正处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人们渴望科学、民主；五四爱国运动使得人们反对殖民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激情空前高涨。泰戈尔作品中追求自由民主、同情劳动人民、批判黑暗现实的精神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温和的泛爱主义与当时中国人的心理不谋而合。因此，人们接受、喜欢、推崇邻邦的这位伟大诗人。正如郑振铎所言：“泰戈尔之加入世界的文坛，正在这个旧的一切，已为我们厌倦的时候。他的特异的祈祷，他的创造的新声，他的甜蜜的恋歌，一切都如清晨的曙光，照耀于我们久居于黑暗的长夜之中的人的眼前。这就是他所以能这样的使我们注意，这样的使我们欢迎的最大的原因。”^②

在中国，最早翻译泰戈尔作品的人是陈独秀，他用文言文翻译了《吉檀迦利》中的四首短诗，以《赞歌》为题，发表在1915年出版的《青年杂志》上。小说方面，最早的译文是《妇女杂志》1917年登载的由无风、无我翻译的《雏恋》和《卖果者言》。戏剧方面，最早的译文是《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1915年刊载的由韵梅翻译的《邮局》。虽然从1915年开始，泰戈尔的作品便陆续出现在各种报刊上，但是，中国文学界翻译、介绍泰戈尔作品的真正高潮则是20年代上半期。在这一时期，除

^① 《泰戈尔关于佛教之谈话》，1924年5月20日《申报》。

^② 郑振铎：《泰戈尔传·序言》，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

了《小说月报》、《东方杂志》、《文学周报》、《晨报》副刊、《少年中国》等报刊大量刊载泰戈尔的诗歌、小说、戏剧等作品外，还出版了不少泰戈尔著作的中译本。较早的有商务印书馆 1921 年出版的由瞿世英翻译的戏剧《春之循环》、次年出版的由郑振铎翻译的诗集《飞鸟集》以及泰东图书局 1923 年出版的由张墨池和景梅九翻译的长篇小说《家庭与世界》。我们可以从下面这个表格中想见当时“泰戈尔热”的情况。

1921—1924 年泰戈尔作品（文章和书）中译数量统计^①

年份	诗歌	剧本	小说	论著	合计
1921	18	3	11	5	37
1922	9	1	2	2	14
1923	23	8	14	13	58
1924	4	2	0	20	26
合计	54	14	27	40	135

在对泰戈尔作品进行翻译、介绍的过程中，中国学者开始了对泰戈尔及其思想、作品的研究。瞿世英、郑振铎 1921 年在《晨报》副刊上发表的连载文章《泰戈尔研究》是中国学者研究泰戈尔的开端。研究泰戈尔较早的专著有 1921 年出版的冯飞的《塔果尔及其森林哲学》、1922 年出版的张闻天的《太戈尔之哲学》等。1924 年泰戈尔来华讲学，在中国文艺思想界引起了一场盛况空前的论争，几乎所有圈内人士都直接或间接地卷入进来，从而推动了中国的泰戈尔研究。泰戈尔来华时，中国文化界正在进行着一场新文化阵营同封建复古派和资产阶级右翼文人的斗争。泰戈尔极力提倡复兴东方的精神文明，反对西方的物质文明，主张用东方文明去拯救西方文明，创造一个和平的、充满爱

^① 据林承节：《中印人民友好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55—461 页编制。

意的大同世界。因此，复古派和资产阶级右翼文人企图利用泰戈尔的“精神复兴”和“爱的哲学”等唯心主义思想为自己张目，以达到抵制正在发展的革命思潮的目的。革命阵营中的进步文人为反击复古派和资产阶级右翼文人，就不得不对泰戈尔的思想做出批评。据统计，除了介绍、颂扬性的文章，这一时期仅涉及到论争的重要文章即达22篇之多。^①陈独秀、瞿秋白、沈泽民、沈雁冰、郭沫若等人先后发表文章，从不同方面对泰戈尔的思想提出了怀疑与批评。对于这场论战，鲁迅看得最为透彻，他对复古派和资产阶级右翼文人的阴谋了如指掌，他揭露说：“人近面事古的，我记起了泰戈尔。他到中国来了，开坛讲演，人给他摆出一张琴，烧上一炉香，左有林长民，右有徐志摩，各各头戴印度帽。徐诗人开始介绍了：‘唵！叽哩咕噜，白云清风，银磐……当！’说得他好像活神仙一样，于是我们的地上的青年们失望，离开了。神仙和凡人，怎能不离开呢？但我今年看见他论苏联的文章，自己声明道：‘我是一个英国治下的印度人。’他自己知道得明明白白。大约他到中国来的时候，决不至于还胡涂，如果我们的诗人诸公不将他制成一个活神仙，青年们对于他是不至于如此隔膜的。现在可是老大的晦气。”^②鲁迅还谈道：“印度诗圣泰戈尔先生临中国之际，像一大瓶香水似地很熏上几位先生以文气和玄气”，^③而泰戈尔本人却“被戴印度帽子的震旦人弄得一塌胡涂，终于莫明其妙而去”。^④鲁迅没有因为几个别有用心的人将泰戈尔“制成一个活神仙”而否定诗人本身；他也没有因为几个“震旦人”的胡闹使泰戈尔“莫明其妙而去”而否定这次访问。鲁迅讽刺、批判的矛头对准的是复古派及资产阶级右翼

① 据王锦厚：《五四新文学与外国文学》第20—21页统计。

② 鲁迅：《骂杀与捧杀》，《鲁迅全集》（第5卷），第585—58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③ 鲁迅：《论照相之类》，《鲁迅全集》（第1卷），第189页。

④ 鲁迅：《马上日记之二》，《鲁迅全集》（第3卷），第341页。

文人，而非泰戈尔。茅盾晚年谈到这场论争时说：“当时，就泰戈尔之来中国宣传‘东方文化’而表示反对者，有好多人写文章，发表的地方也不光是《觉悟》。这是响应共产党对泰戈尔的评价，也是对于别有动机而邀请泰戈尔来中国‘讲学’的学者、名流之反击。”^① 茅盾的话揭示了这场论争的政治背景。当时的中国，已经建立了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统一战线，国民革命的高潮即将来到。泰戈尔并不了解中国的形势，只是一味地宣传自己“慈爱忠恕”的文明观。而梁启超、胡适等人在向听众介绍泰戈尔时，又带着他们自己的思想倾向，很少提及泰戈尔反对侵略和提倡民主的一面。这一情况不免引起了共产党的注意和革命知识分子的反感，从而“借题发挥，批评玄学家这一类的思想”。^② 由泰戈尔访华引起的争论，扩大了泰戈尔在中国的影响，推动了中国的泰戈尔研究，加深了当时已广泛开展的东西文化论争，从而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独特的一页。

泰戈尔的作品促进了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影响了一代作家的成长。他的诗歌在中国新诗运动中更是起了不可估量、无法替代的作用。徐志摩在谈到这一现象时说：“在新诗界中，除了几位最有名神形毕肖的泰戈尔的私淑弟子以外，十首作品里至少有九首是受它直接或间接影响的。”^③ 石真也谈道：“《飞鸟集》出版以后，中国诗坛上一种表现随感式的‘短诗’或‘小诗’就很流行起来。”^④ 郑振铎在《飞鸟集》1933年版本序中也指出：“近来小诗十分发达。他们的作者大半都是直接或间接受泰戈尔此集的影响的。”^⑤ 《印度文学》的作者柳无忌认为：“在中国新文学的

① 茅盾：《文学与政治的交错》，《茅盾全集》（第34卷），第276—27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

② 代英：《告欢迎泰戈尔的人》，1924年4月19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③ 徐志摩：《泰戈尔来华》，《小说月报》第14卷第9号，1923年9月。

④ 石真：《泰戈尔诗选·前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⑤ 郑振铎：《飞鸟集·序》，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

创造阶段，泰戈尔是一个不可磨灭的影响，他启发了诗歌的灵感”，“他对于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初期有着深刻的影响。他的诗歌音奏，他对于人生的深刻见解，他的理想，他伟大的精神感召，深深地印在中国作家的心灵上”。^①

郭沫若是我国新诗界中最早受到泰戈尔影响的人，“最早对泰戈尔接近的，在中国恐怕我是第一个”。^② 1915年，在东京留学的郭沫若读到英文油印的泰戈尔《新月集》中的《岸上》、《睡眠的偷儿》、《婴儿的世界》等几首诗，立刻被泰戈尔的诗风吸引住了，“那清新和平易径直使我吃惊，使我一跃便年轻了二十年！”^③ 后来，郭沫若终于在冈山图书馆找到了泰戈尔的《吉檀伽利》、《园丁集》、《暗王室》、《伽毗尔百吟》等书，他如饥似渴地阅读着，好像探得了“生命之生命”，探得了“生命的泉水”一样。^④ 阅读了大量泰戈尔作品的郭沫若必然要受到泰戈尔的影响，包括泰戈尔哲学思想上的泛神论和创作风格上的清淡、简短。郭沫若甚至将自己诗歌创作的第一阶段称做“泰戈尔式”的。在谈到这一时期创作的《牧羊哀话》里的几首牧羊歌、《辛夷集》的序以及《女神》中的《新月与白云》、《死的诱惑》、《别离》、《维奴司》等诗时，郭沫若说：“那些诗是我最早期的诗，那儿和旧式的格调还没有十分脱离，但在过细研究过太戈尔的人，他可以知道那儿所表示着的太戈尔的影响是怎样地深刻。”^⑤ 郭沫若在泰戈尔的诗里面陶醉了两三年，在诗歌创作的初期颇受

① 柳无忌：《印度文学》，第162—163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民国七十一年版。

② 《郭沫若诗作谈》，《现世界》1939年创刊号。

③ 郭沫若：《我的作诗的经过》，《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第21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④ 郭沫若：《太戈儿来华的我见》，《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第270页。

⑤ 同③，第213页。

泰戈尔的影响。

郭沫若虽然是中国新诗界中最早接近泰戈尔的人，但是他受泰戈尔影响的时间不是很长，程度也不是很深。文学界公认的“最善学泰戈尔”的人是冰心。沈从文在《印译〈中国小说〉序》中曾经指出：“印度诗人太戈尔先生《新月集》的介绍，和他本人一再莅临中国作客，意义大，影响深，中国两个现代诗人的成就，都反映出太戈尔先生作品点滴的光辉：一个是谢冰心女士，作品取用的形式，以及在作品中表示对于自然与人生的纯洁感情，即完全由太翁作品启迪而来。另一个是徐志摩先生，人格中综合了永远天真和无私热忱，重现于他的诗歌与散文中时，作成新中国文学一注丰饶收成，更是太翁思想人格在中国最有活力的一株接枝果树。”^①

冰心以小诗奠定了自己在现代文坛上的地位，“泰戈尔—冰心模式”的“繁星格”、“春水体”成就了她的名声。“因看着泰戈尔的《飞鸟集》，而仿用他的形式，来收集我的零碎的思想”，^②于是便有了《繁星》和《春水》。六十多年后，冰心回忆到：“那是1919年的事了，当时根本就没有想写诗，只是上课的时候，想起什么就在笔记本上歪歪斜斜地写上几句。后来看了郑振铎译的泰戈尔的《飞鸟集》，觉得那小诗非常自由。那时年轻，‘初生牛犊不怕虎’，就学那种自由的写法，随时把自己的感想和回忆，三言两语写下来。有的有背景，有的没有背景，也偶尔借以骂人。后来写得多了，我自己把它们整理成集，选了头两个字‘繁星’，作为集名。……这是小杂感一类的东西。”^③冰心受泰戈尔影响最明显的地方表现在诗的形式上。《飞鸟集》中的诗非常短小、简洁，一首只有一两句话，一般不分行写。《繁星》虽

① 沈从文：《印译〈中国小说〉序》，《世纪评论》1948年第16期。

② 冰心：《我是怎样写〈繁星〉和〈春水〉的》，《诗刊》1959年第4期。

③ 卓如：《访老诗人冰心》，《诗刊》1981年第3期。

然分行来写，但一首诗也只是一两句话，同样地短小、简洁。冰心受泰戈尔影响最深的地方则表现在创作思想上。她汲取了泰戈尔颂扬母爱、追忆童年、礼赞自然、热恋祖国的爱的哲学。此外，在托物喻理、借景抒情等艺术表现手法上，冰心也深受泰戈尔的影响。冰心因受泰戈尔的影响而创作出《繁星》和《春水》，从而领导了中国文学史上一次著名的小诗运动。

在新诗界中，与泰戈尔交往最多的无疑是徐志摩，他是“泰戈尔最虔诚的信徒与有力的介绍者”。^① 徐志摩在泰戈尔访华时担任翻译，跟随其左右，他为泰戈尔的人格所深深折服，两人遂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泰戈尔的影响下，徐志摩创作出了《沙扬那拉》等形神俱似泰戈尔风格的诗篇。但正如沈从文所言，徐志摩吸收的更多的是泰戈尔的人格。徐志摩认为：“我们只要能够体会泰戈尔诗化的人格，与领略他满充人格的诗文，已经足够的了。”^② 可以说徐志摩是一个虔诚的泰戈尔的崇拜者，但他算不上一个成功的泰戈尔的学习者。

学习泰戈尔的最成功的诗人，除冰心外，要算王统照了。瞿世英认为：在中国文学家，最受泰戈尔影响的有两人，一是冰心，“她的诗很有太谷儿的诗的风格”；一是王统照，“他的思想受太谷儿的影响很深，但形式是不一样的”。^③ 泰戈尔“处处用广义的‘爱’与‘同情’来作他的诗的哲学”，^④ 王统照接受了这种“爱的哲学”，特别是其中热爱人生的思想以及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精神。在这种思想和精神的影响下，王统照极力追求“爱”与“美”相一致的理想王国，他诅咒着“与爱和美

① 柳无忌：《印度文学》，第163页。

② 徐志摩：《泰戈尔来华》，《小说月报》第14卷第9期，1923年9月。

③ 顾园柱：《新文学作家与外国文化》，第155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④ 王统照：《泰戈尔的思想与其诗歌的表象》，《小说月报》第14卷第9期，1923年9月。

不调和的生活”，想象着“爱和美和社会”。^①王统照的第一本诗集《童心》，在思想情调、意象选择和思想编排上，深得泰戈尔诗歌的神韵，这为我国新诗创作方法和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做出了贡献。王统照早期的小说《微笑》、《醉后》、《日影》等也深受泰戈尔思想的影响，不难看出其中浸染着泰戈尔人类之爱、母亲之爱、童心之爱式的思想。

除了郭沫若、冰心、徐志摩、王统照四位泰戈尔的知音外，还有许多诗人和作家直接或间接受到过泰戈尔的影响，著名的有郑振铎、许地山、宗白华、叶伯和、冯至、李金发、燕遇明等。他们受泰戈尔影响的时间有长有短，程度有深有浅，但无论如何，这一现象是不容忽视和值得研究的。柳无忌在他的《印度文学》一书中这样说到泰戈尔与中国文坛的关系：“二十世纪印度的作家中，与我们关系最为密切的要推泰戈尔了。这位德高望重的诗人，曾与中国的文坛接下了美满的因缘，受到我们的尊敬与赞美；而且，他曾经是我们一派新诗人的灵感泉源，东方文化的伟大支持者，在他身上，实现了中印文化的交流。”^②泰戈尔访华不仅扩大了他在中国的影响，更促成了中印学会和中国学院的成立，从而使中印文化交流有了更好的条件。

2. 国际大学中国学院

对中国文化有着特殊爱好的泰戈尔将汉学作为他创办的国际大学中的重要课程，1924年访华期间，他多次呼吁中国学者到印度去研究和讲学，他设想成立一个从事中印文化交流的组织，他还与中国学术界达成了交换教授的协议。虽然泰戈尔的这些美好愿望因为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没有实现，但他一直将恢复与发展中印文化交流这一伟大事业放在心上。1928年，有志致力于

^① 瞿世英：《春雨之夜·序》，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

^② 柳无忌：《印度文学》，第149页。

中印文化交流的青年学者谭云山应泰戈尔之邀来到国际大学，成为近代第一个到印度从事文化交流的中国学者。

谭云山在国际大学一边教授中文，一边学习梵文，并开始研究印度学。在工作中谭云山逐渐认识到：“欲谋两国民族之真切联合，非求两国民族互相了解不可；欲求两国民族互相了解，又非互相研究两国民族文化不可。”^①因此，必须加强两国文化的互相研究与互相交流。泰戈尔自然同意谭云山的看法，他们一致认为，要促进中印文化交流与中印学者交换，必须尽快在国际大学建立一所永久性的汉学研究机构。国际大学的学者们也赞成这个想法，他们同谭云山一起反复讨论，制定了一个活动计划，主要包括设立研究机构和交换学者两个方面。在得到印度各界的支持与鼓励后，谭云山决定回国寻求帮助与合作。

1931年9月，谭云山回到中国。他向文化界人士谈了自己的主张、设想和印度方面的反应，得到了有识之士的热烈响应。当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和当时任考试院院长的戴季陶对恢复中印民族友好十分重视，对发展中印文化交流非常热心。在他们的支持下，发起组织中印学会的工作逐渐展开。1933年，中印学会的发起人编辑出版了《中印学会：计划、总章、缘起》的小册子。他们指出：因为沟通、研究中印文化是非常必要的，所以要建立以“研究中印学术，沟通中印文化并融合中印感情，联合中印人民，以创造人类和平，促进世界大同”为宗旨的中印学会。^②

1934年，谭云山应泰戈尔之召返回印度，组织了以国际大学为根据地、以泰戈尔为主席的中印学会。印度文化教育界及谋求印度独立的许多重要人士都申请入会。

接着，谭云山又回到中国，加紧成立中国中印学会。1935

^① 谭云山：《印度周游记》，第29页，南京新亚细亚学会1933年版。

^② 《中印学会：计划、总章、缘起》，中印学会1933年版。

年5月3日，谭云山、蔡元培、戴季陶、陈立夫等二十多人在南京召开中印学会发起人会议。会上，会议主席蔡元培临时提议改开成立大会，得到全体与会者的同意。于是，蔡元培、戴季陶、谭云山等人分别报告了中印学会的发起缘由及筹备经过。随后，与会者讨论了会章，经修正通过。会上，蔡元培、吴稚晖、王一亭、叶楚伦、陈立夫、陈大齐、许崇灏、段锡朋、谭云山等九人被选为理事，戴季陶、许世英、徐悲鸿、辛树帜、马鹤天等五人被选为监事。会后随即召开了第一次理事监事联席会议，蔡元培被选为理事会主席，戴季陶被选为监事会主席。至此，中印学会终于在印度和中国分别建立起来。

中印学会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在国际大学内部建立了中国学院。泰戈尔和谭云山在筹建中印学会时，即商讨了建立中国学院的方案并拟订了计划。泰戈尔曾致信蔡元培说：“我很高兴提供我在和平乡的大学，作为中印文化协会在印度活动的中心。我希望我的中国朋友会欣然接受这个协会，并慷慨帮助我的朋友谭云山教授实行这项建立一个永久性组织以促进中印更密切文化接触的计划。”^①谭云山于1934年10月再次回到中国，一面为中印学会的正式成立而奔波，一面开始为中国学院的建立筹措资金和搜集图书。

谭云山的努力得到了中国各界人士的热烈支持。蔡元培在致泰戈尔的信中谈到：“我们感谢您慷慨地允诺‘中印学会’把生汀尼克坦的国际大学作为它的总部。关于谭教授筹款建立国际大学中国学院大厦一事，我当尽力和他合作，尽管我们目前财政困难，谭教授仍然在竭力筹措。”^②经过一年多的努力，谭云山终于募得了足够建立中国学院和购买必须设备的资金，并搜求购置了大量的中国书籍。

① 陈文：《谭云山与中印关系》，《明报月刊》1983年第4期。

② 魏凤江：《我的老师泰戈尔》，第126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936年春天，谭云山带着钱和书返回印度，“彼邦人士欢欣鼓舞，不可名言”。^①泰戈尔随即决定划出一块环境优美的地区建立中国学院大厦。经过一年的苦心经营，中国学院终于建成。这是一幢两层的西式建筑物，楼上是图书馆、研究室、办公室，楼下是讲堂、会议室、学生宿舍。在讲堂前面有林森楷书的“中国学院”四字；会议室外的墙上有一块铜碑，是戴季陶所书，内容为叙述过去中印文化关系、展望未来中印文化关系以及他个人朝礼印度佛教圣地的观感。

1937年4月14日，在孟加拉新年的这一天，中国学院举行落成典礼。蔡元培和戴季陶联名代表中印学会给泰戈尔发出贺电。甘地因故不能前来参加典礼，他给泰戈尔写信说：“如果我没有早就决定在十四日去贝尔高姆的话，我一定要来参加盛典，同时来看望多年未见的你和生汀尼克坦^②。现在虽不能如愿，但我和你在精神上是在一起的，愿中国学院作为中印两国人民结合的象征吧！”^③甘地还致信谭云山说：“我已写信给古鲁特父^④，向他道歉，因我有事不能出席盛会。是的，我们确实需要促进中印两国人民的文化联系，你们的努力诚可钦佩，愿中国学院产生丰厚的果实吧！”^⑤

国大党主席嘉华赫拉尔·尼赫鲁（Jawaharal Nehru）因生病不能前来，派他的女儿英迪拉（Srimati Indira）带来了书面祝词当面宣读。尼赫鲁在信中表示了不能参加中国学院落成典礼的遗憾，因为这一盛典“标志着对悠久历史的纪念，对未来友谊的重缔”。他高度评价了中印之间源远流长的友好关系，表示了中印两国人民与帝国主义法西斯及其帮凶斗争的信心和决心。他在信

① 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下（2），第359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② 生汀尼克坦，Santiniketan，意译和平乡、寂乡，国际大学所在地。

③ 魏凤江：《我的老师泰戈尔》，第130—131页。

④ 古鲁特父，Gurudev，意即大智，是印度人民对泰戈尔的尊称。

⑤ 同③，第131页。

的最后说：“中国和印度有史以来是姐妹国家。两国文化传统久长，高尚的理想和平地发展着，必然要在世界舞台上扮演领导的角色，这是两国人民置身于其间，而又不容辞的。”^①

泰戈尔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他说：“今天对我来说确是一个伟大的日子，我久盼着这个日子的来临，为我们的人民偿还从古已许下的宿愿，就是要维护我们印度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文化交往和友谊，这是在一千八百年前，我们的祖先，以无与伦比的忍耐和牺牲奠好了基础的。……中国学院在今天开幕了。中印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友谊与日俱增。学院将成为这种了解的一个核心和象征。中国学生和学者将来到这里和我们同甘共苦，为着一种共同的事业，各尽其能，重建两国人民间的友好关系，这种关系，已中断了十个世纪了。”泰戈尔继续讲道：“中国和印度接壤数千里，通道不计其数。这些通道不是战骑和机枪开发出来的，而是和平的使者，往来不绝，一步一步踏出来的。两国人民，现在要把这些通道，开阔平整起来，使之畅通无阻，以便更密切地交往。而这开阔平整的任务，我们已经开始，有赖我们和我们的后人，继续努力，以期迅速完成……”^②泰戈尔这个长达1小时20分钟之久的演讲，就是今日中印两国人民所传诵的《中国与印度》一文。

被任命为中国学院院长的谭云山在致辞中感谢泰戈尔对中印文化交流的重视及对中国学院的帮助。他表示他个人和他的学生将继续为沟通中印文化而努力。

中国学院的成立使印度终于有了一个完整的中国学研究中心。中国学院是国际大学的特别研究部门之一，它的目标是使中国学者研习印度文化、哲学、宗教、语言，同时使印度学者致力于中国文化、历史、哲学和语言的研究。因为佛教是中印文化交

^① 魏凤江：《我的老师泰戈尔》，第131—132页。

^② 同^①，第133—134页。

流的重要媒介，因此佛学、佛典研究、佛经翻译在这儿很受重视。中国学院的图书馆有着丰富的藏书，包括四部丛刊、四库珍本、二十五史、万有文库、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玉海、古今图书集成、艺文类聚、皇清经解、宋碇砂藏经、大清龙藏经、大正大藏经、上海频伽藏经及其他重要的字画、辞典、学报等。中国学院如此丰富的馆藏与中国各界人士的支持是分不开的。蒋介石曾捐给中印学会五万元钱，“拟以三万元为在印度国际大学建筑中国图书馆之用，以二万元为购置、编录及运输图书之用，组织购书委员会”。^① 谭云山于1936年携带第一批书画返回印度，其中包括中印学会购置的十多万卷书籍及私人和各学术出版机构如中央研究院、北京大学、国立故宫博物馆、南京佛学院、上海书局等单位捐赠的约五万卷书籍。这批书差不多包含了中国的全部古典著作，仅是中文的大藏经就有四种版本，另外还有藏文的大藏经，梵文、巴利文、孟加拉文、印地文、英文、德文的著作以及中国名画家张大千、徐悲鸿等人的作品。1937年1月，在为学院搜求购置的第二批书画即将运往印度之时，蔡元培和戴季陶联名发出了一个征集国画沟通中印文化的通函。他们以佛教为例讲述了中印学术沟通的陈述，以绘画为例讲述了中印艺术交流的成果。“元培、传贤志切嚶求，益怀往迹”，故“用敢撮述涯略，以告当世之法绘名家，各策群力，共襄盛举”。他们认为：“凡印度昔所贲于中国者，今中国亦将转以贲诸印度，参互而变化焉，会通而光大焉，虽欧洲之文艺复兴，亦将不得专美于前矣。邦人君子，其亦有乐于是欤。”^②

中国学院成立后，一批有志于中印文化交流的中国学者先后到此进行讲学和研究，如吴晓铃、金克木、法航法师、杨允元、周祥光、薛雷、胡季藻、徐甫、萧化民、余清波等人。此外，印

① 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下（2），第217页。

② 同①，第359页。

度、泰国、德国、斯里兰卡等国的汉学家也陆续来到中国学院。在谭云山的领导下，学院的师生撰写了大批关于佛教、中国哲学和文化、印度哲学和文化的书籍和文章。学院发行的《中印研究》丛书在学术界享有盛誉。

作为中国学院的首任院长及汉学教授，谭云山为中印文化交流的恢复与发展做出的贡献是独特的。他除了主持院中事务和授课外，还常应邀为印度各地的学术机关和社会团体做关于中国文化、哲学的演讲。此外，他还继续在哲学、佛学和文学方面进行研究工作，写出了38种英文著作和10种中文著作。谭云山“将为世人所怀念，因为他在现代最早努力重建中印文化的联系”，“为了确认谭云山教授在加强中印相互研究和中印两个民族的友谊方面做出的独特贡献”，国际大学于1979年授予他该校最高荣誉 Desikottam——名誉文学博士学位。^①阿尼尔·萨玛尔特在他的《和平乡的学术大师谭云山》一文中高度评价谭云山：“本世纪的中印文化关系史上，谭云山教授的贡献独放光芒。他成功的文化工作是不会及身而没的。他是虔敬忠诚加上谦卑、丰富学识加上圣人性格的化身。这位现代中国非官方的特别文化大使在印度住了几乎半个世纪，打破玄奘的记录，纪元六世纪中国高僧玄奘只在那兰陀住了十四年。”^②

3. 中国学者对印度文学的译介和研究

民国时期，中国学者对印度文学的译介与研究，是以包括史诗、戏剧、寓言、童话、民间故事等形式的梵语文学为发端，以包括诗歌、戏剧、小说等内容的泰戈尔作品为中心展开的。

苏曼殊是“我国近代最先提出要研究梵语文学”的学者。^③

① 中村元：《论中国文化在亚洲的意义》，《南亚研究》1981年第2辑。

② 转引自陈文：《谭云山与中印关系》。

③ 林承节：《中印人民友好关系史》，第428页。

1908年,《民报》连载了他选辑的《岭海幽光录》和他翻译的印度作家瞿沙(Kusha)的小说《娑罗海滨遁迹记》,这可以说是中国近代译介印度新体小说的先声。同年,他的《文学因缘》一书在东京出版,在白序中他谈道:“印度为哲学文物源渊,俯视希腊,诚后进耳。其《摩诃婆罗多》(Mahabrata)、《罗摩衍那》(Ramayana)二章,衲谓中土名著,虽《孔雀东南飞》、《北征》、《南山》诸什,亦逊彼闳美。”^①1911年,他在《答玛德利玛湘处士论佛教书》中写道:“《摩诃婆罗多》与《罗摩延》两书,为长篇叙事诗,虽颌马亦不足望其项背。考两诗之作,在吾震旦商时,此土向无译本;惟《华严经》偶述其名称,谓出马鸣菩萨手。文固旷劫难逢,衲意裴公当日以其无关正教,因弗之译。”^②1913年,他在《燕子龕随笔》中又谈道:“Mahabrata, Ramayana两篇,闳丽渊雅,为长篇叙事诗,欧洲治文学者视为鸿宝,犹Iliad, Odyssey二篇之于希腊也。此土向无译述,唯《华严疏钞》中有云:《婆罗多书》、《罗摩延书》,是其名称。二诗在欧土早有译本。”^③从苏曼殊多次提到《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的情况来看,他对印度的这两大史诗是极为推崇且很有研究的。苏曼殊曾翻译过印度女诗人佗露哆(Taru Dutt)的诗篇,他还打算翻译印度古代伟大诗人迦梨陀娑(Kalidasa)的名作《沙恭达罗》(Shakuntala),但是否译出却不得而知。此外,他还参考英人的著作,编写了《梵文典》。了解印度古代文明并对梵文颇有造诣的苏曼殊在沟通梵华学术上起了开创作用,他的著述标志着近代中国学人研究梵语文学的开始。

在苏曼殊盛赞印度两大史诗的同时,鲁迅也注意到了印度梵

① 《曼殊大师全集·诗文集》,第106页,教育书店1947年版。Mahabrata应作Mahabharata。

② 同①,第136页。“颌马”今译“荷马”。

③ 同①,第262页。引文中Mahabrata应作Mahabharata,即《摩诃婆罗多》,Ramayana即《罗摩衍那》;Iliad即《伊里亚特》,Odyssey即《奥德赛》。

语文学中的这两件瑰宝。1907年，他在《摩罗诗力说》中称赞道：“天竺古有《韦陀》四种，瑰丽幽夔，称世界大文；其《摩阿罗多》暨《罗摩衍那》二赋，亦至美妙。厥后有诗人加黎陀萨（Kalidasa）者出，以传奇鸣世，间杂抒情之篇。”^①鲁迅对汉译佛典中富有文学气味的那一部分进行过精细的研究。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一再指出印度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他指出：“魏晋以来，渐译释典，天竺故事亦流传民间，文人喜奇颖异，于有意或无意中用之，遂蜕化为国有。”^②并以《汉武帝内传》、《灵鬼志》、《续齐谐记》等来说明印度故事的中国化。鲁迅非常喜欢印度寓言，他曾将僧伽斯那撰、萧齐天竺三藏求那毗地译的《百喻经》（即《痴华鬘》）断句，并出资刊印。在《〈痴华鬘〉题记》中鲁迅赞到：“尝闻天竺寓言之富，如大林深泉。他国艺文，往往蒙其影响。即翻为华言之佛经中，亦随在可见，明徐元太辑《喻林》，颇加搜求，然卷帙繁重，不易得之。佛藏中经，以譬喻为名者，亦可五六种，惟《百喻经》最有条贯。”^③精通汉译佛典的鲁迅深受佛典的影响，他多次将佛典中的词汇借用到作品中。可以说鲁迅对印度的史诗、故事、寓言推崇备至。

苏曼殊和鲁迅对印度梵语文学的关注与研究逐渐引起了中国学术界的重视，一些学者开始从事印度梵语文学的翻译与介绍。

印度古代的伟大诗人迦梨陀娑及其作品自然吸引了文学翻译工作者的注意。30年代，王维克从法文本翻译了诗人的主要作品《沙恭达罗》、《时令之环》和《云使》，朱名区从世界语本翻译了《沙恭达罗》，并将其改编为戏剧故事。40年代，卢前据英文本译出了《沙恭达罗》，并将其改编为南曲，以《孔雀女金环重圆记》为名出版。稍后，王衍孔也从法文本译出了《沙恭达

① 《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一卷），第81页。

② 《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九卷），第50页。

③ 《〈痴华鬘〉题记》，《鲁迅全集》（第七卷），第101页。

罗》。由此可见，迦梨陀婆的作品深受中国文学翻译工作者的喜爱。1934年，辜怀据英文本翻译出版了《印度女子诗选》，此书内收印度吠陀时代、早期佛教时代、中世纪及现代女诗人的诗歌共110首。

久负盛名的印度寓言、童话和故事也引起了文学翻译工作者的极大兴趣。20年代，郑振铎在《小说月报》、《文学周刊》等期刊上先后翻译发表了六十多篇印度寓言。1925年，他编译出版了《印度寓言》一书，该书收入寓言55则，其中大部分是根据拉马斯瓦米·拉久（P.V. Ramaswami Raju）选辑的《Pilpay》一书译出的。1931年，刘北茂也出版了一本译自拉马斯瓦米·拉久英文著作的《印度寓言》，该书内收寓言106则。1947年，卢前出版了印度古代童话、寓言故事集《五叶书》，此书是根据芮士的英译本转译的 Vishun Sarma 的著作，译文为文言体。

1930年，顾均正据慧觉译的《贤愚因缘经》（印度《查塔卡》的部分译文）编译出版了《公平的裁判》一书，内收六篇印度古代童话故事，并附有丰子恺作的插图。日本的丰岛次郎编著的《印度童话故事集》在1932年、1933年、1937年分别由徐蔚南、许达年、叶炽强翻译出版，该书共收录12篇童话故事。

1929年，许地山出版了译自英文原本的《孟加拉民间故事》一书，该书收有22个民间故事。1930年，汪原放据升喀（Shyama Shankar）的著作编译出版了《印度七十四故事》。1943年，南登山编译出版了《印度故事集》，该书内收印度民间传说与童话故事三十多篇。

在翻译介绍的同时，中国学者开始了对印度文学的研究。1923年，胡适为上海亚东图书馆铅印出版的《西游记》写了一篇代序《西游记考证》，提出了中国的“孙悟空”来自印度的“哈奴曼”这一大胆的新观点。1927年，许地山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梵剧体例及其在汉剧上的点点滴滴》一文，考察了梵剧的发展变化及其与中国戏剧的关系。1931年，他又在《晨报》

上发表了《印度的戏剧》一文，介绍了印度戏剧的发展及主要的剧作家。1930年，陈寅恪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发表了《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一文，具体地指出了西游记与印度故事的详细联系：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故事是两个印度故事的组合，一是《贤愚经》卷十三《顶生王缘品》第六十四回中，顶生王为上三十三天而在天上与魔斗争的故事，一是《罗摩延传》第六编工巧猿造桥渡海直抵楞伽的故事；猪八戒高家庄招亲的故事出自《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卷三的《佛制苾刍发不应长因缘》；沙僧则来自《慈恩法师传》卷一中的一段记载。同年，他在《清华学报》上发表了《三国志曹冲华陀传与印度故事》，文中指出：曹冲称象的传说来源于印度，华陀二字来自梵文 agada，即药叉之意。1932年，他又在《清华学报》上发表了《莲花色尼出家因缘跋》，此文考证了中国佛经记载与梵文原文的异同。1944年，苏雪林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天问里的印度诸天搅海故事》。1946年到1948年间，季羨林先后发表了《一个故事的演变》、《一个流传欧亚的笑话》、《木师与画师的故事》、《“猫名”寓言的演变》等，通过考证，提出一些国家民间流传的某些寓言、神话、故事均源自印度。中国学者对印度文学的研究揭示了中印文学间源远流长的关系及千丝万缕的联系，引起了文学工作者和文学爱好者的极大兴趣。

民国时期，中国学术界对印度近代文学的介绍与研究主要是围绕着泰戈尔作品进行的，本书在泰戈尔访华的有关部分已对其作品在中国翻译、研究的情况做过介绍。在对印度文学翻译、介绍、研究的基础上，出现了两本《印度文学》。许地山1931年出版的《印度文学》是我国最早的印度文学史专著。该书将印度文学分为吠陀文学、非圣文学、雅语文学及近代文学四个时期，系统地叙述了印度文学发生、发展的过程，并对各个时期各种文学形式的主要成就及其主要代表人物做了重点介绍。该书成为印度文学爱好者的首选之书。柳无忌的《印度文学》于1945年出版，

这是一本概论性质的书，共有八章。第一章介绍古印度的宗教文学，着重论述了吠陀经典。第二章至第六章论述中古时代的雅语文学：其中第二章与第三章专论史诗，重点举《摩诃婆罗达》及《罗摩衍那》两大代表作；第四章以《沙恭达罗》为中心讨论了戏剧；第五章概述抒情诗；第六章专论小说、故事等民间文学；第七章及第八章以女诗人陀露哆及诗翁泰戈尔为中心论述近代文学。关于本书的内容，作者曾有如下说明：“本书的写作，侧重古印度文学每一门的一二部代表作品，及近代印度文学的两位代表作家，以为论述的中心，详细评介，而并非史的、综合的、概括的、平行的叙述。”^① 该书为印度文学的爱好者提供了一个入门读物。

在印度文学的翻译、介绍和研究中，郑振铎做出了重大贡献。印度学者海曼歌·比斯瓦斯在1958年所写的《悼念郑振铎》一文中曾经指出：“我们印度人是把他当做最早的印度学者来热爱的，在当代，他可能是第一个把印度古典和现代的文学介绍给中国读者的人。他同样地是当前中印文化交流的先驱。”^② 郑振铎对印度文学的译介是从泰戈尔的作品开始的。1920年8月《人道》月刊上所载的译自《吉檀迦利》中的22首诗是现在见到的郑振铎最早发表的泰戈尔的译诗。这组译诗以《新月集》中的《我的歌》一诗作为序诗，同时还附有他撰写的泰戈尔生平介绍。之后，郑振铎经常在《小说月报》、《文学旬刊》等刊物上发表译自泰戈尔《园丁集》、《新月集》、《采果集》、《飞鸟集》、《吉檀迦利》等诗集中的诗篇。1922年，郑振铎将《飞鸟集》翻译出版，这是我国最早出版的一本泰戈尔译诗。在翻译泰戈尔作品的同时，郑振铎开始了对泰戈尔作品和思想的研究。1921年文学研究会成立时他即在会内组织了一个“泰戈尔研究会”，“中国专研

^① 柳无忌：《印度文学·后记》。

^② 陈福康：《郑振铎论》，第389页，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究一个文学家的学会，这会还算是第一个呢”。^①

1925年，郑振铎出版了《太戈尔传》，这是中国人写的第一部关于泰戈尔的传记。该书分12章叙述了泰戈尔的生活道路、著作和思想，书末附有瞿世英的《太戈尔的人生观与世界观》、郑振铎的《太戈尔的艺术观》、张闻天的《太戈尔之“诗与哲学”观》、《太戈尔的妇女观》、《太戈尔对于印度和世界的使命》等五篇文章以及《太戈尔的重要著作》和《关于太戈尔研究的书》两个书目。我国的印度文学研究专家石真先生曾经指出：“可以说中国最早较有系统地介绍和研究泰戈尔的是西谛先生。”^② 郑振铎的这些活动，对我国新文学的建设和中外文学的交流，都是很有意义的。

除了介绍泰戈尔及其作品，郑振铎还将优美动人的印度寓言翻译介绍给中国读者。他在1922年主编《儿童世界》周刊时即开始了对印度寓言的译述。1924年到1925年间，他在自己主编的《小说月报》和《文学周刊》上发表了六十多篇印度寓言。1925年，他编译出版了《印度寓言》一书的上册，其中收有寓言55则，大部分是根据拉马斯瓦米·拉久所选的一本印度寓言英译本《Pilpay》一书译出的。该书下册拟选译《百喻经》及其他寓言，郑振铎曾在刊物上发表了七篇译自《百喻经》的寓言，但《印度寓言》一书的下册终未出版。仅有的上册面世后，受到了中国读者、尤其是广大少年儿童的热烈欢迎，于1927年、1933年两次再版。郑振铎并非仅仅从事单纯的翻译活动，他曾对印度寓言进行过深入的研究，撰写了许多文章论述其地位、特点及传播等。郑振铎的努力有力地促进了中国读者对于印度寓言这一文学奇葩的了解。

1924年，《小说月报》从第15卷起开始连载郑振铎编写的

① 陈福康：《郑振铎论》，第386页。

② 石真：《泰戈尔诗选·前言》。西谛是郑振铎的笔名。

《文学大纲》。1927年，该书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此书上溯占希腊罗马，下及20世纪初叶，综述了中外古今的著名作家与作品。郑振铎一反以往的文学通史编写者重视西方忽视东方的陈规，对印度、阿拉伯等东方文学给予了足够的重视。第五章《东方的圣经》叙述了婆罗门教、印度教、佛教等印度宗教及其文学。第六章《印度的史诗》介绍了世界文学中最伟大的作品《马哈巴拉泰》和《拉马耶那》两大印度史诗。^①郑振铎对这两大史诗甚为赞赏，他写道：“在事实上说来，这两篇史诗实可算是最幻变奇异的，在文学艺术上说来，他们又是可惊异的精炼的，在篇幅上说来，他们又是世界上的所有的史诗中的最长的。”^②第十六章《中世纪的印度与阿刺伯》介绍了戏剧家巴瓦希底、开里台沙等人及戏曲《泥车》、《那格南达》等作品，指出“中世纪的印度文学时代可以称之为戏曲的时代”，“中国戏曲在中世纪后半期之突然而发生，受印度的影响，想必是不少”。^③郑振铎的《文学大纲》，虽然不是论述印度文学的专著，但是在当时多数人把目光集中于西方文学的情况下，他能为印度文学等东方文学留出应有的空间，这是相当可贵的。

4. 中国学者对印度佛教和印度哲学的研究

从清末开始的佛学研究热在民国时期继续升温，在近半个世纪里，寺僧、居上和学者的佛学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研究者除了继续研究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佛教经典本身外，还开始了佛教在印度的兴起及发展变化的研究。

梁启超的佛学研究除涉及中国佛学史的沿革、佛典的翻译与传播及佛学理论外，还对佛教在印度的形成与发展及初期的佛教

① 即《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

② 郑振铎：《文学大纲》，第212页，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版。

③ 同②，第781—782页。

教理做了初步探讨，他在这一方面的主要文章有《印度佛教概观》、《印度之佛教》、《佛教与西域》、《又佛教与西域》、《读异部宗轮论述记》、《说六足发智》、《说大毗婆沙》、《说四阿含》等。梁启超粗略地研究了印度佛教发生、发展、衰亡的线索，并介绍了部派分化的情况，注意到了政治斗争对印度佛教的影响，他还试图从小乘经论中追索佛教部派发展的历史。梁启超的印度佛教研究虽然不是特别深入，但其开创之功仍是值得称道的。

佛门弟子吕澂在研究印度佛学方面贡献突出，撰有《印度佛学源流略讲》、《印度佛教史略》、《禅学考原》、《佛学辩证法》、《杂阿含经刊定记》、《略述有部学说》、《阿毗达摩泛论》等专著及论文。1925年，吕澂编写的《印度佛教史略》一书出版，这是近代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印度佛教史，此书推动了中国学者对印度佛教史的研究。该书讲述了佛陀出世前印度的居民及宗教，佛在世时佛教的传播及佛灭后各宗派的演变，阐述了大乘教派兴起的原因及大小乘教派不同的教义，书末附有《印度佛教史略表》。《印度佛学源流略讲》是吕澂的另一部重要著作，该书勾勒出印度佛教一千多年来发展变化的情况，并将印度佛学分为原始佛学、部派佛学、初期大乘佛学、小乘佛学、中期大乘佛学、晚期大乘佛学等几部分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谭云山对印度佛教的研究也比较深入。1933年出版的《印度周游记》中的附录《印度佛教之现状与六大圣迹》对印度佛教的状况及圣迹做了系统介绍；1935年出版的《印度丛谈》中的《印度宗教一般》、《印度教之演化》、《印回两教关系》等文章对印度的宗教状况做了详细介绍；1936年发表的《印度文化与佛教》探讨了佛教在印度文化发展中的地位、影响。

1943年，佛门弟子印顺的《印度之佛教》出版。该书叙述了印度佛教的发展源流概况。全书包括释尊略传、佛理要略、圣典之结集、学派之分裂、学派思想泛论、中印之法难、大乘佛教导源、虚妄唯识论、真常唯心论、密教之兴与佛教之灭等，共

18章。书前有作者自序，书后附有太虚的《议印度之佛教》、作者的《敬答议印度之佛教》及印度佛教大事年表。此书的出版将“我国佛学界对印度佛教的研究又推进一步”。^①

民国时期还有两部翻译过来的《印度佛教史》。由日本人境野黄洋著、慧园居士编译的《印度佛教史》于1934年由武昌佛学院出版，该书叙述自释尊以前的印度宗教至小乘教末期的佛教，共15章。商务印书馆1946年出版了由王沂暖节译自藏文的《印度佛教史》，该书始于“善见王时代”，终至“造像发生兴趣”，共44章。原书作于明神宗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著者西藏觉昂派大师多罗那他，曾派行印度、尼泊尔。

民国时期，中国学者开始比较系统地研究印度哲学，出现了几本关于印度哲学的专著及为数不少的论文，一些大学还开设了印度哲学课程。

1918年，梁漱溟在北京大学讲授《印度哲学概论》，其讲义于191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我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印度哲学专著。书中论及印度哲学的概念、典籍与诸宗学说，分为印度各宗概略、本体论、认识论、世间论4篇20章。梁漱溟在北京和济南作的关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演讲稿也于192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中有一部分是讲印度哲学的，该书以后曾多次重印或再版，并被译为多国文字，在中国现代文化史、思想史、哲学史上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历史地位。

1932年上海佛学书局出版了黄健六著的《印度哲学总论》。书中分导言及总论两大部分，总论中包括印度哲学之界说、印度哲学之由来、外道与佛教之异同三方面内容。

1935年，高观庐译自日文的《印度哲学宗教史》出版。该书原作者是高楠顺次郎和木村泰贤，原为作者在东京帝国大学讲授印度哲学宗教史的讲稿。主要论述佛教产生之前的印度哲学，

^① 林承节：《中印人民友好关系史》，第441页。

包括吠陀之宗教与哲学、梵书、奥义书、经书、奥义书终期学派之开展等五篇。

黄忏华的《印度哲学史纲要》于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被誉为“三十年代中国学者研究成果的代表作”。^① 全书分婆罗门哲学、诸派哲学和佛教哲学三大部分，全面介绍了印度哲学，对婆罗门哲学内部的吠陀哲学、净行书哲学、奥义书哲学，对诸派哲学内部的数论派、瑜伽派、胜论派、正义派、弥曼差派、吠檀多派等主要派别，对佛教哲学内部的根本佛教、部派佛教、开发佛教都做了详尽的论述与分析。

汤用彤20年代在《学衡》杂志上发表了《印度哲学之起源》和《释迦时代之外道》两篇关于印度哲学的文章。他于1929年在南京支那内学院讲授印度哲学史及巴利文。1945年他出版了《印度哲学史略》一书。该书论述了印度哲学的起源，各种学说宗派的要义、发展、变迁和相互之间的关系，以及有关的典籍。书中内容包括黎俱吠陀与阿闍婆吠陀、梵书与奥义书、释迦同时诸外道、耆那教与邪命外道、佛教之发展、婆罗门教之变迁、数论、瑜伽论、胜论、正理论、前弥曼差论、商羯罗之吠檀多论等。书中有《吠陀及奥义书选译》、《六师外道》、《顺世外道》、《金七十论科别》几个附录。

民国时期发表的关于印度哲学的主要论文还有：许地山的《古代印度哲学与希腊哲学之比较》、王与楫的《印度哲学概论》、张正藩的《印度哲学面面观》、姚宝贤的《印度哲学之体系》、心月的《印度哲学上胜数论法义及其数量》、谈玄的《佛陀以前的印度思潮》、大古的《印度——哲学的故乡》、子微的《印度思想与初期佛教思想概观》、子中的《数论与胜论之宇宙观》等。

民国时期，一些大学先后开设了印度哲学方面的课程，主要的有：北京大学，许季上、梁漱溟、汤用彤、金克木讲授；南京

^① 林承节：《中印人民友好关系史》，第439页。

支那内学院，吕澂、汤用彤讲授；法相大学，吕澂讲授；东南大学，汤用彤讲授；武汉大学，金克木、石峻讲授。

5. 赴印的中国留学生与学者及来华的印度留学生与学者

近代第一个去印度留学的中国学生是曾圣提，他受到苏曼殊的感召，又受到泰戈尔来华的鼓舞，因此决定学习梵文，研究印度文化。1924年，他离华赴印，先在国际大学就读，后来又到甘地办的沙巴玛提真理学院学习，于1925年回国。1931年，有三名中国学生在国际大学学习，但具体情况不详。谭云山1931年在德里遇到一位名叫海维凉的中国学生，该生是由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派到印度攻读伊斯兰宗教和哲学的。中国学生杨国宾于1933年夏去国际大学攻读印度哲学，并于次年应邀去印度大学硕士班就读。30年代去印度留学的僧人有1931年去国际大学学习梵文的体参和1936年去国际大学学习的岫庐。魏凤江是第一个由中印学会选派到国际大学学习中国留学生，他于1933年至1939年在国际大学攻读印度历史文学，学习、生活在泰戈尔身边。

1942年，印度教育顾问沙金特来华访问，对中国的战时教育大为赞赏，归国后即建议交换学生10名，以加强中印文化交流。次年，由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政务次长顾毓秀率领的教育文化访问团访问印度，与印度政府和教育界商讨了互派教授、学生等事情，决定在1943年各派10名研究生去对方留学。印度首批来华学生于1943年11月到达中国，他们均系大学毕业，有的已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他们由教育部分至中央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金陵大学等校，从事中国历史、哲学、考古学、化学、数学、农学等学科的研究。我国选派的10名赴印留学生为：胡汝楫、王汉中、魏珪孙、欧阳中庸、卢浩然、汤迪宝、池际咸、赵硕欣、甘其绶、沈铸，他们中六人在大学就读，四人学习实验与工程。双方原定交换学生期限为一年，

期满时，我国学生返国者五人，印度学生返印者六人，其余经双方政府核准延期一年到一年半不等，至1946年均分别返国。^①中印两国政府互相选派留学生的的工作自此断续进行。

有一批中国人，不属于中印双方政府正式交换，他们因对中印文化交流感兴趣而就读、任教、做研究于国际大学或国际大学中国学院。他们是：林我将、巴宙、周达夫、石岫庐、吴晓铃、常任侠、徐梵城、杨允元、杨罗衡、法航法师、巫白慧、张敬、尹挥戈、余清波、萧化民、童纪唐、周祥光、冉云华、冉肖凤、胡季藻、李开物、杨瑞琳、谭中等人。

还有一些中国学者曾到印度做客或做短期研究。1926年，许地山自英国回国时，曾到印度罗奈城印度大学研究梵文及佛学；1934年，他再次赴该校研究梵文及印度宗教。1928年，徐志摩到印度做客，看望泰戈尔。陶行知于1936年、1938年两次访问印度，为中印文化交流做出过杰出贡献。他在第一次访印时留下了五首反映印度被压迫阶层被压迫人民生活的诗歌。第二次访印期间，陶行知拜访了甘地、泰戈尔等名流，并特别考察了印度的教育。他还应甘地的请求，用英文撰写了《中国的大众教育运动》一文，在印度的《民族旗帜》（HARIJAN）杂志发表。徐悲鸿也曾应泰戈尔邀请，于1939年前往印度国际大学讲学。在印期间，他与画家安庞宁·泰戈尔、南达拉尔·鲍斯、钱达夫人等谈论艺术、欣赏绘画，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完成了《愚公移山》、《群马》、《喜马拉雅山之晨》等作品；他为泰戈尔、甘地、国际大学的学生们和印度民间艺人画像；他还在生汀尼克坦和加尔各答两地举办画展，泰戈尔亲自为画展撰写了序言。此外，因与中国学院有关系而暂居国际大学的中国学者还有张大千、金克木、陈祚龙、糜文开、薛雷等人。

来华讲学和做研究的印度学者主要有拉达克里希南、甘歌

^① 《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878页，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

利、师觉月 (P.C. Bagachi)、蒲罗丹 (Pradhana)、泰无量 (Amita Tagore)、南曼 (Ramana)、福南吉 (Phnanjib) 等人。贝拿勒斯大学副校长、著名哲学家拉达克里希南博士是第一个来华讲学的印度学者。1944 年, 他作为文化使节访问了重庆, 他讲学的主要内容是中国和印度的古代思想和宗教。印度东方艺术学会副会长、美学教授甘歌利于 1945 年应邀来华讲学, 讲述关于印度艺术的知识。师觉月是加尔各答的汉学及佛学教授, 蒲罗丹是乌提卡尔 (Utkal University) 的梵文教授, 他们两人曾在国际大学中国学院工作过, 来华后, 他们在北京大学做研究工作, 并教授印度文化与语言。泰无量是诗哲泰戈尔的侄孙, 原是国际大学中国学院的研究生; 南曼是南印度研究龙树中观哲学的学者, 后来也在国际大学中国学院做研究工作; 福南吉来自西印, 他归国后任职于印度外交部及印度驻华大使馆。他们三人在北京学习中国语言, 在北京大学进行学习与研究。

上述学者和学生为中印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6. 印度的中国学

毫无疑问, 国际大学的中国学院是印度中国学研究的主要基地。在谭云山教授的领导下, 印度、中国、斯里兰卡、泰国和德意志等国的学者和学生撰写了大量关于中国的文章。该学院发行的《中印研究》丛书在世界学术界有很大的影响。

新德里的印度国际文化研究院是印度研究中国学的另一个重要机构, 它由著名学者拉克维拉博士 (Raghurira) 创办并主持, 他的儿子洛克什·钱德拉博士 (Lokesh Chandra) 在其父去逝后主持该院工作。

浦那的费尔古森学院于 30 年代后期成立了一个研究中国学的中心。P·V·巴帕特博士 (P.V. Bapat) 和 V·V·戈卡勒博士 (V.V. Gokhale) 开始从事巴利文、梵文和中文佛教文献的比较研究。

“印度的中国学学者中，最突出的是师觉月”。^① 师觉月本名巴克济，师觉月是他按意译给自己取的中文名字。1918年，加尔各答大学开设中国语言和文学课程，由于在印度没有合适的中文教员，故该校把研究中国学的学者师觉月派到越南、日本和法国学习，使他得到了完善的训练。他的研究成果体现在《中国——印度丛书》的四卷论述中。该书前两卷对汉译印度佛学典籍做了详细介绍，后两卷对唐代中国编纂的供佛教学者使用的两部汉梵字典做了校勘。这部著作作为印度学者研究中国学提供了帮助。师觉月的另一部著作《印度与中国——千年文化关系史》也很著名。该书主要内容是叙述两国历史上的交往，分为八章，分别论述了古代中印的交通、佛教往来、印度佛教文学艺术科学在中国、中印两国文明的比较等问题。此书虽是小册子，但内容翔实，生动有趣，不足之处是书中引征未注明出处。师觉月曾于1947年来华讲学，并负责协助北京大学建立一个研究梵文和印度学的机构。他还是印度政府在北京大学设置的为期两年的印度历史和文化讲座的第一任教授。

拉古维拉致力于中国文学艺术的研究，撰写了一些有关中国诗歌和绘画的专著。洛克什·钱德拉在中国学的研究上也取得了丰硕成果。

拉达克里希南曾写了一本《中国与印度》，这是世界上第一本对印度与中国思想进行比较研究的书。

7. 印度援华医疗队

为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印度国大党于1938年9月派出了援华医疗队。医疗队由马登·莫汉拉尔·爱德尔、姆·尔·卓克尔、德瓦卡纳特·桑塔拉姆·柯棣尼斯、^② 比乔埃·库玛尔·巴苏、

^① 薛克翘：《中国与南亚文化交流志》，第21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② 中文名为柯棣华——作者注。

德贝什·木克吉五位大夫组成。医疗队经香港、广州、长沙、武汉、重庆，克服了国民党当局的阻挠，终于在1939年2月到达了延安。从此，五位大夫开始了忙碌紧张的工作。

医疗队建议将八路军直属医务所扩建成八路军军医院，这项建议很快被采纳了。爱德尔应邀参加了该院的组织工作并给医生上进修课；柯棣华、巴苏分别在该院担任外科医生和五官科外科医生；卓克尔、木克吉被派到八路军卫生学校教学并在其附属医院工作。印度大夫医术高明，工作热情，得到一致好评。1939年年中，卓克尔、木克吉因健康原因先后离开延安返回印度。这年年底，医疗队经过艰苦跋涉到达了山西武乡八路军总部，受到朱德总司令的欢迎。爱德尔因病于次年2月离开八路军返国。柯棣华和巴苏在八路军总部军医院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建立了流动医疗队，亲到前线救治伤员。后来，两位大夫被派到晋察冀边区，接替白求恩大夫的工作。1940年6月，他们到达了河北唐县，在白求恩卫生学校和该校附设的卫生所工作。百团大战第二阶段开始后，他们各带一个巡回医疗队上前线救治伤员。10月中旬，两位大夫回到了卫校，见到了毛泽东主席要他们取道延安回印度的电报，经商量，柯棣华暂留学校，担任外科教员及该校附设的卫生所的外科主任，巴苏则去延安弄明情况。巴苏12月回到了延安，问明情况后，和柯棣华决定留下来继续工作。巴苏被派到延安卫生部附属医院任耳鼻喉科和眼科主任。1941年初，白求恩卫生学校附设的卫生所改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柯棣华被任命为首任院长，同时继续在卫校任教。柯棣华的行政工作做得井井有条，医院在各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他在医术上精益求精，仅在担任院长的两年中就施行手术九百多次。他还特别重视中国医务人员的培养，认真指导学员实习。在这期间，他完成了《外科总论》的写作，并开始编写《外科各论》。由于营养不良、缺少药品以及过度劳累，柯棣华于1942年12月不幸病逝。鉴于印度政治形势的变化，巴苏于1943年5月离开延安，回国参加

战斗。至此，印度医疗队圆满地完成了援华使命。

印度大夫不仅为救治伤员、培训人员做了很多工作，他们还通过各种途径介绍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八路军和边区的战斗生活及援华医疗队在中国的情况，其中，巴苏的工作尤为突出。巴苏曾为印度共产党的刊物《民族阵线》写过多篇通讯，并寄去不少照片，使印度人民更多地了解了中国的实际情况。他在延安参加了朝鲜、泰国、印尼、马来亚、印度、日本的革命者组成的东方民族反法西斯同盟的工作，负责编辑同盟的石印英文刊物《中国报道》。他自己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了《参加八路军百团大战》、《同冀西游击队在一起》、《平西抗日根据地》、《八路军前线医务工作印象记》等八篇通讯。回国后，巴苏利用各种机会向印度人民介绍中国抗日战争的情况和中国人民对印度人民的友好感情。他动员著名作家阿巴斯根据他的日记和口述写了一本反映柯棣华在华生活、工作的著作，书名《还有一个没有回来》，1944年用英文出版，以后又有多种文字的版本问世。巴苏还鼓励、帮助著名电影导演桑塔拉姆摄制了一部反映柯棣华生平事迹的影片，片名《柯棣华大夫不朽的一生》，1945年公映。巴苏的活动促进了印度人民对中国、对印度援华医疗队的了解。

二、中朝文学友谊与交流

20世纪上半期，日本帝国主义日益加紧了对朝鲜和中国的侵略。1905年，日本强迫朝鲜签订了《已巳保护条约》，将朝鲜变为它的保护国；1910年，日本进一步强迫朝鲜签订了《日韩合并条约》，将朝鲜变为它独占的殖民地。接着，日本将它的侵略魔爪伸向中国。1915年，日本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1931年，侵占中国东北，接着成立了伪满洲国；1937年，发动了罪恶的全面侵华战争。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扩张下，朝鲜和中国同处民族危亡的艰难境地，都面临着民族解放斗

争的艰巨任务。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两国人民同仇敌忾，相互支援，彼此支持，在反日斗争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相同的处境、共同的战斗给中朝两国现代文学交流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奠定了坚实的现实基础。两国作家正是在这一基础上进行交流，创作出了大量以反日、抗日为主题的优秀作品，丰富了两国的文学宝库。

在中朝现代文学友谊与交流方面，做出重大贡献的当推我国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鲁迅先生。1919年朝鲜的“三·一”爱国运动被镇压后，一批朝鲜爱国志士流亡到中国，有的进入各级各类学校学习，有的组织各种革命团体进行反日斗争，有的直接参加了中国革命。作为伟大的反帝斗士，鲁迅热情关心朝鲜人民的反日斗争，他多次与在华侨居的朝鲜学者、记者和其他人士接触，了解朝鲜的情况，支持朝鲜人民的事业。在这一时期，鲁迅先后与朝鲜友人李又观、金九经、柳树人等有过交往。

鲁迅在1923年3月18日的日记中写道：“下午李又观君来。”^①李又观是朝鲜学者，同时也是一位积极从事反日斗争的革命者，他于1921年左右来到中国。由于李又观不懂中文，故他用日语同鲁迅交谈。鲁迅从李又观那里了解到许多关于朝鲜的情况。

金九经是另一位与鲁迅有交往的朝鲜友人。金九经也是一位朝鲜学者，他于1925年至1928年在北京大学讲授日本语和朝鲜语，住在未名社。鲁迅在北大任教时与金九经相识。1929年5月15日，鲁迅由上海抵达北京。25日，“往未名社谈至晚”，^②主要是向金九经了解朝鲜的情况。31日，金九经偕同冢本善隆、水野清一、仓石武四郎到鲁迅寓所“观造象拓本”。^③6月2日，

① 《鲁迅日记》，第38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

② 同①，第644页。

③ 同①，第645页。

金九经和水野清一再次拜访了鲁迅。6月3日，鲁迅自北京返程回上海，金九经同李霁野等人前往送行。金九经赠给鲁迅一本日文综合性月刊《改造》，鲁迅自此常阅读《改造》，并与改造社有了联系。

与鲁迅有交往的另一位朝鲜友人是柳树人。柳树人是位历史学家，长期在中国居住，先后在吉林延吉第二中学、南京华中公学、北京朝阳大学读书，曾担任过南京《东南日报》的主编。1925年春，柳树人在时有恒的陪同下拜见了鲁迅。柳树人谈了自己想把《狂人日记》译成朝鲜文的打算，得到了鲁迅的赞同与鼓励。几个月后，柳树人带着译好的《狂人日记》再次拜访鲁迅。鲁迅说：“我不懂朝鲜文，有哪些不清楚的可以问。”^① 1926年，柳树人翻译的《狂人日记》在汉城《东光》杂志上发表。之后，柳树人为翻译《阿Q正传》又“数次会见过鲁迅先生”。^②

申彦俊是拜访过鲁迅的又一位朝鲜友人。他于1923年来到中国，先后在杭州英文专修学校、国立政治大学、东吴大学读书，并于1929年到1936年担任朝鲜《东亚日报》社驻中国的特派记者。申彦俊思想进步，积极地将中国的现实状况介绍给朝鲜人民。1931年至1934年间，他在朝鲜的《东光》、《新东亚》等报刊上先后发表了《受难中的中国》、《受难中的中国全貌》、《蒋介石的法西斯运动》等十余篇通讯报道。申彦俊对鲁迅十分敬仰与钦慕，他“对这位怪人怀有强烈的好奇心，很久以来就渴望见他一面”。^③ 经蔡元培等人的联系，申彦俊终于在1933年5月19日拜访了鲁迅。鲁迅介绍了自己的写作经历，并就小说的创作方法、中国的政治局势、中国知识分子的现状以及世界政治形势、民族解放斗争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申彦俊则向鲁迅介绍了

① 李政文：《鲁迅在朝鲜》，《世界文学》1981年第4期。

② 杨昭全：《现代中朝文学友谊与交流》，《社会科学战线》1988年第2期。

③ 申彦俊：《中国大文豪鲁迅访问记》，《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第7期。

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下的朝鲜形势，尤其谈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同化政策将导致朝鲜文化日本化的问题。最后，鲁迅请申彦俊代向朝鲜文艺界人士致意，并约请朝鲜作家为正在筹办的《中国文坛》杂志撰文介绍朝鲜艺术的历史与现状，同时表示自己也将向朝鲜的《新东亚》投寄稿件。申彦俊在会见鲁迅后，撰写了长篇通讯《鲁迅访问记》，发表于1934年第4号的《新东亚》杂志，这是中朝文学友谊与交流的珍贵史料。

还有一位与鲁迅有交往的朝鲜人士是李陆史。李陆史是记者、诗人、文学家，20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他是在1933年6月20日上海万国殡仪馆杨杏佛的追悼仪式上经人介绍而与鲁迅认识的。从此，他们“成了熟悉而亲近的朋友”。^①1936年10月鲁迅逝世后，李陆史在《朝鲜日报》上发表了一篇《论鲁迅》的长文，介绍了鲁迅的生平、文学活动、思想发展等情况，高度评价了鲁迅的文学成就，是当时少见的研究鲁迅的论文。同年，李陆史出版的作品集《野葡萄》一书收入了他翻译的鲁迅的小说《故乡》。

鲁迅与朝鲜友人的交往，增进了中朝两国文学界的了解与友谊。鲁迅大无畏的战斗精神深受朝鲜人民的尊敬，他那饱含战斗激情的作品更是得到了朝鲜人民的喜爱。由于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朝鲜人民多是通过中文原著接触、了解鲁迅作品的。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同化政策，朝鲜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受到限制，翻译、出版鲁迅的著作是非常困难的。50年代前，译成朝鲜文的鲁迅作品大概只有《狂人日记》、《阿Q正传》和《故乡》。但是从中国大量秘密输入的鲁迅原著使朝鲜人民熟悉了鲁迅和他的作品。仅从统治朝鲜的日本总督府1938年发布的禁书目录中，即可看出鲁迅原著在朝鲜的传播还是相当广泛的。当时

^① 李陆史：《野葡萄》，转引自杨昭全：《现代中朝文学友谊与交流》，《社会科学战线》1988年第2期。

被日本帝国主义禁止出售、阅读的鲁迅作品有：《鲁迅选集》、《鲁迅文集》、《鲁迅遗著》、《现代小说集》（第一辑）（收有鲁迅的短篇小说）、《鲁迅最后遗书》、《中国新文学丛刊书信》（收有鲁迅书信）、《鲁迅散文集》。

鲁迅的作品给朝鲜人民以很大的教育和鼓励，使他们坚定了进行斗争的信心和决心。柳树人回忆说：“我和许多朝鲜青年在1920年初在延吉道立第二中学读书的时候，通过进步教师读到了刊载在《新青年》上的《狂人日记》。最初我们读不懂，读几遍，议论几遍后，激动得我们几乎也要发狂了。那时认识到，鲁迅先生不仅写了中国的狂人，也写了朝鲜的狂人。从那时起鲁迅先生成了我们崇拜的第一位中国人。”^① 鲁迅的小说和杂文引起了朝鲜进步作家的共鸣，他们从中得到启发，反日斗争的意志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并创作出了一批优秀的作品。朝鲜作家韩雪野曾说，他的短篇小说《摸索》、《波涛》等都是从鲁迅的《狂人日记》、《孔乙己》中受到启迪而创作的。^②

现代中朝文学友谊与交流更多的表现在中朝两国的无产阶级作家、诗人和抗日官兵创作的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两国的侵略、反映两国人民抗日斗争生活的作品中。

郭沫若是最早创作这类国际题材文学作品的中国作家。1919年，“绵延了五年的世界大战告了终结，从正月起，在巴黎正开着分赃的和平会议。因而‘山东问题’又闹得甚嚣且尘上来了”。在这样的背景下，郭沫若“借朝鲜为舞台，把排日的感情移到了朝鲜人的心里”，^③ 于是产生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描写朝鲜爱国志士形象的小说《牧羊哀话》。小说通过描写牧羊少女闵佩

① 李政文：《鲁迅在朝鲜》，《世界文学》1981年第4期。

② 韩雪野：《鲁迅与朝鲜文学》，《朝鲜文学》1956年第10期。

③ 郭沫若：《创造十年》，《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二卷），第6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

冀对恋人尹子英的哀思，插叙了正义少年尹子英为救爱国志士闵崇华而英勇牺牲的经过，歌颂了朝鲜爱国志士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爱国热情，揭露了朝鲜贵族势力卖国投敌的可耻行径。作者借第一人称“我”来叙述故事，将“我”的主观感情与客观对象融洽契合，由朝鲜的民族灾难联想到中国的民族灾难，“我”恨不得立即回国，像闵崇华、尹子英那样投入斗争。作者将朝鲜民族的悲剧与青年人的爱情悲剧交织在一起，展示了重大的民族矛盾和社会势力之间的矛盾。

1926年，蒋光慈发表了中篇小说《鸭绿江上》，这是一篇激励中朝两国青年投向革命的力作。小说采用第一人称的写法，由朝鲜学生李孟汉讲述其爱情经历，写出了他对国仇家恨的感慨。李孟汉的父亲与金云姑的父亲都是李朝末期的爱国官吏，他们因不满日帝的侵略而弃官隐居。不久，李父被日本当局杀害，李母亦投海自杀，李本人因受日本宪兵的追捕而被迫流亡苏联。他曾参加苏联红军，后来进入某学院深造。李的未婚妻金云姑在国内积极参加反日独立斗争，不幸被捕，英勇就义。李孟汉得知金云姑牺牲的消息后，决定更英勇地投入斗争，完成烈士遗志。这篇作品“叙述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于朝鲜的压迫，且显示着逃出这种压迫，实行自主的惟一方法——革命”，^①因此感动了许许多多的热血青年，激励他们走上民族解放的道路。

1929年，殷夫创作了诗歌《赠朝鲜女郎》，愤怒地揭露了日本对朝鲜的野蛮统治，表现了诗人对朝鲜人民的深切同情，歌颂了朝鲜人民的独立斗争事业。诗中写道：

女郎，愤怒地跳舞吧，
波浪替你拍着音节，
把你新生的火把燃起吧，

^① 方铭：《蒋光慈研究资料》，第307—308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被压迫者永难休息。

1933年，李辉英发表了长篇小说《万宝山》。作者以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制造的万宝山事件为背景，塑造了中国农民暴动领袖马宝山、朝鲜觉醒农民金福父子和朝鲜革命者李竞平的形象。作品揭示了日本帝国主义是中朝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中朝两国人民只有共同对敌才能赢得民族解放的真理。茅盾曾给这篇小说以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①

1936年，巴金发表了短篇小说《发的故事》。作者写这篇小说“是在纪念一个亡友，同时还对几个活着的友人表示一点感激的敬意”。^②小说以“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地区中朝人民共同的抗日斗争为背景，塑造了一位在中国东北地区进行反日斗争的朝鲜革命战士金某的英雄形象，赞扬了他把自己的青春和精力献给祖国民族解放事业的精神。巴金1940年发表的长篇小说《火》的第一部中也讲到了朝鲜革命者的活动，并以朝鲜志士的英勇战斗和自我牺牲作为结尾。

1936年，舒群创作了短篇小说《没有祖国的孩子》，叙述一个失去祖国的高丽孩子果里在中国东北的一段生活经历，写出了他流亡生活的辛酸悲欢。果里的父亲被日本人杀害，他流亡到中国东北谋生，遭受着生活上的磨难和精神上的痛苦。在无端遭到日本士兵的毒打后，果里终于将一把尖刀插进了那个日本士兵的胸膛。

1939年，力扬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诗作《朝鲜义勇队》，歌颂了为中朝两国的革命事业英勇奋斗的朝鲜战士。1942

^① 茅盾：《九·一八以后的反日文学——三部长篇小说》，《文学》1卷2期，1933年8月。

^② 巴金：《关于〈发的故事〉》，《巴金论创作》，第97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年，艾青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诗篇《悼词——献给反法西斯斗争中殉难的朝鲜烈士们》，表达了中国战友对在中国革命中牺牲的朝鲜战友的深切怀念，也表达了中国战友为中朝两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继续英勇奋斗的决心。此外，穆木天的《献给朝鲜战友们》、静霞的《献给韩国青年》等诗也是这类题材的佳作。

在现代中朝文学交流史上，还应提到的一位作家是无名氏。无名氏在30年代末期担任记者时，结识了一些朝鲜革命志士，他先后采访过著名人士金九经和当时的韩国光复军总司令李青天等人。1940年6月到9月间，无名氏发表了多篇有名的访谈通讯。1941年8月，他来到韩国光复军二支队做宣传工作，与支队长李范奭关系很好。1942年9月，无名氏随李由重庆到了西安。从此，写了《北极风情画》、《骑士的哀怨》、《露西亚之恋》、《荒漠里的人》等一系列以朝鲜抗日志士的斗争和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其中很多是以李范奭为创作模特和生活素材的。无名氏的成名作《北极风情画》即是根据李范奭在托木斯克的一段经历写成的。这部13万字的小说于1943年11月起在西安《华北新闻》上连载，并于1944年出版，成为抗战末期的畅销书。小说讲述了一个浪漫的故事：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朝鲜籍上校参谋林先生随军停驻西伯利亚时，与一位美丽的波兰少女相恋，军队撤退时，少女无法跟随，于是留信自杀，并要求林先生在十年后登山唱一曲《离别歌》。《龙窟》是无名氏1947年出版的一本短篇小说集，内收《奔流》、《抒情》、《红魔》和《龙窟》等六个短篇。《龙窟》主要描写朝鲜皇族李范仪的儿子李箕对朝鲜上层与日本侵略者沆瀣一气的不满与反抗。后来，他参加了“自强体学会”，决定“配合革命”行动，内心里感到充实和兴奋。本集其他小说也多表现朝鲜人民和朝侨的生活和斗争。

除了专业作家、诗人，奋斗在抗日前线的将领、战士也创作了许多以鼓舞中朝两国人民共同杀敌为主题的诗篇、歌谣，如《抗联第一路军歌》、《反日歌》、《民族解放歌》等。其中，东北

抗日联军将领杨靖宇创作的《中朝民族联合抗日歌》脍炙人口，流传很广。这是讨伐日本帝国主义的战斗檄文，是鼓舞中朝两国战士冲锋的号角，更是歌颂中朝人民友谊的赞歌。诗中写道：

全世界上，最大仇敌日帝属头等，
焚烧掠夺，奸淫侮辱，亡国且灭种，
并朝吞中，莫非“田中奏折”的兽行。
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绝不让再久逞。
团结呀，中朝民众！离则亡，团则生！
谨防离间计，携手打冲锋！

聚居在长白山麓、海兰江畔的朝鲜族人民在中朝文学的交流中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李根全的长篇小说《苦难的时代》反映了朝鲜人定居中国东北的历史背景、历史经过以及他们开拓边陲、奋起抗日的生活和斗争，记述了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被誉为形象化的编年史。金长辉的长篇叙事诗《长白山啊，你说吧》，记述了朝汉两族人民组成的抗日游击队的战斗历程，反映了30年代朝鲜族人民的苦难生活及其与反动统治者和日本侵略者进行的斗争，体现了抗日武装斗争和民族团结这两个主题思想。朝鲜族作家创作的以抗日斗争为题材的文学作品还有长篇小说《海兰江啊，你说吧》、《冲破黑暗》，短篇小说《血缘》，叙事诗《山村的母亲》，话剧《继承父志》、《革命家的妻子》、《父亲胜利了》等。

中国作家和将士的这类作品寄寓了他们对朝鲜民族解放事业的精神支援和情感关注。这些作品对当时处在日帝统治下的朝鲜人民尤其是革命青年有着巨大的鼓舞与支持作用。金日成回忆当年在我国东北求学的情况时曾经指出：“特别是革命的书，对激发青年的革命热情有着巨大的作用……我们在中学时代，在阅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的同时，还读了高尔基的《母亲》，以及

《鸭绿江上》、《少年漂泊者》、《阿Q正传》、《祝福》、《铁流》等许多革命小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更清楚地认识了当时社会的腐败状况，更加坚定了投身于革命斗争的决心。”^①一位朝鲜作家在谈到中国进步作家的影响时说道：“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新文学运动，是朝鲜进步作家和艺术家非常关心的，其中人们最熟悉的人，是中国最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中国新文学的创造人鲁迅……当然，从这时候起，朝鲜所知道的中国新文学运动有关的作家不止鲁迅一人。郭沫若、蒋光慈、郑振铎以及其他人的名字大家都知道。”^②

同一时期，朝鲜作家和战友也创作了大量歌颂中朝两国人民友谊、反映他们的生活与斗争、号召他们共同对敌的文学作品。在华侨居的朝鲜人士在这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金泽荣是朝鲜著名诗人，因不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于1905年移居中国，投靠多年前在汉城结识的张謇，并于1912年加入了中国国籍。金泽荣在中国结交了俞樾、屠敬山、梁启超、严复等文化名人，游览了上海、南京、杭州、常州等地，写下了很多诗歌、散文、评论，仅收入《韶沪堂集》的汉诗就有一千多首。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金泽荣欣然写下了《感中国义兵事五首》，其中写道：

武昌城里一声雷，倏忽层阴荡八垓。
三百年间天帝醉，可怜今日始醒来。

1912年，为纪念明朝援朝抗倭战争中牺牲的中国人曹公亭，金泽荣以《曹公亭》为题作诗一首。该诗以明代中朝共同抗倭的

^① 《金日成文选（1968—1979）》，第160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② 韩雪野：《鲁迅与朝鲜文学》，《朝鲜文学》1956年第10期。

胜利，来鼓励两国人民仿效前事，团结起来，共同对敌。诗末写道：

雷鼓鼓动两国气，人间何代无勇忠。

看到帝国主义的军舰在长江上肆意横行，金泽荣愤怒地写道：

况今万国铁轮舰，凭陵来去无徒杠。
诸君哭取我将军，来鼓铁板写我史。

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北伐夭折，革命陷入低潮。金泽荣感到中国革命前途渺茫，朝鲜复国遥遥无期，他悲愤地写道：

龙鼠升沉家国事，吾曹何以际斯辰。
千秋广武英雄叹，阮步兵真是快人。

忧国忧民的金泽荣终因悲愤抑郁于同年自杀。

还有一位移居中国的朝鲜诗人是申圭植。他于1911年移居中国，同年加入同盟会并参加了武昌起义，是惟一一位参加过中国辛亥革命的朝鲜革命者。申圭植与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陈英士等人皆有深厚的交谊。他曾与宋教仁等在上海创办《民权报》，还组织过以团结中朝人民共同反帝为宗旨的新亚同济社。申圭植汉文造诣很深，尤其是汉诗作得很好，他是柳亚子等人创办的南社中惟一的外籍人员，著有汉文诗集《儿目泪》（又名《睨观诗集》）。其中，《赠中山先生》一诗表现了他对中国推翻帝制实现共和的欢欣和对孙中山的敬仰，诗中写道：

荆天棘地一身轻，楚水吴山路不平，
铁血疆场当日愿，数千万口是同声。

陈英士被刺后，申圭植十分悲痛，写下了感人至深的挽联：

吴授卿宋渔父生与同名死与同归壮志未酬留取丹心
照千古

大革命真共和创之维艰久之靡定万方多难空余热血
到黄泉

此联表达了他对中国革命的关注、对挚友的怀念以及对反动势力的憎恨。

在朝鲜国内的朝鲜作家同样创作了许多反映朝鲜人民的抗日生活及中朝人民友谊与共同战斗的优秀作品。

崔曙海 1925 年发表的《出走记》是他的代表作。作者采取第一人称书信体的形式，描绘了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劳动人民背井离乡的悲惨遭遇和他们对黑暗社会的反抗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主人公朴君怀着建设一个理想村的雄心，扶老携幼来到中国东北，在理想破灭后，终于走上了反抗道路。作者通过朴君的形象反映了劳动人民阶级意识的逐步提高，同时，通过他一家的遭遇，真实地反映了朝鲜人民水深火热的生活。

赵明熙 1927 年发表的《洛东江》也是这一题材的优秀作品。小说以 20 年代朝鲜社会为背景，塑造了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者朴成云的形象。朴成云因参加革命活动被捕入狱，出狱后，到中国的东北、上海等地继续参加民族独立运动，并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回国后，他组织农民进行反日斗争，再次被捕，遭到严刑拷打，最后含恨而死。他的未婚妻鲁莎继承他的遗志走上新的征程。

韩雪野 1928 年创作了短篇小说《过渡期》。由于日本帝国主

义的人侵，朝鲜农民被迫流亡中国东北。在那里，他们同样遭到日本警察和中国地主的压迫，最后不得不回到朝鲜，到日本人的工厂里做工。韩雪野的剧本《总工会》描述的是中国武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英勇事迹。剧本揭露了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政府对工人阶级的残酷镇压，歌颂了中国工人英勇不屈的高贵品质。

姜敬爱 1931 年发表的散文《再见吧，间岛》，^① 描绘了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与剥削之下，中国东北的人民无家可归的凄惨景象。1933 年，姜敬爱发表了短篇小说《菜田》，描写了当时中国东北农村经济凋零、农民生活困苦的真实情况，充满了对农民的同情。

和中国战友一样，战斗在朝鲜和中国的广大朝鲜革命战士在血与火的战斗中也创作了许多鼓舞朝中人民斗志的剧本、诗歌和其他文学作品。

《血海之唱》是东北地区朝鲜革命战士集体创作的话剧。该剧讲述了中国母亲宋妈妈和儿子王平为了救护被日军追击的朝鲜侦察员“布谷鸟”而壮烈牺牲的故事。话剧《图们江畔》（后改名为《国境之夜》）是由关内地区的朝鲜战友集体创作的。该剧描写侨居中国东北的一家朝鲜人参加游击队走上抗日革命斗争道路的经历。歌剧《阿里郎》也是关内地区的朝鲜战友创作的。该剧描述一个朝鲜人因国破家亡流亡到中国东北，最终参加抗日部队的经历。话剧《韩国一勇士》是由关内地区的朝鲜战友以真实故事为素材创作的。该剧描述日军中的一个朝鲜翻译英勇机智地营救被日军俘虏的中国抗日游击队队长，最后两人一起奔赴抗日游击队的故事。此外，《朝鲜儿女》、《胡家庄战斗》、《北京之夜》等话剧也都是抗日题材的优秀作品。

朝鲜战友还创作了为数很多的诗歌和歌谣。他们在《起来，无产者大众》中写道：

^① 间岛指中国东北延边地区。

数千万朝中大众，
战斗在前线的同志们！
帝国主义、卖国贼互相勾结，
阴谋进攻革命的苏联。
起来，战斗！抗日的民众，
勇敢地参加战斗！

他们在《战士的武器》中写道：

起来，被压迫的朝中民族，
夺回被抢去的房子和土地，
打碎亡国奴的铁链，
勇敢投入抗日斗争。

诗歌《这正是我们复兴祖国的时候》、《民族解放的先锋队》、《总动员歌》、《革命歌》等也都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号召朝中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战斗。

中朝作家、民众创作的抗日题材作品是民国时期中朝文学交流的主流。此外，中国古典文学和汉字对朝鲜文坛影响的继续存在也是这一时期中朝文学交流的一个组成部分。

近代以来，随着世界经济、政治的巨大变化，朝鲜文学界逐渐将目光从中国转向了西方。1895年，李朝政府开始推行“甲午更张”的改革措施，这更使越来越多的朝鲜人摈弃了使用已久的汉文，杜甫的诗、苏东坡的散文、吴承恩的小说等中国古典文学佳作不再流行。曾经是朝鲜文学形影不离的亲密伙伴的中国古典文学在朝鲜的影响渐趋弱化，朝鲜的汉文文学进入了尾声。尽管中国的古典文学和汉字在朝鲜不再风光依旧，但它们毕竟曾经长期地作用于这方土地。因此，在朝鲜现代文学中不难寻觅它们

的踪迹。

这一时期，仍有一些文人有着很深的汉文造诣，他们习惯用汉文写诗作文，留下了不少优秀作品。金泽荣、金素月、金允植、尹喜求、郑万朝等即是这类人的代表。

诗人金素月的代表作《招魂》显然借鉴了屈原《招魂》的写法，诗中写道：

片片碎裂的名字，
 烟消云散的名字，
 我呼唤着，却无人应声的名字呵！
 这名字呵——我将在不停的呼唤中死去！

为死去的亲人招魂，是中国和朝鲜都有的民间风俗。屈原为他所忠实的楚怀王作《招魂》，“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以此召唤客死他乡的楚怀王魂归故国，表达了他强烈的爱国感情。金素月为他饱受苦难的祖国作《招魂》，情真意切，感人肺腑，爱国之情跃然纸上。

金素月在《无题》一诗中这样抒发亡国的悲伤之情：

国家已经灭亡，
 山川依然那么青苍。
 一年一度的春天又来了，
 只有草木又披上绿装。
 啊！无限忧伤，
 难道这就是春光？！

这与杜甫的《春望》是何等的相似！

作家崔曙海的小说《梅月》通过叙述李朝时期一个贵族子弟对其丫鬟梅月的威逼，歌颂了梅月宁死不屈的高尚情操。小说写

到梅月想起《三国演义》中关云长义释曹操，终于决定以“义”为重，不辜负主母对自己的恩遇，以一死来保清白。小说中多处可见中国古典文学、民间文学、神话传说的影响。

作家洪命焘的长篇历史小说《林巨正》被誉为朝鲜的《水浒传》。小说讲述了李朝时期林巨正率领农民起义军劫富济贫、惩治贪官污吏的故事。小说中的青石沟好似梁山泊，林巨正好似宋江。作者以古讽今，表达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思想。从中不难看出作者深受《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影响。

可见，中国古典文学在现代虽不能像往昔那样对朝鲜文坛施以独一无二的强大影响，但它的遗风余韵仍给朝鲜现代文学添上了绚丽的一笔。

民国时期，中国还翻译出版了一些朝鲜文学作品。主要有：童话《朝鲜童话》、《朝鲜现代儿童故事集》、《朝鲜现代童话集》、《黑白记》；民间故事《朝鲜传说》、《朝鲜民间故事》；历代诗文集《韩国文苑》；散文集《朝鲜春》；短篇小说集《朝鲜短篇小说选》等。这一时期翻译出版的朝鲜文学作品，虽然种类和数量不算太多，但很多书籍曾一版再版，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这些翻译作品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宝库，使中国读者领略到了异国文学的风采，在中朝文学交流史上有着自己独特的地位。邵霖生、范泉等编译者在这一过程中做出了很大贡献。

纵观民国时期的中朝文学交流，虽然中国古典文学对朝鲜文坛的影响不及以往，两国对对方文学作品的翻译也不是很多，但是相同的处境与经历赋予两国的文学交流以新的内容，两国的文学作品因此有着共同的主题与基调。两国的作家与民众扎根生活，创作出大量优秀作品，成为近代中朝文学交流的主流，在历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三、中国与东南亚的文化交流

1. 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在东南亚

中国与东南亚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中国的古典小说在东南亚备受青睐。据颜保庆先生研究，从1905年到1968年的63年间，越南翻译出版的中国通俗小说多达316种，这个数字恐怕仅次于日本翻译出版的中国通俗小说的数目。据不完全统计，在1889—1950年间，在马来语世界内大约一共出版了中国历史文学作品70部。^①《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等古典文学名著及武侠小说在东南亚很受欢迎。从1910年到1944年，越南出版的三国故事剧本即有21种之多。^②在泰国，《三国演义》的译本也受到了各阶层人民的喜爱。国王将其列为王室成员和军事将领的必备书籍，各级学校将其中的精彩选段作为历史教材和写作范文，泰国文学会在1914年将其评为优秀小说。在《三国演义》译文文体的影响下，泰国文坛出现了一种新的文体——《三国》文体。这种新文体深受读者和作家的喜爱，在40年代前的文坛上非常流行。泰国著名作家、评论家、皇家图书馆馆长丹隆·拉查努帕亲王曾这样评价《三国演义》：“泰国人喜爱《三国》。达官贵人爱读《三国》书，黎民百姓爱看《三国》戏……它使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获益匪浅，并使之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境地。”^③《聊斋志异》也深受赞赏，越南译者阮克孝在

^① 林水壕、骆静山：《马来西亚华人史》，第183页，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1984年版。

^② 王丽娜：《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第46—48页，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

^③ 王介南：《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志》，第23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聊斋志异》的译本序言中写道：“《聊斋》一书，可与阮攸先生的名著《金元翘传》相媲美。《金元翘传》中的许多情节，内容毫无重复，《聊斋》中的许多故事也都不相雷同。蒲松龄的知识渊博，文笔精练流畅，运用典故自然恰切，因而他的作品非常引人入胜，令人爱不释卷。”^① 在越南、泰国，中国古典文学的翻译主要是由本国文学家承担的；在马来亚、印度尼西亚，这一工作则主要是由土生华人进行的。总之，历史、神怪、武侠、公案、传奇、艳情等各类中国文学作品的流传，促进了中国与东南亚的文化交流，加强了东南亚人民对中国历史、文化、社会的了解。

2. 东南亚华侨华人与文化交流

“中国和东南亚文化的交流的担当者非华侨莫属”^②，他们创办报纸，兴办教育，翻译、创作文学作品，为中国与东南亚的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

20 世纪上半期，华侨在东南亚各地及国内办了大量的报纸，构成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阵地。据上海报学杂志社调查，20 年代，华侨在东南亚各地办的主要报纸情况如下：^③

20 世纪 20 年代东南亚的华侨报纸

地 点	报刊名称	编 辑
棉 兰	南洋日报	陈劲倪 汪馥泉
	苏门答腊民报	陈怒涛 谭孟衍

① 王丽娜：《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第 235 页。

② 朱杰勤：《东南亚华侨史》，第 32 页，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0 年版。

③ 据黄天鹏《中国新闻事业》第 264—265 页编制，《民国丛书》第三编（41），上海书店 1991 年影印版。

地 点	报刊名称	编 辑
巴达维亚	天声日报	萧一华 陈耀
	新报	谢佐禹 林云谷
	工商日报	司徒赞
	全民日报	戚修祺
泗 水	泗滨新报	未详
	大公商报	未详
三 宝 瓏	中南日报	陈韵皋
孟 加 錫	錫江商报	黎觉公
新 加 坡	叻报	李焕新张群方
	总汇新报	梁显凡
	新国民日报	张叔耐
	南洋商报	张相时
檳 榔 嶼	檳城新报	汤日坦
	光华日报	吴萍望
	南洋日报	林浪沅
吉 隆 坡	益群报	李海若
	中华商报	未详
仰 光	觉民日报	陈恩仙
	仰光日报	孙中山(兼)
	缅甸新报	杨元通
马 尼 拉	民号报	李健者
	新闻日报	汤开瑜
	公理报	未详
南圻堤岸	华侨日报	陈肇琪
盘 谷	励青日报	郑舞飞
	联侨报	孙中山(兼)
	国民日报	魏天育
	中华民报	刘锡如
	华暹日报	未详
马 来 亚	群益报	未详

在众多的办报人中，胡文虎是影响最大的一位。1929年，

胡文虎在新加坡创办《星洲日报》，开始了他的办报事业。之后，《星华日报》1931年在汕头创刊，《星光日报》1935年在厦门创刊，《星中晚报》1935年在新加坡创刊，《星岛日报》1938年在香港创刊，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星报》在马来亚创刊，但是，缅甸的《星仰日报》及印度尼西亚的《星巴日报》却因战争的爆发半途而废。战后，胡文虎在恢复以前创办的报纸的同时，继续创办新的报纸。《星洲日报》、《星沪日报》先后在福州、上海问世。1949年，英文《虎报》（TIGER STANDARD）在香港创刊。1950年，《星暹日报》在泰国创刊，新加坡开始发行英文《虎报》的增刊。至此，华侨界独一无二的报业托拉斯星系报业最终形成。其中《星洲日报》（1929—1983年）存在时间最长，影响也最大。这份报纸比较重视南洋问题的研究，1937年开辟了《南洋经济》、《南洋史地》、《南洋文化》、《南洋问题》等副刊，1939年出版了《南洋年鉴》、《星洲十年》，为研究东南亚提供了宝贵资料。东南亚另一份时间长、影响大的华文报刊当数陈嘉庚创办的《南洋商报》（1923—1983年）。《南洋商报》初创时，只是一份报道商业动态及南洋、中国等地消息的商业性报纸。抗战爆发后，《南洋商报》在业务上做了很大改进，积极宣传抗日救国，及时报道抗日动态，实际上成为陈嘉庚领导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的喉舌。1940年，胡愈之从中国来到新加坡，受《南洋商报》之聘为编辑主任。之后，刘尊棋、张企程、蔡馥生也相继来到新加坡，加入到《南洋商报》的编辑部。由于他们的加入，《南洋商报》成为东南亚华侨观察社会、了解祖国的一个重要渠道，并一度成为南洋销路最好的侨报。总之，以《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为代表的东南亚华侨报纸在团结华侨、宣传抗日、宣扬中华文化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是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渠道。

东南亚华侨历来重视文化教育。他们在侨居地捐资兴学，创办华文学校，以灌输中国民族主义和中华传统文化为主旨。东南

亚各地华侨所办华校情形如下表：^①

20 世纪上半期东南亚的华文学校

国家	年份	华校数	教员数	学生数
印度尼西亚	1919	250	600	15948
	1926	507	1092	32668
	1930	未详	未详	38274
菲律宾	1930	80	268	7373
越南	1929	112	未详	9600
马来亚	1929	696	未详	43961
缅甸	1930	208	未详	13282
暹罗	1930	237	未详	15000 余人

东南亚华侨不仅在侨居地办学，他们中的很多还回国办学，力图提高家乡人民的文化素质。以厦门和汕头为例，可以看出华侨在侨乡教育事业中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厦门，共有 39 所小学，其中与华侨有直接关系的多达 17 所，每年直接获得华侨经济援助的有 11 所，获得华侨捐助的建筑费的也有 11 所；在 11 所中学中，与华侨有直接关系的多达 5 所，每年直接获得华侨经济援助的有 2 所；至于福建最早的大学厦门大学，则是由陈嘉庚独资创立的，以后不断得到华侨的捐助。在汕头，29 所小学中，与华侨直接发生关系的有 4 所，获得华侨特种捐助的有 2 所，获得华侨经常性捐款的有 2 所；10 所中学中，与华侨直接发生关系的也有 4 所；获得华侨特别性捐款的有 3 所，获得华侨经常性捐款的有 4 所。^②

^① 据丘守愚《二十世纪之南洋》编制，《民国丛书》第三编（72），上海书店 1991 年影印版。

^② 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民国丛书》第二编（26），第 232—235 页，上海书店 1990 年影印版。

在捐资兴学的华侨中，被毛泽东喻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陈嘉庚是当之无愧的代表人物。在侨居地，陈嘉庚创办及参与创办了道南学校、爱同学校、南洋华侨中学等华校。在中国，陈嘉庚致力于集美学村和厦门大学的建设。从1913年创办集美小学开始，经过十几年的建设，到1927年，陈嘉庚终于把偏僻的集美建设成包括男子小学、女子小学、男子师范等10个学校的中外闻名的“学村”。1921年创办的厦门大学亦倾注了陈嘉庚的大量心血。厦门大学是福建省当时惟一的一所大学，它的创办不仅极大地推动了福建教育事业的发展，而且还是继暨南大学之后，招收国外华侨子弟回国接受文化及科学知识的高等学府。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到1936年，厦门大学已由初创时的师范和商学两部扩充到文、理、法商三个学院九个系，成为当时国内科系最多的五所大学之一和最早招收女生的七所大学之一。陈嘉庚几乎捐献了他的全部财产兴办教育，他一生所捐献的教育经费在一千万元（新加坡币）以上，相当于他的全部不动产。陈嘉庚倾资兴学，还得到了广大华侨的支持，李光前、陈六使、黄奕住等人也都曾对陈嘉庚的兴学事业慷慨相助。东南亚华侨在侨居地和祖国捐资兴学的举动，推动了两地文化事业的发展。

东南亚的华人作家翻译、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印尼的华人作家在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近百年的时间内，共创作和翻译了三千余部作品。其中，翻译中国作品759部，西方作品233部。^①据不完全统计，1889年到1950年间，马来语世界大约出版了中国文学作品70部。^②方修编的《马华新文学大系》收集了1919年至1942年的华文文学作品，计10卷400万字。可见，东南亚是20世纪上半期以前海外华文文学的主要阵地。

东南亚华人，尤其是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土生华人，利

① 巫乐华：《南洋华侨史话》，第141—142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② 林水豪、骆静山：《马来西亚华人史》，第183页。

用语言优势，将很多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成了侨居地语言。《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等古典小说，《东周列国志》、《精忠岳传》、《三宝太监下西洋》、《杨家将》等历史小说，《西厢记》、《梁山伯与祝英台》等爱情小说，《风流女侠》、《少林女侠》、《火烧红莲寺》等武侠小说，《封神演义》、《聊斋志异》等神怪小说，《包公案》、《施公案》等公案小说等大量的中国文学作品被译成马来语、爪哇语、望加语、锡语等东南亚语言出版。这些中国小说不仅受到了不懂汉语的土生华人的喜爱，而且深受东南亚各国人民的欢迎。华人的翻译活动宣扬了中国文化，促进了中国与东南亚的文化交流。

以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为界，在此之前，海外华文文学以旧体诗词和文言小说为主；在此之后，以白话文为载体的新文学作品渐成主流。东南亚的华文文学是海外华人文学的主流，东南亚华文文学的主要代表则是新加坡、马来亚的华文文学。抗日战争和援抗运动使马华新文学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的时期：“随着一九三七年抗战文艺运动的勃兴，马华小说创作又呈现了新兴文学时期的盛况，人才济济，佳作纷披”；^①“戏剧文学产品却是空前的繁盛，大大地充实了马华戏剧部门的创作成绩，而且与舞台演出密切配合，发挥了最大的艺术教育效能，成为当时的文艺工作的最突出的一环”；^②“这时期的马华诗坛空前热闹，优秀作者特多”；^③“马华新文学繁盛期是马华散文全面成熟的时期，记事、抒情、说理……各种体裁都在这时候充分的发展”。^④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反映马华社会救亡运动的情况，一是描写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在

① 方修：《马华新文学大系（四）：小说二集》导言，第18页，星洲世界书局1971年版。

② 方修：《马华新文学大系（五）：戏剧集》导言，第13页。

③ 方修：《马华新文学大系（六）：诗集》导言，第18页。

④ 方修：《马华新文学大系（七）：散文集》导言，第15页。

这一时期，文艺工作者认识到必须结合当地的具体情形，来推动抗战文艺的工作，因此他们开展了“南洋文艺运动”、“南洋通俗文学运动”、“马华文化运动”等文学运动。这些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南洋色彩、群众路线、大众文学等，突出特点在于强调抗战文艺的创作“应写些与南洋侨众生活有关的事情”，强调“作品必须深入大众，在他们的生活中，能替他们解决问题”。^①此外，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的华文文学也取得了一定成就。

辜鸿铭、伍连德、林可胜等出生在南洋、留学在西洋、工作在中国的华侨人士对文化交流做出了特殊贡献。学贯中西的辜鸿铭（1857—1928年）出生在马来亚，早年留学欧洲，先后获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莱比锡大学土木工程科文凭，精通英、德、法、拉丁、希腊等九种语言；后因景仰中华文化，故潜心研读中国经史典籍。他曾任上海南洋中学校长，曾在北京大学讲授英国诗歌及希腊文等课程，曾为北京的英文报纸《京报》（Peking Gazette）和《北京每日新闻》（Peking Daily News）写专稿，还曾应日本大东文化协会邀请几次东渡日本讲学。辜鸿铭的中英文著作主要有《张文襄幕府纪闻》、《中国牛津运动故事》、《春秋大义》、《读易草堂文集》等；他的英译作品有《中庸》、《论语》、《大学》；汉译作品有《痴汉骑马歌》。辜鸿铭不遗余力地弘扬中国数千年的传统文化、道德观念及人生哲学。他的许多著作被译成了德、法、日等多种文字，在西方世界拥有广泛读者。通过他的著作，西方人较好地了解了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德国汉学家卫礼贤（R. Wilhelm）将辜鸿铭的英文著作《中国牛津运动故事》译成德文，书名改为《为中国反对欧洲观念而辩护：批判论文》，哥廷根大学的新康德派特别推崇此书，将之列为该大学哲学系师生必读的参考书。德国文化界甚至有人认为真正能代表东方文化的人只有两个，一个是泰戈尔，一个是辜鸿

^① 方修：《马华新文学大系（二）：理论批评二集》导言，第1页。

铭。可见，在西方，辜鸿铭有着比在中国更高的知名度。他是近代中国惟一在西方世界尤其是德国发生过相当影响的人，也是近代惟一被正式邀请到日本长期讲学的中国学人。

伍连德（1879—1960年）是饮誉世界医学界的防疫科学权威。他出生于马来亚，在欧洲度过了七年留学生活，先后获得剑桥大学医学学士、医学博士学位。1907年，他回到中国，被委任为天津帝国陆军军医学堂的副监督，负责军医培训工作。从这时起，他连续在中国医药卫生界服务了30个年头，直到抗战爆发返回马来亚。1910年底，哈尔滨发生了严重瘟疫，这种俗称黑死病的疫症迅速蔓延，危及整个东北。伍连德在其助手们的协助下，用了不到四个月的功夫，扑灭了这场震惊世界的传染病。1911年4月，伍连德在奉天（今沈阳）主持召开了有英、美、日等11国专家出席的万国防疫会议，这是我国召开的第一次国际性科学会议。同年8月，他代表中国出席在伦敦召开的国际医学大会，发表了学术论文《蒙古鼠（即山拨鼠）与瘟疫的关系之考察》。这年年底，他出席了在海牙召开的第二届麻醉药会议。1914年5月，伍连德与颜福庆等人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华医学会，自任秘书，并负责《中华医学杂志》的编辑事务，于第二年被推选为会长，连任两期（1916—1920年），为促进中国现代医学的发展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1930年，伍连德被委任为全国检疫事务所监督，接收原由海关办理的检疫工作，并先后主持兴办了哈尔滨医院及其防疫医院、奉天东北陆军医院、齐齐哈尔人民医院、北京中央医院及为全国检疫事务所建立的各个医院等医院。因致力于医学研究工作，伍连德先后被上海圣约翰大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香港大学等单位授予名誉博士学位，并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苏联微生物协会外籍会员等。

林可胜（1897—1969年）是闻名国际的生理学家。他出生于新加坡，在英国接受教育，先后获得爱丁堡大学医学内科学士、外科学士、哲学博士与科学博士学位。1925年，林可胜应聘回

国担任北京协和医学院生理学系教授兼系主任，成为该学院的第一位华人教授。1935年到1937年间，他是协和医学院三人领导小组成员，执行院长职务。在协和工作的12年中（1925—1937年），林可胜刻苦钻研、锐意创新。他在教学、研究之余，殚心著述，在英美各国生理学刊物上发表了不少学术论文。他还培养了大批医生和生理学工作者，包括青年教师、研究生和进修生，冯德培、柳安昌、吕运朋等著名专家学者都是经他培养出的。1926年，林可胜创建了“中国生理学会”，第二年创办《中国生理学杂志》并任主编。该杂志获得了国际生理学界的称道，成为我国具有国际水平的少数科学刊物之一。中国生理学会和《中国生理学杂志》在促进学术交流、推动我国生理学的发展和培养我国的生理学人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28年到1930年，林可胜被选任为中华医学会会长。30年代初，在我国生理学的初创时期，林可胜无私地向全国伸出援助之手，特别是对北京的几乎每一所大专院校的生物系以及医学院都给予了帮助，或代为培训生理学教师，或派人前去讲课。抗战胜利后，林可胜出任国防医学院院长，创建军医中心教育制度，筹建中央研究院医学研究所。1948年，当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

3. 郁达夫、胡愈之等文化界人士在东南亚

民国时期，郁达夫、胡愈之、杨骚等文化界进步人士相继从祖国来到东南亚，从事新闻、创作，为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

郁达夫于1938年底赴新加坡，应《星洲日报》之聘，任《星洲日报》副刊《星洲日报半月刊》的主编。此外，他还负责《星洲日报》的纯文艺副刊《晨星》和《文艺周刊》以及《星洲日报》的晚报《繁星》。《星洲日报半月刊》的《星洲文艺》专栏和《星光急报》的文艺专栏也是由他负责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郁达夫流亡苏门答腊，于1945年9月惨遭日本特务杀害。在新加坡，郁达夫写的政论、诗词、书评、散文等多达一万多

篇，给当地留下了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他撰文介绍徐悲鸿、张斯仁、刘海粟、杨骚等文化界著名人士，使当地人民更多地认识了中国文化界；他在自己负责的报刊上经常发表中国名家的作品，使当地人民更多地了解了中国文学；他积极选取好作品，热心鼓励新作者，发现重用了大批新人……郁达夫在新加坡的三年，对新马文化界、文学及社会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有力地沟通了中国与东南亚两地的文化。

胡愈之于1940年底抵新加坡，应《南洋商报》之聘任编辑主任。胡愈之与香港新闻界、文化界有较密切的联系，又得到“国际新闻社”的全力支援，因此，与海外其他报纸相比，《南洋商报》关于中国的消息较多、较快。自1941年起，胡愈之承担了几乎一天一篇的社论的写作，并为星期刊写较长的专论，为晚报写简短的时评。太平洋战争期间，胡愈之等人在苏门答腊度过了三年零八个月的艰难生活，期间，他学会了印尼语，写了专著《印度尼西亚语言研究》和中篇童话《少年航空兵》。战后，胡愈之等人返抵新加坡。1945年底，胡愈之主编出版的《风下》周刊问世，这是一本综合性的刊物，内容包括时评、文学、哲学、科学、音乐、美术、人物等。流亡南洋的杨骚、巴人、汪金丁、卢新远等人都是《风下》的作者及记者；国内的郭沫若、茅盾、陶行知、何其芳等人也常将文稿寄往《风下》；许多当地青年也向《风下》投寄作品。《风下》周刊为解除战后华侨青年失学的痛苦，还办起了“自学辅导社”，由胡愈之亲任社长。《风下》受到了广大华侨的拥戴。1946年11月，由胡愈之任社长的《南侨日报》面世，这是一份以促进和平与民主为宗旨的进步报刊。《南侨日报》的社论涉及中国问题、国际问题、新马问题、华侨问题等，其中绝大部分出自胡愈之之手。胡愈之的社论，在掌握大量资料的基础上进行调查研究，深刻地分析国际国内形势，以说理透彻、深入浅出赢得读者的厚爱。

除郁达夫、胡愈之外，杨骚、巴人、汪金丁、卢心远、陈仲

达、沈兹九、张企程、吴柳斯等流亡在南洋的文化界人士，也为中国与东南亚的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

4. 20 世纪上半期的东南亚研究

在关于海外华侨的研究中，华侨历史悠久、人数众多的东南亚自然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1928年，中国第一所华侨高等学府上海暨南大学设立了研究东南亚的第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学术研究机构——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该部出版期刊《南洋研究》11卷61期；在一个短时期内出版过期刊《南洋情报》；还曾出版过《南洋丛书》32种。这些出版物以华侨历史为重点课题，刊载了一系列华侨史方面的论著与译著。该部聚集了刘士木、李长傅、姚南、苏乾英等人，他们出版了一批很有分量的开拓性著作。刘士木是该部第一任主任，他的主要著作有《南洋华侨教育论文集》（与钱鹤合编）、《南洋荷属群岛之教育》、《华侨概观》等。李长傅是《南洋研究》的主编，他著有《南洋史纲要》、《南洋华侨史》、《菲律宾史》等。

1940年，旅居新加坡的热心东南亚研究的华侨知识分子姚南、许云樵、刘士木、李长傅、郁达夫等人共同发起创办了“中国南洋学会”。会上通过了会章，选举姚南为常务理事，刘士木、李长傅、关楚璞、张礼千、郁达夫、许云樵六人为理事，第一批会员共有19人。许云樵被推举为会刊《南洋学报》的主编。南洋学会是我国学者成立的最早的研究东南亚问题的学术团体，该会以研究南洋学术文化为宗旨，对培养东南亚史及华侨华人史的研究人员，深化中国南洋学的研究与交流，起了良好的作用。该学会的成立，表明中国的东南亚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南洋学会会员著译颇丰，成果最多的，当推学报主编许云樵。他主编学报长达18年，自己撰写的中英文论文多达六十多篇。他勤于著述，50年代前出版的主要有《暹罗王郑昭传》（译注）、《古代

南洋史地丛考》(与姚南合著)、《新加坡风土志》(校注)、《佛罗利氏航海记》(译注)、《北大年史》、《新加坡工商业全貌》(与许直合著)等。由于在南洋学研究上取得的成就,许云樵被人们尊称为该学科的“泰斗”、“一代宗师”。

此外,在南洋学方面较有影响的著作还有:温雄飞的《南洋华侨通史》、张相时的《华侨中心之南洋》、刘继宣和来世澄的《中华民族拓植南洋史》、陈达的《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等。

可见,在民国时期,中国的南洋学已初具规模,后来的南洋学方面的专家在这时已崭露头角,初试锋芒,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四、中国与阿拉伯的文学交流

民国时期中阿文学的交流集中体现在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的翻译及研究工作上。这部深受世界各国人民喜爱的作品自然也引起了中国文学家的注意。20世纪上半期,在中国出现了为数众多的《一千零一夜》的节译本与选译本。

民国前出现了几种文言译本。1900年,上海清华书局出版了周桂笙的《新庵谐铎》,该书上册收录了从英文《一千零一夜》翻译过来的一些故事,这大概是我国出现的最早的《一千零一夜》的译本了。1903年,钱楷重从史谷德的英译本选译了《辛伯达航海故事》,并改名《海上述奇》出版。1904年,周作人从英文译出了《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的故事》,改名为《侠女奴》,刊于苏州《女子世界》,后来,由上海女子世界社出版了单行本。1903—1906年,上海的《绣像小说》上登载了一些选译的故事。1906年,奚若自莱恩(A.L.Lane)的英文本《Arabian Nights》译出了述异小说《天方夜谭》,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共4册,收有50个故事。奚若的译本受到了读者的欢迎,以后在1914年、1924年、1930年、1932年、1935年、1939年、1947年多次

再版，并于1924年被定为“中学国语文科补充读本”，是《新中学文库》中的一种。

1925年，中华书局出版了黄弁群、吴太玄据《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编写的《秘密洞》。1928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杞瞻生、天笑生据莱恩的英文本翻译的语体本《天方夜谈》，该书收有《一千零一夜》、《记渔父》、《异马记》等13篇故事。1930年，汪原放也据莱恩的英文本翻译出版了白话本《一千零一夜》，收有20个故事，并使用了书的原名《一千零一夜》，由亚东图书馆出版。

1931年，陈逸飞、酆昭蕙自英文合译了《天方千夜奇谈》，内收故事11篇，北平敬文书社出版。同年，上海三民图书公司出版了汉英对照的《天方夜谭》。1933年，有澎兆良的译述本和姚杏初的译注本出版。1935年，陈旭轮译的《能言鸟》由世界书局出版。1936年，启明书局出版了方正译的《天方夜谭》。30年代后期，世界书局推出了《阿拉伯故事丛书》。该丛书是马兴周从埃及高米尔原著翻译的，共有《桑鼎拜德航海遇险记》、《哈漪雅格赞》、《阿里伦丁》（又名《神灯记》）、《有志的公主》、《巴格达的商人》、《安特拉·筛多德》、《奇异的国王》、《阿里巴巴》、《伊本几雅的宝剑》、《伊本白图塔游记》等10种。

1940年到1941年间，回族译者纳训译自阿拉伯原文的《一千零一夜》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由于得不到各方支持，只出版了五册。^①1948年，范泉据巴登（R. F. Burtor）的英文本编写了少儿版《天方夜谭》，收入三篇故事，由上海永祥译书馆出版。1948年新潮出版社推出了《天方夜谭》的分辑本，包括译自巴登英文本的《脚夫艳行记》（原名《巴格达德的脚夫和三个女人的故事》）和译自莱恩英文本的《神灯》。

由以上众多的译本可见我国翻译工作者对《一千零一夜》的

^① 纳训的六卷全译本终于在80年代初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厚爱，正是有了他们的辛勤劳动，这部闻名世界的伟大作品才被我国人民所熟悉。但是，这一时期并未将《一千零一夜》全部译出，没有推出全译本。而且，由于语言的限制，只有马兴周、纳训是从阿拉伯原文翻译的，其他译者只能从英文等西方文字转译。不管怎样，正是由于他们的翻译，才使得这部民间文学作品在中国广为流传，许多精彩篇章成为家喻户晓的故事。

这一时期，只有奚若、叶绍钧、郑振铎等少数人对《一千零一夜》做过一些研究。

奚若《天方夜谭》的译序可以说是我国早期研究《一千零一夜》的精粹之作，该文介绍了欧洲研究者关于此书起源问题的主要观点及欧洲流传的各译本的优劣。

奚若译本作为中学国语文科补充读本在1924年出版时，增加了叶绍钧的校注和长篇白话体新序。这篇序文讲述了故事的来源、成书过程及成书时间，各故事的连接次序和主要内容，此文可以说是民国时期我国研究《一千零一夜》的佳作。叶绍钧对《一千零一夜》非常欣赏，他这样评价：“虽然全集是一个大故事，但是我们若截头去尾，单单取中间包蕴着的最小的一个故事来看，也觉得完整妙美，足以满意；这譬如一池澄净的水，酌取一勺，一样会尝到美甘的滋味。”^①

鲁迅曾关心过《一千零一夜》和阿拉伯文学。“在事实上，我曾经见过苏联的 Academia 新译新印的阿刺伯的《一千零一夜》”。^② 鲁迅还谈道：“所以一样的没有打过中国的国度的文学，如希腊的史诗，印度的寓言，亚刺伯的《天方夜谈》，西班牙的《堂·吉珂德》，纵使在别国‘已经闻名’，不下于‘英、美、法、德文人’的作品，在中国却被忘记了，他们或则国度已灭，或则

① 叶绍钧：《天方夜谭·序》，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

② 鲁迅：《准风月谈后记》，《鲁迅全集》第五卷，第296页。

无能、再也用不着‘媚’字。”^①可见，鲁迅对当时文学界重视英、美、法、德文学，忽视印度、阿拉伯等国文学的状况，深为愤慨。

郑振铎没有忽视阿拉伯等国的文学，他的《文学大纲》有两章讲到了阿拉伯文学。第五章《东方的圣经》讲到了回教及其圣书《可兰经》(The Koran)。第十六章《中世纪的印度与阿拉伯》讲了关于阿拉伯的几个问题：回教未发生之前的诗人伊摩鲁、泰拉法、阿摩尔、赫里士、安泰拉、萨赫尔、拉比特、那比加、阿莎、阿尔卡马等及其代表作；乌麦耶特朝(661—750年)的诗人阿克泰尔、法拉兹达、加劳尔等及其代表作；阿巴西特朝(749—1258年)的宫廷诗人莫底、阿皮诺瓦士、阿皮阿泰希耶、摩泰那皮、麦亚里等及其代表作；蒙古人人侵到中世纪末的“惟一光荣者”《一千零一夜》及这一时期的另一大故事书《安泰尔的传奇》。郑振铎高度评价《一千零一夜》“为这时的惟一光荣者乃为《一千零一夜》；这部绝大绝有趣味的故事书，在世界的名望，比之《可兰经》尤为伟大，更不必说别的作品了。有许多的人，不晓得一点阿刺伯的别的东西的，却都知道《天方夜谭》——《一千零一夜》之别名——全全世界的小孩子，凡是有读故事及童话的幸福，无不知《一千零一夜》中之许多有趣的故事；这部书已成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而非阿刺伯之所独有的了”。^②郑振铎对《一千零一夜》做了相当的研究，他考察了这一民间故事集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波斯、报达(巴格达)、开罗，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即该故事集是吸收了无数的东方民间故事而成的。

^① 鲁迅：《“题未定”草(三)》，《鲁迅全集》第六卷，第356页。

^② 郑振铎：《文学大纲》，第810页。

五、中加文化交流

1. 教会的“社会福音”传教事业

19世纪80年代末期，加拿大基督教会开始有组织地派遣传教士来华传教。1872年，长老会传教士乔治·莱斯利·麦凯（Rev. George Leslie Mackay，汉名马偕）开辟了台湾北部教区，在淡水建立起传教总站，这是加拿大传教士在中国开辟的第一块传教基地。1888年，长老会传教士高费斯（Rev. Jonathan Goforth，汉名占约翰）开辟了豫北教区，在彰德、卫辉、怀庆等地建立起传教总站，这是加拿大长老会投入人力、物力、财力最多的一个传教基地。1920年，长老会传教士威廉·麦凯（William Mackay，汉名祁威林）开辟了华南教区，在江门、广州、石岐等地建立起传教总站。1892年，卫理公会传教士哈特博士（Rev. V. C. Hart, D.D）开辟了华西教区，在成都、嘉定、莱县等地建立起传教总站，这是加拿大对华传教规模最大的一个基地。1909年，威廉·查理斯·怀特（William Charles White，汉名怀履光）开辟了河南教区，在开封、商丘、郑州等地建立起传教总站。加拿大天主教会组织地对华传教则始于20世纪20年代。法裔修会的方济各修会、耶稣会、外方传教会分别建立了山东教区、苏州教区和中满教区，英裔修会的斯卡巴罗外方传教会建立了宁波教区。为了传教，教会建立起学校、医院、农场等，在客观上传播了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为当地培养了一批教师、医生、护士等人才，推动了社会的发展。

加拿大教会为着传教的需要兴办了初级小学、高级小学、中等学校、女子学校、师范学校等。据统计，20年代前，加拿大

教会在河南办学的情况如下表所示：^①

20 世纪 20 年代前加拿大教会在河南办学概况

差会	初等小学	高等小学	中学	初小学生	高小学生	中学生	中学以下学生总数	初小学生升学率	中国教员
圣公会	16	4	2	500	106	40	646	21%	37
长老会	40	7	2	804	192	77	1073	23%	68

同一时期，华西教区有各类在校学生六千多人。加拿大传教士除了兴办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外，还积极地投入到教会的高等教育事业中。华西差会在华西大学的创立和发展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华西大学 1920 年正式聘任的 21 名外国教师中，有一半是华西差会的传教士。华西大学在其存在的 40 年里，培养了 2000 多名各类学生，其中有 420 多人是加拿大医学院培养出来的医生，包括 150 多名牙医。^② 豫北差会参与了齐鲁大学的工作，先后有一批传教士学者前往任教，罗维灵 1916 年教授内科学并任内科主任；E·B·斯特拉瑟斯 1919 年担任内科学教授；J·麦克雷 1919 年担任公共卫生系主任，1925 年至 1927 年间担任校长；瑞思培 1919 年在神科任教，后来任神科科长、代理校长；原来在物理系任教的夏景文 1920 年从美国长老会的编制中转到加拿大长老会的编制中来；明义士 1932 年担任考古学教授。在谈到华西大学和齐鲁大学对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贡献时，不应忘记加拿大教会的作用。

尽管加拿大在华开办的教会学校在数量、规模、影响等方面均无法与美、英等国相比，但这些学校在传播西学、培养人才方面同样在所在地区起了重要作用。河南是中国教育比较落后的省

① 据《中华归主》（中华续行委员会 1922 年）第 188、196 页编制。

② 宋家珩：《加拿大传教士在中国》，第 9 页，东方出版社 1995 年版。

份，加拿大教会在该省开办的各类学校几乎都具有开创性。由长老会 1896 年开设的圣经学校发展而来的贤英学堂是彰德最早的学堂之一，长老会 1906 年开办的三育女校是彰德第一所女子小学，该校 20 年代增设初中班后成为安阳惟一的一所女子中学，长老会 1912 年开办的牧野中学是汲县最早的中学之一，圣公会 1920 年开办的幼稚园是河南首创……教会中小学收费较低，为贫寒人家的子弟提供了接受教育的机会。教会中小学重视英语教学，为学生日后留学欧美打下了基础。除了特别重视宗教课程和英语课程外，教会学校的课程设置和教学要求与国立学校并无两样，因而成为对国立学校为主的教育体系的有效补充。教会学校的学生毕业后有很大一部分在教会或非教会学校任教，充实了当地的师资队伍；也有一些人得以继续深造，成为著名的专家学者，如历史学家白寿彝、古典文学研究专家王素凌、诗人王皎我、小提琴演奏家谭抒真、农学专家陈林樵等。

除了开办学校，传教士还开办了各种各样的扫盲班，为减少文盲做出了贡献，尽管他们的直接目的只是为了吸收教徒。传教士创造性地把中国人发明的拼音用于群众性的扫盲班，他们经常在农闲时节深入到乡村，向农民讲授拼音，宣传福音和其他注有拼音的圣经材料。这一举动使得一些本不识字的人学会了常用的汉字，客观上提高了人们的文化素质。

行医是传教的重要手段，开办西医院也就成为教会投入人力财力最多的事业之一。几乎每一个传教总站都设有一所规模不等的医院，医疗传教士常驻那里；分站与传教点大都设有诊所，医疗传教士在那里进行巡回医疗。20 年代前加拿大传教士在河南的医疗事业情况如下表所示：^①

^① 据《中华归主》188 页、190 页、199 页编制。

20 世纪 20 年代前加拿大教会在河南的医疗事业

差会	医院	药房(医院内药房不在此列)	病床	每年住院人次	外国医务人员总数	中国医务人员总数
圣公会	1	-	100	未详	3	3
长老会	4	2	307	4072	11	19

在四川,1920年前后11个外国差会共建有大小医院26所,其中有11所属于华西差会。1875年到1951年来华工作过的120名加拿大医生中,有六十多位受雇于华西差会。^①华西差会的医疗工作以成都为中心,以城镇为重点。华西差会创办了华西大学医学院和协和大医院,二者分别以牙科教学和牙科门诊闻名于全国。

教会医院最直接的贡献是为当地人民解除了病痛。以圣公会的圣保罗医院为例,该院1923年收治病人200人次,门诊病人1800人次;1926年收治病人444人次,门诊病人3725人次;1936年收治病人1513人次,门诊病人19331人次。到40年代,圣保罗医院已经成为豫东水平最高的现代化大医院,每日诊治病人达120—130人次,有的疾病每天就诊者达50—60人次,最多时曾达200人次。圣保罗医院先进的医疗技术和先进的医疗设备使其声名远播,除豫东本地外,鲁西南、皖北等地的患者也慕名而至。^②圣保罗、广生、惠民、恩赐等教会医院对于改变当地缺医少药的状况,对于促进当地人民的健康起了积极的作用。

教会医院设备先进,技术高超,在引进传播西医科学上起了重要作用。惠民、恩赐、广生、圣保罗几个医院都拥有X光机,使透视和拍片成为诊治疾病的重要依据。恩赐医院以拥有镭锭针而闻名,广生医院拥有先进的血、尿、康乐化验设备及镭放射

① 宋家珩:《加拿大传教士在中国》,第8页。

② 同①,第57页、225页。

器，圣保罗医院的郭海伯大夫自行设计制作了一台无影手术灯。教会医院先进的设备和高超的医术为它们赢得了声誉。

教会医院培养了一批华人医生和护士，这些人日后成为当地医疗队伍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恩赐医院的罗光普大夫曾培养了八名“快速医生”，由这八名医生在怀庆下属的八个县建立了恩赐医院的联合诊所。惠民医院于1923年建立了护士学校，校长由医院的护士长担任，教员由医院的医生、护士长及外出学习过的护校毕业生担任。学校经“万国护士协会”批准，并向中国护士协会注册，使用中华护士学会统一组织教会院校编著的教材。圣保罗医院在1921年开办了护士学校，由医院的大夫和护士兼任教师，教授生理卫生及护理知识，学员边上课边在医院担任护理工作，教会医院培养出来的医生和护士弥补了当地医护人员的不足。

教会医院一般是当地开办最早的西医院，它们带动了当地西医院的出现，后来开办的西医院或多或少都与教会医院有些联系。以广生医院为例，该院在创办时因缺少人员曾招收了四名中国学徒做助手。后来，这四人离开了医院，独自开办了西医诊所。他们不但挂牌行医，而且广收门徒，这些门徒出师后再开诊所，使西医渐行于安阳。

除了开办医院，教会还广泛地宣传卫生知识，开展卫生健康活动。利用宗教集会，传教士常做卫生知识的报告和演讲；在教会开办的《圣经》学习班里，医院的人员也常向学员讲授卫生知识；护校开设的有关公共卫生的课程，也常请病人及附近居民旁听；教会还出售有关卫生、保健知识的小册子。教会的这些活动，普及了基础卫生知识，深受人们欢迎。

传教士对改良农业也颇感兴趣。长老会在彰德开辟了一处农场，用科学方法进行栽种、施肥、耕耘，引进新的品种，向农民推广他们的方法。圣公会也在商丘开辟了一处农场，进行农业试验，向当地农民和中学生讲授和示范农业科技知识。1930年，

R·G·斯特拉瑟斯医生用救灾款在卫辉安装了一个加拿大风动水车，扩大了从卫河汲水进行灌溉的面积。1932年，罗光普和杰克·麦瑟森在怀庆和卫辉演示了由汽油发动机带动的抽水机。在政府无暇顾及乡村农业科技之时，加拿大传教士引进现代农业技术，进行现代农业试验，推广试验成果的活动是值得称道的。

此外，传教士还将一些现代技术运用到当地。罗光普在医院周围煤矿的协助下，在恩赐医院建立了发电机房和自来水系统；他还协助在怀庆县城建立起电话通信系统，在医院装上了电话。贝尔·米切尔也在彰德广生医院安装了当地第一个发电装置，他还把加拿大教徒捐献的改用电池的收音机分给大家，让人们认识了现代化通讯器材。

尽管传教士办学、办医院、介绍现代科技等活动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吸收教徒，但这些活动在客观上起了积极的作用，尤其在比较偏远的地方，传教士的上述活动显然促进了当地社会的发展。

2. 几位著名的传教士

医疗传教士是传教士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将西方先进的医疗技术带到中国，建立医院、医治病人、培训人员，推动了中国医疗事业现代化的发展。长老会医疗传教士罗维灵、罗光普可以说是加拿大医疗传教士中的杰出代表。

罗维灵（William McClure，威廉·麦克卢尔）是加拿大的名医，他在中国度过了50个春秋（1888—1938年），为中国的地方医疗事业和医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做了很多工作。罗维灵“不是第一，也是第二位受加拿大长老会派遣来华的加拿大医生”。^①他领导创建了惠民医院，是该院的首任院长和主治医生。他医术高明，是中国当时早期脑炎和震颤麻痹症诊断的权威之一；他建立

^① 宋家珩：《加拿大人在中国》，第168页，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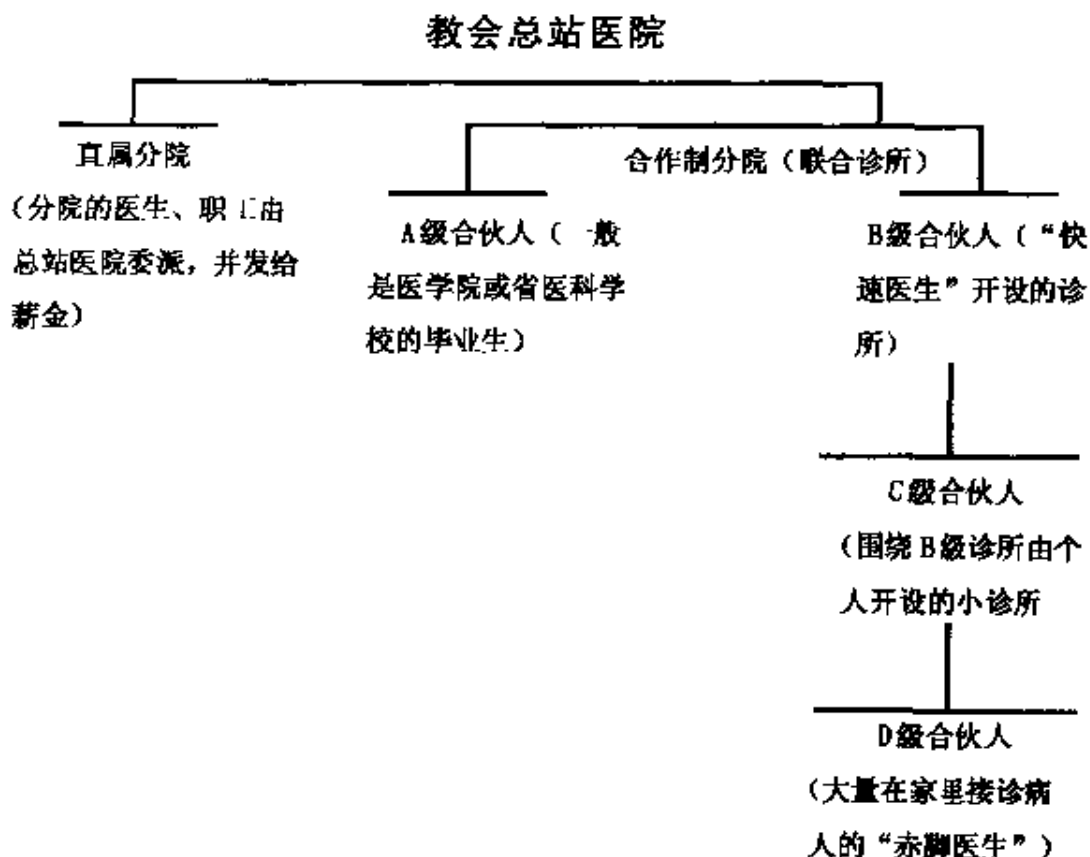
了X光室、无菌手术室、化验室，使惠民医院成为河南设备最先进的西医院之一；他热心指导华人，为当地培养出一批医护人员。1917年，罗维灵到长老会参与建设的齐鲁大学担任医学院教授。在教学之余，他翻译了许多医学教科书，促进了医学院教学水平的提高。

罗光普（Dr. Robert McClure，罗伯特·麦克卢尔）是罗维灵的儿子。他在豫北度过了童年和少年。15岁那年回加拿大接受教育，毕业于多伦多大学医学院。1923年，长老会任命他担任恩赐医院的院长，从这时起直到1948年冬回国，他一直在为中国的医疗事业工作着。

抗战爆发前，罗光普长期在恩赐医院工作，为豫北的农村医疗事业付出了大量心血。他注意学习新技术，常常将最新医疗手段运用到工作中。来中国前，罗光普认真地学习了X光技术、化验技术、外科、眼科等。1931年，他通过了英国皇家外科学会会员资格的考试，正式成为该会会员。在英国期间，他悉心学习妇科；他深入钻研了X光技术，尝试着用X光来治疗深层肿瘤；他还学习了镭放射疗法这一最新技术，甚至买下了一点点镭，从而成为全世界医疗传教士中第二个备有镭的医生。回到恩赐医院后，罗光普开始在豫北地区推广计划生育工作，他广泛宣传计划生育的意义，耐心进行说服工作，积极推广避孕和绝育措施。罗光普的工作小有成效，当时怀庆周围地区有三百多名妇女带上了避孕环，这种避孕环是罗光普找人根据他从国外带回的样品批量生产的。1934年，罗光普前往瑞士、法国等地，学习世界上治疗癌症的最新技术放射针疗法。罗光普虽然长期生活在落后的农村，从事着艰苦的农村医疗工作，但是他通过各种途径学到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医疗技术，并将之运用到豫北农村，从而推动了当地医疗事业的发展。

罗光普在恩赐医院工作期间的一项重要成就是建立了乡村医

疗网，其结构如下：^①



这一医疗网先在怀庆建立，然后逐渐在豫北地区推广。罗光普通过全面训练，培养出八名“快速医生”。八位医生分别在怀庆属下的八个县建立了八个诊所。这八个诊所是恩赐医院的联合诊所，在药品、器械、化验、手术等方面得到恩赐医院的支持。快速医生的联合诊所之下还有一类诊所，其开办者不能使用恩赐医院的名称，但可以从医院购买药品和供应品。这个医疗网的最基层是大量没有受过正规训练的“赤脚医生”，他们仅能诊治一些最常见、最简单的病症。以恩赐医院为基地的怀庆乡村医疗网取得了成功，同样结构的医疗网开始在豫北地区逐渐推广。据罗光普介绍，围绕着卫辉惠民医院、彰德广生医院、怀庆恩赐医院

^① 宋家珩：《加拿大人在中国》，第178页。

三个作为基地的教会医院，乡村医疗网已经普及到豫北大约有150万人、5000平方公里的地区。在这个区域内，在居民点的20公里内可以找到A、B、C三级医疗人员，每个村民在八公里内可以找到D级“赤脚医生”。^①罗光普的乡村医疗网使他名声大振，可他并未满足这一成绩，他打算将这一组织推广到华北乃至全中国的广大农村，但这一愿望因日本的人侵而未能实现。

抗战爆发后，罗光普担任中国北部和中部地区的国际红十字会主任，领导组织以郑州为中心的战地救援工作。从1939年起直至抗战胜利，他主要在大西南负责领导国际援华物资的运输工作，并组织战地医疗队帮助前线救治伤员。抗战期间，罗光普曾借参加国际红十字会议的机会前往英、美、荷兰、德、瑞士等国进行演说；他也利用回加拿大休假的机会在学校、教会等处发表演说。罗光普的演说宣传了中国人民的正义战争，为中国募集到了一定的救援基金和物资。

抗战胜利后，罗光普领导公谊救护队前往河南重建受到战争破坏的医院。1947年，受汉口协和医院的邀请，他带着别人捐助的镭来到该院，建立了癌症检测和治疗中心，从事癌症的诊断和治疗。1948年冬，罗光普返回加拿大，结束了他在中国长达二十多年的工作。

作为医疗传教士，罗光普将西方先进的医疗技术带到了中国，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医疗工作者；并且创造性地建立了乡村医疗网，为中国医疗事业的现代化做出了贡献。此外，他还积极地投入到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中，而且尽自己所能进行宣传活动，让世界了解中国，支持中国。

文字出版工作是教会投入较多的一项重要事业，广学会是教会在中国创办的最主要的出版机构，长老会的季理斐在此服务长达三十多年，为教会的出版事业做了大量工作。

^① 宋家斯：《加拿大人在中国》，第177页。

季理斐 (Donald Mac Gillivray) 作为长老会的牧师于 1888 年来到中国。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 季理斐对乔治·卡特·斯登特编辑的《北京方言汉英词汇》进行了修订, 删除了一些旧的词汇, 补充了一些新的词汇, 1898 年由上海美华书馆出版。该词典的出版受到了传教士的关注, 引起了广学会总干事李提摩太的注意, 因此而改变了季理斐的生活。这部词典在 1911 年出版第三次修订本时, 改名为《英华成语合璧字集》, 季理斐也从修订者变为作者。到 1930 年, 这部字典一共修订了九次。该词典的出版奠定了季理斐在汉语研究中的地位。

1899 年, 季理斐来到上海, 开始了他在广学会长达 30 年之久的文字工作。

翻译和编辑宗教书籍是季理斐文字活动的重要内容。他先后编译、改写出版了《基督之圣神》、《四教考略》、《真道喻言》、《天国释义》等关于基督教教义、历史等方面的书籍, 向中国系统地介绍了基督教。

季理斐也翻译出版了《泰西十八周揽要》、《振新金鉴》、《泰西名人事略》等介绍西方社会、历史的书籍和《观物博异》、《日月蚀节要》、《实学衍义补》等介绍西方自然科学的书籍。尽管他译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传教, 但客观上却传播了西方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

季理斐参与了教会许多统计活动和杂志的编辑。从 1901 年起, 他负责两年一次的中国基督教书刊分类目录的编纂。同年, 他还担任了《万国公报》的代理主编。1905 年, “基督教在华传教百年大会” 筹委会决定编辑一部著作, 对基督教各差会在中国的工作进行一次总结。次年, 季理斐被指定为该书的编辑。1907 年, 他将各国海外传教总部寄来的书面总结及各国在华差会寄来的资料汇编成《基督教在华传教百年史》, 用英语出版。该书正文 677 页, 统计了在中国的一百多个基督教差会及其所开办的学校、医院的详细情况; 一百多页的附录包括了近一百年来在中国

死亡的传教士名单、传教士传记书目及中国百年大事记。这本书成为基督教在华传教的重要历史记录，为日后的传教史研究提供了权威性资料。会后，季理斐承担了《中国基督教差会年鉴》的编辑工作，直至1914年将其交给1913年成立的中国续行委员会，以后他作为编委成员，继续为其撰文。年鉴的编写使西方国家得以了解差会和传教士的活动。从1909年起，季理斐开始主编《中西教会报》。同年，他还参与了《大同报》的编排工作。

季理斐组织翻译的《圣经辞典》是一部内容完整且使用方便的工具书。该书以英国海斯丁编写的《圣经辞典》为基础，将不适合中国的内容删去，加入了中国古代祭祀、佛教、儒教、道教等与中国有关的条目，该书的出版有助于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了解。

季理斐将一批西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译成中文，有助于中国对西学的了解；他编写的年鉴、杂志成了后人研究基督教在中国的重要资料；他的《英华成语合璧字集》和《圣经辞典》有助于西方人士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综观季理斐的活动，可见他确实为中西文化的交流做出了不少贡献。

文幼章是“继白求恩之后又一位赢得中国人民普遍敬爱的加拿大友人”。^①文幼章（James Gareth Endicott）出生于四川的一个传教士家庭，在中国度过了童年，回加拿大接受教育，1925年作为加拿大联合教会的传教士重返中国，1946年因中国内战回到加拿大。

文幼章因在英语教学上的显著成绩而获得了教育家的美誉。1931年，他受华西差会委派，去“青年协会”和精益中学教授英语。1932年，在重庆“反省院”担任兼职教师约一年，为狱中关押的共产党员和嫌疑犯教授英语。文幼章在教学中积极推广直接教学法，注意而对而地教授学生。他编写了十多种课文和教

^① 宋家珩《加拿大人在中国》，第85页。

师手册以及大量故事性很强的英语普及读物。1934年，他创办了手工石印的《精益中学英文周报》，丰富了学生的课外阅读。1935年，文幼章与迈克尔·威斯特共同编辑的《新法英语词典》由格林公司出版，这本专供学习英语的外国学生使用的词典很受欢迎，到1976年已印刷40次，总印数超过400万册。由于文幼章在英语教学上的出色表现，不久即被重庆大学英文系聘为讲师。1940年，任西南联大英语系教授和成都市传教士语言训练学校校长。1944年秋，他应聘担任成都华西协合大学英语系主任，并帮助四川省教育厅改革英语教学法。

1946年，文幼章接受了周恩来的邀请，在上海协助共产党创办了秘密刊物《上海时事通讯》。这一刊物主要介绍中国的真实情况，呼吁各国不要支持蒋介石打内战。刊物出版后由文幼章通过他在联合国救济总署工作的朋友寄往世界各地的政府决策机构、新闻团体、教会领袖、友好人士等。内战爆发后，根据共产党朋友的意见，文幼章回到了加拿大。《上海时事通讯》仅仅存在了一年，但它的意义是重大的。文幼章当时的合作者之一乔冠华后来回忆道：“它对我们有极大的价值。它的发行量不大，但它让我们和许多有影响的机构取得了联系，并争取了许多新的外国朋友。当时在上海是困难的——我们没有料到蒋帮的统治会这么快就垮台，因此我们需要争取到一切可能争取到的同情和支持，以挫败蒋帮把美国更深地卷入内战反对我们的企图。在这场斗争中，文幼章是我们的战友。”^①文幼章将《上海时事通讯》的出版工作带回了加拿大，更名《加拿大远东时事通讯》，从1948年1月起固定为通讯日报，直到1992年他因病住院才终刊。在这44年里文幼章积极热心地宣传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使遍布世界各地的读者对中国、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更真实、更深刻的

^① 文忠志：《出自中国的叛逆者——文幼章传》，第337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认识。

文幼章还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机会向加拿大介绍中国。1933年第一次回国休假时，他曾应邀到各地演讲，介绍中国人民的生活及传教士的工作，抨击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掠夺，歌颂给中国带来希望的青年一代。1941年，他第二次回国休假。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加拿大人开始关注远东和中国。这次休假期间，文幼章在各地做了五百多次公开演说，向人们介绍为捍卫民族尊严和自由而战的不屈的中国人民，呼吁加拿大民众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1947年文幼章回国后，应邀在各种场合进行公开演说，宣传中国革命的性质和目的，呼吁各国不应干涉中国内政，指明蒋介石政府必会垮台。

文幼章的一生，先是致力于英语教育，积极改进教学方法，注意提高教学效果，推动了中国英语教育事业的发展。后来因协助共产党创办《上海时事通讯》而致力于向世界介绍中国，几十年如一日地编辑、发行《加拿大远东时事通讯》，帮助各国人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

怀履光、明义士等传教士因收藏文物而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开始做一些研究工作。回国后，他们继续中国文化的教学与研究，为加拿大中国学的创立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怀履光(William Charles White, 威廉·查尔斯·怀特)是加拿大圣公会的传教士，也是一位著名的汉学家。他1897年到福建传教，1910年前往河南创建了圣公会河南教区，1934年回国。在华期间，怀履光开办学校、医院，开展禁毒运动、农业改良运动，为西学的传人与社会的进步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从1924年起，怀履光开始为安大略皇家博物馆掠夺中国文物，10年中，他通过各种途径从中国运走了数千件文物，这种不光彩的行为应受到中国人民的谴责。

怀履光在掠夺文物的过程中，逐渐对中国文化发生了兴趣并具有了一定的文物鉴赏能力。回国后，他担任多伦多大学中国考

古学副教授并兼安大略皇家博物馆远东收藏部主任。1942年，晋升教授，次年领导创建了中国研究系，并担任系主任。怀履光在多伦多大学讲授中国文化，举办关于中国文化和社会的讲座，为热心学习汉语的人开设中文课程，深受学生欢迎。在博物馆，怀履光将中国文物分类展出，并附上文物的出土地点、用途及相关历史、文化背景的介绍。怀履光的主要精力放在研究工作上。他的专著主要有：《洛阳古墓考》，介绍洛阳附近周代古墓的挖掘情况及出土文物，上海凯利—沃尔出版社1934年出版；《墓砖图集》，介绍墓砖的发现地点、制造过程及使用情况，多伦多大学出版社1939年出版（以下书籍均为该出版社所出）；《墨竹画册》，介绍了近二十幅18世纪的墨竹画，1939年出版；《中国庙宇壁画》，介绍了中国庙宇壁画绘制时的历史背景及其体现出的宗教内容，1940年出版；《中国犹太人》，介绍开封犹太人的历史、石碑、家谱，1942年出版，以后多次重印，是怀履光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中国古代甲骨文化》，介绍各种甲骨的特征、用途及与其有关的历史，1945年出版；《中国青铜文化》介绍华北地区出土的各种青铜器，1956年出版。

怀履光在中国传教时，通过开办学校、医院等方式传播了西学；回到加拿大后，潜心研究汉学，积极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可以说他为文化交流做出了一定贡献，但是，中国人民不应忘记他掠夺中国文物的强盗行径。

明义士（James Mellon Menzies）是加拿大长老会豫北差会的传教士，从1910年来华到1937年回国，在中国度过了二十多年。1914年，因一个偶然的机，明义士与甲骨文及“殷墟”结下了不解之缘，从此致力于中国古文物的收藏和中国古文物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明义士称自己是所有中外考古学家中第一个怀着纯科学的态度访问殷墟的人。他常年居住在安阳，利用地利之便，收藏了大量的甲骨，并开始进行研究。1917年，明义士从自己收藏的约5

万片甲骨中选出 2369 片精品，亲自临摹，编为《殷墟卜辞》，由上海别发洋行石印出版，这是西方学者研究甲骨文的第一部专著，且开创了甲骨文摹本著录这一著录形式。在该书收录的甲骨中，仅有一片赝品混入，从中可见明义士辨别伪造甲骨的能力。1928 年，他又从新获甲骨中选出 2819 片，拓印数份，名《殷墟卜辞后编》，分赠于马衡、容庚、商承祚等甲骨学名家。该书 1972 年经许进雄先生整理，由台湾艺文印书馆出版。

1932 年至 1937 年，明义士担任齐鲁大学的考古学教授，度过了他学术生涯最为辉煌的时期。在齐大，他用汉语讲授“甲骨学研究”、“考古学通论”等课程，以自己的藏品为主办起了一个文物展览馆，经常带领学生进行野外考古调查，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商代文化》刊于《齐大季刊》1932 年第 1 期；《商代之文化》刊于北平《导报》，并由该社出版了单行本；《甲骨研究初编》，齐鲁大学 1933 年石印讲义本，1996 年齐鲁书社出版；《表校新旧版〈殷墟书契前编〉并记所得之新材料》，刊于《齐大季刊》1933 年第 2 期；《中国商代之卜骨》1933 年刊于济南扶轮社报告，并出版抽印本；《论汇印聂克逊先生所藏青铜十字押》，刊于《齐大季刊》1934 年第 3 期；《柏根氏旧藏之甲骨文字》，刊于《齐大季刊》1935 年第 6 期，并有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单行本；《商周的美术》和《商代的文化与宗教思想》1936 年刊于《亚洲文会》第 67 期。在齐大任教期间，明义士尚有以下完成或未完成的著作：《商代王妣世系考》（草稿）、《殷墟卜辞类考》（未完成）、《卜辞中商代之战争》（部分完成）、《商代器皿形成考》（资料已收集）、《齐大古器物室录簿》、《中国初时之美术》、《殷墟卜辞文字索引》（完成卡片索引）、《殷墟卜辞考释》。其中，《甲骨研究初编》是最能代表明义士学术水平的一部专著。作者关于甲骨发现及流布的叙述被认为“最为准确、详赡和具有权威

性”。^① 作者还根据自己掌握的材料，考证了甲骨文中商代帝王阳甲与沃甲的写法，纠正了当时学术界流传的错误看法，在商代帝王世系的研究上取得了关键性的成果。

1937年抗战爆发后，明义士回到了加拿大，次年受聘到安大略皇家博物馆远东部中国研究所从事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工作。这期间，他的兴趣转到了对中国古代青铜器的研究上。1940年发表了《中国青铜器欣赏》一文，1942年以《商戈》获多伦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商戈》以出土的实物为依据，以当时所能见到的中外公私各家已公诸于世的商代铜戈标本为基础，对商戈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明义士收藏的文物，现由中国的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山东省博物馆和加拿大的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及明义士的子女收藏。明义士将中国文物非法盗运出境，理应受到中国人民的指责，但他对中国考古学尤其是甲骨学研究做出的贡献仍是值得纪念的。

加拿大传教士一般都受过高等教育，这使他们可以通过医疗、教育、出版等方式将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传入中国；由于精通汉语并长期接触中国文化，使得传教士中的一些人着迷于灿烂的中华文明从而致力于中国文化的研究并将之介绍到西方国家；传教士还通过演讲等形式向西方介绍中国。总之，在民国时期的中加文化交流中，传教士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3. 加拿大医疗队在中国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支援中国人民的正义战争，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联合成立了援华委员会，派遣以著名外科专家白求恩大夫为首的医疗队来华。诺尔曼·白求恩（Norman Bethune），医学博士，世界著名的胸外科专家，加拿大共产党员。医疗队另

^① 王宗信：《甲骨学通论》，第4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一位成员是美国的法拉特大夫，但他一直没有报到，临行前美国的帕森斯大夫参加了进来。护士琼·尤恩（Jean Ewen）曾于1933—1937年间服务于美国圣路易斯的方济各修会山东教区，她讲一口流利的汉语，比较了解中国，又是一位老共产党员的女儿，因此，成为白求恩最理想的助手和翻译。加美医疗队于1938年到达汉口，在这里三人发生了分歧，白求恩和尤恩愿去八路军卫生部工作，但帕森斯坚决反对，最终退出了医疗队。4月，白求恩和尤恩抵达延安，会见了毛泽东，他们达成共识，决定由白求恩组织中国的第一个战地医疗队。后来，理查德·布朗（Richard F. Brown）加入进来。布朗是医学博士，30年代作为医疗传教士服务于加拿大圣公会在商丘开办的圣保罗医院。抗战爆发后，他决定利用三个多月的休假到延安去，为中国人民做点事情，因此，加入到“八路军加美巡回医疗队”。

4月24日，白求恩与布朗等人从延安出发，前往晋察冀根据地，6月17日到达五台山。1939年11月，白求恩在一次手术中因细菌感染不幸牺牲。在中国近两年的时间里，白求恩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做出重要贡献。

在缺医少药，设备简陋的条件下，白求恩创造性地发明了一些器械与药物。他用猪油代替凡士林，用竹片制作镊子，把砖头改造为热敷工具。他亲自绘制图样，指导人们做夹板、病床、钳子等医疗设备。他用次硝酸铋、黄碘、流动石蜡、香油配制成软膏“毕普”，减轻了伤员换纱布时的痛苦。这些因地制宜的发明创造，缓解了药品与器械的不足。

白求恩编著了《战地救护须知》、《战伤治疗技术》、《战地外科组织治疗方法草案》等二十多种医疗卫生教材，丰富了战地医疗的理论。白求恩1938年8月完成的《游击战争中师野战医院的组织和技術》是他在中國從事戰地醫療工作的總結，也是他最重要的著作。聶榮臻曾高度評價該書：“這是他一生最後心血的結晶，也是他給予我們每一個革命的衛生工作者和每一個指戰

员、伤员最后的不可再得的高贵礼物。”^①

白求恩非常重视医疗工作人员的培养与训练。早在筹建松岩口模范医院的同时，他就开办了卫生训练班，招收了五十多名学员。他还在杨家庄举办过以集体实际教育为中心的实习周。在白求恩的关怀、倡导下，1939年9月18日，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正式建立。他参与了教学方针、教学计划、课程表的制定，亲自编写了外科教材。该校建成后，为解放区培养了大批医务干部和医护人员。此外，白求恩还经常举办专题讲座、巡回讲座，进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现场实地参观、操作。

白求恩还做了大量宣传工作，为八路军争取外援。他曾任根据地宣传委员会的英文组组长，专门负责向国外报刊组织编写介绍中国抗日战争情况的文章。他曾撰写了热情歌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英雄业绩的短篇小说《沃土上的野草》，寄往国外发表。在与美国和加拿大朋友的通信中，白求恩多次请他们在国外代为宣传，为中国争取支持与援助。

布朗加入八路军加美巡回医疗队后，担任白求恩的翻译。同时，作为出色的外科医生，他也做了大量的战地服务工作和医疗工作，“我的日记告诉我，在三个月内我一共做了365例手术”。^②7月13日，布朗离开解放区回开封，途中访问了八路军总司令部，会见了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副总司令彭德怀，朱德交给布朗一封信，信中代表八路军对来自传教士的援助表示感谢。

8月初，布朗回到开封，得知自己已被圣公会除名。早在前线时，布朗就决定要尽快筹备一个为伤病员和平民服务的医疗项目。于是他前往汉口，多方为八路军争取医药援助。8月27日，他致信华中国际红十字会秘书马克斯韦尔博士，谈到了为八路军开办医院的计划，希望得到药品、设备和钱的援助。布朗还前往

^① 章学新：《白求恩传略》，第175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② 转引自：宋家珩《加拿大人在中国》，第39页。

上海、香港募捐。利用募捐来的款项和来自国际红十字会的援助，一座新医院终于落成。“医院发展很快，到1943年，已有920名医护人员，组成12个巡回医疗队，在河北西部和陕西西南部地区提供紧急医疗服务”。^①但布朗未能看到新医院的建成，他因家庭原因前往青岛行医，后来加入了英国军队。布朗为支持八路军的医疗事业，付出了极大的热情和心血，他永远是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

尤恩到达延安后，担任了边区医院的护士兼营养师。后来，她离开陕甘宁边区，奔赴晋绥革命根据地。途中，在药品器材供应站清涧帮助建立和完善了造册登记制度，在120师后方医院负责教授了一批年轻的男护士，还为伤员和百姓做了许多医疗服务工作。6月底，尤恩到达山西岚县120师贺龙司令部所在地，开始在军医部门工作。接下来的四个月中，尤恩踏踏实实地做了许多最基本的医疗工作，并有系统地训练和培养了一批卫生、医护人员。

由于健康原因，尤恩离开解放区，准备取道上海返回加拿大。在上海，新四军卫生处处长沈大夫请求尤恩帮忙一起将募集到的医药补给送到皖南。尤恩答应了沈大夫的请求，和沈大夫等人将药品和物资送到了苏皖边界新四军军部。尤恩主动留在了支队司令部所在的云岭工作，除了负责照顾病人，她还为培训战地医务人员做了大量工作。为使受训人员更直观地了解人体的构造，她曾与其他医生一起做尸体解剖，这在本地区医务人员的培训中还是第一次。他们将解剖图与收集到的材料汇编成册，以备后用。1939年5月末，第一期“小抗大”的护士与卫生员训练班的35名学员圆满完成了学业，成为一批合格的医护人员。从1938年1月到1939年6月，尤恩先后在陕西、山西、皖南工作，照顾伤病员，培训护理人员，并且参与了医疗、军需物资的运

^① 转引自：宋家珩《加拿大人在中国》，第43页。

送，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加美医疗队的三位成员白求恩、布朗、尤恩都是加拿大人，他们筹集物资、救死扶伤、培训人员、著书立说，为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医疗卫生事业奉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成为中加友谊的象征。他们将永远受到中国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附录一：民国时期中外文化交流大事年表

1912年（民国元年）

清华学堂更名为清华学校，并派出首批16名学生赴美。到1929年清华改办国立大学后派出最后一批学生，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清华共选派留美学生1279人。

留美生詹天佑等人创办中国工程师学会。

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继1905年后再度赴中国东北调查搜集史料，并把《满文老档》等珍贵资料携归日本。

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汪精卫等人在北京发起成立留法勤工俭学会，吸收有志赴法的学生入会并帮助他们留法。后一共派送两批勤工俭学学生赴法，共100人。

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赴英留学。

基督教青年会在北京举行第六次全国会议，将总部名称改为“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

德国人兴办的同济医工学堂成立，1924年改为国立同济大学。

1913年（民国二年）

12月，郭沫若东渡日本留学，先后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冈山第六高等学校和九州帝国大学学习，1923年毕业回国。

李四光进入英国伯明翰大学学习，1919年以长篇论文《中国之地质》获硕士学位，1920年回国。

- 陈嘉庚创办集美小学。
- 1914年（民国三年）
- 1月，日人松本龟次郎等在东京创办东亚高等预备学校，专门招收中国留学生，成为留日学生教育的重镇。
- 8月，文明戏团体“新民社”等相继出现，形成所谓“甲寅中兴”的局面。
- 夏天，流亡日本的刘艺舟集结留日青年，在东京创立“光黄新剧同志会”。
- 12月，民国政府呈准公布《管理留日学生事务规程》。
- 留美生组织的“科学社”成立，翌年10月正式定名为“中国科学社”，后该社发展成为中国第一大科技团体。
- 1915年（民国四年）
- 泰国文学会将《三国演义》评为优秀小说。
- 1月，科学社社刊、中国历史上第一份自然科学的专门刊物《科学》在上海出版。
- 2月，东京留日学生成立留日学生总会。
- 6月，李广安、张秀波、齐云卿、李石曾等人在巴黎成立勤工俭学会。成立之初致力于介绍华工来法并组织华工教育，后与华法教育会一道组织学生赴法勤工俭学。
- 教会兴办的福建协和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成立。
- 1916年（民国五年）
- 6月，法国人欧乐、法士乃及中国的蔡元培、汪精卫、吴稚晖、李石曾、吴玉章等共同发起成立了华法教育会，1918年前后又在中国国内设立了若干分会和预备学校，有力推动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发展。
- 9月，周恩来赴日留学，入东京高等预备学校，1919年回国。
- 教会兴办的华北协和大学和汇文大学合并

- 1917年（民国六年）
成立燕京大学。
留美生过探先等人创办中国农学会。
教会兴办的齐鲁大学成立。
- 1918年（民国七年）
4月，日华学校在东京成立，由日本枢密院副议长小松原英太郎任会长。
本年，日本汉学研究团体“斯文会”在东京成立。
- 1919年（民国八年）
2月，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出版。在这部书里，胡适运用实用主义的方法论，对中国古代哲学进行了破旧创新的研究，在学术界产生强烈反响。
3月，第一批勤工俭学学生89人登船赴法。同月，徐悲鸿赴法留学，1927年回国。
4月，中国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首次率剧团赴日演出，受到日本观众热烈欢迎。
4月，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教育家杜威来华讲学。他在中国度过两年零两个月时间，足迹遍及14个省市，做了大小演讲二百多讲，系统宣传了实用主义学说。在杜威讲学的推动下，中国形成实用主义热潮。
本年，陈毅、李立三、李维汉、蔡和森、聂荣臻先后赴法勤工俭学。
- 1920年（民国九年）
8月，讲学社将杜威在北京举行的5个系列讲座辑为《杜威五大演讲》向全国发行。到杜威离华时，该书已印行13版，每版1万册以上。
9月，邓小平赴法勤工俭学。
10月，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讲学，在中国十个月，传播了现代西方大量的科学知识和哲学思想，对五四时期的中国思想界影响很大。
10月，北京大学举行典礼，授予杜威哲学

博士。

10月，瞿秋白作为北京《晨报》特派记者赴苏俄采访。

11月，周恩来赴法勤工俭学。

本年，杜威继续在华讲学。

日本汉学研究团体“支那学社”在日本京都成立。

《民铎杂志》2卷1号出版“尼采专号”，全面介绍宣传了尼采思想。

1921年（民国十年）

6月，华法教育会宣布与勤工俭学生脱离关系，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夭折。

7月，杜威离华返美，罗素离华返英。

本年，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曹靖华等人赴苏留学，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郭沫若、郁达夫等人在日本成立创造社。

天主教会学校—天津工商大学正式招生。

泰戈尔创办国际大学。

陈嘉庚创办厦门大学。

陈寅恪从本年至1925年在德国学习。

1922年（民国十一年）

1月，德国哲学家杜里舒来中国讲学，先后在上海、南京、北京等地做学术演讲，历时一年，于1923年初离华返国。

3月，日本第45届国会通过了关于中国留学生的建议案，正式把支持中国留学生运动作为一项国策。

6月，周恩来、赵世炎、李维汉等人在巴黎组织“旅欧少年共产党”，1923年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

11月，北洋政府正式公布了《学校系统改革案》，受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影响的“新学制”确立。

年底，萧三从法国只身赴莫斯科，进入东

方大学学习。

从本年到 1927 年，中国社会爆发了声势浩大的“非基督教运动”，使得基督教势力的发展速度开始减慢。为应对形势，基督教会实行了“本色教会运动”，教会学校更明确提出“更有效率、更基督化、更中国化”的口号。

1922—1924 年，德国著名汉学家卫礼贤第二次旅华，在此前后，他翻译出版了大量中国古代典籍，并撰写大量著作，向德国介绍了中国文化。

1923 年（民国十二年）

3 月，中共从旅欧勤工俭学学生中选派第一批骨干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熊雄等赴苏留学。9 月，选派第二批骨干李林、穆青等赴苏留学。

本年，日本汉学研究机构东洋文库正式对外开放。

“德国工程师中国协会”成立。

1924 年（民国十三年）

4—5 月，泰戈尔访华，先后在讲学社等处进行了多次公开演讲，访问了上海等七个城市，极大地促进了中印文化交流。

10 月，梅兰芳率剧团二度赴日演出。

留美生竺可桢等创办中国气象学会。

本年至 1925 年，王光祈出版了《欧洲音乐进化史》、《西洋音乐与戏剧》、《西洋乐器提要》等著作，研究介绍了西洋音乐文化。

本年，日本外务省成立对华文化事业部。

中共从旅欧勤工俭学学生中选派第三批骨干赴苏留学，包括聂荣臻、蔡畅、郭隆真等。

教会兴办的武昌华中大学成立。

老舍从本年到 1929 年在英国伦敦大学教授

- 汉语和中国文学。
- 《西游记》选译本在巴黎出版，译者莫朗。
- 1925年（民国十四年） 莫斯科中山大学成立，并通过公开招考和选派的方法招收了一批国共两党党员及进步青年赴该校学习，包括张闻天、王稼祥、吴亮平、叶南、陈复等。
- 苏联电影导演B·A·史涅伊吉洛夫到中国拍片，后来将所得素材编辑成影片《伟大的飞行与中国的国内战争》。
- 美国太平洋学会成立，研究中心放在远东问题特别是中国问题上。
- 《民铎杂志》6卷4号出版“康德专号”，集中介绍了康德学说。
- 从本年起，王光祈在德国刊物及出版社发表、出版了大量论著，介绍宣传了中国的传统音乐。
- 1926年（民国十五年） 在里昂中法大学留学的敬隐渔将鲁迅的《阿Q正传》译成法文，在《欧洲》杂志1926年5月、6月号上发表，罗曼·罗兰对该小说给予很高评价。
- 莫斯科中山大学招收第二批学员，有杨尚昆、秦邦宪等。
- 12月，上海百星大戏院从美国运来若干种有声短片放映，这是有声电影在中国放映的开始。
- 1927年（民国十六年） 傅雷、巴金、郑振铎赴法留学。
- 苏联电影导演雅可夫·布里赫来到上海，拍摄了新闻影片《上海纪事》。
- 梁思成翻译的英国史学家韦尔斯的名著《世界史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到1935年共发行五版，在史学界产生较大影响。
- 1928年（民国十七年） 8月，日本著名戏剧演员守田堪弥和村田

- 嘉久子等一行五十余人到北京献艺。
刘海粟赴法国等欧洲国家考察西方美术。
斯诺、史沫特莱来到中国。
哈佛大学和燕京大学合作成立了哈佛燕京学社，成为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中心。
- 1929年（民国十八年） 本年至1930年，孙本文主编的《社会学丛书》由世界书局陆续出版，这是国内首次对西方社会学的系统输入。
- 1930年（民国十九年） 年末，冼星海赴法留学，1935年回国。
梅兰芳率剧团赴美国进行了为期半年的访问演出，在美国引起极大轰动。
本年，日本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成立。
日本汉学家青木正儿的巨著《支那近世戏曲史》问世。
上海戏剧协会在中央大会堂公演了《威尼斯商人》，这是莎士比亚戏剧在中国舞台上第一次较严肃的演出。
莫斯科中山大学停办。
吴亮平在上海从俄文翻译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由江南书店出版。
- 1931年（民国二十年） 11月，萧三作为“左联”代表出席了在苏联哈尔科夫举行的国际革命作家代表大会。
1月，胡愈之在莫斯科参观游览，之后写出《莫斯科印象记》。
3—6月，曹谷冰在苏联访问，回国后写成《苏俄视察记》。
中英文教基金董事会成立。
鲁迅与德国友人合作，筹办了德国作家版画展。
- 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 留美生王箴等创办中国化学会，梅贻琦等创办中国物理学会。
美国著名中国学家费正清来中国进修汉语，

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

为撰写博士论文做准备。

2月，苏联有声电影《生路》在上海大戏院上映，受到左翼文艺界的热烈欢迎。

英国著名戏剧家萧伯纳到中国做短期访问，在中国文化界掀起一股热潮。

从3月起，戈公振访苏三年，不断写文章发表见闻感想，后由邹韬奋汇成《从东北到庶联》一书出版。

10月，鲁迅借上海北四川路一空屋举行德俄木刻展览会。

12月，鲁迅在上海老靶子路40号举行俄法书籍版画展。

徐悲鸿赴欧洲举办中国近代绘画展，引起很大反响。

南京国民政府公布了《国外留学规程》，对留学生的资格、考选、管理和回国效力等问题做了全面详尽的规定。

本年至1936年，清华大学举办了四届留美公费生考试，共派出92人赴美留学，其中包括后来成为著名科学家的钱学森、张光斗、赵九章等人。

本年，中英文教基金董事会举行第一次庚款留英考试，此后又进行了八次考试，共录取194人赴英留学，其中涌现了一批著名学者，如钱钟书、张文裕、卢嘉锡等。

部分留德学生和在北京的德国汉学家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德文化协会”。

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

5—7月，徐悲鸿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举行中国近代绘画展。

8月，萧三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

7—9月，邹韬奋访苏两个月，其访问文章

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

收入《萍踪寄语》。

鲁迅出版了苏联版画集《引玉集》。

鲁迅等人创办《译文》杂志，出版了法国文学家罗曼·罗兰逝世纪念号。

美国女作家赛珍珠离开中国回美国定居。此前，她在华生活三十多年并完成后来为她赢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几乎全部文学作品。

3—4月，梅兰芳率梅剧团赴苏联演出，受到热烈欢迎。

3—4月，影星胡蝶及周剑云夫妇在苏联参观访问。

4月，中华话剧同好会在东京神田一桥讲堂公演《雷雨》，这是《雷雨》的第一次域外演出。

5月，中国中印学会在南京成立。

7月，鲁迅编辑的《珂勒惠支版画选集》自费出版。

本年，中华国际戏剧协进会、中华戏剧座谈会在东京成立。

张仲实与樊英合译了20年代风靡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程》。

留美生胡敦复等创办中国数学会。

金岳麟出版了《逻辑》一书，第一次系统介绍了西方近代以来特别是罗素的数理逻辑，极具启蒙意义。

季羨林赴德国留学，1945年回国。

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

1月，由中苏文化协会和美术家协会联合举办的苏联版画展在南京中央大学图书馆举行。

4月，中华话剧同好会、中华国际戏剧协进会、中华戏剧座谈会在东京合并为中华戏剧协会。

7月,鲁迅以三闲书屋的名义出版了《死魂灵百图》。同月,《苏联版画集》由良友印刷公司出版。

郑振铎主编的《世界文库》丛书开始出版,共出版12个国家的一百多部作品。

英国著名记者贝特兰受英国《每日先驱报》委派到北京做特派记者,向世界最早报道了西安事变,并宣传了中国革命。

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

4月,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举行落成典礼。

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驻日大使馆和留日学生监督处相继关闭,留日学生大举归国,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至此暂告结束。

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

9月,印度国大党派出了援华医疗队。

国民政府为节约外汇以应战时之需,颁布了《限制留学暂时办法》,大大限制了学生的出国。

苏联著名电影导演罗曼·卡尔门到中国拍片,回国后根据其在中国拍摄的素材,编辑成两部大型纪录片《中国在战斗中》、《在中国》。

徐悲鸿赴新加坡举办画展,所得款项捐给祖国抗战。

斯诺的《西行漫记》出版,向世界宣传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贺麟的《黑格尔逻辑学简述》一书出版,在这部著作中,贺麟完整阐述了黑格尔逻辑学的基本思想,并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为后来研究黑格尔哲学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

加美医疗队到达中国。

- 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 张仲实从俄文翻译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斯大林的《论民族问题》。
本年至1940年，刘海粟在东南亚举办画展，所得款项捐给祖国抗战。
贝特兰的《华北前线》在英国出版，被誉为《西行漫记》的姊妹篇。
- 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 4月至翌年7月，云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林同济、陈铨、雷海宗在昆明主办了《战国策》半月刊，多方面宣传尼采学说，形成一股热潮。
5月，冼星海赴苏考察音乐。
徐悲鸿应泰戈尔之邀赴印度国际大学讲课并举办个人画展。
中国南洋学会成立。
- 1942年（民国三十一年） 国民政府为适应培养抗战建国人才的需要，宣布废除《限制留学暂行办法》，重新放宽留学政策。
英国著名汉学家李约瑟受英国文化委员会等机构的资助来中国进行科学文化交流，在中国度过三年时光。
- 1943年（民国三十二年） 国民政府举行第一次自费留学考试。
中印两国政府开始互派留学生。
- 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 郭沫若应苏联科学院之邀，参加该院建院220周年纪念大会，访苏50天，回国后写成《苏联纪行》。
- 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 7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南京、上海、北平等九城市举行公费留学考试和第二届自费留学考试，分别录取148人和1216人。
12月，茅盾夫妇应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邀请，作为文化名人访苏三个月，写成《苏联见闻录》一书。

- 曹未风译的《曹译莎士比亚全集》由上海文化合作股份公司出版。
- 郑昕的《康德学述》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印行，这是民国时期惟一一部专论康德哲学的著作。
- 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 上海世界书局出版了朱生豪译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
- 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 费正清出版了《美国与中国》，介绍了中国文化，成为他的代表作。

附录二：主要参考文献

中文文献

A. 报刊

《留美学生年报》

《留美学生季报》

《留英学报》

《科学》

《北京大学日刊》

《晨报》

《新青年》

《东方杂志》

《大公报》

《新潮》

《工读》

《时事新报》

《教育杂志》

《学生杂志》

《民国日报》

《上海晚报》

《改造》

《全国学术工作咨询处月刊》

B. 书籍

《人生观之论战》，泰东图书局 1923 年版。

《杜威五大演讲》，晨报社 1926 年版。

《杜威教育论著选》，赵祥麟、王承绪编译，华东师大出版社 1981 年版。

《杜威罗素演讲录合刊》，新学社编辑印行。

- 《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开明书店 1934 年版。
- 《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商务印书馆 1948 年版。
- 《留学教育》，王焕琛主编，（台北）国立编译馆 1979 年版。
-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一）、（二），张允候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1986 年版。
- 《海外工读十年纪实》，盛成著，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 《留德十年》，季羨林著，东方出版社 1992 年版。
- 《美国视察记》，伍廷芳著，中华书局 1915 年版。
- 《从东北到庶联》，戈公振著，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 《苏联见闻录》，茅盾著，开明书店 1948 年版。
- 《我所走过的道路》，茅盾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8 年版。
- 《茅盾全集》（第 18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 《胡适往来书信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中华书局 1979 年版。
- 《胡适留学日记》，海南出版社 1994 年版。
- 《胡适的日记》，中华书局 1985 年版。
- 《胡适年谱》，曹伯言、季维龙编，安徽教育出版社 1986 年版。
- 《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葛懋春、李兴芝编，华东师大出版社 1993 年版。
- 《胡适口述自传》，〔美〕唐德刚译注，华东师大出版社 1993 年版。
- 《胡适作品集》，（台北）远流出版公司 1986 年版。
- 《胡适著译系年目录》，季维龙编，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版。
- 《蔡元培全集》，高平叔编，中华书局 1984 年版。
- 《蔡元培教育论著选》，高平叔编，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3 年版。
- 《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商务印书馆 1940 年版。
- 《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 《鲁迅书信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6 年版。
- 《鲁迅论美术》，张望编，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2 年版。
- 《李大钊文集》，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 《瞿秋白文集》，人民出版社 1985—1988 年版。
- 《瞿秋白年谱新编》，周永祥著，学林出版社 1992 年版。
- 《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年版。
- 《周总理青少年时代诗文书信集》，怀恩选编，四川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 《聂荣臻回忆录》，战士出版社 1983 年版。
- 《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 《回忆与怀念》，伍修权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
- 《艾思奇文集》，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 《三松堂全集》，冯友兰著，三联书店 1984 年版。
- 《陶行知全集》，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4 年版。
- 《郑晓沧教育论著选》，王承绪、赵端瑛编，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3 年版。
- 《萧三文集》，新华出版社 1983 年版。
- 《曹靖华译著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河南教育出版社 1993 年版。
- 《田汉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 1987 年版。
- 《傅雷译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1—1985 年版。
- 《傅雷全集》，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9 年版。
- 《我的电影生活》，梅兰芳著，中国电影出版社 1984 年版。
- 《徐悲鸿年谱》，李松编，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5 年版。
- 《老舍年谱》，甘海岚编，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9 年版。
- 《东西乐制研究》，王光祈著，上海中华书局 1926 年版。
- 《过去的学校》（回忆录），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2 年版。
- 《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贺麟著，辽宁教育出版社 1988 年版。
- 《民国时期总书目》，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
-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舒新城编，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2 年版。
-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
- 《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北京出版社 1982 年版。
- 《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料——教会教育》，李楚材编，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7 年版。
- 《时代之波——战国策派文化论著辑要》，温儒敏、丁晓萍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5 年版。
- 《从叔本华到尼采》，在创出版社 1944 年版。
- 《朱家骅年谱》，胡颂平编，（台北）传记出版社 1969 年版。
- 《中国科学技术史》第 1 卷，李约瑟著，科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 《中外文化交流史》，周一良主编，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
- 《中外文化交流史丛书》，季羨林总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
- 《中华文化通志·中外文化交流典》，姜义华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

《中华民国文化史》，史全生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0 年版。

《现代中外文化交流史略》，陈新仁主编，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7 年版。

《中国科苑英华录》（新中国之部，上、下册）科学普及出版社 1985 年、1988 年版。

《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李喜所著，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王奇生著，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

《近代中国留学史》，陈启天著，（台北）天一出版社 1979 年版。

《中国留学教育史》，林子勋著，（台北）华冈出版有限公司 1977 年版。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简史》，黄利群编著，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2 年版。

《中国人留学日本百年史》，沈殿成著，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

《中国人留学日本史》，〔日〕实藤惠秀著，谭汝谦、林启彦译，三联书店 1983 年版。

《近代外国在华文化机构综录》，郭卫东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中国翻译家辞典》，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8 年版。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顾长声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顾长声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狄考文和司徒雷登在华教育活动》，史静寰著，（台湾）文津出版社 1991 年版。

《传教士与中国近代社会》，顾卫民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中国教会学校史》，高时良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4 年版。

《教会大学在近现代中国》，谭双泉著，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版。

《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章开源、林蔚编辑，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

《基督教大学与国学研究》，陶飞亚、吴梓明著，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

《加拿大传教士在中国》，宋家珩著，东方出版社 1995 年版。

《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胡逢祥、张子建著，华东师大出版社 1991 年版。

《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张岂之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中国近代社会学史》，杨雅彬著，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外国教育家评传》（二），赵祥麟主编，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

《张君勱传记资料》，（台北）天一出版社 1979 年版。

- 《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丁守和著，三联书店 1979 年版。
- 《中共党史人物传》第 8 卷，李新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 《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晋阳学刊编辑部编，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 《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3 年版。
-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李其驹等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 《马克思主义理论翻译家张仲实》，张积玉、王钜春著，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
- 《罗素与中国》，冯崇义著，三联书店 1994 年版。
- 《罗素哲学译述集》，张申府著译，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 《自由主义之累——胡适思想的现代阐释》，欧阳哲生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 《中国近代的无政府主义思潮》，蒋俊、李兴芝著，东北师大出版社 1988 年版。
- 《五四新文学与外国文学》，王锦厚著，四川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 《走向世界文学》，曾逸著，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6 年版。
- 《二次大战的中外文化交流史》，黄俊英著，重庆出版社 1991 年版。
- 《中外文学因缘》，戈宝权著，北京出版社 1992 年版。
- 《中国翻译文学史稿》，陈玉刚主编，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9 年版。
- 《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郭延礼著，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
- 《萧伯纳在上海》，瞿秋白编，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 《法国作家与中国》，钱林森著，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版。
- 《朱生豪传》，吴治敏、朱宏达著，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9 年版。
- 《萧乾评传》，王嘉良、周健男著，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0 年版。
- 《汉语词汇史》，王力著，商务印书馆 1993 年版。
- 《汉语语汇研究史纲》，周荐著，语文出版社 1995 年版。
- 《中国现代比较戏剧史》，田本相主编，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3 年版。
- 《中国话剧研究概述》，田本相、焦尚志著，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
- 《中国电影发展史》，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出版社 1980 年版。
- 《中国西画五十年：1898—1949》，朱伯雄、陈瑞著，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9 年版。

- 《林风眠论》，郑朝、金尚义编，浙江美术出版社 1990 年版。
- 《冼星海传》，马可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 年版。
- 《聂耳、冼星海纪念文集》，聂耳、冼星海学会编，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 《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汪毓和著，人民音乐出版社 1984 年版。
- 《鲁迅与新思潮：论鲁迅留日时期的思想》，汪毅夫著，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
- 《鲁迅与新兴木刻运动》，马蹄疾、李允经编著，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5 年版。
- 《文化巨人郭沫若》，秦川著，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2 年版。
- 《解读周作人》，刘绪源著，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4 年版。
- 《徐悲鸿的一生》，廖静文著，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2 年版。
- 《纪念埃德加·斯诺》，刘力群主编，新华出版社 1984 年版。
- 《纪念史沫特莱》，尹均生、曹毓英主编，新华出版社 1987 年版。
- 《天涯萍踪——记萧三》，高陶著，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1 年版。
- 《东方行——记斯特朗》，白黎著，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5 年版。
- 《梅兰芳游美记》，齐如山著，岳麓书社 1985 年版。
- 《梅兰芳》，许姬传著，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7 年版。
- 《胡蝶回忆录》，胡蝶口述、刘慧琴整理，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8 年版。
- 《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在国外》，王丽娜著，学林出版社 1988 年版。
- 《汉籍外译史》，马祖毅、任荣珍著，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
- 《当代美国的显学——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侯且岸著，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 《美国中国学手册》，中国社会科学院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 《费正清看中国》，〔加〕保罗·埃文斯著、陈同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 《中国文化在俄罗斯》，李明滨著，新华出版社 1993 年版。
- 《中国与俄罗斯文化交流志》，李明滨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
-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在苏联》，〔苏〕李福清著，田大畏译，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9 年版。
- 《中苏文化之交流》，郭沫若著，三联书店 1949 年版。
- 《梅耶荷德谈话录》，A·格拉特柯夫辑录，童道明译，中国戏剧出版社 1986

- 年版。
- 《德国的汉学研究》，张国刚著，中华书局 1994 年版。
- 《法国当代中国学》，〔法〕戴仁主编，耿昇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 《中日文化交流史论》，梁容若著，商务印书馆 1985 年版。
- 《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王晓秋著，中华书局 1992 年版。
- 《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王晓秋、大庭修主编，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 《日本中国学史》，严绍璁著，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 《田汉在日本》，小谷一著，刘平编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 《李约瑟与中国》，王国忠著，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1992 年版。
- 《李约瑟博士及其〈中国科学技术史〉》，华东师大出版社 1989 年版。
- 《泰戈尔传》，郑振铎著，商务印书馆 1925 年版。
- 《我的老师泰戈尔》，魏凤江著，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 《中印人民友好关系史》，林承节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 《东南亚华侨史》，朱杰勤著，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0 年版。
- 《南洋华侨史话》，巫乐华著，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
- 《德国文化史》，杜美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 《法国文化史》，罗凡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 《20 世纪的中英关系》，萨本仁、潘兴明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外文文献

- A. Kemp-Welch, *Stalin and the literary Intelligentsia, 1928-1939*, London 1991.
- Barry Keenan, *The Dewey Experiment in China: Educational Reform and Political Power in the Early Republic*,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 Bertrand Russell, *The Problem of China*, London and New York, 1922.
- Deming Brown, *Soviet Russian Literature Since Stalin*, Cambridge, 1978.
- E. Stuart Kirby, *Russian Studies of China: Progress and Problems of Soviet Sinology*, London, 1978.
- George Dykhuisen, *The Life and Mind of John Dewey*,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73.
- Herbet Frank: *Sinologie an Deutschen Universitaeten*, Wiesbaden, 1968.

John Dewey, *Letters From China and Japan*, *New York*, 1920.

Hartmut Wairavens: *Sinica und andere Periodische Publikation des Frankfurt China Institut*, *Muenchen*, 1981.

Marc Solonim ed., *Soviet Russian Literature: Writers and Problems, 1917-1977*, *New York*, 1977.

Salome Wilhelm: *Richard Wilhelm-Der Geistige Mittler Zwischen China und Europa*, *Eugen Diederichs Verlag*, *Duessldorf Koeln*, 1956.

《日本现代文学全集》，伊藤整等编辑，东京讲谈社 1980 年版。

《日本近世思想史研究》，前田一良著，文一总合出版 1980 年版。

《现代の社会学》，居安正等编，京都ミネルウア书房 1981 年版。

《日本と中国——技术与近代化》，吉田光邦著，东京三省堂 1989 年版。

《日本してずける东洋史论文目录》，东洋史研究论文目录編集委员会编，东京学术振兴会 1964—1967 年版。

《中国文化史日本語文献目录》，-教育・キリスト教-，多贺秋五郎、矢泽利彦著，东京近代中国研究会油印，1955 年。

后 记

在世界知识出版社的鼎力支持和李喜所教授的擘划统筹下，本书几经寒暑，终于和广大读者见面了。能为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做一点基础性工作，实在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

本书写作分工如下：全书写作大纲的拟定、第一、二、四、六章的写作由元青负责；第三章由唐艳香负责；第五章由肖立军负责；第七章由颜珠负责；第八章由宁美菊负责。全书最后由元青审改定稿。

在本书撰写过程中，作者查阅了大量中外文文献资料，并注意吸收了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力求能言之有据，客观再现民国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面貌。限于条件和水平，文中定有不妥之处，深祈专家、读者不吝赐教。

元 青

2000年8月于南开

作者简介



元青，天津市杨柳青人，1963年生。1985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并留校任教，1999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和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主要著作有：《杜威与中国》、《梁启超传》（合著），另外还发表了《梁启超中西文化观的典型意义》、《民国时期的中国留德学生与中德文化交流》等论文二十余篇。曾于2000年9月至2001年8月被聘为访问教授赴韩国延世大学进行学术研究。